民國叢書

第二編

·35·

經濟類

中國農村經濟論文集

千家駒編

中國農村經濟論

馮和法編

上海書店

發刊辭（代序）

農村問題現在已經變成了全國最嚴重的問題，它不但決定了社會的動亂與安定，而且中華民族的前途，四萬萬廣大民衆的生存也因農村的崩潰而感受到莫大的威脅，這已無須乎用什麼數字來證明，而爲每個有識見的人們所共認的事實了！

中國農村問題的嚴重當然不是自今日開始的，自鴉片戰爭以來，西歐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挾其廉價的商品擊破中國經濟自給自足的萬里長城後，中國的農村便開始其崩潰的過程。資本主義商品的侵入打擊了中國農民的副業，切斷中國農村農業與手工業的聯繫，而且擴大了一般人民消費品質量的範圍。同時因國內的連年混亂與災患的頻仍，不但把城市弄得百業蕭條，把生產機關破壞得不堪，且必然地會把農田荒蕪，把農民擊落到貧窮的深淵中去的。農村崩潰的過程表現得最顯著的，莫過于災況區域的擴大與農村生產的衰落。這所謂災況，不僅是水旱天災，而且是兵禍與匪患！即就天災而論，也決不是什麼「天意」而是「人爲」的結果。因頻年的戰亂而使溝渠長年失修，河工的疏于防範，因農村凋弊而使水利與植林事業無人注意，這些都是發生水旱的重要條件。其次，更因農村過度的窮困與飢餓，平時既不能講求衞生，病時更無力延醫服藥，飢餓致斃之人，棄屍遍野，鋒火兵刃之餘，暴骨平原，這些都是發生疫厲重

要的原因。水旱與疾疫決不是什麼不可以人力挽回的天災，而是社會條件造成的人禍。至於匪患與兵災，其爲人謀的不臧，更是不用說的了。由於災況區域的擴大，其必然的結果就是農村生產的衰落，這不僅可由耕地面積的減少得到證明，同時也可在海關貿易冊中每年巨額食糧的入超這一事實證示出來！因爲中國農村這種山崩地坼的破產過程，所以如何救濟中國農村問題才被一般人所注意，正式提到主要的議事日程上來了！

有的人們把中國農村的破產視爲產業革命過程中應有的產物，與十八世紀西歐農村破產的過程相彷彿，這我們是不以爲然的。我們知道，當西歐資本主義抬頭時，產業革命固然摧毀了封建制度下農村中間的生產平衡，中小地主的沒落與廣大農民羣衆的破產固然使農村中充滿着悲慘的氣象，但因都市工業的發展開始吸收了這批離開土地而流浪於街頭巷口的農民；同時，又因都市資本主義向着農村中的伸張，使落後的農業也跑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於是農村又開始其新的發展。農業勞動者是在農業資本家雇傭之下，改良土壤，使用新式勞動工具，來進行其農業生產的。所以在剝削關係上，固然是農民的剩餘價值被農業資本家所剝削；然在勞動生產力上，它却比封建經濟時代進入到更高的一個階段。但中國所走的道路却與此不同的，舊的農業是受資本主義的洗禮而破產了；但新的生產力並沒有在農村中建立起來。都市的民族工業又因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交互的壓制下而得不到迅速的發展；成千成萬被迫

離開土地的農民，若要不在飢餓線上奄奄待斃，就只有流爲盜匪，或出外從軍，形成國內軍閥混戰時的血肉工具，這又轉而促進農村的破產化！農村愈破產則流爲兵匪的愈增多，兵匪愈增多則農村愈益加速其崩潰。這種交互影響，因果循環的連鎖如果不被打破，則非但中國社會根本沒有出路，有數千年光榮歷史的中華民族也終會有「時日曷喪，與汝偕亡」的一天的。

感於農村問題目前的嚴重與迫切，我們幾個朋友所以才有「農村週刊」的刊行。我們是一羣自由的組織，裏面有大學教授，有實際從事農村事業的人，也有一大部分是社會科學研究所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研究人員。因爲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們並不想藉此來高談理論或貫徹一種什麼主張，我們祇是希望把中國農村破產的眞相如實地暴露出來，使沉醉於都市生活的人們也可以看看爲中國經濟基礎的農村社會究竟已崩潰到何種程度？我們同時也願意究明農村破產眞實的原因是在那裏，以揭破那些不顧事實信口雌黃的理論家之虛僞。有時，我們自己假如對救濟農村或改良農家經濟有愚者一得的意見，也極願意把它公表出來，請求國內外專門學者的指示與批評。總之，我們不需要高深的冗長的理論，我們祇要有根據的平凡的事實。離開了實際，我們認爲無理論之足言。「眞理常常是具體的，」這句話便是指這樣而說的。一個社會科學家處理實際問題的武器要有統計與調查，要有分析與綜合，要有假設與實驗。不僅是這樣，同時我們還要求從動的狀態中，從一切事態的關聯中來了解事實，由這樣觀察到的事實，

才是眞確的有根據的事實，由此得出來的理論，才是正確的理論。「農村週刊」的文字，我們希望能做到這點。至於每篇論文的主張與態度，也許有時不必一致，因爲這是由每個作家自己的立場而決定的；不過我們不願說無根據的話，不發揮空泛的議論，則編者可負全責，並願以此與國人共勉！

編例

一、本集乃選集天津益世報農村週刊之論文而成。按其性質，別爲三類：一爲一般理論之檢討；二爲研究與調查；三爲各地農村通訊。惟此項分類，初非有嚴格之標準，在理論之檢討中自包括有研究的工作，在研究與調查中亦不能離開理論之闡述；農村通訊雖爲各地農村狀況之速寫，但亦非經相當之調查，不能作正確的描述。故三者之區分僅以醒讀者之眉目計，非判若鴻溝也。

二、本集選刊之文字，均爲在農村週刊初次所發表者，該刊自發行後，承各種刊物及作家不棄，紛紛引用或轉載，如馮和法君所編之中國農村經濟資料續編，卽曾轉載該刊論文九篇，他如中國農村，農村經濟，浙江合作，紡織週刊等刊物亦時轉載該刊論文，或一二篇或三五篇。吾人本學術公開之旨，對於此種轉載，自表極端歡迎。但轉載文字，魚魯亥豕，終所不免，且所轉載者，亦以與彼等有特殊興趣者爲限。本集所選，則範圍較廣，舉凡初次發表之理論（如對於鄉村建設運動之批判，該刊實首創其端）及資料（如關於糧食市場之調查及各地農村通訊），具有較永久性之價值，足供研究中國農村問題之參考者，均一一選入，手民刊誤，亦經作者親自校正，以饗讀者。

三、當本刊創刊時，編者曾撰一發刊辭，說明農村週刊發行之旨趣及編者個人之態度，實足供讀者了

解該刊論文之一助，值茲選集付印，即以之代序。

千家駒，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北平。

中國農村經濟論文集目錄

第二編 研究與調查

第三編　各地農村實況

中國農村經濟論文集

第一編　一般理論之檢討

一　拉西曼報告書之農村部分的研討

李紫翔

國際聯盟駐華技術合作代表拉西曼博士，近爲國聯行政院及對華技術合作委員會所提出之報告書，將「技術合作」之經過與內容駐華技術員之活動，以及中國經濟恐慌之原因，「復興農村」「生產建設」之計畫等，均有或詳或略的敍述。就其內容和範圍觀察，我們可以說它的性質與意義實在十分重大。這一報告書在國際上既獲得英法意等帝國主義者之熱烈贊許，另一方面，復引起日帝國主義者之極力反對，同時在國內亦有贊成與懷疑中國經濟之慢性急性的恐慌，能否由國際聯盟主辦的「技術合作」而達到「復興農村」與「生產建設」之目的，以及這一「技術合作」之性質與其政治的意義。

我人現在避免各種主觀的贊成與反對，打算從拉西曼報告書之內容的客觀的分析上來認識國聯「技術合作」代表之中國經濟恐慌與建設觀的正確與否，和「技術合作」下的「復興農村」「生產建設」於中國有利或是有害，以及這一「技術合作」如果能繼續下去時，在國內及國際會發生什麼可

能的結果。同時，因就本刊的性質與範圍，我人祇就報告書中關於農村的部分作爲我的研討之對象。不過實際上，報告書除了第一章與第九章至第十一章之序論與概述外，其他第二章至第八章無不與農村問題有關，而第二章農業，第三章棉業，第四章絲業，第五章水利，第六章公路，更爲報告書之中心所在，因此，我人對於農村部分的研究與批判，實際上無異是對拉西曼報告書的全部的研究與批判，亦卽是對於「技術合作」之實際的本質的研究與批判了。

拉西曼博士集合國際「技術合作」員特賴貢尼教授，瑪利博士，郭樂城君，司丹巴君，沙爾德君，克利伯君及天津南開大學「著名經濟學家」何廉教授等調查研究中國農村經濟之結果，指出農業危機的基本原因是「中國農業產額低微，高利借貸，賦稅過重，尤以附加稅爲然，及國內大部分所通行苛刻而不經濟之佃租制度，爲造成中國農業危機之基本原因。」在這裏，實在不能不使人懷疑這許多專家們對於中國農業之危機的調查研究與其研究的結論。要不是他們把調查研究的對象弄錯了的話，就是着了有色眼鏡的吧。不然，經過許多專家的研究而公認的基本原因，不僅與最大多數的國人研究之結論不同，而且對於赤裸裸的現實亦不相同。首先我人根據中國的現實的事實來研討專家們之中國農業危機的基本原因觀：

第一中國經濟之衰落尤其是中國農村經濟之衰落的過程中，鐵般的事實，告訴我們帝國主義者的

經濟侵略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因。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中國的發展，造成中國之殖民地化的過程，這是每個科學的研究者，所不能否認的事實。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政策下之商品市場，原料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競爭與擴大，使得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益發隸屬於各個帝國主義者的勢力之下，而成爲附庸——殖民地化的經濟。爲利於帝國主義者之工業製造品與農產品的推銷和原料的獲得而擴大起來的市場，無疑的祇是爲了饒厚的利潤之攫取。即是採取各種形態而輸入中國的資本，政治的投資和經由中國政府之「實業投資，」不過一方面加重中國人民之債務的束縛，另一方面則攫得特殊的政治權利，以爲銷售商品和取給原料之保障；所謂直接的企業投資，則商業資本在造成各帝國主義者在華的特殊經濟勢力，並組織起中國經濟之特徵的買辦制度；其移殖來華的工業資本，則在利用中國之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料，免除商品流通過程上的死費用和某種關稅的負担，而增加商品銷售的競爭力，取得更大的利潤而已。因此中國的農業生產者，不僅要負擔一般資本主義國家之工業品與農產品之交換價格差的損失，並且因爲輸入輸出的商品均爲各帝國主義者的銀行、洋行、以及爲其所操縱的買辦的中國商業機關獨占之下，輸入的「洋貨」每在世界市場價格之上，而輸出的「土貨」則又在世界市場價格之下，壟斷中國市場價格，攫取了特殊的「買辦利潤，」從而更增大了工農業產品——洋土貨之價格剪刀式的差額。此外，帝國主義者對於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雖然要攫取原料的供給，更重要的還在其工業製品以至過剩農產品之推銷。

所以中國自一八七一年以來，對外貿易，永久處在入超，其累積數已約達百萬萬元左右，而自一九〇二年至一九三一年政府債務的本利償還，約有二二七五・七百萬元，外人在華企業投資的利潤，亦有三、一九一・二百萬元。僅就這種可能計算的帝國主義者在華之利潤的榨取已達一百五十萬萬元之巨：這種巨額利潤的榨取，一方面要從壓潰中國固有的工農手工業之生產，另一方面又要使最大多數的工農羣衆成爲帝國主義的工業製品之消費者，這一過程的發展上得來。農村的生產事業，雖日就衰落破產，農村的現金，仍是不斷的流入都市，最後流入帝國主義的國家所以在「中國經濟」的各部門中，除了帝國主義者的在華企業及與其有關的買辦式的中國企業外，無不處於一種的衰落境況，尤其是農村經濟所受榨取與轉嫁之嚴重，自中外通商以來，一直就處於慢性破產的過程。近數年來更因受了國內外，特別是帝國主義者之經濟與政治的襲擊，遂不能不爆發爲含有特殊意義的半殖民地的經濟恐慌，尤其是農村經濟普遍地急速地破產下去。這一普遍的客觀的事實，不會爲國聯指派下的專家，在實際調查中所看見，在五萬餘言的報告書中，竟無一字提到，這決不是偶然的罷！拉西曼博士等因爲其後面所代表着的帝國主義的立場，不能不把這一中國經濟恐慌的基本原因輕輕放過，不能不意識的歪曲事實，掩蔽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侵略的罪惡；並且在爲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政策說教，企圖在「復興中國農村經濟」與「生產建設」的幌子下，來擴大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之新園地。這是在報告書的全部內容上所明白報告了的。

第二拉西曼博士對於中國農業危機之內在的原因，雖指出「苛刻而不經濟之佃租制度」爲基本原因之一，然其立意不過欲在現存剝削制度之內，企圖施以某種改良，所以不僅對於「或爲社會經濟紊亂之原因」的佃租制度，沒有什麼澈底改革的建議；對於中國土地分配的分析，尤盡巧妙曲解之能事。比如拉西曼博士曾引用材料，證明黃河以南占人口百分之六十一的地域，平均佃農已占到百分之四十三，半自耕農占到百分之二十五，自耕農不過占百分之三十二之一事實，足以反映土地分配的不均，並已到了如何嚴重的地位，「此種佃租情況，足使情勢更形緊張；」但是又說「詳加研究，似僅有少數地主擁有甚大之面積與歐美相等。」似乎告訴我們中國土地的分配問題，尚不成問題，至少土地集中尚遠落在歐美之後，這種不從中國土地分配的歷史過程上去研究，只是簡單的以歐美相比擬，其目的不過在企圖歪曲中國土地問題之性質與意義而已。因爲中國之自耕農的成分，在與今日先進資本帝國主義國家比較，雖居較高之比率，但是數十年來之自耕農土地的失掉與地主土地集中的趨勢，以及因中小地主之剝削的更加苛刻，致使農民益陷於半農奴的勞動狀況，而急速的破產。所以實際上的中國土地問題，決不是拉西曼博士筆下的那樣無足輕重的，那樣容易改良的。拉博士認爲改革中國土地制度之「澈底辦法」唯在推行十九年公布之土地法，希望經由下列條件「同一承租人繼續耕種十年以上之耕地，其出租人爲不在地主時，承租人得依法沒收其耕地，」「則原有耕地少而交租多之佃戶將一躍而爲執有適量耕地

之田主。」實際上因爲經濟的政治的種種不利條件，所謂「一躍而爲執有適量耕地之田主」，不僅理論上證實其不能實現，並且事實已將這一幻想粉碎了。土地法的自公布迄今，仍只能束之高閣，就是證明。反之，事實上土地以更高的速度，集中於新舊地主和抵押於銀行之手；而且水利的興辦，更加助長新的不在地主之發展，如陝西的涇惠渠，綏遠的民生渠之開通，不過給官吏和商人獲得土地獨占之一機會，就是一好的例證。其次，拉博士對於百分之五十以至百分之七十的地租，則屬望於曾經在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江蘇、浙江、上海等地施行而已失敗了的二五減租，「倘政府機關，能雷厲風行，佃農所受過分之勒索，得以救濟，三分之一農產爲最高租率，似可令人滿意也。」二五減租運動，在上述各地，或由政府命令取消，或迄今未實行；即在所謂最有成績之浙江，既由減租百分之二五，改爲最高租率百分之三七·五，中間又曾爲省政府一度取消，拉博士亦不能不說「此法刻已施行至若何程度，殊難決處，聞尚有多處並未實行採用（租率有高至百分之六十甚至百分之六十以上），司法機關，調停爭議，厲行法律，未能澈底，而地主因受減租法之制裁，乃另用其他方法取償於佃農，以補其損失，減租法則之利益，亦往往爲農民協會所利用（此種組織原爲厲行減租法而成立，現已變爲新式勒索工具），故佃農本身獲利甚微。」由此可見，此種「最滿意而最易成功之試驗」在現狀下實爲一種甚少可能性之「試驗」，則所謂減少佃農地租的負擔，直等於空言。

第三　拉西曼博士對於繁苛的賦稅，亦沒有打算從本質上認識它的封建的剝削性，所以拉博士雖然表面上認爲農業危機的原因，實際上却爲此種剝削方法而辯護了。比如全國經濟委員會指出：「此種舊式田賦，無論有無弊病，若依法徵收，不增附加及額外剝削，或尙不致病民，但田賦促成農業衰落之原因：爲(一)附加稅，(二)各處負擔不均，(三)徵收制度不良因有消耗與勒索之弊也，」這已經爲此種無限的徵收賦稅，攤派，徵發現物和勞力等的封建剝削的制度迴護周到了。而拉西曼博士更說，此種不平均徵收，與各地過分附加，爲農民徵納之總數，雖屬不公，猶可差强人意。惜乎徵收制度不良，使人民受額外之需索，富豪者設法逃稅，致政府稅收，大受影響。至徵收田賦之關鍵人物，並非官吏，乃書吏；其所持之魚鱗册，由其祖宗傳下……吾人不能計算此種制度所包含之逃稅與勒索。」照拉博士的意思，賦稅之所以病民者，倒不在無限制剝削的賦稅制度，只是在於徵收制度不良，特別是書吏的勒索與揩油。「書吏」固是令人訴病的，不過徵收制度與賦稅制度是不可分離的。並且中國之不良的徵收制度，實在不過是封建性的賦稅制度下之產物。卽如書吏的特殊勢力之形成，正是官吏們狼狽爲奸地培養起來的。並且揩油勒索，正是中國數千年一貫相傳的官僚制度的特徵之一，上至高級官長，下至書吏，無不以舞弊相尙，搜括爲能，所以不在根本上改革封建的賦稅制度，剷除官僚制度，舞弊勒索，終無法消滅。因此拉博士避重就輕的爲中國不合理的賦稅制度辯護，不正是暴露了這些專們家在爲帝國主義者利益努力而外，同時還爲中國的封建的

剝削制度以至官僚制度隱諱，並使其合法而又合理的保存着嗎？

第四　高利借貸固然是促進農村經濟之衰落的一個重要因素，但不是什麼農業危機的「基本原因。」我們如果要說明高利貸在農業危機中起了怎樣重大的作用，同時不能忘了商業資本之在剝削農村中之更重大的地位。因爲這都是帝國主義者的和封建的在農村以至都市的兩個重要的剝削形式。高利借貸不僅普遍通行於農村，且亦普遍通行於都市，帝國主義者在華的金融機關就是以放高利貸取得優厚利潤著稱的，並且因此更加促進高利貸在中國，特別是在農村之通行。至於商業資本的剝削對於農村經濟的關係，當更在高利貸之上，因爲它可以大部分支配中小農的生產物和完全壟斷商品的流通。不僅「江西農民所得農產物之售價，與上海消費者購買之市價，其相差至少一與二之比，」而農民所購買必需物之市價，與世界市場的售價相差至少又不祇是一與二之比，「此卽居間人輾轉剝削有以致之也。」此種居間人，應該包括中國舊式的新式的商業機關和帝國主義者的洋行與公司，及其在內地遍設之「經理處」，而帝國主義者在通商口岸所設立之包辦中國國際貿易的出入口洋行，就是組織並指揮此種居間人——買辦式的商業機關之司令部。這大概又因爲關聯到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中國的問題，所以在報告書中又被略去了。

第五　至於專家們認爲造成中國農業危機之基本原因，中國農業產額的低微，我們的認識亦完全

不相同。我們不否認中國農產額的低微，『非獨每人平均生產量，即土地絕對生產量，亦在水平線以下』之一事實，然而這亦不過是證明中國生產的落後而已。『產額的低微，』既不能作爲帝國主義的剩餘農產物輸入傾銷之原因，亦不能解釋「生產過剩」的農業危機的事實。照拉西曼博士分析，「此種產量之低微，一部分固有由於技術之不精，一部分或亦受社會經濟情形之影響。」此種「或亦」影響到產額低微的社會經濟情形，照我們在上面的分析，固完全由於帝國主義的和封建的殘酷的榨取所造成，而非技術不精的本身所固有。拉西曼博士既承認社會經濟情形，「或亦」影響到生產量之低微，則其「均認農業產額低微」爲農業危機之最重要的基本原因亦已不能自圓其說。況且「技術之不精，」據特賴貢尼教授報告，「如種子之最宜於中國風土者尙未普遍應用，人造肥料亦未充分施用，輪作法仍墨守成規，獸病蟲類之科學防治法，不知採用，畜牧事業，本可改善農人生活，而在揚子江之南部，則毫無所知，農人所用舊式農具，過勞人身，亟應改良」等，此種「專家」報告的技術不精，是否正確，自然須待專家再來特加審查。但就其列舉的各項說其所以「不精」的原因，幾無一不爲社會經濟情形和政治情形的影響之所致。比如以占農業技術之主要地位的農具說罷，（農具的改良，在國聯的專家們看來，大概沒有充分施用人造肥料重要吧……），中國舊式的農具之簡單與不經濟，據韓德章君之計算，經營一華畝的穀子，自整地布種以迄收穫儲藏，共需人工八，畜工五，經營一華畝的棉花，要用十四個人工同一個半畜工。這十四個人工，

可以折算成一百四十小時，而美國農家生產一華畝的棉花，不過只用十八小時，生產一華畝的穀子還要減少三五小時，這其間效率的差異，多半是由於農具和動力使用的不同。可見中國舊式農具之效率的如何微小了。但是如要研究中國農民爲什麼不能採用新式農具和動力，首先就要考慮在雙層壓榨下的農民，年甚一年的深陷在凍餓的死亡線上救死不遑，如何能有餘力作農具的改良。況且像通海墾殖公司等那樣大規模的農業公司，亦因勞力低賤於器械，而把費了大量資本購買來的農業機器，廢棄不用或改作他項用途。其次假設中國農民能改良了農具或採用了農業機器，（其實在現存條件下，這祇能算是沒有實踐性的假設，甚至拉西曼博士也說，「此種設法改良農業技術（按指各農業試驗場之試驗改良主要作物之育種）雖屬可能，然在合作事業未臻發達之時，恐不易使農民注意此項改良方法及勸導其採用」。事實上，作爲農業技術改良之前提的合作事業，特別是生產合作事業，在目前之不易發達，又已被決定了的，）即使農業生產技術可以與現代資本主義之王的美國相比，農產物生產量大大地增加起來，麥子增加到當燃料來消費，棉花增加到要強迫農民剷除棉苗，這亦沒有消滅農業危機的原因，反之，却是把農業危機更加擴大而深入了。

由於生產技術落後所致農產額的低微，既不是中國農業危機之基本原因，同時在現狀下又沒有實踐性的技術改良，根本上又只能促進農業危機之深入與擴大，那末爲什麼國際對華「技術合作」的許

多「專家」們，硬要把產額低微與技術不精，看作危機的基本原因最重要的一個呢？我們在這裏要指出的，這許多專家們既然主要的任務是要掩蔽帝國主義侵略的罪惡，另一方面因為氣味相投，或者投鼠忌器吧，又要對於封建的剝削，多方曲解，蒙蔽其眞相。因此，最聰明的辦法，是讓技術不精的產額低微，擔負了農業危機的基本原因之責任，因為技術本身既不會說話，而使用技術的農民，亦是不會說話的！

第六　報告書的出發點，既不站在中國民族的立場上，更不是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上，因之對於解決中國農村問題的許多建議，亦是不澈底的，不正確的和加深中國之殖民地化的。這可分為兩方面來說：

（一）它們對於土地集中到少數地主手中的趨勢，是採用着鼓勵的態度，對於地主的土地所有權之動搖，是從法律上去鞏固了和保證了的。打算名義上以給佃戶永不能獲得的「耕地所有權，」使動搖着的地主的土地所有權，與地主階級的勢力強有力地再被保障起來。其次，百分之三十七又二分之一的地租率，已否適宜於農民負擔能力之標準，專家們並沒有提供我們以科學的研究之結論，況且民國十六年之二五減租運動，正因政府機關之能「雷厲風行」地失敗了下去的，現在報告書中既沒有提供什麼新的條件，使這一成為歷史之陳迹的「尙稱最滿意而最易成功之試驗」可以復活起來的。其次，關於賦稅之改革的最大目的，如上面所分析，亦不過在使「負擔平均」和代「書吏」以「官吏」於賦稅制度本身和勒索揩油的徵收制度，並沒有本質的變革，已是十分明顯的。最後，對於以上的各個因素，既沒有澈底的改

革，最多只是希望作到某種限度的改良，將已劇烈化的各種矛盾緩和一下，因此，他們將一切「改良農業技術，」改良借貸和改良運銷之前提，放在萬能的「合作社運動」上，並且企圖由合作社運動挽救中國農村之破產，正確一點說使咆哮起來的半農奴們安靜下去，來維持現存的制度與秩序。(一二)我們可以在報告書中看出一個强力化的一貫方針，即使中國農民之工業品購買力恢復起來，換言之，即使帝國主義者之商品市場擴大。表面上似乎在計畫中國某種農產品的自給或某種農產原料的恢復世界市場，而實際的目的不過完全是使農民有餘力作為帝國主義之工業製造品的購買者罷了。如報告書關於棉花之求自給，則說「若中國農民利用改良棉種，則每年可不必購買外棉，此項財力，可用以購置機器及其他現在不能自製之物品，」關於改良絲業之品質，減低絲價，劃一品質，恢復世界市場之地位時，又說「絲業之發展，向予農村以相當生產剩餘，目下斯業既日趨衰頹，殊是使中國成一貧弱之工業品購買者。」這誠不免透露了國際之熱心於「復興中國農村」之真實的目的，同時，亦可以看出中國農民購買力的恢復與市場的開發，對於經濟恐慌中的帝國主義者是如何地迫切與需要了。並且，不論這些試驗將來對於中國的成果怎樣，而在這一試驗過程中帝國主義者之過剩的工業品可望大大的銷去一部分。如以建築公路說，最近兩年由全國經濟委員會協助督造完成之公路，計達四千餘公里，今年計畫建築者達五千餘公里以上，現在七省可聯絡互通車者共計一萬三千餘公里，因之每年汽車的輸入已在四五千輛，汽油的輸入

亦達三千萬加侖，兩共計約值五千萬元左右。連年的經濟恐慌並未影響到汽車汽油之增加，就可見建設公路對於進口工業品是生了如何效果的了。至於公路汽車能否便利農產物之輸送，我們可由公路處搜集各種交通工具之運費比較，以汽車爲最貴，可以測知每公里每噸之運費計汽車高於鐵道三倍至八倍，高於汽船五倍至十三倍，高於帆船十倍至十三倍，高於大車二倍至三倍，高於小車一倍至二倍半，並高於驢馬駱駝之運費一倍又四分之一至二倍左右。這種高率的運費自然祇能加速工業品之輸入農村，而阻礙農產品之輸出的。並且「所築之公路與農民無大關係，因彼等甚少利用，反覺土地充公與賦稅增加之苦也。」最後在「復興」與「建設」之下，必然大量的引起外資之輸入，如今年度的經委會經費，必有待於美棉借款者，更可推測今後依賴於外資之殷繁。過去利用外資的歷史教訓我們，必然要擴大帝國主義者之勢力和使中國整個國民經濟完全隸屬於外人的統制之下，加速地殖民地化；如果輸入外資而引起帝國主義者之表面化的衝突，如最近日帝國主義之反對「技術合作」而大喊別的帝國主義者「從中國拿開手」時，自然加速瓜分與共管之激進，同時又加速內戰之進行，兵連禍結，愈演愈烈，無疑的是促進經濟恐慌之深化，和阻礙民族解放運動之發展了！

總起來說，我們從民族和民眾的立場上研究拉西曼報告書之結果，深深的感覺中國之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殖民地化的黯影，是怎樣有力地威脅着全民族的生活，同時對於這些搖鵝毛扇的「客卿」們，

深信他們是在怎樣巧妙地玩弄着「掛羊頭賣狗肉」的得意把戲。假使有人說報告書的一切建議，對於中國亦有有利的地方，那末，如我們在上面所客觀地研究的結論所示，它所賜給的某種小利小惠是可以計算的，而其潛藏和必然隨着而來的民族和民衆所受的害處，則是不能計算的呵！

一九三四，七，二十一日

二　論「定縣主義」

吳半農

平敎會在定縣的鄉村實驗工作顯然已經引起中外人士極大的注意。我爲滿足注意平敎會的工作而沒有機緣前往參觀的人們起見，曾在「河北鄉村視察印象記」中，用了很長的篇幅，把自己參觀時的所見所聞詳細地寫了出來。寫的時候，我完全採取客觀敍述和描寫的態度；我沒有參加絲毫的意見和批評，因爲我相信，一件工作的內容之忠實的介紹便是這件工作的性質和意義之一極好的說明。但是有些意見却也值得特別提出談談的，所以我又執筆寫這篇文章。

我沒有到定縣以前，常常聽到人家說，定縣的工作是美國的金圓鑄成的，縱然試驗成功了，其他的縣份和其他的省份也決沒有能力來仿效牠。這次到了定縣，我覺得這個批評多少有些寃枉了平敎會的工作——至少目前的平敎會決沒有把美國的捐款拿來作「奢侈的遊戲」他們確實是在那裏研究和尋找各種簡單易行的制度，以供全國各地之採用。而且有些試驗，如保健制度，如實驗小學，却已有了很好的成績。又有人說，定縣的工作沒有一定的哲學和理論，只是零星地亂幹；這個批評，照目前的情形說，也不十分正確。目前的平敎會確有它整個的「一套」他們相信中國之所以弄到目前這步田地完全是因爲「愚」「窮」「弱」「私」四個字在作祟。要救中國，便得先救這四個字。於是他們提倡「文藝敎育」以

救「愚，」「生計教育」以救「窮，」「衞生教育」以救「弱，」「公民教育」以救「私。」爲要推行這「四大教育，」他們並且提出了「學校」的，「社會」的，「家庭」的「三大方式。」這確是他們的「一套。」有了這「一套，」他們才引以自豪，並博得許多參觀的外人之贊賞——甚至有少數的外人，如 *Edgar Snow* 之流，居然把他們的工作稱之爲「定縣主義。」

所以我覺得定縣的工作不是有沒有整個的哲學和理論的問題，而是這整個的哲學和理論是否正確，是否抓到了中國整個問題之癥結處的問題；換句話說，便是平敎會所提出的「愚」「窮」「弱」「私」四字是否是中國整個的根本問題癥結之所在。

這里我敢武斷地說，中國目前弄到這樣「民不聊生，」「國將不國」的地步，其根本原因決不在「愚」「窮」「弱」「私」四字，這四個字充其量不過是中國社會四個病態的現象而已。「怎樣發生這四個病態的現象？」這個問題是要分開回答的。我們先來談談「愚」字。

平敎會所說的「愚，」我想大約是指農民的文字教育而言，因爲談到實際的農業知識和社會經驗，也許一位大學農科的學士或博士還不如一位目不識丁的老農來得切實。那末中國農民的文字教育爲什麼不能發達呢？這個問題，平敎會的統計調查處已經給我們從事實的調查中找出正確的答案了。他們調查的結果發現定縣最富的村也是最有教育的村。可知「愚」這個字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是隨着

「窮」而來的產物。

其次我們談談「弱」字。平敎會的工作是以農民爲對象。目前中國鄉村的農民之體格和一般在都市中過慣了奢侈淫逸的生活的老爺，少爺，太太，小姐，乃至敎授，學生……比較起來到底是否衰弱，當然是一個頗成問題的問題。平敎會之所謂「弱」，如果是指農民的體格和吃苦耐勞這兩點而言，我想不敢苟同的當不止我一個人。他們之所謂「弱」，或者是指鄉村的新式衞生事業和醫藥設備之不發達而言。如果我這假定不錯，那末「窮」的問題又跟上來了，一個縣份的人口居然有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窮得終年不吃食鹽（依據平敎會瞿菊農先生的估計，）我們還要勸他們講求衞生，提倡新式醫藥，我想不管「保健制度」想得怎樣妥善周到，也不容易收到普遍的效果的。

再其次我們談談「私」字。這里，我們先得說明一個事實。中國的經濟，直到目前爲止，還是基礎於農村生產之上，廣大的直接生產者畢竟還是農民。什麼是直接生產者？簡單的說，便是直接創造「財富」的人。誰都知道，目前中國有這樣一種現象：在都市裏，大批不生產的寄生份子，如軍閥，官僚，買辦，地主……擁着巨大的資金，整日度着花天酒地的淫蕩生活，而在鄉村裏面，廣大的創造「財富」的人却正在極度的貧困中，任憑統治者加稅攤捐，拉夫派差而不敢稍有怨言。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還說農民「自私，」除非主張把農民一日還得不到兩頓白薯的食料（定縣的農民普通一日只吃兩頓白薯）也索性拿了出來

供寄生階級揮霍。所以中國的農民，如果說是「自私，」這個「自私」至多也不過是他們在重重剝削下的一種最低限度的自衞手段而已。我們叫他們不要「自私，」除非叫他們不要生活。何況從經濟制度本身來說，中國還是一個私有財產的社會呢！

再其次我們談談「窮」字。這確是中國農村一個極重要的問題。我們討論「愚」「弱」「私」三個問題的時候，亦已知道每個問題都和這個「窮」字有極深切的關係。我覺得這個問題是要特別加以重視的。平教會把它拿來和「愚」「弱」「私」三字相提並論，當然是他們忽略了這四個字之間的比重及其相互之因果關係。不過這裏，我們也得提醒一句。農村窮困雖爲中國目前最主要的問題，同時並爲「愚」「弱」「私」之最主要的原因，但其自身仍然不過是中國社會之一病態的現象而已。中國農村爲什麼這樣窮困，是另有重要的原因存在的。關於這重要的原因之檢討當然不是本文的職責，不過我們於此也不妨約略提到一點。中國農村之所以窮困到目前普遍破產的地步，其根本原因可分外在的及內在的兩方面。外在的方面，我們可以提出的，第一是帝國主義的商品之長期的侵入；以往不究，僅以民國以來，這二十二年間的對外貿易而論，入超總額卽已達七十六萬萬餘元；中國的農村人口要占人口總數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這筆鉅大的款項直接間接當然是從農村流出去的。第二是軍閥的混戰；民國以來，連年混戰的結果，約計損失至少當在百萬萬元以上；這筆損失歸根到底也是要農民來負擔。第三是水旱天災

（這些天災當然不是「天意」而是「人造」的；）別的不算，僅以民二十年的長江水災而論，損失卽達二十萬萬元。第四是匪患；匪患發生之根本原因當然是由於一方農村經濟急劇破產，一方都市工業不能發展，以致失業農民無處吸收之一事實，但其結果亦足以減低農村生產力；並使農村資金，隨着地主的遷移，益發集中於都市。第五是苛捐雜稅；目前各省各地捐稅之離奇與繁重及其破壞農村生產之作用已是一件盡人皆知的事實，無須詳述。這些都是外在的原因。至於內在的方面，我們可以提出的，便是地主，高利貸資本及商人資本三位一體的高度剝削作用。

這些都是中國農村急劇貧窮化的根本原因；把這些原因歸納起來，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破壞中國農村，或是說，破壞中國社會的主力，一是帝國主義，一是封建勢力。

平教會却沒有注意這些根本問題；他們只是把四個輕重各異的病態現象相提並論地拿了出來，作為他們實驗工作的理論之基礎和出發點。這當然不能責備他們的。平教會本身的性質和社會背景，便會使他們不敢正視這些根本問題。他們雖然不理會這些根本問題，但他們所要解決的却正是這些根本問題。他們要建設農村，他們要「復興農村，」他們還要「使中華民族能於建設工作中創造一個新的生命」。一言以蔽之，他們要從撇開中國根本問題，以謀解決中國根本問題之一夾道中去找出路。這當然會使他們常常碰壁的。我現在舉出幾個實例以結束吾文。

例如他們爲要提倡農村工業以裕農民生計，曾在高頭村設立了一個小規模的毛棉紡織廠，用意不可謂不善。但是當地的農民因爲近來棉織品賣不起價，偏偏不願來學，以致該廠不得不移至城裏（詳細記載見「河北鄉村視察印象記」）這是因爲什麼？因爲目前的中國已經不是一個自足自給的地方性的社會（幾年以前，曾經著過一本「中國工業化之程度及其影響」的小冊子，以統計數字證明中國的工業化業已獲得長足的發展的何廉先生，最近又在「獨立評論」第九十三號上發表了一篇「中古式之中國經濟，」說明中國目前的經濟還停留於地方性之一形態上。說中國的工業化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當然是言過其實；說中國目前的經濟還是地方性的，則又未免矯枉過正。中國的絲茶不是在七八十年以前便在世界市場上占了一個極重要的地位嗎？再說國內的市場，中國無論那個偏僻的地方不是都可以找出外洋的商品嗎？其實中國便是這樣一個奇怪的社會：在一方面，生產雖停滯於中古的形態，但在另一方面，廣大的農村却早已捲入世界市場之林，）每一農產品的產銷差不多都要受着世界市場的操縱和影響。我們閉着眼睛，在一個外貨可以任意傾銷的毫無保障的國際市場上，空叫農民養「來航雞，」改良麥種，改種美棉，乃至復興家庭紡織副業，是決不能濟事的了。這是一個例子。又如該會霍六丁先生長定縣時（現霍氏已去職，）深感「白麵」爲害於農民太巨，於是多方努力，限期禁絕。用意亦不可謂不善。但是等到快要達到目的的時候，忽逢某方軍隊進駐定縣；該軍隊的頭目一到該地便把禁「白麵」的負責

人找了去，拿出大批「白麵」請他代爲銷售，否則，卽請負擔該軍隊的一切餉用，這樣一來，數月努力的成績，立卽化爲烏有。現在這一部分軍隊聞已他遷，但據最近章元善先生在其「從定縣回來」一文中所述，當他離開定縣的時候，又是「兵車絡繹於途，開到了許多軍隊。西關一帶，兵馬滿街，家家門口，已劃上軍隊符號的粉筆字。」章先生說：「像東建陽這個村子，經濟雖不景氣，人民還能安居，充滿新氣象。這一點小小成績——代表平敎會多年的經營——是經不起大兵們一天的光臨的呢。」這兩個事實是表示什麼呢？這是表示：一國的根本問題沒有解決以前，一切建設都是沒有前途的。這又是一個例子。又如他們利用新年的機會，在高頭村所作的「化私爲公」的家庭設計會，依據陳筑山先生的報告，雖然說是很有效果，（參看「河北鄉村視察印象記」）但據我們在高頭村和兩位農婦談話的結果，則似乎還值得研究。這兩位農婦聽了我們問她們的意見時，所作的答覆是：「有什麼意思！「財主老」才有意思呢！我們窮人還不是湊湊數。」這是說明什麼？這是說明：一個社會事實上既劃分着貧富，我們要想用一種「設計」消滅窮人對富人的反感，鮮有不失敗的。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如果能代窮人說出一點痛苦，我們馬上便會得到他們的反應的。熊佛西先生描寫高利貸資本剝削農民的劇本——「屠戶」——不是已經博得台下的青年農夫之狂呼麼——雖然這個劇本的結尾還是一個河淸無日的「好人政府」！（參看「河北鄉村視察印象記」）

還些都是我們在定縣三日所見所聞的例子之一部分。平敎會的同仁在實際工作中所遇到的這類的問題當然決不止此。

我的文章就此「帶住。」最後我還要補充一句：平敎會的試驗，目前還在進展中。他們時時是在求進步。我這點小小的意見不知於他們的試驗的演進，能發生若干作用否？

一九三四，四，二十一日

三 定縣的實驗運動能解決中國農村問題嗎？

千家駒

——兼評民間半月刊孫伏園先生「全國各地的實驗運動」——

自從近幾年來中國農村加速其崩潰的過程後，救濟農村的理論眞如風起雲湧，目迷五色；這種理論因基于各人的立場背景與認識之不同，所開的方案亦盡五花八門之能事，就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鄒平的鄉村建設研究院與定縣平教會的實驗運動。因爲他們不僅有其一貫的理論，而且還正有許多人在埋頭苦幹着，他們都忠實于其所信仰的學說，深信這種工作可以解決農村問題，甚至中國的基本問題。尤其是定縣的實驗運動，目前不但已經引起了中外人士的注意，而且甚至有人稱這種運動爲「定縣主義」；也有人視爲這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唯一途徑，而把它拿來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辛亥革命等相比擬。平教會的文藝教育負責人孫伏園先生最近在民間上發表的全國各地的實驗運動，就是基于這種出發點來說話的。這種理論，在中國社會正在急劇演變之中的今日，實有予以批評之必要。

按主持定縣實驗工作的平民教育促進會，成立於民十二年，最初是晏陽初先生的平民千字課運動，以後晏君在實行識字運動的時候，發現吾國民族之病根，不僅缺乏智識，而是缺乏智識，缺乏經濟，缺乏健康，缺乏合羣的習慣，簡言之就是「愚、窮、弱、私。」他又覺得，在大都市裏除文盲，收效遠不如在農村裏來得

宏大，因此他們就決定了集中農村實驗的計畫，而以定縣爲一個澈底的集中的整個的縣單位實驗。他們到定縣是在民十五年，以十五至十九年爲準備時期，十九年以後爲實驗時期。準備時期內「最主要的是在客觀事實上發現愚，窮，弱，私四種基本缺點。」針對這四種基本缺點，於是有所謂「四大教育，」以「文藝教育」救農民之「愚」，以「生計教育」救農民之「窮」，以「衛生教育」救農民之「弱」，以「公民教育」救農民之「私」，實施這四種教育的方式有所謂社會式，學校式與家庭式。他們的工作系統，依據自己的說明，有如下圖所示：

愚、窮、弱、私（基本問題）——→統計調查（社會事實）——→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公民教育（教育內容）——→社會式，學校式，家庭式（實施方式）——→農村建設。

換言之，他們以愚、窮、弱、私，爲中國社會的基本缺點，以農村建設爲工作之最終目標。定縣是他們實驗之中心區，由定縣之實驗而推廣全省以至全國，「使農村復興得到具體進行的方案，使國家得一條基本建設的新路，使中華民族能於建設工作之中，創造一個新的革命。」（見定縣的實驗）

孫伏園先生對平敎會工作的估價更使得我們吃驚。孫先生以爲自鴉片戰爭以來，爲挽救垂亡的國運，曾經發生過六次運動，第一次是太平天國，第二次是戊戌新政，第三次是辛亥革命，第四次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第五次是一九二五——七年的國民革命，「以上這五次運動，目的都在挽救鴉片戰爭以後垂亡

的國運論範圍是一次比一次擴大，論意義是一次比一次深沈，論對於挽救危亡的目的，是一次比一次的接近，」但是結果「危亡的徵象也一天比一天的增加和暴露。」這到底是什麼道理呢？據孫先生說這是由於還有幾種「缺陷，」這些「缺陷」據說第一是「爲國事分擔憂患的人太少」了，……在「憂國的」和「不憂國」的兩種人當中，天然有一條極嚴的界限，憂國的是國民，不憂國的是「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主義下的「無國之民」第二種缺陷是「享受到國家利益的人太少了。」第三是「國家的政令，法律，制度，全不從人民產出，所以大抵不能適合於一般人民的生活」爲補救這三種缺陷，所以有第六次運動，這便是「全國各地的實驗運動。」這種運動，孫先生舉出了江寧和蘭谿的實驗縣，鄒平和定縣的鄉村教育的實驗工作，這四處地方爲例。

明瞭了定縣實驗運動整個的哲學系統與他們對這運動的估價與希望後，我們就可進行批判的工作。

第一，我們必須指出：定縣平教會對中國社會的整個認識是錯誤的。他們以爲中國社會的根本病根是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農民之「愚、窮、弱、私，」所以要救中國必須針對這四個字着手。可是他們從沒有想到「愚、窮、弱、私，」祇不過是中國社會病態之一個表現，其眞實的原因，是深深地埋在這四個字的底裏的。換言之，僅知道了「愚、窮、弱、私，」這種表面的現象是不够的，我們必須進一步去追究爲什麼中國的

農民會「愚，」會「窮，」會「弱，」會「私？」它底眞實的根本的原因在那里？「愚、窮、弱、私，」是中國農民天性賦與的呢；還是有它社會的經濟基礎的？如果有它的社會經濟基礎的，則這種基礎又是些甚麼？但平敎會的人們是不敢正視這些問題的，因爲誰要眞正探究起「愚、窮、弱、私，」的社會經濟基礎來，他就不能不承認資本帝國主義之長期的經濟侵略與國內封建勢力之殘酷的剝削是造成中國今日農村破產之主要的原因。由於帝國主義廉價商品之如怒潮的輸入，中國農村之自給自足經濟爲之破壞，農家副業爲之破產；而且因長期入超的結果，近幾年來金銀都集中到條約口岸而大部分關入外國銀行之保險庫中去。又因封建軍閥連年的混戰與豪紳地主超經濟的剝削，高利貸資本與商人資本之盤剝，農村災況之頻仍，農村田園爲之普遍荒蕪，地價爲之普遍跌落，貧農爲之急遽增加。在這種種條件之下，試問農民那得不「窮？」因爲窮得連飯都沒得吃了，你還能怪他們不認識字，不講求衛生與自私？平敎會的人們如果能虛心地對於鄉村問題作一客觀的觀察，就可以知道「愚、弱、私，」僅不過是「窮」必然的結果，而「窮」自身又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封建勢力的剝削，以及水旱天災等等條件所造成的產物。如要救濟農民之「愚、弱、私，」首先必須使他們普遍有飯吃，有衣穿，而如何使他們有飯吃，有衣穿，這決不能僅訴之於「生計敎育」（關於生計敎育之不能救「窮，」下當詳論之）而必須根本剷除造成「窮」而且現在正以加速率製造「窮」的諸社會條件。如果我們一方面故意忽視了製造「窮」的諸基本動力，一方面又想以枝枝節節的

辦法來作救濟，則不僅舍本而逐末，亦所謂揚薪而止沸，薪不熄則沸不止。然而要談到根本剷除製造「窮」的社會條件來，那我們就一定要結論到推翻帝國主義在華統治與肅清封建殘餘這兩個基本的課題上來了，但這却正是平敎會的人們所不敢提出，不願提出而且有意識地避免提出的。這是因爲從事平敎會的一般人們出身於小資產的智識階級，他們大多受過金元帝國主義敎育的薰陶，所研究的學科又是敎育，他們素來主張所謂敎育萬能，敎育救國的理論的。另一方面誰都知道平敎會的經濟來源是靠向帝國主義者募捐而來的，牠在國內之能合法地存在是有賴於某種勢力之維持的。他們如果提出了「要救中國農民之窮困，必須根本剷除造就窮困的條件，」那麼平敎會不但會立刻失其經濟基礎，而且早就不會取得其合法的社會地位：當然更不會得到一部分中外士紳之交口稱頌了。這就是平敎會人們之所以不能對於中國社會有正確的認識之社會的原因。

第二，平敎會對於中國社會的整個認識既然是錯誤的，他們根據這種錯誤認識而開出來的方案當然也會藥不對症。自然，他們在一個小縣之內每年化上了二十萬元左右巨款（這我們決沒有意思說他們多化了經費，幸讀者勿誤會，）小小的成績是不難得到的，例如有了許多人在那兒從事文藝敎育，定縣識字的人，可以增加；有衞生敎育，定縣的病人死亡率也許可以減少，這些成績，我們完全承認。不過，這裏我們必須指出的是：在定縣社會經濟的根本組織上，或者更淺近的說，在定縣最大多數民衆的經濟生活

（狹義的）上，並不會因平教會之工作而引起根本的變革；不僅如此，而且我們知道定縣也正逃不出一般農村破產的命運，它的社會經濟正隨着中國國民經濟破產之深刻化，而日就衰落。這用不到我們去旁徵博引，平教會社會調查處李景漢先生的「定縣農村經濟現狀，」（見民間創刊號）就告訴我們這個事實了：

「農民願出賣田產者日衆，因此地價低落。前五年時普通有井之田地每畝爲一百二十元，目下落至五十元。普通旱田由五十五元降至二十五元。前五年時雇農之全年工資爲四十元，目下落至三十元。

「前五年定縣的乞丐是鳳毛麟角，上年冬季增至三千左右。民國二十年內在定縣因債務破產而爲債主沒收一切家產之家數不過五十家左右，二十一年增至三百家左右，二十二年內竟達二千家之多。破產之主要原因爲重利盤剝者超過破產家數總數之半。此外之破產原因爲人口衆多而收入不足，經商賠累，養蜂賠錢，兵匪搶劫，婚喪耗費，不良嗜好，疾病等項。

「目下定縣欠債之家數占全縣總家數百分之六十七，約四萬六千家，不欠債之家數，占百分之三十三……。

「農民處此種經濟情況下，有的實在無法生活，與其坐而待斃，不如另謀出路，尤其是其中的壯丁，遂不得不拋棄其眷戀之故鄉，出外謀生於異土。民十以來已漸有往關外謀生者，每年約在七百人左右。

民國二十二年內生計困難之程度遠過於從前，因此離家謀生者數目亦呈空前的陡增，竟超過一萬人今年春季出外謀生者亦已達七八千人，多係壯丁，其中大多數係往東北——農村破產之狀況可見一般。」

李先生自己雖然以這種原因來自恕：「定縣是中國一千九百餘縣中的一個縣，終不免捲入一般的農村破產的漩渦裏。」但就這句話還不是足以充分地證明平教會的工作絲毫不能挽救定縣農村經濟的危機？所謂「生產教育」不唯不足以救「窮」而且甚至不能維持前五年「窮」的水準，使得「許多貧農連這僅免於凍死餓死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也要維持不住，」世界上還有比這個更雄辯的事實嗎？自然，我們決不至荒唐到把這種貧窮化歸咎於定縣實驗工作的，但實驗工作之無補於農民之生計，即不能解決農民之窮困問題，這裏顯然已經得到事實最好的回答了。

或許有人辯護說：挽救農村之破產與救濟農民之貧困決不是旦夕可以奏效的，而且也不是定縣一縣單獨所能爲力的。這我們也可以承認，但我們試問這四五年來農村之加速的破產，是不是由於「昊天不弔，虐我斯民，」所以農民才特別變「愚，」變「弱，」變「私，」以至變「窮」呢？還是由於許多深藏於「愚、窮、弱、私」更深底下的外在因素之作用：即帝國主義侵略的深入（巨額入超之加增）軍閥混戰的擴大，水旱天災的頻仍，重利盤剝的加甚，與苛捐雜稅的繁重等等所造成的呢？如我們不從這些基本問題上

去着眼，結果豈僅止於實驗自實驗，破產自破產；而且有一天破產的浪潮會將實驗的一點點經濟基礎，打擊得粉碎呢！

第三，如果他們認爲：平敎會的工作僅爲了一種敎育制度的實驗，這祇是普及農村敎育（包含識字，衛生，農藝，公民等等）之一種實施的方案，他們的實驗如果成功了，則在經濟組織已經變革後的社會裏，實施起來也許可以事半而功倍，或者說：在中國整個的政治經濟都沒有出路之前，局部的敎育的改良也是必需的，在鄉村裏把農民做一點事，比根本袖手不做終要好些！如其意義僅限於此，則我們非但不反對一種敎育制度之實驗，而且對這種實驗正應該加以熱烈的贊助與同情。但平敎會人們對實驗運動的估價是不止於此的；換言之，他們決不是把定縣工作僅視爲單純之一種敎育制度的試驗，而是把它視爲解決中國社會之一切經濟的與政治的問題之張本。最明顯的，如孫伏園先生把實驗運動比之于太平天國，戊戌維新，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與一九二五——七年大革命。而且甚至以這第六次運動是彌補前五次運動之缺陷而發生的！這不僅是個不倫不類的比擬，而且還是有意地歪曲中國革命之理論與事實。我們知道：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就變成了個半殖民與半封建性的社會，半殖民地革命的客觀任務是：第一要推翻帝國主義統治，即從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以統一中國；第二是要澈底肅清一切封建殘餘，根本摧殘現存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即解決土地問題。祇要一天這兩個客觀的任務沒有解決，中國的革命

便一天沒有完成。自太平天國以至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無非是爲着解決這兩任務而爆發的運動。不過因爲各時期的政治背景不同，所受的刺激不同，以及領導者認識之不同，所以每次運動都表現出各自不同的姿態來；對於前二任務之着重點亦有畸重畸輕之別；但每一次都因爲客觀條件之不曾成熟，與領導者對革命任務之沒有眞正的理解，以致每次都歸於失敗。例如太平天國運動固然是因鴉片戰爭使滿廷積弱暴露後的反應，它的主要內容是一個民族革命，但同時他們卻又實行均田制度，以滿足一般貧農之土地飢荒，這是稍治太平天國史，讀過「天朝田畝制度」的人們所共知的。因之，這次運動卒被維持「名敎」的曾李與帝國主義者的武力所鎭壓下去了。至於戊戌維新運動卻又不同，戊戌維新是當時的所謂「士大夫階級」受甲午戰敗的影響，由反對李鴻章議和誤國運動一變而爲維新自强運動。這維新實際上雖由帝國主義侵略而起，但因這次運動爲封建官僚所領導，並沒有社會羣衆做基礎，而且他們是害怕革命的改良主義者，因之祇能採取宮廷改變的方式，並不敢建築在人民羣衆基礎上來推行眞正的改革，結果因慈禧之反動，自然是一敗塗地了。義和團運動是中國破產農民反抗帝國主義壓迫最悲壯的一幕，（不過因他們把目標認錯，把一切「洋人」認爲「帝國主義者」，以致發展爲盲目的「排外」）雖然這一幕是常被「高等華人」所誣蔑所曲解的。（孫伏園君自不能例外）自義和團事件至辛亥革命十二年中，帝國主義的侵略日益加甚，滿清政府的昏庸暴戾與貪官汚吏的橫征暴斂也日甚一日，不但廣

大的農民和手工業者更加破產，成爲參加辛亥革命中堅力量之一的新軍會匪的來源，而且一般華僑及國內新興資產階級亦因此而要求改革，所以這次革命的主要基礎原是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但是因爲中國資產階級在革命的開始便表現出他的妥洽性與不澈底性，並沒有提出資產階級的鮮明革命的政綱，並且根本沒有認清革命的主要對象，所以當時革命的口號祇有簡單的「排滿」不但不敢反抗那站在滿淸政府背後的帝國主義，反而滿口尊重外人在華條約權利，這種革命的結果自然除了剪去一根辮子與掛上一塊民國空招牌而外別的一無所成。單獨排滿的辛亥革命既失了中國國民革命的眞面目，國民革命的對象（帝國主義與國內軍閥）反因而毒燄愈熾，在此毒燄之下忍受了八年的中國青年，受了歐戰後世界革命潮流下的激盪，遂發生「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的意義是很大的，但它却不是如孫伏園氏所說的「有志之士看了這種情狀，乃想用思想學術來充實中華民國的內容，來描濃中華民國的輪廓，直接間接的阻止那些手執橡皮企圖研察者的舉動」。反之五四的意義是在於第一，它是羣衆的抗日的運動；第二，它是羣衆以直接革命手段對付賣國賊的運動，第三，這個民族革命的潮流，開始衝動了中國工人階級的覺悟，從此在中國開始了一個新的革命階段。固然，在五四時，中國社會還正受着美國威爾遜的麻醉，忽略了國際帝國主義對華侵略之全部形態，甚至誤信美帝國主義者能幫助中國爭什麼人道正義，所以五四興起的民族革命運動發生局限於排日的錯誤，但五四却無疑地是歐戰後世界革命的怒潮中

和中國城市工業開始發展中的產物五四雖未完成它理想的任務，但在此運動中的中國青年，遂開始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的而進於實際的運動。自五四後，因爲歷次的運動都沒有完成中國革命的客觀任務，同時又因歐戰後民族資本主義之獲得相當發展，中國的工人階級，躍登中國政治大舞臺，他們經了「二七」「五卅」……等大洪流的訓練，遂與民族資產階級聯合而爆發爲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在這次革命中，中國革命的兩大任務──即推翻帝國主義統治與肅清封建勢力，是最明顯不過的表現出來了。但這次革命的偉大意義也非如孫君所說：「它在辛亥革命所打下的輪廓上濃濃的鈎上了幾筆，把我們中華民國的國基從此奠定，沒有一個人敢再提一句復辟或再提一句帝制了。」這實在是淺薄不過的理解，事實上，這次革命的意義，第一是在於它是以廣大羣衆爲基礎的革命，它直接地或間接地捲進了幾千萬的工農，（孫君說「國民革命運動的參加者連黨員和武裝同志在內不過百萬上下，」是不合事實的）他們第一次表現在殖民地革命中具有獨立的政治作用，他們在鬥爭中的英勇毅力不但使得帝國主義者驚惶失措；而且使得國內民族資產階級恐慌萬狀，亟亟由革命的陣營中退了出來而轉入另一個營壘中。第二，這次革命把中國民衆解放運動最主要的內容明確的規定出來！要解放中國必須肅清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即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與實行土地革命。這個任務在原則上，他們是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目標相共通的，但一等革命演進到某一階段，革命潮流之進展足以危害豪紳資產階級的生存時，資

產階級就必然的會放棄革命的任務，正式的投入帝國主義者的懷抱中而與之相結合。這次革命失敗就在於資產階級之背叛。自然主觀指導之錯誤，亦爲慘敗原因之一。當這黑暗彌漫，黎明尙未分曉的過渡期間，許多奇形怪狀的理論之出現，是有它自己的社會背景的：他們一方面看到中國社會經濟之急遽的崩潰，同時又懼怕羣衆革命之實現，於是就想出以某種和平的「敎育制度」來救中國，他們以爲祇要這種「制度」一被發現，中國就可由積弱之軀一躍而爲自由平等的世界一等强國（！）。鄒平的鄉村建設與定縣的平民敎育都是這種理論典型的代表。

所以，孫伏園先生之將實驗運動視爲前五次運動缺陷之彌補，且甚至以它爲挽救「鴉片戰爭以後垂亡的國運」最有希望的運動，這種理論，在一個對中國政治經濟稍有相當認識，對中國革命史有些理解的讀者看來，雖然似乎有些荒唐得不經，但我們如一分析這種理論的社會基礎，却又是毫不足怪的了。

況且孫先生的所謂「實驗運動」，除鄒平與定縣外，還兼指「許多位黨國柱石」所倡導的江寧與蘭谿實驗縣而言，如果江寧與蘭谿這種單純的縣政之整理亦能救「鴉片戰爭以後垂亡的國運時，」那我們自然不必打倒什麼帝國主義，祇要等待着做實驗縣的「治民」就是了！

至於孫先生所認爲前五次運動的三點主要缺陷，那都是由於他不認識中國革命之客觀的任務，不認識中國社會經濟之結構，同時更不認識「國家」本身是什麼（即國家之本質）而產生的，更不必我

們詳細論述了。

這裏，我要聲明的一點，卽我們的批判僅限於平敎會之把實驗運動評價得太高，以及他們對中國社會認識之根本錯誤而言。至于定縣實驗工作之全部，我是沒有菲薄的意思的。反之，他們那種實驗的刻苦精神，與他們之肯把工作目標從大都市移轉到鄉村，實深值得我們的同情。他們整個的哲學雖不免于錯誤，但其實驗工作之某幾部分，例如保健制度，平民讀物等等却無疑地已得到相當的成功，值得我們介紹到別的鄉村去推行。但如果以爲這種局部的技術上面的成功，就足以解決中國農村破產的問題或解決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時，那就無疑地是一個幻想了。不要說根本的社會問題，卽他們想利用那一套哲學來解決小小的社會問題，事實上亦無疑地會碰壁的，例如他們用新年的機會，舉行了一個「家庭設計會」，想使農民「化私爲公，」這個設計會在貧農中所得的答覆是：「有什麼意思，財主佬才有意思呢！」由此可知農民的階級感情是決不因「設計會」而磨滅的。又如熊佛西先生編了一本描寫高利貸剝削農民的劇本——「屠戶，」博取了青年農夫之熱烈的同情，甚至於有一農夫狂呼「揍死混帳王八蛋的孔屠戶；」但「孔屠戶」在中國却正是普遍地存在着，農民的憤怒情緒是被熊先生巧妙的技術所引起了，然而熊先生拿什麼去滿足他們的要求呢？熊先生自己也承認他對於這問題很苦惱，因爲他決不能叫他們去暴動或去革命——這不是熊先生個人的問題，因爲平敎會的哲學根本就不允許農民之革命的——

所以結果祇得訴之于好政府，據說孔厝戶經民衆告發而被縣政府所正法了，這是多麼滑稽的結論！至于其他的較大的社會問題（如禁白面之不能澈底進行）之不能由平敎會本身來解決，更是不用說的了。（讀者參看本書吳半農先生「河北鄉村視察印象記」及「論定縣主義」兩文。）

由上兩個簡單的事實中，我們就可以看出：平敎會的工作本身實包含着一種不能解決的矛盾，他們想不談中國社會底政治的經濟的根本問題，但他們所要解決的却正是這些根本問題，他們不敢正視促使中國國民經濟破產農村破產的眞正原因，但他們所要救濟的却正是由這種原因所造成的國民經濟破產與農村破產！

平敎會的矛盾是社會的矛盾所造成的，等到平敎會的矛盾解決，社會的矛盾也就解決了。

一九三四，五，十六日

四　中國的歧路

——評鄒平鄉村建設運動兼論中國工業化問題——

千家駒

自從中國的農業恐慌進入到更深刻的階段後，「復興農村」這口號遂正式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但如何謀中國農村的復興（嚴格地說，「復興」兩字是有語病的，因爲中國的農村始終就沒有「興」過）時論界對於這却有二種不同的意見：一是主張自建設鄉村入手，由鄉村之建設以引發工商業，一是主張由發展都市來救濟農村。前者可以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的梁漱溟先生，定縣平民教育促進會的晏陽初先生及無錫教育學院的高踐四先生等爲代表，而今日風靡一時的鄉村建設運動便是他們這種信仰的成績表現。後者可以吳景超先生爲代表，而獨立評論之工業論者大概是屬於這個陣營的。梁漱溟先生在去年全國鄉村工作討論會席上演講「鄉村建設的旨趣」說：「四面八方的來到一塊，這證明今日鄉村運動好像是天安排下的非出偶然。它（指鄉村建設——筆者）是從二面來的：一面從中國歷史演下來，一面從西洋歷史演下來，二者相遇，發生近百年來的中國問題。從中國問題產生數十年來的民族自救運動，輾轉變化，而到最後這一着（鄉村運動這一着。）此其故亦很容易明白，用簡單的兩句話來說就是中國原爲鄉村國家，以鄉村爲根基，以鄉村爲主體，發育蔚成高度的鄉村文明；而近代西洋文明來了，逼

着他往資本主義工商業路上走，假如走上去也就完了，沒有我們的鄉村建設了。無奈歷史命運不如此，十年來除鄉村破壞外沒有都市的興起；祇見固有農業衰殘而卒不見新工商業之發達。我們今日的痛苦正在此，然而未來的幸運也在此。蓋從大勢上反逼着我們走一條不同的路……這一條不同的路，便是從農業引發工業，以鄉村爲本而繁榮都市，這正是中國今後一定的路線。新社會文明的創造在此，中國的得救在此。中國之得救是要以新社會文明的創成而得救的。我們祇有向着創造新文明去努力才可以救中國，此殆爲歷史命運所決定。沒看清大勢的人嚷着救濟鄉村，鄉村自救，而不知其爲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一着，或知其爲最後的民族自救運動，而不知其恰已負擔着創造新文明的使命。」梁先生這個見解，同樣的發見于氏所著之「鄉村建設論文集」及「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兩書中。定縣平教會的平民文學部主任孫伏園先生在「全國各地的實驗運動」一文中（民間半月刊創刊號）對於鄉村運動的評價，恰與梁先生彈同一的調子——雖然他們的觀點是不完全一致的。孫先生以爲自鴉片戰爭以來，爲着挽救垂亡的國運，曾經發生過六次運動：第一次是太平天國，第二次是戊戌新政，第三次是辛亥革命，第四次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第五次是民十五年的國民革命，「以上這五次運動，其目在都在挽救鴉片戰爭以來垂亡的國運，論範圍是一次比一次的擴大，論意義是一次比一次的深沉，論對於挽救危亡的目的是一次比一次的接近。」但是結果「危亡的徵象也一天比一天的增加和暴露。」這是什麼道理呢？據孫先生

說是由於這五次運動還有若干「缺陷」不曾做到，為了補救這種缺陷，所以有第六次運動起來，這便是「全國各地的實驗運動。」雖然孫先生的口氣比之梁先生要小一些，一個是要鄉村建設開拓世界新文明，孫先生却不過以爲這種運動是彌補前幾次運動之「缺陷」的，但他們視鄉村建設爲今後中國唯一的一條路，則並無二致的。

反對這種論調的有兩種人，一派是吳景超先生爲代表的工業論者，吳先生在「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獨立第一一八期）一文中主張救濟今日農村破產應從發展都市着眼，如興辦工業，發展交通，擴充金融機關等等，在另一文「我們沒有歧路」中，吳先生又分析反對工業化的人爲四種：一是誇大派；二是禁慾派，三是因噎廢食派，四是畏難退縮派。其中誇大派是針對農本論者而說的，但吳先生說：「以農立國，是一件可憐的事，沒有什麼可以自誇，」因爲農業國是走向貧窮，愚笨，和短命的路；而工業國是走向富有，聰明和長壽的路。（雖然吳先生在前一文中說：「都市與鄉村的關係不是敵對的，而是互助的，」但在後一文中他却顯然把農業和工業敵對起來了，這是令我們驚異的一點。）不過吳先生反對農本論者的主張終是一貫的，響應吳先生主張的有陳序經先生的「鄉村文化與都市文化」（獨立第一二六期），賀嶽僧先生的「解決中國經濟問題應走的路」（獨立第一三一期），以及王子建先生的「農業與工業」（天津益世報農村週刊第四十一期）。

另一種反對的論調是筆者在申報月刊第三卷第十期上的一篇「中國農村建設之路何在?」對於定縣平教會的整個哲學，筆者曾說「平教會的工作實包含着一個不能解決的矛盾。他們想不談中國社會之政治的經濟的根本問題，但他們所要解決的却正是這些根本問題，他們不敢正視促使中國農村破產的眞正原因，但他們所要救濟的却正是由這些原因所造成的國民經濟破產與農村破產。」對於他們的實驗運動，我又說過：「如果我們不從這些基本問題上着眼（指帝國主義及封建殘餘之剝削，）結果豈止實驗自實驗，破產自破產，而且有一天破產的浪潮會把實驗的一點點基礎也打擊得粉碎呢!」這可以代表我對於今日一切鄉村建設運動的見解，該文發表後，我只看到一篇喻任聲先生的「中國農村運動與民族之自衞」（申報月刊第三卷第十二號）是批評我的。然而喻君的論點根本沒有否定了我的立場，所以我沒有答覆的必要。最近在民間第十七期上又讀到瞿菊農先生一篇「人」的基礎，其中有一段話却似乎反擊我的，他說：「有些朋友認爲農村建設工作並不是主要的工作，中國的大問題是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和封建勢力的遺存，這種情形誰也見得到，但我們要的是辦法，至少是初步的現在的下手辦法。」「拿辦法來」這話很對。不過，我却以爲有沒有別的「辦法」與鄉村建設之路本身是否走得通完全是兩個問題，而且除鄉村建設之路外，是否眞沒有人走其他的路（這另一條路也許更難走，但是走的人也更多，）也還是一個問題。

本文，我將更進一步來檢討鄉村建設之路是一條什麼路，是不是眞如梁先生所說「天安排下的」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的一着。但在檢討之前，我得聲明幾點：

（一）我的批評僅限於鄉村建設運動之整個的社會哲學，對於從事建設鄉村運動的人們之肯深入到鄉間去，我們實深致其敬仰，而且認爲這是智識份子之一種新覺悟。

（二）我的批評僅限於鄉建運動之是否能成爲「復興」中國農村的一條橋梁，卽僅限於鄉建運動是否眞已抓到了中國農村的中心問題而在那裏推動？至於他們工作中之某幾部分技術的成功，我毫無非薄之意；但要有人以爲這種局部的技術成功，就足以解決中國的農村問題，那我認爲是一種新的烏托邦。

（三）中國應該走工業化或農業化的路應以工業來引發農業或以農業來引發工業？這我以爲只是一個形式邏輯的問題，雙方的論戰是不會達到什麼結果的。辯證的問題是在中國目前半殖民地的狀況下，鄉村建設前途的可能性如何？它能否走得通？工業化前途的可能性又如何？它的阻礙又在那裏？

（四）鄉村建設是近年來這一種運動的總名稱，它裏面包含着許多不同的理論和實踐，各種理論自身有時亦自相矛盾，在本文內我祇能批評這總的潮流之幾支主流——特別是梁漱溟先生之鄉村建設運動。（平敎會運動，我已有文討論，不再贅述。）

中國的問題是甚麼？

中國的問題是甚麼？梁先生在「鄉村建設理論提綱」上，給我們有一個明確的答覆。梁先生以「鄉村運動之所由起，可分四層來說：（甲）淺言之，起於中國鄉村的破壞，這種破壞的力量有三，一是政治屬性的，即兵禍匪患苛徵等；二是經濟屬性的，即外國之經濟侵略等；三是文化屬性的，即禮俗風尙之改變等。（乙）進一層言之，是起於中國鄉村無限止的破壞，迫得不能不自救，鄉村建設運動實是鄉村自救運動。（丙）進而言第三層，是起於積極建設之要求；鄉村運動，即我民族社會的新建設運動。（丁）進而言第四層，今日中國問題在其數千年相沿襲之社會組織構成既已崩潰，而新者未立；鄉建運動實爲吾民族社會建設一新組織構成之運動。——此爲其眞意義所在。」說明了鄉建之所由起後，梁先生有下述一段結論：「人非社會則不能生活；而社會生活則非有一定秩序不能進行。任何一時一地之社會必有其所爲組織構成者形著於外而成其一種法制禮俗，是則其社會之秩序也。於此一時一地，循之由之則治，違之離之則亂；是在古人謂曰治道。中國此時蓋其社會組織構造根本崩潰，法制禮俗悉被否認，夙昔治道已失，而任何一秩序建立不成之時也。外國侵略雖爲患，而所患不在外國侵略；使有秩序則社會生活順利進行，自身有力量可以禦外也。民窮財盡雖可憂，而所憂不在民窮財盡；使有秩序則社會生活順利進行，生息長養不難日起有功也。識得問題所在，則知今日非根本上重建一新組織構造，開出一新治道，任何事不必談」

這是一段極重要的文字，我們決不能輕易放過的。中國的鄉村破壞了，這是有目共見的事實，誰也承認。破壞鄉村的力量，梁先生說有三種，政治的經濟的與文化的，這三者又「相連環輾轉影響加重其破壞」。這與我們的意見稍有出入，我們認爲文化的破壞（禮俗風尙之改變）不過是政治與經濟二種破壞力量的結果，隨着一社會經濟制度的變動，禮俗風尙亦必隨之而改變，例如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私有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但在蘇聯就不如此；又如在奴隸社會，奴隸是公認爲「能說話的工具」，但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亦不如此。不過這些都是小節，不必深論。我現在所要問的是：

這「循之由之則治，違之離之則亂」能抵抗「外國侵略」不必憂「民窮財盡」的所謂「社會之秩序」是種甚麼？

梁先生告訴我們：「任何一時一地之社會，必有所爲組織構成者，形著於外而成其一種法制禮俗，」此即「社會之秩序。」梁先生又告訴我們，「社會之秩序」即古人所謂「治道。」那麼，我們又要進一步問這「一種法制禮俗，」這一種「治道，」又是些甚麼？追問到這裏，梁先生的整個哲學系統暴露無遺了。梁先生說，中國夙昔之社會組織構造及治道乃是「倫理本位；」「人生必有其相關係之人，此即天倫，人生將始終在與人相關係中，此即倫理。倫理關係即表示一種義務，一個人似不爲其自己而存在，乃彷彿互爲他人而存在者。試從社會、經濟、政治、三方面徵之：社會方面於人生各種關係中，家乃其天然基本關係，故

又爲基本所重，謂人必親其親也。……舉凡社會習俗國家法律，持以與西洋較，在我莫不寓有人與人相與之情者，在彼恆出以人與人相對之勢。社會秩序所爲維持，在彼殆必恃乎法律，在我則敬重於禮俗。近代法律之本在權利；中國禮俗之本，則情與義也。經濟方面，夫婦父子共財，乃至祖孫兄弟等亦共財……西洋則夫婦異財，其他無論，在西洋自爲個人本位的經濟，中國亦非社會本位的，乃倫理本位的經濟也。政治方面，但有君臣間官民間相互之倫理的義務，而不認識國家團體關係，舉國家政治而亦家庭情誼化之。」好了，這不用我們再加什麼解釋了，中國鄉村之所以破壞至於無救，原來是因爲我們喪失了這種「社會之秩序，」即喪失了「治道，」「治道」者何？「法制禮俗」是也，「法制禮俗」者何？舊有之「倫常關係」是也。再明白言之，即「父之義慈，子之義孝，兄之義友，弟之義恭，夫婦朋友乃至一切相關之人莫不自然互有其應盡之義」是也。假如中國仍保持了這些東西，則「外國侵略雖爲患，自身有力量可以禦外也；」「民窮財盡雖可憂，而生息長養不難日起有功也。」所以「社會的秩序」這名辭雖費解，「凡社會必有其所爲組織構造者，形著於外而成其法制禮俗」這句子雖抽象，如果我們把它翻成普通的白話卻也不過是我們習見習聞的「世道淪亡，人心不古，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的舊調新彈而已。梁先生「開拓世界新文明」的鄉村建設之哲學基礎，雖似新鮮，若剝去了外皮，却也不過是我國孔老夫子學說之復活而已。

我們的意見是與此不同：我們認爲一社會的法制禮俗本身是由該社會的經濟基礎所決定的，有怎

樣的社會經濟制度就產生怎樣的法制禮俗。中國固有的舊道德舊倫常，分明是封建經濟制度下的產物，自中國社會受到了西洋資本主義的洗禮，舊日的經濟制度達到了崩潰的階段後，舊道德倫常自然而然要趨向於混亂與破產。另方面，我們又走不上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路，（因我國乃一次殖民地，）所以個人主義的「法制禮俗」自無法以養成；要新的「社會秩序」之產生，新的「法制禮俗」之養成，必須先有新的經濟制度之建立。舊「治道」之崩潰，我們是不必留戀的，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如何造成一新的社會經濟制度以培養新的法制禮俗，而不是先發明一套做好了的「禮俗習尙（社會秩序）」而後改造我們的經濟組織與政治組織。後者等於把馬車放在馬的前面，事實上是行不通的。

但假如梁先生的社會秩序不僅是指法制禮俗，而是說人民所須有的一種新信仰和新組織，這我們是同意的，我們現在就是要來看梁先生的「新治道」是怎樣着手進行的？

『新治道』是什麼？

梁先生以爲中國鄉村之所以破壞沉淪，是由於社會組織構成崩潰，即由於喪失了「社會之秩序」或「治道，」這種「治道」在昔便是「倫理。」但梁先生與復古派有根本不同之一點，復古派要求恢復昔日的三綱五常，梁先生則要開闢一種新的治道，由這新治道來救中國民族，來創造世界新文明這「新治道」從什麼地方入手呢？曰自鄉農學校入手。鄉農學校不僅是鄒平鄉建工作的出發點，而且它還是梁

先生理論的一個核心，要了解梁先生鄉建運動之精義，是不能不先了解鄉農學校的。

「鄒平的鄉村工作；是以鄉農學校來進行。」但鄉農學校是什麼呢？據說它「相當於江南一帶的鄉村改造會，或農村改進區，也相當於北方定縣的平民學校，不過都不很相同。我們的辦法是在相當範圍的鄉村社會以內成立鄉村學校……我們的目的是要化社會爲學校，可稱之爲「社會學校化」鄉農學校的構成成分有三種人：一是鄉村領袖，二是成年農民，三是鄉村運動者。」它的用意，據說可以八個字來概括，就是「推動（推進）社會，組織鄉村。」換言之，梁先生在鄒平入手做鄉村工作的具體方案是這樣的：他們把以前的行政區域都取消了，把「鄉公所」與「區公所」改成了「鄉學」與「村學」（即鄉農學校之具體形式）同時把鄉區公所管轄的範圍縮小，所有以前由鄉區公所辦理的行政事項，概改由「鄉學」「村學」辦理。但區公所鄉公所與「鄉學」「村學」不僅是名稱上的差異，在本質上也完全不同的。「鄉學」「村學」的工作有二：一、爲對該村內各分子之教育，二、爲酌量倡導社會改良運動，如禁烟禁賭、放足等等，故「村學」與「鄉學」乃合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二者而言，它一方面是教育機關，一方面又是自治機關，可說是「行政機關教育化」或「社會學校化」。鄉學與村學的組織分子不稱「學生」而稱「學衆」。至於「鄉學」「村學」的組織，首先是成立一個「學董會」，這「學董會」由該村中有地位身份的人所組織，「因爲在鄉間倡辦此事，非先得鄉村領袖的同意與幫助，就無法作起。」然後由學

董會中推舉「齒德並茂」「羣情所歸」的一人經縣政府禮聘他爲「學長，」學長主持教育，爲該區民衆之師長，不負事務上之責任；另由縣政府委派一人爲「理事，」負責辦理公事，此外還有「教員，」這就是「村學」或「鄉學」聘請的先生及「輔導員，」這是代表縣政府下鄉去的，教員與輔導員多半是做鄉村運動的人。至於「村學」與「鄉學」的區別，則不過「鄉學」是上層，「村學」是基礎。所以鄒平實驗縣的組織就成爲：

村學→鄉學→縣政府→鄉村建設研究院

此外梁先生還訂了些「村學鄉學須知」內分「學長須知，」「學董須知，」「教員輔導員須知，」「學衆須知」等等，爲的是「村學鄉學意在組織鄉村，却不想以硬性的法令規定其組織間的分際關係，而想養成一種新禮俗，形著其組織關係於柔性的習慣之上。」

村學鄉學表面上看來似乎僅是縣政改革的一部分，但實質上它是鄒平鄉建運動的結晶體，其重要性正與定縣平敎會的三大敎育四大方式相等；而最足以表現鄒平鄉建院之精神及本質的，也就是它。

瞥眼一看，鄉農學校彷彿是一個「組織民衆」「敎育民衆」「訓練民衆」的集團，用梁先生明白的話來說，就是要「大家聚合，」「討論問題，」「想出辦法，」「發生作用。」這裏我們須先免除一種誤解，卽這種組織雖自一鄉一邑做起，但它決不是一鄉一邑的事情。梁先生說過：「整個中國社會日趨破壞，

向下沈淪，在此大勢中其問題明非一鄉一邑所得單獨解決，局部的鄉村建設如何可能！即如破壞鄉村的力量很多，而以眼前中國的政治爲最大破壞力。但是政治的影響又是那一處局部的鄉村所能逃的呢？假使因爲中國政權分裂的方便，或有局部的地方，其政治情況較好，但又如何能够逃出無遠不屆，無微不入的經濟影響呢？譬如鄒平一縣，劃爲縣政建設實驗區後，在政治上所受不良影響當然可以減少，但是絲業恐慌，棉花價低，糧食跌價影響，是遮欄不住的。所以凡以爲鄉村建設是小範圍的事，是從局部來解決問題者，都是錯的。」由上一段話中，可知鄉農學校只不過是敎育民衆，組織民衆的一個出發點，他們也並不以爲有了它，便可以抵抗政治、經濟之種種侵略的。關於這點，我們完全同意，我們而且同意「農民之自覺，有組織而發生力量，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是中國鄉村問題解決之唯一的途徑。我們現在所要問的是：梁先生的鄉農學校是不是眞正民衆合作的組織？它內部有沒有矛盾之存在？假如有，則這種矛盾是什麼？

鄉農學校最大的特色就是把農民看成無差別無等級的一團，梁先生說：我們看「鄉村社會的內部，雖然不是全沒有問題，然而鄉村外面問題更嚴重，」所以「我們現在必須看鄉村是一個整個的。」這裏「鄉村」兩字實乃「鄉民」之義。（此非曲解，讀原文上下文便知。）但是「鄉民」是不是整個的呢？鄉民內部是不是眞沒有嚴重問題呢？如果有問題，這會不會影響到他們合作與團結呢？要是他們的利害不一致時，應該誰遷就了誰呢？這幾個問題在梁先生看來好似不成問題，我們則以爲不然。今日中國農民問

題之嚴重，原因雖錯綜複雜，然土地分配之不均實亦其一，這不僅可由統計數字得而證明，（所有各處關於土地分配的調查，都證實這點：即占有農家戶數至少數之地主與富農，其所有耕地面積所占的百分比極大，而占農戶大多數的貧農與雇農則僅有小量耕地）而且可由農民要求土地之迫切的歷史事實所證示出來。例如太平天國運動，一九二五——七年大革命以及歷年來的大變亂，殆莫不包括有嚴重的土地問題在內。梁先生以為我們不應該「在鄉村社會內起一種分化的工夫，」但問題是鄉村社會內究竟有沒有顯然對立的農民階層的劃分；假如無有，則參雜外力也分化不了，假如有的，則梁先生苦口婆心的勸告，也終歸無用處。我們又知道，由於土地分配之不均而發生的高率佃租，是促使農民貧窮與破產之又一因素，高額佃租隨着農民土地飢餓之深化而愈得其發展，例如據中山文化教育館與嶺南大學的調查，廣東「廉江佃農賣兒子以還租的，時有所聞，無論男女孩，十歲左右的每個人賣不到百元，」又如「花縣每至清明，佃戶迫於還欠租的時候，鄉間常能聽到一片賣兒聲。」「赤貧的佃戶納了十餘年租，說不定還要出賣兒女；不勞動不經營的地主們收了十餘年的租，所有權就可擴張一倍。」（廣東農村生產關係與生產力頁三二——三三）這當決不是廣東一省的情形。我們疑問的是：在農民自身利害如此衝突的「整個鄉村」中，梁先生如何能教他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呢！（這幾句話即在古代也未曾實現過的，正有如「王道」之僅為古人之一種理想一樣，不幸卻做了梁先生鄉農學校的憧憬。）再則，梁先生是不

能不承認他的「整個鄉村」內有放高貸者與借債者的前者大多是地主與豪紳，後者大多爲中農與小農，前者富之積累有賴乎後者之負債與破產，梁先生又如何能教他們「相親相愛」如家庭「父子兄弟」呢！

所以「整個的鄉村」是與「全民」同樣地是抽象的名辭，具體分析起來，他裏面便不能不包括有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僱主僱農，債主債戶，土豪劣紳，赤貧者等等，我們決不是說有這許多階層便應該使他們互相分化，互相敵對；也不是說他們就沒有共通的休戚與禍福，我們的意思只是說在由這種種經濟地位不同的農民所組成的「整個鄉村」不能調和的矛盾與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要使他們爲着全鄉村的利益而合作，這種「利益」名義上是全鄉村的，事實上却是一部分人所獨享。例如「防匪與防盜」終算一鄉村共同的利害關係了，但其實地主與富戶更沾到光，而義務是全村人所共同負擔的。又如戒烟酒，戒賭博，戒游惰，是梁先生所稱爲「齊心學好」之起碼條件的，我們也相信這種種是美德，但在一鄉之內，有的人胝手胼足，克勤克儉，反要啼飢號寒，賣兒鬻女，有的人四體不勤，五谷不分，荒嬉終日，却能養尊處優，優哉游哉。鄉農學校是決不能保證前者能收善果，後者必得惡報的，梁先生的「齊心學好」又將何以取信于人呢！

更進一層言之，「鄉農學校」既是一個集各種農民於一爐的垃圾堆，它的政權，究竟是握在什麼人

手裏，卽它將爲那一種人謀利益呢？這我們一看鄉學及村學的組織，與梁先生手訂的「學衆須知」便可以明白了。「鄉學」「村學」成立以前，先有「學董會」，「學董會」是由鄉村中「有信用有資望的領袖所組織的」，這我們知道小農和貧農，雇農和債戶是決沒有資格做學董的了。然後由學董會中推舉一「齒德並茂羣情所歸」的人，經縣政府禮聘爲學長，這我們又知道學長更非紳士或地主階級來充當不可！「村學」「鄉學」的基本人員是一般農民，卽所謂「學衆」是，梁先生要求「學衆」的是什麼呢？在「學衆須知」上，梁先生勸他們要「敬長睦鄰，」「要尊敬學長，」「要接受學長的訓飭，」「要信任理事，」「要愛惜理事」（在「學衆須知」之十四條規約中這就占了五條）。理事「辦事若有疏失錯誤，應原諒他，」「不可存挑剔反對之意，」一言以蔽之，卽學衆是要馴良要服從！這樣一個由地主與豪紳所組織的「鄉學」與「村學」是否能爲一般小農與貧農謀利益（如關于佃租及高利貸的問題，）又不待我們辭費的了。

我們再問這種「鄉學」與「村學，」它眞正的任務到底是甚麼？在梁先生草擬的「本院（指山東鄉建院——筆者）設立旨趣及辦法概要」中我們找到正確的答案了：「鄉民愚迷而有組織，且爲武裝組織，其危險實大，第一要化導他向開明進步的方面去；不然，必爲鄉村改進的絕大障礙。第二要愼防其他勢力擴大，爲人利用，釀出禍亂，這是一件最不易對付的事，然只許用軟工夫，不可用强硬手段摧毀之。」這幾句

話把鄉學與村學的根本精神暴露無遺了。

所以，梁先生的「新治道」表面上看來好似盡善盡美，彷彿眞可以令學衆一路而入「自由平等博愛之王國，」但說穿了却也不過是孔老夫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把戲；梁先生的鄉學與村學，雖然披上了一件美麗的外衣，掛上了「組織農民，教育農民」的新招牌，戳破了說却也不過是現存秩序之巧妙的設計者而已。另方面，梁先生雖然口口聲聲說要深入農村，組織農村，然而農村假如眞的組織起來，他却是一個民衆武力之懼怕者，所不同的，他是要「用軟工夫」去對付，以別於「硬工夫」對付者而已。

鄉村建設乎？發展工業乎？

鄉村建設之路走得通嗎？這問題在這裏似乎是一個多餘的了！因爲鄉村建設既不是要改變現存生產關係的，即使他走得通，其前途亦可想而知。說者或曰鄉村建設雖不能改變鄉村內部之生產關係，但或許能阻止鄉村之外部的破壞也未可知。我答之曰，亦不可能，現在我們就借梁先生自己的話來問他們：

「莫言鄉村建設，且問鄉村之日趨崩潰可能有已止的希望嗎？似乎崩潰的趨勢，却有把握，而崩潰的已止，轉機在那裏，倒不可見呢？二，破壞鄉村最有力的，一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一是國內不良的政治，這是無待煩言的事實，然如一般鄉村建設者之所爲，於此究何補？他們果算得針對問題而解決嗎？」這二問題

是梁先生自己所提出的（「鄉村建設幾個當前的問題」見民間十一期）但他並沒有予以解答。同樣地，我曾執此以評定縣平教會之實驗運動，即以定縣人民破產之深刻化來反證他們的運動並不能阻止鄉村之日趨崩潰的潮流。在民間第二十期上我看見一小評題曰：「非可一蹴而就」大意說我們對於農村建設之成效，不可求之過急。是的，我們也承認建設鄉村非可一蹴而就，但遺憾的是直到今日爲止，無論定縣或鄒平，我們都絲毫找不出鄉村建設能成功的趨向或端倪來，反而破產的怒潮，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我在去年的鄉村工作討論會席上，聽到某一辦理民團與自治著稱之鄉運團體代表的報告，最後他曾說：「現在我們鄉裏土匪是平了，自衞團也組織成了，但是農村依舊往下破產，大多數農民的生活依然一天天窮下去，這有什麼辦法補救呢？」這段話是值得每個從事鄉村工作者之深刻地反省的。

鄉村建設既有此路不通之勢，那麼以工業救濟農村的路走得通嗎？換言之，即中國工業化的可能性如何？

在討論工業化之前，我們首先要問：在目前中國經濟政治的現狀下，我們還什麼來工業化？爲近代重工業之基礎的是煤鐵與石油，自東北淪亡，占有全國石油儲量百分之五十二，鐵儲量百分之七十九，煤儲量百分之二（產量則爲百分之三十六）的東北礦產已拱手讓人，固無論矣；即以全國而論，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國鐵路，四分之三以上的中國鐵苗，二分之一以上的中國礦產，都在外人的掌握中，要說建設中

國的重工業在帝國主義者的鐵腕未伸開以前，簡直是夢想！今日比較可以稱得起民族工業的還只有輕工業中之棉紡織業但棉紡織業因年來受外廠之壓迫及花貴紗賤之影響，停工時聞，倒閉迭見。岌岌危殆，不可終日。如最近申新第七廠被匯豐所拍賣，五二兩廠則在停工之中，華北規模最大之天津裕元紗廠亦關門大吉，其他各廠復有被日商收買的消息。中國比較可稱許的棉紡織業，衰敗如此，自檜以下之火柴，烟草等等工業，更不足論。誰也知道發展工業之一個主要的條件，是要有保護關稅，但我國之關稅則反有利於洋貨之傾銷，比較有點保護氣息的民二十二年五月頒布之國定稅則，到去年還不得不因某國之要求而改訂，改訂結果是把某國輸入最多之印花布及雜類棉布減稅了。在毫無保護的世界市場上，以中國初興資本薄弱技術幼稚的工業，欲以與帝國主義高度發展之商品相競爭，豈非以卵擊石？退一步說，即使我們把保護關稅做到了，但外人在華租界有自由設廠權，有領事裁判權，他們有雄厚的資本與政治勢力的後盾，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力以製造生產品，我國工業又豈經得起他們的一擊？年來某國在華紗廠之猛晉及英美烟草公司之飛躍發展，便是在華外廠壓迫民族工業之最好的明證。筆者前年在廣西梧州調查經濟時，遇到帝國主義者摧毀我民族工業典型的好例：梧州昔有土製火油廠二十四家，按所謂土製火油，即把原油(*Crude oil*) 煉成精製火油 (*Refined oil*)，這種工業，嚴格地說，是不配稱眞正的民族工業的，因爲他的原料——原油，非仰給於舶來不可。不過它較精製火油差勝一籌的地方，便是原油到底是半製品，它

是經在中國加工後，再成爲精製品的。這人工是中國的人工，並且所投下的資本也是中國的資本。自從前幾年來金貴銀賤，火油價格飛漲後，兩廣的土製火油業，風起雲湧，利市三倍，據說當民國二十一年時，在廣州的土製火油廠有二百數十家，梧州也有二十多家，他們的資本，少則數萬元，多者達數十萬元，這種飛躍的發展，當然不是帝國主義的火油公司所能忍受的，於是美孚，亞細亞，德士古三公司就聯合向我傾銷了。煤油的價格，當二十一年八九月間，每罐賣七元五毛（毫洋）至二十二年一月跌至六元五毛，二月更跌至五元二毛，五月爲三元九毛，另有經濟牌一種，則僅售三元二毛，這樣一來，土製火油業便祇有宣告死刑了，因爲他們的成本每罐就要三元八角，所以廣州的火油公司就倒閉了一半，梧州的二十四家，當我們調查時，祇剩了二家，而這二家也祇開工了四分之一，合計僅有半家開工而已。近據報載廣西省政府向三公司之借款已告成立，這兩家想也不免於停工吧。

由上一事實，可知在資本帝國主義包圍下半殖民地的中國，一切發展工業的前途都是很渺茫的。吳景超先生在有一篇文章上說：「這些困難——指發展工業的困難——決不是帝國主義幾個字可以包括的，」但在我們看來，却以爲正是帝國主義之不平等條約是壓迫中國不能走上工業化之主要原因，其他技術之落後，組織之不善，都是次要的。吳先生提出了「絲業衰退」以爲這與「帝國主義壓迫」全不相干，然而吳先生要知道僅靠絲業與茶業決不能令中國走上工業化之路，絲茶不過在中國對外貿易上

占些地位罷了，要工業化，是必須機器工業，交通工業，鋼鐵工業，金屬工業等等重工業之發展，而且必須有强固有力的金融資本做它們的後盾，吳先生能否認中國之重工業原料及交通業强半握在外人手中，而中國的金融市場完全被外人所操縱之一事實嗎？何況絲業之衰敗，原因亦還不如吳先生所說的簡單，其中實包含着日人之有組織有計畫的傾銷，（「參看何炳賢「一年來的中國工商業，」」）而這正可以反證我國在國際市場上被帝國主義者所排擠，不僅是絲茶品質之關係，且被其他政治、經濟諸條件所決定的。又如吳先生所認為足以救濟鄉村的發展交通，以為這可以使農民的生產物往都市中流，因而增加農民的購買力；然而吳先生沒有看到發展交通在半殖民地之中國的反作用，是使洋貨更容易地流入鄉村，因而增加中國的入超額，同時農產品與工業品之價格差，又使中國的農民更進一步於貧窮，我們當然不能「因噎廢食，」但「橘逾淮而為枳」這句話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我們認為在半殖民地的中國，不平等條約之桎梏未解除以前，一切發展工業的計畫都不能談，不配談。近二十年來一部中國民族工業之發展史，已足為此事之明證。現在一般工業建國論者，亦不過如在沙漠上幻想着建築一座巨廈，離現實性是很遠的。

那麼，中國的出路是什麼呢？曰祇有澈底消滅帝國主義者及封建殘餘之勢力。這工作由何處着手呢？曰自組織民衆教育民衆入手。不過這種民衆組織不是梁漱溟先生的鄉農學校，這種教育民衆不是定縣

平教會之平民教育，

一九三五，四，六日

五　『鄉村建設』運動的評價

李紫翔

一、『四面八方來到一塊』的『鄉村建設』

第二次鄉村工作討論會上梁漱溟先生說：「我聽到各方面的報告，再印證到我自己身上，發見了我們到會同人各從不同的動機，不期而然地集於鄉村運動一途，好多爲始意所不及料。例如這裏平教會始而不過識字運動，現在却變成整個的農村建設。中華職業教育社，始而不過培養職工店夥，現在却轉到各地農村改進。從教育轉過來的已有這許多不同來歷。其不從教育來的，如華洋義賑會，始而不過賑災，何曾料到今日成爲農村合作運動一支主力軍。河南村治學院同人，其動機出於鄉村自救，與義振會以救人爲事者，正反映成趣。我自己是從對中國政治問題的煩悶，而想到如何養成大多數人的新政治習慣；乃銀行界朋友，又從經濟問題的刺激，而亟謀流通農村金融。四面八方來到一塊，這證明了今日鄉村運動好像天安排下的，非出偶然。」這個「天安排下的」鄉村運動，使第二次會的出席代表，多至一百五十餘人，比一次會增加一倍。就其代表團體的性質說，計有行政機關的代表二十五人，學校的代表二十六人，民間團體代表二十人，學術機關代表三人，銀行代表二人，工業團體代表一人，其中尤以屬於平民教育促進會之系統者爲最多，計占三十四人，鄒平鄉村建設研究院之系統者次之，計有十八人，燕京大學又次之，計有十六

人。又代表中直接間接與教會或教會學校有關係者約有五十餘人，占全體代表人的三分之一以上。就其主張和目的來分析有「中國特殊文化」與「全盤的西化，」有「鄉村建設」與「農村救濟，」有恢復舊禮教與推行新宗教，以及「民族自救之最後一着」或「民族改造」的「第六次運動」等等複雜矛盾理論之區分和對立；然而實際上要以柔化的教育政策，求社會秩序之安定，和農村購買力之增加，則為現階段的鄉村運動之共同的特點和一致的要求。那末，使各種不同動機的人，集於鄉村運動的「非出偶然」的原因是什麼呢？這，讓我們來作一個客觀的科學的分析和答復。

二、『鄉村建設哲學』

盛極一時的各派鄉村運動中，定縣的「平民教育」主義和鄒平的「鄉村建設理論，」是中國今日鄉村建設運動的兩個中心和兩個方面。在這裏我們先來對梁漱溟先生的「鄉村建設哲學」加以系統的介紹與批評。

梁先生之「鄉村建設」的哲學，確是與衆不同的玄妙的「一套，」這一套又是依據他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之玄學的理解：『人類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有三不同，人類的生活中所秉持的態度，有三不同，因而人類文化有三期次第不同。第一問題是人對「物」的問題，為當前之礙者即眼前面之自然界——此其性質上為我可得到滿足者。第二問題是人對「人」的問題，為當前之礙者在所謂「他心」——此

其性質上爲得到滿足與否不由我決定者。第三問題是人對於「自己」的問題，爲當前之礙者乃還而在自己生命本身——此其性質上爲絕對不能滿足者，第一態度是兩眼常向前看，偪直向前要求去，從對方下手改造客觀境地以解決同題，而滿足於外者。第二態度是兩眼常回轉來看自家這裏，反求諸己，謀其在我，調和融洽我與對方之間，或超越乎彼此之對待，以變換主觀自適於這種境地爲問題之解決，而得滿足於內者。第三態度——此態度絕異於前二者，他是以取消問題爲問題之解決，以根本不生要求爲最上之滿足。問題及態度，各有淺深前後之序，又在什麼問題之下，有其最適相當的什麼態度。雖人之感觸問題，採取態度，初不必依其次第，亦不必適相當，而依其次第適當以進者，實爲合乎天然順序，得其常理。人類當第一問題之下，持第一態度走去，卽成就得其第一期文化，而自然引入第二問題，轉到第二態度，成就其第二期文化，又自然引入第三問題，轉到第三態度，成就其第三期文化。」這種所說的第一期文化，卽是近代西洋文化，第二期文化，卽是中國文化，第三期文化，卽是印度文化。此「世界三大系文化，」在梁先生的眼光中，是有邏輯的關係的，卽「近世之西洋人重新認取第一態度而固持之，遂開人類文化新紀元，大有成就，訖於最近未來，始得完成所謂第一期文化。在最近未來第一期文化完成；第二問題自然引入，人類必將重新認取第二態度，而完成所謂第二期文化，如是第三問題又自然引入；第三態度又將重新認取而完成所謂第三期文化。」因此中國文化雖仍落在第三期的印度文化之後，却已走到第一期的西洋文化前面，所

以梁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比較中西文化之後，就武斷的斷定「凡以中國未進於科學者，昧矣謬矣！中國已不能進於科學。凡以中國未進於德謨克拉西者，昧矣謬矣！中國已不能進於德謨克拉西同樣之理，凡以中國未進於資本主義者，昧矣謬矣！中國已不能進於資本主義。」這是一種如何反進化非客觀的言論。然而這一所謂已經走在西洋文化前面，落在印度文化後面的「中國文化」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呢？梁先生研究的結果是：「人生必有相關係之人，此即天倫；人生將始終在與人相關係中，此即倫理。親切相關之情，發乎天倫骨肉，乃致一切相關之人，莫不自然有其情，情誼所在，義務生焉，父義當慈，子義當孝，兄之義友，弟之義恭，夫婦朋友乃至一切相關之人莫不自然有其應盡之義。」這種「一個人似不爲其自己而存在，乃彷彿互爲他人而存在者」的社會，叫做「倫理本位的社會。」在社會上，「家乃天然的基本的關係」，「人必親其所親」，「師徒東夥隣右社會上一切朋友同儕或比於兄弟之關係。」在經濟上夫婦父子祖孫兄弟均共財，「自家人兄弟以訖親戚朋友，在經濟上皆彼此顧恤互相負責」沒有「貴族與農奴階級的對立，」沒有「資本家與勞工階級的對立，」「生產工具無爲一部人壟斷之形勢，殆人人得而有之，以自行其生產，形成職業分立的社會」在政治上，「但有君臣間官民間相互之倫理的義務，而不認識國家團體關係。又比國君爲大宗子，稱地方官爲父母，舉國家政治而亦家庭情誼化之。」其實這一美化了的「倫理本位社會」「職業分立社會，」不過是建築於農工手工業之基礎上家長制的宗法社會；即使帶上了多

少地方性的特點，要亦人類社會進化史上所已經過的一個階段；並且事實上因爲經濟基礎的變革，中國的家長制的宗法社會已不得不起着急速變化。因此更使迷戀往古的梁先生大爲歎惜和煩悶的說：「此社會向下破壞沉淪之所由致，主要在其內部之矛盾衝突，而此矛盾衝突則爲外界潮流國際競爭所引發。以內部矛盾而社會組織構造崩潰，以組織構造崩潰而矛盾衝突益烈，如此輾轉不已。」客觀的事實，慘酷的擊潰了無「階級對立」的「倫理本位社會」，燬滅了「生產工具無爲一部人壟斷之形勢」的「職業分立社會」，唯其如此，梁先生主觀的意識，偏得他要求從崩潰着的現存「社會之秩序」的維持上，「重建一新組織構造，開出一新治道。」所謂「新治道，」還是「父義當慈子義當孝，兄之義友，弟之義恭」的家長制的家族之恢復，以及「比國君爲大宗子，稱地方官爲父母，舉國家而亦家庭情誼化之」的宗法社會關係之還魂。這裏我們並沒有絲毫曲解。我們看梁先生曾經「掬出心肝之言」的說中國鄉村之出路，亦卽是中國之出路，「則將全靠其古先哲人所發明之『禮』，」同時鄒平實驗縣欲用數工夫的教育手段，組織村學鄉學，要使全體「學衆」（鄉民）要知道以團體（整個的鄉村）爲重，「爲團體服務」「遵規約，」「守秩序，」「敬長睦鄰，」「尊敬學長，」「接受學長的訓飭，」「信任理事，」「愛惜理事」等，實不過培養「禮」的團體條目，其目的是在「推村學之義於鄉學，」而使村學鄉學縣政府，鄉村建設研究院等一串的組織，成爲「小家庭對大家之倫理的關係。」最後由一縣一鄉的實驗，推廣到全中

國使全國亦成功一個大家庭，才是「鄉村建設哲學」的之理想的實現與完成！

三、『鄉村建設理論』的方法論

鄒平「鄉村建設」的理論，不僅是特殊的「一套」，並且是龐雜和矛盾的「一套。」加以他們之事態的循環的詭辯，每會使人眩迷而不知其眞相。但是，我們如要澈底認識批判「鄉村建設」的理論和實際，切不可爲他們的龐雜和矛盾的言詞所模糊，而須正確的把握了他們理論之基本的方法論。梁先生在「鄉村建設理論」一書的導言「研究鄉村建設的途徑」一文上，告訴我們說：「政治問題解決的途徑如何去尋求呢？如何去研究呢？我們對於政治問題，千萬記住，不要自己先提出一個什麼辦法，不要先對某種政治制度有成見，以爲某種制度最合適，某種政治制度最有效率，這種念頭千萬不要有！……本來就沒有那一個辦法是好的沒有那一個辦法是壞的；也許那一個辦法都是好的，那一個辦法都是壞的，（都是比較的，不是絕對的。）再則，不要單從我們此刻的大勢所需要的處所去想，你不要肯定中國在政治上非如何如何不可，不要單從「要求」一方面去想，如果從「要求」一方面着想，而單順從其「要求」來想辦法，這也是錯誤的！你以爲如何渴切需要，你正不可從此渴切的需要上想辦法。有人羨慕某種政治制度好，（如羨慕意國德國或英國俄國，）固然是錯誤；就是你無論怎樣的看清楚了中國的政治需要，而從其需要上想辦法，想途徑，想制度，這個都要不得！這就好像你口渴的時候不要想水喝，即令面前有蜜，你也不

要想它是不是甜的。這是第一層。第二層是說你口渴了也不想水喝，這個意思就是你不可從要求方面去用心，要先看看擺在眼前的事實能夠有什麼。差不多一件事情至少要從兩方面看：一是主觀的要求，一是客觀的事實。我們宜重在客觀的事實能夠有什麼，不要斤斤於主觀的要求什麼？…………我用一句話結束：我們應當把主觀的强烈的要求平下來（也不要忘記）而去看看周圍，看看擺在面前的事實，看看社會的形勢，能夠形成什麼樣子的政治構造，能夠有什麼樣子的政治構造，我們就接受什麼樣子的政治構造。」這段話雖說是指研究政治問題的方法，實際是整個「鄉村建設理論」的方法論。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梁先生的方法論之特質是：第一，「主觀的要求」和「客觀的事實」被處置成截然無關的兩個東西。梁先生雖然特別的著重「擺在面前的客觀事實」「社會的形勢」，但他的「主觀的要求」之發生，是既不受客觀事實之決定，更不了解主觀與客觀在實踐行程上的統一。第二，他所把握的「客觀事實」祇是無法則的動的客觀事實之表象。各個「客觀的事實」在梁先生看來，雖有表面的相互的關係，但沒有內在的發生發展和死滅之行程。第三，所謂擺在前面的客觀事實能夠有什麼，就接受什麼的理論，即是凡是客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主張。所以不管他們在理論有些什麼高遠玄妙的理想，不管有些什麼「主觀的强烈的要求」而在實踐上卻是徹頭徹尾的一切既成事實之頑固的保守者投降者，同時是一切進步的革新運動之頑强的反對者。因此梁先生的極端客觀論，本質上卻是極端主觀論。這裏梁先生全部理

論的形成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梁先生自認他的一生是「身在問題中，」受着問題的逼迫，和「問題的管束，」「不期然而然」地隨着「客觀的事實」之變化而有許多不及料的「變化，」同時亦受了許多「委實令人苦悶，徬徨，無辦法」的痛苦。他的由西洋的實利主義一變而為出世的佛教思想，再變而為入世的儒家思想，都是「問題偪出來」的。辛亥革命前，中國政治問題的爭論偪得他贊護梁啓超的立憲論，反對孫中山的革命論。因為「當我所以贊成立憲論時，實鑒於美國法國的制度不若英國的制度，當時我對於中國問題之見解，以為最關緊要的是政治改造問題，而不是在滿洲人復仇問題。」迨至辛亥革命時，「大勢所迫不得不轉而革命，」加入國民黨，並參加「祕密工作。」民國成立之後「我以為政治改造之要求已屆達到……而事實上……反至一年遠似一年……而日後越來越絕望。當此時也，一般人多責難彼時三數强有力者之破壞政治制度。如袁世凱之破壞約法以及其他軍閥之攘奪競爭；而在我則始終認為這決不是某幾個人所能破壞的，我們僅責少數人，實已蹈於錯誤之境地。」於是西洋的實利主義的思想動搖了，經過一個短時期的無政府主義的熱狂，而轉變到出世的佛教思想中去。民國六年後，一方面因為他父親的自殺，「謬慕釋氏……於祖國風教大原，先民德禮之化，顧不知留意，尤傷公之心……嗚呼！痛矣！兒子之罪，罪瀰天地已；」另一方面因在北大教書，「其時校內文科教授有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高一涵，陶孟和諸先生……茲數先生即彼時所謂新青年派，皆是崇尚西洋思想，反對東洋文化的。我

日夕與之相處，無時不感覺壓迫之嚴重，」於是再來一次「深刻的轉變」——由佛敎轉到儒敎，而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之發表。民國十二三年至十七年南方新興的國民革命運動，迅速的發展與變化，震撼了全國各階層分子的心靈，而梁先生經過長期的懷疑煩悶之後，「一旦掃除了懷疑的雲翳，透出了坦達的自信，於一向之所懷疑而遽然否認者，現在斷然地否認了；於一向之有所見而未敢遽然自信者，現在斷然地相信他了！否認了什麼？否認了一切西洋把戲，更不沾戀。相信了什麼？相信了我們自有立國之道，更不虛怯！」於是「我很迅速地從政治制度問題而旁及於經濟問題，從政治上之無路可走而看出於經濟上之無路可走。原來經濟進步，產業開發不外兩途；其一即歐洲人走的而爲日本人所模仿的路子。即是近代國家制度能確立，社會有秩序，法律有效力，各個人可本營利之目的，以自由競爭成功資本主義的經濟；第二即是俄國的制度，由政府去統制經濟，基本工業之收歸國有，農業亦徐徐因國家經營農場之故而改變其私有局面等等。這兩條路…………都須有其政治的條件，或其政治環境…………而此兩大前提，在中國全不具備。」這因爲中國文化已超過了西洋文化，中國「已不能進於科學」「已不能進於德漠克拉西，」「已不能進於資本主義」的原故；同時覺悟出中國要培養「新政治習慣」「從習慣問題看到團體力之培養，從團體力之培養，看到小範圍之做起，」而中國所有的「只有鄉村。」於是十七年有鄉村自治之主張的萌芽，二十年有「鄉村建設」的主張的完成。從政治以至整個的社會，「總須從頭起，另行改造，

從那裏改造起？何從理頭緒！何處培苗芽？還是鄉村。」梁先生的所謂從頭改造者，就是『「中國鄉村生息濡染於中國文化以至於今日，流風亦已歇，流弊亦已深，謀鄉村改進者自非有眞情實意運乎其間，蓋未易識得問題之深曲，而有以見乎其出路之何從，出路何從？則「禮」是也。此掏出心肝之言，毫不雜以書生迂闊之見，文人矜奇之意者。」漱前爲「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曾指出中國社會之唯一問題在求其從散漫入於組織（分言之則爲政治的民治化，經濟的社會化。）然此組織，所以行之者必有其道。在西洋近代則有其個人本位，權利本位的法律；在中國未來則將靠其古先哲人所發明之「禮」。』後來的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在鄒平鄉村建設之基礎的「鄉學」「村學，」「却不想以硬性的法令規定其組織間的分際關係，而想養成一種新禮俗，形著其組織關係於柔性的習慣之上」者，亦就是企圖恢復崩潰了的宗法社會之「禮」的實施。由此看來：梁先生的半生歷史，全部理論，恰好是他的方法論之註解。第一，以上層築物的「禮」「習慣」或「心理，」爲「鄉村建設」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正是倒果爲因的主觀論，所謂處處著重「客觀的事實」者，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謊言，第二，所謂培養「新禮俗」者，自然絲毫沒有依據新生活而培養新習慣的意味，反之，「古先哲人」所發明的「禮，」從精神至形式的整個的復活。它的「新」的意義，不過是在舊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宗法思想的崩潰過程中，保守主義的開倒車運動。所謂「從頭改造，」實在不過是澈頭澈尾的復舊。最後，梁先生的思想的變遷過程不是證明了他的毫無「成見，」恰

好相反，證明他有一貫的頑强的成見。這個成見，就是一切進步的思想和活動之敵視和反對，一切既成的統治勢力之合理存在的承認。這一保守主義的强烈的主觀要求，是貫澈了他的全部生活和全部學理的。所謂「客觀的事實」倔得他起了許多次「變化」的意義，即是他的保守主義，倔得他不斷的改頭換面來適應「客觀的事實」——一切既成的勢力罷了。

四、『鄉村建設』的意義與價值

梁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曾將「鄉村建設」之理想，描畫爲：「中國興亡繫於能否工業化問題，但從世界大勢看去，中國的工業化，將必走一條不同的路，他是要從鄉村生產力購買力輾轉遞增，農業工業壘爲推引，逐漸以合作的路，達於爲消費而生產，於生產社會化的進程中同時完成分配的社會化。這樣創造起來的文明，完全爲一新文明。既不是過去的鄉村文明，亦不是近代西洋的都市文明。」又說「其社會的重心在鄉村；鄉村經濟的中心，政治的中心以及文化的中心都可以在都市。」大概就是因爲「生產的社會化」「分配的社會化」等美麗的術語之濫用，被日本的一部分人稱爲農村社會主義派。然而如此的「社會主義派」不僅是永不能兌現的烏托邦，龐雜矛盾得不能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並且本質上完全是一種反時代反進化的企圖。這個理想的第三條道路的「新文明，」所以行之之道，唯有「靠其古先哲人所發明之「禮，」而此「禮」就是手工農工業經濟基礎上宗法社會的上層築物，它的骨幹，全在家長制

的家族之維持梁先生看成中國社會「天然基本關係」的「家」——家族制度的家族不過是由對偶婚到一夫一妻制的過渡家族形態，是人類社會史上普通存在過的一個階段，雖然在中國存在的時期比較長久些，但決不是中國特有的文化基礎，亦不是什麼「天然基本關係。」況且近數十年來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的發展（自然是畸形曲折的，）使這一家長制度的「家」以至「家庭化」的政治制度，都在急速地崩潰，而成為遺老遺少們所迷戀者的博物院的古董。這個崩潰的客觀事實，梁先生亦已嚴重的看見了，不過他不願看見所以崩潰的原因，更不願看見代之而起的新組織新制度。所以梁先生只想在崩潰的家長制度的「家」的廢墟上來作心勞日拙的恢復工作。「中國的興亡」不是「繫於能否工業化，」而是中國事實上已在工業化的過程上繫於能否解除一切內外的限制勢力。中國家長制的倫理本位社會恰是阻障了中國的工業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並且必然的被破壞崩潰的，此其一。小農與家庭工業之基礎上的合作道路，祇是一種走不通的幻想，同時本質上並不排斥生產手段的集中於少數人之手的事實。況且目前中國的農村合作，更是在中外資本家金融家的提攜和支配之下而活動的。所以所謂以合作的道路達到「生產的社會化」和「消費的社會化」之理想，實是一種南轅北轍的幻想。此其二。「合作的道路」既然不過是使農民緊密的被支配於都市工商業家之手，則無論怎樣要把社會的重心放在農村，自然並不絲毫變更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中心之都市，對農村之剝削和支配的關係的。其實經

濟的政治的文化的中心之「都市，」在中國亦已不是尚待梁先生創造的理想，即使完全如梁先生所說，中國「在它境內見到的無非是些鄉村，即是有些城市，亦多數只算大鄉村，說得上都市的很少，」可是我們不要忘記倫敦、紐約、大阪等世界大都市對於我國的農村，正起着深巨的支配作用，此其三。總而言之，梁先生企圖創造的第三條道路的「新文明」之理論，只是龐雜矛盾的一套，只是主觀的要求要把見了風的東方木乃伊重新復活起來的幻想，於中國的眞正出路，恰是一個障害。但是他的「客觀的事實能夠有什麼？就接受什麼」的現世主義，却自有其現實的意義和價值。

鄒平鄉村建設的理論和活動，自是「非出偶然」的時代之產物，不過它代表的不是進步的一方面，而是保守的一方面，它的眞正意義和價值，亦正在此：

第一，「我們回想最近二三十年來的經過，是不是政治改造運動失敗史？較遠之辛亥革命運動，以及十五年國民黨北伐後厲行之黨治，乃至其間的各次政治改革，那一次不是失敗？又有那一次未曾失敗到家？」梁先生否認二三十年來一切改革運動的進步意義，在他的眼中無不失敗，無不「失敗到家」，自有非偶然的深長意義。這是從清末時贊護梁啓超的立憲論起一貫的主觀的要求，同時亦是一切被改革者時代落伍者之一相情願的希望和結論。並且還不只此，「此社會向下破壞沉淪之所由致，主要在其內部之矛盾衝突，而此矛盾衝突則爲外界潮流國際競爭所引發。以內部矛盾而社會組織構造崩潰，以組織構造

崩潰而矛盾衝突益烈，如此輾轉無已，」外界潮流引起的社會內部之矛盾衝突，在梁先生看來，祇是社會組織構造崩潰與矛盾衝突輾轉無已的舊社會的向下破壞沉淪！這自然亦非偶然的。梁先生的保守主義者的眼中，社會是不演進的，只有家長制的「家」是「天然的基本關係，」同樣的只有宗法社會的「禮俗，」才是天然的社會文化，才是社會向上進步之所由致。所以對一切關於舊組織的「禮俗」的改革，都是社會的「向下沉淪，」所以我們的梁先生每在改革浪潮的當時總是煩悶的；每當改革的失敗或遭受了挫折時，總是以社會的舊組織舊禮俗的救世主而自任了。我們的救世主，雖說了些什麼要把中國政治經濟問題整個的解決，和創造了些什麼「新習慣，」「新禮俗，」「新文明」等等新名詞，然而「掏出心肝之言，」還是「在中國未來則將靠其古先哲人所發明之「禮」而已。因此社會的「內部矛盾衝突」之客觀事實的發展，雖然擊破了無階級對立的「倫理本位社會，」「職業分立社會」之美麗的理想，以及中國特殊文化之整個的理論體系，然而鄒平鄉村建設之主要任務，却正在此種「內部矛盾衝突」之軟工夫的緩和和彌縫上。梁先生要達到「必須把鄉村看成是整個的」主觀的强烈要求，所以一方面鄉學村學的學長學董和理事，必須有「信任資望，」「齒德並茂」的鄉村領袖，聯莊會的會員必須有「身家財產」的分子，鄉村建設的動力，必須是「有心人」的知識分子，這樣來建立集政治教育和武力於一手的社會基礎。另一方面强為譬解的說農村中的地主資產階級都已逃入都市，而根本地消滅了農村內部之矛盾，

這樣來形成村學鄉學縣政府研究院之小家庭大家庭的倫理關係。梁先生在廣西國民基礎教育與鄉村建設運動一文上說：「鄉村建設運動實爲一種農民運動，或造端於農民運動者……所不同於過去之農民運動者，蓋在不分化鄉村而視鄉村爲整個的，不鬥爭破壞而合作建設，」由此可知被問題僞出來的鄉村建設運動的意義和價值主要的是什麼了。

第二，我們必須指出梁先生的思想之變遷，祇是許多不料的變遷之表象；根底上的保守主義是用了各種各式的形態而存續着的。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們更不可忽略梁先生之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客觀主義；在既成事實的面前，「調和融洽與對方之間，或超越乎彼此之對待，以變換主觀自適於這類境地爲問題之解決」的供奉哲學的現世主義。具體的說，就是梁先生堅決自持的「我們宜重在客觀事實的能夠有什麼，」「就接受什麼」的客觀論。這種客觀論，首先表現於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態度。不錯，梁先生曾經指出「外國之經濟侵略」爲鄉村之經濟屬性的破壞力；「兵禍匪亂苛徵等，」爲鄉村之政治屬性的破壞力；十九年時梁先生亦曾異議過胡適先生「我們革命的眞正對象，」「我們的眞正敵人是貧窮，是疾病，是愚昧，是貪污，是擾亂，」「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爲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爲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的說法，其實梁先生正是胡先生最忠實而聰明的信徒。他雖把帝國主義和軍閥，歸入中國問題之內；但是「都可見我初非放鬆他們，而是要覓求更切實

而有效的辦法，」終於放鬆了他們而成為「非革命對象。」梁先生確切明瞭的說，「外國侵略雖為患，而所患不在外國侵略，使有秩序則社會生活順利進行，自身有力量可以禦外也。民窮財盡雖可憂，而所憂者不在民窮財盡；使有秩序則社會生活能順利進行，生息長養，不難日起有功也，」這自然不僅放鬆了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當前奮鬥，反之，一切反帝反軍閥的勢力卻成為梁先生的「革命對象」了。另一方面，帝國主義者要求中國恢復奴隸的秩序，我們的梁先生就用「軟工夫」來化除「愚民」的不知忠順之危險，而重新建立「社會之秩序；」帝國主義者要求「中國增進購買力和推銷存貨之一種有效辦法，」我們的梁先生就努力增加鄉村購買力以「引發工業」——鄉村購買力的增加，民族工業未嘗不可以分得一杯羹，但在沒有獲得政治保護的前提之前，無疑的只是為帝國主義推銷存貨的努力。同樣的，梁先生雖認「中國現在南北東西上下大小的政府，其自身皆為直接破壞鄉村的力量，」但是實際上不僅要依附一種他所「鄙棄的」政治力量，來實驗他的「鄉村建設，」並且更以「新禮俗」的實施，來鞏固「其自身皆為直接破壞鄉村的力量」

其次，梁先生雖在理想上否認了中國資本主義之存在，在意氣上痛恨「其猶有些資金則唯在軍閥官僚商人買辦之手，是皆敲剝於農村而屯之都市租界銀行者。」可是當都市租界的銀行家與工業家高唱擴大農村的商品和原料市場，為都市的過剩資金找出路時，梁先生的「鄉村建設」亦正由「萌芽」而

「完全成熟」，而實際實驗並且昔日之「敲剝於農村而屯之都市租界銀行」的「軍閥官僚商人買辦之手」的資金，「此時大計，唯在因勢導之以返迴流入農村，集於新式農業之開發一途，籌管計之，使吾能一面萃力於農業改良試驗，以新式農業介紹於農民；一面訓練人才，提倡合作；一面設爲農民銀行，吸收都市資金，而轉輸於農村。則三者連環爲用：新式農業非合作而貸款莫舉；合作非新式農業之明效與銀行貸款之利莫由促進；而銀行之出貸也，非有新式農業之介紹莫能必其用於生產之途，非合作組織莫能必其信用保證。苟所介紹於農民者其效不虛，則新式農業必由是促進，合作組織必由是促進，銀行之吸收而轉輸必暢遂成功，一轉移之間，全局皆活，而農業社會化於爲可望。」我們如果剝去了農業社會化的美麗外套，「則農業必奪於工業，而資本主義與（其實這裏應該說主要的是帝國主義市場的擴大——筆者。）由合作以達於社會主義之途，就離了。」

總之以上的分析，是鄒平的「鄉村建設」運動之眞實的社會背景，和其所依附的「客觀事實」的要求，同時，亦就是「鄉村建設」之眞的時代的意義和價値。我們又可歸納起來說，自帝國主義者以至保守主義者都統一意志，集中力量於「中國所有者，則祇是鄉村，祇是農業」的原因，是中國鄉村還被目爲買購力之可供開發的無盡寶藏，是中國動亂的一支主要力量，同時又是中國舊有的社會組織構造崩潰之最後殘存的地方，所謂『禮失而求諸野』的唯一尙堪掙扎的一块土。唯其如此，鄉村建設運動的本身，

就已決定了它的前途的無望的命運。鄉村運動領導者之一的楊開道先生甚至亦不能不說：「勞民傷財這是梁漱溟先生給山西村治的總評，也可以借用於一切改造舊村的活動，尤其是現代化運動，科學化運動。無論你談自衛也好，自治也好，教育也好，經濟也好，一切農民沒有資格了解，沒有法子參加的。十畝地的自耕農，已經是耕作的牛馬，而不是社會的中堅，何況耕人土地的佃農，爲人雇傭的工人。資本越少，土地越少，作工器具越舊，工作效能越低，農場收入越少，農家生活越低，一個循環不已的圈子，只有越走越低。舊村改造的工作，等於推車上山，起初比較容易，以後越走越難，他許會從半山倒塌下來的。」（見大公報鄉村建設第十七期「農村建設之途徑」）不過我們還須附加的說，如果中國問題沒有正確的解決以前，這種「非出偶然」的「鄉村建設」大概總還有某種客觀的要求吧？

註：引號中文字，均係引自梁漱溟先生所著之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一着，鄉村建設論文集，鄉村建設旬刊，及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概覽等書。

一九三五，七，二十日

六　中國地租的形式和性質

田秋烈

租佃關係構成農村中之主要關係，這種關係以地租爲紐帶而顯現晚近隨了地權移轉之進展，使得租佃制度較以前有着更廣泛的存在，因之感受支付地租痛苦的人們也有了大量的增多；同時，更因爲農村中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不斷的推移，又迫使地租在形式上發生了若干的變革，入們根據地租形式之改變而遽下判斷，對於地租本質之認識，遂不免陷於混淆。前者增强了研究地租問題之意義，後者加甚了解析地租性質之要求。所有這些都指示着對於地租的形式及其性質之說明是不容再緩的。

地主和佃農的關係是農村生產關係之樞紐，這種關係到現在更其普遍而尖銳。中國佃農的分佈，南部多於北部，這種現象完全由於南北兩部的自然環境及經濟發展所形成。據民十八年國民政府立法院調查，全國自耕農所佔的成份爲百分之四五，自耕兼佃農爲百分之二二·二，純粹佃農爲百分之三二·八，綜計受租佃制度之影響者爲百分之五五。但近年隨了天災人禍之推演，促進了農民無地化的過程，因而使得佃農在數量上有了顯著的增加。據去年實業部調查，全國自耕農佔全部農民的百分之四十，自耕兼佃農佔百分之二四，純粹佃農佔百分之三六，合計在租佃制度下討生活的佔百分之六十，較五年前立法院調查增多了百分之五。在這種數字的背後，隱藏着自耕農轉化爲佃農之深切的慘痛，同時也指示出

作爲主佃雙方爭執之焦點的地租問題是當前一個不可忽略的嚴重問題。

在未討論中國地租本身以前，對於地租形式一般的發展之敍述，自然是必要的前提。地租的內容完全爲社會生產方式所決定，因之地租各種不同的形式，也和各個社會生產過程發展的階段相適合。在典型的封建社會裏，以自給自足經濟爲基礎，農民附着於土地，地主對農民保有種種經濟外的强制權。此時農民除了耕種那事實上歸其所有的土地以外，必按期抽出若干時日，用自己的耕具和耕畜，至地主田中操作，這種無報酬的勞動，便是地租之最原始最簡單的形式，即力租或勞役地租。這種地租之特徵，在於地主對農民之强制耕作，農民爲自己的勞動與爲地主的勞動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劃然分開，地主佔有着農民全部過剩勞動之支出。迨後社會經濟及生產勞動都有了前進的發展，於是力租逐漸改爲用生產品繳納的物租，這種形式的轉換，並沒有改變了地租的本質，所不同的，僅在以剩餘勞動實現爲地租時，已不再呈現本來的面目，也不再在地主或其代表者的直接監督及强制下面形成，農民多少可以處分自己的全勞動時間了。

商品經濟的發展，扯斷了農業和手工業的聯繫，促進了農產商品化的行程。貨幣流通達到某種程度，以前的力租或物租即有變爲錢租即貨幣地租之可能。但這種單純的由物租向錢租之轉變，也和由力租向物租之轉變一樣，並沒有改換了地租的本質，農民對地主仍須無報償地繳納其全部或大部的剩餘生

產物，它和以前的形式區別之點，只在易現物爲貨幣以支付而已。不過，錢租雖可爲封建地租的一種形式，但無疑地它是封建地租的崩潰形式，和錢租相適應的生產方式已經起了變化，卽交換關係已經有了較高的發展。隨着錢租的出現，以前主佃間所有的傳統的身分的習慣關係，必然轉變爲法律的契約的貨幣關係。此時，農業經營如仍有自由順利的前途，則以後的發展有趨於資本主義經濟，因而有趨於從農業利潤中扣除平均利潤後之剩餘部份的資本主義地租之可能。

地租之一般發展形式既明，以下請論中國地租。

一、地租的形式及其分佈

中國各地農村經濟發展的程度不同，反映於地租的形式上也極爲複雜。一般地說來，全國各地之地租包括力租，物租與錢租三種形式，其中以物租爲最普遍，錢租次之，力租僅行於邊遠省份及內地經濟特別落後區域。今試依次述之於下：

(一)力租——力租在整個地租形式的比重上，顯然是最弱的一種，在這種形式下的佃農，大概都因爲受着身分，傳統，及債務等束縛而無法擺脫。如廣西思恩，河池等地，至今尙有一種農奴性質的佃農，由地主供給小屋一間，薄田數畝，佃農須全年爲地主服勞役。在西藏，佃農之在地主家地上代耕者，得由地主撥與若干免租地，田內收入，概歸佃農所有，惟須以其勞力供地主無限制之使用。雲南南部一帶之佃戶，每年

秋收上場後，還租償債，所餘無幾，十月起即須向地主借糧，一般佃農為了債務的束縛，致不得不終身匍匐於地主之前，供地主無報酬之使役。四川西部的佃農，與雲南南部相彷彿，大致均為債務所累，成為終身佃奴。

佃農為地主服役，也有由契約規定的，這頗似一種工償制的保留。河南輝縣，鎮平等地之佃戶每年於分租之後，照例須在地主家中服役幾天，地主只管膳食，不給工資。在輝縣，普通是人十天，牲口三天以至十天；在鎮平，人二十天，牲口至少十天，多至三十天。也有的不規定日期，地主家裏有事，便隨意去幫忙，一年中為地主服役四五十天，也是常有的事。安徽潁州佃農除繳納租穀外，須常川供地主差使，或處理家庭瑣事，或為地主充當挑夫。桐城，貴池等地尙有一種帶莊田，此田由地主租與一般在其田上代種或幫種之佃農，作為一種報酬，而佃農也即以代地主耕作之勞力作為田租。江蘇灌雲地主與佃戶訂立契約時即規定佃戶須永遠服從地主之指揮，為地主服勞役。寶山縣東北鄉通行「脚色」制，每年由主佃雙方訂明：地主租出一畝不收租金之土地，佃農須在地主的田中耕作或處理其他雜務三十天至六十天。佃農租進之脚色田，須待地主之田種好，或平時起早帶晚種之。地主家中有事，須義務幫忙。

從上面的例證中，可以看出力租這種地租形式充分表現着地主對佃農之經濟外的剝削。在行着這種地租的地方，大概都具備三種條件：一、帶着濃厚的地方經濟的色采，地主的莊田和外界還沒有多大聯

緊；二、佃農還未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便於地主索取他的勞力；三、農業經濟發展落後，技術低劣，一般小農知識愚昧，且困於貧窮，使得這種制度有存在的可能。

由力租過渡到物租的中間形式，爲幫工佃種制。在這種制度下，地主提供土地及全部或大部經營資本，且親自參加農作，管理農場，佃農於一年終了後取得一定的收穫分益。這種佃農和純粹分租制下的佃農不同，他沒有處理耕作的全權，一切農事勞動均須聽從地主的命令。但也和農業雇工不同，因其耕作限於固定的佃地，所得的報償以總收穫的一定比率爲依據。實質上，幫工佃種的佃農仍未脫離佃種形式的束縛，所以我們把它歸入力租的範圍。

幫工佃種制分佈的地方，大多是土地極磽薄或初墾荒土的區域，如雲南之寧河；江蘇之海門，松江，南通；河北之深澤，武强，邯鄲；山東之恩縣；陝西之綏德；綏遠之墾殖區；以及「九一八」以前遼寧之瞻楡，鎮東，洮南；吉林之賓縣，阿城；黑龍江之巴彥，蘭西，景星等地，皆有這種制度的踪跡，其中以北部及東北部諸省較爲普遍。分益的比率各地不同，有的爲主九佃一（如河北深澤，武强，）有的爲主四佃六（如吉林洮南，）普通爲五五對分。

（二）物租——物租是中國地租的統治形式，流行的範圍最爲廣闊。繳納物租的方法有三：第一爲分租，租額無定，由主佃雙方預先約定按若干成數分取收穫物，所分的收穫物，或限於春作物，或兼及秋作物。

第二爲定租，通稱「穀租」或「包租，」佃農每年向地主繳納定額之租穀，無論年歲豐歉，不得短少。所繳的品類不限於一種，有以田內主要產品來規定者，有以合主產品及副產品來規定者，也有以米穀作代表者，繳納的時期，有一季繳清者，有兩季分繳者。設遇荒年，有酌量減免者，是爲「軟租，」或「花租。」有絲毫不減者，是爲「硬租，」「板租，」或「鐵租。」第三爲折租，由佃農將現物按時價折爲現金，繳與地主。折租並非貨幣地租，地主有隨意變更回復之權，他可以「米價昂貴則要錢，米價低賤則要米。」繳租時期也無一定，因穀物價格時常變動，地主多依照自己之方便，將每畝租穀量按市上高價合作錢數，迫令佃農繳納。

大體說來，物租多行於土質欠肥，商業資本不發展的區域。物租中之分租制在北部各省行之者較多，蓋此等地方土壤瘠瘦，豐歉無定，收成太無把握，不如是則佃農難免遭受重大的危險與損失。據農村復興委員會調查，河南輝縣、許昌、鎮平三縣各類田租情形如下：

	半數以上納錢租者	半數以上納穀租者	半數以上行分租者
輝縣四村	—	二村	二村
許昌五村	—	二村	三村
鎮平六村	—	—	五村

（註：鎮平一村穀租與分租各半，表中未列入。）

據上表所示，三縣十五村半數以上皆納物租，其中尤以分租佔絕對的優勢，折租無。反觀江浙二省則穀租較爲盛行：

	半數以上納錢租者	半數以上納穀租者	半數以上行折租者
江蘇啓東七村	—	六村	—
浙江東陽八村	一村	六村	—

（註：啓東一村穀租與折租各半，東陽一村錢租與穀租各半，表中未列入。）

定額穀租通行的區域多爲耕作較精密，收成較有把握的地方。分租在江浙一帶甚少見，只有碰着水旱成災，農產歉收的時候，佃戶請地主來勘田，或可邀得暫時實行分租。至折租，本爲物租蛻化爲錢租的一種過渡形式，行之者自也以南部各省爲多。

物租的普遍程度，也可於上列兩表見之。事實上，不僅河南江浙如此，其他各省也莫不皆然。據吳順友君調查，江西永修、資溪等三十六縣中，平均納穀租者佔百分之七三・六，分租佔百分之一一・四，錢租佔百分之一〇・七，幫工佃種佔百分之四・三，綜計物租佔百分之八五。更據陳翰笙氏在廣東的調查，該省

「除旱地多數納錢租外，可以說全省還通行穀租……近十年來，各縣都有將穀租改爲錢租的一種傾向，所以到處可以見着折租，而穀租依然在全省佔優勢。」他如甘肅全省都通行定額穀租和分租；山西汾城、平定、黎城、代縣、吉縣等地，山東鉅野，以及察哈爾之商都，綏遠之歸綏，皆通行分租；湖南除少數地方行錢租外，物租也佔着統治地位。

各項調查材料都顯示着地主本身對於由物租變爲錢租表示頑强的反抗。地主之所以樂於接受物租，大概多自備倉廩，儲蓄待時，好作屯積居奇事業。農產價格之大的跳動，收前收後價格間的剪刀差額，對於地主收取物租，比收取錢租要有更多利益。收穫前用高利出借米或其他生產品，當價格最高的時候，是按高的市價來計算生產品的價格的，但當收穫後收回借貸本息時，則按低的市價來計算生產品的價格，這是再有利不過的事。農產品價格之跳動，及高利貸資本之活躍，阻止着物租走向錢租之轉變過程，延長了物租之優越生命。

(三)錢租——錢租在現在並不十分普遍。錢租租額不以生產品的數量爲基準，而是由主佃雙方於事前議訂的一定現金額，無論收穫如何，不得減低。各地之官產與公田（如寺產，族田）及一般商品作物地（如桑田，棉田，菜園）多實行錢租。下面所列廣東番禺八個代表村的納租形式，可供參考：

	租入畝數	納穀租的 畝數	納穀租的 百分比	納錢租的 畝數	納錢租的 百分比
四個稻作村	三，四五九·一	一，八〇二·二	五二·一	一，六五六·九	四七·九
四個純粹商品作物村	一，二五四·八	四四·九	三·六	一，二〇九·九	九六·四

前四個稻作村，穀租面積超過錢租面積，後四個種植生菓蔬菜、棉花，花生的代表村，錢租面積竟佔了百分之九六·四。他如山西能種美棉之上等水田，皆納錢租；湖南產薯芋、茶、麻、竹、木等山田之地租，也多用現金繳納。

都市附近的農村受商業資本的影響較重，故納錢租者也特多。據上海社會局調查，附近九十二戶農家中，送禮者僅一家，分租者二家，納穀租者二家，納錢租者則達八十七家之多。河南除學田，廟田，及同類性質的公田之地租收取現金（廣東及長江流域各省的官產及公田也多收錢租）外，私人土地行錢租的，只有豫北重鎮新鄉近城的地方。在卜凱氏所調查的六省六四一農戶中，納錢租者在北部僅宿縣一家，而南京太平門外卻有三十三家。「九一八」以前的東三省也是如此，據南開大學調查，吉林省城附近，瀋陽，永吉，及哈爾濱，呼蘭縣等地，均通行錢租。

錢租的繳納有時期之不同，有的在農產收穫後繳納，有的在未下種前即須付出租金，後者稱為「預

租。」預租在錢租通行的區域差不多很普遍，北平近郊之「上交租，」東三省之「上打租，」廣東之「上期租，」皆屬此類形式。預租有放息的可能，在地主既可收「鐵租」之效，又可多得一年半載的利息，在農民非但減少了生產上所必需的流動資本，且多因預籌租金而投入高利貸的鐵蹄之下。有些地方的地主卽兼此高利貸者，於是農民一方面向他納租，一方面又向他舉債，本利相循，租金數量隨而增加。農民資無所出，惟有撙節經營資本而縮小其再生產的範圍。所以這種錢租名義上雖是進步的，實質上則是退化的。

農民於地主處租進土地之前，有須付出一筆巨額現金，然後再按期繳租的，是爲「押租。」押租雖爲貨幣，但其分佈地點卻不限於錢租通行區域，有穀租的地方也可以有押租。押租的名稱，因地不同，在江浙稱爲「頂首」「基脚，」「過岸，」「上莊，」「扎耕金，」「押信；」兩湖稱爲「批關，」「批禮，」「信錢；」兩廣稱爲「黑錢，」「水面，」「批頭錢，」「按租；」江西稱爲「撥價，」「脫肩，」「墜脚，」「押脚；」河南稱爲「禮錢，」「借頭；」東三省稱爲「小押，」「押契錢，」「護租錢。」但名稱雖不同，而其用意則不外預防佃戶欠租及代表田產權之一部，前者之意義易明，後者見於江浙皖閩各省的田權分有制。在行田權分有制的地方，田面權與田底權是分開的，田底權是地主的所有權，田面權是佃戶的耕種權。佃戶欲取得這種耕種權或欲對耕種權建立相當的保障，須向地主納付一批現金，卽押租。有些地方佃戶取得耕種權以後，可以繼續至永久，通稱永佃權。

押租重量，各地不同，河南信陽德林鄉，每石田（合六畝左右）要繳四十元，浙江杭縣新闢鄉，每畝五元，江蘇各鹽墾公司出租土地每畝可達八元，常熟高英鄉每畝高至三四十元。許多貧困的農民因爲拿不出這巨額的押金，只得老守着那狹小的田場度他們飢寒的生活。有的地方雖然規定佃農納押金，繳租時可與以酌減，但在佃農仍然是吃虧的。據韓德章君調查，浙西一帶「通例佃戶在先一年所預繳之押租，每洋一元，在次年可減收米一斗，這在表面上好似預繳押租在次年應得一斗半的酬謝，但事實上每石糙米約值九元，每斗不過○・九元，每元錢按月息百分之二計利放債，則周年本息應得一・二四元。此本利之和與斗米價值之差數○・三四元，即佃戶因享受減租的特權而蒙受的無形損失。」

二、地租的高度

地租租額之高，是中國農村經濟特質之一。分租與穀租一般地均搖擺於全產量的一半左右，錢租則估到地價的十分之一。分租比率雖然和主佃雙方對農業投資的多寡，不無關係，但地主根據有田產而造成的一種傳統的身分，不出資本或僅出少量的資本，以分取半數收穫物的，也不在少數。河北保定地主供給土地，間或出一半種籽，佃戶大多數負擔人工及全部資本，而農田收穫則由雙方五五平分。深澤黎元村的分租制，業主不供給任何資本，收成由業主與佃戶按對半分取，租物包括糧柴兩部。山東益都地主出土地，佃戶出人工及全部資本，收穫物各取半數。河南最通行的分租辦法，是地主和佃戶平分生產物，種籽各

出一半，買的肥料對分，牲口由佃戶出。但各縣情形也不盡同，如淇縣，種籽須過一斗纔分，否則全由佃戶出；許昌一帶甚至田稅也各半負擔。江蘇邳縣全境通行分租制，地主出土地及一半種籽，此外農具肥料一切不管，到收穫時平分生產物。廣東翁源的分租制，上田是主四佃六，中田對分，下田主二佃八。上田佃戶所出資本往往多於中田，地主所取也少於中田，惟有赤貧的佃戶仰給於地主的成本時，或富有的佃戶和地主合股投放資本時，地主所得的分租成數必然地較高，如潮安種柑的田，地主供給肥料和樹苗，分租時，地主得百分之六十的收穫，這正如卜凱氏在所著中國農場經濟一書中所說：「如果將公平地租解釋做依照主佃雙方對於費用供給的比例而分取收穫物，佃戶所得的太少，地主所得的也太多。」

當分取收穫物時，地主更可利用種種方法，佔得不少的便宜。江蘇邳縣在收穫前，地主卽派「總管」下鄉督看收割，總管在鄉村食住等項全由佃戶供給。收割穀物時，佃戶請地主的代表人估量收穫的多少，但估量毫無標準，本來只可收三十石的，他可以估到四十石，按五五對分，地主拿去二十石，結果竟徵至三分之二。廣東高要桂嶺鄉，每到分租時，地主和稅商就帶了武裝隊伍下田，親自動手把他們自己所要得的穀堆堆得大過佃戶所能得的幾乎一倍。河北阜平地主收租時不用新式度量衡，而用自己特製之斗，這種斗比舊市斗還要大出一升甚至二升，通常稱之爲「加一」「加二」的租斗。分租方法已無所謂公平，分租時又有種種不利於佃農的黑幕，致使佃農所得愈發少，地主所得愈發多，佃農之陷於極度的貧困，自屬

必然的結果。

穀租租率之高，也是吸盡了佃農的血汗。從農村復興委員會的調查中，可以知道浙江穀租通常佔到全收穫的一半。龍游八村穀租租額對全產量的比率最低百分之五十，高者達百分之六十。崇德各村租額佔產量的百分之二五至四四。崇德鄰縣的租額，以杭縣新蘭鄉爲最高，普通每畝一石，幾佔產量百分之五九，最高者一石四，差不多佃戶全部的收穫都要獻給地主。有永佃制習慣的地方，租額較低，但享有永佃權的佃戶還可以將租田轉頂於第三者，而取得頂銀。有時還能轉租於第三者，這第三者所出的租金，有出人意料的高度，所以永佃田一經轉租，便完全表現一副人間慘痛的剝削。

江蘇常熟穀租租額平均佔收穫量的百分之四五，啓東較低，租率通常爲五分之一。啓東租額雖不高，但也有許多苛刻的辦法，有些地主實行「包三石」制，即每年每千步田要繳麥一石，黃豆一石，玉蜀黍一石，無論年歲如何，不增不減，倘其中缺少某一項，則照時價折合算繳。這種包三石田的佃農往往一年所穫，除自己餬口外，竟不足償繳的數目，於是只得質典衣物，七拚八湊，以納糧租。山西屯留普通租額每畝黃豆五斗，每畝通常收穫十斗，所有錢糧公費尙歸佃農負擔。河南許昌每畝產量在民二十二年只值七·五五元，每畝地租高者達五·六六元，佔產值的百分之七四·九七，平均也在產值百分之五五以上。江西彭澤、新淦、吉水、峽江、萍鄉等五縣，平均每畝租額佔通常產量之比率在上田爲百分之四八·七一，中田爲百分

之五一・八七，下田爲百分之五五・七九。廣東番禺定額穀租佔產量百分之六五，大多數是百分之六十。廣西龍州等地穀租租額通常也以百分之五十爲準則。二千年前董仲舒說佃戶耕種豪民的田地，要以所得十分之五納租，這種情形到現在還是普遍的。

錢租租額同樣地很高：浙西富陽等縣八村平均上田每畝租額約八元，中田六元，下田四元，對地價的比率爲百分之八・八，九・一，一一・九。江蘇常熟高英鄉趙巷與花溪鄉西濱二村的普通租額爲四・八元及五・四元，對地價的比率爲百分之一九・二及一二。江西彭澤永修等七縣，租額平均上田四・五七元，中田三・一三元，下田一・八六元，對地價的比率各爲一九・一，一八・四五，一二・〇八，廣東中山坑田（山谷間稍低潤的田地）可以改作屋基，地價昂貴，每畝租額普通三十元，對地價的比率爲百分之十。北平近郊三十二村平均每畝租額二・一元，對地價的比率爲八・二。

計算租價佔地價的百分之幾，然後再看幾年的租價和地價相等，這種年數通稱「購買年」。購買年的長短，表示租額的輕重。如果將這種方法應用於上列各地，則浙西八村平均上田購買年爲一一・五年，中田一〇・九年，下田八・四年。江蘇常熟高英鄉趙巷爲五・二年，花溪鄉西濱爲八・三年。江西彭澤等七縣，上田爲五・二年，中田爲五・四年，下田爲四・七年。廣東中山坑田爲十年。北平近郊各村平均爲一三・七年，從這一點點貧乏的材料中，可以看出購買年最長者爲一三・七年，最短者竟在五年以下，換言

之，也就是最多在一三·七年間地主即可擴張田權一倍。

假如我們再把地租正額以外的誅求考慮在內，更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租額的高度。河南有所謂「人工稞」及種種白供；江蘇有所謂「脚銷」「力米」「例米」「催甲費」；浙江有所謂「田婆鷄」「田主馬食穀」；江西有所謂「小租錢」「飯租」「租鷄」；湖南有所謂「牛鷄」「年肉」；廣東有所謂「伙頭鷄」「年頭鴨」「伙頭米」；山東有所謂「包裹工」「打裏工」。這種種經濟外的剝削之存在，一方面增加了佃農的負擔，同時也表露着中國租佃關係的特質。

中國這種高額的地租，無疑地不是超過利潤的特殊部分，反之，它不但侵蝕了利潤的全部，而且包含着工資之一部。試舉江蘇灌雲爲例以說明之。據二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日報載，灌雲在中稔之年每畝每年收支情形如下：

支出	收入
畜牛六角四分一釐五毫	夏麥二斗五升（每斗價一元二角）
全部人工二元三角五分二釐	合洋三元
種籽七角六分三釐	秋豆二斗（每斗價一元一角）
肥料四角	合洋二元二角

溝洫工程二角

共計四元三角五分六釐五毫　　　　共計五元二角

假定一切捐稅皆由地主出，自衛費三角二分也不計算在內，每畝每年可盈餘八角四分同時，根據劉大鈞氏在所著我國佃農經濟狀況一書中所載，灌雲每畝田租最低一元，最高四元，平均二元五角。如果把這二元五角的平均地租算進去，每畝收支情形則如下：

支出	六元八角五分六釐五毫
收入	五元二角
差額	一元六角五分六釐五毫

這不是明明白白地指示出地租吞沒了利潤的全部而有餘嗎？灌雲特例，固不足云統觀全體，然中國地租的特質，已可概見。地租奪去了全部利潤，即是說農民無法擴大再生產，地租侵蝕及一部分工資，即是說農民連單純的再生產都不能維持。在這種重額地租的壓榨下，農民是沒有改良技術的可能的。即是外國的專家們，雖然輕視這種重租之爲害，但看到農家經濟的窘迫，也不能不認爲是一回嚴重的事情。如陶芮（*R. H. Tawney*）氏在所著中國土地與勞動一書中說：「這種現象（指高額地租，）無疑地雖不及農民不能得善價出售其生產物，以及受高利貸的剝削，爲害之烈；但鑒於大多數中國農民收入之短少，那也

的生存限度以下，且在整個農村經濟中，簡直成了阻滯發展的一個有力的契機。

高額地租隨了農民土地飢餓之深化而愈得其發展，大批的農民失去土地以後，爲了維持生活計，勢不得不設法佃進一些土地，因而又給與了地主以提高地租的機會。江蘇寶山較大的地主近十年來乘機將地租提高了二分之一，近上海市的大場，楊行等鄉甚至有提高一二倍的。江都一帶的永佃田，租額本很輕，近年各田主多主張永佃農與普通佃農一律看待，勒令加租。廣東除順德等少數縣份因蠶桑失敗而減租外，其他各縣地租在近五年內一般地抬高了百分之二十左右。番禺縣屬之族田因返國華僑紛紛求佃關係，三年內租額增加了百分之六六，河南也有同樣的情形。在二十一年的某報上曾載着赤區視察記一文，其中述及該省商城縣的租佃制度時，有這樣一段記載：

「昔日地主所收之租穀爲二分之一，且僅限於水田中所生產之稻，其無水地中之產物及柴草，悉歸佃農，押金亦甚微。演至今日，人口日繁，佃農增多，地主乃大事壓迫，租期由五年而縮爲四年，繼復縮爲三年。其押金則增加，幾乎與購買之地價相等，且須於押金之外，繳納隨禮一份。故佃農每三年必罄其積蓄，獻之地主，以求保留其佃地之權。同時，地主所收之租稞，亦復加重。稻稞之外，復有所謂麥稞，魚稞，鴨稞，油稞，棉稞，柴稞，草稞等。總之，凡田中所產，家中所蓄飼無一不按五五均分。」

一切事態均利於地主加甚其對佃農之剝削，均刺激着他們獲得更多的租額之要求，然而這種大量的地租之提供，是和農業生產範圍完全脫離的。

三、地租形式之動態的考察

中國地租租額不僅包括了農業利潤的全部，而且包括了佃農工資之一部，隨了地租的增漲，佃農所得更其相對地減少，這種地租是談不上資本主義的地租的。

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及貨幣流通的擴大，地租在形式上也次第發生變革，由分租物租轉化為錢租，由身分關係轉化為契約關係，這都是目前無可否認的事實。在一般商業資本較為發展的區域，尤其表現的顯著。廣東各縣物租近年多改行折租，已如前言。浙西富陽一帶的農民雖仍沿用納租米租穀之舊習，實際上已多趨於改用租米或租穀折現之辦法。北平近郊之農田在前數年均納物租，近年也多改為錢租。在行着永佃制的地方，地主每每設置種種口實，以遂其改為契約租佃之欲求。封建的身分關係逐漸為資本的巨掌所摧毀，舊式的情誼漸次為貨幣的冷酷所代替。但是這些就表示中國地租已經資本主義化了麼？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沒有打定它的全般基礎以前，根本不會有資本主義的地租。有些人認為農產商品化程度之亢進，就是資本主義之發展，從而推論中國地租帶了資本主義意味，這是一種錯誤的見解。中國農產商品化之進展，主要地是由於資本先進國的侵略所形成，它本身含有十足的強制性。資本先進

國的侵略，引起了國內買辦式的商業資本之發展，這種商業資本在外來的經濟勢力的控制下，已經成了各國在華經濟利益的一部分。各國侵略的目的在於以不等價的交換吸收中國工業原料的生產物，並推銷其製成的商品，而中國商業資本的功能卻在變本加厲地盡瘁於這種吸收和推銷工作之完成。買辦的性質是中國商業資本的特質，這種特質決定它只能促進交換關係，不能變更生產方法。交換關係的推廣，僅只爲資本主義國家廓淸了掠奪的坦途，僅只造成了一個農村破產的局面，而於建立新的生產方法之前，卻表現其無力。所以中國農產品儘管商品化，並不能刺激農業生產之改良，商品經濟儘管發展，也沒有使殖民地經濟走上資本主義化的大道。

地租之資本主義的意義，是指農業利潤超出平均利潤的剩餘部分，然而在中國顯然不是這樣。誠然，中國各地也有貨幣地租的存在，且有日趨擴大的形勢，但貨幣地租不一定就是資本主義地租，它可以是簡單的現物地租之轉變形式。只摸索了地租的表皮而遽下判斷，那是錯誤的由封建地租過渡到資本主義地租，件隨着一個重要條件，卽資本制農業企業之廣泛的完成。在中國，小農經營依然佔着絕對的優勢，雖然近數十年來受了外來的資本主義的洗禮，社會經濟機構起了不少的變化，偶然地也有資本制農業企業的萌芽，但這種新的形式在整個農業部分的比重上是不够大的，且在半殖民地經濟的特殊條件下，有日趨衰落以至消滅的可能。在普遍流行小農經營的國度裏，佃種業者的所得不是從利潤而來，而是從

工資而來，那裏是不會有資本主義的地租的。

同時，我們尤不可忘記：物租仍然是中國地租的統治形式，物租的統治正是租佃關係半封建性質之具體的表徵。有些地方甚至還有力租的痕跡，在那裏，地主在契約上明訂佃農每年須爲其作工幾天。封建的餽贈也是到處可見。中國現時的地租雖然形式上有很多轉變，但這種轉變旣緩慢，且一般地只存在於商業資本較發展的區域。這種轉變的形式雖較落後的殘餘爲進步，但對資本主義地租仍有本質上的差別。

物租的統治，租額的過重，工償制的保留，租外貢納的存在——所有這些都說明着中國地租的特質，換言之，卽說明着中國地租不是資本主義的地租。

一九三五，二，十六日

七　資金集中都市與「資金回到農村」

李紫翔

資金由農村集中都市，是中國近百年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個最顯著的趨勢。這一趨勢發展到今天，已經達到農村資金流盡，都市資金膨脹到無出路的階段。農村資金不斷的源源流出培養了少數都市的繁榮和畸形發展，但是農村資金的枯竭促進農村總崩潰的危機，因之，都市繁榮之滋養源泉將有斷絕之虞，並且膨脹過度的都市資金感到金銀滿庫不能再生利潤之苦，少數倒置的金字塔的近代大都市——，「條約口岸」，統統陷於與農村金融枯涸之現象相反的資金過剩的恐慌。雖然他們更加努力作公債標金地產的投機，點綴住腐朽的繁榮，但是實際上恐慌與破產的激盪已將它們自己的墳墓愈掘愈深了。於是「農村破產」「農村經濟總崩潰」的事實和呼聲，激動了我們的政府，政客，實業家尤其是我們的金融家的「良心」，都要來負起「救濟農村」「復興農村」的任務，要使集中在都市的過剩「資金回到農村去」。它們欲以興築汽車路，濬修水道，創設農民銀行，舉辦農民借款處，農民倉庫，經營農民抵押和農產原料押款等方法，達到「資金回到農村去」的目的。修築公路之目的，祇是在便利軍事交通，而可資應用的資金亦並不多，並且據許多農村調查的報告，公路之地基，大都「無償沒收」，築路之人力，又都「無償勞動」，是則實際上既毋與於救濟農村，反之，不免要起重大之反作用。在理論和實際上比較與農村經濟

發生若干影響者，自然要算我們的金融家們所提倡的合作社運動和放款押款等舉動了。但是經由這種方式的放款和押款，是否能使資金回到農村，是否能使農民得到必需的資金，以及是否能使急性破產中的農村經濟獲得甦生之力，或者促進農村經濟恐慌的深刻化，都是值得我們根據客觀的事實來詳細研究和檢討的。作者在這一篇短文內，擬將農村資金枯涸和資金集中都市之原因及「資金回到農村」之實際意義作一客觀的分析，以與從事救濟農村運動者一商榷焉。

在未分析資金離開農村和集中都市的原因之前，我們先來看一看農村與都市之資金偏在的情形。

「農村破產」「農村金融恐慌」的事實，早已普遍深入到中國各地的農村。不過可惜我們尚沒有一個比較可靠而完整的調查統計材料，可以作一個全般的觀察和分析。我在這裏節引最近李景漢先生所作定縣農村經濟現狀一文中關於定縣的狀況以示一例。我們知道河北的定縣「在中國是一個比較安定的農村社會，境內沒有隨地籌餉的軍隊，也沒有顯著的土匪」「土壤以砂質壤土為最多，以肥沃論屬於中等，」「完全耕種自有田地之自耕農家約佔一切農家總數百分之六十三，自耕兼租種他人田地之農家約佔百分之二十四，自耕兼租出田產一部於他人之農家約佔百分之五，完全租出田地而不自己種田之地主極少，」並且平民教育促進會從民國十五年以來就在定縣試行「實驗運動，」每年約有二十萬元左右的款項來進行所謂「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和「公民教育」等之種種

設施，因此定縣不但「頗能代表華北一般的農業區域，」並且因有上述各種特殊條件，頗可以作爲中國最好的農業區域之代表看待的。

定縣大多數農民平時生活，在寒季五月內，「六口之家的每日各種食品量大略如下，甘薯七斤左右，小米兩斤多，雜糧一斤四五兩，白菜和乾蘿蔔葉子兩三斤………一起放在大鍋內，加水與鹽煮成粥，叫做「菜粥」，也有時放幾滴油在裏面。」「暖季農民終日工作，不得不吃些耐餓較久的東西，因此小米和雜糧數量增加，外有各種青菜……說不到食品的衞生與營養。」但「自民國二十年以來，有許多貧農連這僅免於餓死凍死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也要維持不住了。」民國二十二年度冬季，定縣人民常常連鹽也吃不起的約佔人口總數百分之二十。」「農民出賣田產者甚衆，因此地價低落，前五年普通有井之田地每畝爲一百二十元，目下落至五十元（跌落百分之五十八，）普通旱田由五十五元降至二十五元（跌落百分之五十五，）前五年傭農之全年工資爲四十元，目下落至三十元（跌落百分之二十五。）前五年定縣的乞丐是鳳毛麟角，上年冬季增至三千左右，」農民出外謀生者「民國十年以來，每年約在七百人左右，民國二十二年竟超過一萬人，今年春季出外謀生者亦已達七八千人，多係壯丁」，（如以民十以來之年約七百人爲百分，則二十二年出外謀生者約增十四倍，而今年一季即增十倍以上。）「目下定縣欠債之家數佔全縣總家數百分之六十七，約四萬六千家，不欠債之家占百分之三十三，借債之農家數目中，不

滿二十畝之小農占百分之六十三，二十至四十畝者占百分之二十四，四十畝以上者占百分之十三。借債之期限以十個月及一年者爲多。月利普通爲百分之二·五，有高至百分之五者。全年借入款額不滿五十元者，占總數百分之三十，五十至九九元者，佔百分之二十七，一百至一百四十九元者，占百分之十四，一百五十元至二百元者，占百分之六，其餘爲超過二百元者。」「民國二十年內在定縣因債務破產而爲債主沒收一切家產之家數不過五十左右，二十一年內增至三百家左右（增加率百分之六〇〇），二十二年內竟達二千家之多（增加率爲百分之四〇〇〇）破產之主要原因爲重利盤剝者超過破產家數總數之半。」破產家庭所欠債額不滿五百元者，五百至一千元，一千至二千元與二千元以上者各佔四分之一，但「沒收產業之估價不滿五百元者之家數佔總家數之半，五百至一千元者佔四分之一，一千至二千元者佔六分之一，一千元以上者佔百分之七。

這一幅定縣農民高速度破產情形之數字的寫真，我以爲是不能代表全國農村破產之一般情勢的，實際上我們知道定縣之許多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條件，不過是全國一千九百餘縣中的一個特殊的縣，以經過九年的「實驗運動」下的定縣，尚不免陷於破產者二千家，負債者竟占總家數的百分之六十七，則其他一切條件不如定縣的全國之最大多數的農村，其窮困破產之程度，豈不更數倍於定縣！一個金融家曾經描寫過以富庶著稱的江南農村「欲得一元以購穀種而不可能，」河南陝西四川等省，銀幣幾

已絕跡，改以銅元作貿易單位和恢復以貨易貨之原始交易，甚至陷於「無產可破」或「有產破不得」之狀況了。

反之，都市又陷在另一極端形態的狀況，即資金充滿了銀行的金庫，而感覺用途之困難。本來所謂都市者，應該包括與帝國主義者締結的條約所特定的「通商口岸」和「內地城市」而言的，不過本文所謂都市，實在最狹義的意義上僅指新式工商業之中心的「通商口岸」的都市。尤以國境內的新式金融機關，帝國主義者在華銀行既無不設立於通商口岸之內，即國人自辦的銀行之總行所在地，設在「通商口岸」的占行數的百分之八十五，資本總額的百分之九十六，即上海一埠就占行數百分之四三，資本的百分之四八；而且實際上「內地城市」雖然統制了農村，但內地城市又無不被統制於「通商口岸」的。所謂「內地城市」在目前都是同樣的犯了金融的貧血症，而農村流出的資金，經由「內地城市」而轉入「通商口岸」，而以上海為國內之最後的一個資金集中地。所以我們觀察上海十數年來現金集中的情形，即可以看出全國資金集中都市的趨勢的：

	外國銀行存洋	百分比	本國銀行錢莊存洋	百分比	總計	指數
民國九年一月	二八，〇八七	七·七四	九，四九一	二五·二六	三七，五六九	一〇〇
十年一月	五八，六七四	七一·三四	二三，五七〇	二八·六六	八二，二四四	二一九

十一年一月	四五，七一六	六七·一四	二二，三六四	三二·八六	六八，〇二〇	一八一
十二年一月	四〇，五〇二	五八·六五	二八，五五六	四一·三五	六九，〇五八	一八四
十三年一月	三六，二一〇	五三·五三	三〇，五四四	四六·四七	六五，七五四	一七五
十四年一月	六二，九三二	五七·四一	四六，六八八	四二·五九	一〇九，六二〇	二九二
十五年一月	七五，一九〇	五一·七七	七〇，〇五二	四八·二三	一四五，二四二	三八七
十六年一月	七二，六四二	五四·〇九	六一，六六六	四五·九一	一三四，三〇八	三五七
十七年一月	五三，八九〇	四〇·二〇	七九，八一四	五九·八〇	一三三，七〇四	三五六
十八年一月	六八，三一六	四〇·五七	一〇〇，三四二	五九·四三	一六八，六五八	四四九
十九年一月	九七，四九八	四七·五三	一三一，七六〇	五七·四七	二二九，二五八	六一〇
二十年一月	九一，七一四	三五·五四	一六六，三三八	六四·四六	二五八，〇五二	六八七
二十一年一月	八二，五八一	三二·一四	一七七，六一〇	六七·八六	二六〇，一九二	六九三
二十二年一月	一八一，一八五	四〇·六九	二六三，四八七	五七·六八	四四六，六三九	一一八九
二十三年一月	二七五，五二〇	四九·一九	二八四，五五七	五〇·八一	五六〇，〇七七	一四九一
二十三年三月	二五二，〇二八	四二·七六	三三七，四二九	五七·二四	五八九，四六七	一五六九

根據上面的統計，所謂「東方紐約」與「東方巴黎」的上海之存洋集中的趨勢，一般的說來，每年都在增加，尤其從民國二十年急性的經濟恐慌暴發而深刻化了以後，其增加速度更特別的快。從民國九年至二十三年的十四年三個月中增加了十四倍半，平均每年增加一倍；但自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三月的三年三個月中就增加了七又四分之三倍，平均每年要增二倍以上。雖然在數字上，自民國十七年後，本國銀行錢莊之存洋的相對地位，似乎已超過了外國銀行，但就實際上的勢力而言，並不是這麼一回事；並且最近二年來現銀之大量的由外國銀行輸出，致在數字的統計上表示了外國銀行之存量的波動狀態，迷糊了自「九一八」以後，迅速集中上海的現銀，外國銀行之增加率遠過於國人金融機關的這一事實——其實國人的金融機關亦不過都是帝國主義的金融機關之「外府」而已。民國二十一年海關統計的金銀出超達六千八百七十萬元，去年出超更達八千三百六十萬元，據中國銀行之估計，去年私運出口生金，尤達一萬二千萬元之巨，因此，如將報關和私運出口金銀合計起來，則可見最近兩年每年集中於上海和私運出口的每年均在二萬萬元左右。耿愛德氏估計中國銀貨不過二十二萬萬元，而張公權氏之估計可稱爲資金者不過六萬萬元左右，是則全中國之可稱爲資金的銀貨，幾已全部集中於上海一地了。在許多年以來，黃金已是成爲私運出口抵補國際收支不敷的一個重要方法，現在銀貨又成爲出超的一種「土貨」，雖然中國並不產銀。這一切是怎樣的說明了帝國主義者經過宰割中國之堡壘的「租界」—

近代的大都市，在金融上怎樣的統治了全中國，同時，全國農村的資金，差不多爲這些吸血鬼的「通商口岸」吸吮乾涸了。

資金之不斷的離開農村的原因，換言之資金愈接愈厲的集中「通商口岸」的大都市的原因是什麼呢?

第一，基本的原因是由於農產品對於工業品之交換價格差的剪刀式的發展，即是農產品與工業品的交換不得不以多量換少量的在農產原料，輸出減少時，又不得不以現金的逆態的出超來抵補。中國固有的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足自給經濟，早已受二三千年來的商業資本之分解，尤其是鴉片戰爭以後，各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之大量價廉物美的工業製品的侵入，以空前的速度促成自足自給經濟之解體；雖然現在我們尚可以說，大多數農村尚保持一種半自足自給或自足自給的狀態，但是已在不可挽救的急速的破壞中。即是說中國農業的生產，不管生產方式爲種種條件所阻止不能資本主義化，但中國的農民不能不被迫着轉變爲世界資本主義之市場的購買者，同時又爲原料市場的生產者。資本主義的法則之下，原料的價格之上漲，既落在工業品之後，而其下落，又常較工業品的速度爲快。這種農工業產品交換價格之剪刀式的發展，使農產品對於工業品的交換永遠處於一種不利的地位，使農村永遠被統制於都市，而農村之被榨取，即是都市發展的主要條件。中國的農村尚不僅受資本主義式的大都市之榨

取，更重要的還是受帝國主義者之殖民地的榨取，比如自一八六四年以來，即就海關貿易冊上所公表的入超積累數就達一百萬萬元之多，私運和經由工商業的經營所榨取的利潤尙不在內。這些巨額的支出之最後負擔者，無疑的均要轉嫁到農工階級的身上。

第二，伴隨着帝國主義勢力中國的商品市場之擴大而發展起來的買辦制度，不僅廣泛地樹立起其自身組織與其在商品流通上之壟斷地位，並且扶植和發展了封建式的「行幫」制度之商業資本以及舊式金融組織錢莊和新式的銀行，以爲買辦制度之「放射網」的重要骨幹；它們層層密密的直接間接在農村中起了「吸血管」的作用。這種買辦資本以及帶了「買辦」性的「行幫」制的商業資本之任務，是在推銷帝國主義者的工業生產者之工業品以至過剩的農產品，同時又向農民購買廉價的農產原料，供給帝國主義者之需要；中國的錢莊與銀行，明顯的是以此種商品流通過程上的資金的融通，爲其主要的機能。它們在這一商品流通過程上，不僅在分取工業生產者與農業生產者的一部分利潤，更在保持並發展封建性的兩層不等價交換，特別是提高工業品與抑低農產品交換的價格，取得特殊的買辦商業資本的利潤，而壯大了此種特殊的商業資本之組織與勢力，因此又更加甚了農民所受農產品與工業品間剪刀式價格差的損失，加速促進農村現金的流入都市。

第三，中國農業的經營雖以小農耕種爲主，然決不是說沒有地主階級之存在。中國的歷史已證明地

主及地主階級的政權之偉大勢力，雖說每間二三百年一次的農民暴動，舊政權的推倒與新政權樹立中，或多或少的摧廢了一部分地主，一部分農民得了若干土地，但是實際上不過是以新地主代替舊地主，本質上也未動搖過地主階級之經濟的基礎，我們現在雖無法得到關於地主及其所有田地數之統計，但據官方公佈的拉西曼報告書中，黃河流域五省佃農平均占百分之十三，長江及珠江流域十二省更占百分之四三。這種統計的可靠性，到如何程度，雖可懷疑；但據許多小區域的調查，關於佃農之數量，似不致有誇大的地方。換言之，因對地主階級之定義的模糊和許多中小地主之不願以地主自居，或雇人耕種（如本刊十四期所載之大名一個地主經營方式）的緣故，不免對地主之數量之計算過小，而對自耕農之一階層計算過大（所謂自耕農中實包含一部分實質的地主在內）；並且數年來農村經濟恐慌的深入，土地之高速度的集中，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這些地主，尤其是軍閥官僚和商人出身的新地主，十九都是「不在地主，」他們不僅要以對農民超經濟的剝削來維持其在都市的奢華生活，並且要以其中的一部分存入外國的或中國的銀行以生利息。

第四，基因於封建剝削關係之上的苛捐雜稅與受賄中飽，其程度超過世界任何國家，這是無庸在這裏舉證的。即如頗以稅輕著稱的河北省的定縣論，除去攤派徵發，其所納的國稅省稅和地方捐，共計年達五十萬元，合一切無納稅能力之人口平均每人要擔負一元三角，每家要擔負七元之多，而一切貪污和額

外徵收尚不在內。以此例彼，則其他一千九百餘縣中每人納稅的負擔數目必較定縣增重不少。這些稅捐和額外徵收中自然有一不小的數目，而爲那些軍閥官吏放入私囊，存入租界和倫敦紐約東京的銀行，以爲將來作「寓公」之資。

以上所分析資金離開農村和集中都市的四個原因，可以歸納爲資本主義的經濟法則，帝國主義的經濟法則和封建的超經濟剝削。在理論上各個因素雖要起互相排斥的作用，但在事實上錯綜結合，而在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法則的領導之下，更加畸形的變本加厲地剝削農村。自鴉片戰爭，尤其是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來，農村愈益隸屬於都市，同時亦是農村之資金以更快的速度流入都市；雖說目前之農村金融已至枯竭的地步，但是這些現存的榨取農村的因素存在而發展的時候，過剩的都市資金自然不會在改革農村生產關係和有利於農村生產的發展條件下回到農村去的。

我們既知資金離開農村和集中都市之原因，現在可進而考察金融界之「資金回到農村」的動機與目的。

上海銀行公會祕書長林康侯氏，最近對上海記者談話中說：「民國以還，國內天災人禍，無時或息，致農村不振，經濟衰落，一般富戶，不堪騷擾，相率避難，於是農村更至不堪收拾，滬市則因此日趨繁華。」此種意見，或許大可以代表金融界對於農村破產之原因的認識，但是很明顯的是歪曲和掩蔽了百年來帝國

主義的經濟侵略，和都市的榨取農村的一個事實，因之他希望銀行界流通農村經濟的動機不過是：「此種畸形之發展（按指上海市畸形的繁華）前途實至堪慮。蓋金錢者血，滬市如頭腦，內地如四肢，四肢之血，盡入頭腦，則四肢殭矣。至頭腦中則亦將因血過多而患腦充血。」他更接着說到投資農村的堂皇的目的，「銀行界投資內地農村，藉圖復興農村經濟，此點本人非常贊成。蓋頭腦中吸收四肢之血，亦應派出四肢，以讓其活動，同時吾人應知國以民爲本，使民貧而不設法補救，是無異四肢死而頭腦獨活，是又何貴於活。故現乘此機會投資內地農村，則國富民强之基，胥基於是。」林先生祇知道通商口岸的大都市，尤其是上海犯了資金膨脹的腦充血症，但是他沒有並且不能看到腦充血症的眞正原因；所以他開的方單，祇是爲腦充血的都市資金找輸通的出路，而不能爲貧血症的農村經濟找新生之方，是十分明白的。雖然，他以「頭腦」與「四肢」將都市和農村在他的方程式上連繫起來，說什麼「復興農村經濟」，塡「國富民强之基」等等，實亦不過是照抄「××救國」云者之一套庸俗的循環邏輯而已。林先生指出「四肢死而頭腦不能獨活」，但我們的金融家所要求的，決不是農村與都市的平等發展，不過祇是希望貧血症的農村，繼續其半生不死的狀態，使都市之資金的「腦充血」得以繼續和發展罷了。關於這，我們同時可以在金融界使「資金回到農村」的具體的設施上明白的看出來。

就中國銀行二十二年度營業報告之農業放款觀察：棉花，繭子，米稻，雜糧，烟葉，茶葉等農產品之抵押，

達一千五百十餘萬元，約占農業放款總額百分之九十六以上這種農產原料的押放款，純屬商業放款或工業放款的（如廠家棉花之抵押）範圍，與農民毫無直接關係，即所謂「以謀穩定物價之初步救濟」間接影響於農民之利益者，亦已完全爲中間商人所掠奪了。其次，農民小額「放款本年核准之放款額爲一百零一萬二千六百元實放六十二萬二千餘元，戶數一萬四千五百九十七戶，」此種小放款，似乎可予農民多少便利，但是我們要知道，無論此種農產品集散中心之小量農產抵押放款，仍屬農產原料流通過程上之商業資本的應用，無與於農業生產的濟助；並且因爲中國農區的遼闊，小農經營優勢，此種小量的農民押款，祇有在少數農產原料之集散中心的區域才有相當發展的可能，這就決定其不能「藉圖農村經濟的復興，」亦不會對於農民之受中間商人之榨取上，有什麼本質的變革的。再次，合作社放款，年來成爲「農村復興」之唯一救星的合作社運動，已變爲金融機關農村放款之對象，除上海銀行及農民銀行直接指導的運銷合作社外，辦理合作社較有歷史與成績的如華洋義賑會及定縣平民教育促進會等，因對於放款多了一層保障，尤爲銀行界所注目。不過信用合作社之放款，既不能分潤於大多數之貧農，而時期短促款項細小，又不能資生產之用途。至於生產合作社，雖爲一般中小農之希望，然因種種條件之限制與夫銀行界要求對於放款保障之過苛，根本無大量發展之可能。因之，最適合於銀行界之目的的，厥惟少數農產原料的運銷合作社而已。這種農產原料之較直接的運銷，最高限度亦祇可做到減少一部分「行

莊」的中間剝削，而以合作社代替買辦制度下的「行莊」的機能；其對於農產物與工業品的價格差和農村慢性恐慌與世界經濟恐慌夾攻下的物價之慘跌，不能起反作用，亦是十分明白的。

總之，風靡於全國的銀行界之「資金回到農村」的運動之眞實的意義，不過是對於腦充血的都市資金集中，起一部分疏通的作用，所謂對農村的投資，實際不過祇是對農產原料之流通上的商業投資，最大作用祇能減少某種中間商人的榨取，不僅對於農業上生產的改造上，不會起多大的影響，即對於盤踞農村的高利貸資本，甚至會要沆瀣一氣，而由合作社造成的新土豪劣紳，新的高利貸者，這已爲某些合作社領導者所不能否認的事。因此，這一運動的終極目的，仍不過祇是促進資金之繼續由農村流出與向都市集中。所以，如果要把這一流行的「資金回到農村」看成「復興農村經濟」或者塡「國富民强之基」，不僅估價太高，而且是一個幻想的錯覺呢。

一九三四，六，二十三日

八 合會在中國今日農村金融中的地位

吳承禧

一

中國固有的平民金融組織，除掉典當，最普遍而歷史最悠久的便要算是合會了。合會的起源，現雖尚無定論，但據王宗培先生的研究說「合會在中國之起始似在唐宋之間，」則其在國內的流傳，至少已在千年以上，歷史不可謂不久了。

這樣一個歷史悠久而深入民間的金融組織，在平民金融中的地位自然是很重要的。本文的主旨，第一便在指出合會的特質是什麼？它爲什麼能够與中國的一般民衆那樣年長日久的深切適合着？第二再問：合會在目前這樣一個農村崩潰的悲慘過程之中，究竟又成了個什麼樣子？它是否依然能够像以前那樣的盛行和重要？換句話說我們對於合會的功能，將要予以新的評價看看合會這舊有的組織，在這國民經濟正在經歷着一種從來未有的大破敗和大轉變的今日，究竟是否還能够保持它那固有的地位和特質不能？因爲合會的流行，在都市中較不重要，故本文討論的範圍，姑以鄉村爲限。

二

然則，合會的特質是什麼呢？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對於合會的內容似乎還應當有一個初步的

理解才可。合會的組織通常是這樣的：一個需用現金的人，找到了他的親友，邀請「來會，」親友們如果都答應了他的要求，合會便宣告成立，主動的人稱會首，應邀而來的便稱會脚或會友。會友們聚集的資金，第一次照例由會首收去，以後由各會友輪收，直至大家都得會了爲止。收會的方法有好多種：有的預先認定，按照排好的次序輪收，這叫做輪會或坐會；有的臨時拈鬮搖骰，以機遇决定會金之誰屬，這叫做搖會；有的既不坐得也不搖得，而以每次所出利息之大小競取會金，這叫做標會。輪會與搖會通行最廣，標會則盛行於廣東。通例，每期應付會金的多寡，以得會的先後爲準：得會愈前的所付愈多；愈後愈少，亦有在同一會員之中，得會後多付，未得會時少付者，總之：一方面有還本付利的人，一方面有利息預扣的會友。因爲向來會金的分配，大多不是按照精密的數理計算而得，故各會友所得的利益並不相同，分配的標準是不很公平的。會期的長短，各不相同：輪會多一年或十月一轉；搖會多一年兩轉，亦有較此稍短者；標會則常逐月舉行，時期最短。大抵在鄉村中的合會時期較長，而都市中的合會則較短促。至於人數，輪會通常由六人至十一人組織，故會期有長至十年者；搖會與標會的人數，多寡不一，但至多不出三四十人，因其轉期較速，故一會的壽命，通常總在三五年之間，至於會款之用途，用於置產與經商者固亦不少，但大多用於消費或用以應付急需，如婚喪喜慶，如營葬先人或整理宿欠等均是。

以上對於合會的要義，雖然述而不詳，但我們從這上述的種種，至少也可以看出合會的一些特質來：

第一，合會帶有一種互助的性質。合會與典當本質不同。爲什麼呢？因爲典當與平民的關係乃是一種嚴格的借貸關係，離開押品，離開高利，典當也就和平民離開了。

合會却不如是。合會的組織，一方面固在自助，但另方面却貴在助人；合會的作用，除掉調劑金融而外，還有一種社會的卽互助的意義蘊藏在內，所以合會的組織以及會金的分配等等，雖然有許多不合理及不公平的地方，但會友們的結合，既均以互助爲懷，則收付的多寡以及各人利得的厚薄等等自然也就很少有去斤斤計較的事件發生了，這是合會本身雖然有其缺點，但仍能在國內流傳了這樣久遠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我們必須明瞭，合會的組織並不是在各種不同的經濟階段上都可以通行無阻的，它必須在一個以農業爲中心而國民經濟的發展又較爲落後的國家裏方可以發榮滋長。爲什麼呢？因爲在那種農業社會裏，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還沒有萌芽或是沒有佔據優勢；金融制度也沒有高度的發展；一切的社會制度演進甚緩；社會秩序較爲安定，大衆聚族而居，安土重遷，家族觀念極爲濃厚，鄉黨親友的關係異常密切，有無相濟習以爲常，所以，以互助爲目的，以對人信用爲主幹的合會組織便可以應運而生，蔓延各處。

中國，在實際上，幾千年來便是一個以農立國的國家，所以像合會這種在外國極其少見的金融組織便得以在中國長遠流行，與一般民衆的需要深切適合。當然，合會的組織，歷來曾經有過不少的變化和演

進，而且，因為各地經濟發展的不均平的緣故，合會的方式以及它那流行的程度，在此處或在彼處，在鄉村或大都市間自然也是或多或少的有些不同的。不過，無論如何，合會的發展，一般的確是與中國經濟發展之特殊的性質相適應的。

目前中國的農村金融正呈顯着一種空前未有的枯竭狀態。

救濟農村，資金回到農村去的呼聲正針對着農村破產的深化而為一般國人所呼籲所冀望着，究竟在此時期，合會的組織，對於農民金融的調劑，有何功效；有何地位；較之往日的情形又有什麼不同呢？這是我們在下面所要討論的。

三

依我們的觀察，合會對於農村金融的關係，目前可以說是逐漸的走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合會存在的條件已在那兒漸漸的發生動搖，合會對於農民的作用，已不能像以往那樣的普遍而深切了。

為什麼合會存在的條件已經漸漸的在那兒動搖了呢？這，我們只要把合會的特質和目前農村經濟的轉變作一個聯繫的考察就可以明瞭的。

我們知道：目前中國的農村，已經不是一個安定的農業社會；農村經濟的基礎，經不住外貨的侵銷，經不住頻年內戰和水旱蟲災的破毀，經不住苛捐雜稅的橫征暴斂，早就由慢性的衰退變為急驟的崩潰了。

往日的情形，那往日的所謂安居樂業和物阜民豐的太平景氣，在今日固然看不到，卽就小康的局面也很難找。呈顯在我們面前的多是一種窮困流亡的景象：或則赤地一片，十室九空；或則顚沛流離，餓殍載道，老弱的轉乎溝壑，少壯的鋌而走險，稍有資財的又大多移居都市，以致整個的農村體系，瀕於破滅。農民金融的周轉，雖然是戔分的竭蹶，但因大部份的農民，天天都在飢餓線上掙扎，雖欲互助，豈復可能？此農民經濟之普遍的貧窮化致使會友難找而影響於合會之發展者一。

合會的限期，少的兩、三年，多的六、七年以至九、十年不等。在社會秩序安定之日，意外的變化較少，大家固可以信義相守，貫澈始終；但現在的農村則變化多端，誰也不能預料在一年兩年之中，會不會有意外的突變發生，因此，農民中卽使有一些略有餘蓄的人，也不願意和人「來會」——不敢且不耐作一種長時期的投資了。

誰都知道：目前中國的農民，對於資金的需要是如何的迫切！他們只要有錢可借，可以暫時的拯救他們的燃眉之急，則不論借款條件之如何苛刻，也在所不顧。合會的利率，雖然常較通常的利率爲低，但合會的組織，自發動以至於成立，往往需要相當的商議時間，不是在最需要現金的時候，現金馬上可以到手的，因此，合會對於農民，在昔卽有緩不濟急之憾，目前農民之不能以合會爲調劑金融之唯一的便門，自尤不待贅述。

前面說過，會款的運用，一部份耗於消費，如婚嫁喪葬之類等是。在這民不聊生的時候，農人救死不遑，焉有餘暇以及於此，故合會的動機以及「來會」的慾望，現在已是遠不如前了。合會的發展，又安得不受影響呢！

而且，合會的動機雖以純正的居多，但在往日的鄉間亦有一般狡黠的人，往往不辭勞苦，利用合會，自做會首，而到處奔波，邀請「來會，」冀以低利收得的會金，轉手間以高利貸於窮苦無告之人而坐收其利。此種舉動，於合會的流行，確有相當的助力。但今日情形如何？我想，在這農村破產民命倒懸的時候，會友既不易尋求，則爲此種慾望而到處奔走的人，大概也就很少了吧！

當然。合會在今日的農村，並沒有完全喪失了它的功效。上述種種，主要的只在指出：合會的作用，就現階段國民經濟發展之整個的體系上來看，無疑的已是今不如昔了。而且，如果國民經濟今後仍是像現在這樣每況愈下的衰敗下去，則合會的機能，恐益將無以致用，這是我們敢於置信的。

作者的故鄉——徽州本是合會極爲流行的一個地方。但近年來，因爲華茶對外貿易愈形不振的緣故，農村金融的枯竭，已是日甚一日；合會的組織，據作者所知，已不像以前那樣的輕而易舉；而且，已有的合會，往往因爲會友們的經濟狀況日漸拮据的緣故，有的中途無力繳付，有的收了會款之後，對於以後會金的交付即拖延賴欠，無以爲繼，遂致有始無終，流於「倒會」——這是數見不鮮的，諒亦不僅徽地一處而

已吧！

四

末了，我們還有一點小小的引論要提一下——就算它是題外之言罷：

第一，我們覺得，在這農村破產的現狀之下，要想憑藉了農民自身的力量來拯救農民在金融凝滯上所感到的痛苦，幾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爲什麼呢？因爲：挖肉補瘡，第一要有肉可挖，農民的經濟概況，如果一般的已是惡化了，則雖欲其自助互助，亦不可能——這是我們應當明瞭的。

我們試看：近年來江浙等處的信用合作不是發展得很快嗎？然而，它們的成效如何？農民自助互助的力量是不是已經有了相當的培養和進步呢？事實顯然沒有這樣的順利。農民的情況，一般的實在是太窮困了，所以，合作的動力，全是由上而下，合作的基礎，完全沒有樹立，農民們除掉利用合作社向外借錢而外，社內的互助，簡直是還談不到的，此與合會之難於盛行於今日之農村，理由正同，我們實不可忽略。

所以，第二，我們覺得，改善金融同時非改良經濟的環境與生產的條件不可。

而且，第三，改善金融，也不是東一鱗西一爪的辦法所能濟事，不是營利爲目的的少量資金的貸放所能致力，也不是改善一種兩種的農作物所能臻效；必須有一眞正爲人民謀利益的政府傾其全力，大規模的，多方面的爲農民謀辦法謀出路，而後農業生產，始克有復興的希望，農民金融的改善，始克有所着落，有

些意義。至於現時政府是否有此力量，或是否能責望他們這樣辦，那當然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也不必在此多所費辭了。

一九三四，十，九日

九　山西發行「村信用合作券」的眞象與我見

陳光遠

兩年來，山西農村的破產，如江河的決口，浩蕩奔流，不可收拾。聰明的山西當局，因倡導「造產救國，」而有「十年計畫，」並組太原經濟建設委員會，負責規畫山西經濟，以求統制。究竟山西以省爲單位的經濟統制是在怎樣實行呢？現在進行到如何程度呢？這在留心社會問題的人都急於想知道。而山西設立村信用合作社，發行村信用合作券，乃「十年造產計畫」在最近實施的最主要的項目。據太原經濟建設委員會經濟統制處所發表的消息，說村信用合作券的發行，目的在救濟破產的農村，活動停滯的金融，復興倒閉的商業，並興辦建設事業。因之，如果我們對山西發行村信用合作券的眞象能予了解，則「十年造產計畫」的現實性亦可窺得一斑。

太原經濟建設委員會經濟統制處的諸先生，都下了最大的決心，埋頭去做這件工作，而絲毫不作宣傳。我想他們不肯把這件事實公諸社會，絕不是因爲這個辦法是救濟農村破產的法寳，不願讓他人竊取，以使全中國得救；而是惟恐實行擱淺，遺笑他人。我認爲一種偉大的計畫，在執行之前是應該公諸社會的，計畫好固可使他人取法，計畫如有缺陷，亦可得公開的批評。因此，雖然太原經濟建設委員會經濟統制處，關於村信用合作券之發行祕而不言，我還願意盡我所知公諸社會，並加一點私見；而更希望全社會的人

士了解批評之。

× × × × × × × ×

據我所知道的，山西發行「村信用合作券」的辦法如次：

一、信用合作社的組織。凡村中有土地之人民，均為村合作社的社員，合全縣之村信用合作社組織合作社。總合作社，歸縣經濟建設委員會指揮，縣經濟建設委員會，直接受制於太原經濟建設委員會經濟統制處。村信用合作社之社長由村中富而能幹之人充之；社長則受制於村經濟建設董事會——經濟統制處在村中的機關。

二、合作券的發行與週期。凡有五畝土地以上之人民，均由經濟統制處，按土地之多寡發給一定量之信用合作券，該券之信用，卽由土地擔保：值十元以上之土地，每畝擔保一元，值五元以上之土地，每二畝擔保一元；值二元以上之土地，每五畝擔保一元，值一元以上之土地，每十畝擔保一元；不值一元者，不得發行，（卽每畝值十元以上之土地每畝發給合作券一元，每畝值五元以上之土地每二畝發給合作券一元，……）至地價之高低則由村長召集村副閭鄰長開會，舉出七至十五人組地畝評價委員會評定之。此券在村中，不僅要一律行使，並且在本村購買動產或不動產及一切貨物時，還要較用現洋者便宜，卽以九角九分當一元；其餘行使，卽與現洋相同；但不能完糧納稅，此券發行後，無論何人，不得拒絕收受，違者處罰。

農民領此劵者，按年利一分行息，（徵收現洋，）以十二年爲限。領劵人如不能按期付利時，待農田收穫後，按時價折收其糧食；如土地租與他人者，於收租時，向租種人於租價內扣除之。——收糧扣租及應收利息發生困難時，應由村長負責；村長不能了者，區長負責；區長不能了者，縣長負責。滿十二年後，利息卽停止，並不必還本。祇於賣地時，每畝如原領一元者，每畝卽少收賣價一元；二畝如原領一元者，每畝卽少收賣價五角；……以移轉其擔保信用之責任。

三、信用合作社的匯兌基金。信用合作劵是不兌現的，而發行是以村爲單位的。如到外村或外縣使用時，由合作社與之匯兌現洋，不收匯費；但遇現洋向外匯兌有匯費時，則此劵匯兌亦與現洋等。匯兌基金的來源及最數是如何來的呢？村合作社的匯兌基金是由總合作社按照各村合作社所發合作劵總額之二成借給的（現洋，）此項借款，亦以年利一分行息。如遇二成有不足時，准由各該村向富商息借，此項借款亦以年利一分行息。總合作社的匯兌基金是由縣銀號按全縣各村所發合作劵額數十分之二借給的，亦以年利一分行息；由縣負責匯兌，以調劑村與村之週轉。由省銀行按縣銀號借給總合作社款數的十分之二，借給縣銀號，亦以年利一分行息，由省負責兌現；以調劑縣與縣之週轉。

四、信用合作社之經費。村信用合作社之經費，以全村所發合作劵總數千分之八爲度。總合作社之經費，以全縣各村所發合作劵總數千分之二及總合作社所借縣銀號款百分之一爲度。

五、信用合作社之積款及其支配辦法。村信用合作社，每年由社員身上所收回之利息，以年利九厘，責成本社負責人經營之，如同包辦性質。逐年所得利息，累進至所發合作劵總額二倍後，其以後每年所得之利息，以一半增益合作社之基金，以一半代替土地之負擔。所有超過年利九釐以上所得之利息，概爲本社辦事人之紅利。總合作社所經營之縣銀號款，每年所得利息，除照縣銀號章程以半數充作建設基金外，其餘半數，以年利九釐，責成總社負責人員經營之，如同包辦性質。逐年所得利息，累進至與原借款本額相同後，所得利息，一律撥充建設基金。

六、發行合作劵的理想成績。太原經濟建設委員會經濟統制處的諸先生，就按上述辦法，估計村合作社與總合作社理想的成績如次：如發給各土地所有者合作劵一萬元，十五年共計本利三萬零五百五十二元七角，除原本一萬元外尙餘二萬五百餘元，爲原本之二倍有奇。如總合作社借縣銀號款一萬元，轉借給各村，按年利一分計，全年得利一千元，就中以十分之一爲總合作社經費之一部，十分之二爲付省銀行之利息，十分之三·五爲縣建設經費，其餘十分之三·五按年利九厘生息，十五年後共得本利二萬零二百七十八元四角，除原本一萬元外，尙餘一萬零二百餘元，爲原本之一倍有奇。

山西的土地至低估計亦在六十萬頃以上，每畝平均價格至少亦在十元以上，即按每兩畝發劵一元，全山西省可發合作劵三千萬元。水洩不通的山西社會，驟然加添一筆三千萬元的流通要具，想來會達到

「救濟農村，」「活動金融，」「復興商業」的目的罷！而這三千萬元的合作券，在十五年後，可得純利六千一百餘萬元；又總合作社向縣銀號所借款額，以三千萬元十分之二計，共有六百萬元，轉借給各村，十五年後，可得純利六百餘萬元。這樣，祇要我們等候「十五年，」一定會有一個堂哉皇哉應有盡有的山西社會出現。——這就是所謂「造產救國。」

× × × × × × × ×

究竟山西發行農村信用合作券是不是能如計畫的順利施行呢？施行後會導出怎樣的「意外」（在當局的意外）結果呢？還有發行合作券的本質上的意義到底是甚麼呢？這裏，我要作一番詳密的考察。

首先令我注意的是這個計畫頗「週到，」當局可以不費一個銅板，得到很大的利益。

村信用合作社的經費是用全村所發合作券千分之八擔負的，總合作社的經費內中有一部分現洋，現洋是從總合作社匯兌基金中撥充的。村信用合作社的匯兌基金是以年利一分借自總社的，總社的匯兌基金是以年利一分借自縣銀號的，然而全省各縣銀號借給各總合作社現洋六百萬元（以發合作券三千萬元計）每年所得利息六萬元，却一半充作縣建設基金，一半交給總合作社負責人經營，是縣銀號借給總社現洋，「亦以年利一分行息」云者，徒美其名而已！縣銀號並毫無所得。可是當局者顧計到縣銀號的窮乏，特由省銀行按縣銀號借給總合作社款數的十分之二，借給縣銀號，為數僅十二萬元，而縣銀號

則必以年利一分付利是省銀行以年利一分放出現款十二萬元，毫無損失可言由此知發行三千萬元的合作券年可得淨利三十萬元現洋，總合作社以縣銀號的六百萬元現洋，又可得淨利六萬元現洋，是當局不費一個銅板，一年可從民衆身上取得三十六萬元現洋。以複利計，十五年內共可取得七千餘萬元現洋。

第二點令我注意的是農村信用合作社是「官」辦的，官家可以用特有的權力，任意擺布民衆。合作券是不兌現的。不能完糧，不能納稅，不能付「官家」的利息。總之，合作券在與官家的來往中是沒有「信用」的；可是在民間是信用十足的——以九角九分當現洋一元。百姓們誰敢不使用呢？「違者處罰！」領券人如不能付利息時，有的是收糧扣租的辦法；收糧扣租及應收利息發生困難時，有的是村長，區長，縣長負責。村信用合作社的社長是由村中「富」而「能幹」的人充當的，總合作社的辦事人當然也不會是不相干的民衆信用合作社的社長受村經濟建設董事會的節制，村經濟建設董事會受縣經濟建設委員會的指使，而縣經濟建設委員會受太原經濟建設委員會經濟統制處的直接指揮。這裏的許多「會，」內中滿是甚麼「長」一類的人物，與「富」的地主，及「能幹」的豪紳。於此，豪紳地主封建軍閥相互勾結剝削民衆的機構，活生生現在我們眼前。有些人硬說中國社會到現在已進至資本主義的階段，那簡直是「盲人摸象！」

以上所說是山西發行農村信用合作券本質上的意義，所謂「救濟農村，」「活動金融，」「復興商

業，」「造產救國」云者，表面招牌而已！

那麼，山西的農村信用合作券是不是能如當局所計畫的那樣順利發行呢？

在山西社會中在一般的情況下，那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貨幣的數量，因爲沒有確實的統計，所以不能正確地估計出來。可是，山西省鈔自從蔣閻戰爭山西失利後，均以二十元當現洋一元收回。民十九年另發新鈔，迄至今日，官方宣稱僅發出八百餘萬，事實上山西自舊鈔失信後，鈔票在民間的信用喪失淨盡，省行以準備金有限，所發新鈔至多亦不過在千萬左右。中國與交通兩銀行鈔票，以兩年來晉省商業不景，天津之來往銳減，幾於市面少見。此外山西市面所流通之貨幣僅爲數甚少之輔幣——銅子而已。是山西現階段市面所流通之貨幣合鈔票與現洋至多亦不過三千萬耳。此三千萬貨幣是不是適合於山西社會商品流通的需要呢？這我們祇要考察一下山西銀號的現狀，就可以知道。一九三四年太原各銀號倒閉者在半數以上，各縣銀號，如壽陽，祁縣，文水，汾陽等大縣份，倒閉者皆十之八九，倒閉之惟一原因則放款無法收回而已。以是去年山西各銀號間之相互的往來完全斷絕，銀號與商號間之往來，亦僅有存款之關係，而借貸關係殊少。商號借款未能如期清償，致銀號積款未敢出貸。是山西金融界之水塞不通，並不是因爲貨幣缺短，乃由商業蕭條所致；而商業蕭條則農民購買力薄弱之結果；農民購買力之所以薄弱，乃因帝國主義者廉價商品之壓迫及苛捐雜稅高利貸的剝削造成。由此可見山西社會的病根與中國社會的病根一樣，救

治的惟一辦法是逐出帝國主義者在華的勢力，取消苛捐雜稅及分散已經集中了的財富。三千萬農村信用合作劵的發行，絕不是救濟山西社會的辦法；而且那超過商品流通現實上所需要的現洋量的，並且是不兌現的三千萬合作劵，也絕不會如當局者所計畫的那樣能夠順利發行。

然而，在「違者處罰」的威權之下，山西的當局是事在必行的。那麽，信用合作劵發行後會導出怎樣的結果呢？

結果是很明顯很簡單的：

一、紊亂幣制，給投機者造發財的機會。社會秩序因以更亂。

二、阻止社會的進展，迫使人民返於「老死不相往來」的原始社會。（因爲合作劵是以村爲單位發行的。）

三、貧農加倍貧窮化（因爲五畝地以下的人是沒有領劵資格的，）財富的再度集中。——因爲匯兌基金，紅利，信用擔保責任的移轉等都是爲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打算的。

可是，社會終是要向前發展的，人民在走頭無路的時候，一定會死裏求生的。所以，綜合上述三點，可以推斷合作劵的發行會有一個必然的結果：即在當局方面所認爲「大不幸」的事件會加速的出現。

×　×　×　×　×　×　×　×

本文草就後，聽到剛從山西崞縣五台來的人說：合作劵試辦成績良好，農民均樂於收受。原因是這樣的：起先試辦的六縣，每畝地祇發給合作劵一角或兩角，而且是十足兌現的——不，每九角九分就能兌得現洋一元。當然，拿上現洋給人，誰都不會拒絕。據本月十三日北平世界日報太原特約通訊說，合作劵現將推行全省，如果都兌現的話，當然也會有良好的成績。不過我相信當局者絕不至這樣荒唐！——姑置之，用觀後效。

一九三四，三，十六日

第二編　研究與調查

一　中國土布業之前途

王子建

在「洋布」和「洋紗」沒有被介紹到這東方古國以前，織布幾乎完全是中國農民的一種副業。那時候，農家婦女在一年間利用農閒時間所織出來的布，非但足以供一家大小的穿着，而且可以有剩餘的馱進城去賣；雖然所得的代價不見怎樣了不得，究竟對於農家的經濟上不無補益。幾千年以來，中國的衣着問題就在這「男耕女織」的狀態下解決的；而農民的經濟也就在這「男耕女織」的狀態下得着了出路。

自從「洋布」隨着「洋人」到了中國，接着「洋紗」也跟着來了，再接着中國人也學着紡「洋紗」織「洋布」了，於是這「男耕女織」的狀態也被迫着改了面目。多數的鄉村裏已經久矣夫聽不到軋軋的機聲了，只有少數的鄉村老百姓還能藉着他們的堅強的體力來同機械爭勝，使幾千年來的鄉村織布業不絕如縷地苟延到今日然而在最近的一兩年來，事實證明這種僅存的土布業也逐漸傾向於衰微了。這似乎又到了一個緊要的關頭。不管這是長期的趨向於衰落，或是整個農村經濟崩潰所牽動的偶然現

象，無論如何，爲中國的紡織工業的前途着想，爲農村的經濟着想，我們應該趁這機會討論出一個適當的應付方策來。作者在這裏願意簡略地敍述一點土布業目前的狀況，並且爲將來的出路問題貢一得之見。若因此而引起國人的注意和切實的討論，進而謀事實上的補益，那是作者所最切望的。

一、何謂土布

「土布」是「洋布」的對待名稱。所謂「洋布，」嚴格地說來自然是指輸入的外國品而言，但習慣上有些人對於中國工廠的仿製品也稱之爲「洋布；」所以廣義地說來，凡別於舊式土布的都可稱之爲「洋布。」土布是隨着洋布而生的名辭，最初是指以舊式方法用手紡紗線做原料而織成的窄面布而言，但事實上這種典型的出品在目前已將絕跡。現在所謂「土布」在形式上和原料上均已無復舊觀，有些出品簡直與「洋布」無甚區別，習慣上所以仍以土布稱之者，只是因爲它是鄉間以舊式的生產工具所製成的出品，所以別於城市中大工廠的出品罷了。若就形式，品質，和所用原料來分析時下的所謂土布，約可分爲四種：第一，原料參用「洋紗」和「土紗，」幅寬在一尺左右，品質極粗厚堅實，如河北定縣所產；第二，原料純用「洋紗，」幅寬在一尺左右，品質粗厚，如江蘇南通和廣西平南所產；第三，原料純用「洋紗，」幅寬在一尺五寸至二尺之間，品質粗糙，如廣西鬱林等處所產；第四，原料純用「洋紗，」幅寬二尺以上，形式仿「洋紗，」品質較細潔，如河北高陽和山東濰縣所產。上述四種土布，形式上既有偌大的區別，在本文

敍述上自須加以分別。現在我們姑且把前兩種稱之爲「舊式土布」後兩種稱之爲「改良土布」

所謂「舊式土布」在形式上和品質上尙保存着舊時的典型，不過原料已由手紡的紗改爲機紡的紗。這種布的特色在於堅厚耐久，但顏色和花樣極其單純，是其缺點。所謂「改良土布」在形式上和品質上都是模仿「洋布」的，雖然尙有程度之差；所以與其目爲「土布」無寧目爲「洋布」之較爲合適。這種布非但品質細潔，而且顏色可以有多種變化，花樣也比較複雜。

總之，凡以舊式的生產工具，織造的布疋在目前都被稱爲土布，並不以其出品之類於舊時的土布與否爲標準。這一點是必須要認淸的。

二、土布業的現狀

現時各鄕村的織布業情形與洋布沒有輸入以前的景況有最顯著的不同的一點，那就是：以前的鄕村織布以自給爲目的，現在的鄕村織布以營利爲目的。從前，幾乎每一鄕村都有布織，幾乎每一農家都有人織布，但完全是農隙的利用，其產量大部分自用，至多也只在小區域內周轉販賣。現在，鄕村裏不一定會見到布機，即有也不見得有人在使用，這是一般的情形。但有許多鄕村，却挨家挨戶在織布，甚或終年不輟，夜以繼日，其出品大都運銷於幾百里以外，甚至幾千里以外。這情形顯示出現在的鄕村織布事實已形成以某一區域爲中心的幾個集團，與以前分散在全國的情形完全不同了。

這幾個鄉村織布的集團，在最近過去的幾年中，曾有過驚人的成績，引起國人的注意；但在最近二三年來，有的簡直快消滅了，其餘的也都傾向於衰落。試觀下文所述各種典型的鄉村織布業的現狀，就可想見前途是怎樣的危險了。

（一）濰縣區域　往昔濰縣所產的土布，有所謂「小布」和「丈五絃子」等名稱。後因洋布輸入，逐漸淘汰，或至絕迹。民國初年有濰縣東鄉人從天津購新式機數架，回鄉推廣傳習技術，出品改良，銷路很好，於是利之所在，人皆趨之。但在民國四五年間，僅城東眉村一帶有布機五百台左右，直到民國十年以後，纔由東鄉而侵及南北西三鄉，再度越過縣境而傳入昌邑，安邱，壽光等縣的鄰近各村。現在濰縣區域，卽包括鄰近各縣在內，據說有織機九萬台以上。近年因布價低落，織戶時織時停，現時照常工作的，只有四萬餘台了。

前四五年濰縣所產的布，大都是粗細兩種市布。粗市布原料經用二十支紗，緯用十六支紗；細市布原料經用三十支紗，緯用二十支紗。近年多改織細市布和細布兩種，也有織直貢呢的。細布經緯都用三十二支紗，織直貢呢經用四十二支合股線，緯用三十二支紗。市布普通每疋重十磅半，長四十碼，寬英尺二尺四寸，每平方英寸經八十根緯六十八根；細布普通每疋重九磅半，寬和長同市布，每平方英寸經緯各八十根。

織布所用的織機，是鐵輪木架的鐵木機，又有脚踏式和手織式兩種。這種機器的能力比舊式織機高

上好幾倍如以脚踏機織平紋布，每分鐘打梭數約一百二十次左右，每日以實際做工十四小時計，可以織布一疋即一百尺。此種脚踏機每具值價七八十元，大都是本地做的。濰縣現有機器製造廠十一家，每年製造織機七千台以上。

濰縣織戶在從前只是農閒時的一種副業，今則常年晝夜製織，一家男女輪流工作；農忙時，壯年男子白天在田裏工作，早晚仍得幫着織布。每一織戶少的有布機一兩台，多的有四五台。但不管織機有多少，織戶是並沒有多大資本的。因爲：第一，購買織機時可以覓人擔保，分期付款；第二，所需紗線可以由線莊或布莊供給。因爲這種緣故，線莊和布莊在濰縣織布區域裏占有絕大的勢力，大多數的織戶是在他們的壓迫之下掙扎着的。織戶與線布莊的關係，大致分三種：一、線莊賒線給織戶，以五天或十天爲期，屆時織戶把布賣掉了來償債，利率一分二釐。二、布莊或線莊放紗給織戶，而換取織成的布，紗布都按市價作價，若交布時的紗價與放紗時的紗價每大包漲落在五元以內，兩不相找，若在五元以外，漲落之數兩家分認。三、織戶代布莊織布，賺取工資。除上述三種方式之外，織戶自己出資買原料，織成了自己去求售的自然也不能說沒有，但在比例上爲數極少至於開設工廠，招工製織的，更不多見。這裏明白地指示出商業資本在這區域內怎樣的占有勢力，幾乎整個的織布業存在於商人僱主制度之下，雖也有工匠制的組織同時存在，但勢力是迴乎不能相敵的。近年又有一種新的勢力突興，就是日本棉紗商在本區域內設立商行，推銷棉紗，代替

了舊日線莊的地位。原因是這樣的：近年出品日趨於精細化，原料由十六支改爲三十二支，這種較細的紗在目前中國紗廠尚沒有豐足的產量，而且上海一隅的出品又不易推銷到這裏來，於是織戶不得不求給於日廠，而近在咫尺的青島日紗遂源源而來，馴至占有了整個市場。這一支可怕的新勢力將來演變到怎樣，尚在莫測之中，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事。

織戶所出的布都是本色布，整理和漂染工程另有專門的人去處理。最初自然只有舊式的染坊從事染色工作，以後花素條布出世，整理工作必不可少，壓布廠因之而紛紛成立，近年則又有染織廠成立，用動力從事漂染，整理，和打包等工作。上述染坊係代客染色性質，只取染工，自己並不營布疋買賣。這種染紡約有三十家，每家備染缸一二個至十幾個。壓布廠也是代客整理性質，全區域內共有七家。染織廠的規模較大，出資收買市集上的布加以漂染整理，自備商標，行銷外埠。這種工廠已成立的有三家，在興築中的尚有數家。

濰縣區域出品以白布爲大宗，格布，條子布，和嗶嘰等爲數較少。每疋布的長度是十丈，幅寬在二尺至二尺六寸之間。據本業同業估計，每年出布約一千萬疋，約值七千五百萬元以上。其銷路幾遍及全國，而以河南爲最。運輸方法，或由鐵路或交郵局轉運。據鐵路統計，二十一年由濰縣運出的布共三千六百公噸；其中以運往河南許州，開封，潼關鄭州四處爲數最多；洛陽和商邱次之；鄆城及安徽蚌埠，宿州又次之。經郵局

運出的，每年在二十五萬疋左右，其送達地點幾遍各省。

(二)高陽區域　高陽附近，原是出產窄面土布的地方，後來因爲洋布輸入的緣故，銷路大受影響。光緒末年，始有人試織寬面布，成績很好，事業逐漸發達。歐戰期間，洋布入口減少，高陽布業大盛，到民國十八年時達最高峯。近年已形衰落，但全區域內尙有織機二萬餘台，從事織業的男女在十萬人以上。這區域係以高陽爲中心，包括淸苑縣的東南部，任邱縣的西部，安新縣的南鄉和肅寧蠡縣的北部各鄉村。其集散中心則在高陽縣城。

高陽所產土布最初只限於白粗布和粗斜紋布兩種，原料用十六支紗。其後逐漸添織市布，標布，細斜紋布，條子布，提花布等，原料也由二十支紗進至三十二支和四十二支。近年人造絲輸入，各色人造絲布又應運而生。現時所出的粗布市布和斜紋布，幅寬都在二尺四寸至二尺六寸之間，每疋長一百零四尺；條子布，提花布等幅寬在一尺八寸至二尺一寸之間，每疋長一百尺。

最初的織機，概係手拉梭的木機。民國初元，始有人改用鐵木機。這種鐵輪木架的脚踏機，除了用來織平布和斜紋布外，還可以織提花布。平布鐵輪機的效能較大，每分鐘投梭數約一百二十次左右。

至於織業組織，也和濰縣相同，仍未脫商人雇主和工匠制的形式，而前者的勢力又遠非後者所能及。這裏的經濟大權完全操在一部份商人的手裏，這種强有力的主宰者便是布線莊和染線店的老闆們。布

線莊是一種具有大量資本的營業，它們的職務除了散發紗線給織戶，付給工資定織布疋外，並且還在市集上收集現成的布，運銷到外埠去。這種布線莊一共有六十家。染線莊的規模較小，以前只是染線出售，後來色條布盛行，纔發線定織，自己出售。這種染線莊共有二十多家。織戶中沒有本錢買原料的，只好托人介紹到這兩種店舖裏去領紗織布，以血汗換取微薄的工資。比較富足一點的織戶自然可以自己買原料，自己出售，或把織成的布到布線莊去換紗線？但這種農戶究竟占極少數。因為農民的貧窮遂使商業資本在農村中活躍到如此模樣！至於小規模的工廠，也有幾處，却不重要。

隨着織業而生的整理工廠，自然是不可免的。該地共有整理工廠六十幾家，包括機器染色廠，雜色染坊，藍缸染坊，印花廠，和踹坊等五種性質的工廠，其中除了十二家機器染色廠備有發動機和新式機器外，其餘大都是舊式作坊性質，資本極小，最多僱有工人十幾名。

高陽布的出產極豐，銷路亦廣，近如華北各省，遠至西北一帶及長江流域，都有高陽布的踪跡。高陽本是一小縣，地瘠民貧，當初織業之興，本是農民的一種農隙副業。後來事業發達，竟至反賓為主，現在大部份農民幾乎已經把它當做正業，長年在工作，已經失去了鄉村工業的本來面目了。

(三)南通及海門　通海居長江北岸，素以棉產著稱，故紡織事業向極發達。洋布傳入中國後，通海布因為把持着特殊的市場，雖銷數略減，在中國織業上仍占有極重要的地位。自從「九一八」事變發生後，

通海布的主要銷路全被日貨奪去，織布業一時頗有陷於崩潰的形勢；幸而國內還有一部份市場，而且織戶們已經在着手改織寬幅的「仿洋布，」目前正在困難中掙扎着。

南通和海門所產的土布都是粗質的，原料用十二支和十四支紗。布的種類大別之有三類：一種叫做「大布，」白色，幅寬一尺三四寸之間，每疋約長五丈，重在三四斤之間；第二種叫做「小布，」也是白色，幅寬八寸至八寸半之間，每疋長約二丈五六尺，重約一斤餘；第三種叫做「藍布，」又可細分爲格子布，米通布，蘆席布，桂花布等四種，幅寬一尺零五分至一尺一寸，每疋長約四五丈，重在二三斤之間。

這裏的布機完全是舊式的木機，手投梭和手拉梭同時存在着。絡紗和牽經等工作自然也保存着較原始的方法。

布的銷路分散在好幾個區域，因之布店也隨着分爲關莊，京莊，和縣莊三幫。關莊的貨銷在東三省銷的全是「大布；」京莊的貨銷在江蘇和安徽一帶，銷的也是「大布；」縣莊的貨銷在本地和蘇浙皖閩各省，大小布都能銷行。在「九一八」以前，僅南通一地每年銷售量約五百五十萬包，其中關莊所銷在三百萬疋以上，京莊所銷約六十餘萬疋，縣莊所銷約一百五十餘萬疋。通海布在昔日幾乎獨霸了東三省的棉布市場，其後日本洋布逐漸侵入，奪去了一部份勢力，但商人勉力維持，尚堪苟延。其時上海設有通海棉布公所，專任通，滬，牛莊間的運輸責任。自從「九一八」以後，東三省被暴日奪去，關莊的命運也就從此了結。

（四）河北定縣　定縣的「舊式土布」在過去很負盛名，但目前則在逐漸落後之中。直到現在，定縣各村還保存着土法紡紗，用做緯線，而以「洋布」做經線。所產的當然屬於「舊式」的一類，每疋長在三丈三四至四丈二尺之間，幅寬一尺左右。織機係舊式木製品。農戶織布，或自備原料，或由布販發紗代織。如果是自織的，逢集日拿到集上去賣給布店；如果是代織的，自有布販來收，每疋約給工資兩角，銷路以張家口外內蒙古一帶爲大宗，清末民初最盛時年銷二百萬疋，現時只銷一百萬疋左右了。

（五）浙江硤石　硤石鎮左近五十里內幾沒有一家農戶不織布，這自然也是育蠶和農事以外的婦女副業。這裏所產的也是「舊式土布」，俗名「甯波布」，因模仿甯波的土布而得名。布分三種：一種叫做「大布」，有粗細條子和小格子各種花色，幅寬一尺六寸至八寸，每疋長約五丈，重約四十餘兩；另一種叫做「小布」，幅寬自八寸至一尺二寸，每疋長自二丈至四丈；還有一種叫做「灰布」，品質極劣，專備喪事人家之用。所用原料，都是「洋紗」，支數在十支至二十支之間。織戶通常都不備原料，紗由布莊發給，每織完一小包的紗，約得工資五角。布的出路，北銷淮揚齊魯東三省一帶，南達皖贛閩粵和本省的寧紹台金衢嚴一帶。往昔銷路甚廣，營業鼎盛；近年日就衰落，每年所銷只有百萬疋左右了。

（六）廣西鬱林　鬱林土布雖不及上述各地所產的著名，但在省內却佔有很重要的地位。這裏所織的布，已由「舊式」而趨於「改良」。鐵輪木機在這裏曾被人採用過，然而畢竟因爲價格過貴而不能普

遍，現在一般織戶所用的是木製的手拉梭機，名為「高機，」取所以別於舊式的「倭機」之義。布的種類和長寬極不一致，白布，色布，格子布，條紋布樣樣都有，幅寬有一尺五寸，一尺七寸，和二尺三種，每疋長度自三丈幾尺至八丈，而以五丈為最普通。經緯都用「洋紗，」大部份用二十支，也有用三十二支和四十二支的，二十支以下則不多見。織戶大部份是以耕種為本業，利用餘暇來織布的，但終年靠着織布過日子的人家也並非沒有。

這裏也正與別的產布區域一樣，紗布商人是占有很大勢力的，而且紗商與布商往往就是同一個人。除了少數有資本的織戶自己買紗賣布外，其餘的不是向布商領紗或領機頭（即經軸）便是以織成的布向布商換取紗線。在這種情形之下，織戶自然難免要受慘酷的剝削。譬如重二斤一疋的布，可以換紗二斤二兩，假定布的漿分重三兩，織戶所得的工作代價便是五兩紗的價錢，值不到大洋一角五分。若布質較劣，等重的布只能換等重的紗，那時織戶所得的工資更可想見了。

這種「改良土布」行銷在本省各縣，代替了一部份外來「洋布」的勢力。每年的產量雖沒有確實統計，據可靠的估計，大約在二十萬疋左右。

上文所述各地土布業的現狀，自然只是擇幾個重要區域言之。實際上各省鄉村裏從事織布的農戶尚多，如廣東之佛山，江蘇的淞滬一帶，江陰，常熟，河北的寶坻三河，湖南的常德，岳州等處，都有大量土布的

生產，眞是舉不勝舉。不過我們可以相信，土布的品質，形式，生產方式，以及製造者和販運者之間的生產關係等等，則大致如上文所舉，不會有很大的差別的。

三、土布業之所以能存在

在「洋布」的重重壓迫之下，中國的「土布」居然還能够掙扎到現在，而且居然能因了「洋布」的啓示而改良出品，這在我們乍看起來似乎是一件値得駭怪的事。但如果我們細細地考察土布業的現狀，如前文所述，則知中國土布業之所以能存在於今日，却自有其可以存在的理由。分析言之，約有下列數端。

第一、由於傳統的習俗，使織布事業能在鄉村裏存在着。這是因爲幾千年來「男耕女織」的觀念在農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要事實許可農民總要想盡方法維護這一種農暇的副業，以守舊固執如中國農民，竟肯抛下了祖先遺傳下來的木織機而去採用日本式的鐵木機者，其原因就在於想保持着「祖業」，不使衰落而已。

第二、這種工業，合於農民生活。這一點極易明瞭。大家都知道農事是有季節性的，冬季收成後，農民有極長期間的餘暇；利用餘暇來做一點工作是最合理也是必然的結果。織布便是農隙工業之一，而因爲習俗的重視，在各種農隙副業中尤占重要地位。

第三、由生產要素上看來，農民從事織布有幾種優點。所謂生產要素，就是指土地，人工，資本三者而言。農民的工場大抵都是食於斯，寢於斯的起居所在，一不需出地租，二不需納房金；這是一種優點。農民把自己的勞力看得很不值錢，而且生活又很刻苦，所以往往從早到夜，工作十幾個鐘點，所得的代價僅僅夠一天的食用，在都市裏的工人是決不肯忍受的，他們都能忍受；這又是一種優點。至於資本，本來是農民所最感缺乏的東西，但聰明的商人會利用這種機會把原料和工具借給他們或賒欠給他們，使他們雖無資本而也有工做；雖然這種制度容或有可議之處，無論如何，工業却因此而得以維持；這是第三種優點。這三點都是鄉村所特有的現象。鄉村土布所以還能同「洋布」並存者在此。

第四、土布有它的特殊市場。從前如東三省，現在如西北各省，內蒙古，以及內地各省的窮鄉僻壤，都是土布的專利市場。這一點，却是要感謝中國的交通現狀的。因爲交通不便，「洋布」纔不能暢達腹地，而土布商人占了「人熟地熟」的光，得以把這些市場把持下來。

第五，由於消滅者的習慣需要，也能保持一部份的銷路。以「土布」和「洋布」比較，由消費者的觀點論之，原是站在必敗的地位的，其所以能得一部份人的賞識，則在於堅實耐用之一點。直到現在，還有一部份老實樸素的老百姓歡喜這種堅實耐用的布——自然只是指「舊式土布」——他們便是農民織戶的主要顧客。

四、前途的危機

如上所述，國內土布業的前途似乎很有發揚光大的可能了；而實際則恰恰相反，各大產布區域如濰縣、高陽、南通等處的產量一年減於一年，織機也一天少似一天。固然，農村經濟破產，農民的購買力普遍地降落是一種原因，東三省被暴力奪去，消費市場縮小，又是一種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則仍在於「洋布」之侵略。而這種「洋布」決不是中國廠家的仿製品，因為現在我國大布廠的出產每年只在千萬疋左右，其勢力尚不足打倒「土布」，能代替土布的乃是地道的「洋布」尤以日本貨占其大宗，土布何以敵不過洋布呢？這約有下列幾種原因：

第一、生產組織幼稚，在市場上失却競爭的力量。現在的土布生產者完全是舊式的商人，他們的資金是有限的。在購買原料如銷售出品時都不能待價而買或待價而賣，這已是一重損失，加以洋布的製造者擁有巨量的資本金和準備金，在必要時不妨跌價傾銷，這在內地商人是不能忍受的；即使他忍受，跟着跌價，也非其敵，勢必破產了結。而況在同一生產區域裏，從事織製的，供給原料的，收集布疋的，整理漂染的，又都各自獨立，毫無聯絡，甚或兩方接洽，尚須憑中間人介紹（如高陽之有「機頭」）以致手續愈繁，成本愈高，結果遂不足以與洋布爭勝。至於品質粗劣，長寬度不能標準化，每次出品，難於劃一，也是使人厭惡土布之一因，而這種原因的造成也由於組織的幼稚而生。

第二、工具簡陋，技術幼稚，結果不但品質欠良，而且影響於成本。如濰縣和高陽，採用鐵木脚踏機，總算是進步的了，但每分鐘的投梭數只有一百二十次左右，以與力織機的每分鐘投梭二百次相比，遲速奚啻霄壤？故其結果影響於生產能率，能率低下，又影響於生產成本。據最近南開大學經濟學院的調查，高陽織布農家每機每八天可以織布八百尺，需人工二十工半，共計工資六元二角。（見該院出版經濟統計季刊二卷三期第六一一頁）照此分析，每一機每一天成布一百尺，需人工兩人以上。而據作者去年調查東南各省華商紡織廠的結果，每一力織機每天可以成布一百二十五尺，只需人工一人。所以在高陽織一百尺布的工資需七角七分半，而在大工廠裏却只要四角六分，使即把動力，設備等統加上去，後者仍站在優越的地位上。改良織機的情形是如此，手拉梭式和投梭式的舊機更不用提了。同樣，在漂染整理方面也是這樣，舊式染法非但不能得好的品質，恐怕也不易得較便宜的成本。

第三、國內交通逐漸開發，土布的銷路隨之而漸小。上節曾說到，土布在國內是有特殊的市場的。現在因爲交通逐漸開發的結果（如各省公路的興築）使洋布也流到這些內地市場裏去了。這在目前尚不很顯著，因爲利用公路來運輸大量貨物究竟還不是經濟的辦法。預料將來若干條鐵路完成之後，土布所受的打擊一定還要大。但公路對於運貨雖不最好，它却有把內地物質生活提高的可能；從前看不見「洋布」的地方，因爲交通方便之故，至少是可以看得見了，看見了就會有人尋求，尋求的結果，遂使洋布到了

內地。作者曾在僻遠省份的腹地看到運貨的汽車載着洋布疋頭飛跑，大概這種現象不僅在一處可以看到。

由於以上的觀察，卽使遠一步往樂觀方面着想，認為目前土布業的衰落是全部農村崩潰的一環，希望萬一農村經濟恢復時仍有復興的可能，但為將來的前途設想，無論用何等樂觀的眼光去觀察，也實在難於尋到可以樂觀的理由。據個人的估測，「舊式土布」是必在淘汰之列的了，中世紀的生產工具和技術至少都要改良到濰縣和高陽的情形，這種「改良土布」在最近的將來或者仍有它的相當的地位，但要望發展是絕無希望的，而且漸趨於衰落，似乎是應有的事實。請再申論之。

因為紡織機械經過最近二百年的改革，使紡織生產方式完全變了舊日的模樣。直到現在，機械的構造和運轉還在日新月異之中，其目的無非在求充分利用機械的能力來代替人的體力，因以減低工資的付給和許多浪費的人事的齟齬。就目前而論，紡織事業倚賴於機械者漸重而需要「人」的技巧者日輕。因為想要充分地發揮機械的功能，紡織事業自然而然地趨向於大規模化；最初是紡的部分如此，現在則織的部分也進到同樣的境界了。日本的小織布廠近年逐漸減少，大織布廠年有增加，便是這種演變的一例。本來，以人的體力來同機械爭勝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譬如用人力來織布每人只能管理一台織機，若用力織機每人至少可以管理兩台，多至六台，若用自動換梭織機則每人可以管理二十台以至四十台；又如

用老法人工牽經每一小時大概能牽五六十碼，而最新的高速率牽經機每一分鐘就能牽九百碼。這些事實便是最有力的辨證。所以嚴格地講，今日中國紡織界非但要追步西法，甚且要研究出更精巧的機械以求勝，非但投梭式和拉梭式的木機都應淘汰，就是脚踏式的鐵木機也不應讓它們存在。但是爲保持已成的局面，爲維護鄉村的經濟狀況，自然不能這樣的嚴格處理；然而現態之不能持久而必須設法改善是極明顯並且急待解決的。

五、改革的私見

在沒有討論改革的方法之先，不妨先說一說改革後的理想情形應該是怎麼樣。我以爲，如果改革的確成功的話，將來的出品，在品質上和銷路上至少應當能與「洋布」並駕齊驅，而農戶的經濟活動能力則至少數當比目前進步。這樣纔能算是眞正的改革成功。要想達到這種目的，便須注意幾個原則：第一、出品要標準化和時代化，這是基本的條件，因爲不如此便不利於推銷；第二、工具要改良，理由具如上述；第三、技術要求進，卽非但要有好的工具，而且要能懂得最好的使用法；第四、生產和運銷組織要完密，這是準備與「洋布」在市場上肉搏的工具；第五、農村裏的優越的地位要充分保留着，要這樣纔能扶助農村經濟的向上發展。

照上面這幾項原則看來，將來的組織必須擴大和充實，殆無疑問，而農民與全組織的關係也勢必換

一面目。譬如要求農民改良工具，這一點就非從整個的組織入手不可，農民自身是沒有資本可以投在這方面的。爲要能使工具得到最高的效能，必須充分地去利用，如是，一部份的機械如絡經，捲緯，牽經之類必須集中在一處，日夜不息地使它們在運轉，而農民則各人守着一架或兩架織機，專門從事這一種工作。這樣纔能收分工之效，而使農民與全組織從合作中尋求出路。

本此，作者個人的意見以爲當從下述的計畫着手改造現在的局面。

個人以爲每一產布區域應該有一個集體的或由數個分體而集合的中心組織，這組織包括着原料的購進或製造，織造部份的準備工作（如絡經，捲緯，牽經，漿經之類，）織成後的整理工程（如漂，染，印花，起絨之類，）和出品的運輸銷售。農民所擔任的只是「織」的部份，既不備原料也不管絡經捲緯，更不負推銷之責；完全成爲「工資工人，」不過可以仍在各人家裏工作，不必集中於一處，也不規定工作的時間，這是與工廠工人不同之點。所有的準備，織造和整理的機械必須盡量引用新的機械，工作技術也必須盡量採用新的方法。中心組織在形式上自然是一大工廠，故動力是必須引用的；就是農村織戶，也應該以能利用動力爲最終目的，最好是實行「農村電化。」

中心組織的規模是這樣的大，資本自然要充足，因爲不如此便不能同外國的傾銷物品相競爭。因此這種組織既不是農民合作社的力量所能急切完成，也不是普通商人投資所可奏效，最理想的上策是由

棉業統制會來舉辦，否則由金融界和紗廠的分子聯合起來經營，也還不失是中策。統制會能籌集巨量資金，其利一；借此可以推銷國內存紗，其利二；可以利用政治力量（如運費優待，稅捐優待之類）來推銷出品，其利三。如金融界與紗業分子合作，在資金和銷紗方面雖然可以得同樣的利益，但在運銷方面不免稍遜一籌。

至於農民與中心組織的關係，可以利用合作社的方法來聯繫起來，即農民在小區域內組織合作社，再聯合各區合作社組織總社，總社則與中心組織發生直接的關係。中心組織把經紗做成經軸，連同捲就的緯紗紆子，發給合作總社，總社再分發給各合作社，各社再分發給各農戶。農戶織成了布，也交合作社轉交總社，歸還工廠。發紗可以完全採信用制度，或收一部份保證金，織機由廠裏預備，用分期收款制賣給農戶，或長期租給農戶。中心組織聘有許多專門技術人員，長期輪流到各鄉去視察並指導工作。

工廠付給農民的工資，比都市的工廠自然要低些（這是設廠於農村的優點之一，）但因為工具的改善，生產能率加增，農民的實得至少可以比現在增加半倍，甚至一倍。這是維持鄉村工業和補救農民經濟的最要之點。

以上這個草草的計畫，因篇幅關係，言之未能詳盡，但要義實不外乎此。個人希望將來能有機會再實地去考察一下，庶幾能得些更具體的觀念。又關於農村織業的改善，最近上海振興織廠在南翔創辦的振

與農村副業協助會試辦頗有成績。該廠的辦理原則上很有與鄙意相同之點，不過限於資金，具體而微罷了。然而無論如何是一種很好的試驗和參考，希望有心改革土布業者注意及之。

作者深信土布業的盛衰關係國家經濟者至大，不但在農村經濟一方面，就是在中國紗廠的發展方面也是如此。我們要知道中國的關稅是在半自主之下，而通商口岸又許可外國人設廠製造，所以一方面既不能抵拒外貨的傾銷，他方面更無法阻止在中國境內所製的「準洋貨」不向內地流去，結果遂致固有的土布業大受排擠，不能立足。而現在中國紗廠所出的紗，大抵十分之七八用於製造「土布」的。經此打擊，紗銷日減，以致形成紗業的危殆。從另一方面來看，即使鄉村織業仍在發展，但因缺乏聯絡組織，紗的市場反為別國企業家所奪，如濰縣即是一例，這對於中國紗廠仍是大大的不利。所以作者深信中心組織必須聯合紗的製造者，布的製造者和運銷者為一體，纔能對於民族的經濟有整個的幫助。質之海內賢達，以為如何？

一九三四，三，十九日。

二　中國之棉花運銷合作運動

王子建

一、過去的成績

棉花運銷合作，在中國是一種新的運動。民國十五年金陵大學農科，曾在安徽和縣的烏江地方試辦農產交易合作社，代社員直接運銷該地所產的改良棉和本地棉於無錫的紗廠。結果除去一切開銷外，其售價比之本地市價每擔多得六七元盈餘。這次的嘗試是成功的，因爲不但使棉農增加收入，而且使烏江棉在紗廠技師的目光中得到了特殊的優越地位。這件事可算爲棉花運銷合作運動的嚆矢。但因爲合作社的範圍不廣，每年由社運出的棉花爲數不大，所以不甚爲一般人所注意。最近兩三年來，這種運動因了環境的影響而忽然光大起來，有好幾處地方不約而同地同時做着嘗試的工作，結果都很良好。其中進行在先的是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主持的梁鄒美棉運銷合作社，規模較大的是上海銀行農村合作貸款部協助的陝西，湖南，江蘇，安徽各省運銷合作社，由於農民自動的做這種嘗試運動的是河北深澤縣梨元村，農村信用合作社社員自辦的西河棉運銷合作。現在把它們的組織和經過情形分別撮述如左：

1. 梁鄒美棉運銷合作社爲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所倡導組織。梁鄒是山東鄒平縣孫家鎮的古名。地居小清河南岸，土質砂壤，最宜植棉。二十一年春，研究院農場選「脫里司」美棉種四千餘斤，推廣於孫家

鎮一帶棉農二百十九戶表證試種，入秋即以前次表證棉農爲社員，分村組織運銷合作社十五處，復將各社聯合組織，取名梁鄒美棉運銷合作社。是年計設十五分社，社員二百十九人，包括十五村，棉田面積共廣六百六十七畝，經社運銷花衣六十七擔，售價三千二百四十五元。二十二年度繼續進行，改以實際繳花車銷爲準則，打破上屆以表證農家爲基礎的形式制度，其在上屆入社未曾繳花的社員和分社，都一律取消或解散。是年社數增爲十五，社員共三百零六人，包括三十五村，棉田面積共廣三千四百六十四畝，運銷花衣共八百九十五擔，售價三萬八千八百五十二元，營業狀況較上屆擴大了十倍有餘。這次所得的售款比之當地價格溢出一千一百八十九元，這就是社員所得的純益。除去公債金（純利的百分之二十）職員酬勞金（百分之三）和社員教育費（百分之七）外，每花價百元應攤餘利二元二角五分，亦即每擔棉約攤一元。

合作總社主要的業務爲收花，評定等級，整製，貸借，銷售，和選種六件事。社員繳入棉花，由社根據潮份，純潔，長度，拉力，色澤各項標準，施以檢查，評定品級，列爲「特」「甲」「乙」三等。然後過秤，按照當地市價計值。二十二年度共收花衣八百九十五擔，內特等佔百分之八十三，甲等百分之十六，乙等百分之一。整製工作，分軋籽及包裝兩手續。現時去籽尚用人力軋花車，包裝用人力榨包機，每包重百五十斤。貸借款項，由總社負責向金融界抵借，然後轉借與分社及社員。貸款最高額，社員每人不得超過所交棉花時價之七

成。二十二年度向濟南中國銀行先後貸款二萬四千餘元。在棉花收穫之後，尚未售出以前，分借與社員。最高額每戶借入九百元，最低額借入三元。是年所收花衣分兩批運至濟南，均售與申新紗廠。

總分社各職員均係義務職，概不支薪。且上年度業務發達，而職員未增一人。總社共有社務委員三人，分掌總務，營業，會計三部，營業費用之支出，第一屆每包平均負擔一元六角七分五釐，第二屆每包平均負擔一元一角六分六釐，較上屆減百分之三十。其分配比例計打包用材料佔百分之四十二，工資佔百分之十四，運費佔百分之三十五，房租及旅費佔百分之五，其他佔百分之四。

2.上海銀行所協助的運銷合作，是該行農村合作貸款部事業的一種。該行自民國二十年起，即注意農業合作貸款事業，先後與金陵大學及華洋義賑會合作辦理。至其有相當組織，專責應付，則始於二十二年一月農業合作貸款部成立之後。運銷合作即為該部之一種重要事業。就以往的經營而言，除蕭縣一社為雜糧運銷外，其餘都是棉衣運銷。其辦法大抵由學術機關之類指導農民組織合作社，而經濟上則由該行協助。故多係合辦性質。該行對於合作社的組織，注意下列三點：(一)合作社所在地，須為一種作物區，如棉作區；(二)合作社區域內，須有改良作物的工作，或改良種子的推廣；(三)當地須有負責領袖與輔導機關，輔助社務的進行。對於以上各點，經該行派員詳加調查，認為合於標準時，始協助進行其組織工作。至組織成立後，再進而予以業務上的輔導，如會計制度，內部管理等。自開始組織起，至成立後止，皆由該行派員

親往指導。範圍較大的社，並由指導者長駐該處。該行對合作社的業務，約有下列幾種：一、生產貸款——棉農在耕種期間，青黃不接之時，得向該行借款，以免高利貸的盤剝。二、交花——凡入社農民，須將全部棉花交社；且為免除種子混雜，保持棉種純良起見，社員必須繳納籽花。三、預支花價——社員交花後，如需用款，可向社中預支花價之七成。四、裝運手續——合作社將籽花軋成皮花後，用木機或人工打成棉花包，由社運出。五、結賬——至全部棉花出售後 即由社中與社員結賬，以售價所得除去費用公積金等等，所餘全部還於社員。

二十二年與該行有經濟關係的運銷合作共計二處，其屬於棉花運銷性質者凡六處，分佈於湖南津市，陝西永樂區，江蘇東台，江浦，浙江餘姚，安徽和縣等地。各合作社的辦理情形，摘要敍述如左：

甲、湖南　湖南棉花生產運銷合作社是湖南棉業試驗場與該行合辦的，總社設在澧縣的津市，那是湖南棉產區洞庭湖周圍幾縣棉花的終點市場。合作社分布於漢壽，南縣，華容，安鄉，澧縣等五縣，而尤集中於澧縣，安鄉，漢壽三縣。全區域分為四十四個合作場，加入合作的戶數共一萬九千八百餘戶，全社棉田達十二萬畝，其範圍為合作社中之最大者。按本年湖南全省棉田面積為八十八萬畝，合作場的面積已佔百分之十四。此十二萬畝棉田因水災影響淹損了三萬八千餘畝，結果存八萬四千畝，每畝產量在八九十斤左右，共約產籽花六萬擔。交通合作社軋籽的棉花僅二萬六千餘擔，占合作場總產額百分之四十五。這是

可議之點。合作社的軋花打包廠設於津市，共軋皮棉四千五百三十二包，重八千零六十一擔。此等出品，大部運銷長沙第一紗廠占百分之八十六，漢口申新紗廠占百分之三，南通大生紗廠占百分之二，此外尙有黃花如油花未計在內。產品運銷價值，每擔最高四十五元，最低三十四元五角，平均四十一元二角六分；較之當地商行出品，最高超過十元，最低超過六元，平均超過九元。以合作社的費用與普通的費用比較，在軋花方面，普通每擔皮棉需費一元五角，而合作社軋花廠每擔只需一元零二分八釐，是每擔省去四角七分六釐；在打包方面，合作社打包費每百斤皮棉較在花行打包省洋六角一分，在運費方面，合作社辦理較普通包每擔減省三角二分；合此三項，每擔皮棉卽省却一元四角矣。

乙、陝西　陝西永樂區棉花運銷合作社，是該行與陝西建設廳合辦的。區域是在經惠渠，該處土壤和氣候，都宜於植棉。區內農民之加入合作社的，以一村爲單位；卽加入合作社的村莊，全體農民一律參加。二十二年度共有社員二百五十餘戶，包括十村，棉田面積四千四百餘畝，產銷棉花一千二百餘擔。該社的收花處和軋花廠都設在三原城外的孤兒院內，設備方面，有十二匹馬力的引擎一部，軋花機十二架，其餘如木架打包機等用具皆備。去年全年經濟週轉，包括青苗款，收棉款，軋花廠設備，棉花押匯等項，共計約六萬元。棉花是直接銷售於蘇州蘇綸紗廠的，平均每一社員因生產運銷合作而得的利益約五十餘元。

丙、東台　江蘇東台裕豐村棉花運銷合作社，是由該縣大豐公司發起組織的，經濟方面，由上海銀行

給以補助。因組織上的錯誤，及其他種種關係，未能有健全的發展。該社有社員一百五十餘人，共借生產用款七千餘元，社員預支棉價用款一萬二千餘元。棉花分兩批運至南通大生紗廠銷售。

丁、江浦　江浦棉花生產運銷合作社，是中央大學棉作試驗場主辦的，成立於二十一年九月。社員共計五十人，棉田七百餘畝。二十二年運出棉花一百七十四擔，共借款五千五百元。棉花陸續售與無錫慶豐紗廠。

戊、和縣　烏江合作社聯合會棉花生產運銷合作社，是由金陵大學農學院指導組織的，已有多年的歷史了。烏江原來是有名的棉作區，「烏江衞花，」各處聞名；自金大推廣改良種子以來，更有改進。二十二年度該處的運銷合作，由合作社聯合會主辦，加入者共三十二社，約二百五十戶，運出棉花二百四十五擔，分兩批售與無錫申新慶豐二廠。第一批中棉賣價每擔三十八元五角，改良棉（愛字棉）四十元零五角，而烏江當地賣價，中棉平均三十三元，改良棉三十五元，故除開支外，每擔多得二元五角；外加軋花費所省一元，每擔實盈三元五角。第二批中棉賣價三十九元，改良棉四十三元五角，惟此次虧秤甚多，除開支外，中棉可淨售三十五元五角，改良棉可淨售四十元，另加軋花費所省之一元，中棉每擔實盈三元五角，改良棉實盈六元。

3. 河北深澤縣梨元村農民自辦的西河棉運銷合作是值得稱道的一種嘗試。他們既沒有得到政府

機關或學術團體的指導，也沒有得到金融機關的幫助，如別的運銷合作那樣；他們僅僅還了華北工業改進社幹事盧廣綿君個人的慫恿和指導，用他自己的力量，做成了這次的嘗試工作。盧君於二十二年九月因他事到了深澤，想着領導當地梨元村和鄰近的別的村莊的農友試辦運銷合作。經他努力宣傳的結果，得到了三十幾位同志，願意參加這種嘗試工作。一共湊集了大約一百五十擔皮花，由社員自己軋花，自己分級，自己雇船押運到天津去銷售。結果每擔棉花平均淨得三十三元五角七分，比之深澤當地市價，多得三塊多錢的利益。所以能夠辦得成功，却是因為加入運銷的農人，都是華洋義賑會舉辦的信用合作社社員，所以能夠明瞭合作的意義和效能。

總結上述各合作社，二十二年度經合作運銷的皮棉計二萬八千餘擔，代表棉田四萬畝以上。詳如下表：

合作社名	棉田面積	運銷花衣
鄒梁	三，四六四畝	八九五擔
湖南	三七，八〇〇畝	二六，〇〇〇擔
永樂區	四，四〇〇畝	一，二〇〇擔
江浦	七〇〇畝	一七四擔

烏江	未詳	二四五擔
深澤	未詳	一五〇擔
共計	四六，三六四畝	二八，六六四擔

二、現況及計畫

上文所述是過去一兩年中各省舉辦棉花運銷合作的情形。因爲過去的成績很好，所以很能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現在除了上述各團體繼續着舉辦外，今年新興的又有多處，就我所知道的而言，有山東省政府主辦的齊東美棉運銷合作社，陝西棉產改進所指導的棉花生產運銷合作社，華洋義賑會主持的河北省棉花運銷合作，和華北農產研究改進社主持的棉花運銷合作，規模都是很大的。現在逐一介紹於後。

山東省近年棉產之猛增，是值得注意的事。現在全省產棉縣份達五六十縣，皮棉產額達一百五十萬擔至二百萬擔。對於該省農村經濟，關係甚巨。該省建設廳爲力謀發展棉業及改良棉種起見，與濟南中國銀行及中華棉業公司歷記商得經濟上的協助，從事全省棉業的改進。第一步決定以第二棉業試驗場試驗成功的三十六號脫里司種美棉推進於齊東縣，由建廳派員指導組織齊東美棉產銷合作社，由中國銀行及中棉歷記擔任貸款與合作社，再由社貸於棉農，購買種籽。本年年初由建廳派員前往組織，二月五日開始宣傳，二十一日就實行組織的開端。此後各社陸續成立，到三月十八日開聯合會成立大會時，已有一

百三十二社到會。實際上這時已成立一百四十四社，社員數達四千六百人，棉田面積達三千二百餘畝，棉種計十九萬餘斤。山東省內，在鄉村建設研究院之外又得一運銷組織，如此者前途自大有可觀。

至於鄉村建設研究院主辦的梁鄒美棉運銷合作社，本年度也將有極大的擴充。據該院統計，新社已成立二百十三處，社員達五千九百七十五人，代表棉田四萬餘畝，約十五倍於去年，預計可收花衣一萬六千餘擔。在設備方面，擬籌設軋花廠和打包廠於聯合辦事處，購六匹馬力的發動機一架，帶軋花機十五架，並將此項發動機改爲木炭代油爐。此外並擬設立棉包儲藏處，並保火險，以防危險。擴充育種場，以保持純種。在農民經濟方面，除秋收後得以預借棉款，並擬在春季青黃不接之時，於查驗棉苗後按畝借給貸款，以助貧農。

陝西省自建設廳與棉業統制委員會合作辦理棉產改造所之後，積極進行改良棉種及提倡合作。故現在屬隸該所棉花生產運銷合作社，除永樂區以外，又增加了十幾處。此等合作社分布在華縣、渭南、臨潼、三原、長安、咸陽各縣間，代表棉田在十四萬畝以上。

河北省自上年西河棉運銷合作試辦成功後，華洋義賑會卽議定正試舉辦，並將範圍擴大，擬定以深澤、蠡縣、束鹿、無極、趙縣、晉縣、元氏、高邑等八縣爲合作範圍。由會中派員到各縣協助各合作社及聯合會準備一切，各縣均原有信用合作之組織，進行上當較便利。其深澤一縣，已見成效。該會於本年四月間向金陵

大學農藝系購得脫字棉種七擔，運往深澤，分派各社試種。棉花登場後，深澤縣中西南三區合作社聯合會曾將所屬社社員所產棉花，湊集二百二十八包，先後運到天津，待價而沽。

本年河北省尚有一大規模的促進棉運合作的團體成立，那就是華北農產研究改進社。該社係由金城銀行，南開大學，和平民教育促進會合組成的，預定工作很多，舉辦棉花運銷合作也是重要工作之一。負責主持這一部份事務的便是去年從事西河棉運銷合作嘗試而得成功的盧廣綿君。現在各地棉花生產運銷合作社已次第成立，都是有限責任的性質。其目的除運銷該合作社社員自產的棉花外，復在提高社員出產棉花的品級及產量。惟本年度因棉花行將登場，工作成績為事實所限，已在進行合作社組織的僅定縣、趙縣、蠡縣、無極、南宮、束鹿、深澤等數縣。預計來年，當可推行到全省各重要棉區。

以上是今年各省推行棉花運銷合作的大概。此外，棉業統制委員會在它的事實計畫進行大綱裏，也定有推廣全國棉花生產運銷合作的計畫。這是一個有系統的計劃，預備推廣到全國各棉產區的。據其計劃綱要所載，在組織方面，分為三級：第一級為合作總辦事處，設在上海；第二級為合作分辦事處，分設於陝西、湖北、湖南、河南、山東、河北、安徽、江蘇、浙江等產棉省分，每一大棉區設一分處；第三級為合作社指導所，每一棉花運銷合作社區內，即設指導所一處。至實行步驟，則分做五項：（一）合作社地點選擇的標準——在開始組織合作社時，其地點必需為改良棉子推廣區，且當地有公正熱心的負責領袖。（二）合作社第一年

區域的標準及組織形式的標準——每合作社第一年的區域，擬不超過五千畝，但最小亦須有棉田一千畝左右，始可成一經濟單位。自第二年起，合作社區域將按改良棉子的供給量擴充。對合作社之區域較大的，其社務將採用聯合式的組織，以求全社社員合作精神的普遍貫注。其業務無論區域大小，將均採用集中式的組織，以求經營管理可以集中，而增高其效率。(三)合作社聯合辦事處之設立——在同一棉區，其土地氣候相同，且種植同種棉子的合作社，發展至相當數目時，將在交通便利適中地點，組織合作社聯合會，辦理其會員合作社棉花的集中，運輸及金融的周轉等事項。(四)合作社逐年社數增加的速度——目前因缺乏改良棉區的精確統計，故逐年棉花運銷合作社數目的增加，祇能大約估計。在第一年至多可有五十社，代表棉田十萬至二十萬畝；第二年可增至一百社至一百五十社，代表棉田六十萬至一百二十萬畝；第三年或可增至二百五十社，代表棉田一百八十萬至三百萬畝；第四年第五年每年約增新社一百個，其已有舊社則逐年擴充區域，如是則第四年合作社棉田約可代表四百五十萬至七百萬畝；第五年合作社棉田可約代表九百萬至一千二百萬畝。至此時棉花運銷合作社的組織，已極普遍，效果昭著，農民信仰，故自動組織者亦必甚多。大概以七八年的期間，可以普遍全國改良棉區。(五)合作社業務所需資金的辦法——合作社所需資金，按其時期長短之不同，可以爲以下數種：第一種長期的固定資金，擬用股金或合作社對社員所發長期債券借款，或向銀行借款以供給之；第二種爲中期的半固定資金，擬分別性質，由合

作社向銀行作抵押借款，或擔保借款，以供給之；第三種為短期的流動資金，擬按其穩妥程度，分別由合作社自籌，或向銀行作押款押匯以供給之。

三、棉花運銷合作運動的產生背景及其前途

綜觀以上兩節所述，可知近年我國棉花運銷合作運動之盛況；雖然現在尚無多大成績可言，前途却好像有無限希望似的。這種事業在外國，如美國，行之已有十幾年，為什麼這時候纔推行到中國，又為什麼不先不後，恰恰會在這兩三年來興起呢？據個人的觀察，這種運動之所以能夠成熟，完全是靠了三種力量的推動。這三種力量是什麼呢？第一是歷年改良棉種的結果，第二是農村經濟破產的一種反應，第三是近年紗廠實行合理化運動的影響。自從歐戰後中國棉紡工業突然發達以來，有遠識的科學家如實業家看到中國棉花品質之不宜於紡細紗，便促起了所謂棉種改良運動，想法試植美國棉種，以求長纖維的棉種之產生於是各省遍設棉業試驗場之類的技術機關，而各大學農學院附設的農場也多試育良好棉種。等初步試育良好棉種成功之後，自然就要設法推行到民間去，以求實效。但棉農種植改良棉種之後，如將棉花賣給當地花商，既不易得善價，而且花商收了去仍要攙雜做假，無從使社會知道改良棉的好處。所以結果，技術機關除了指導棉農植棉外，又想出方法來幫助他們直接銷售於紗廠，以求高價，而得名譽上的收益。於是就產生了運動合作的組織，如金陵大學之在烏江，中央大學之在江浦，相繼組織運銷合作社，都是

這樣發生的。但這種技術機關除了技術上和組織上幫忙以外，經濟上是無法幫忙的，所以要想推廣發達．事實上有不可能者。事實湊巧，恰好近兩年全國農村經濟日驟衰落，農村瀕於破產，有志於復興農村的人士，便想着鼓勵農民植棉，而且代他們辦直接的運銷，以求較多的收入，如山東鄒梁美棉生產運銷合作社和陝西永樂區棉花生產運銷合作社便是應此需要而生的。另一方面因爲農村破產的結果，現金集中於都市，在這全國經濟陷於深度恐慌中的今日，金融界對這許多現金都感到無法擺布之苦。於是有比較富於遠識的人想着何不把一部份資金返回去投到農村裏去嘗試，而竟成功，這運動纔算得到了充分的動力，向前邁進。此中以上海銀行和中國銀行爲先進，在湖南、陝西、江蘇、山東幾省都已培植了各人的勢力；而金城銀行也不甘落後，也組織了一個華北農產研究改進社在河北方面想要獨霸一方。此外還有一種原因足以促使這種運動向前的，那就是近年棉紡工業凋敝以後力行生產合理化的助力。因爲紗廠實行合理化，對於棉花的需要，傾向於標準化，即品質求整齊劃一，不攙雜質，不攙非天然的水分之類，而各合作社恰能做到這種條件。於是合作社的產品不怕沒有銷路，而合作社的基礎益堅。我們分析中國棉花運銷合作運動的成因，所得的結論，可以說是爲適應下列四種需要而來的：第一技術機關需要推廣他們的改良種籽；第二農民需要資本；第三金融家手頭的資金需要出路；第四，廠家需要良好的棉花。

因此諸種原因的錯縱構結，我們又得看出中國棉花運銷合作運動的特質如次。第一，在性質上，大多

數的合作社，實不僅限於運銷一途，而是縱合信用，生產，運銷在一個直系上的。這完全是爲適應目下的農村經濟狀況而然的。在破產狀況下的農民，如不給他種籽不放給他青苗，他是什麼事也做不起來的，故大半數合作社都兼營青苗信用貸款。梁鄒合作社過去兩年雖沒有辦青苗貸款，但聽說今年也要添辦了，又種籽的純良問題，也是這運動的中心要點，故事實上各合作社員不能不聽主辦者的指導，種植一定的棉種。第二，在組織上，所有的合作社的組成，在一方面不能離開技術機關或學術團術，在別一方面，又不能離開金融界。這理由是很顯明的，農民自身最初非但不知道在怎樣組織合作社，即連合作社的意義也沒有意識得到，所以必須要一個社會團體來扶持起來；而資本的來源呢，又必需從金融界手裏放出來。老實說，金融界對於農民經濟並不一定怎樣關心，他們所最關心的還是在怎樣於資金中博求利息，故要想資本家獨力來做這種事，在他們的能力上和興趣上都不許可的。第三，在業務方面，有兩點可以注意：一是各合作社都能自己軋籽，自己打包，自己運輸；一是合作社產出的原棉大半是直接銷給紗廠的。第四，在技術上，各合作社都能做到，至少是想要做到，(甲)保持良好的品種；(乙)按標準分清等級；(丙)不攙雜，攙籽，攙水；(丁)打成標準的棉包。這些事都是原棉消費者所極端歡迎的。

因有這種種特色，自然影響於社會國家者很大。先說直接的影響，第一，在農村方面，農民的收入得以增加，亦卽生產力之增加，藉此可以促使農村經濟狀況的復蘇，其次，在工業方面，從此可以得到較好的原

料，助成工業的合理化運動。復次，在金融方面借此可以使呆滯的資金得到流通，減少在都市方面的畸形的作怪。再說間接的影響，第一，可以因這種合作社的組織，養成農民的組織能力，以及做一個公民所需要的智識。其次，在將來全國棉花分級及棉花檢驗方面有很多幫助。

但就目前的情況看來，這種運動也未始不有尙須改善之處。最顯著的一個缺點，便是各個組織不相聯絡，甚且有衝突重複之處。譬如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既在鄒平辦一合作社，建設廳復在齊東辦一合作社，彼此不相聯絡；但總算不在同一區域，也還說得過去。可是在河北，既有華洋義賑會辦理在先，又有華北農產研究改進社繼起於後，而舉辦的區域，又多有重複的。而且兩方面似乎不相諒解，各自為政。試看華洋義賑會出版的「合作訊」第一〇九期第六頁所載的一段文字：「……至各外勤人員對於協助各社辦理棉花運銷時，尤應審慎從事，蓋棉運一事，原為本會預定計畫，迭經執行委員會議決在案，如在同一區域內，更有其他機關辦理此項同樣工作者，仍應按照原定步驟進行。」可知將來的糾紛或者難於倖免的。其實，現在既有全國棉業統制會的設立，應該由該會聯絡疏通，把所有同性質的組織歸納於同一系統之下，分工合作，既免糾紛，且增效率。譬如各省應辦事業，參照該會計畫大綱，畫定區域和步驟，指定各團體分任一區或數區的指導工作；至於資金來源，亦由有意投資此項事業的銀行，分認款額，或分認區域經會中指撥。如此，在事實上仍然可以各自試行各自的辦法，而系統上不致於紛亂，並且用人等事也可以經濟些，否

則如照現時的情況，在相連區域中有幾個機關所主持的合作社同時存在，互相錯雜，各自爲政，非但農民不知所從，或竟有跨社分子發生，或此社淘汰的社員，彼社又復收用之，使訓練及組織上發生惡劣影響，甚且使農民懷疑合作社的倡導者爲謀利性質，而裹足不前。這豈不是此種運動的一大障礙嗎？除此以外，還有一問題須要注意，就是棉花的分級和棉包的重量體積等要促使統一化。這事也非棉統會主持辦理不可。

我們回顧以往，遠矚將來，覺得這種事業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若果棉統會的計畫可以達到，則五年以後，全國有一千二百萬畝棉田的代表者參加這種運銷合作；七八年之後，這種事業可以普遍到全國各改良棉區。這是多麼偉大的一件事！如何才能使這件事得到一個光明的前途，關聯的問題固然很多，但最要莫過於資金的供給之一點。所以命運如何，要看金融界的志趣如何才能決定。

一九三四，九，二十六日。

三　中國各地的農民借貸

——幾個極堪玩味的統計的申述——

吳承禧

一　引言

近一年來，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的農業經濟科曾經陸續的在農情報告上發表了幾個極有價值的關係中國各地的農民借貸的調查報告，其中最初所發表的一個乃是一張比較簡略的「各省農民借貸表，」載在民國二十二年九月一日第九期的農情報告上，所包括的範圍計有二十二省七百八十五縣，但所調查的僅有負債農家的百分數以及借款的年利兩項，內容比較簡單；第二次所發表的是一個關於「各省農民借貸調查」的統計，載在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一日的農情報告上。這次的統計計分兩部，一部為「現金借貸，」一部為「糧食借貸，」被調查的地域計有二十二省八百五十縣，除去第一次報告中所檢討的兩個項目外，還加入了「借款來源」的百分比一項，把「合作社，」「親友，」「地主，」「富農，」「商家，」「錢局」以及「其他」等等在農村貸款中各個所占的地位用百分數表現出來。第三次的統計，即「各省農村金融調查」在二十三年十一月一日的農情報告上公佈。這次的調查，計分兩大部分，一部是「借款與儲蓄，」一部是「合會與合作社，」後部的統計，計有表三：一為「合會種類，」二為「合會

款額與合會年限，」三爲「合作社」的種類；前部的統計，和第一二次的都很不同，第一次中的借債農家百分數和第二次所特有的「糧食借貸」的統計在第三次中都找不到，但第三次對於現金借貸的統計却特別翔實，除去借款來源和借款利率的數字比第一二次所調查的更加完善的表現了出來之外，它還包括了「信用方法，」「借款時期，」和「儲蓄機關」等等統計，在調查的範圍上，它也比第一二次的更廣，計二十二省八百七十七縣。

因爲近幾年來討論農村金融的文字和統計大都是限於一隅，——限於一省一縣甚至限於一個小小的村莊，所以爲了給予一般的讀者以一個對於國內各地農民借貸之概括的印象起見，我們願意把上述的幾個統計擇要申述一下，當然，這只是一種介紹和詮釋的工作，談不到什麼研究和發現的。

二　有多少農家是借債的？

在這農村經濟極度惡化農業金融極度枯竭的今日，中國各地的農民究竟有多少是負債的呢？下列這個統計很可以給這個問題作一個一般的答覆：

各省負債農家統計（根據第二年第四期農情報告）

省名	負債農家占農家總數之百分數	
	借錢的	借糧的

察哈爾	七九	五三
綏遠	四八	三三
甯夏	五一	四七
青海	五六	四六
甘肅	六三	五三
陝西	六六	五六
山西	六一	四〇
河北	五一	三三
山東	四六	三六
江蘇	六二	五〇
安徽	六三	五六
河南	四一	四三
湖北	四六	五一
四川	五六	四六

雲南	四六	四九
貴州	四五	四七
湖南	五二	四九
江西	五七	五二
浙江	六七	四八
福建	五五	四九
廣東	六〇	五二
廣西	五一	五八
平均	五六	四八

從這兒，我們可以看出：第一，全國半數以上的農家都負有債務，借現金的農家平均占農家總數百分之五十六，借糧食的農家平均占總數百分之四十八，幾占總數之半。第二，各省農民負債的程度，相去並不甚遠，例如江浙，雖是江南富庶之區，但農民的負債，却竟與西北的不相上下，可知在這農村崩潰日趨激化的今日，無論東南西北，農民的窮困以及農民對於資金的需要都是非常普遍而又極其迫切的。

三　向誰去借？

國內大多數的農民，既都以借債爲生，則他們舉債的源泉究竟是在一些什麼地方呢？換句話說，他們向誰去借，他們的債主是誰呢？

關於這點，下表很值得我們仔細的考察：

農民的借款來源（百分比）

（根據農情報告第二年第十一期）

省名	銀行	合作社	典當	錢莊	商店	私人		
						地主	富農	商人
察哈爾	—	—	—	一二·五	一八·七	二五·〇	一二·五	三一·三
綏遠	二·九	五·八	二·九	八·八	五·八	二〇·七	一七·七	三五·四
寧夏	—	—	—	—	二一·八	一四·三	二八·六	三五·三
青海	—	—	六·三	—	一四·九	二三·五	一七·〇	三八·三
甘肅	—	一·三	二·六	—	一六·〇	二一·三	二二·七	三六·一
陝西	四·一	二·〇	九·〇	五·〇	二〇·五	一五·四	一四·四	二九·六
山西	四·九	一·三	一八·九	一三·一	一一·四	一四·四	一三·四	二二·六

河北	三·三	一一·九	五·一	一〇·七	一三·八	一三·二	一九·八	二二·二
山東	六·一	八·四	三·五	一六·三	一五·四	一五·五	一九·六	二〇·二
江蘇	八·八	五·六	一八·五	六·二	七·二	二三·五	一四·二	一六·〇
安徽	—	八·六	六·九	〇·五	一三·一	三〇·四	一六·九	二三·六
河南	一·七	一·三	六·三	六·五	一五·七	二八·八	一六·六	二三·一
湖北	二·九	四·九	一〇·九	三·九	一三·八	二五·四	二一·六	一六·六
四川	二·六	〇·九	一八·三	六·八	八·八	二六·六	一四·五	二一·五
雲南	二·六	〇·八	五·二	—	六·一	三三·四	二一·一	三〇·八
貴州	—	—	七·四	—	一〇·四	三二·九	二三·九	二五·四
湖南	—	一·六	五·六	二·二	一三·六	三四·五	二二·七	一九·八
江西	一·六	三·二	五·六	四·〇	一一·二	三三·六	二二·四	一八·四
浙江	三·七	四·五	一六·二	一〇·一	一二·〇	二一·九	一五·八	一五·八
福建	〇·九	—	三·六	七·二	一六·三	二〇·〇	二二·八	二九·二
廣東	三·二	〇·三	一八·四	五·五	一三·二	二六·九	一二·四	二〇·一

廣西	三·七	—	二二·三	〇·八	八·九	三一·八	一三·四	一九·一
平均	二·四	二·六	八·八	五·五	一三·一	二四·二	一八·四	二五·〇

這個表究竟告訴了我們以一些什麼呢？它指出了：

第一，新式的金融機關在農村金融中是沒有什麼地位的，銀行放款，在農民借款的來源中只占到百分之二·四，則其地位之無足輕重，可想而知。年來，都市銀行業者雖以投資農村相號召，但農村既不安靖，且又不能予銀行資本以高利的酬報，則實際上它們不能以大量的資金貸於農村，殆亦勢所必然，所謂投資農村藉以拯救農村之崩潰云者，事實上原亦不過是一種粉飾門面的企圖而已！

第二，合作社對於農民也沒有什麼深切的聯繫，它在農民借款的來源中平均也還沒有占到百分之三，即歷史悠久而合作運動的發展又較爲普遍的河北省，合作社在借款來源中所占的地位也僅達百分之十一·九，遠在「商店」與「私人」借款之下。這是什麼緣故呢？合作的基礎爲什麼難以根深蒂固的在鄉村中樹立起來呢？這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合作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則是自助互助，農民們的經濟狀況如果一般的都已惡化了，則雖欲自助互助，豈復可能？此所以今日中國合作事業的發展，其動力全是由上而下，農民們除掉利用合作組織向社外的銀行或是向社外的慈善機關借錢外，簡直是沒有什麼社內的會務可言的。而今日的銀行與公益團體對於合作的資助，畢竟有限，所以，合作社對於農民的關係也

就不得不顯得非常的淡薄了

第三，在農民借款來源的百分比中，「錢莊」和「典當」也沒有什麼重要的地位，錢莊只佔百分之五·五，典當只佔百分之八·八，「商店」所占的百分數雖然比較高些，但亦僅有百分之一三·一，三者合計，亦僅占借款來源總額百分之二七·三，遠在「私人」借款之下。

我們知道，今日中國大多數的農民都在死亡線和飢餓線上掙扎，他們既沒有什麼東西足以取信於人，也沒有多少金銀首飾或是其他的動產足以向人抵押，所以，以融通商業資金爲主的舊式錢莊以及爲一般平民作種種動產抵借的典當業自然也就不能和大多數的貧農有所往來了。至於商店，雖亦間有兼營農民放款的業務的，但能够和店主們有所周旋往來的，除掉一般較爲殷實的地主和富農而外，恐怕也就很少了吧！

第四，我們很容易看出，一般農家的債主最主要的乃是「富農」「地主」和「商人」；富農占百分一八·四，地主佔百分之二四·三，商人佔百分之二五·〇，三者合計，已幾及農民借款來源的百分之七十了——其普遍性與重要性於此可見。

表中把地主，富農與商人三者合爲一欄而統以「私人」名之，也是很有趣味的。我們知道：這三種私人，眞是所謂「三位一體」的東西——地主有時候兼營商業，商人有時候就是地主，富農與地主階級非

常接近——他們原來都是直接間接或多或少的以高利貸的形式剝削農民，以榨取一般貧苦無告的農民而生活着的，例如他們有的可以憑藉了一點青苗放款就把農民們胼手胝足終歲勤勞的收穫，預期以極不等價的方式收買了去；或是在「青黃不接」的時候，他們給你一斗兩斗以賤價屯積起來的糧食，而在「新穀登場」的時候，喊你以一倍兩倍於借時的數量給他償還；或是在你「需款孔急」的時候，他們給你以少許現金的接濟，而在你覺得無可奈何負擔不起他那重利的盤剝的時候，他便很輕易的把你的土地兼併過去，使你流於佃戶，淪於無產……他們一方面遏斷了農民對於市場的接觸，一方面又妨害了農民對於生產條件的改進，所以阻礙農民經濟之高度的發展的因素雖不一其端，但這種三位一體的高利貸的剝削却不能不說是其中的主要的一種，這種因素如果一日不能除去，則農村復興的希望簡直也是無法可以實現的。

四　借款利率

在新式的金融組織還沒有普遍的設立，在高利貸依然是占着統制的地位的時候，農村借貸利率的高昂自然不是一件出乎意表的事。下表是從農情報告第二年第十一期上摘錄下來的：

各省農家借款所負之年利統計

各種借款利率所佔之百分率

省名	一分至二分	二分至三分	三分至四分	四分至五分	五分以上
察哈爾	一二·五	六二·五	一二·五	—	一二·五
綏遠	一八·七	一二·五	六·二	四三·九	一八·七
寧夏	—	—	二八·五	一四·二	五七·三
青海	—	四二·九	一九·〇	一四·二	二三·九
甘肅	二·七	二二·三	一九·四	二七·八	二七·八
陝西	〇·九	六·六	二九·三	一二·二	五一·〇
山西	二·六	一七·〇	四〇·六	二七·六	一二·二
河北	六·六	四六·七	四三·八	二·五	〇·四
山東	五·四	三五·七	三七·〇	二〇·〇	一·九
江蘇	一四·三	四八·七	二五·二	五·九	五·九
安徽	一·二	三二·一	三八·三	一一·一	一七·三
河南	一·二	一〇·八	五二·八	一九·二	一六·〇
湖北	七·五	五〇·〇	二七·五	七·五	七·五

四川	一五·六	三二·七	四〇·九	六·一	四·七
雲南	八·三	三九·六	三七·六	四·一	一〇·四
貴州	—	一五·二	六五·五	一二·九	六·四
湖南	一·一	四四·九	四三·六	四·七	五·七
江西	一六·三	七三·五	一〇·二	—	—
浙江	四一·二	五七·七	一·一	—	—
福建	三一·九	六三·九	四·二	—	—
廣東	一八·八	四八·二	三〇·四	〇·九	一·七
廣西	一·〇	三四·〇	五五·〇	六·〇	四·〇
平均	九·四	三六·二	三〇·三	一一·二	一二·九

從這兒，我們可以看出農村中高利貸的流行是如何的普遍。一分至二分的借款在鄉村中已不可多得了，二分三分以至四分的借款却占到百分之六十六以上，四分至五分的借款比一分至二分的還多；而五分以上的借款．竟亦達到百分之一二·九，農民的經濟狀況怎會不以此而江河日下呢！

當然，各省利率的高低頗有參差，例如東南較低而西北最高，西北各省——如綏遠、寧夏、甘肅、陝西等

處，借款利率之在四分以上者且占到百分之五十以至六七十之高哩！

以上都是指現金借款的年利而言的。在農情報告第二年第四期上還有一個糧食借貸的月利表，也值得我們注意。

各省農家糧食借貸所負之月利統計

省名	百分數（月利）
察哈爾	八·三
綏遠	七·七
寧夏	十一·七
青海	五·一
甘肅	七·三
陝西	一四·九
山西	六·〇
河北	三·三
山東	三·五

省別	數值
江蘇	七·六
安徽	一〇·〇
河南	七·三
湖北	六·九
四川	五·七
雲南	七·二
貴州	七·四
湖南	六·八
江西	四·四
浙江	四·〇
福建	四·七
廣東	五·八
廣西	一〇·九
平均	七·一

因爲糧食借款的時期較短，而在借糧與還糧的時候，糧商或是地主們又往往故意的抑揚食糧的價格，使農民們暗中大吃其虧的緣故，糧食借款的利率自然是遠較現金借貸爲高的。

現金借款的年利在五分以上的只有百分之十二・九，但糧食借款的利率普通却都在月利六七分之間，廣西、安徽、寧夏、陝西等處的借糧，月利且有超過十分十一分以至十四分以上者，如以年利計算，都在百分之一百二十以上，其剝削之慘重，還不足以駭人聽聞嗎？

五　借款期限

因爲像大規模的農業銀行或是土地銀行等等專以辦理長期農業放款爲業務的新式金融機關還沒有在國內健全的發展起來，因爲各地的農村秩序又是極不安定，所以今日流行於國內的農村借款的期限便不能很長，普通都在六個月以至一年之間，如下表：

各省農民借款之期限（％）

（根據農情報告第二年第十一期）

	六月以下	六月至一年	一年至二年	二年至三年	三年以上	不定期
察哈爾	—	七五・〇	—	一二・五	—	一二・五
綏遠	二六・六	六〇・二	—	六・六	—	六・六

寧夏	—	七一·五	—	—	—	二八·五
青海	—	七一·四	四·八	四·八	九·五	九·五
甘肅	一六·六	四八·四	五·五	二三·三	二·七	五·五
陝西	四八·〇	四二·〇	三·〇	一·〇	一·〇	五·〇
山西	三九·四	五一·二	三·一	三·七	—	二·六
河北	一〇·四	八四·六	〇·八	一·八	〇·四	二·〇
山東	一八·七	七四·一	一·二	二·八	—	三·二
江蘇	六·〇	七五·八	九·一	一·八	〇·六	六·七
安徽	一一·八	六〇·七	九·二	二·六	五·二	一〇·五
河南	一七·五	六八·六	二·〇	四·〇	〇·六	七·三
湖北	五·〇	七五·〇	二·五	—	—	一七·五
四川	一一·二	六九·二	四·二	一·四	二·八	一一·二
雲南	六·三	五一·二	一三·七	四·二	二·一	二三·五
貴州	一二·五	六二·六	八·三	四·一	—	一二·五

湖南	三・八	六六・八	一・二	五・一	二・五	二〇・六
江西	七・八	六三・四	二・六	五・二	五・二	一五・八
浙江	九・八	八〇・四	三・七	—	一・二	四・九
福建	四・七	五九・七	七・一	七・一	二・三	一九・一
廣東	一五・七	五三・〇	四・六	二・七	八・三	一五・七
廣西	七・三	五九・四	八・三	一六・七	一・〇	七・三
平均	一二・六	六四・七	四・三	五・〇	二・一	一一・三

我們知道農民借款的期限大多是隨着各種借款用途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的：借款的用途如果在購買種籽，添購肥料，則有短期的資金即可；如爲購買牲畜，增置農具，則有中期借款亦足以應付，但如欲興辦大規模的水利或墾殖荒山荒地等，則非有長時期的投資即難以收效了。現在的農村貸款，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既都在一年以內，則農業技術和農業生產力的改進自然也就很困難了。

六　信用方式

在第二年第十一期的農情報告上，我們看到農民借款的信用方法有如下三種。

(一)個人信用——在各省農民借款中平均占百分之一九・八

(二)保證信用——平均占百分之三三・九

(三)抵押信用——平均占百分之四六・三

信用方式之重抵押而不重個人，在這兒是很顯然的。「個人」方面，假如沒有土地或沒有其他的紳商來給你作保的話，那你當然也就別想借錢了。

七　農村的游資存在那裏？

在上述那第十一期的農情報告上還有一個「儲蓄機關」的統計也頗有意義，根據那個統計，各省農民的餘款都存在下列這幾個「機關」裏：

(一)銀行——占百分之〇・四

(二)合作社——占百分之〇・七

(三)典當——占百分之七・四

(四)錢莊——占百分之一・一

(五)商店——占百分之二五・六

(六)私人——占百分之六一・二

(七)其他——占百分之三・六(所謂其他，係指窖藏)

從上列這七個項目裏我們一眼就可以看出，農民的餘錢有百分之六十以上都存在「私人」的手裏，其儲蓄於銀行及合作社的數目是極少極少的。

為什麼緣故呢？因為在鄉間，能夠有資格給別人保管錢物的私人不外是一些地主，富農與商人，而如前所說，這些「私人」本來就是以經營高利貸為致富之捷徑的，所以他們對於游資的吸收當然是特別努力，他們所給予存戶的利息當然也不是一般的銀行與合作社所能敵對，因此，農村游資之不斷的轉化為高利貸資本也就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實了，何況現在的新式金融組織，在農村中根本還沒有普遍的發展，農民對於它們還是異常隔膜的呢！

八　結尾

以上所檢討的統計都是近一年來的情形，關於農村借貸之一種較為長期的變動的趨勢我們可謂毫無所知。不過，李景漢先生最近在民間上發表了一個關於定縣「農村高利貸的調查，」在「趨勢」方面却可以供給我們以一點參考：他所發表的是民國十八年、十九與二十年三年內五個村莊五百二十六家的調查的結果，這結果有使我們可以注意者三；

（一）借債的農家是一年比一年多——民國十八年借債的計一百七十一家，佔總家數百分之三十三；民國十九年借債的計二百三十家，佔總家數百分之四十四，民國二十年借債的計三百零五家，佔總家

數百分之五十八。十九年借債的家數比十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五。二十年比十九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三，比十八年增加百分之七十八。

（二）借款的次數也是一年比一年增多——民國十八年各家借款的總次數爲三百三十五次，民十九增至四百六十六次，多一百三十一次，增加百分之三十九。民二十更增至七百二十六次，較十九年多二百六十次，增加百分之五十六，較十八年多三百九十一次，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七。

（三）借款的總額也是一年比一年增加——十八年借款總額爲二萬一千零二十六元，十九年增至三萬四千四百零一元，比十八年增多百分之六十四；二十年借款總數爲四萬八千九百四十四元，比十九年增多百分之四十二，比十八年增多百分之一百三十三。

以一個在平教會積年努力改進之下的定縣，農民的借貸情形，猶如此的每況愈下，則其他縣份的農民借貸狀況之日趨惡劣，當亦不難想像而知。

占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的大多數，原來都是在「債」的深淵中掙扎着哩！

一九三四，十二，十六日。

四　中國的農業銀行

吳承禧

農業銀行之在中國，爲數極少。據一九三四年全國銀行年鑑所載，全國現存的各種銀行合計有一百四十六家，實繳資本總額達二萬六千五百萬元以上，其中農工銀行一項則僅有十三家，實收資本總計亦僅有一千四百四十餘萬元，較之前者，不及十一，而其中又多以農工並稱者，足見純以農民爲對象的銀行，在數量上是如何的稀少了。

下表是我們根據銀行年鑑及其他資料所得到的一個關於全國農業銀行之總的概況的統計：

銀行名稱	成立年	總行所在地	分支行數	已繳資本額（元）
中國農工銀行	一九一八	上海	六	五、〇〇〇〇〇〇
江豐農工銀行	一九二二	震澤	—	二〇〇、〇〇〇
江蘇省農民銀行	一九二八	鎮江	一九	二、二〇〇〇〇〇
農商銀行	一九三四	上海	一	三、〇〇〇〇〇〇
紹興縣農工銀行	一九二一	紹興	—	一〇〇、〇〇〇

紹興縣農民銀行	一九三三	紹興	—	五三、五六九
嵊縣農工銀行	一九二四	嵊縣	—	一〇六、九〇〇
衢縣農民銀行	一九二九	衢縣	—	六二、四八八
海甯縣農民銀行	一九三一	海甯	—	一〇六、六九二
餘姚縣農民銀行	一九三二	餘姚	—	六〇、〇〇〇
崇德縣農民銀行	一九三三	崇德	—	五九、一九二
嘉興縣農民銀行	一九三三	嘉興	—	七二、〇四一
嘉善縣農民銀行	一九三三	嘉善	—	五〇、〇〇〇
莆仙農工銀行	一九二八	涵江	—	一五〇、〇〇〇
中國農民銀行	一九三三	漢口	六	二、五〇〇、〇〇〇
北碚農村銀行	一九三一	北碚	—	二三、三四二
汾陽農工銀行	一九二四	汾陽	—	一〇〇、〇〇〇
河南農工銀行	一九二八	開封	三	一、二五〇、〇〇〇
青島市農工銀行	一九三三	青島	—	一〇〇、〇〇〇

通縣農工銀行	一九一五	通縣	―	一〇〇、〇〇〇
共計總行二〇			三五	一五、二九四、二二四

因爲時間的差異以及資料來源微有不同的緣故，上列統計和銀行年鑑所刊載的數字似稍有出入。因爲個人精力有限的緣故，掛一漏萬的地方仍是在所不免的。現在，我們就根據這個統計再加以約略的分析。

我們先看這些銀行之地方的分佈狀態。依據總行所在地之所屬省份來分，上述二十家總行之各省的分佈狀態如下。

所屬省份	行數	所屬省份	行數
江蘇	四	山西	一
浙江	九	河南	一
福建	一	山東	一
湖北	一	河北	一
四川	一		

除掉西藏和蒙古不計以外，中國現在包括着二十八行省。在那二十八行省之中，有農工或農民銀行

的却只有九省還不及總省份的三分之一，足見中國農業銀行發展的幼稚及其分佈的不均了。又浙江雖是中國最小的一省，但農民銀行却以浙江爲最多——這只要一看上列的統計就可以明瞭的。

這些當然都是指的總行而言的；若以分支行之多寡合併計算，則江蘇省的總行雖僅有四，遠在浙江省之下，但江蘇省農民銀行一家即有分支行十九處之多，較之浙江省各縣立農民銀行的數目超過多多了——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不過，無論如何，中國的農業銀行總是集中在江浙兩省——那是沒有疑問的。

現在，我們再看：這些銀行的資本組合形態是怎樣的。

根據前面的總表，我們可以把那二十家總行的資本額類別歸併如下：

資本類別	家數
十萬元以下的	七
十萬至二十萬的	八
一百萬以上至五百萬元的	五

換句話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銀行，其資本額不及十萬元；百分之七十五的銀行資本額皆在二十萬元以下。百萬以上的農業銀行，全中國只有五家，足見中國農業銀行的資本一般的是非常薄弱！

然則，這些銀行之史的發展過程又是怎樣的一種情形呢？

在沒有提到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可以先把農業金融發展之一般的特徵說明一下。我們知道，農業金融和工商業的金融是不同的：農業資金的融通，第一需要長期，第二需要低利；時期長，則投資的危險性大，利息低，則投資的利潤率薄；所以，農業金融在市場上和其他工商業金融爭奪資本的能力根本是非常薄弱的——那些專以牟取厚利爲目的的投資者，對於農業金融常是不屑一顧，因此，農業金融在各種金融部門中就成爲最弱的一環，——當工商業金融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的時候，農業金融還停滯在一個比較幼稚的階段上。這個，各國的情形大都相去不遠。農業銀行既是農業金融的一種，則其發展自亦必較其他各種銀行稍爲落後了。

中國的情形恰是如此。中國第一個自辦的銀行是中國通商銀行，它成立於一八九七年，距今已幾及四十年了。中國首創的農業銀行——通縣農工銀行則始創於一九一五年，距今才有二十年的歷史，較之前者已是落後得遠了。

中國銀行業的發展，過去曾有過兩個蓬勃的時期：其一是民十前後的幾年，正當北京政府濫借濫用的時候，其二便是近幾年來都市銀行業之畸形的發展。因爲這兩次蓬勃發展的原因與結果都很少關及中國的農村經濟，因此，農業銀行在這兩個時期中也就沒有獲得怎樣發展的機會——雖然在近幾年來

農業銀行的設立爲數也不在少，但其發展的動因却在另一方面，它與近年來一般商業銀行的投機發展本質上是不相同的。

然則，中國農業銀行發展的趨勢究竟怎樣，依據我們的觀察，中國農業銀行的發展，應以一九二八年爲一轉變的樞紐。

一九二八以前，中國已有的農業銀行很少，計僅六家。自此以後，因爲環境的需要與政府的注意，於是，江蘇省農民銀行首先誕生了；接着便是浙江省農民銀行組織條例的頒布；接着便是一大批縣立農民銀行的成立；去年，漢口又有四省農民銀行的創設；今年，上海又有農商銀行的成立：凡此種種，皆足以表示：近幾年來，由於環境的惡化與需要的迫切，農業銀行的發展，確是比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前要快得多了。

然而，中國的農業銀行與一般窮困的農民究竟有什麼關係；於中國的農村經濟，究又有何裨益呢？

由於行數的稀少與分佈的限於一隅；由於資本的薄弱與發展的比較落後，中國的農業銀行對於中國的農村經濟以及對於那占據全人口總數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農民羣衆，顯然是不會有着怎樣改進的能力與發生怎樣密切的關係的。

問題可以再深入的分析一下。

第一，我們覺得中國的農業銀行很多是名實不符的。在名義上，它們雖然都是以農工或農民爲重，但

實際上它們既不重農，又不重工，它們有的只在努力於鈔票的發行；有的轉變爲商業銀行，競以公債之投機與地產之買賣爲務；有的甚至聽說在販賣特貨，以遂私利，……窮困的農民，對於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把戲何嘗有一點兒利益可得呢！

第二，農民銀行的設立，在農民沒有得到實惠之前，往往就已加重了農民的負擔了。例如在江蘇，農民銀行的基金是由「畝捐」的附徵而收集的；在浙江，縣農民銀行的資本也是出在田賦附加的身上。前者徵收的方法是「每畝帶徵二角，蘆田一角，」計自十六年開徵以迄二十二年七月，實收數已達二百二十萬元，但尚未及應徵數之四分之一——應徵總額爲一〇，八二九，八〇七．九七元——故此後還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基金，卽八百六十餘萬元的重負要落在那窮而無告的農民的身上。

浙江省各縣農民銀行資本的徵收與此微有不同。它是按照每畝應納稅銀的每元而酌收幾成的。例如：如在一九三三這一年裏，繳納農行附加稅的計有三十三縣，其中出得最少的計每元稅銀出洋四分五厘，普通以出一角七分二厘者最多，計十一縣，出二角五分八者亦不少，計八縣，最多者計有兩縣竟出到四角三分之數，足見此省農民在這方面所受到的負擔亦正不小！現浙省已有的縣農民銀行，如海寧，嘉興，崇德，餘姚，嘉善，……等處，其資本的來源無不取自這種附加稅上。

第三，我們再看：農民銀行怎樣運用它們的資金呢？它們的資金，如果是貸給農民的話，是通過一種什

麼樣的方式而實現的呢？這兒，我們可以把中國的信用合作社約略的檢討一下，因爲目今各地農行貸款給農民的時候，大都是利用信用合作社——合作社實在是農民與農行發生關係的一條橋樑！

然則，信用合作社對於農民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在原則上，誰都承認合作社的功用是很大的；但目前中國各地信用合作社的發展，却還沒有達到完善的境地，因爲，第一，它的歷史太短；第二，除掉河北省在華洋義賑會指導之下的信用合作社是很穩健的一步一步的發展者外，各地信用合作社的發展都過於迅速，缺乏強固的基礎，因此，它們只有量的衆多而無質的完美；第三，各地農民智識淺陋，對於信用合作的眞諦多不易了解，因此，信用合作社就常爲當地的一般土劣所把持所利用，例如：陳賡雅先生在他所著的贛皖湘鄂視察記上曾載有一段江西清江縣縣長的談話說「……華洋義賑會來此放款三萬元，因經鄉下小土劣之上下其手，重利盤剝，結果農民反蒙其害，今春耕牛恐慌，卽由於賣牛償債故也。」又如：在第三年之江蘇省農民銀行一書中，高淳縣分行對於該縣農民「加入或組織合作社之觀念及態度」曾有如下之記載：「……今考合作社數量之發達如此，（高淳合作社總數冠於全省各縣）而農民之保守性如彼，足證非眞正農民所組織，爲少數人所把持，卽或有少數農民在社，亦不過爲彼等之傀儡，做假面具而已……」又如：在拉西曼報告書附件第五種——浙江省經濟及財政之現狀一文中，何，方二先生對於浙江省合作社的批評也有類似如上的敍述。他們以爲：

浙江省合作社的發展，實在太快，有不少場合，合作社幾完全操縱在幾個狡黠之流的手裏，因而，眞正的農民反被他們所愚弄了。總之，我們覺得在這農民教育非常幼稚，在一般貧困的農民還沒有自發的有組織能力的時候，合作社對於那需要合作最殷的貧農往往是不易發生密切的關係的，因而，農民銀行對於一般貧農的關係間接的自然也就非常淡泊了。這是第三點，第四，目今合作社所予農民的實惠也極有限。爲什麼呢？因爲第一，合作社貸給農民的款項，普通都是以六個月或一年爲期，時限太短，對於農業的改進，殊少助力；第二，借款定於信用，借款的多寡，定於信用的優劣，因此，大農可以比小農多得利益，處境最艱的貧農反有告貸無門之苦；第三，社員向合作社借款，普通只能借到二十元上下的樣子，這個數額，這在農村金融異常竭蹶的今日看來，實可謂杯水車薪，於事殊少補益；第四，農民借去的款項，普通都是拿去還借。他們少有機會可以利用合作社的資金去從事生產或改良生產條件，因而，合作社對於農民的關係，除掉在高利貸方面能够把農民所受到的痛苦微微地減輕一點而外，實在是很有限的。

以上，我們已經直接的把信用合作間接的把農民銀行對於農民的關係約略的敍述一過了。現在我們再問：中國的農民銀行對於此後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將會產生怎樣的作用？它是否能够拯救這目前正在急驟的崩潰着的農村經濟於萬一呢？

問題的解答顯然是很複雜的。這兒，我們只能扼要的指出幾點來略予探討而已。

第一，我們覺得中國農業銀行的自身還沒有形成一個完備的系統。它在橫的方面既沒有長期的和中期的貸款機關，在縱的方面又缺乏一個强有力的中心系統，因此，它在業務方面只是承做了一點小額的和短期的貸款，在行政方面，也只能各自爲政，互不相通，對於農業金融之各種各樣的需要顯然是難以並且無從適應的。

第二，我們再問：促使中國農村經濟日趨破敗的因素究竟是什麼？中國農業金融的系統如果一旦很健全的建立起來的話，它是否能够發生很大的作用而促使中國農村經濟於不潰？

答案是在反面。因爲，我們認定：中國農村經濟崩潰的本質不單是一個金融枯竭的問題。它的原因：第一是由於帝國主義者之經濟的榨取，凡原料的收買，洋貨之侵入，手工業之破落等等屬之；第二是由於豪紳，高利貸，軍閥之超經濟的剝削，一切苛捐雜稅重利盤剝，徵發徭役等等皆屬之，此外則尙有天災一項，亦是促使農村經濟之日趨崩潰的主要原因。農村金融的枯竭，雖是農村崩潰的一種悲慘現象，但它不是農村經濟破產的主要因素，因之，農村經濟的復興，顯然也不是農業銀行單獨的力量所能奏效——不管它的組織是怎樣的完美。

我們還可以拿目前一般農民銀行放款的成績來作證明，它們不是時常有很多過期不付和催收或轉期的賬目嗎？這種賬目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有許多是由於當事者的輕於濫放，一方面確也不少是由於

上述的諸種因素在那兒作祟以致農民還款的能力都爲所剝奪了。可知中國的農業銀行，處在這現階段中國國民經濟飽含着半殖民地的特質的時候，其改善農民經濟的能力，縱不薄弱，亦必被減低。

當然，除掉農民銀行以外，中國現在還有好多的商業銀行也正在從事於農業金融的試探，其利弊如何等等自亦不乏可資討論之處，只因篇幅關係，不能在此一一的敍述了。他日有暇，當再爲文論之。

一九三四，九，一日。

五　中國農具改良問題

韓德章

講到目前中國的農村經濟狀況，少不得要說起改進農作技術以增加生產。說起改進農作技術來，又少不得要提起農具的改良。農具改良的必需，是人所共知的，至於農具的如何改良，却很使人有無從措手之感。這裏所討論的就是改良我國農具的途徑同步驟。至於具體機構的改良設計，那又是純技術的另一個問題了。

講起農具的改良，第一先要看看現時固有的舊農具都有些什麼。首先要檢討的是這些農具的種類，用途，構造同使用的方法同工作的效率。我國農具的種類頗爲複雜，大致分析起來，旱田農具與稻作農具可以別爲兩個很明顯的體系。而每體系的農具又各受地方情形的支配，各有差別。現在先就河北省深澤縣的農具作一個鳥瞰，因爲深澤縣的農作情形，雖然不能代表，至少是可以說能近似中國北部旱田農具的一般情形的。

深澤縣的農具常用的都凡六十多種，茲先就用途分列如下：

（一）整地用　犂，鏊子，耙，蓋，大鋤，木榔槌，鐵掀。

（二）佈種用　種什（即耬車），礅子。

(三)中耕用　大鋤，小鋤，鐵耙。

(四)灌漑用　水車，轆轤，柳罐，水梢。

(五)收穫用　小鎬，高鐮，草鐮，割穀鐮。

(六)脫穀用　碌軸，杈子，木掀，木杷，掠子，括板，草掃帚，竹掃帚，淺篩子，抬篩，扇車。

(七)精製用　碾子，磨，小掃帚，馬尾籮，絹籮，淘籮。

(八)儲藏用　囤底，囤圈，甕，甕蓋，排架，簸籮。

(九)運輸用　大車，小車，轂轆子，拖車，大套，小套，堵頭，枚籠。

(十)雜用　抬筐，架筐，糞筐，糞杈子，糞簍子，柴禾筐，竹耙，扁擔，斧子，鋤頭，鍘刀，簸箕。

上列各種農具因為限於篇幅，未能製圖表示，亦未能各作詳細的說明。整地器具裏的重件農具只有犂同㧖子兩種起土的器具，與耙同蓋兩種碎土的器具。比起西洋農具犂耙之各有多種，每種各有一定的用途來，俱形簡陋。鎬及鐵掀為園地必需的人力整地器具。木榔槌為擊散既經犂過耙過而仍不能碎破的黏性土塊的器具，由這種器具的存在，可以認明犂與耙整地工作效率的不足。

從脫穀用的器具裏可以見出為打落高粱或豆子的籽粒，要費如許多件的輕件農具。這顯然是每件的用途太缺乏活動性，而這些件農具代價的總值或者還不到一架新式的脫穀器。由這裏又可以見出農

具用途效率的低微。

現在再看看使用這些農具的時間效率，今假定有如下的生產條件：農田面積二十畝，土壤爲砂質壚土，距農舍一里半，以水車灌漑，用較精密的方法耕種旱穀，則此二十畝旱穀自整地佈種以迄收穫儲藏期間，所需人工畜工及經過日數如下：

	工作性質	人工數	畜工數	日數
一	先一年秋耕	四	八	四
二	冬間運糞至田間	二	六	二
三	雪後揚糞	二	｜	一
四	本年春耕	一二	一二	八
五	預備佈種整地	四	二	二
六	灌漑	一二	一二	六
七	灌漑後再整地	八	一二	八
八	佈種	二	二	二
九	鋤草間苗	四〇	｜	二

項目				
一〇 中耕及鋤草	第一次	一三	—	二
	第二次	七	—	一
一一 灌溉	第一次	一六	一六	八
	第二次	一二	一二	六
	第三次	一二	一二	六
一二 收割，紮捆		九	—	一
一三 運到場上		三	三	一五
一四 掐去穀穗*		一〇	—	五
一五 捆穀楷		二	—	一
一六 壓場，打穀，收藏		八	二	一
共用工數總計		一七六	九九	六七
每畝需用工數		八・八	五	—

*女工二〇工

就上表計算的結果，每畝穀子自整地佈種以迄收穫儲藏，共需人工八・八工，又畜工五工用同樣方

法計算經營一畝地的棉花，要用十四個人工同一個半畜工。這十四個人工可以折算爲一百四十小時，而美國農家生產一華畝的棉花不過只用十八小時，生產一華畝的穀類還要少去三五小時。這其間的效率的差異，多半是由於農具和動力使用的不同。用機器動力固然可以節省勞作的時間，即或人力或畜力的農具倘或在構造上有優良的設計，亦可以增進每單位時間的耕耘面積並減縮耕耘的次數。至於良好的農具在工作的「質」的方面的成績優越，尤其餘事。再從前表裏看看各項工作的時間的分配，可以知道絕大的時間消用在整地中耕及灌溉方面。其中除整地的工作時間性較爲活動外，中耕及灌溉的工作都要在一定的短時間內，迅速的完成。因此在這兩個時期裏農工的代價亦極高。倘使在農具同動力的兩方面各有合理的設計，每單位耕作面積的勞力同成本都可以有很顯著的節省。至少農家的生計困難情形，可以減却幾分嚴重。

農具改良的必要是無須多加解釋的，現在要討論的是農具改良的途徑同步驟。中國農具的改良，可以分爲機具的改良同動力的改良兩條道路。這兩方面都是不可偏廢的。在目前的情形下，農家經濟能力如此單薄，亦許機具的改良較動力的改良更爲切要些。現在舉幾個具體的例來說明農具改良的各方面的線索：

(一)機具的改良　機具的改良，可以別爲舊農具的改造同新農具的採用兩面。在我國舊有的農

具有好多可以在構造上同材料上略加一些新的設計，價值所增無幾而效率大有改進。如中國犂的犂壁無甚彎曲，壢土不能完全翻覆，鏵端尖形，鏵刃不平面着地，所耕的地深溝處不過四五寸，兩旁更淺，而兩壢之間，必遺有魚脊形硬埂一條，耕土底面呈瓦瓴狀。而洋犂則無此等弊病。如犂身木架仍採土製原型，犂壁及鏵刃倣照洋犂鑄造，當能收採洋犁之長普遍能爲農民購用。又如河北通用的耬車播撒籽實的設備仍爲木製且極簡陋，佈種既不能均勻，對於各種大小不等的籽實又難爲有效的控制。這一部分很可以單獨設計用金屬製造，可以裝配在原型的木製車身內，或爲可拆卸換置的零件，且構造不甚複雜，在鄉間的洋鐵工匠卽可以製作。又如舊式的水車，用兩只等齒數的龐大齒輪且關連極鬆，工作既緩，構造又極笨重，如果改用小型的關連緊密的齒輪，正輪齒數較多於副輪，則機身減輕，戽水加速。如保定育德工廠改良的水車，已具此等條件，在隣近各縣行銷頗廣。又如通用的耙只有釘齒的一種，很難對於各種不同情形的土壤各作有效的破碎工作。如果能將耙齒變爲活動裝置，用螺釘裝連耙身，可以任意拆卸或轉動，可以換用數種不同耙齒，則兼有西洋數種 *Cultivator* 與 *Harrow* 之長，代價仍極低廉。或將耙齒由方柱形的截面改爲狹方柱形的截面，則各齒轉過九十度卽可由狹齒與寬齒互換，更爲便利。又如南方常用的打穀桶，如改爲狹長方形，一面可容五六人同時工作，對面幃以布幕以防穀粒的散失，接受穀穗的部位隔以粗鉛絲編製的篾子，以幫助穀粒的易於脫落，總比原式正方形或圓形木桶用竹篾或不用篾子的稻桶，效率要高出

多多。又如南方的水車（又名龍骨車）其木槽中之連板，概與槽底成直角，戽水時流溢損失頗大，致不能起水太高。如連板改用鉛鐵製之水斗，絞鏈裝在斗底，則每節容水量較增，而轉動時殊少溢失，不過稍費一些動力而已。以上所述的幾個例子，都是輕而易舉的。現在需要的是有人對於舊式的農具加以科學的檢討，再細心設計，就原有構造稍加改造，一方面顧及效率的增進，一方面還要顧及構造簡單，成本低廉，以使農民易於採購和倣製。

新機具的採用為農具改良的第二步。西洋的犂或耙，為各種不同的用途，都各有特殊的設計。有好多可以倣製採用的。如圓盤耙（*Disc Harrow*）構造極其簡單，而破碎土塊的能力很好，殊有推行的必要。近年以來，國內新農具的製造事業，很有相當的發展，可認為一種新的工業，如常州厚生機器廠，上海中華新農具推行所等，都有各種新式的農具出品，其中以內燃發動機及應用機器動力的灌溉器行銷最廣。其他關於農產精製的機具亦各有獨到的成績。如中華新農具推行所製造的剝玉米器，形體輕便，代價亦廉，每小時可剝下玉米粒六百餘斤。又如該所製造之打稻機，用脚踏動，費力極微，雖婦女小孩均能使用，每人每日可打稻五六畝。這都是農民的福音。而近來農民自己對於新農具亦漸有相當的認識，且有專心銳意自行研究創造新式農具的。二十二年七月武漢日報載，江西新建縣縣民鄧克成發明割稻機及插秧機，每機只須一人，前者每日可割稻十五畝，後者可插秧三十畝。又同年八月杭州民國日報載，嘉興農民郭楚賢，發

明播穀機業經建廳試驗結果滿意，已獲得雙穗牌商標之專利權云。這都是很可喜慶的消息。目下新農具推廣的工作似應由各方面分別努力，由農事推廣機關實地表證新式農具的效率，並向農民指導新農具的使用，由政府切實對於新式農具的做造者及發明者予以相當的獎勵，由鄉村學校授與學生農具學應有的知識，以期對於新農具有所認識，對於舊農具有所改良。

（二）動力的改良，農用動力除人工外即係牲畜動力及機械動力，二者各有獨具的長短。牲畜動力的長處，係對於各種工作及地點，俱能隨意裝配，且成本低廉；其短處則係工作能力有限，且即不工作亦需一定量數的燃料（飼料）。機械動力的長處在能力宏大，通常農用動力機可大至二三十匹馬力，在不工作時則完全不消耗燃料；其短處則係設備費用昂貴，工作性質有一定限制，且管理需要相當的技術與學識。我國對於農具所採用的動力應因地制宜，牲畜動力及機械動力分別採用。在內地交通不便，機械動力燃料缺乏的地方，牲畜動力是要充分利用的。昔日用人力的工作，要改用牲畜，昔日略用畜力的，現在要盡量駛役。如河北省的耬車在沿平漢線一帶較為通用，沿北寧線則較為希罕。用耬車的地方，一個人把着耬車，用一兩隻牲畜牽引，另一人在後邊𧾷平隴溝；不用耬車的地方，佈種時則須一人牽𥣤子，一人把着𥣤子，另一人用手撒種，一人平土，一人碾溝。這其間人工省費的差異在事實上並沒有經濟的背景，而係習慣使然，當然有推行畜力的耬車的必要。又如舊有的犂，只是耕單隴的，用一隻黃牛拖曳，在農場資本及田塊面積

等情形許可之下，儘可改用駢犂（multipl: plough）用兩三隻騾馬拖曳。其他整地中耕灌溉等工作，亦都要用種種新的設計，取畜力代替人工。在美國沒有普及農用機械動力以前有一種轉變動力的機關，稱為（Hore Gear）的，係用騾馬的牽曳，由桿軸齒輪飛輪等設備，產生高速度的旋轉動作，為打穀，脫粒，磨粉，切草等工作的力源。這種落伍的機具，在現代的我國農場仍有相當的時髦性，是值得採用的。

機械動力在我國目下已有地方很快的採用，耕種用的機械動力為裝內燃發動機的拖車，在「東北」及西北大農作的農場經營頗收實效。綏遠薩縣新農試驗場試用十五至三十四馬力的拖車一架，帶三行犂，每日可耕地五十六畝，每日消耗油料十五元或每頃二十三元。又十至二十四馬力拖車一架帶二行犂，每日可耕地四十畝，每日消耗油料十元或每頃二十五元。如用人力則一人兩牛每日可耕三畝，工食飼料等估值約一元。機械力耕田代價已較人力為省，且耕土較深而工作迅速。灌溉用的機械動力在東南各省頗為流行，計有內燃發動機及電機兩種。如採用機力戽水最早的常州，西北各鄉多用煤油發動機，已較人力戽水費省，又確實可靠。東南各鄉則特有戚墅堰震華電廠（現改為建設委員會戚墅堰電廠）的供給電力，多用電機戽水。其費用更廉。如每畝戽水至敷足用，每年約耗費電力十基羅瓦特小時，每年每畝代價不過大洋六角，如用人工，農忙時每工即須大洋五角，遠不及電力經濟。即畜養耕牛以備戽水的人家，雖在天雨時亦難省去每頭耕牛的一角錢的飼料費，更無怪乎電機戽水的風行一時了。

常州戚墅堰震華電廠推行電力戽水始於民國十三年，試辦後成績卓著，各地聞風競相倣效，民國十五年蘇州電氣廠在滸墅關望亭一帶推行電力戽水，民國十七年吳興電氣公司在湖州北鄉與埠橋一帶推行電力戽水，都各有相當的成績，而駕凌各該電廠成績以上的則爲福州電氣公司，該公司分設農村電化部，除推行電力戽水外，並進一步爲農村經濟的改善及一般農業推廣工作，其造福農民，尤非淺鮮。除耕種灌溉外，如脫穀，碾米，軋棉，榨油等工作，在目前亦漸漸採用機械動力。中華新農具推行所曾有很合理的設計，用一只柴油或拉沙油發動機，配置農民機器多種，可以在一年裏川流不息的作種種獲利的工作，不致因呆閒而徒耗折舊的損失。

綜上所舉的事實，可以認爲今後農具的改良，應同時走上下列幾條道路：（一）都市附近或有水力發電的所在，可儘量利用電力。（二）內地可以經營大農作的所在，可儘量利用內燃發動機。（三）不能採用機械動力的地方，牲畜動力仍須提倡，且更進一步推廣役畜的飼養，並改良役畜的品種。（四）舊式農具之不得已必須留的，須加以種種學理上的改良，並指導農民合理化的使用。（五）努力於國產新式農具及農用發動機的製造，並研究國產之代用燃料（如酒精木炭等）如何應用於農用發動機。

使用改良農具用機械動力可以減少勞力勞動時間及生產費用，可以增加農產量並間接的改良農產品質，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但就中國目前的經濟情況之下，如何推行改良的農具以增加生產，其中

不無困難的問題，現時新農具的使用已在萌芽，但其前途的發展如何，殊難蠡測，現在大多數的農民都是過着次小農經濟的生活農場面積是這樣的小，田塊是這樣的零割。殊有碍於新式農具的有利的使用。因為土地私有，耕地缺乏，以至土地資本佔農場資本的絕大成分，使農民無力投資於農具設備，更遑論新農具及機械發動機的購置！此外又因為小農的破產釀成農村人口過剩，結果工資低廉，亦足以阻止農民對於新式農具的歡迎及採用。這目前的難關怎樣打破呢？亦許新農具的製造要站在國家社會主義的立場上，由政府出資經營。改良後的農具由政府以低廉的代價供給農民，並由農民銀行以最低利率貸與農民以農具資本，同時積極提倡農田合作經營或其他集團生產的形式，並振興農村工業同時顧及農村工業同都市工業的分野與提攜，這樣，或者農村經濟的前途還有一些曙光吧？

一九三四，三，三十一日。

六　一九三三年的中國農業災荒

陳暉

在中國長遠的歷史中，災荒的問題常是很嚴重的，歷來朝代的興衰更迭，雖有其他的原因在，然而對於災荒的防禦或助長，實不能不算是主要因素之一。據馬羅里（*Mallory*）的報告，中國在紀元前一〇八年起，至紀元後一九一一年止，發生過一八二八次災荒（包括水，旱，風，霜，蟲等）；換句話說每一年中國的十八省內，總有一省以上鬧着災荒的。尤其是在最近五年中，中國各省的災荒，頻頻暴發，年甚一年。就其種類而言，則有水旱，螟蝗，風霜，冰雹等等；就其範圍而言，則遍及二十五省之廣大。據賑務委員會的調查報告，一九二八年，全國被災的縣數二百有三，災民四千餘萬人。一九二九年，全國被災的縣數驟增至八百四十一縣，佔全國縣數百分之四十三強。一九三〇年，全國被災的縣數爲八百三十縣，災民幾達五千萬。一九三一年，大水爲災，洪流遍及十八省之多，面積約四十餘萬方里。災情最慘重的是長江下游各省。只就安徽、湖南、河南、江蘇、江西、湖北、和浙江七省而言，據賑務委員會的調查報告，被災面積爲三十一萬八千餘平方公里，被災人口爲四千三百餘萬人，財產損失爲十五萬七千餘萬元，農田被淹爲一萬二千七百餘萬畝。災害的慘烈，由此可以想見。一九三二年，就全國的範圍說來，在最近五年中，可說是災荒較輕的一年。然而吉林，黑龍江，山西和雲南等省的水災，陝西積年的水、旱、風、雹、黑霜各災，河北的各河決口，江西的先水後旱，災荒

亦及於七省之多，其中災情最重的爲吉林、黑龍江、山西和陝西四省。吉黑松花江氾濫成災，據南滿鐵道會社的調查報告，該兩省耕地全面積之八成完全爲大水所淹沒。農產物所受的損失，佔往年總收穫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山西受水災的縣份爲六十八縣，陝西所受冰雹，風，旱各災的縣份，則有九十餘縣，損失都沒有統計。至於一九三三年的災荒，其災區的廣大，災情的慘烈，雖沒有如一九三一年大水災的震動全國，然究其災害的實況，比起一九三一年的大水災來，實是更加嚴重！

本文在分析一九三三年的中國農業災害的問題時，所根據的材料爲全國十餘種最主要的日報，四川月報，各省省政府公報和中央統計處編的政治成績統計等刊物的報告。自信材料尚屬正確詳密，不過因材料複雜紛繁，掛一漏萬之處，仍屬不免。茲爲敍述的便利起見，把中國的災荒按省分述。

最先我們來考察中國的北部，即黃河流域的災況。在一九三三年度中全國受災最慘烈的地方，就是沿黃河流域等省份，即青海、甘肅、寧夏、綏遠、陝西、山西、山東、河北和河南等省。

在黃河流域各省的災荒中，最駭人聽聞的是黃河的大水災。不過各省遭受災荒最廣且最重的是陝西，所以我們可先來考察陝西的災況。

陝西十餘年來，無時無地不在兵災饑饉之中，尤其是自民國十七年以來，災禍頻仍，年甚一年，水、旱、雹、鼠、蟲、蝗、黑霜，無不爲災，而以旱災最重。自去冬至今雨雪復缺，災情益趨嚴重，入夏以後，復霜雹爲災，被災者

達六七十縣，（二十二年八月十六日中央日報）鄉區田畝，荒蕪殆盡。至此，災民所恃者全賴秋收，以維生命。乃邇來竟連續大雨，以致山洪暴發，大小河流，氾濫成災。全省遭受水災縣份據監察委員邵鴻基的視察報告，共有五十餘縣。「查趙邑、平民、韓城、府谷、潼關等五縣，均係黃河氾濫，倒灌人畜田廬，均被淹沒，災情極重。又大荔、寶鷄、隴縣、岐山、扶風、武功、奥平、鳳翔、鳳縣、涇陽、郿縣、馬陵、富平、三原、長安、邠縣、長武、淳化、盩厔、鄠縣、平利、柞水、華陰、華縣、渭南、臨潼等二十九縣，或係渭洛各河漫溢，或山洪暴發，人畜房屋田禾，被淹成災極重……亢旱之後，繼以大雨，平地水深數尺，全省五十餘縣，復遭水患……」（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中央日報）又據賑務委員會的報告，陝西旱災計蒲城等十四縣，霜災計三原等三十一縣，風災計城固等三十八縣，雹災計華陰等四十四縣，水災計華陰等四十四縣，疫災武功一縣，鼠災白水一縣，可謂全省無縣無災。這是就陝西本年的災荒種類與範圍而言，至其災情的慘烈，實非意想所能及，田畝固已荒毀殆盡，赤地千里無人烟，災民遷徙流離，餓殍遍野，甚至田地五角一畝，妙齡女鬻銀一二元，苦無受主，言之令人酸鼻。

河北省本年的災荒亦很厲害，災情的慘烈只稍讓於陝西。蝗蝻積聚成災，幾遍全省。境內所有各河流如黃河，大清河，薊河，箭桿河，永定河，冀城河，滅河，滹沱河等都先後潰決，釀成巨災，洪水橫流，淹地數萬方里。

大清河於六月二十四日下午在新蓋房村舊決口處衝決，被災縣份為雄縣，新城等縣。滄縣南運河於六月二十六日夜潰決，淹沒數十村。隆平縣山洪暴發，濁浪漫溢，田畝悉被淹沒，秋收完全絕望。箭河於六月

二十二日決口，被淹禾麥當在三四百頃以上。武清縣北運河泛濫，村莊被淹之數，總計在四五十村，禾苗多被冲沒或淹毀，秋收多無希望，（二十年七月三日中央日報）蠡縣唐河泛濫，汪洋一片，不但把所留麥田淹毀，即高盈尺的秋苗，亦俱隨水東去，秋收絕望。（二十二年七月三日天津益世報）薊河氾濫，災及玉田、薊縣，只玉田一縣水淹五十餘里，二百四十餘村，田畝二千五百餘頃。（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大公報）津北寶坻縣，今春亢旱，田園荒蕪，入夏以來，霪雨連綿，加以山洪暴發，各河水勢驟漲，遂致先後潰決，氾濫成災，淹沒五百餘村莊。（二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天津益世報）滄縣減河決口，農作物盡付東流。（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庸報）獻縣滹沱河泛濫，淹沒四十八村。（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大公報）保定縣在五月間山洪暴發，春麥盡被淹沒，繼而蝗蟲鋪天蓋地飛來，秋禾損失已甚，蝗未捕滅，蝻子發生，後復霪雨連綿，瀦龍、大清、滹沱、等河均行漲溢，奪堤四潰，東南百數十村莊，盡成澤國，秋禾悉遭滅頂，秋收無望。（二十一年八月一日大公報）南運河河水於七月二十八日猛漲後，先後決口五六處，青縣有十餘村被淹，同時北城河亦漲七八尺，官莊城河亦潰決，在西城河之間，約有三千六百頃稻田，已完全被淹沒，霸縣河隄亦潰決，淹田在千頃以上，文安縣勝芳鎮一帶，將完全被淹，武清縣境北運河昨又潰決一處，被淹田畝無算。（二十二年八月一日華北日報）津縣境雙口鎮，曾於日前被永定河一度潰決，被淹田禾共計三百餘頃。（二十二年八月一日庸報）本年八月間黃河水氾濫，災及蘇豫魯冀四省，而河北省長垣、東明、濮陽三縣受災最重，為近百年來所未見。長垣東明兩縣，全境十之八九，濮陽縣境三分之

二，盡成澤國，具體的說來，總計被淹面積九千四百餘方里，即約一千二百四十餘村莊，災民六十一萬九千人，財產損失三千五百二十七萬元，田地損失五萬一千頃。（二十二年九月九日天津益世報）武淸縣，樂亭縣，天津縣等則因海河放淤成災，被淹農田達數千頃之多，平均水勢最深處達五六尺，最淺處亦有二三尺。據河北省政府向全國賑務委員會的報告，總計全省遭受水災縣份有肅寧，武淸等二十五縣。

又河北省境各縣，歷年遭受蝗災極重，去年受災計有五十八縣之多，今年雖較爲和緩，然災勢仍很慘烈。據華北各報所載各地通訊，本年河北遭受蝗災縣份，總計有滄縣、定海、靜海、肅寧、永年等四十一縣，殃及田地數萬頃，其中災情以冀南大名安新等縣最重，蝗蝻遍野，飛則蔽天，落則蓋地，噬食田禾，俄頃即盡，秋收無望，農民生機完全斷絕。其他慘遭旱災雹災的縣份，計有唐縣、武邑、柏鄉、行唐、無極等縣。

山東省本年遭受黃災極重，省境西部二十餘縣，盡成澤國，災情以鉅野、曹縣、荷澤等縣最爲慘烈。據災區各縣呈報民廳表册，魯西水災區域受災詳情如下：

山東被水災各縣災情狀況調查總表

縣名	被災地畝數	被災村莊總數	災民總數	財產損失情形及概數
荷澤	一萬一千頃	一千二百村莊	約三十萬口	約三千萬元
魚台	一千六百餘頃	一百六十七村莊	約三萬五千餘口	約三十萬元

城武	四千一百餘頃	三百三十村莊	約六萬餘口	約一百八十萬元
東平	三十五萬餘畝	三百四十二村莊	約十萬五千餘口	約二百四十餘萬元
濮縣	東西二十餘里 南北三十餘里	三百九十八村莊	約八萬九千餘口	約二百三十餘萬元
長清	二百五十餘頃	七十餘村莊	約二萬三千餘口	約二十餘萬元
陽穀	九百餘頃	三百六十餘村莊	約四萬餘口	約一百三十餘萬元
金鄉	九百七十餘頃	二百五十餘村莊	約二萬七千餘口	約五十餘萬元
曹縣	六千七百餘頃	一千一百三十四村	約十七萬六千餘口	約二百九十餘萬元
定陶	五百三十餘頃	一百零四村莊	約二萬餘口	約二十餘萬元
東阿	二千四百餘頃	二百十餘村莊	約七萬八千餘口	約五十餘萬元
鄆城	一千三百餘頃	二百十餘村莊	約一萬八千餘口	約百萬元以上
肥城	六萬八千餘畝	四十七村莊	約三萬餘口	約七十餘萬元
單縣	二十五萬餘畝	二百二三十村莊	約七萬餘口	約八十萬元
鉅野	六千餘頃	四百餘村莊	約十二萬餘口	約二百萬元
壽張	三千餘頃	三百八十餘村莊	約十萬六千餘口	約六百餘萬元

范縣	三千餘頃	三百餘村莊	約九萬餘口	約四百五十餘萬元
鄆城	四千五百餘頃	三百餘村莊	約五萬八千餘口	約三百十五餘萬元
利津	三萬九千餘畝	一百五十餘村莊	約一萬八千餘口	約二萬餘元
濟寧	三千八百餘頃	二百九十餘村莊	約七萬一千餘口	約七萬九千餘元
汶上	一千四百五十餘頃	一百二十餘村莊	約二萬五千餘口	約六萬餘元
嘉祥	三千餘頃	二百零三村莊	約九萬五千口	約一百二十萬元

（此表除定陶嘉祥二縣係根據二十二年十月三日大公報數字外，餘皆根據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北平晨報數字）

其次，山東省亦有數縣發生蝗災，據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世界日報的各地通信，慘遭蝗災的計有榮成，青城，邱縣，高苑等四縣。

河南省本年所受的災荒實比往年的嚴重得多，特別是黃河的大水災，被嘆爲八十年來未有的巨災。據全國賑務委員會的報告，河南本年所受災荒的種類，計有風，雹，旱，霜，蝗，水等六種，災區幾遍全省。計受旱災的縣份有鄧縣，方城，登封，靈寶，閿鄉，洛寧，確山，羅山，太康，孟津，襄城，陝縣，許昌，嘉縣，溫縣，禹縣，沁陽，新安，祕縣，滎陽，臨汝，伊陽，潢川，先山，固始，信陽，陽武等二十七縣，受蝗災縣份有陝縣，嘉縣，延津，滑縣，汲縣，臨汝，沁陽，閿鄉，嵩縣，孟津，孟縣，寶豐，新鄉，洛寧，西平，濟源，臨安，內鄉，鞏縣，廣武，溫縣，輝縣，原武，淇縣，夏邑，伊陽，陽武等二

十七縣；受風災縣份有信陽，閿鄉，靈寶，澠池，陝縣，盧氏，鎮平，新鄉，等八縣；受雹災的縣份有臨汝，陽武，新野，內黃，寶豐，禹縣，沁陽，洛寧，盧氏，中牟，靈寶，許昌，開封，葉縣，襄城，嵩縣，濟源，內鄉，南陽，涉縣，洛源等二十二縣，受霜災的縣份有靈寶，閿鄉，陝縣，鎮平，新鄉，等五縣；受水災的縣份有林縣，西平，安陽，考城，葉縣，莎縣，密縣，淅川，臨汝，內黃，鄧縣，方城，夏邑，鹿邑，寧陵，永城，商水，淮陽，上蔡，光山，汜水，魯山，廣武，中牟等二十四縣。上述水災部份，八月份的黃河水災，尚不在內，下文當詳述。（以上材料係根據二十二年九月二日，十月十四日，十二月九日中央日報）本年夏季黃河水勢過大，為數十年來所未有，加以河身淤高，堤壩殘缺，遂致釀成巨災，殃及冀魯豫等省。河南受災甚為慘重，所有濱河各縣，幾於無縣無災，總計被災縣分有二十二縣之多。就中滑縣被災最重，考城次之，溫縣又次之，蘭封又次之，此外封邱，孟津，武陟，孟縣，鞏縣，汜水，廣武，原武，虞城，鄭縣，開封，靈寶，濟源，澠池，中牟，陳留，沁陽等縣較輕。據黃河水災救濟會河南查放處調查各縣被災詳情，統計水災面積共一萬二千五百零一方里，淹沒房屋五十四萬五千九百二十七間，被災人口達八十萬四千九百五十四口。（二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央日報）據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大公報的開封專電稱，河南又以漳河決口聞了。

山西本年的災情雖沒有上述各省慘重，但災區是非常之廣的。在春夏兩季期間，初以風霜肆虐，繼以蟲雹成災，迨至夏秋之交，陰雨連綿，山洪暴發，黃汾昌源烏馬等河，相繼潰決，洪水橫流，釀成空前奇災。據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天津益世報所載，山西南北多半縣份，十日均降冰雹，大者有如碗，田禾打毀甚重，為數

十年來未有之大冰災。又據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時事新報所載，山西一月以來，天雨連綿不斷，並雜以冰雹，汾河河水猛漲，昨已在老軍營處決口。沿河村莊，悉被淹沒，其災情之慘重，已駕去年而上之。又據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天津益世報的太原通訊，各縣向省府報災請賑者，紛至沓來，截至現在止，據報被災者，計已有陽曲等七十七縣，其中最重者，為陽曲，太原，太谷，徐溝，文水，汾陽，平遙，介休，孝義，長治，晉城，永濟，臨晉，榮河，河津，靈石等十六縣，統計被災鄉鎮已達一千二百四十村，淹沒田禾竟有九十萬畝以上。其次為榆次，祁縣，清源，交城，興縣，臨縣，離石，長子，壺關，高平，武鄉，洪洞，猗氏，苗城，稷縣，大同，渾源，應縣，五寨，代縣，繁峙，保德，河曲，新絳等二十四縣，統計被災村鎮，達四百七十村，淹沒田達三十九萬八千餘畝。再次為岢嵐，嵐縣，方山，潞城，黎城，陵川，和順，沁縣，沁源，壽陽，臨汾，翼城，鄉寧，虞鄉，萬泉，解縣，夏縣，霍縣，汾西，隰縣，大寧，懷仁，靈邱，忻縣，定襄，朔縣，右玉等二十七縣，統計被災鄉鎮達一百二十二村，淹沒田禾達兩萬餘畝。其餘正在查勘尚未呈報者，計有山陰等十縣，其中以沿黃河各縣的災情算是最重的。

甘肅連年災禍頻仍，一年比一年慘重，特別是在本年度，災荒幾遍全省。計甘肅所轄縣府，只有六十五縣，而受災的縣份，竟達五十餘縣之多。今年三四月間，禾苗正長的時候，天氣亢旱不雨，田園已呈乾枯之象。其後則又迭降冰雹，禾苗盡被打毀，災情之重，已達極點。詎料又繼以狂風暴雨，山洪暴發，河水泛濫，釀成空前奇災。據全國賑務委員會呈行政院呈文所載，計自本年一月份至十月份止，甘肅所受災況如下：受地震

縣份有酒泉等七縣，受旱災縣份有涇川等十三縣，受風災縣份有臯蘭等三縣，受雹災縣份有鼎新等四十一縣，受水災縣份有武都等三十一縣，受霜災縣份有靈台等五縣，受蟲災縣份有鎮原等三縣，受疫災縣分，則有靈台一縣。（二十二年十一月八日大公報）又據二十三年二月八日申報所載甘肅在二十二年份受水災的縣份，實達四十餘縣。

綏遠本年水災極爲慘重。自入夏以來，霪雨連綿，山洪暴發，河水洶湧澎湃，衝毀河堤渠道，泛濫三四百里。計薩拉齊，托克托，包頭，五原，臨河，東勝，涼城，被災縣分已過全省縣數之半。年來穀賤傷農，鄉村對於存糧絕不出售，故皆蓄藏甚富，此番水災，不特本年秋收完全無望，即舊日蓄藏，亦一併被淹沒，隨波流去，災情之重，歷所未有。（二十二年九月九日大公報）據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大公報所載，磴口縣黃河於三月十八日決口，淹沒二百餘里。又據十一月十日大公報平地泉通信，集寧縣本年歷遭冰雹，水各災，不過災情較輕罷了。

青海和寧夏兩省本年亦有多縣遭受災荒。據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中央日報所載，青海本年遭受水災縣份，計有西寧，湟源，樂都，大通，互助，民和，貴德，循化，同仁，化隆，共和等十一縣；雹災縣份有西寧，湟源，互助，樂都，民和，化隆等六縣；旱災縣份有西寧和樂都二縣。又據二十二年十一月八日大公報所載，寧夏本年遭受雹災縣份計有中衛等六縣，水災縣份有中衛等五縣，察哈爾亦有一二縣遭受雹災。其餘東北四省的災荒，則因自日帝國主義操縱下的僞國成立之後，消息隔斷，這裏無從敘述，只好付諸缺如了。

其次，在中國中部方面，卽長江流域各省，如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蘇，浙江等省，本年度的農業災荒，亦極嚴重，尤以湖南災荒最爲慘烈。

四川本年歷遭雹，蝗，水，旱各災，其中以旱災最重。自入夏以後川東南各縣，卽大半遭受雹災。據重慶中國銀行出版的四川月報第二卷第五，六期所載，四川罹雹災的縣份，計有仁壽，隆昌，綦江，古藺，鄰水，富順，古宋，江安，宜賓，瀘縣，石柱，萬縣，大竹，高縣等十四縣，總計各縣罹災面積，廣袤達數千里，損失之鉅，爲空前所未有。（參閱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中央日報）璧山縣螟蝗爲災，禾苗盡被嚙毀。安縣因連日大雨，山洪暴發，毀損田禾無數。遭受旱災的縣份則有南充，岳池，廣安，渠縣，銅梁，江安，隆昌，資中，內江，綦江，南川，巴縣，酆都，涪陵，開江，鄰水，大竹，古藺，開縣，榮縣，永川，瀘縣，酉陽，廣安，忠縣，石柱，蓬溪，什邡，璧山，江北，犍爲，合川，萬縣，梁山，墊江，黔江，彰縣，秀山等三十八縣，災情重者均顆粒未收，災情輕者，亦告歉收。（四川月報第三卷第二三四期）又當二劉內鬨時，在灌縣決堰守禦，致沿河十餘縣，釀成二十年來未有的大水災。據該報三卷四期所載，此次災區上自松茂道間六疊溪沙灣起，下至灌崇郫溫雙新各縣止，縱橫氾濫，約一千餘里。總計漂沒人口，爲數在二萬以上，冲毀農田，不下五萬畝。又三卷五期所載，四川屯殖區松，理，茂，懋，汶五縣境內，都歷遭地震，山崩和水災，損失不計其數。

湖北省西北各縣，如房縣，隨縣，鄖縣，均縣，鄖西，竹谿，竹山，巴東等縣，前年卽遭嚴重的冬荒，轉瞬春饉又

至，民食告罄，因此有些縣份竟發生人食人肉的慘象。（二十二年一月十九——二十一日武漢日報）迨入夏以後，各地霪雨不止，山洪暴發，河水氾濫，洪流所至，廬舍為墟。據全國賑務委員會報告，本年湖北全省遭受水災縣份，計有武昌，石首，沔陽，嘉魚，監利，黃岡，襄陽，黃梅，漢陽，枝江，江陵，黃陂，來鳳，孝感，當陽，長陽，廣濟，蘄春，咸豐，麻城，公安，竹山，咸寧，荊門，漢川，陽新，蒲圻等二十七縣，其中災情較重者為蘄春，長陽和嘉魚等縣。（二十二年九月二日和十月十四日中央日報）興山縣遭受雹災頗重，鄖西和應山等縣則告旱荒。

湖南本年災荒亦甚慘重，可與華北的陝西相比擬，全省七十六縣，可說無縣無災。據五月三十日大公報的長沙通信所載：自入夏以來，此間氣候變幻靡常，忽而天放晴光，忽而大雨傾盆，寒暖不常，為近十年來所僅見。颶風冰雹相繼成災。邇來霪雨連綿不息，湘江水勢暴漲，衡州和衡山兩縣，首告水災。洪水橫流，田廬盡淹，災情綦重，損失極鉅。又據水災委員會統計，此次濱湖各縣被災，潰決隄垸，計有常德，沅江，漢壽，澧州，湘陰，華容，益陽，岳州等處，共二百十四垸，安鄉潰決數垸，尚不在內。先後報災縣份，已有衡陽，衡山，湘潭，湘鄉，邵陽，新化，會同，通道，石門，臨澧，慈利，長沙，瀏陽，常德，岳陽，澧縣，安鄉，華容，南縣，沅江，漢壽，益陽，桃源，湘陰等二十四縣。邇後復因長江西水大發，倒灌洞庭，水勢無法宣洩，遂增淹至三十餘縣之多。災區之廣，損失之大，較民國二十年的大水災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二十年七月二日和八日中央日報）據本年九月份的中央統計處編的政治成績統計報告，湖南本年水災的縣份，達四十二縣。

湖南濱湖縣份固已全數慘遭水災，而省境西南各縣，則多被旱，損傷禾苗極鉅。據民政廳呈報內政部中央賑務會呈文本年湖南遭受旱災縣份計有麻陽，漵浦，瀘溪，新寧，零陵，武岡，古文，保靖，華容，慈利，會同，邵陽，湘鄉，城步，酃縣，水明，新田，茶陵，靖縣，東安，江華，嘉禾，道縣，大庸，郴縣，藍山，綏寧，晃縣，汝城，常寧，黔陽，芷江，龍山等三十二縣，幾佔全省面積之半，非赤地千里，顆粒無收，即大部受害，少有收穫。且各該縣，或則曾受水患，或則曾被雹災，災上加災，形極慘烈。（二十二年十月六日大公報）又據十月份中央統計處政治成績統計報告，湖南本年有六縣遭受雹災，有二縣慘罹蝗災。

安徽省本年入春以來，始以山洪暴發，繼以江水泛濫，災象極烈，後復發生蝗災，蔓延二十餘縣，綜合各報地方通信及賑災委員會報告，去年安徽罹蝗災的縣份，為歙縣，鳳陽，渦陽，來安，全椒，滁縣，天長，泗縣，舒城，合肥，廬江，當塗，懷寧，盱眙，定遠，和縣，繁昌，懷遠，蒙城，靈壁，鳳台，宿縣，鳳陌，五河等二十四縣，災情最重者為合肥，來安，全椒，五河，盱眙，定遠等縣。

皖北皖東一帶如鳳陽，懷遠，霍邱，蒙城，東流，歙縣，鳳台，婺源，靈壁，宿縣等十餘縣，則遭風雹，有的縣份，其慘烈竟為百年來所未有。

其因山洪暴發，河水氾濫而成災者，計有銅山，潛山，太湖，懷寧，天長，和縣，望江，東流，桐城，至德，銅陵，繁昌，蕪湖，壽縣，阜陽，歙縣，無為，等十七縣。若據賑務委員會報告，安徽本年遭受水災縣份，則有二十縣之多。（二

十二年十一月七日大公報）又據本年十月份中央統計處編的政治成績統計，安徽還有十四縣遭受旱災。

江蘇自今春四月間，淮陰，沭陽，漣水，泗陽等縣即首告蝗災及後愈演愈烈，竟至蔓延數十縣。據江蘇省政府報告先後報罹蝗災的縣份已有高郵，寶應，淮安，鹽城，阜寧，東台，溧水，揚中，淮陰，灌雲，東海，沭陽，贛榆，泗陽，宿遷，漣水，興化，江浦，鎮江等十九縣，中以灌雲，東海，鹽城等縣災情最重。（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和七月十九—二十日大公報）揚州，無錫等縣，則因久旱不雨，溝澮河水乾涸，田土莫不龜裂，稻禾盡皆枯萎，秋收絕望。

本年八月間黃河大水災，亦殃及蘇北各縣。據二十二年九月八日天津益世報所載，黃河洪流於八月十八日由大沙河直向豐縣，沛縣，蕭縣和碭山縣灌入，（參閱八月十八日北平晨報徐州專電）水頭高丈餘，寬約數百里，兩岸田廬悉被淹沒。又據五月二十五日大公報所載，宿縣睢溪口大水泛濫，大野綠疇，悉入水底，麥收已告絕望。又據九月八日，二十一日和十月十六日申報所載，南通，南匯，啓東，崇明，和寶山等縣，都因海塘潰決成災，災區面積達數千方里，田禾廬舍悉被淹沒無餘。又據賑務委員會報告和上海各報所載，本年江蘇遭受風災縣份，計有崇明，寶山，川沙，南匯，啓東，太倉，南通，和海門等八縣。

浙江本年災荒，比江蘇還要嚴重。據杭州民國日報和上海申報所載，本年在春夏之交，浙江各縣即紛告蝗災，綜計有義烏，蕭山，紹興，餘杭，餘姚，東陽，富陽，杭縣，海寧，上虞，長興，吳興，崇德，嵊縣，嘉興，海鹽，雲和，新昌，宜興，於潛等二十縣。其中有數縣，如吳興，宜興，新昌，於潛，嘉興，海鹽，雲和七縣，兼罹旱災或水災，災情極重，秋

收全告絕望。只罹旱災的縣份，則有安吉，玉環二縣。最慘重的災荒，要算是水災。浙東各縣多山少湖，故自霪雨後，蘭谿，金華，諸暨，蕭山一帶，均次第告水災。其他富陽，桐廬，分水，雲和，建德，新昌，淳安，湯溪，龍游，上虞，開化，景寧，宣平，慶元，龍泉等十五縣，則非受山洪之暴發，卽遭江水氾濫，田畝多被冲毀，災情頗爲慘烈。又據十月份中央統計處編的政治成績統計，本年浙江還有七縣遭受風災。

江西省因霪雨連綿不已，山洪暴發，省境撫，饒，信各河同時暴漲，下游各縣如南昌，九江，鄱陽，湖口，樟樹，永修，德安，萬載等縣，均已淹沒多處，尤以永修潰決最大，全縣盡成澤國。據全國賑務委員會的報告和各報的地方通訊所載，綜計此次江西遭受水災縣份，計有南昌，永修，德安，湖口，安義，屋子，高安，上高，進賢，彭澤，鄱陽，瑞昌，新建，餘干，宜豐，都昌，九江，樟樹，萬載等十九縣。

最後，在中國南部方面，卽粵江流域各省，如貴州，雲南，廣西，廣東，福建等省，本年亦都有被災的消息傳來。不過這些省份的災情，若拿來和華北華中相較，實要算是最輕的了。

貴州省本年的災荒頗爲慘重，水，旱，雹，風相繼成災。據二十二年九月二日中央日報所載，自本年一月至八月止，貴州省向中央賑務委員會報災的縣份已有數十縣之多。計受水災的縣份，有鳳崗，湄潭，桐梓，桐動等四縣；受旱災的縣份，有大定，織金，威甯，畢節，黔西，郎岱，安南，普安，興仁，關嶺，盤縣，再亭，水城等十三縣；受風雹之災的縣份有婺川，都司，息烽等三縣。

至入夏以後，黔東黔北霪雨不止，致山洪暴發，洪水橫流，遵義，桐梓，湄潭，鳳泉，松桃，江口，思南，省溪沿河，印江，婺川，等縣，都慘遭淹沒，災情極其慘烈。又據十一月份中央賑務委員會的報告，貴州本年患旱災的縣份，還有赤水，仁懷，郎江，桐梓，永從，石阡，普定，鎭寧，后坪，婺川等十縣；患雹災的縣份，還有鎭寧，盟縣，丹江，都勻，甕安，默西，遵義，德江沿河，湄潭，間瑒，水城，咸寧，大定，清鎭等十五縣；患水災的縣份，也還有三合，永從，下江，織金，紫雲等五縣。

雲南省本年雖亦罹風，水，旱等災，但災情較貴州爲輕。

據二十二年六月四日大公報的昆明通信所載，雲南自去年入秋以來，霪雨連綿，各處漲水，所有全省米穀，大半被淹，收成歉薄。不料自去年冬間至今年四五月，又復亢旱，粒雨未下，所有小春應收之豆麥雜糧，均已枯萎殆盡。刻下滇東之昭通，東川，曲靖，滇南之開化，廣南，馬關，滇西之楚雄，三姚各處，均先後呈報災荒，人民無以爲食，連草根樹皮亦已掘盡。

建水縣所屬江外，在去年初春三月，因狂風暴雨不止，江水奔騰澎湃，兩岸田畝悉被冲毀，積一千數百石，亦隨波漂沒，災情奇重。迨至六月中旬以後，天雨復連綿不止，遂致洪水橫流，自間洞以上至李家莊，河堤傾倒數處，田疇盡成澤國。及水退後，秧苗及其他農作物所存者俱已腐爛，秋收亦告絕望。

昆明附近的盤龍江，金汁河，西霜河亦均先後決口，洪流漫溢數百里，綜計此次遭受水災縣份，計有昆

明，安寧，鹽津，宜良，金河，建水等六縣。

廣東東北江一帶，本年自入春以來，即亢旱不雨，田畝均乾涸龜裂，農民無從下秧。韓江各縣農田灌溉，本全靠河流溪澗，現河溝池沼完全乾涸，自然無從耕耘。潮陽，揭陽，惠來，饒平，澄海，濱海，各縣，因海潮倒灌入河，河水變鹹，農人以之灌田，禾苗盡成霉爛。潮陽縣更發生一種類似蝗蟲之害蟲，因田土乾燥，蟲從泥中攢出，先吃穗稈，蟲長生翼，飛往他田，蔓延極廣。綜計此次遭受旱災縣份，計有韶關，英德，清遠，花縣，潮安，潮陽，揭陽，澄海，惠來，饒平，豐順，梅縣，大埔，五華，和平等十五縣。至遭受蟲災縣份，計有曲江，潮陽，南海，清遠，開平等五縣。

據去年六月二十二日天津益世報的廣東通信，粵東西北江一帶咸告水災。北江因連月大雨，故水勢極大，兩岸田禾盡被淹沒，佔全縣十分之七，秋收絕望。東江上游各縣低窪處，遍成澤國，所有禾田雜糧，將屆收成，均已淹沒無遺。西江較之東北江爲災更烈，下游佛山一帶禾田被淹沒者達十分之八九，早稻損失奇重。

廣西是本年華南災荒最輕的省份。但據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大公報所載，恭城縣風雹爲災，田中肥土及農作物都被冲毁，不能耕種。又據二十二年七月二日廣州民國日報所載，蒼梧縣和懷集縣均遭水患。聞此次洪水成災，爲四十餘年來所僅見，田禾多被淹沒，秋收恐無望。又據二十二年十二月份廣西公報所

載，本年向省政府報災者有白縣一縣，報旱災者有永福縣和全縣二縣。

福建本年遭受旱災極重，先後向賑委會報災縣份計有尤溪，順昌，將樂，建甌，屏南，淸流，南平，永泰，古田，寧德，壽寧，龍溪，海澄，安溪，永春，仙遊，惠安，晉江，同安等十九縣，中以閩北一帶最爲慘烈，災民流離輾轉，以草根樹皮充飢。

總計本年全國罹災省份達二十餘省之多，災民不下一萬萬人，而兵匪等顯著之「人禍」尙不計在內。自然，水旱蟲雹等農業災荒，通常雖被目爲「天災，」但在科學發達的今日看來，實在仍是人禍。卽是說，這些所謂天災的農業災荒，其根本原因，和其他一切的經濟災難，以及社會各種病態一樣，都是由社會制度本身而起的。作者將來如有機會，還打算把這種種災荒的原因作一詳細的分析。

一九三四，三，十八日。

七　中國的土壤

讀梭卜氏「中國土壤與人文地理紀要」

張培剛

梭卜 (G. Thorp) 氏是位土壤專家，現在我國地質調查所作研究員，這本小冊子 (Notes on Soils and Human Geography in China)——實業部地質調查所與國立北平研究院地質調查所出版，是他遊覽並考查十四省後所得的一點印象。全書只有二十二面，內容雖簡而極充實，範圍亦甚廣。關於中國土壤的研究，前曾有蕭 (Shaw) 氏發表過中國的土壤 (The Soils of China)，但只限於中國東部，而未包括中國西部，西北部和西南部諸省。梭卜氏這次的紀要，則西至略葛羅爾湖和黃河套，北至戈壁沙漠，南至京滬，杭州和贛省，所到的區域不能謂不廣了。

人類對於土地的改變，是一個潛伏的重要因素。所以梭卜氏謂：除內蒙古和西藏的草原不計外，整個的中國土壤，甚至一部分的東三省森林地和南部山地，都因為人類數千年的耕耘操作而改變性質了；現在要想找一塊「處女地」(Virgin Soil)，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全書除頭節為導言，最後為關於土壤氣候的兩節附錄外，中分四節，各論一主要項目。首言氣候，次言植林，再次論土壤，最後論土壤與人文地理。現在把這各節目的要點，簡略的指示出來。

在「氣候」一節中著者歸結說：一般言之，華北是夏天濕熱，冬天燥冷的區域，急雨是向着西北戈壁沙漠落下；東三省北部和外蒙北部，雨量是相當的高，特別是在多山的區域；華南則全部是春夏濕熱，晚秋與冬季燥涼的氣候，大雨是多發生於東南部的山脈區域。

「植林」一節的大意是說：中國各部的森林，因爲經過若干年的砍伐採用，原始的樹木已不可見，現在多是再行種植者。在華中和華南高度沖洗土壤多栽植松柏，至於低度沖洗土壤則間植脫葉樹和果木樹類，中國大部分的原平都已經過了集約耕耘，除掉沿海岸鹽性地多是喜鹽性植物 (Halophytic Plants) 外，其餘的地方差不多就沒有天生的植物，至於東三省，特別是北部和多山區域，大部是種植果樹和脫葉樹類，但仍有大部是草原，並且有些鹽性地也是以喜鹹性植物爲最主要。

基於土壤外形的有無石灰質，梭卜氏將中國的土壤分作兩大組，一是石灰質組 (Pedocals or Calcium Soils)，一是非石灰質組 (Pedalfers)。黃河流域的大部分，以及淮河和揚子江流域的一部分是屬於前一組。其中延着內蒙邊界從黃河北套到內蒙東部和東三省中部爲黑色土壤(Chernozems)，東三省大平原又多爲分化後的黑色土壤(Degraded Chenoezems)，在內蒙古，兼有深色的和淺色的栗色土壤(Chestnut Earth)，分析言之，則深淺色土壤一般都發生於陝西省與甘肅省的黃土高平原區域 (Loessial Plateau Earth)和山西省的多山地帶，同時也發生於青海的高平原區域；淺栗色土壤多發生於大黃

土高平原和渭河流域。後一組是包括蕭氏所謂的大半在山東半島的褐色土壤(Brown Soils)，和灰褐色森林土壤（Graybrown Forest Soils），以及華南的紅色土壤（Red Soils）。

最後梭氏論述土壤和人文地理。他說在將土壤的分配和全國的人口比較之後，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中國四萬八千五百萬人民都是集中在沿河平原和低山地帶。克勒舍（Cressey）氏估計人口密度每方英里爲一二〇人，要是將西藏和外蒙不算在內，該數字將增高到每方英里爲一五六人。中國本部，克氏所謂「農業的中國」（The Agricultural China），每方英里約爲三二六人，其中還包括大部的人口稀薄的多山區域。華北大平原人口密度爲每方英里六四七人。就全國已耕地來說，人口密度爲一，四七九。這就是說：每人所能分得的已耕地平均只有〇·四三英畝，約言之，將近半英畝。至於揚子江流域最的沖積土壤，人口密度在每方英里二，〇〇〇人以上。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沿河平原和低山地帶是中國人民的生命線了。

稻的生產只限於非石灰質土壤的區域；這是因爲在此種區域內，才足有大量的的水供灌溉。除水是決定稻的種植之要素外，還有一種要素。那就是因爲大部的冲積土壤和高地區域，其土壤鬆散，能保持水分於谷稻中；許多南方的沙地也具着此種特性。在非石灰質區域的北部，冬天氣候較溫，可以生長油菜，小麥，大麥，和菜類植物；因之此種土壤在種稻之先，又可種植額外的作物。此種地利，加上高雨量這種天時，遂

使揚子江流域得以供養大宗人口。事實上，如上所云，揚子江流域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僅四川成都平原人口較爲稀薄。話雖如此說，但是華南這種肥沃土地的數額比之於全國土地的面積，仍是很微小的。氣候太燥的地方，紅土非常磽瘠，雖然地勢上可以耕耘，但事實上大都荒廢。有些深山峻嶺，一時雖因耕耘年代之暫，地沃可以保持，但依現在耕耘之結果，最後必使地力全歸消滅。

棱卜氏又論到中國的災情，他說：一般外國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概念覺得中國是一塊災荒之地。要分析中國的災情，我們可以得到許多的原因，而水和旱則爲最主要者。水災之發生，多原於雨量過多，同時人力不能控制河流，以致大水一來，附近咸遭淹沒。黃河較揚子江難於控制，所以前者發生水災之次數多。最不幸的，因爲雨量最多時，恰是主要農作物的生長時期，所以水災的發生，多在主要農作物收穫之前，這是水災所以影響甚大的緣故。旱是構成黃土地帶災荒的主要原因。要是雨量很足的話，黃土區域例爲豐收。所以西北部的災荒，大部分不是由於地不利，而是由於天時不濟。

總之，就可耕地而言，中國是一個人口密度很高的國家；所以，即令在豐年，生產的食物也只是剛够消費。無疑的，苟能改良農具，採用人造肥料，農業生產品可增加，這雖說能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是如果那些較諸現在將更頻仍的災荒不設法除掉，則中國大額的人口是否能以維持，是深可懷疑的。有些人主張移民西北，但西北是否有大額土地可供耕耘，尚成問題。故此，中國這塊良好地方，在其繁多的人民之精細的和

忍耐的耕作之情狀下，對於其子孫的供養，確是盡了一番大力。但是，我們很想看看將來，五千年以後，看這塊土地將有何種食料以供養其子孫，其子孫將用何種努力使這塊土地能維持他們。

以上可說將棱卜氏在這書中的論述要點，大略的指示出來了。我們由此可以得到幾點印象。

1. 一般的概念都以爲中國是地大物博，實則肥沃的土地是很有限。不說像南方那種肥土不多，就是像北部那種次等土地也很少。所以我國儘管地域大，但可耕地確是太少，拿全國人來分配，每人還得不到半英畝地。同時，因爲數千年來，農民祇專注重於地力的抽用，不知地力的培養，所以地力也顯著退化了。號稱以農立國的我國，自己的農產品既因農地不足，生產力不大而甚感缺乏，同時又因爲工業落後，不能以工業品易取他國之農業品，這該是何等的一個大的危機！

2. 一般人都認爲我國的人口密度不高，因而多未感覺到人口的壓迫。棱卜氏在這本小冊內，特別注意到這個問題。他引用克勒舍氏的估計，謂中國的人口密度，依可耕地計算，爲每方英里耕地一，四七九人。這較諸印度農業人口最密的地方每方英里耕地一，一六二人那種密度還要高；至於和英國每方英里耕地四·七人，及美國每方英里耕地七一人相較，那更是相差得令人伸舌的。自然精確的統計，還要待諸將來的舉辦。不過，我們可以說：在我國，人口及於土地的負擔不是輕鬆的了，而已逐漸感覺到壓迫，這是值得全國考慮的一個問題。

3.依梭卜氏的意見，西北能不能解決我國的人口問題，深用懷疑，這誠然給予現在盛唱的「移民西北」的口號以一大打擊。不過，我們也不要因此灰心，至少移民西北在目前是可解決中國本部一部分的人口問題的。但是，我們却不可因此就忘了本部土地的改良，和農耕的改進。應用新式工具與引用新式技術，對於農產品的增加有着直接的效力，對於人民生活程度的提高有着間接的影響。這當然可以增加土地對於人口的支持，換言之，延緩人口壓迫的程度。

4.雖然農民的生活程度可因農具的改良與技術的進步，致農產品增加而提高，但是梭卜氏又嚴重的說過；苟災荒不除，則中國的土地能否支持這大宗的人口，還是疑問。這樣使我們要深切的注意到災荒的免除的問題。由梭卜氏的分析，我們又知道中國的災荒，多於天時不濟，所以如何防止災害，便利灌溉，實是當今最迫切的問題。植林濬河在目前實是刻不容緩的工作了。

5.我國農業的經營，已經集約到極點，地力已用到極限；在豐年，生產也只剛够消費。由此看來，可耕地若不增加，依於人口增加的趨勢，五千年後，全國土地是否能贍養大宗人口，以後的子孫是否可以自爲維持，實成問題。固然這問題還隔得遠，而我們不得不予以考慮。我們雖然不能像梭卜氏這樣說得令人喪氣，但是我們不要太樂觀了，我們要把那一向忽略了的問題注重起來。

一九三五，一，十九日。

八　東北農村的春耕貸款制度

王藥雨

一　引言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四日據報載：「汪院長十三日下午二時赴許世英邸談商春耕貸款。許語記者：汪認春耕極重要，農村破產，農民無力購料，政府宜速撥款救濟，前由財內兩部等四機關，曾決定由中央銀行暫墊二十萬，不足汪再設法籌集。」由上邊一段新聞記載裏，可以看到春耕貸款的重要和中央政府對於這件事情的一點辦法。本來，吾國農村經濟沒落的嚴重程度，是人所共知，毋待深論。以地廣人衆，尤其是農民佔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之多的中華民國，當此農村破產，如墜深淵的時候，政府對於春耕貸款如無大規模和具體而有效的辦法，實在是件可慮的事情。語云：「一年之計在於春，」春耕關乎一年的民食，倘無相當的救濟，則隱患何堪設想！

東北農村雖在僞組織之下，而對於春耕貸款的設施，頗有注意的價值。這並不是長人家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吾們是站在客觀的立場，本着研究的態度，做個忠實的介紹，以備國人的參考。但是，這篇短文只是一個簡略的敍述，內容上的缺陷，在所不免。最大的原因，是蒐集資料特別困難；卽本文所用的這點材料，尋求起來，已費了很久的時間和精神物質上的若干代價了。

二 貸款的原因組織與用途

東北貨幣缺乏，錢法毛荒由來已久。各銀行所發行的鈔票，竟無一家可以兌現。從前一般銀行，尤其是佔大勢力的各省立銀行，它們的業務主旨，不是利商便民，調劑金融，而專以濫發鈔帖，操縱糧產為能事。又兼荒地甚多，移墾甚亟，更需要大量資金作經濟效用上的媒介，因之農村金融極感拮据。借貸通常利率，總在五分以上；月利百分之十者，也是習見的現象。遼寧省輝北縣（舊名海龍）某國人開設的「東亞當」收典物品的利率，竟高到每天百分之一，即月息百分之三十，且限四十天滿期，到期不贖，即沒收作抵。它的條件雖然這樣苛刻，而到那裏質物的農民，並不見少，這自然是農村金融困難的一種反映，在社會秩序良好的時候，農民需款時，還可以用田契押借或預賣青苗，並且也可以在商家賒欠貨物，無論利息上怎樣吃虧，畢竟總可以周轉。但自民國二十年秋季「九一八」事變以後，社會秩序失常，金融格外紊亂，外間的游資，多避藏在安全的處所，不復流通，向以借貸為調劑私人經濟之法門者，至此已無路可走，以致衣食無着，耕種無資。那種困苦的狀況，真與內地各省災區的難民有些相同，而需要救濟，也是十分迫切的。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組織各省春耕貸款監理委員會，各縣農會為分會，「滿洲中央銀行」為貸款機關，凡無分支行的地方，並另設特派員辦理此事。各縣縣長則負調查與證明的責任。貸款區域，廣佈於遼，吉，黑，熱，等四省的各鄉村，甚為普遍。

貸款的用途，只限於春耕。所謂春耕的用項，是包括種子費，耕畜購買費，農具購置費，僱工及家族生活費等五項。這些費用需要的概數，在請求貸款時，卽須逐項開列。其開列的方法，首要的是所種熟地的晌數（每晌合十二畝，每畝二四〇方弓）；次爲農作物種類；本年度春耕面積，各種種子購入數量及價格，均須分別塡列；再次是耕畜，必須寫明種類（如馬牛騾驢；）購入頭數，購入費用等；更次是農具，應該陳報的是農具名稱，件數，價格等，此外關於僱工，須聲明年工或月工，以及僱工數，每人工資額，共需工資額。至於家族生活費，只塡人數與本年生活費總額。

農民貸款額，不得超過春耕需要之數，並須經縣分會及縣長查實證明，在「貸款呈請書」的末端，加具如下面的證明語詞：「茲經嚴重審查，前列貸款呈請書內所列各項，均係實在，並認爲有貸款之必要。」（見附件一）必經證明後，才有借到貸款的希望。

三　貸款時期及手續

凡要借用春耕貸款，必須於貸款時期內辦理。貸款時期是每年四，五，六這三個月（國歷）東北氣候較寒，春耕的季節也比內地晚些，四至六月，正是春耕時期，所以規定此時爲貸款期，於是按時接濟春耕，用於生產方面，不至移作別的用途。

貸款手續是這樣，先由借款農民繕具「春耕貸款呈請書。」開列借款人姓名，住所，擬借金額，借款日

期，所有熟地面積與坐落地點以及借款用途的分配等項，連同借據及預備抵押之「地照」（田契）並「擔保抵押證書」等，呈請本管縣長查明許可，予以證明，然後再送至貸款分會查核蓋章，轉請「中央銀行」押借款項。如果手續合法，證明無誤，卽可將款項借到，並無困難。

借據上包括的事項，是借款人姓名，借款額，借款用途，期限，利率，抵押品，保人等項。末尾附有貸款分會的保結，證明借款人及保人信用可靠，倘有不能淸償時，分會負追討之責。此外還有縣長的保結，保證借款人抵押的田地，確係已墾的熟地，（註一）並未另作其他擔保，且不准作「中央銀行」以外的擔保或讓渡。「爲減輕借款人擔負費用起見，」抵押品不必過戶，但認爲是獨對「中央銀行」的借款擔保品，這也是縣長附帶保證的一點。（見附件二）

借款手續除具備前述的借據外，對於提出的抵押品，還得另立「擔保抵押證書。」這種證書的寫法是：「立擔保抵押證書人（卽立借據人）某某，今於某年月日由貴行（指「中央銀行」）借到春耕資金國幣若干元，以左列各件擔保抵押，悉聽貴行按借據所載條件自由處分，決無異議。」這段文詞的左邊，開列地點的號數，張數，領名，所有人，坐落，面積，每晌時價，總時價，以及附屬書件張數等。末端仍附着貸款監理分會和縣長的保結，所保證的事項，也是借據上的那一套。（見附件三）

如果借款人提出的抵押品，不是借款人所有，而是向外人借來的，必須業主以文件證明，承認借款人

作抵押之用，這種文件叫做「押款文契所有人承諾書」。業主不但在書面上承認抵押，尙須承認貸款銀行按照借款人所立的借據上的條件自由處分，倘抵押品發生掛失及作廢情事，也須由業主擔負全責。（見附件四）

四　貸款的限制與條件

這種貸款的名稱，既叫做「春耕貸款」，它的用途，自然限於春耕，所以『「滿洲中央銀行」辦理吉林省春耕貸款規則』第二條便有這樣的規定：「凡貸款用途，只限於本年份春耕。是故必須努力防備移作他用，或以高利轉貸等情形」（地主轉貸佃戶者，不在此限。）既是用於春耕，對於借款人的身份自須有相當的限制，同規則第三條就有這樣的規定：「本貸款以接濟窮農爲宗旨。」因爲是接濟窮農，最怕貸款經手人從中剋削，以致農民遭受損失，所以同條裏又規定：「是故必須特別注意努力嚴防手續費、運動費、或一切任何名目之從中剋盤，俾貸款全額如數交到借款農民手內。」

貸款本額在民國二十二年時，是每戶自三元起碼至一百五十元爲限；民國二十三年則增至每戶自九元至四百五十元，比上年加多兩倍。但是抵押田地的晌數，並無變更，這兩年全是以每戶一晌至五十晌作準。不過抵押品的估價有些不同：民國二十二年每晌地只能抵押三元，民國二十三年則增爲九元，所以貸款額也因之提高至本額和抵押品價值的比差，民國二十二年是百分之三，民國二十三年是百分之九。

換句話說就是價值百元的田地，在民國二十二年只能押借三元；民國二十三年可以押借九元。因爲地價的平均數，是以每晌一百元作準。貸款期限，是由半年至十個月，因爲銀行方面規定本年（四至六月）貸出款項，至遲到第二年二月底以前須將本息歸還。貸款利率是月息七釐；「倘屆期還本遲誤，並應按月息一分二釐之利率交納，由到期次日起至償還當日止之遲延利息。」關於抵押的田地，銀行方面也有幾項繁複而嚴密的規定，作爲借款人遵守的條件：（一）「抵押熟地作爲擔保賠償淸還借款本利並其他一切損失。至關於押品抵押權之設定管理轉讓及處分等應需之必要書類，當依貴行之要求立卽提出」；（二）「在借款本利未還以前，不得將抵押品私自變賣或另行押借款項或向其他債權者指抵債務」；（三）「抵押品之價值如低落於立借據時，得貴行之通知，當立卽增加抵押品或交納現金，至少以能補足低落價格之數爲準」；（四）「此項借款到期，如不能淸償或違背前項各條件時，貴行得不通知敝人（借款人）卽可將左列之抵押品自由沒收變賣抵償借款本利及借款延期所受之損失，並一切變賣抵押品之用費。如有不足，仍由敝人如數補償。倘有餘剩，應儘先移償敝人所欠貴行之他項債務。此時關於押品之賣價及售出手續與時期等，均任憑貴行自主，決無異議。」對於抵押品雖有這樣嚴密的規定，另外還有承還保人負償還之責。如果保人有兩人以上，保人中有發生事故無力代償者，其餘保人須負全責。此外貸款監理分會和縣長調查證明，也算貸款條件之一，但於貸款手續裏業經說明，不再詞費了。

註：一東北荒地甚多，非經墾熟不能耕種，故借款抵押，以熟地爲限。

一九三五，五，十八日。

附件一

春耕貸款呈請書

爲呈請事茲擬依據吉林省春耕貸款辦法借款實行春耕，謹將借據及抵押熟地地照並抵押證書等項，一併呈上

恭請

鑒核　　借款人氏名

計開

一借款人住所　縣　區　村　屯　號

一擬借金額　國幣　元

一借款日期　××年　月　日

一借款人所有熟地座落　縣　區　村　屯　號

一前項熟地面積　晌

一農作物種別及本年度預定耕種面積並種子農具人工勞力牛馬等費之概數

農作物

種類	本年度合耕面積（晌）	種子購入數量（斗）	購入費：每斗價格（國幣）	購入費：購入總額（國幣）
大豆			元　角　分	元　角　分
小麥			元　角　分	元　角　分
高粱			元　角　分	元　角　分
谷子			元　角　分	元　角　分
包米			元　角　分	元　角　分
其他			元　角　分	元　角　分
計				元　角　分

牲畜

種類	購入頭數（匹）	每匹價格（國幣）	購入總額（國幣）
馬		元　角	元　角
騾		元　角	元　角
驢		元　角	元　角
牛		元　角	元　角
計		元　角	元　角

農具

種別	購入件數	每件價格（國幣）	購入總額（國幣）
		元　角	元　角
		元　角	元　角
		元　角	元　角
		元　角	元　角
計		元　角	元　角

勞力

種別	需用人數	每人工資（國幣）	共需工資（國幣）
年工		元　角　分	元　角　分
月工		元　角　分	元　角　分
計		元　角　分	元　角　分

家族生活費

人數	本年生活費總額（國幣）
人	元　角　分

本年度耕種用款總計國幣　元　角　分

以上所列各項均屬實在，無並虛僞之處，特此聲明，謹呈

×××銀行鈞鑒　　具呈請書人　　縣農民印

××年　月　日

春耕貸款證明書

爲證明事茲經嚴重審查前列貸款呈請書內所列各項均係實在並認爲有貸款之必要特此證明

吉林省春耕貸款委員會　　縣分會印

××年　月　日　　縣長印

附件二

春耕貸款借據　　第　　號

立借據人　　今依據黑龍江省春耕貸款辦法以左列

熟地向　　貴行押借到國幣　　元所有左開條件均願遵守

一、此項借款利率，定爲月息七釐。

二、此項借款之本利，應於康德二年二月末以前，直接交還貴行，倘屆期還本遲誤，並應按月息一分二釐之利率交納由到期次日起，至償還當日止之遲延利息。

三、此項借款，專充作本年春耕費用，此外不准移作別用。

四、左列抵押熟地作爲擔保賠償淸還借款本利，並其他一切損失，至關於押品抵押權之設定、管理、轉讓及處分等，應需之必要書類，當依貴行之要求立卽提出。

五、在借款本利未還淸以前，不得將抵押品私自變賣或另行押借款項，或向其他債權者指抵債務。

六、抵押品之價格，如低落於立借據時，得貴行之通知，當立卽增加抵押品或交納現金，至少以能補足低落價格之數爲準。

七、此項借款到期，如不能淸還，或違背前項各條件時，貴行得不通知敝人，卽可將左列之抵押品自由沒收，變賣，抵償借款本利及借款延期所受之損失，並一切變賣押品之用費，如有不足，仍由敝人如數補償，倘有餘剩，應儘先移償敝人所欠貴行之他項債務，此時關於押品之賣價及售出手續與時期等，均任憑貴行自主決無異議。

八、以上各條，敝人倘不能履行時，應由承還保人負完全償付之責，如保人中有發生變故，無力代償者，其餘保人當卽完全償付。

熟地地照							
號數	張數	領名	所有人	坐落	面積	每晌時價	總價額
合計							

此請

××××銀行存證

花印

借款人蓋章

款已收到	

住所

立借據人

住所

承還保人

×× 年 月 日

保結

茲敝會對於右項借款特出保結證明如左：

一、右項借款及抵押品並連帶保人信用事項，業經敝會嚴重審查確屬妥當，認爲有貸款之必要。

二、右項借款，倘屆期該借款人及保人不能清償時，敝會自當負責追討，以免拖延。

黑龍江省春耕貸款監理委員會

縣分會

會長

茲敝署對於右列擔保地照所表示之土地，特出保結證明如左：

一、右列地照所表示之土地，經敝署審查確係熟地，且未另作其他擔保。

二、右列土地爲減輕借款人擔負費用起見，按照春耕貸款辦法第四條之規定，省却抵押權之設定手續，但應認爲獨對貴行之借款擔保品。

三、右列土地無論如何，亦不准作貴行以外之擔保或讓渡。

此請

×××銀行台照　　　縣

縣長

××　年　月　日

附件三

春耕貸款擔保抵押證書　第　號

立擔保抵押證書人（立借據人）今於××　年　月　日由　貴行借到春耕資金國幣　元，以左列各件擔保抵押悉聽　貴行按借據所載條件，自由處分，決無異議。

地照	數號	張數	領名	所有人	坐落	面積（晌）	每晌時價 國幣	總時價 國幣	附屬書件 張數
總計									

此請

×××銀行存證

（立擔保抵押證書人蓋章）

××　年　月　日　立　立擔保抵押證書人

保結

本縣公署對於右列擔保地照所表示之土地，特爲證明如左：

一、右列地照所表示之土地，確係熟地，且並未另作其他擔保。

二、右列土地爲減輕借款人之擔負費用起見，對於抵押權之設定等手續，故省略之，惟應認爲押借××××銀行款項之擔保品。

三、右列土地，無論如何亦不准作××××銀行以外之擔保或讓渡。

吉林省春耕貸款監理委員會　長
委員長

年　月　日

附件四

押款文契所有人承諾書　　第　　號

立承諾書人　　今承諾　　以敝人所有左列之地照作擔保，由貴行押借春耕資金國幣　　圓，按照該借款人與貴行所立之契約，自由處分，決無異議，並如發生掛失及作廢等情事，願負全責，立此為證，此請

×××銀行存查。

	領名	號數	張數	面積	坐落
地照					
總計					

住所

立承諾書人

××　年　月　日

九　華北農村中之幾個根本問題

田文彬

一　引言

在整個中國國民經濟底比重上，無疑地，農村經濟佔着最大的構成分，所以在全國經濟普遍破產的形勢下，也便增强了人們對農村問題之注意。如果說，中國農村經濟已由慢性的衰落變爲急性的危機，那末華北底情形尤其表現得顯著。華北經過歷年天災人禍之餘，在地權上發生了激劇的移動，相隨而至的便是佃農與流民數目之龐大的增加及農村社會之高度的不安。同時，復因農產品對工業品的交換價格之剪刀式的發展，及農村資金的流出日多，使得賦稅來源有漸見枯竭的威脅，如本年河北省靜海固安等縣包稅招標至六七次之多，而尙無人敢於投標承包，卽屬顯例。華北當局爲了培養稅源起見，自也不得不尋求農村問題底解決途逕。因此，救濟華北農村的呼聲，便應運而生。

本年十月初旬，北平當局提出了救濟華北農村的口號，那自然是應時的要求，我們姑不論這一口號能否實施及實施後能否奏效，但闡明華北農村危機底深度及指示其衰落破產底眞象，實屬刻不容緩之圖。尤其在强隣逼處，垂涎張爪的今日，這一工作更感到必要。本文之目的在於將華北農村凋敝底幾個根本現象作一概括的敍述，並約略解釋其癥結之所在，以供國人之參考。

二 地權移轉之激化

在華北農村中之最觸目的現象，便是地權之迅速的移轉。近年由於水旱災荒，軍事勒索，苛捐雜稅，高利重租等原因，已將華北農村陷於極度疲滯的地步，但這些事態却正刺激着地主將土地移爲己有之要求，更利於他們掠奪貧農底土地。

土地底集中隨着災荒底擴大而發展，每經過一度的災荒，土地便有一度的集中，如陝西在一九二九年時發生了空前的旱災，至災後有許多土地集中於地主之手，其演變底痕跡極爲明顯，試觀下表：

咸陽災前災後土地分配比率

土地畝數	災前佔有戶數	災後佔有戶數	增減比較
五——十畝	三〇·〇%	二五%	減　五%
十——五十畝	五〇·六%	四五%	減　四·四%
五十——百畝	一一·二%	二五%	增一三·八%
百畝以上	四·四%	一〇%	增　五·六%

迨至最近，情勢愈演愈烈，該省年來受禍最慘，農民生活也最苦，所以往往以百畝之田，換取全家三日之糧。截至一九三三年爲止，陝省自耕農底土地已經減少了五分之一，因而佃農與流民成份便又增加了

五分之一。貧農中的自耕農所押出的土地年有增加，一九二八年押出的土地佔所有土地底百分之三十，至一九三三年則增至百分之六十。貧農將土地押出後，絕無力量再行贖回，事實上這些土地都是準備讓渡地主的。

其他各省小農失地底慘痛及地權移轉底速度，也正不減於陝西。河北保定「自一九二七年六月至一九三〇年六月，三年之內他們（貧農及雇農）喪失之土地，約當同期間所得土地之四倍。換言之，買入之土地，僅當賣出土地之百分之二四。一九二七年六月，這些貧農及雇農共有土地六，八六二·八九畝，到一九三〇年六月其買入或當入數則一六四·二九畝，即百分之二·三九。同時其賣出或當初之數則爲六七九·〇七，即百分之九·八九。總計三年之中所喪失的土地爲五一四·七八畝，前數年穀價較貴，猶且如此，若以最近情勢推之，至多四十年內，保定之貧農及雇農將喪失一切土地，變爲赤貧了。」河南袁氏乘了連年變亂的機會，佔有了彰德全部土地底三分之一以上。綏遠在前幾年重災時，農民多將土地售與省政府底官吏，如打色令村全村土地不過八十餘頃，而經官吏收買者却達四十餘頃之多。

農村愈貧困高利貸愈活躍，高利貸愈活躍，土地集中底過程也愈加速。如山西壽陽縣自鬧票災後，晉鈔一落千丈，直跌至一百多吊換大洋一元，市面恐慌，高利貸隨之而興，利息五分，六分，七分，以至加一，該地有「一塊跟一角五天算一月」之諺。農民因受票災的損失，多以土地作抵押而奔走於高利貸之門，但大

多數到期不能償還，因而抵押品也隨之以去。陝西北部一帶，貧農借錢最低月利三分，高者不等，甚至有一年一間借一元還兩元者，俗名爲「一年滾」借糧普通是借三還四。但借貸不論數目大小，均須以土地作抵押，期滿不還，變爲典地，典地到期無法贖取或再需錢時，只有將土地找價出賣，地主遂得以用最低價格將大批的土地收買進來。山東高密縣高利貸掠奪貧農土地的手段，尤其來得乾脆。該地富戶向貧農放款採取賣契抵押與典契抵押兩種形式，月利普通四分上下。賣契抵押係借款者將自己所有的房產或土地以賣契形式抵給放款者，在契約左邊年月日之外，另註一行「言明幾個月爲期，幾分加息」字樣，如到期不還，放款者只需將左邊一行字割去，即成爲正式賣契！典契抵押則係由借款人將自有的土地或房產立典契交給放款者充作抵押品，契內所塡的錢數係包括本利之總額，到期不還時，即將土地交給放款者耕種。近年來該地富戶用這種方法攫得的土地實屬不少。

華北各地地權移轉的情形，略如上述，但是地主或富農取得大批的土地以後，並不是自己經營集中的農場，以建立新的生產關係，而是將土地重新分租給多數的小農，藉以取得佔全部農產品價值百分之五六十的地租。所以，土地所有的集中並不能引起土地使用的集中，恰恰相反，它更招致土地的被蠶食而成爲碎裂分散的狀態。目前華北各地每戶農家平均十畝左右的土地，還不是聚在一處，而是分爲許多細小的塊段，且相距在數里之外。這種小農田的經營，天然排斥着進步技術之應用，天然決定着資本與勞力

之無謂的消耗，換言之，也便是阻止着生產力之前進的發展。

三　農村金融之枯竭

農村金融底凝凍不靈，已成了全國底普遍狀態，而華北農村金融底枯窘，較他處尤為嚴重。蓋我國是一個長期入超的國家，內地需用的各種物品，無一不來自通商埠，我國底對外貿易是逆態的入超，內地對通商口岸又是逆態的入超，內地對口岸的抵補方法只有靠土產和信用，但年來因為內地農業底衰落及農產品跌價較工業品為速的關係，竟使內地無法抵補對口岸的入超，其結果只有運送現金到通商大埠，再由各通商大埠輸送到上海，由此遂形成了都市膨脹與農村偏枯的畸形狀態。此外，再加以內地不靖，有產者多攜現還往都市，從而更加重了農村資金底逃亡。全國如此，華北自也不能例外。茲列近兩年來上海與華北各埠銀元移動底情形於下以見一斑：（單位千元）

埠別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上期）	
	移往上海	移出各地	移往上海	移出各地
青島	八，一一〇	—	二，七〇〇	—
濟南	六，四八〇	—	三，〇〇〇	—
烟台	三，八二〇	四〇〇	一，三〇〇	—

天津	三，二六〇	一，〇〇〇	四〇〇	一五〇
開封	—	—	四〇〇	—
秦皇島	—	二〇〇	—	—
山西	一五〇	—	二〇〇	—
合計	二一，八二〇	一，六〇〇	八，〇〇〇	一五〇

自二十二年至本年上期爲止，一年半之間，華北各埠向上海移銀共二千九百八十二萬元，移回者不過一百七十五萬元，二者相差達二千八百零七萬元，這一數目無疑地都是來自內地農村的內地資金既有如此大量的流出，其陷於極度的偏枯，自屬必然的結果。而造成華北農村金融之特殊枯竭的原因，猶不止此。

華北與東北向來保持着一種特殊的關係，即冀魯豫等省底農民於農事畢後，多出關赴東北各地謀生，以經營所得之餘，匯回故鄉，或於翌年春耕前攜款返籍，各地農家之賴以作金融上之流通者，委實不少。據中國商業循環錄登載，只山東一省，每年收受東北匯款約爲一百五十萬元，若合華北各省計之，每年至少當在五百萬元左右。但自東北淪陷後，內地在關外的農民多已返回原籍，即留居東北者，也因匯兌停止關係，不能照常寄款，因而這一數目遂完全喪失，其直接間接加於華北農村金融上之打擊，至爲鉅大。

農村金融枯竭底結果，遂將農民完全陷於高利貸底操縱之下，近年各地雖有信用合作社之提倡，然以歷史短淺，收效不宏，不足以打開農民經濟上之困厄。據中央農業實驗所調查寧夏，察，綏，甘，陝，晉，魯，冀，豫九省農民借貸情形如下

種類	報告縣數	借貸來源							利息
		合作社	親友	地主	富農	商家	錢局	其他	
借款%	四一五	一·五	五·七	六·二	四二·二	二四	九·九	一〇·五	三·九（年利）
借糧%	四一五	—	一〇·八	九·八	三九·八	一四·七	—	二四·九	七·八（月利）

就上表以觀，無論現款或食糧，農民向富農及商家舉借者獨多，計借款佔百分之六六·二，借糧佔百分之四四·五，且利息極重，借款年利平均三分九利，借糧月釐七分八釐，農民呻吟於高利貸鐵蹄下的情形，於此可見。

農民在借到現款與食糧之後，大部分都用於家計所需，並非以之投入生產的用途，如此輾轉相循，不出幾年，小農便臻於全部破產。然此尚不過就一般狀況而論，若就某幾個地方作個別的觀察，則情形尤覺淒慘。如陝西以前值百元的土地，近年雖以二三元求售也不可得。河北趙縣，行唐，大名等地，昔年可押二三十元的土地，近來雖以五六元出押，也無人問津，欒城，高邑等縣底當舖，因當者過多，無法收容，宜告只贖不

當，其結果竟使農民飲鴆無門，農民金融枯竭底程度，可以想見。

四　勞力的摧毀與逃亡

華北農村中之土地演變底矛盾及金融枯竭底狀態，已如上述，而年來在人口上之大量的摧毀與農民底離村逃亡，尤屬駭人聽聞。查人類勞動原爲一切生產上之必不可少的要素，勞力的過度摧殘，實無異減剝其生產底基礎。以華北而論，近年由於天災人禍底擴大及毒禍流行的普遍，人民之消耗於槍聲砲彈之下及沾染毒化而離開生產過程的數目，實開空前的紀錄。以言人禍，十九年中原大戰，死壯丁三十萬，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冀魯豫等省底健兒，人民因之而流離失所者，必更倍蓰於此。該年末，馬廷賢蹂躪甘肅，隴南十三縣變成一片荒涼世界，禮南天水武山三城，完全爲其所屠洗，只此一役，死人無慮數十萬。然此尚不過舉其較著者而言，若將連年各地發生的小戰事及土匪之掠地燒殺合併計之，死人當也不在少數。以言天災，則水旱疫癘之流行，無年無之。西北三年旱災，陝西死人一百三十萬，前年各地瘟疫流行，只陝西華陰一縣兩月之間死人一千以上，西安死八百餘人，大荔澄城等六十餘縣死兩萬人，一時陝西市上，棺材爲空，山西境內疫癘傳染達四五十縣，死亡約兩萬人。河南經陝疫傳入後各地皆有死亡，洛陽一月中死兩千以上，去年天災更集以往歷年災荒之大成，黃河氾濫，波及冀魯豫三省。河北長垣東明濮陽三縣，十之八九，已成澤國，魯西荷澤鉅野等十縣，半被淹沒，人民在生命財產上之損失，極爲重大。本年北方水災之嚴重，正不

亞於南方底旱災，據中央農業實驗所調查，全國災民共有六千六百萬，只河南一省便有一千三百萬之多。

除了天災人禍之外，更有毒禍底蔓延澎湃，凡吸食鴉片海洛英者，即得不死，也屬苟延殘喘，倖存於世，無力參加生產勞動，這是一種慢性的摧毀。現在華北各地毒禍底流行已達到了可驚的程度，其中以山西爲最深入。山西全部人口一千七百萬，除吸食料面藥丸者無可稽考外，只鴉片烟民已達九十萬人。

天災人禍底嚴重與普遍，促進了農村社會底崩潰，加速了農村勞力底喪失，即不死者，也因戰亂頻仍，負擔加重，經營無利，相率棄地逃亡。關於華北各地農民離村底實際狀況，我們現在尚沒有完整的報告可作一般的視察，日人田中忠夫氏根據歷年的調查，將我國北部與中部十縣農民離村底比率列表如下：

	全人口比率	每村比率
中部	三·八五%	九·一八%
北部	五·四九%	一三·八%

由上表可知北部農民離村的比率較中部爲高，這正說明着北部農村崩潰的程度較中部來得激進。農民離村的結果，一方面爲軍閥混戰造成了「人口基礎」，他方面增加了都市底產業預備軍，所以今年日人在青島招募華工時，一月之中便有兩萬人應募，這是有其社會經濟底基礎的。

五　結論

根據前文底敍述，可知華北農村的危機，現已達到了極端嚴重的階級。從土地上看，土地所有底集中與土地使用底分散，促起了小農經營與租佃制度底普遍流行，在小農經營與租佃制度之下，必然招致農業技術底衰落。從資金上看，農村金融底枯竭及高利貸底活躍，將農業耕作陷於更困難的條件之下，致令農民不斷縮小其再生產的行程。從勞力上看，循環式的戰爭之繼續排演及水旱災荒底愈趨擴大，造成了壯丁死亡，老弱流轉的狀態。所有這些都使華北農村經濟基礎整個地發生了動搖。

在這種情形下來救濟華北農村，我們深覺得不是發行幾百萬公債所能濟事的，一定的社會現象來源於一定的生產關係，在生產關係沒有變革之前，要想改變社會現象，那在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

一九三四，十，二十九日。

十　崩潰中的河北小農

田文彬

河北省是中國黃土區中一個省份，在這裏小自耕農佔着絕對的優勢。一般人的意見以爲北部自耕農的境遇較南部的佃農爲優越，這是不合事實的見解。實際上河北大多數的農民不是耕地過細分割，便是耕地不足。據張折桂君調查定縣八村一三八六家的土地分配如下：

	農家戶數	戶數%	所有田畝	田畝%
無地	一一九	八·六	—	—
一——九畝	五三九	三八·九	二，五六六·四	九·四
十——二四	四一四	二九·八	六，五九四·六	二四·一
二五—四九	一九七	一四·二	六，七八四·三	二四·八
五十　九九	八九	六·四	六，〇七六·二	二二·二
一〇〇畝以上	二八	二·一	五，三三七·七	一九·五
合計	一，三八六	一〇〇·〇	二，七三五九·二	一〇〇·〇

佔戶數百分之八·六的農民，竟連一畝土地也沒有；享有土地二五畝以下的貧農，佔戶數百分之六

八・七，所有田畝只佔百分之三三・五；有地五十畝以上的富農和地主，佔戶數不過百分之八・五，享有田畝却佔百分之四一・七。若以每戶平均佔有土地計算，富農和地主每家可有土地九七・六畝，貧農每家不過九・六畝。若將貧農和純粹無地農民連繫起來看，竟有四分之三以上的農民是處於耕地不足和赤貧的狀態。

同樣的情形，在保定也存在着，一九三〇年，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社會調查所曾經聯合在該地作過一次調查，結果發現出在十個代表村中佔總戶數百分之六五・二的農家，只有耕地百分之二五・九，反之，佔戶數百分之一一・七的地主和富農，却有土地百分之四一・三。這裏貧農和雇農平均每家還不到七畝地。

	農家戶數	戶數%	所有田畝	田畝%
地主	五八	三・七	三，三九二	一三・四
富農	一二五	八・〇	七，〇四二	二七・九
中農	三六二	二三・一	八，四〇〇	三三・八
貧農及雇農	一，〇二〇	六五・二	六，六八六	二五・九
合計	一，五六五	一〇〇・〇	二五，五二〇	一〇〇・〇

南和縣位於河北省的南部，它可以代表南部平原農業區的一般情形。「在本縣雖無過大的地主，但據約略估計，地主富農所佔耕地竟達百分之九二；中農佔有耕地百分之五，貧農佔有耕地百分之三。就各類村戶中戶數來看，更可以明瞭其間的懸殊：在全縣戶口總數中，地主佔百分之十，富農佔百分之一四，中農佔百分之二五，貧農及雇農佔百分之五一。」以百分之五一的農民只有耕地百分之三，這充分指示着他們是在迫切地需要土地。寧津縣六村「富農及中農佔戶數百分之一五・六，耕地佔百分之五五；貧農戶數佔百分之七八・三，耕地佔百分之四五；雇農戶數佔百分之六・一，無地，平均每戶只有田五・六六畝。」於此我們應指明這是以總戶數和總畝數平均計算的，若單就貧農和僱農來看，每家耕地，必然更少。在農產品跌價和勞力不值錢的今日，這一點點土地是遠不足以使他們獲得溫暖的。

河北農民的土地不但過少，而且還是四分五裂，一個小小的農場，每每形成許多細小的塊段，且相距在數里之外，這在農業耕作上實處於極端不利的地位。據李景漢氏在定縣調查二百戶農家的田地，共有一五五二塊，其中二六家各有地六塊，兩家各有地二十塊，平均每塊面積四・二畝，其餘每塊平均也在五畝以下，這些地段通常距離農村有一英里遠近。深澤縣的農場最多有分爲十數塊的，每塊面積最小的至五分之一畝，平均每塊也不出五畝，田塊對農舍的距離通常在一里至二里之間，最遠的竟伸至五六里地以外的隣村。井陘某村爲該縣數一數二的大村，人民全部業農，但「土地盡是零零碎碎之旱田，無成大塊

在二十畝以上者。」北平近郊三九家中，一家種一塊地的約佔四分之一，種兩塊的約佔三分之一，其餘每家皆有地在兩塊以上，最多的一家有地八塊，平均每家約有地三塊。這種農場的過小和細分，在現階段的農業經濟中，實含有最深的社會意義。它抗拒着進步技術之應用，決定着資本與勞力之過度的消耗，以至阻礙着生產力之發展。

在這種脆弱的經濟基礎上，再加以種種內在外在之不利的條件，必然招致農村社會的崩潰。這裏首先便是帝國主義商品之普遍流行農村。目前農產品的價格雖在狂跌，農民生活雖在緊縮，而日常所需的各種物品，却不得不仰賴帝國主義者的供給。譬如邯鄲永年一帶「普通婦女頭上的一切裝飾品，男女較好的各種衣料，衣扣，洋燈，提燈，紙烟，以及其他一切零用品，大多數都是都市工業的製造品，已不是農村中手工業的製造品了。即時常出沒於農村的小販，滿擔子裏洋貨總佔十分之八九。」藁城縣「以前用洋貨者甚少見，近來則穿洋布者，點煤油者，比比皆是。」在定縣「每個鄉村裏，都有洋貨舖的設立與洋貨小販的發售，雖然遠在幾萬里的英美國家某一公司的出品，都可出運到這偏僻的農村來，」工業品的侵入，擊破了固有的手工業，增强了內地農村對帝國主義的依賴性，然而在經濟恐慌的浪潮裏，農產品的跌價遠較工業品爲速，於是當農民以農田所產換取日常所需時，在價格間便須遭受一種剪刀式的剝削，這對農村金融直接起着過度溢出的作用。

在帝國主義商品的打擊之下，農家副業破產了，以前是自給自足的，現在須得購買，收入減少，支出增加，農民不得不飲鴆止渴地乞靈於高利貸。現在河北農民借款，大多數都打回扣，鄉間稱之為「出門利，」如借款十元，實收只八元，償還時除償本金十元外，利息仍照十元計算。此外，還有所謂「剝皮利，」「臭蟲利」（即複利，形容其蕃殖過速之意。）剝皮利係中間人由他處借來，再以高利放之於農民；臭蟲利係還款期至，債務人無力繳納，將利作本，仍按舊率或較高之利率行息。利率最低者二分，高者達十分以上，普通為四分或五分。但債主放款並不按同一之利率，他們常視舉債人財產的多寡而差別待遇，如肥鄉縣債主放債時，「皆以揭賬人的經濟狀況而決定利率之高低，大約富農揭賬為月息二分五至四分，小農小商人以個人信用程度及活動力大小而有不同，最高有至六分者，赤貧者多按日計息，有每元每日出息三四枚者。」在邯鄲「利率之高低恆以使債者產業之多寡為標準，雙方關係恰為反比。使債者其土地若在百畝以上，年利為三分五至四分；若在百畝以下五十畝以上者，利率均須五分至六分；其他農戶年利約為七分至八分；最貧之戶絕無受剝削之機會。」貧苦的農民本來不易借到款子，借到時還須受最高利率之剝削，就每元每日出息四枚的「印子錢」以觀，若照目下的銅元價格按月計算，利率即在二角以上，較富農利息約高十倍；一般稍有產業的小農，其受剝削的程度也較富農高出三四倍。這種差別利率之存在，是促進小農崩潰一種最兇猛的工具，

農村金融的吃緊，高利借貸的逼迫，在在迫使農民當收穫後即須從速出售其生產物，這又給了私人地主和商業資本家以一種剝削的機會。肥鄉一帶的富戶多於秋收後屯積粮食，俟翌年青黃不接時放出，一般農民「在田禾尚未成熟時，即缺乏粮食，又無力購買，乃向富戶批借，至打場後歸還。這種糧食係食陳還新，往往借一還二，或借谷子一斗還麥子一斗，其利息常在一倍以上。」在束鹿，一般雜貨舖和米麵店等商家，多經營糧食貸放事業，它們於大秋後「大批買進粮食，待到轉年初頭，再以高價向外貸放，大約放一元的粮食，幾個月後，即可得利一倍。」最近各地銀行曾經提倡農業倉庫的創設，期以補救農民不能待善價出售其生產物之弊，然而在農產價格跌落無定的條件之下，這種企圖也是無效的。今年一月八日天津益世報載有正定通訊一則，最足以說明這種情形。該通訊云：「石門中國銀行曾於城內分設貨棧，專辦農村貸款。農民借款時，以粮食押存該棧，如值百元之貨，只能貸款七十餘元，月息八釐，雖較鄉間貸款之利率為輕，然粮價日後不幸跌落，即須蒙兩重之損失。以此之故，除少數農民急於用款者或向其押借外，他人則不願問津焉。」

高利貸是整個社會經濟制度的一部份，它不是法律所能禁止的。去年一月間密雲等「非戰區域」的當局有鑒於該地借貸利率過高（以八九分為最普通），曾經下令禁止，並明文規定最高不得超過二分。但結果不但不曾收效，反使農村金融一時驟形緊張。高利貸本是追隨着農村的貧困程度而發展的，在

農村貧困沒有解決以前，要想以一紙命令來橫加干涉，那不過是空口說白話而已。

近十餘年來，經過華洋義賑會的提倡和試辦，河北省的合作社無疑地是在一天天地增加。這些合作社十九都是信用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的目的是以倡導農民自助互助，調劑農村金融，及打倒高利貸為依歸的。但經過十餘年的長久歷史，其成績却是微乎其微。據中央農業實驗所調查，河北省一零五縣中，農民借款來源：合作社只佔百分之一一．九，地主富農和商人等的私人借貸却佔了百分之五五，其餘銀行佔百分之三．三，典當錢莊及商店等佔百分之二九．六，後者仍不脫高利貸的範圍。這已充分說明了合作社效力之微。即使我們退一步講，姑承認合作社運動在農村救濟上有它的作用，這種作用也禁不住苛捐雜稅及軍事徵發的抵銷。去年作者本人曾面聆在河北辦理合作社有年的某專家說過這樣的話：「我們是蓋房的，它們（指一切捐稅及攤派）是拆房的，我們的一點點成績實在禁不起它們的摧殘。」這指示着在整個社會經濟日趨崩潰的過程中，醫頭醫脚，根本就不是辦法。

不合理的生產關係，又使得對於自然條件的克服成為不可能，這表現於一年比一年嚴重的災荒上。我們且不來算較遠的舊賬，只以去年而論，河北全省受災縣份即有六十八縣之多，計水災十九縣，旱災二十三縣，蝗災二十六縣，總損失達一千四百餘萬元。其中經民政廳勘察認為災情較重，「原擬由省撥款，普放冬賑一次」者，尚達六十二縣。在這些縣份中，受災最慘的當屬長垣的全部及濮陽東明的一部。該地受

黃河決口的衝擊，農民財產，蕩然無存，災民除了流落各都市，終日在十字街頭靠了出賣兒女以苟延殘喘者以外，留居該地的還有十餘萬人。去年底，黃災代表田家鼐等曾晉京請求賑款，據本年一月九日各報載該代表等之報告云「抵京後，迭向本省在京諸要人接洽，並向財部交涉多次，迄無具體辦法，據財部李秘書長云：冀省並未列入被災省份。且中央通令各捐款，係指旱災而言」這樣便碰了一個相當硬的釘子。本年入春以來，黃河連日猛漲，貫臺堵口工程以物料屢不敷用，坐失良機者凡三次。最近金堤又發生危險，金堤一潰，河北全省即將陸沉，這種嚴重情勢，嚇得某報記者都說：「吾儕居天津者其將為魚乎？」近據報載，長垣縣城周圍東西約四十里，南北自入境起至出境止，均屬一片汪洋，平地水深五六尺或三四尺不等，濮陽受災各村同。一般災民多架屋樹上，以資棲息，風聲水嘯，傾覆堪虞。這麼一來，小百姓回復到有史以前的原始生活去了。

高利貸的殘酷剝削，再配合上嚴重天災之肆虐，必然促進農民無地化的過程。正定農民「借債時須先以房屋地契作抵押，到期無力償還，則田產聽債主沒收。」甯晉縣在去年年底因「農村凋敝，經濟恐慌，一般負債農民紛紛以田償債」井陘農民也多於「不得已時，只得割肉剜心似地賤賣祖宗所遺留之田產，以充必須之費用。」農民競相出售土地之結果，又引起了地價之極度的跌落，今就材料所及，將河北各縣一九三二年與一九三四年的地價作一比較，以見其跌降之程度：

	一九三二年每畝普通價格	一九三四年每畝普通價格	跌價%
趙縣	一〇〇元	四五元	五五
大名	七〇	三〇	五七
定縣	一二〇	五〇	五八
行唐	一六〇	五〇	六九
深澤	九〇	二五	七二
正定	一四〇	三〇	七九

以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四年相較，河北各縣地價一般地均跌落百分之六十左右，最甚者如正定，竟跌價百分之七九。但土地價格之跌落，並不是小農易於獲得土地，而是賦與了地主以擴張田權的機會，這可以拿新河縣兩里村的情況作一個說明。據新中華農村通訊登載，近五年來該村各級農戶之演變如下：

	無地戶數	一至十畝之戶數	十至二十畝之戶數	二十至四十畝之戶數	四十至八十畝之戶數	八十至百畝之戶數	百畝以上之戶數
一九三〇	八	三〇	六九	八四	五十	八	一
一九三一	八	三六	六五	八二	四九	九	一
一九三二	九	三九	六四	八二	四五	九	二

一九三三	九	五十	六三	七〇	四五	十	三
一九三四	一三	五三	六二	六八	四二	八	三

五年之間，無地農民增加五戶，一至十畝者增加二三戶，十畝二十畝者減少六戶，二十至四十畝者減少十六戶，而百畝以上的地主則由一戶變爲三戶，中小農失地及土地集中於地主手中的情形，已極顯然。該通訊云，地主之所以獲得土地，大多是由貸款弄來的，起初他們向農民放款，保有債權，俟農民無力償還時，即將其土地攫爲己有，於是債權一變而爲地權。在農村金融緊迫之下，在人禍造成的天災打擊之下，在高利借貸的剝削之下，小農經濟的崩潰是必然的了。

然而陷農民於走頭無路的狀態之中者，猶不止此。農民失去土地之後，受着生活的逼迫，勢必設法佃進一些土地，這樣便又投入了地租剝削的懷裏。河北省的租佃制度雖不發達，但地租之吞食佃農的血汗，與南部各省無異。在都市附近及沿鐵路一帶農產多商品化，通行錢租；此外更廣大部份的農村，則通行物租，物租中尤以分租爲最普通。錢租租額之高，可佔到全部農產品價值的百分之七八十，如在正定，農民租地一畝，每年只可得七八元的收入，而地租一項即佔去了五元，還差不多等於將終年辛苦所得整個交給了地主。北平近郊二十八村每畝旱田的生產費爲五・四元，其中地租佔二・一元，去年因微受水災，收成減少，且價格跌落，每畝產品只能售一・九元，結果尙不敷繳納地租。後窰村有一劉姓佃戶，因連年賠累過

甚，跳水自殺。分租制有四六，三七，五五之不同，以五五對分制爲普遍。但這種制度顯然也是不公平的，因爲地主一般地都是只提供土地，其他一切人工，肥料，種籽，農具，概歸佃戶負擔，如高陽、井陘、保定各地，都是如此（保定地主間或出一半肥料種籽。）地主專憑了自己的土地所有權，到了一定的時期就可以穩妥地分取一半的收穫物。

在沒有地租的地方，賦稅便替代它而起着剝削的作用。截至去年年底爲止，河北省的苛捐雜稅名義上雖然蠲除了九十種，實際上各種攤派又紛至沓來，農民負擔依然毫未減輕。據去年十二月九日大公報載負責河北省土地調查的冀黨部委員王玉賓氏談話云：「農村田賦太重，每畝捐稅一角，一切附加原即在內，但村公所又攤派三四倍之數，河北省苛捐雜稅固多，而無名之攤派尤夥。」各縣於取消了苛雜之後，「以裁減之款皆與庶政攸關，有停頓之虞，紛紛電省請籌抵補」（見去年十二月十七日庸報）省方却答以「雖所述成理，但一縣如此，各縣何莫不如此，省方焉有許多款項補助」（見本年一月十九天津益世報）是可知在目前，農民負擔是無法減輕的，縣方爲了「不停頓」起見，仍須設法勒索，而羊毛終究是出在羊的身上。

農民負擔不但繁重，這種負擔還是不平均的，我們可以拿涿縣作個例子。據南開大學在該地調查，發現了三種主要的現象：第一是有地愈多者，向縣府呈報的畝數愈少，逃稅的機會愈多。這因爲在鄉間享有多量土地的人，多爲當地的紳士或村長，呈報地畝權操在他們手裏，因而可以任意少報。第二，是有同樣負

擔的人，不一定就有同量的土地，和村長及紳士接近的農民也可以少報，其他農民則不能不實報。第三是有的農民其呈報數竟高出其實有數，這因為他們已將土地賣出，賣時約定賣主仍須照舊納糧，所以土地仍在他們的名下，由這幾種現象，可以看出愈是無力納稅的農民，他們的負擔愈重，享有多量財產的富農，他們的負擔反愈輕，田賦的負擔落在了一般極窮苦有地最少的農民身上。

租稅的壓榨，負債的積累，災荒的打擊，一齊向農民進攻，於是乎農民離村的現象便發生了。據李景漢氏在定縣調查「自民國十三年至民國二十年，每年出外謀生的至少四百人，至多一千五百餘人。民國二十一年增至三千三百餘人。而民國二十二年內竟達七千八百餘人之多。……若不是受經濟非常壓迫，那能到此地步。」定縣是全國公認的實驗縣，尚且如此，其他縣份，更不必論。農民離村之後，除了投入軍隊供軍閥驅殺外，便是逃往都市，以求生計。但工業的缺乏，是殖民地的特色，遷來都市之後，仍不能使他們塡飽了肚皮，最後便相率出關赴東三省。在九一八事變前，東三省本是華北各省移民的尾閭，自事變發生後，移民受阻，即使得機前往，危險也多，生命財產，了無保障，但據本年三月十七日的大公報載，去年一年，河北省「走關東」的勞工仍達十五萬一千餘人「若不是受經濟非常壓迫，那能到此地步！」今年日人鑒於內地移民過多，突於三月二十一日由關東軍司令部公佈「外國勞動者入境取締規則」一通，禁止勞工前往，這樣，連農民將生命作孤注的機會也給堵塞了。等到農民窮蹙田間，走頭無路的時候，這種農村社會還

能安靜麼？

金融的涸竭，土地的集中，農民的離村——這一切一切都昭示着農村社會的崩潰，同時也逼迫着人們不得不籌謀救濟的辦法。今年二月二十四日河北當局曾擬定了一道救濟農村的方案，其中規定推廣事項二項，整理事項一項，籌辦事項四項（見次日北平報紙）完全着重在利用合作社的方法。不過以合作社運動來救濟農村，不會有什麼大的效果，這於前文已經述及。農村經濟的崩潰，農村社會的不安，自有它的原因，在這種原因沒有根本排除以前，農村經濟恐怕無法好轉的吧。

一九三五，四，二十七日。

十一 北平農產品販賣方法和市場組織的研究

張鐵錚

本篇所指爲農產交易市場，包括糧食市，花生市，棉花市，猪市，鷄市，鷄蛋市，和菜市等七個市場。大體上，這七個農產市場仍多是一種類似「集市」的組織，而爲每日開市。集場上的農產交易，多半以經紀業或牙行爲中心；交易的撮合擔保也便由他們負責。除了糧食市以外，在集場上，又全爲現貨交易。交易的時間，則多是自早六時起，至中午完結。

我們仔細的觀察，這七個農產市場，由於需給的，或交通的關係，所形成的市場性質不同。我們區別它的性質，可以分爲四類，如猪市，鷄市，鷄蛋市，和菜市等爲消費市場，花生爲經過市場，棉花爲終點市場，糧食爲移入兼經過市場的性質。

因爲這幾項農產的品質也不同，故有不同的販運方法。在集場上糧食可作樣本的交易，猪和鷄則須作實貨的交易。又在集場上，完成一種農產品的販賣，需要不同的行商來分擔販賣的職務，由於這種職務的分擔，而有不同的市場組織，我們比較北平幾個農產市場組織上的不同，則有下列數點：

(一)以經紀業爲交易的中心，如糧食市和菜市，他們向官廳領牙帖，完納牙紀稅，在市場上盡着爲買

賣兩方撮合交易評價等一切經紀應盡的職務；市場上農產交易，即以他們爲中介份子。

（二）以代客的牙行店爲交易的中心，如花生市，猪市和鷄市，他們除向官廳領牙帖，盡市場上的經紀職務外，同時並代表客方在市場上參加交易，更供給客方種種交易上的便利，如居處，伙食，收付款項等事。

（三）無須中介分子的介紹，如棉花市和鷄蛋市在市場上是買賣兩方直接舉行交易，不假經紀人的介紹，兩方成交以後，即自行過付款項，收取貨物。

依各業的營業性質，分爲下述三種機關，我們還可以指明它的組織上不同之點。

（一）代表客方在市場上參加交易，以收取店佣爲目的者，如糧食市之糧麥機，猪市之猪店，花生市之花生店，鷄市之鷄店。其他三市，則無是種組織。

（二）在原產地購買，至本市販售者，如糧市有米莊業，陸陳行業，棉花市有棉花莊，其他五市則無之，

（三）在本市購買，再零售與一般消費者。如糧市有米莊業，陸陳行業，米麵舖等，棉花市有棉花店等，猪和鷄二項，當達到消費者時，形質上已起變化，其零售與一般消費者，有肉局肉槓等。其他花生，鷄蛋和菜等，俱無專事零售店舖，花生僅附於乾菓舖或小販售賣，菜附於油鹽店售賣，或菜販售賣，鷄蛋則僅爲小販售賣。

此外尚有附於各業的一種組織，如糧食業有麵粉廠，麵粉分銷處等，猪業有白油店，腸衣店等，我們比

較各市場組織上的不同，絕不能說明某個市場組織上的優點或缺點，因這幾項農產品性質不同，所需要的販賣方法，和分擔販賣的各行業的組織，亦不相同。我們在敍述這幾個市場組織時，須要注意它的特點，它的形成原因，並且要個別的考察各市場之組織，制度等等。茲將這七個市場的詳細情形，述之如下：

一　糧食市

糧食需給及流通狀況　北平爲近數百年來建都之地，人口衆多，關於糧食的消費，據一有經驗的糧商估計，全市每年的麵粉消費量，約在四百四十萬袋之數，白米的消費量，約在四十六萬包以上，雜糧（包括玉米，小米，高粱和其他）的消費量，更多至二百八十萬石。麵粉一袋以四十斤計算，白米一包，以一百六十斤計算，雜糧一石，以一百五十斤計算，折成斤數則如下：

麵粉	全年消費量	一七六，〇〇〇，〇〇〇斤
白米	全年消費量	七三，六〇〇，〇〇〇斤
雜糧	全年消費量	四二〇，〇〇〇，〇〇〇斤

上項數字，係以全市糧店每日銷售數量，作爲估計的根據，這種估計，雖不能認爲十分準確，不過根據以前經濟討論處的估計，所謂北平糧食（包括粗細糧）的消費總量，每日至少當在一萬石左右（中外經濟周刊第一七二期）。因北平約有一百五十萬人口，糧食多賴外來，故實構成一主要的糧食移入市場。

移入北平的糧食，大部份經鐵路運輸，小部份則用旱車運來。旱車運進者，皆爲腹地所產糧食，產地與北平距離不遠，北平人稱之爲「伏地糧食」。由鐵路運進的糧食，白米麵粉，主要賴天津供給，經北寧鐵路運來，雜糧賴平綏路運來，至平漢線運入北平的糧食，則主要者爲芝蔴及小米兩項，其他雜糧，反賴北平運去供給，運去的糧食，最遠可達到順德站。北平東北數縣，爲糧產不足的區域，主要亦賴北平接濟。故北平爲糧食流通的一個中心，又帶有經過市場的性質。

糧市的沿革　北平的糧食交易，原有固定的交易地點七處：（一）東珠市口，（二）敎子胡同（廣安門內），（三）西直門外，（四）東直門外，（五）欖杆市（崇文門外），（六）安定門外，（七）朝陽門官廟。以前曾有九門七市之諺；據一老糧商的聲述，以前各城廟均設有糧店，類似一種經紀性質，買賣糧食，即在糧店內舉行，以後漸次發達成爲糧市。現在各城廟所設的糧店，多已歇業，糧食集中在城內交易，則只剩有三處糧市，（一）西直門外，俗稱「西市」，（二）東珠市口，和（三）敎子胡同，則稱「南市」。這三個市場的開集日期和在集市上交易的糧食，都不相同，我們試把它列表如下。

（一）西市（西直門外）每逢二，四，六，八，十等日（雙日）開市。每集交易的糧食：大米自五〇〇石至一〇〇〇石，其他雜糧自一〇〇〇石至六〇〇〇石。

（二）南市（敎子胡同）每逢一，三，六，八等日開市，每集交易的雜糧，約五〇〇石至一〇〇〇

石。

(三)南市(東珠市口)每逢五,七,九等日開市,每集交易的糧食自三〇〇石至三〇〇〇石,多為大米和麵粉。

糧業的分類　北平糧業的組織,計有四大種,即糧麥雜貨棧,大米莊,陸陳行,和米麵舖,它們的業務性質,約略如下:

糧麥雜貨棧　糧麥棧或稱為堆棧,其主要的業務,是代客買賣和代客轉運。有時亦自營買賣。糧棧代客買賣或轉運時,則以收取棧費和店佣為其最大收入,至對於客方所供獻的職務,第一是供給客商居處及膳食的便利,其次,客商運糧到平,並由糧棧代為卸貨,搬運存棧,再由跑外人每晨赴糧市代為兜銷。關於講價,過斛,收款等事,概歸糧棧代辦;辦妥以後,始索佣費。糧棧收費,可分為三項:(一)糧棧代客方墊付的費用,如牙稅,裝卸車費,發脚費等。(二)糧棧代客經營買賣,所取之經手費,如店佣,過斛費等。(三)糧棧對客方有一種設備時,始取費用,如伙食費,囤存費,倒囤費等。這三項費用中,惟第二項為糧棧眞正的營業收入。照西便門糧麥雜貨公會的規定,糧棧代客賣儎所取佣金,雜糧按交易值每百元收費二元,麵粉按每袋收洋四分。代客買儎,雜糧按每石收洋五分,麵粉按每百袋收洋一元。由糧棧賣出糧食,起儎時即由糧棧過斛,斛佣由賣方每石出二分。糧棧墊付的費用,如裝卸車費,仍照西便門糧麥公會的規定,二十噸車為二元,由車

站搬運棧內脚力，規定每百石爲五元。又在本市內發脚費，普通每包糧食爲二角，糧麥牙稅，每石爲二角四分。

糧棧對於客方存儲糧食的便利，規定取費，係按三個月爲一季。每季每石收費四分，囤存第二，三，四，等季，按季遞加。囤存時期過久，至欲行倒囤者，每石另收費三分。

各糧麥棧均設在本市西直，西便，永定，正陽等門各鐵路車站的附近，這是爲轉運糧食便利的原故。

大米莊　大米莊業，係專經營大米的批發生意，此處所稱爲大米，即南方所稱爲稻米。經營此業者，在北平又稱爲「米局，」資本較其他各糧行爲雄厚。營業的性質分爲兩項；一是「在外坐莊，」即在外埠販運大米；一是在本市作大米的零售交易。米莊在外埠販運大米，則有常川人員住在南省各產米區域，經營販運。以前採辦大米的地方，多往無錫，鎮江（均機器米，）南京，上海（均淸水米，）蕪湖，蚌埠（均秈米）等處。間亦到漢口（湖南米，）信陽州，等地方。以後因上海米禁止出口，長江發生水災，米產不足，在近幾年來，轉多往香港採辦西貢，仰光，敏黨，暹羅等米。米莊在外埠採辦的大米，即轉運他處銷售，同時並就近在天津批買，購定的貨，即自運來平，在門市零售。運到的大米，若爲粗糙的秈米時，尙須重行加工精製；故北平各大米莊，均有碾米設備，將一種白砂子之白色粉末和於米中碾之，利用砂粉的磨擦碾去秈米的臍頭，碾後加以篩簸，即成爲精白米。出售時分爲零售和躉售，零售是賣與各食戶和飯館，躉售則在糧市上舉行，賣與

本市的米麵行。

米莊近來多營麵粉的批發生意，他的營業方法有二(一)代麵粉公司推銷麵粉，取「回扣錢」(二)到天津批買麵粉，在門市或糧市批售。

米莊多設在宣武門外騾馬市大街，和崇文門內米市大街一帶，至設在本市四城的各米莊，稱爲大米麵粉的批發商號者，多是以前的陸陳行業，與眞正的米莊業有別。

陸陳行業　陸陳行業是糴糶稜，角，方，芒，稻，穗等六種糧食，稱爲陸陳廣聚。一方既營批發的生意，又兼作門市的零售買賣。其採辦雜糧的地方，以前多在平綏綫，最遠到包頭，薩拉齊等地，平漢線則到新鄉以北各地；津浦線最遠到明光，蚌埠等地。九一八國難以前，尚到北寧線新民，溝幫子等地採買糧食。據前經濟討論處的估計，北平人口食麥豆雜糧者，佔十分之七，食米者不過十分之三；(中外經濟週刊第七十二期)故此陸陳行業在北平糧業中，亦殊占重要地位。至所謂稜角方芒稻穗等，是代表下述的各種糧食。稜(蕎麥；)角(豆類；)方(芝蔴；)芒(大小麥；)稻(秈米，糯米；)穗(穀，糜，黍，高粱稷。)

米麵舖業　米麵舖或稱爲雜糧店，它們的營業，是在本市批買雜糧和麵粉，再直接賣與一般消費者，故此雜糧店不集中在一處設肆，而分散於內外城居民的中心地點。且雜糧店多兼售油鹽雜貨，又多自備石磨，碾磨伏地麵和玉米麵等。

雜糧店磨麵，近來多改用火磨機，總計本市六七百家雜糧店，用火磨機磨麵的已有二百餘家，用電機只有十餘家，其餘仍是用舊式畜力拉的石磨，所磨麵粉，除伏地麵外，多爲玉米麵和小米麵，用這三種磨麵機來磨麵，每日夜的產量，比較如下：

	玉米麵	小麥麵	小米麵
電力機	五，〇〇〇斤	二，四〇〇斤	三，五〇〇斤
火磨機	五，〇〇〇斤	二，四〇〇斤	三，五〇〇斤
石磨	七〇〇斤	四〇〇斤	—

上表電力機，火磨機和石磨，每日夜的磨麵量相差極遠，不過機器的購置費，和每日機器上的消耗，也相差極鉅，石磨每套僅值二十元，電力機二十五馬力的（磨兩盤）則值一千二百餘元。又每日的消耗，除人工外，石磨僅用畜力，消耗極少，電力機則每月平均修理機器費須四五十元，每日所用機器油，須四五毛錢，每日用電須十一二元（用電每月在四千字以下，每字電費一角二分，過四千字，則每字電費爲八分。）故資本小的雜糧店，率皆設備不起。

以上爲組成本市糧業的四大組織，另外又有保定乾益麵粉分銷處，三陽麵粉廠，雙合盛啤酒公司，及本市糖坊，酒坊，油坊等。三陽麵粉廠係在民元年間成立，後至民十九年曾改組一次，現在僅有工人三十餘

人，每月可出麵粉一萬五六千袋，對於本市糧業組織，並不占一重要位置。啤酒公司所需大麥原料，多在徐水，固安，及平綏路宣化，新保安等地採買，又與本地糧食交易的關係較少。

交易的程序　北平糧食交易，係為樣本交易，賣方不須運糧食到市場上發售，僅用樣品在市場陳列，任顧客的選擇，稱為「看小樣」，購糧者，先看貨樣，再議貨價，貨價議妥，即由經紀人，代寫市帖，寫明兩方糧食交易的數量和價值，一付給買方，一付給賣方。在習慣上，市帖向只專給買方，不給賣方。賣主向買主交割糧食，須待散市後，三五日或八九日，最晚不得過半個月，同時買主亦將貨價交付清楚。

在糧市上交易時，所稱為賣主，並非全為貨主，買方亦非為本市一般消費者，蓋除本市糧號在糧市上參加買賣外，便是代表外地客商經營糧食買賣的糧棧。故分析糧市上買賣份子，大概賣方，多為本市經營糧食批發生意的大米莊，及隸屬於本市陸陳行業作販糧生意的糧號，再為代客糧棧，和外埠在平所設的麵粉分銷處。買方則多為本市雜糧店，製粉廠，糖坊，油坊，同時糧棧並代表買客在糧市上參加交易。

糧市上成交糧食，由經紀人開寫市帖後，始由買方給與經紀人佣金，雜糧每百石為銅元六十枚，麵粉每百袋二十枚。經紀人在此一方面所收佣金雖少，但逢年節，則在糧市上常作交易的各糧號，均須付給節費。至論其對於糧食交易上所供獻的職務，則僅開寫市帖而已。實際上，此種市帖，亦不能作為一種交易上的擔保，在買賣雙方交割糧食時，如有糧食作假，款項延宕，亦非持有市帖，便可解決。不過在北平糧食交易，

尙少發生此種情形，原因則不外交易兩方，俱以舖號作信用的擔保，客商既委託代客糧棧在市上作交易，與本市糧號並無直接交易關係。賣方賣出糧食，須雇脚力送貨至買方，脚力由賣方付給，前述發脚費，即代表此項費用。買方將糧食收訖，付清貨款，交易手續始告完成。

交易的單位　糧市上雜糧及大米交易，均以石爲單位，麵粉則以袋爲單位，每袋麵粉計重四十斤。石則以市斛兩斛爲一石，所謂市斛，以前分三種，卽東市斛，西市斛，和安市斛三種，廣渠門內糧市（卽欖杆市）用東市斛，廣安門及西直門糧市均用西市斛，安定門官廂糧市，用安市斛；安市斛較西市斛每石多二升，每升糧食重爲一斤零八兩。現在北平各糧市皆通用西市斛一種，兩斛爲一石，又合老斛管爲二百管，每管的容量，大米重十三兩，小米亦同，高糧十一兩，雜糧中惟芝蔴以老斛二百零八管爲一石計算。在交割糧食時，高粱，玉米，小麥，大麥，蕎麥，穈子，黍子，白米等，均按每石折成若干斤過秤，小米，黃米，黃豆，黑豆，綠豆，穈米等，仍按石數計算過斗過秤的各種糧食，每石折成的斤數如下：

高粱	每石	一四〇斤	玉米	每石	一五〇斤
小米	每石	一五二斤	大麥	每石	一五〇斤
蕎麥	每石	一一五斤	穈子	每石	一五〇斤
黍子	每石	一五〇斤	白米	每石	一六〇斤

在糧號門市上批發或零售交易，均以斤數作單位。米莊門秤稱爲包過秤，以一百六十斤爲一包，合官秤（前農商部秤）一百四十斤，市秤一百五十二斤，京平一百五十五斤。雜糧店零售糧食用京平（每斤比市秤小三錢二分）稱爲油麵秤，批發糧食用市秤（每斤比京平大三錢二分）市秤又爲北平最通用的秤。

二　花生市

花生集散狀況　花生爲一種油類作物，可榨花生油，和芝蔴油同爲供吾人的食用。不過北平既無規模較大的花生榨油廠，同時北平居民對於花生油亦不甚歡迎。花生在北平僅供「零食」消費極少。惟因平東北數縣，俱爲花生產地，故在北平的集散數量，尙有可觀；若論市場地位，則遠不如糧食市爲重要。據花生商的估計，每年運入北平花生的數量，約有八百萬斤，分爲生熟花生及花生仁三種；熟花生運進的數量較少，且在大秋以後，始在市場上發現，至次年舊曆三月間，卽行絕迹；在此時期內，生花生在本市雖見減少，但在每年生熟花生輸入總量中，生花生尙占十分之六，熟花生佔十分之四而已。花生仁輸入量，又較帶殼熟花生爲少，僅占花生輸入總量的十分之二，茲比較生熟花生及花生仁每年輸入的數字如下：

	每年輸入量
花生仁	一，六〇〇，〇〇〇斤
帶殼生花生　同　上	二，五六〇，〇〇〇斤

帶殼熟花生	同　上	三，八四〇，〇〇〇斤

據崇關民十八年份貨物統計表所列，則花生仁輸入北平者爲二百三十九萬六千八百五十九斤，帶殼生熟花生爲六百〇八萬七千四百四十四斤，和現在情形比較相差不多，可見年來花生輸入北平，在量的一方面始終未有甚大的變動。又據本市社會局調查花生在本市銷售者僅占輸入的四分之一，其餘四分之三，皆轉運天津行銷外洋（北平市工商業概況P三六六）故花生在北平只形成一個經過市場的性質。

花生的來源，最主要是順義縣所產的花生，運進的數量也最多，其次則爲昌平及懷柔縣所產的花生，而運進的最少縣份爲密雲縣；大興宛平兩縣亦爲花生產地，與北平距離密邇，故亦以北平爲唯一市場。各縣輸入北平花生的數量比較，依花生商的估計，列如下表：

	帶殼生熟花生	花生仁	合　計
順義縣	三，〇〇〇，〇〇〇斤	三〇〇，〇〇〇斤	三，三〇〇，〇〇〇斤
大宛兩縣	二，〇〇〇，〇〇〇斤	二〇〇，〇〇〇斤	二，二〇〇，〇〇〇斤
昌平縣	七〇〇，〇〇〇斤	五〇〇，〇〇〇斤	一，二〇〇，〇〇〇斤
懷柔縣	六二〇，〇〇〇斤	五五〇，〇〇〇斤	一，一七〇、〇〇〇斤

密雲縣	八〇，〇〇〇斤	五〇，〇〇〇斤	一三〇，〇〇〇斤
總計	六，四〇〇，〇〇〇斤	一，六〇〇，〇〇〇斤	八，〇〇〇，〇〇〇斤

上述各縣所產花生，主要以北平為銷路，運輸工具，均用大車，有時亦用騾馱。

市場現狀　北平的花生市，分為南市和北市，南市設在前門外大蔣坊胡同，北市則設在德勝門裏丁字街，兩市上均有牙行店，或稱花生店。由各縣運來花生皆卸落在花生店內，交易時就近在店內舉行，交易的時間，多在早晨舉行。

花生在北平為乾菓行所購售，北平的乾菓行店，又多兼營乾菓業，故有乾鮮菓行公會的組織。花生與其他乾鮮菓行均在一處設肆，乾鮮菓自亦在同一處交易，故前述兩個市場，普通稱為菓子市，並非純粹花生市場。南市有花生店四家，北市一家，至齊化門內及東直門內，雖各有花生店一家，且有花生交易，但均非交易市場。民四年有孔士培者，欲包攬南北市原有各行店業務，另在天橋地方設立乾鮮菓店，集中一處舉行交易，幾至將此原有兩市場消滅。目前南北兩市，則以南市佔優勢，花生的交易額，亦以南市為多。

行店業務　北平乾鮮菓行同業公會，由乾鮮菓行的行店和「倒莊」所組織的，「倒莊」是自營買賣的菓行，行店即是菓行的經紀，總計北平有倒莊菓行三十餘家，行店二十餘家。二十餘家行店，僅有花生店七家。他們對於花生販賣的主要職務，為評價與過秤，以前當崇關未取消時，花生進城，照章應納捐稅，故

客商運來花生，例須先入行店，由行店代徵此項捐稅。行店除供給客方種種之便利外，又盡下列三種義務：（一）代客銷貨，（二）墊借款項，（三）供給客商住室。花生卸落行店後，即可委託行店代為銷售，一切講價，過秤，收付貨款等事，均由行店代辦，客商概可不必過問，待至花生脫手，而貨款尚未收回時，又可由行店墊借款項，惟墊款數額，僅按貨價的十分之六，即客商賣出一百元花生，行店可墊借六十元，以後待貨款收回，即在內扣除。惟行店本身固無資本，其周轉款項，又賴由銀行貸借。

倒莊菓行，資本充實，經營菓品，不限於鮮菓類，或僅為乾菓類，惟彼等收買花生則亦在行店內收買，再轉運天津銷售。市場交易全為現貨。成交以後即送貨與買主，但買方不必當時付款，照例是在舊曆節年時，結清賬目。其他參加市場的買賣份子，除本市乾菓舖（或稱海味店）外，便是零售花生的小販，他們每家購買的數量自極有限，而且多是現貨現款的交易。

〔註〕以前崇關所徵的花生稅，係按每千斤為銀碼七錢計，又有崇關監督的辦公費，帶殼花生另徵三分之一，即二錢三分，花生仁加徵四分之三，即五錢二分五；此外尚有差兵（即稅丁）門飯錢，每馱為一角。以後稅率改訂為按銀洋每千斤抽一元五角，帶殼花生與花生仁劃為一律，崇關監督公費取消，但差兵門飯費仍存，及崇關裁撤後已全行豁免。

經紀制度　行店所領牙帖，稱為乾菓行牙帖，每年由乾菓行公會代繳牙稅二千二百元，然後再由二十餘家行店分攤。此項牙稅，曾在前順天府登記，期限為二十年，在期限內牙稅數額不能增減。登記原因，則

因有孔士培者包攬行店業務，行店爲鞏固自己地位計，始以團體名義，包繳長期牙稅。起訖時期，則自民四年起，至民二十四年止。菓行公會旣包繳此項牙稅，故在北平設立行店，須經公會認可，並須分擔牙稅，由公會發給牙帖。其牙帖分爲專帖和普通帖兩種。乾鮮菓中杏仁，桃仁，瓜子，花生，西瓜等牙帖爲專帖，行店僅專帖．如爲花生帖，則僅可營花生經紀職務，但每家同時可領數種專帖。其他概爲普通帖，不限制乾鮮菓的種類均可代客介紹交易，評價，和過秤等。現在由公會所發的牙帖，合專帖與普通帖兩種，有五十五張。每張帖費（卽牙稅）臨時規定，僅爲攤足二千餘元的牙稅爲止。

行店代表客方經營交易，其唯一收入爲佣金。花生店的佣金，最初（清光緒年間）曾按交易值買賣各出三分俗稱爲內外三分。不久又增加爲買賣各出店佣五分，按現在北平市財政局公布牙紀收佣辦法，則買賣兩方所出者，均不得超過交易值的百分之三。而實際上，南北兩市花生店近來取佣辦法，多有更張，北市規定帶殼花生每百斤，賣方出佣五分，花生仁每百斤出佣七分，買方則不出佣。南市花生店，亦取佣於賣方，惟佣金無絕對的標準，大概每百斤最多爲九分，最少爲五分。

交易單位　市場上花生交易，以斤數爲單位，至所用的量器則極爲複雜。北市所用的秤爲三釐秤，南市所用者，帶殼花生爲市秤加二，花生仁則用直秤（準斤市秤）齊化門花生店，則大致與南市同，惟帶殼熟花生用市秤加一。又其他乾菓所用的秤，更不相同，爲便參考計，附列如下：

直　秤（準斤市秤）	杏仁，桃仁，瓜仁，花生仁等
市秤加二（每百斤加二十四斤）	帶殼花生一種
市秤加一七（每百斤加十七斤）	白瓜子一種
市秤加一（每百斤加十一斤）	花椒，杏乾，燋棗
市秤小五秤（每百斤加五斤）	黑瓜子

三　棉花市

棉花需給狀況　北平為棉花貿易的終點市場，運進的棉花，大都為本市居民消費。歷年來，本市棉花消費量，固無極大的變動，但有時因駐紮軍隊過多，冬日添置棉軍衣，往往需要量增加。據北平棉業公會報告，民五年至民十五年北平花衣消費情形如下。

	全年消費量
民國五年	六〇〇，〇〇〇斤
民國十二年	一，二〇〇，〇〇〇斤
民國十三年	六〇〇，〇〇〇斤
民國十四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斤

民國十五年	九〇〇，〇〇〇斤

花衣作塞被用，經過彈鬆的手續後，叫做棉絮，彈花衣爲棉絮，分量上並無多大的增減，故花衣的消費量，實際上可代表棉絮的消費量。依上表，民十二年爲消費額最高的年度，民五及民十五爲最低的年度，平均觀察，每年消費約在九十萬斤至一百萬斤之間。又據棉商估計近五年來每年棉花消費情形，不過略增爲一百一十萬斤之譜，若和北平人口數相比，每人消費尚不及一斤棉花。（北平人口總數，近五年來，約在一百四五十萬人之間）

北平消費的棉花，依性質和產地的區別，分爲州花和縣花，州花是粗絨花，原產地在涿縣（以前爲州治，稱涿州。）縣花是細絨花，原產地在平谷縣，故又稱縣花。州花和縣花，原是由於產地不同，相對的命名得來；實際上，北平棉花的來源地，除上述兩地外，在北寧路尚有武清屬的楊村，在平漢路有容城定興兩縣，武清縣楊村一帶所產的棉花，在天津稱爲東北河棉，是美國種，絨細而長。容城定興兩縣的棉產，包括州花縣花兩種，大概容城又多細絨花，定興則多粗絨花。

在北平附近的南苑，也是最著名的棉花產地。該處係一片空地，從前爲清皇室遊獵之所，民國後，歸政府管轄，租與民間墾種，所植棉花爲純美國種，棉絨細長，在北平稱爲高線花。除去南苑，在北平城西藍靛廠，海甸等地，也有不少的棉花，北平城圈內的左安門空地，亦有棉花的出產。

這幾個地方，全是供給北平棉花的消費。不過容城定興一帶，都是旱田，棉花能否種植，全看春日有無雨水而定，且耕種後，每年的收穫量，也極不一定，所以遇到容定兩地棉花歉收時，北平棉商便多到定縣，唐縣，最遠到石家莊等地收買棉花。石家莊一帶，水田甚多，棉花收穫，較為可靠，不過該地棉產，向多轉運天津，北平因需要甚少，且販運上亦不便利，故該地棉產在北平市場出現的機會較少。

棉業組織　北平經營棉業者，統稱為棉花店，分設在內外城，所有棉花店，大小合計不下五十餘家，他們的營業，可分作兩等，一是棉花店為批發零售兼營者，普通又都稱為棉花莊，他們的資本，約在二三千元上下。批發棉花莊，都是自己派人到各地收買花衣，運到北平，就原包批與小棉花店，又一部份彈棉絮，批與本市洋貨布店，或自行在門市零售出去。再是專在門市零售的小棉花店，它們因為資本太小，不便派人到原產地收買，只假手於本市棉花莊收買花衣，再加以彈鬆的手續，在門市零售。因此，無論是批發莊或小棉花店，皆自備有彈棉機，彈棉機多為木製，用人工彈棉，近來安設電機彈棉的僅有八九家，所用電機，皆為本市鐵工廠所造，每架價洋約一千數百元。

花店彈棉，除去幾個大棉花莊有固定的彈花工人外，其餘大概都是臨時僱用的工人。雇用的工人，率為北平附近的農人，他們工資的給付，分為按月，按日，和按斤三種，大棉花莊，皆用前兩項辦法，小棉花店，則採用後項的辦法。工人對於彈州花和線花所得的報酬相同，因線花的纖維長難彈，每日可彈十五斤至二

十斤，每斤工資較多一倍，州花的纖維粗易彈，每日可彈出三十斤，每斤工資較少一倍，若按月或按日給付工資，自無此種區別。

花衣彈成棉絮，須先將花衣稍加水氣，因此彈出的棉絮，每百斤可漲出十斤或五斤，由水氣所加重的斤量，可以歷時很久，即或乾燥時，還可重行加水，並無妨礙。棉花店將花衣彈成棉絮，在量的方面非但未受損失，且有額外的獲利。

在北平經營棉業的，除上述的棉花莊和棉花店外，尙有發售舊棉絮的店舖，它們皆設在朝陽門，德勝門，廣安門各門臉地方，專爲收買舊棉絮，彈鬆後再行賣出，每斤舊棉絮約值一角，每斤手工工價爲二十枚。

販賣制度　北平棉花販賣，以前概歸棉花牙行專辦，後因牙行把持過甚，棉商羣起反對，由前京兆財政廳命令取消牙行，並依農商部頒佈的商會法，於民國五年，由棉商組織京師棉業商會（以後改稱爲棉業同業公會）代替牙行爲官廳徵收棉花牙稅，故凡運進北平的棉花，率須先到商會領稅單和查驗封緘（查驗封緘爲查驗重量交納牙稅的憑證）。繳納牙稅以後，即可在本市自由販賣。惟本市並無一定的棉花交易的地點，小棉花店批買棉花，亦須自行到棉花莊收買。交易的單位，批發貨概用市平，零售貨則用京平，每市平百斤較京平多二斤，零售棉花，又按「個」賣，每「個」名義上是京平半斤，實際「分量」則尙不足半斤。每百斤價格，照現在的行情，粗花爲五十元，細花爲五十八元，（註一）比較棉花莊在原產地購買花

衣時所付的原價，約高二十元，若減去其買來時所付的運價，和彈花所付的工資等項費用，則每百斤亦可賺十二三元。棉花店所賺的利率甚高，不過他們的營業時間，却非常短促，每年自陰曆七月起，始略有生意，至九、十、十一、十二，四個月最爲旺盛，到了次年正月，則成强弩之末，二、三、四、五各月，則無生意可作，至七月又稍抬頭。一年之間，僅有半年的營業，無怪它們賺的利率較高了。惟小棉花店在夏季並不歇業，皆改賣夏季貨，如涼扇，涼蓆，竹簾之類。

（註一）粗細花實在價格每百斤爲四十六元及五十三元，我們在計算棉花店所賺的利益，則將彈花時因水氣加重斤數，多得的價格，也一併算在裏面。

棉花捐稅　棉花的捐稅，以前分兩種，一是城門稅，卽崇關稅，係從量稅，每百斤棉花徵稅二角二分，另外每張稅單加洋二角。從量稅又係按淨斤計算，每包棉可以扣除皮重十斤。城門稅歸前京師稅務監督公署徵收，現在已取消。二是牙稅，經徵機關前爲大苑牙稅局，近由本市財政局接辦，是爲地方稅，卽前述棉業公會代徵的牙稅，稅率當民十五以前每百斤爲四角，民十五年以後則爲八角。現在分爲穰棉每百斤八角，籽棉每百斤三角。所收牙稅，以八成歸公，二成爲經手費，每十日向官廳報繳一次。至棉業公會經費，亦賴此項經手費維持，不足時，則由五十餘家會員公攤。

四　猪市

豬的來源　北平豬的來源多半爲火車運來，小部份則自旱路用大車或由人「趕逐」運來。依產地的區別，則分爲西口豬，車豬，北口豬，本地豬四種。西口豬包括平綏線懷來，延慶，張家口，大同，及山西省太原所產的豬，皆由平綏鐵路火車運來。車豬是平東八縣所產的豬，皆用大車運來。北口豬則爲古北口以外一帶所產的豬，本地豬則爲北平附近及平北昌平，順義，密雲，懷柔，平谷一帶所產的豬。北口豬和本地豬又皆爲「趕逐」運來。總計各地運來的豬，每年不下四五十萬頭，其中西口豬約占十分之四，本地豬約占十分之三，車豬及北口豬共佔十分之三。因豬和其他農產品不同，不便於來往販運，故運進的豬，即全供本市消費，故本市爲豬的消費市場。

各地運進的豬，大概以舊曆八月節以後至次年五月節前爲多，在此時期內，北平對於豬的消費較大，故各地豬乃能源源運入。若就豬的品質來講，則平東八縣飼養的豬爲佳，因該區內養肥豬極盛行，養豬飼料，多用黑豆，肉量既豐，味亦肥美，極受本市食戶的歡迎。西口豬大多瘠瘦，品貨較次。

豬店公會　豬店公會，（註二）以前稱「慶司老會」，成立於清嘉慶年間，約有二百年的歷史，入民國後，始改稱爲豬店公會。據一豬商談述：「慶司」原爲「慶祝皇司」的意思，命名上原無甚大意義，不過加入會員，全爲豬店行，故以後始以豬店兩字冠以會名。現在北平豬店共有四十八家，計設在東四一帶者有四十二家，設在西四一帶者有六家。豬店的業務，則爲代客交易性質，供給客商住室伙食均不取費。客商運

到猪時，則有猪店雇用的外鞭行十三人，將猪趕入店內(註三)外鞭行每人每月的工費為八元，但他們每日僅在齊化，東直，安定三門等候猪客，依猪客指定的猪店趕進城內入店；每鞭猪由客方給與外鞭行八十枚，每鞭猪數自三個起至一百個為止，過一百個猪時，便算兩鞭之數，須另出八十枚銅元。惟此亦僅為一種粗略的規定。實際上販猪進城，須繳牙稅，繳牙稅時，則按「一羣猪」起牙票一張，外鞭行則又以每張牙帖，算為一鞭猪，不按每羣猪實際的猪數來計算的。

外鞭行自接替客商將猪趕入城內，以至將猪賣出為止，若猪有跑失，或因猪在趕進時，將城內擺設的攤挑撞壞，均由猪店負責包賠。猪店對於客方供獻的職務又有(一)代繳捐稅——牙稅及檢驗稅，(二)代客販賣，(三)收付款項，等事。

各猪店均有廣大的院落，且支有草棚，專為客方飼放猪用，飼料亦由猪店代買，取費標準，則猪入店後三天內每頭猪為三角，以後每日每頭猪飼料費為二角。猪店另雇小鞭行，小鞭行除管理飼猪外，每日開市時，並由小鞭行將猪綑綁上市，猪店派人賣出以後，再由小鞭行將猪趕送買主，買主給與辛力錢每個猪四大枚，此外猪店不出工錢，惟院內猪糞歸小鞭行打掃售賣。故其收入，亦有可觀。

猪店代客賣猪，以取店佣為其最大收入，以前規定口猪每頭店佣為銀碼二錢，車猪每頭店佣為三錢，現在一律改按每頭猪店佣為銀碼四錢，由買主出。

（註二）猪店公會為猪店團體，會中經費，即由猪店攤付維持，猪店代客賣出一頭猪，須繳會費洋一分，而公會亦極盡維護猪店營業之能事，即前述各猪店雇用的外騣行十三人，實際上乃是公會雇用之人，因外騣行工資，係歸公會支付。此外在東四舉行猪的交易時占用地皮，每月由公會向官廳繳納二十六元一角之地租，又每月猪店舖捐（一稱統捐）六十七元二角，亦由公會支付。現在因公會經費，已積有鉅款，不再收猪店的分文會費。

（註三）以前外騣行僅稱為騣行，並非為公會雇用之人，惟其職務，與現在的外騣行同，每騣猪數由三個至五十二個，每騣收辛力錢為五十六枚。又現在其他各門（除齊化東直安定三門）另有騣行，取費亦為每騣猪為五十六枚。

猪業食品公會　猪業食品公會在民八年間成立，當時加入的會員有白油業，湯鍋業，小腸業，肉局肉槓等。迄民十八年至民二十年間，除湯鍋業外，其他各業相繼退出，另行成立公會，故現在食品公會的加入份子，僅為湯鍋業。（註四）總計全市有湯鍋二百餘家，入會的有一百四十餘家，它們以屠宰為業，故普通均稱為屠戶湯鍋，分設在東四，西四兩猪市附近的地方。

各湯鍋的資本均不甚大，每家均僅在一千元上下，它們在猪市買來活猪，即於當夜宰殺，次早賣出，故湯鍋業亦不須較大的資本。湯鍋在市上買活猪，每個猪所出店佣為銀碼四錢，另外則有屠宰稅等，買進後，並須於當日付清貨款。因市上猪的交易，均以銀碼作價，付款時則按三釐五扣色，折為洋元計算，即以一兩銀扣去三釐五再按七錢五折為洋元，至將猪宰殺以後，即賣與本市肉局肉槓，猪的附產物，如腸肚脂油等，

則與本市小腸局白油局及專賣下水肺肝的小本營生者售賣，經營屠戶業的，以山東掖縣，招遠，萊陽等處的人最多。

（註四）湯鍋繳納會費，係按宰殺猪數，每殺一個猪，出會費二分。

以上猪店及湯鍋兩業，爲猪市的一個基礎組織。在猪市上，客商全爲賣方，湯鍋全爲買方，其在買賣方中間活動的，則爲代客的猪店。至猪宰殺後，猪的本質上起變化，即死猪的交易，已另成一個市場，在市場上，湯鍋業已轉而居於賣方的地位，它的交易對象，則如下述幾種：

肉局肉槓　這兩業都是售賣猪肉，直接與本市的消費者。不過兩者營業性質，稍有不同之處，（一）肉局係專賣生猪肉，肉槓則兼售熟猪肉。（二）肉局多與附近飯莊業交易，且有不作門市零售買賣者。肉槓則主要是以食戶爲其主顧。（三）肉局多加入白油業公會，肉槓則皆加入飯莊業公會。又肉槓普通稱爲醬肘舖或稱鷄鴨店，分設在本市內外城各街巷。

白油業　白油爲生熟的猪油，在本市經營此業的，稱爲生熟白油局，總計有十三家，均設在屠宰場附近的地方，且大都爲山東人所開設，他們向屠猪者訂購脂油（又名板油）一面再轉賣與本市飯莊業，點心舖和其他各處，此種稱爲生白油局，有五家。又有向屠戶購買掛油（又名網油，）加以融煉，再轉賣與各處者，稱爲熟白油局，共八家。生熟白油局的資本，皆甚微薄，有時且不用資本，隨買隨賣，從中博取微利。

白油局在本市賣出之貨，須送至買主處，故每家均有跑外夥計四五人，至白油在本市的銷數，生油每月約二千餘斤。熟油約三千餘斤。熟油且往外埠銷售，每年銷數最旺時，達四五萬斤。

腸衣業　本市經營腸衣業者分爲：(一)猪腸局，(二)腸廠兩種；在清時營業尙不發達。猪腸的用途，僅可充作低品食料(卽現在街市所賣的管腸，)每條值當十錢一百文(現在猪之小腸值洋二角。)業腸衣者，合羊腸局在內，不過十餘家。自民國後，出口腸衣，逐漸增多，又因外洋腸價飛漲，外商在華收買腸衣，往往先付貨款，分期收貨。故本市腸商獲得鉅款，可以週轉，除盡量的在本市收買外，又多分往新疆，甘肅等省收買，營業遂形擴大。現計腸衣商舖總數，不下六十餘家，內腸廠十三家，羊腸局四十餘家，猪腸局十餘家。腸衣工人，亦不下四百餘人。

猪腸局買入猪腸，須用人工刮製，再賣與腸廠。腸廠設有大木箱及自來水管，放水沖入腸內，復將木卡子裝入，再加水沖。依腸衣桶的粗細，分爲頭，二，三，四，五，六，等貨桶，細者爲頭等。待用水沖畢卽量妥碼數。或一百碼爲一把，或九十三碼爲一把，然後批賣與外商，至於價格的訂定，全由外人所操縱。近來因腸商屢對外商失信，又因外商對於腸衣挑剔過甚，此種行業，已有日漸衰落的趨勢。

猪鬃業　在北平經營猪鬃業者，可分爲兩種，(一)是無營業定所，而專以收買猪毛爲業的人，(二)是專爲整理剔梳毛鬃，往外運售的猪毛廠。前者多爲山東人經營，每日黎明，卽揣袋赴屠猪場收買，他們善於

辨別鬃毛的成分和分量，收集稍有成數，即轉賣與猪毛廠。後者營業地點，多在東四大小豆腐巷，及崇文門外，彰儀門內各地方總計不下一百四五十家。它們雖有營業定所，但多不向官廳呈報。它們由猪毛販手裏收買猪毛，加以整理，然後將鬃綑束小紮，毛則盛入蔴袋內，均備向外推銷，僅有小量的猪鬃，是銷售與本市二十餘家的刷子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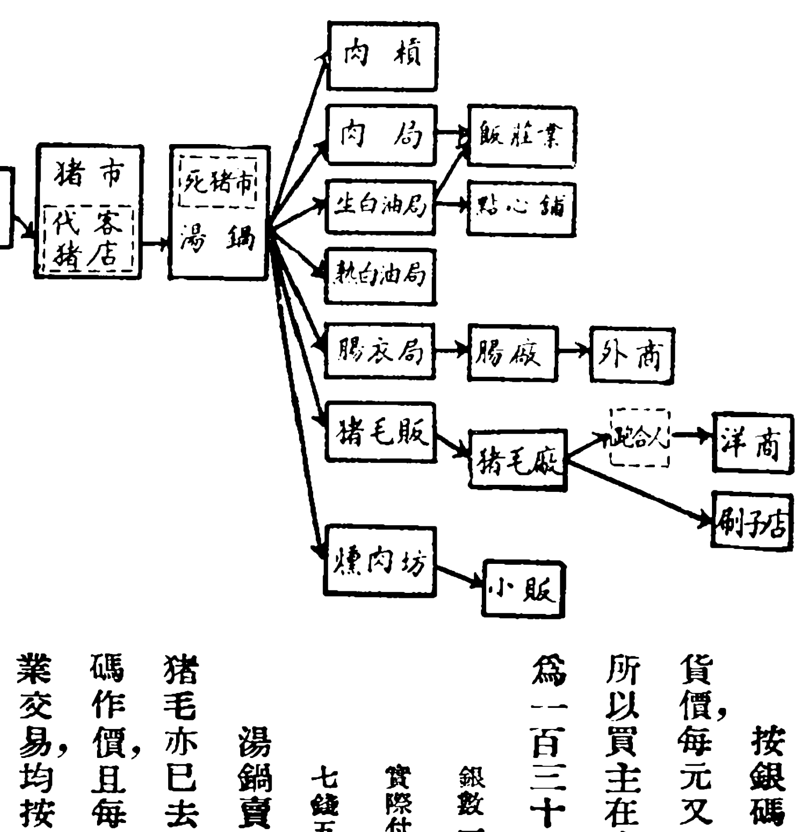
往外運銷鬃毛，原有外商派人到本市收買，收買時，且另有跑合人從中介紹，抽取佣金為百分之二。他們交易方法，則為現貨現款交易，有時雙方亦訂立合同，先交定款，候至交貨期近，再將餘款付清。

燻肉坊　燻肉坊是以燻猪頭肉為業，全市共有十餘家，他們也是向湯鍋收買猪頭，自行燻製，燻製的方法，則用鐵篩一個，將猪頭放在鐵篩上，再用蒸籠扣罩，鐵篩下燃燒木屑，歷一小時之久，即行燻成熟肉，轉賣與小販。

上述猪市的研究，最饒興趣，因猪市的組織，原來甚為簡單，不過，猪宰殺後，又復形成幾個不相同的組織，我們為表示他的組織系統，另列表如下（見次頁）

交易制度　北平猪市，分設在東四及西四兩個地方，每日清晨，由猪店內將猪綑綁上市，買猪者即在市上看貨，就賣主的「一綑猪數」按銀碼作價。自然「一綑猪」內也有大小肥瘠之分，但最有經驗的買主，只須將猪尾提起，便可看出每個猪出肉的斤量，然後計算「一綑猪」的價值。猪店雖代表賣方在市場

上交易，不過價格講妥。尙須經過貨主同意，始能成交，若當日未能賣出則仍將猪放回店內，次早再行綑至市上售賣。



按銀碼作價，係以銀兩數作單位，以後再折為洋元過付貨價，每元又以七錢五分計算，買主再按每兩的三厘五扣色。所以買主在市上買一百兩銀子的猪，實際給付的洋元價格為一百三十二元八角七分。折算的方法如下：

銀數一〇〇兩扣色	〇·三五兩
實際付給銀數	九九·六五兩
七錢五為一元折合現洋	一三二·八七元

湯鍋賣出的猪，為已宰殺的死猪，腸肚下水皆已取出，且猪毛亦已去掉，每個猪劈成兩大肉片，就每片肉賣出。亦以銀碼作價，且每元亦以銀七錢五折算，只不須扣色，肉局與飯莊業交易，均按斤數計價，秤則用京秤。比市秤每百斤約少二斤半。肉槓賣與一般消費者，則每斤按銅元價格為若干枚。

猪的捐稅　活猪進城所繳捐稅，計有三項，即牲畜稅，牙稅，和牲畜檢驗費是，玆分述如下：

(一)牲畜稅係在清乾隆年間舉辦，歸左右翼衙門經徵。民國後，左右翼曾併入京師稅務監督公署管轄。十七年十二月，稅務監督公署裁撤，始改由本市財政局賦捐稽徵所接辦。這是一種地方稅，稅率最初為京錢，每頭猪繳稅二百八十八文，自民國八年八月，改用洋元為本位，每頭猪為二分一釐。至十二年一月重加修正，除正稅外，又加徵辦公人員的津貼飯洋一項，如火車猪正稅九分，飯洋另加三分，不久飯洋又併入正稅徵收。嗣賦捐稽徵所改稱稅捐稽徵所，分設第一，二及北郊分所，與什方院一個分卡，徵稅標準，則因猪的來源地不同而區別高低，有如下表。

	第一分所（每口）	第二分所（每口）	北郊分所（每口）	什方院分卡（每口）
市猪	○·○一五元	—	—	—
家猪	○·○一五元	—	—	—
外猪	○·○五○元	—	—	—
小猪	○·○二五元	—	—	—
花市大猪	○·○五○元	—	—	—

東嶽廟大猪	〇·〇五〇元	—	—	—
閘猪	—	〇·一一〇元	—	—
行販猪	—	〇·〇二四元	—	—
入市猪	—	—	〇·〇六〇元	〇·〇二一元
火車猪	—	—	—	〇·一二〇元

(二)猪的牙稅，原爲一種牙紀稅性質，事實上因猪市並無猪牙紀，故以往皆按「每口猪」規定稅率，由官廳直接徵收。相沿至今，迄未變更，其徵收機關，在民四時，爲大宛牙稅局，民十七年以後，改由本市財政局牙稅稽徵所接辦。稅率則民十五年以前每口猪爲四分，民十五年以後，增爲一角二分。

(三)牲畜檢驗費，係在民十五年京師警察廳因籌措警餉，呈明財政部核准始行舉辦，入城的猪，須受檢驗，且須繳納牲畜檢驗費。其費率在開辦時規定每隻猪爲四角，民十七年以後，增加一倍。同年間復行改訂辦法，按每口猪的斤量最高爲七角，最低爲一角，茲將歷次改訂的費率比較如下：

	民十五年九月六日——民十七年三月三日	民十七年三月四日——民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每口猪檢驗費	〇·四元	

每口猪檢驗費	○·八元
民十七年十二月一日——現在	
二十斤以上者	○·七元
不滿二十斤者	○·三五元
不滿十斤者	○·一○元

已屠宰的猪，在半隻以上者，仍照此比例計算。不及半隻者，每十五斤收費二角，連尾超過十斤者，照十五斤計算，不及十五斤者免費。過境的猪，減半徵收。

上述三項捐稅，全歸猪客所出，其次在本市尚有屠宰稅及猪羊小腸獸骨稅兩種。屠宰稅在清末時，始行舉辦，其經徵機關，以前爲左右翼公署，最近爲市財政局賦稅稽徵所，稅率迄無變更，每口猪爲四角，猪羊小腸獸骨稅，係民十八年十一月間創辦，採包商制，歸[illegible]商繳納，猪羊腸兩項，年額八千元，猪羊骨則每月爲一百二十元。包商既包繳此稅，因而又轉向腸衣商等抽索；其稅率，猪腸衣每百斤爲二元，不及百斤者，按斤數計算，猪骨則按每噸收洋一元三角。

五　鷄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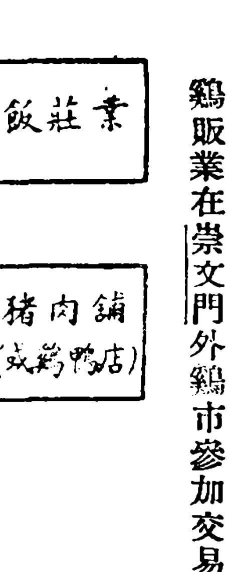
鷄的來源　北平爲鷄的消費市場，各地將鷄運進北平後，即在此售賣，不再轉往他地銷售，至各地運

進的鷄，每年究有多少，不易估計，惟就其產地來講，則火車運進者，爲定州鷄，易州鷄和保府鷄。旱路運進者，爲京鷄，（北平附近所產者）北口鷄（古北口一帶所產者）和西口鷄，（懷來延慶等地所產者。）此外平東三河，興隆，薊縣，昌平，玉田等縣所產的鷄，亦多有販來北平銷售者。

鷄的種類，大要分爲油鷄柴鷄兩種，油鷄略較柴鷄的價格爲昂，不過由各地運進者，全以柴鷄占多數，油鷄僅是北平四鄉農家豢養者較多，在市場上殊不占重要地位。據鷄商談述，則柴鷄品質亦有高低之分，如古北口所產者，體大肉肥，列爲上乘，懷來等地所產者，體小肉少，品質較次。

鷄市狀況　北平鷄市，一在前門外後河沿地方，一在崇文門外三里河東口，兩市的開市時間，俱爲每早六時起至十時止，前門外的鷄市，是一個特定的鷄的交易地點，崇文門外的鷄市，則是鷄牙行所在地。兩市情形，原不相同，在前門外鷄市，是買賣兩方直接舉行交易，崇文門外鷄市，則有鷄牙行的介紹而舉行交易，此外在各城門臉地方，也作鷄的交易地點，但全是四鄉農民肩挑鷄籠，擺在街上販售，由本市鷄販業收買。

本市的鷄販業，約有四百餘家，他們並無舖底字號，且不須繳納任何捐稅，所用資本亦極有限。他們既在城門臉地方，收買農民的鷄，復往前門外鷄市上賣出，有時則肩送與城內飯莊業或豬肉舖賣出博取微利。



雞販業在崇文門外雞市參加交易者甚少，因該市有牙行介紹須出牙紀佣金，雞販吝惜小費，故不願參加。至在該市場作交易者，賣主全爲外地雞客，買主全爲本市雞鴨店和飯莊業。又外地雞客在前門外雞市參加交易者亦少。

關於北平雞市的組織，我們可用圖表示如上：

經紀制度　崇文門外雞市以牙行店爲交易中心，且交易地點，亦即在牙行店院內。此種牙行店在民十九年時，全市尚有三家爲萬勝，任和，同德三家，現在只剩有同德一家，稱爲同德雞鴨官行，設在崇文門外三里河東口，成立的歷史約有三十餘年，工夥十四人。同德店因是市場上的經紀，向本市財政局領有牙紀帖，所領的牙紀帖，則爲散行帖，常年稅（即帖費）每年爲五十元。所謂散行帖，是財政局規定的辦法，爲分區承辦的牙行，只能承辦一區的牙行事務，不能包辦全市的牙行事務。

牙行店對於客方供獻的職務有五：一供給客商居處，二，介紹買主，三，評定價格，四，墊借款項，五，代雇脚力等事。客商販雞至平，無

論是由火車運來，或由旱路驢馱運來，均須要在牙行店內卸落，因行店有種種設備，如由火車運來，當日未能賣出，不僅鷄客可寄宿於店內，且鷄亦可寄放店內空屋，由行店派人照料，驢馱運來的鷄，則店內預備飼驢的石槽，賣出以後，行店即爲買主墊出款項，賣主可當時取走。前門外鷄市，因無此種便利，亦不能招致外地鷄客在市場上參加交易。

牙行店除爲客方交易便利供獻上述的職務外，且在成交以後，並爲代雇脚力，將鷄送至買主，脚力由買主出。牙行店爲買賣雙方介紹，完成一次交易時，即索取佣金，賣方每元爲三分，買方每隻鷄出一大枚。

（附註）1. 由火車運來的鷄至車站卸下，再運至牙行店內，此一段脚力，皆由鷄客自行招雇。

2. 驢馱運來的鷄，多在當日內賣出。

3. 在店內寄放鷄時，飼料由雞客自備。

交易方法　鷄的交易，全爲實貨的交易方法，買主就每籠內講定一隻鷄的平均價格，價格講妥，無論籠內鷄有大小，俱按此平均價格計算，而此種平均價格的幣制單位，則爲銅元，交付款項時，再折爲現洋，牙行店因有墊借款項的關係，對於銅元折合洋元的辦法，並不按當日洋元的市價，却以每月一日洋元價格，爲此一月的折合的標準，如一月一日洋元價格爲五百枚，至同月三十一日，無論洋元價格較五百枚爲增或減少，亦仍按五百枚爲一元計算，買賣成交，須當時交付貨款，買主若由牙行店墊借款項時，在三五日內，

即須歸還，惟不出利息。

六　鷄蛋市

鷄蛋的來源　北平鷄蛋市也和鷄市相同，只形成一個消費市場，在城內既無洋行坐莊收買，又無打蛋廠的設備；由各地運進的鷄蛋，只供商民買賣就地消耗，在平北順義縣，雖爲一有名的產蛋之區，惟該地蛋商販蛋至平，須由通縣經過，在該縣則有英商和記，日商三井等行截買，轉運天津出口。又在平綏線康莊，雖亦爲產蛋較富之地，每年有大批鷄蛋，逕運天津，而不由北平經過。但專就北平鷄蛋的消費來講，却亦不在少數，據蛋商估計，每日運進北平鷄蛋，平均約達七萬個，全年總計，約至二千五百萬個之多。

依其產地區別，則運進北平鷄蛋，可分爲(一)伏地貨，係產於本市附近各鄉鎮農家，隨時有行販下鄉收買或是經養鷄家自行擔進城內售賣。(二)京門貨，爲平北昌平順義等縣所產，用馱子載運來平。(三)口貨，爲平綏路康莊，延慶等地所產，亦用馱子運來，上述各地，惟昌平延慶兩地運進數量最多，伏地貨居次，其他各地運進數量最少。

市場情形　北平舉行鷄蛋的交易地點，全在鷄子店內，鷄子店則分設在各城門外附近地方，稱爲張家店或李家店等，是一個「客店」性質，專爲供給蛋商在店內寄住，並非市場上的經紀，惟其對於鷄蛋販賣時，亦供獻兩種職務，(一)介紹交易，(二)墊借款項。買賣兩方成交以後，並不取佣金，僅向住客按日索取

店費，每日爲銅元十六枚。

各地蛋商運進北平鷄蛋，多用驢騾馱運，每馱內裝鷄蛋最多至一千八百個，因鷄蛋運進時多進德勝門，故在該處設有牙稅徵收所，抽收鷄蛋牙稅，按一千八百個爲一馱，每馱抽鷄蛋牙稅爲三毛，不及一千個爲一擔，每擔抽鷄蛋牙稅爲一毛五分。此項牙稅又多由鷄子店代徵，每隔三五日向稽收所報繳一次，繳納牙稅以後，則鷄子店始代爲介紹買主。

在鷄子店內收買鷄蛋者，多爲小販，其次是本市城內餑餑舖，油鹽店等。餑餑舖收買鷄蛋，係爲做點心之用，油鹽店收買鷄蛋後，再賣與一般消費者，小販則自鷄子店內收買以後，即肩赴城內叫賣，或專爲飯莊業或飯舖等肩送賣出，賺取微利。

由鷄子店介紹賣出鷄蛋，買主當時不能付淸貨款時，則由鷄子店負責償還同時賣主並可向鷄子店預借款項，至鷄蛋賣出後，再爲歸還，不出利錢。

交易方法　鷄蛋的交易，是實貨交易的方法，但因市場上無經紀人除由鷄子店擔負爲買賣兩方的介紹責任外，關於價格的評定，全由買賣方當時商酌。又據鷄子店商人談述，在二十年前原有兩家鷄蛋牙紀店，爲振興店，設在爛縵胡同內；及恆和店，設在南橫街西口（宣武門外）。兩家全領牙紀帖，稱爲商帖，因當時尙在科擧時代，所以兩家牙紀店須向考局子交「鷄子差，」不另出帖費（即牙紀稅）。這兩家即負有

評定價格的責任，評定的方法，是由「主盤」者「開行市，」有數家蛋商每日在牙紀店內包買，無論運進城內雞蛋多少，皆歸彼輩收買，假定雞蛋進城較少，尙不能滿足彼輩收買的額數時，則價格激增。「主盤」是按每日雞蛋進城的多少，決定「行市」的高低。現在北平旣無大量收買的蛋商，兩家牙紀店又全告歇業，所以雞蛋交易只任買賣兩方自行評價，當時商定。

大體上，雞蛋價格的增跌，四季不同，春天旺而價低，冬日少而價昂。又油雞蛋與柴雞蛋價格不同，夏日產生者爲「熱貨，」孵雛未成與傷皮破裂者爲「隔窩，」價格亦有不同；比較起來，油雞蛋價格高，柴雞蛋價格低，「熱貨」與「隔窩」價格更低，且多是攙雜的賣出。

交易時，貨幣單位爲元，每元買雞蛋爲若干個，雞蛋個數增加，是行市跌落，雞蛋個數減少，是行市高漲。

七　菜市

菜的消費及來源　北平附郭一帶皆產菜，特別是西直，廣安，右安，永定各門外的菜園地最多，稍遠如平西大有莊，藍靛廠，蕭家河，海甸和萬壽山等地，也全是以產菜著稱，而又以北平爲最大銷場，趕來販售。

菜的種類頗繁，且在市場上集散狀況，對季節變化極有關係。大體上，舊曆二月至五月，爲菜蔬上市最旺的時期，七月以後，卽漸稀疎。上市最多的菜蔬，有白菜，韮菜，油菜，菠菜，蘿蔔，莧菜，香菜，地菜，芥菜，芹菜，黃瓜，茄子，山藥，山藥豆，冬瓜，毛豆，茴香，倭瓜，辣椒，鮮薑，葱蒜等。各種菜蔬，每年在北平實際的消費數量，不易調查。

以往崇關雖有貨物統計，惟關於菜蔬一項，亦不詳盡，不能代表北平的眞實消費量，且菜蔬種類，僅限於鮮薑，山藥，山藥豆，洋葱四項，但我們爲參考起見，不妨將該項統計，列成簡表如下：（十八年全年輸入北平菜蔬統計）

鮮薑	七一七，〇五二斤	山藥	三八，五九三斤
山藥豆	一〇一，一〇四斤	洋葱	一六六，四八三斤

北平附近各地運菜進城，即全供給當地消費，不再轉運他處，因菜是極易損壞的農產，又因中國商人對於菜的販運上，並無較爲完善的設備，故菜的銷場，不能距離其產地太遠。在這些菜蔬中，雖有幾項可以往他地販運，如薑，葱蒜，辣椒等，但它的銷場，最遠僅至天津或張家口兩地，數量上亦至有限，我們僅可看北平仍是一個菜蔬的消費市場。

市場狀況　北平菜市只有廣安門，天橋，阜城門三處爲常年市，餘如西直門外，德勝門外，安定門外，東直門外，朝陽門外各處，在菜蔬盛旺之季，始行開市，一入冬期，即行停歇，各菜市均祇有菜販業趕往參加交易，一般消費者均不趕至市場購買青菜。此外如西單，東四各菜市，始爲菜販銷於食戶之所。

上述三個常年市，以廣安門菜市爲最大，每日在該市參加交易的菜販，約有一千餘人，平均每日交易總值，約達六千餘元。又千餘名的菜販，若細分其業務性質，則有（一）外幫客商，係專爲販運北平青菜，至外埠銷售。（二）油鹽店，係代賣青菜與一般消費者。（三）菜牀業，係擺攤零星售賣的菜商。三種菜商，以油鹽店

在市場上占最大勢力，其次是菜牀業，再爲外幫客商，他們則只占一部分的勢力。

菜市每日開市的時間最早，夏季約在早四時即行開市，至早七時，則赴市販買靑菜的菜商，便全將貨購定，紛紛散市，每日交易的時間，僅有三，四小時。

經紀性質　上述三個常年市及各城門外菜市的菜蔬交易，均以經紀爲中心。北平的菜業經紀共有七十六人，於民國二十年間，曾結合組織一菜業公會。菜業牙紀稅，卽由公會承辦包繳，七十六家牙紀分攤，每年共二萬四千元。所領的牙帖爲專行帖，包辦全市的牙行事務。他們對於種菜農家，可以墊借生產上各項必需費用，如灌漑費等。待菜已收割，則由牙紀包辦賣出；卽農家未曾預借牙稅款項，但菜運至北平，亦須經由牙紀銷售，牙紀可全權代表賣方，與買主從事交易，此種販賣制度，自有明迄淸，以至現在，歷數百年，相沿未改。

各園戶（卽種菜農家）以手車或大車運菜來市，各投各行（卽菜行，）由菜牙紀預備住室，招待生意，並爲銷售，賣出以後，如買主欠付貨款，全歸牙紀擔保追索；且牙紀有時亦爲買主墊付貨款，送交園戶。至牙紀收入則爲牙佣，按百分之十抽取，卽交易一百元，牙紀抽取十元，惟牙紀實際所得者，尙不及一成（卽百分之十，）其中二分須歸還園戶爲澆水之用，稱爲「二成水，」在立夏後至秋收前，則增爲三成水，故牙紀所得，僅爲七分（百分之七，）最多爲八分（百分之八。）

七十六家牙紀，每家均雇有臨時工夥約十五人，共計約有六七百人工夥工資無固定數目，惟多按每日收入，提成支給。

交易方法 園戶運菜入市，均用蓆簍裝盛，擺列市上，由經紀代爲銷售，交易的單位，如黃瓜則按「條」，茄子，冬瓜，苤蘭等均按「個，」倭瓜，西葫簍，扁豆及各種青菜等均按「斤，」然後向買主賣出。按「條」售賣，是以若干「條」爲一堆，按「個」售賣，則是以「十個」爲一堆，就「一堆」估價，並不計「條」的長短，與「個」的大小。按「斤」售賣，所用的秤爲市秤。

買賣兩方交易由菜行經紀從中作價，行情漲落，一以當日的滯銷爲衡。價格講妥，則經紀代爲過秤，開寫市票，付給買賣兩方，交易的幣制單位爲銅元，在市票上寫明青菜種類，斤量，和銅元數。散市以後，則賣主市票仍交回經紀，由經紀支給其貨價，然後經紀再分向各買主將貨價追索取回。

八 結論

我們將這七個農產市場情形，既已全加論述；其次，就我們觀察所及，並對於這幾個農產市場，提出幾點改進意見，爲明晰起見，再分述如下：

(一)糧食的交易地點，是由城廂而移入於城內，由七個糧市，併爲三個糧市，這三個糧市原不居於適中地點，僅爲買賣兩方來往參加交易的便利而設。同時，這三個糧市上交易的糧食種類，雖少有不同，表面

上並無甚大的區別，我們以爲這三個糧市有合併的必要，選擇最適中地點，建築一較有規模的交易市場，每日須要開市。即退一步講，三個糧市仍有暫時存在必要，似應嚴格的劃分市場的性質，分爲雜糧市，面粉市，大米市，因北平對於這三種，不同類的糧食，俱有專營的商號，依糧食種類不同，而區別它的交易地點，交易自必更爲便利。

市場上經紀的活動能力，極爲有限，且其所開「市帖，」不能作爲彼此交易上的擔保，自應加以取締，減少交易上的用費，但糧業中須有一個共同的組織，代替經紀來管理市場，這種組織，可稱爲「糧市管理委員會，」派人常川在糧市上擔負評定糧價，開寫市帖等事，全爲義務幫忙，不抽佣金。市場所須經費，則由委員會自籌。

復次糧棧代客買賣糧食，所取費用，各家規定不一。不僅對於外地糧客有欺騙之嫌，且對於糧棧本身業務，亦容有不利之處，應由各家共同擬一取費標準，彼此遵從，不得額外需索。

(二)花生市組織比較簡單，花生店亦僅有七家，惟各家對於客商取費的標準，全不一致，自應依北平財政局公布「牙稅章程」辦法，劃一店佣。又各家對於量器並應劃一，改用官秤（即現在推行的「官制秤。」）

(三)棉花全是棉花莊自行派人到原產地販買，來往運費，所費不貲，因此有組織合作販運的必要。由

各家將需要棉花數量，報告合作社，派人到原產地販買，運回北平。北平合作販運的會計制度，僅可在事先作詳密的規定。待到棉花運至北平後，仍可利用合作的辦法，組織一個有規模的電力彈棉廠，用電機彈棉。

現在北平對於使用電機彈棉的只有八九家，其他各家因資本太小，不能裝置，再則電機發動，須有一定速度，過此速度，即易走火，棉花又是富於燃燒性之物，以是相戒不敢使用，但用木機代替彈棉，人工消耗，費用過大，故我們主張，須要利用合作辦法，建築電機彈棉廠，安設防火設備，各家棉花俱在電機彈棉廠彈軋，庶可減少人工的損耗。

(四)猪市的組織，比較爲嚴密，不過猪的交易，不應在居民稠密的東四西四兩個地方舉行，特別是屠宰廠設在這兩個地方更不適宜，我們以爲應一併移至邊僻的地點，最好是在左安門或右安門選擇一大空場，作爲猪市，並設立一最大的屠宰廠，死猪（即猪肉）的交易，無妨另擇一適中地點，作爲交易的場所。其次猪的屠宰方法，是用刀穿入猪項內宰殺，極爲殘忍，使猪感受甚大痛苦，因此我們更以爲有設立一大規模屠宰廠的必要，用機器屠宰，以減少猪的苦痛。

再則猪的衞生檢驗，雖照例抽有檢驗費，實際並未舉行檢驗，我們以爲這種工作應由衞生局嚴厲的施行，檢驗的地點，應在屠宰廠內，並規定須先經檢驗後，方准屠殺。

(五)雞市的組織，仍可維持它的原狀，不過有兩點應該注意：第一，雞爲一種牲畜，須要依猪的方法，施

行衛生的檢驗。其次，雞販善於作假。應該加以取締，就我們所知道的，雞販在賣出雞以前，多用「麵節」塡餵，麵節的成分爲多量的細沙，和以蕎麵，揉成長圓形，約二寸餘，由雞的食管塡入，這種塡餵的辦法，無論對於衛生上有無妨害，但既爲販運上的一種弊竇，自應加以取締。

(六)雞蛋在北平的集散的數量雖大，而市場組織却甚散漫，雞蛋入市只供本地消費，在北平附近產蛋的區域，多是直接販運天津，不由北平經過，爲充分發展本市的雞蛋交易，自應別謀市場組織的完備，即對於外地蛋商供給其交易便利，應有代客交易的組織，對於本市雞蛋向外輸出，應有自營販運的組織。並在可能範圍內設立打蛋廠，製造熟蛋，轉運天津出口。

(七)菜市的經紀，原因職權太大，農民常自動組織團體，在旁監視。至民十三年間，因有劉壽權者設立惠民菜業專行，與舊經紀爭執，發生風潮。至民二十年間，舊經紀投標牙稅額，由八百元至二萬四千元，以穩固其經紀地位，牢固把持，是則農民對於菜行經紀，雖屬在旁監視，然其對於園戶的任意剝奪，實屬無可如何，而經紀投標牙稅愈重，無異是加重園戶與食戶的負擔。所以我們覺得每年牙稅額，應以二萬四千元爲最高額，此後須逐漸減少，同時並須確定經紀權限，使園戶有「認客投主」之權，經紀不得壟斷售賣，或任意的剝削。

除以上數點外，我們另對於北平財政局經徵的牙稅，還有點意見。照現在牙稅徵收的辦法有二：一是

直徵制，係直接按貨物種類，依定率徵收。再是間徵制，係由牙行牙紀包繳一定的登錄稅和常年稅。又依該項牙稅章程說明，則市場有牙紀者，由牙紀領帖包繳，無牙紀者，由同業公會代徵，同業公會亦無者，始由官廳直接徵收。原則上，直徵制與間徵制的牙稅既屬相同，則糧食牙紀已領帖繳納常年稅，似不應再抽每噸糧食的二角四分牙稅；假定此項糧食牙稅為另一種「入境稅」則似應改變其名稱，不再稱為牙稅。

牙稅抽自牙紀身上，本是官廳賦予牙紀以公正的交易介紹人的資格，負有管理市場之責，市場上無牙紀，而仍抽牙稅，似屬不合，上述直徵制和間徵制的牙稅，原則上既同為牙紀稅的性質，則直徵制的牙稅，因市場上無牙紀，固無存在的必要也。

一九三四，八，十四日。

十二　廣西植棉問題

王子建

一　引言

去年秋間，筆者因某一件工作的因緣，旅行到了廣西省，那時常常得與主持該省實業的當局見面，從談話之中知道他們預備制定一個棉業自給計畫。爲什麼他們要有這種計畫呢？簡單說來，只因爲想實現「本省經濟的自足」的一種理論，以求貿易上的平衡而已，就貿易上看來，近年來該省梧州，南寧，和龍州三關平均每年輸入貨品價值在二千萬海關兩左右，輸出貨品價值則只在一千萬兩以內，每年入超有多至一千餘萬兩的時候；而輸入品中，棉紗價值年約六百萬兩，棉布價值年約五百萬兩，這兩項之和既超過總輸入值的百分之五十，且足以抵全部輸出值而有餘。就爲了這一點刺激，使它們想到所謂棉業的自給問題上去。當時我們同去的幾個夥伴，也曾非正式地同那位主持者討論過這問題。我們所認爲最應注意的是製成品或半製成品的成本問題，而與此問題最有關係的則是原棉的供給問題。我們既曾化了三四個月的時間到各縣鄉間去視察過，覺得無論如何在較短時間（尙非極短期間）中要想求得本省的棉花自給是不可能的事。由此推斷，紗的自給當然也就不成問題了。所以過後我們也就不很關心這件事情了。

但桂省當局的這樣計畫很引起了國內一部份人的注意和關心。這一年中我們雖然並未得到關於

這件事的更具體些的報告，而相信此事在最近的將來必能實現的倘大有人在。最近筆者曾與一位在棉業統制委員會服務的朋友——一位棉業專家——偶然談起中國棉業的前途，這位朋友說西南方面的雲南和廣西在植棉事業上是極有希望的。很顯然的，這位朋友也是同情於桂省棉業計畫的一位。不過這位朋友的想像是另有他的出發點的。他想將來中國棉業的發展如有整個的計畫時，植棉和棉工業或不免就全國分爲若干區；現時中國棉業偏於北部和中部，將來若能在西南方面，以雲南或廣西爲中心劃成一區，那豈不是一個很好的全盤計畫嗎？他這一番意見，使我把這久已漠然置之的一件事又重新感覺起興趣來，因想摭拾去年在桂時所見所聞者發抒一點愚見，作一個拋磚引玉的想頭，以與國內關心此事的人們一商榷之。這便是筆者寫這篇文字的動機。至於有關於廣西植棉的技術智識，多承一位去年同行赴桂調查農業的朋友韓德章先生供給了筆者許多珍貴的資料和意見，這是我所十分心感並應加聲明的。

二 是否需要植棉

現在先讓我們討論一個先決的問題：廣西是否需要植棉？這問題得從兩方面來討論，其一是以一省的經濟爲立場，另一是以全國的經濟爲立場。

先就省的經濟來說，若照上面所引的省的經濟自給，省的棉貨自給立論，植棉當然是必要的。沒有棉花就不能有棉工業，不能自製棉貨就設法阻止外貨的侵入，不能遏止外貨的流入就不成其爲省的經濟

統制；這道理是很明顯的。可是這裏有一個先決問題，就是一省自給的統制經濟在理論上和實施上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關於這一點，近來已經有許多討論過，其結論一致認爲這種割據制度的省經濟統制非但在理論上站不住脚，而且在事實上行不通的。這種割據的自給制度既不足取，那末植棉並不一定是必要之舉是很明顯了。

其次，就全國的經濟設計立論，情形當然又不同了。現在須要顧到的有兩個問題：其一，在這地方植棉，是否比在別處更好些？第二，這地方種這種作物是否比種別種作物更好些？關於前者，我們得知道這地方的自然環境是否宜於植棉；假若可以植棉，還得知道於何種品質的棉，其每一土地單位的收穫量是如何，產品的花衣成分又是如何？然後就所得結果，同別的棉產區的情形比較觀察，如果有一二點可取，便值得我們來推廣，否則我們何不把精力施之於別的，更適宜於植棉的地方，而做費力不討好的事呢？關於後者，我們得知道這地方的自然環境，最宜於何種作物；更得知道何種作物收益最好，最能使農家獲利。假若我們確實證明了這地方的自然環境是最適宜於植棉的，種這種作物可以使農家獲得最高的收益，或目前雖未必能得最高的收益而將來有這種可能的，那便值得我們來提倡推廣；否則我們何不把精力用之於種植別種更有利益的作物呢？

由於統計的缺乏，現時要解答這兩項問題是很困難的一件事。尤其是關於第一個問題，在沒有經過

長時期的試驗種植時，任何人皆無法解答。至於第二個問題，若就現在的情形看來，大致在廣西種植棉花，對於農家的收益不見是最好的一種，這是可以由目前棉產稀少的情形上看出來的。

三 是否宜於植棉

在沒有能確實解決廣西究竟是否需要植棉這一問題時，姑且只有退一步而求解決廣西的自然環境是否宜於植棉這一問題。假若這後一個問題能夠解決，則前一個問題也算有一部份被解決了。

棉作的自然條件有三，就是氣候，雨量和土壤。

草棉原是亞熱帶的產物，在北緯42°和南緯25°之間都能生長。發芽時須有65°F以上的溫度。摘心以後須有68°F的溫度，每年無霜時期能有一百八十日就能長成。這些條件在廣西省除了南丹，河池，融縣，全州等高地外，都能具有。所以在氣候方面，桂省是宜於植棉的。

其次，雨量方面，不求量的過多，而在分配之能適當；只要氣候不致焦燥，即不難致棉實的繁盛。一般情形，如果有五〇〇公厘至六五〇公厘的均勻分配的雨量，即已足用。假若成長季內雨量的分佈特別好，能有三五〇公厘的雨量，即足以使短絨花得到平常的收成；若能有五〇〇公厘，就可以得很好的收成，長絨棉的成長季比之短絨棉要長兩個月，自然得需要較多一點的雨量：若雨量過多，害處是很大的，結果必影響於收成。如冬季過潮，春間濕冷，能稽延播種時期，且於萌芽上大受阻礙；六七月雨量過剩，妨礙中耕，而使

棉株枝葉盛長，果鈴稀少且易致病蟲害；結鈴後雨水太多則花落；摘花時雨多則鈴爛；而尤以過量雨水足以洗溶土壤肥料他去，為最大損害。

我國各省棉產地的雨量長江一帶全年平均自八〇〇公厘至一，七〇〇公厘不等，成長季（三月至九月）平均自六五〇公厘至一，三〇〇公厘不等；黃河流域各省全年平均自三六五公厘至六三〇公厘不等，成長季平均自三〇〇公厘至六〇〇公厘不等。其詳如下表：

中國各重要棉產區常態雨量表（據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記錄）

棉產地	全年雨量（公厘）	三月至九月雨量（公厘）
江蘇		
上海	一，一三八	八七二
常熟	九九七	八〇五
江陰	一，〇八八	八七〇
南通	九七六	八一〇
鹽城	一，〇四七	八四二
松江	一，〇三六	八三二

	崇明	一，一六一	九三四
	東台	九二七	七五七
浙江			
	紹興	一，七〇五	一，二九六
	餘姚	一，六三七	一，二〇七
江西			
	九江	一，四一〇	一，〇七一
湖北			
	孝感	九四五	六五一
	襄陽	八三六	七二一
湖南			
	岳州	一，二九四	九七二
山東			
	清平	六二七	五九五

	臨清	四四九	三九八
	館陶	三三五	三〇六
	夏津	五八二	五四〇
	恩縣	四四三	四一二
	荷澤	五八五	五〇八
河北			
	深澤	三八三	三六〇
	博野	五〇三	四七四
	任邱	四四五	四二三
	保定	四四〇	四一〇
	吳橋	四三七	四一〇
河南			
	陝縣	四一七	三六四
	杞縣	五〇二	四四六

	安陽	五五〇	五〇八
山西	平遙	四一四	三七八
陝西	西安	五一八	四四七

美國棉產區域全年平均雨量自八〇〇公厘至一，四〇〇公厘不等，成長季（三月至九月）雨量自五〇〇公厘至八五〇公厘不等，其詳如下表：

美國棉產區常態雨量表（據紐約棉花交易所出版棉花年鑑）

產棉省份	全年雨量（公厘）	三月至九月雨量（公厘）
北加羅里那	一，二六一	八一一
南加羅里那	一，二二〇	七八九
喬其亞	一，二六九	七八九
阿拉巴馬	一，三四八	八〇六
德納西	一，二七〇	七五六

米西西比	一，三五七	八〇七
路易西愛那	一，四二〇	八五八
阿干塞斯	一，二二六	七五三
德克塞斯	七八八	五一一
屋克關荷馬	八三四	五九〇

廣西省的雨量，據廣西年鑑所載的十六縣的記錄看來，除鬱林一縣全年平均爲六二三公釐，成長季（三月至九月）平均爲五六〇公厘，雨量比較稀少外；其餘各縣全年平均雨量自一，〇〇〇公厘至二，〇〇〇公厘不等，成長季平均雨量自九〇〇公厘至一，六〇〇公厘不等。其詳如下表：

廣西各縣常態雨量表（據第一回廣西年鑑）

縣名	全年雨量（公厘）	三月至九月雨量（公厘）
桂林	一，八九五	一，五七九
永福	二，〇〇〇	一，六三三
修仁	一，四六四	一，二二四
梧州	一，二八一	一，〇四九

桂平	一，八四一	一，四九一
武宣	一，一八七	九五〇
貴縣	一，五四八	一，三一四
鬱林	六三三	五六〇
柳州	一，八九五	一，四七二
武鳴	一，六七〇	一，三九五
上林	一，九三〇	一，五六六
南寧	一，三二〇	一，〇七七
西隆	一，四五八	一，二六一
舊州	一，〇一七	九一〇
百色	一，二五七	一，一一三
龍州	一，四六七	一，二七〇

就上列三表比較，中國各產棉區除浙江，江西兩省降雨較多外，其餘各省均與美國產棉區相若。黃河流域各省，雨量微嫌過稀；江浙兩省，有時已有感到雨量太多之苦。就過去情形觀察，如民國九年江浙兩省

棉產本可預期豐收，詎奈九月上旬忽遭暴風霪雨的摧殘，棉鈴吹落霉爛的損失，約占十分之三四；又如民國十年江蘇省在四五月間棉苗受霪雨之害，收成減少；再如民國十二年江蘇省的棉收不良，其原因也是因爲春夏霪雨，爲災，棉田低者，盡爲水淹，幼苗大傷，以致通海各縣每畝僅收籽棉四十餘斤。

廣西各縣的雨量，除鬱林，武宣，舊州等少數縣份外，無論全年或成長季，均較美國產棉區的雨量爲豐，比之江浙一帶亦嫌過多。如桂林，永福，桂平，貴縣，柳州，武鳴，上林等縣，成長季的雨量都在一，三〇〇公厘以上，全年雨量都超過一，五〇〇公厘。這種情形，對於棉花的產量和品質，難免不要發生障礙，這是值得考慮的。

最後，關於土壤，雖然最好是砂質壤土，取其排水良好，儲濕力大，耕作較易；但黏土在適當氣候之下，也能使棉株壯盛，且收量豐富，只是枝葉徒長，結鈴較小而已。大致宜於一般作物的土質，莫不宜於植棉的，所以這問題的關係較小。

從自然環境上看來，廣西雖然並不是不宜於植棉的地方，然而也有相當的限制，就是恐怕降雨量的過多。固然稍微過剩的雨量可以用人工的方法去控制，不過在農耕技術沒有改進以前，作物的收穫，仍是多半要靠天時的。

四　現時棉業不發達的原因

廣西棉產，據該省統計局調查，全省年產不過萬六千餘擔；又據實業部調查，二十一年產額僅只一萬四千餘擔。全省所產，向不及其他棉產區每一縣的產額。該省當局，以前也曾注意過植棉推廣的問題，遠在民國九年，即有棉業促進會的組織，並設立棉業試驗場，訓練植棉學生，分散美棉種籽，推廣植棉事業，準備籌設紗廠，從事紡織。後因民十政變，始歸停頓，現時我們尚可在農田中發現美種棉花，想必就是那時候遺留下來的種子。不過這十幾年來，實際上絲毫未見進步，即偶而可以採得一些長絨美種棉，也只局於一地，產額甚少，就全省說來，棉植情形極其幼稚。這雖說是受了政治的影響，却也還有別種原因存在。

其一，因耕地不敷分配，植棉者少。廣西地勢，因山陵起伏，高低懸殊，凡低田現在均為稻作所佔，徵之目前糧食供給情形，似難改水田為棉作。桂省每年產稻約四千五百餘萬擔，除供本省消費外，雖有輸出於廣東，然為量極少。此因省內農作技術幼稚，產量不豐，而且交通工具缺乏，運輸困難，豐歉兩方，不能挹注，所以使然。因此在目前狀況之下，要想減縮稻田，改充棉田，是不可能的。至於高地呢，除去柳州到桂林之間有一片平坦的大地外，都是坡度很大的。這種山地所受天然雨水沖刷的作用很大，不只表土淺薄不能被覆根株，即人工加入土壤之養分亦多被沖刷流失；而乾旱的時候，又無法保存水濕，這些地方自然又是不宜於植棉的。坐此二因，現有棉田遂致這樣的稀少。

其二，因農作技術的幼稚，以致棉作量低微。一，固有的品種惡劣，而引進新種又不是一般農家的力量

所能「馴化」；二，有機肥料的缺乏；三，灌漑和排水設施根本缺乏，四，各地都以稻作爲主，棉作不過是附帶的作物，而大多數縣份稻作均係兩熟，甚至三熟，因此難得適宜的人工施之於棉作：這些技術上的限制，使現有棉作的收穫量非常低微。

五　推廣植棉問題

由於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桂省的自然環境，雖略有限制，要想植棉也並非完全不可能的，問題只在值得種植與否的一點。就目前的情形看來，棉作狀況既是這樣幼稚，就是想要推廣，在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除非加以澈底的改良。說到改良，就筆者愚見看來，至少應有兩點。

第一，先要選育良好的品種。現時棉作收穫不豐，最大的原因在種子的惡劣和夾雜；這是以往中國棉作的普遍現象，不獨桂省一地爲然。近年國人已漸明瞭這種現象之不能持久，紛紛倡議改良品種。今年棉業統制委員會全國棉業改進所成立，更有一個系統的計畫將見諸實行。桂省如欲提倡植棉，此事當屬首要。惟作物育種工作，須猝窮年累月之人力財力，徐緩圖之。如畏懼工作之艱深，首鼠不前，則眞是因噎廢食也。

現在廣西棉種，除當地的品種外，尚有一部份美國種夾雜其間，這大概是民國八九年時移植的。時下談改良棉種的，大都主張選用美國棉種，移植本土。實則因自然環境的差異，美種是否適宜於中國各棉區，

尙是問題，例如南通在前些年也曾移植過美棉，但成績並不好。其原因有三：第一，南通地近江海，地勢低濕，降霜時早，美棉在開鈴時設遇霜，即足防礙開鈴之活機，而產量減低；故美棉生長時間雖較中棉長月餘，而產量不見超過中棉。第二，中棉較美棉早熟，南通棉農採二熟制，棉作收穫後即繼以麥作，若種美棉，則收穫遲而不克種麥，對於農民的收益大損。第三，南通棉作受小捲葉蟲的害很大，美棉抵抗力不強，故常受害。又如民國八年金陵大學曾選美棉標準品八種分植於八省二十六處，其在上海生長的，雖然茂盛，結鈴繁多，然因天氣潮濕，棉鈴大半腐爛，不克開放，病蟲害亦較中國棉爲多，由此可知，在改良品種之先，還得相當時期的試驗，如選種，以廣西南部各地的天氣看來，是否適合於美棉，尙是問題。或者竟介紹印度和埃及棉種，實行馴化，或與本地品種雜交，總令得有完全適合地方環境之品種，再行推廣。再或選擇本地好種，育種而推廣之，如金陵大學之育種百萬棉，其結果或較馴化外來品種爲佳。

所謂良好的品種，取其適合生產狀況，固爲首要意義，但同時尙須兼顧消費狀況，即纖維長短的問題。現在桂省各地所織土布，雖然大部分採用十支十二支的粗紗做原料，但在鬱林等地「高機」盛行之處，均已着手仿製花色細布，所用原料，大部份爲二十支紗，且有採用三十二支和四十二支紗的。所以將來的棉種，必求其有較長的纖維，至少能紡二十支紗，方合消費者方面的需要。

第二，須要改善農業的一般狀況，纔能談到推廣植棉。現時廣西的平坦低地，既全被糧食作物所佔有，

如要改植棉花，必須使糧食作物每單位面積的產量增加，方能有餘地勻出，而不妨礙民食。這是第一點。其次，要發展內地的交通，使各地的糧食便於運輸調節，纔可以使某一區域完全改種棉花。第三，要改善灌溉，排水等設施，並厲行造林，以調節氣候，才能使現在的荒地墾殖棉花。

以上兩點，都不是幾年的短期可見成效的，然而捨此實沒有捷徑。況且建設事業，必須從根本做起，纔能有立足點，若只論皮毛，那是必定要失敗的。金陵大學在民國八年秋季在上海吳淞一帶棉田中覓得一個棉鈴，只得種籽二十一粒，然而經幾年的忍心耐性的養育，終成「百萬棉」的佳種，現在盛植於餘姚一帶，並推行於華北。可見這種事業若能假以時日，加以努力，自會有相當的成功的，否則只有坐視失敗而已。

現在或者有人可以有這種理想：一方面在廣西開設起紗廠來，一方面用重價收棉，以鼓勵農民的植棉。這從片面觀察，未始沒有道理。可是假若從多方面來看，情形卻大大的不同了。假如就現在的農作狀況之下用獎掖的政策鼓勵農民植棉，農民為目前的利益所引誘，固然可以毀廢了稻作改做棉作，然而糧食問題，勢必隨之而來。試問又當怎樣解決呢？如果農民植棉所得的利潤，實較稻作為低，又豈能特重價收棉可得鼓勵？凡此種種均須重加以審慎的考慮，否則在全省農作制度，農耕技術及農業經濟各方面沒經有效的改進以前，貿然向奄奄垂危的農民，榨取大量的棉產，恐怕要「收之桑榆，失之東隅」，其結果或未可樂觀吧。

一九三四，十二，二十二日。

如要改植棉花，必須使糧食作物每單位面積的產量增加，方能有餘地勻出，而不妨礙民食。這是第一點。其次，要發展內地的交通，使各地的糧食便於運輸調節，纔可以使某一區域完全改種棉花。第三，要改善灌溉，排水等設施，並厲行造林，以調節氣候，才能使現在的荒地墾殖棉花。

以上兩點，都不是幾年的短期可見成效的，然而捨此實沒有捷徑。況且建設事業，必須從根本做起，纔能有立足點。若只論皮毛，那是必定要失敗的。金陵大學在民國八年秋季在上海吳淞一帶棉田中覓得一個棉鈴，只得種籽二十一粒，然而經幾年的忍心耐性的養育，終成「百萬棉」的佳種，現在盛植於餘姚一帶，並推行於華北。可見這種事業若能假以時日，加以努力，自會有相當的成功的，否則只有坐視失敗而已。

現在或者有人可以有這種理想：一方面在廣西開設起紗廠來，一方面用重價收棉，以鼓勵農民的植棉。這從片面觀察，未始沒有道理。可是假若從多方面來看，情形却大大的不同了。假如就現在的農作狀況之下用獎掖的政策鼓勵農民植棉，農民爲目前的利益所引誘，固然可以毀廢了稻作改做棉作，然而糧食問題，勢必隨之而來。試問又當怎樣解決呢？如果農民植棉所得的利潤，實較稻作爲低，又豈能特重價收棉可得鼓勵？凡此種種，均須重加以審慎的考慮，否則在全省農作制度，農耕技術及農業經濟各方面沒經有效的改進以前，雖然向奄奄垂危的農民，榨取大量的棉產，恐怕要「收之桑榆，失之東隅」，其結果或未可樂觀吧。

一九三四，十二，二十二日。

以及一些零星的記述。但材料雖然貧乏，總還可以給我們一個依稀隱約的輪廓。此所以有本文之作。

二

我們首先要探問的是四川省的棉產在國內佔有怎樣的地位。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農業試驗所的估計來觀察。據民國二十三年的最後估計，無論棉田面積或棉花產量均居第八位，其地位僅次於山西及陝西，而尚高出於安徽，浙江，湖南，江西諸省。詳如下表：

二十三年各省棉田面積及皮棉產量最後估計

省別	面積（單位一千市畝）	產量（單位一千市擔）
江蘇	一二，四八八	三，五五八
河北	九，六四九	三，〇二三
河南	七，六三六	二，七六五
湖北	五，九〇九	一，四一一
山東	五，三七三	二，〇六〇
陝西	四，三六五	七三〇
山西	三，〇三五	八三七

四川	二，二六二	六二五
安徽	二，〇二四	二九二
浙江	一，八八五	四二六
湖南	一，二六〇	三一一
江西	八二七	一一九
其他	六五八	二〇三
總計	五七，三七一	一六，三六〇

其次，我們再看看近年四川棉產的變動情形是怎樣的。這一點，也可以引用農業實驗所的估計作依據，如下表：

最近四年四川棉田面積及棉產量之比較

年份	面積（單位千畝）	產量（單位千担）
二十年	四，二一八	六九〇
二十一年	三，九四八	六六〇
二十二年	二，二〇六	三七〇

二十三年	二，四四四	五二四

［註］二十三年面積及產量單位均由市制改算爲舊制。

從上表看來，在最近四年中，面積和產量均有減落的趨向，這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另據陳讓卿私人的調查，估計全川棉產爲七十萬擔。此數與農業實驗所二十年及二十一年份的產量固很相近，即與該所二十三年第二次估計的七十二萬餘擔亦正符合。不過把這兩次估計詳加比較，則我們非但可以發見兩者所包括的縣份各有不同，且同一縣的產量估計亦有很大的差別。這兩點情形不難從下表中索得之。

四川各棉產縣份產量估計（單位一擔）

縣別	農業實驗所估計	陳讓卿氏估計
射洪	四六，九八〇	八〇，〇〇〇
簡陽	四二，三一〇	五〇，〇〇〇
三台	三一，〇九〇	三〇，〇〇〇
蓬溪	二六，三七〇	四〇，〇〇〇
瀘縣	一八，六七〇	二〇〇

遂寧	一八,四一〇	一〇〇,〇〇〇
綿陽	一八,〇九〇	—
樂至	一六,九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仁壽	一四,〇九〇	八,〇〇〇
榮縣	一二,四五〇	—
南部	一一,八五〇	二〇,〇〇〇
威遠	一一,三七〇	四,〇〇〇
南充	一〇,二八〇	五,〇〇〇
井研	九,七九〇	—
崇慶	九,三四〇	—
資陽	九,一〇〇	—
巴中	五,七八〇	—
金堂	五,七二〇	七〇,〇〇〇
銅梁	三,八二〇	—

資中	三,八一〇	—
武勝	三,六六〇	—
安岳	三,二三〇	—
隆昌	二,〇七〇	—
新都	一,七六〇	—
酆都	一,六五〇	—
樂山	一,六〇〇	—
天全	一,四二〇	—
宜賓	一,四〇〇	二,〇〇〇
雲陽	一,一二〇	—
江北	九六〇	—
忠縣	九六〇	—
彭山	九四〇	—
廣漢	九二〇	—

犍為	九〇〇	三〇
馬邊	四一〇	—
南川	二六〇	—
涪陵	二三〇	—
敍永	二〇〇	七〇
中江	—	六〇,〇〇〇
西充	—	五,〇〇〇
夾江	—	五,〇〇〇
安岳	—	一〇,〇〇〇
潼南	—	一五,〇〇〇
南溪	—	一,〇〇〇
富順	—	五〇〇
慶符	—	四〇〇
長寧	—	二〇〇

合江	—	二，〇〇〇
內江	—	二，〇〇〇
納溪	—	一，〇〇〇
江安	—	一，七〇〇
古宋	—	五〇
大足	—	三〇
高縣	—	三〇
其他	三七五，九七〇	五〇，〇〇
總計	七二五，八七〇	六八五，二一〇

上表兩項估計，究竟何者近於事實，我們誠無法判斷。但至少從表中可以見到四川產棉的區域是極廣的；其主要產地大抵在涪江流域，而岷江，沱江，嘉陵江流域的各縣也都有生產；攏統地說來，全省中部的盆地大抵無處不可以產棉。

三

關於四川棉花的產量，我們所能知道的，只有這一些。現在，讓我們再來看看四川棉花的品質是怎樣

的。

四川棉花，以土種為多，雖然偶而也有退化美棉看見，但為數極少。據陳讓卿氏的考察，曾從遂寧，樂至，簡陽各縣相距五六百里的棉田中，有意義的散取棉樣，攜回考其纖維長度，平均在二十四公釐以上，合英尺約一吋，陳氏認為此種棉花的纖維長度足與吾國現在最優等的陝西花和靈寶花相抗，可紡三十支以上的細紗。但另據劉世模氏之說，則謂『纖維長度約一吋，而拉力弱，捻曲度小，品質低；且纖維粗短，不適於紡細紗之用』。這兩說對於纖維長度的認識雖能符合，但論其用途，則大相逕庭。我們若引中心農事試驗場測驗的結果為證，則陳氏之說，未免過於樂觀。現在且先把測驗的結果抄錄如下表，然後再細加討論。

四川各地棉種纖維的檢驗

（四川中心農事試驗場收集棉樣委托上海商品檢驗局測驗）

棉樣	名稱	主體長度	長度整齊率	強度	1cm長纖維量	圓度	一吋內捻曲數
三台	羅安場棉	一三/一六吋	九〇·六二%	八·三九gr	·〇〇二八六六mg	·〇〇〇八九二八吋	六三·二三六八轉
射洪	吳家壩棉	二七/三二	九一·六三	五·三一	·〇〇一九〇〇	·〇〇〇七九七九	七二·九一六七
射洪	縣城棉	二七/三二	九二·六三	五·八一	·〇〇二〇〇〇	·〇〇〇八〇三五	八五·七一九四
射洪	太和鎮美棉	一五/一六	八二·五三	五·五九	·〇〇一八五〇	·〇〇〇七九七三	九二·一〇五三

潼南棉(一)	一三/一六	九三·七一	七·五四	·〇〇二八六六	·〇〇〇八二五二	五六·三一四四
潼南棉(二)	二七/三二	八九·八四	七·八六	·〇〇二七〇〇	·〇〇〇八〇一七	七〇·三八〇五
中江普興場烏牛毛	二五/三二	八八·三三	七·三七	·〇〇三〇六六	·〇〇〇八三三一	七五·三四七二
中江普興場洋花	一五/一六	九一·一八	六·三八	·〇〇一八五〇	·〇〇〇八〇八〇	九八·四三五五
蓬溪洋溪鎮棉	一三/一六	九〇·八〇	五·〇一	·〇〇一八〇〇	·〇〇〇八一〇二	七一·九二二四
蓬溪崇報寺棉	一三/一六	八九·〇六	七·三八	·〇〇二七三三	·〇〇〇八四一六	五九·二二七七
蓬溪金元場棉	二三/三二	九一·〇二	八·五三	·〇〇三〇六六	·〇〇〇九一七二	七五·〇六一三
遂寧觀音場棉	一三/一六	九二·一八	七·一三	·〇〇二八〇〇	·〇〇〇八三一五	五一·七〇四五
遂寧桂花園棉	二三/三二	九一·五五	九·七八	·〇〇三一三三	·〇〇〇一〇二二	五〇·〇四七四
遂寧北壩棉	一三/一六	九三·〇一	六·三四	·〇〇二九三三	·〇〇〇八八三〇	七一·九二二四

上表十四種棉樣中，除射洪太和鎮美棉及中江普興場洋花外，其餘十二種都是本花。我們試先就這十二種本花加以檢討。

第一，先看看纖維的長度。這十二種棉樣，最長纖維爲一英寸的三十二分之二十七，最短纖維爲一英寸的三十二分之二十三，大多數的樣本爲一英寸的十六分之十三。就大多數棉樣的長度言，合於上海商

品檢驗局試訂棉花品級的次中級，即相當於美棉等級的 Strict Low Middling，適於紡十六支紗之用。

第二，十二種棉樣的纖維長度的整齊率，最高百分數爲九三・七一，最低百分數爲八八・三三，平均百分數爲九一・二，按之上海商品驗檢局所定標準，屬於中上級，在國產棉花中爲整齊程度最高之一類，相等於上海棉，餘姚棉，家鄉棉，孝感棉（均中棉）的整齊程度。

第三，十二種棉樣的程度，差別强度極大。最高爲九・七八公分，最低爲五・〇一公分。大多數在七公分至八公分之間。按諸上海商品檢驗局所定標準，屬於乙上級，在國產棉花中爲强度最高之一類，相等於上海棉，餘姚棉，家鄉棉和孝感棉。

第四，關於纖維的粗細，可以從纖維量和闊度二者來推斷。以言纖維量，在十二種棉樣中每一公分長度的纖維最重達・C03133mg. 最輕爲・001800mg. 以言闊度，十二種棉樣中最闊的達・0010222 吋，最狹的爲・0008035 吋，這裏表示着各地棉花的粗細相差極大，我們在這少數樣本中無法推測它們的標準情形。

第五，各地棉花天然撚曲度的差別也是很大的。在十二種棉樣中，最高數達每英寸八五・七一九四轉，最低數爲五〇・〇四七四轉。這樣大的差別，自難使我們推測它們的標準情形。

由上述十二種本花樣本的纖維檢驗記載中來推定四川棉花的品質，自然是一件冒昧的事。但我們

至少能看出由於事實的證明，四川棉的品質既不若樂觀者所稱許的那樣好，也不見得像悲觀者所說的那樣壞。就這些樣本看來，川棉的品質最與上海棉，餘姚棉，家鄉棉和孝感棉相似。

其次，讓我們看看四川的洋棉與本棉在品質上有沒有什麼不同。

根據上表的記載，我們不但可以考見二者的不同，而且可以據此判斷其優劣。如洋棉纖維較長，較細，天然撚曲度較多，均是優於中棉之處，惟纖維强度，較本棉爲弱，是其缺點。

四

從上文所述的情形看來，雖然四川的棉產無論在質或量方面，在國內都可以佔有相當的地位，但離着全省的消費量，則尚遠甚。現時川省輸入原棉雖然不多，但棉紗進口數量着實可以驚人。據海關報告，民國二十三年棉花輸入量在重慶爲一，二五四公擔，在萬縣爲八〇二公擔，兩共約二千公擔，合二千三百餘擔。同年棉紗輸入量在重慶爲一九五，六〇四公擔，在萬縣爲四五，七五三公擔，兩共二十四萬公擔，約合四十萬擔，此數折算爲原棉量，以每包紗需棉三擔半計，約計四十七萬擔。而輸入的布疋及其他棉織品尚未計入。現在我們假定省內產棉爲七十萬擔，輸入棉貨爲五十萬擔，則全省消費總量爲一百二十萬擔。在這消費總量中，省內生產的約佔百分之六十，別省輸入的約佔百分之四十。

這裏，我們發見了一個問題。在目前這樣的自給不足的狀態之下，四川省究竟有沒有提倡和推廣植

棉的必要呢？這問題，急切間是不容易答覆的。固然，從省單位的自給經濟立論，毫無疑問的，應該作正面的答覆。但省單位的自給經濟政策根本上頗多可議之處，已爲多數識者所公認，故這種偏狹的見解能否存在，也成了問題。我們以爲此事應從全國的經濟政策着眼，而不應局於部份的觀察。具體說來，假若在別省推廣植棉較勝於川省的話，我們寧願希望維持現在的局面。反之，假若因推廣棉產而影響於川省他種作物的收穫，那末得失輕重，尤非熟計其利害不可。關於此點，作者前次討論桂省植棉時曾詳細論及，讀者可檢閱參考。（農村週刊十三期）

假若單就自然環境來觀察的話，川省之宜於植棉是不成問題的。在氣候方面，川省每年可得長成期二百日，而該省植棉只需一百五十日，即使延長到一百八十日，仍有長成希望。其次，在雨量方面，據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測定常態記錄如下：

	全年		三至九月	
成都	八二六公厘		七四九公厘	
重慶	一〇九八		八八〇	
宜賓	一二四一		一〇〇〇	

其情形與長江下游各省完全相同，長成季雨量雖略嫌過多，尚不致有很大的妨礙，最後，在土壤方面，四川中部的盆地，頗多砂壤，正是最宜於植棉的。

一九二五，六，二十二日。

十四　浙江省合作社之質的考察

吳承禧

一

浙江省之有合作社，始自民國十七年，迄今雖然只有七八年的歷史，但是，一方面因爲在野人士的注意，他方面因爲地方當局的提倡指導，浙省合作事業在這幾年裏的迅速發展，除去江蘇之外，實可以說是沒有一省可以和它比得上的，根據本年二月底的統計，浙省已有一千五百九十二個合作社，社員人數五萬二千六百零二人，其歷年增進的過程，實至迅速，如下表：

年份	社數	社員數
十七年	二二	三六七
十八	一四三	四，五二四
十九	四一五	一一，九〇九
二十	五四一	一四，二六八
二一	七三一	二〇，二一九
二二	一，〇七二	二九，〇七八

二三	一，四九八	四八，六一六
二四	一，五九二	五二，六〇二

二

合作社與社員人數之急驟的增加在量的方面固然充分的顯示了浙省合作事業之蓬勃的發展，但在質的方面，它是否就能夠表示浙省各縣市的合作社已經有了一個很健全的基礎呢？

這當然是另外一個問題。這問題我們以爲值得考慮。我們知道近幾年來各地合作事業的發展，政府倡導之力居多，而農民自身策動之力居少。政府雖極力提倡合作，但財政上的窮困却往往使得合作指導制度不能充分的完備的建立起來，因此，合作事業的推進便無可避免的產生了下列兩個缺點：第一，因爲各地合作指導人員之缺乏與合作指導人員獎勵失當的緣故，合作社往往就只有量的衆多而無質的完美，第二，因爲合作的動力是由上而下而非自發的由下而上的，一般無知的貧農往往不知合作的眞諦，不能利用合作，反爲一般土豪劣紳所操縱而爲合作之美名所利用。因此之故，各地合作社的內容往往非常窳敗，合作的基礎，根本也就無法健全，表面上看來蓬蓬勃勃，實際上則粗製濫造，一塌糊塗。浙江省合作事業的突飛猛晉，對此當然也不能例外。

我們試拿事實來看罷。

二十二年的十一月，浙省建設廳合作事業管理處爲了要『積極的考核全省各縣每一個鄉村中的合作社辦理成績，藉以明瞭浙江全省合作事業的設施情形而定……興革步驟』起見，曾經頒發了一種合作社考成等分表，分發到各市縣政府去，令飭合作事業指導員均切實考核，詳細填列，表中所考察的項目很多，主要的有下列十八點：

一、社中設備是否完善？

二、合作意義之理解是否透澈？

三、合作精神是否充分？

四、社員份子是否忠實？

五、社員增減之趨勢？

六、識字社員之多寡？

七、會議是否遵循章則？

八、職員能否盡職？

九、有否發生糾紛？

十、簿記——有無簿記並用何種簿記？

十一、公積金對社員之比較？
十二、社員繳股數目？
十三、營業資金對營業之比較？
十四、營業開支與贏利（毛利）之比較？
十五、公益金之處置？
十六、月報表暨其他文件是否準確，清切，敏捷？
十七、儲蓄戶平均存額？
十八、借款用途暨還款有否延期？

對這十八個項目，每個項目都是給予相當的分數的，把這十八個項目所得的分數相加，再以十八相除便得到某合作社所應得的分數了（最高分數爲一百。）合作社得分在八十以上者列甲等，七十分以上者列乙等，六十分以上者列丙等，五十分以上者列丁等，四十分以上者列戊等，四十分以下者列己等，其成立未經一年者則免予考績。不予分等，綜計二十二年度浙省被考察的合作社計有一千一百零四社，分佈於一市，四十縣。考察的結果於今年一月才由建設廳彙集印行，名『浙江省各縣市合作社二十二年份考績表。』其總結果如下：

縣市名	考績等次							共計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免予考績	
杭州市		二	八	三				一三
杭縣	四	七	二一	五二	二七		二	一一三
海寧			一	一二	七	一		二一
富陽							一七	一七
餘杭			一四	一六	八	一	一一	五〇
臨安			六	八	七			二一
於潛				一				一
昌化					一			一
嘉興		七	二四	二四	二一	二六	七	一〇九
嘉善		一	一五	一三	一九	三		五一
海鹽	五	一二	三	七	一	一		二九
崇德				二四	七三	四		一〇一

縣別							
平湖	二	三	八	六	一	二	二二
桐鄉				一六	二		一八
吳興	二	二	二七	七			三八
長興		二		三	一	六	一二
德清	一	一〇	二五	二四	二	三	六五
武康		三	一八	二	二		二五
安吉			一			二	三
孝豐		四	四	二			一〇
鄞縣		四	三	一			八
鎮海			一				一
紹興	一	五	五			二	一三
蕭山		三	一	一	三	六四	七二
諸暨						八	八
餘姚	二	七	八	七			二四

嵊縣	二	一二	一一	六	一	一	三三
金華	三	一六	八	二	一		三〇
蘭谿		九	五		一	一〇	二五
義烏	二	七	五			二	一六
浦江			三				三
衢縣		一	一五	二		二	二〇
江山	一	一二	一五	二		一	三〇
建德		一					一
永嘉	四	一〇	七			七	二八
瑞安	四	六	一一			一	二二
平陽	二	一一	一六	八	二	三	四二
麗水		四	一				五
松陽		一					一
遂昌	一						一

樂清							一	一
共計	九	五六	二二四	三五八	二五三	五二	一五二	一一〇四

為了考察的方便起見，我們再把這個總表簡單化一下：

等第	社數	百分比
甲（八十分以上）	九	〇·八二
乙（七十分以上）	五六	五·〇〇
丙（六十分以上）	二二四	二〇·三〇
丁（五十分以上）	三五八	三二·四二
戊（四十分以上）	二五三	二二·九二
己（四十分以下）	五二	四·七一
其他（免予考績）	一五二	一三·八三
共計	一，一〇四	一〇〇·〇〇

這個表是不必再加以什麼說明的了。根據考績規則所載，合作社得分在丙等以上者應予獎勵，丁等為及格，戊等及戊等以下者均應解散，五十分以上就算及格，水準本已不高，但能夠超過這個水準的合作

社不幸竟還是少數哩！一般合作社質地的低下於此可見。

三

當然，一般合作社的品質之所以不能完美，原因非常複雜。經費支絀，政策時易，指導不週，監視不力，過於急進——這些都是應該由政府去負責的。但合作社員的窮困，文盲的充斥，土劣的操縱，經理人才的缺乏等等卻是合作社自身以及合作基礎之所以難於健全的主要的因素，這些因素，如果不能加以改善，則合作社的水準決難望其有所提高，——這是我們敢於深信的。

我們試再就前面所說過的十八個項目中提出幾個比較重要的來檢討一下——從個別的和具體的事實的檢討中，對於合作社的實際情形也許可以觀察得更明瞭一點吧！

我們首先試來看看，一般合作社員對於合作意義究竟明瞭到一個什麼程度？對於這點，下表很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表由考成總表中計算而出）

合作意義理解之程度	社數	百分比
每多誤解	一四三	一四
隨波逐流不懂什麼	四〇六	三九
有合作之意惟未明白了解	三八〇	三七

明瞭透達並有見地	一〇五	一〇

從這兒，我們可以知道：浙省合作社的社員有一半以上是不懂什麼叫做「合作」的，一知半解的占到三分之一以上，眞正了解合作的只有百分之十的樣子。以大多數對於合作還是莫明其妙的人，來從事合作，合作事業又怎能辦好？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社員間的合作精神如何？下表又是從表中核算而得的：

合作精神	社數	百分比
自私自利無合作精神	一五九	一五
社員間稍有你我之見但不影響社務	五五二	五三
社員間相親相愛之誠充分表現	三二五	三二

我們知道：在現存的生產關係之上，一般合作社員的經濟地位和他們的知識程度都是很不相同的，他們入社的目的，自然也極不一致，「自私自利」當然成爲一種無可避免的結果，即使「不影響社務」「但社員間稍有你我之見」的終也是很平常的事，要想社員們統統都相親相愛，把「合作」的精神充分表現出來，我想除非使他們的經濟地位和他們勞動的目的都能够站在一條線上也許是不可能的吧？

社員們合作精神的不能充分表現，從社員份子的構成上還可以找出一點線索來：

社員份子	社數	百分比
多數特殊階級意圖利用	四一	四
少數特殊階級餘均忠實平民	四五一	四三
完全忠實有正當職業之平民	五四六	五三

從這兒，我們可以知道：「完全忠實有正當職業之平民」在「社員份子」中雖然占了一個絕對的多數，但「多數特殊階級意圖利用」的合作社畢竟也還不能盡免，而社員中有「少數特殊階級」的合作社竟也占到百分之四十以上，這亦足見社員份子之良莠不齊與眞誠合作之難於實現了。

而且，我們知道，合作乃是一種比較新的制度，合作的理解需要相當的教育程度——這是我們所不能否認的。然而，中國的一般農民有幾個能有機會受教育呢？連一個字都不識的還是很多很多的哩！試看下表：

識字社員	社數	百分比
在百分之十以上者	三八八	三七
在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二八四	二七
在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一三八	一三

在百分之四十以上者	七八	八
在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一四七	一四

這是很顯然的：社員們有一大半都不識字！社員們既多是文盲，則社務的執行自必求之於一些『特殊階級，』特殊階級之利用操縱，自然也就成為一種無可避免的結果了。

多數社員之缺乏新的知識，從各社所用簿記上也可以找出同樣的例證：

簿記	社數	百分比
並無任何帳簿	一八二	一七·六
雖有帳簿而不清楚幾與無同	一一三	一〇·九
用老式帳—不甚清楚	三八二	三六·九
用老式帳—尚清楚	二五四	二四·五
用新式帳之一部—不甚清楚	五四	五·二
用新式帳之一部—尚清楚	三二	三·一
用新式帳之全部—尚清楚	一六	一·五
用新式帳之全部且極清楚	三	〇·三

從這兒，我們很容易看出合作社之能利用新式簿記的——不管它用一部或全部，淸楚或不淸楚——非常之少，大多數只能寫一點老式的不淸不楚的帳。『並無任何簿記』和用而與不用相等的社數却幾乎占到百分之三十！

由於合作社之『粗製濫造，』由於多數社員們之蒙昧無知，合作社中的設備便非常簡陋，極不完全，下表也是從考成總表中彙錄而成的：

社中設備	社數	百分比
章則表册圖記等殊欠完備社址亦無着落	二一八	二一
章表等欠完備社址已有着落	五六三	五五
章表等已完備惟社址乏固定	五三	五
章表及社址等均完善	二〇二	一九

現在，我們還可以把合作社的社內會務拿來檢討一下，看看一般合作社除掉利用合作組織向社外的銀行借錢而外還有什麼社內的會務可言？

按合作社的放款資金，其來源本應有三，一爲合作社自身的股金，和公積金，二爲社員的儲蓄，三爲外來的借款，依照合作的原理來說，社員們的股本與存款應該是合作社活動資金的主要源泉，借款只能視

爲一種外來的輔助。現在中國的情形，與此恰恰相反。中國各地合作社的能夠活動，大部份全是仰給於外來資金的接濟，社員們的繳股能力非常薄弱，儲蓄更不必說。浙江省的情形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事實恰恰是這樣：

我們且先以社員繳股的數目來說罷。據統計，社員認股在兩股以上的非常之少，百分之七十的合作社，其社員繳股的數目都只有一股，繳一股半的計有百分之八，兩股的百分之七，兩股以上以迄五股爲止一共也只有百分之十的樣子！社內資金之缺乏於此不難想見，

那末，社內的公積金多不多呢？下表很可以明白的答覆我們：

社員平均所有之公積金數	社數	百分比
一無所有者	五九四	五九·四
五角以下者	三一一	三一·一
五角至一元	六六	六·六
一元至二元	二五	二·五
二元至三元	三	〇·三
三元至四元	一	〇·一

一般合作社之毫無公積在這兒是很顯明的了。現在讓我們再來看看他們的儲蓄能力如何？

從考成總表內所列的一千多個合作社裏，我們找到有儲蓄存款的合作社一共只有四十一家，其中三十二家的「儲戶平均存額」都遠在五元以下，一般合作社員本身的窮困於此不言而喻！

四

以上所述，雖僅限於浙江一省，但環顧國內，除河北省之合作事業發展較爲穩健之外，其他各省合作情形，恐亦與此不相上下，只可惜，他們沒有像浙省這樣去考察一番，局外人無從知其底蘊而已！

浙江合作當局現在以極大的熱忱與毅力去改進浙省的合作事業，已往的缺陷既經考察明瞭，將來的發展一定是很光明的——我們試拭目以待之罷。

一九二五，六，五日。

十五 山東糧食交易的單位

王立箴

「秤」「斗」及其差異

作者此次赴山東作糧食運銷的調查，搜集了不少有關各地糧食交易單位的材料；更參考該省各縣之通信，草成是篇，以作研究糧食貿易者之參考。

本篇目的，除供研究農產品貿易者之參考外，尚欲使一般農民及糧商，對各地不同的單位，得一簡單的比例。如果因此對度量衡新制的施行上，發生點點影響，那更是意外的收穫了！

山東省糧食交易所採用的單位，據此次調查所知，現時使用者，有「秤」與「斗」兩種。據各方面的考察，最初只斗一種；其後因各種關係，有些地方便改用秤。（但歷史較短的市場，如青島，自成立以來，即使用秤，可稱例外。）這種廢斗用秤的原因，頗值得吾人的注意。綜括言之，約有以下數端：

第一，糧食交易，或其他農產品交[illegible]，[illegible]接，與對外貿易有關，糧商們承販運商人的要求，爲運輸上的便利，自動的或被動的，改爲用秤。如濟南，據本地有經驗糧商之稱述：在民國十一年以前，糧食貿易，尙以斗爲議價的標準；但於交割時，則以本地所通用之「三斤四兩秤」，按糧食品種之不同，以各種不同的分量折合之，（其折合之斤數，詳列後表）民十一年以後，市場範圍，逐漸擴大，有幾種重要農產品，如小麥高

梁，花生米等，常經過青島與海外各地，發生出入口的關係，因便於客商計，濟南便自動的改用了「磅秤。」（磅秤是一種鐵質的彈簧秤，山東本地稱之曰「老磅秤」每斤正等於海關斤一斤。）

滕縣也可作一個很好的說明。在滕縣西關外車站糧市中，常有許多濟南客人，在此收買小麥，又常有許多洋幫客人在此收買花生米；買客們各因本地的習慣及出口的便利，故要求本市，改用了老磅秤。同時，縣城其他各關糧集，及城裏一般糧攤，仍以舊用升斗為交易的單位，保持着原來的面目。

第二，為弊端的問題。用秤的弊端，雖有所謂「上下其手」及「大入小出」等，但每斤之差，為數甚少。斗則不然，狡黠者，舉手輕重，每斗能差一升！尤有一點，即用秤弊端容易被人看出；而借於使斗者，即衆目所睹，亦難防其作弊。糧商們常借此，對賣糧者，尤其是誠實的農民，盡量盡其敲詐之能事；（但對買糧者，反不敢公然作弊，藉示信用，以廣招徠。）終至引起紛爭，方共謀改善辦法。例如泰安，就是這種情形。據當地人士傳說：該縣糧食交易，原為用斗，後因「行戶」（即經紀兼糧行，本地之俗稱）常借斗使弊，多向賣主收取合子。其法即：照當時規定，賣主應於糧食賣出交割後，至少須有若干剩餘，例為行戶之合子。如所剩者，不足規定之數，則只有另以現錢補足；但超過規定時，則皆歸為合子之列。是以當時行戶皆利用大斗小斗，時常調換，使賣糧者不易觸摸，於暗中多得合子。（但因大小斗的價錢稍加以人為的漲跌，故買糧者並無任何光沾。）賣糧者不堪其擾，隨起改秤之議。據云，當時並因此演成訴訟。至廢斗改秤之後，一場糾紛，始告平息。

不過當時改用之秤，與今用之磅秤不同，今日之磅秤，乃民國以後所改用的。

廢斗用秤，除上述兩種原因而外，吾人以爲尙有以下之根本原因——卽斗，秤較量標準之簡繁是也。「斗」「秤」雖均隔里而異，然而它們的較量之法，皆有一定標準。試就山東全省而論，普通流行之秤，完全以庫秤爲較量標準。緣庫秤之製造，據經驗豐富之老人言，以標準制錢一枚之重量爲一錢，十枚爲一兩，庫秤一斤，正等於標準制錢百六十枚。各地流行之秤，如所謂「三斤四兩秤，」「三斤六兩秤，」以及「三斤半秤」等，亦皆以此標準制錢爲較訂之標準。所謂三斤四兩秤者，卽該秤之三斤四兩，正等於標準制錢五百枚之重量。三斤六兩秤及三斤半秤之意義亦如此，是各秤較量法則，皆爲同一標準。（此外又有所謂「三厘秤，」「加一秤，」「截半秤」……等等，雖名目繁多，都只是使用習慣上的差別，較量的標準，仍均以庫秤。）至今日各大糧市中所用之老磅秤，雖與上述較量標準，略有不同，然與對外貿易中所用之單位，並無二致，是其便利之點。

然而斗的較量標準，則不如上述之簡單了。據一般人所知，普通皆以「管子」或「筒」爲較斗之器；因每筒等於兩管，故亦可謂卽以管子爲準。這在表面上似乎是統一了；實則管子的大小頗有不同。據多方面的調查，有邵管，漕管，衞管及靑管四種。彼此差異甚小，故嘗被一般人所忽略；所謂「天下管子一般大」者，是習而不察之誤也。玆將四者之傳說的來源，及實際的差數，述之如下：

邵管亦稱邵伯管，相傳係起源於江蘇省江都縣（舊揚州）邵伯鎮，其後因糧食貿易的關係，漸次流行於北方。管即清漕斛管，歷史頗久，爲清康熙以來之國定制；有傳說爲隋唐行漕以來所採用者，似未足信。衛管即衛斛管，有謂係初爲天津衛一帶使用而得名者，有謂爲衛河一帶使用而得名者，二說不知何者較可靠。青管即青斛管，其來源亦傳說不同：有謂係大清朝所興之制者，此說顯係錯誤，——前既言之，康熙以來，歷朝均採用漕管爲準，是大清所採用之較管標準，非青管可知。故又有人謂係大清河一帶最初使用之標準，此說亦未足信。此外另有所謂老斛管一種，以其使用之地域，及每管之大小而言，似與衛管相同；然以缺少有力的證明，未能斷定。

上述四管，在山東境內，最流行者爲衛管及邵管；漕管亦有之，青管則絕少。故以下僅就此三管之容量，略作比較。茲先列其比例如下：

1. 衛管＝.9邵管＝1.05漕管

另據作者在濟寧實測本地小米，每衛管之重量爲·三七五公斤，（在濟寧稱小米之重量時，係用市秤，爲每衛管十二兩正，即七五市斤。按該市市斤，每斤適等於半公斤，故每衛管小米之重量即爲·三七五公斤。）若以每管大小之比例，又可依次列每管濟寧小米之重量如下：

管別	邵管	衛管	漕管

每管重量（單位公斤）	·四一六	·三七五	·三五七

由上面的事實明白告訴了我們：斗之較量的標準——管子，是很複雜的。所以一般農商爲避繁就簡計，因事實的要求，卽將斗廢而不用，改用秤作交易的單位了；

其他廢斗用秤的原因，當亦不少；僅就上述數端，已足窺知其一斑了！

吾人對廢斗用秤之理由事實及斗秤繁簡之比較，雖有如上之陳述；但山東各地，糧食交易，仍多以斗爲單位者，這當然另有其他的原因存在，例如舊習難改，市場範圍狹小等是。但廢斗用秤，及由普通秤而改用鐵質之磅秤，是一種進步的現象，誰也不能否認的！並且，由容量改以重量爲單位，恐也成爲農產品貿易上必有之趨勢。

以下我們分別將各地糧食交易所採用的單位，按照中央政府所規定之權度法，一一折合列出，並將各種糧食，每單位之重量（如係用斗者）附列其後：

在未列表之前，吾人須略述民國以來，權度法之大概。民四年一月，北京政府農商部公佈權度法，分甲乙制兩種：甲種遷就舊制，以營造尺一尺爲長度單位，以庫秤一兩爲重量單位，以三一·六立方寸爲一升，爲容量單位——稱爲營造尺庫秤制。乙種則追隨世界潮流，以一公尺爲長度單位，以一公斤爲重量單位；以一立方寸爲一公升，爲容量單位——稱爲萬國權度通制。惜公佈以後，採用者僅山西一省，餘均奉行故

事，後雖屢有部令亦毫無成效。民十七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於是年七月十八日公佈新權度標準方案，亦分爲「標準制」與「市用制」兩種。標準制卽上述之萬國權度通制；市用制乃折中萬國權度通制及營造尺庫秤制二者之大小而另創一進步之制度也（參閱第一表。）其單位爲：一市升等於一公升；一市斤等於二分之一公斤；一市尺等於三分之一公尺。因其折合萬國通制，單位適爲一二三，故又稱爲「一二三制」。此制公佈將近六年，而各省切實使用之者仍鮮，卽就山東主要市場而論其複雜情形一如附表所列。

第一表　中央所頒各權度制折合表

萬國公制	合市用制	合營造尺庫秤制
一升	一升	○·九六五七四六一升
一斤	二斤	一·六七五五五八三斤
一尺	三尺	三·一二五尺

第二表（A）　山東各糧市用斗折合公斗數表

糧市	所用之斗	每斗管數	每斗合公斗數	備註
濟寧	新市斗	舊管三六·二管	二斗	本市原用舊斗二種名曰河市斗與旱市斗前者每管四八管，合新制斗二·六五二斗，後者每斗舊管

				四十管，合新制斗二・二一斗。現均廢用
淄縣	老斗	邵管五四管	三・一五斗	本市雖已奉令使用新制，然陽奉陰違。此外尚有舊斗一種，名官斗；每斗邵管五十管，合公斗二・九五斗，亦廢棄不用。
烟台	錫斗		二・七八二斗	
博山	市斗		一斗	
臨清	老市斗	衛管二八管	一・五七斗	本市對新頒之斗，亦陽奉陰違。又市斗之大小與天津斗相較，合天津斗一・一九。
德縣	市斗	二六管六	一・四六斗	市中現有採用新斗者。
桑園	斗	二七管	一・五八斗	集中糧棧家另用一種斗，其大小與德縣糧市所用者同。
洛口	洛斗	邵管四五管	二・六二五斗	

第二表（B） 山東各糧市用秤折合公斤數表

糧市	所用之秤	每斤合市秤	合公斤數	備註

濟南	老磅秤	一·二一斤	·六〇五斤	按老磅秤之大小，與海關斤相等。海關斤每百斤爲一擔(Picul)，故老磅秤百斤亦爲一擔。又本地通行之秤名三斤四兩秤，每二百斤等於老磅秤一百五十斤。
泰安	同右	同右	同右	
滕縣	同右	同右	同右	
青島	同右	同右	同右	
長清	老秤	一·一一斤	五五五斤	本市對新制，持一種陽奉陰違的態度。

「附」各地糧食每斗重量表

地名＼糧食種類＼本地每斗公斤數	小麥	小米	高粱	玉米	黃豆	菉豆	黑豆
淄川	一〇	一〇	九		一二		
博興	一〇						
萊蕪	二四·二五	二五	二〇	二〇 二四	二五	二五	
清平	五〇						
館陶	七	七·五	六·五	七	七·五	七·五	七·五
臨清	二二		一九	二〇	二二		

武城	一五						
平原	七·五	八	六·五	七	七·五	八	八
觀城	一四	一三	一一		一四	一五	一四
蓬萊			二〇	二〇	三〇		
冠縣	七·五			六·五	七·六	七·八	七·六
即墨	一三						
諸城	四四·二八	四三·〇五	三九·三六		四〇·五九	四四·二八	四〇·五九
荷澤	一四	一三·五	一二		一四		
博山	六	六	四·五	五	六		
無棣		一二·五	一三		一三·五		一三·五
茌平	七·五	七·八	六·六	七	七·五	八	七·五
德縣	一二	一〇		一二	一二		一二
膠縣	七	七·三	六·五	六·六			
齊河	二七·五	二八	二六·五	二七	二七·五		
濟陽	八	八	七		七·五		
蒙陰	九〇	九五	八八	八三	八九	八六	
益都	七·五五	七·五五	七·三	七·四	七·五六		
掖縣	一二			九·五			
濮縣	三四·一	三七·一			三五·九		
濟南	七五·〇二	七九·八六	六八·九八	七〇·一八	五二·六〇	七七·四四	五二·六

由這個表上，我們可以看出在二十六個糧市中同一種糧食每一單位之重量相差甚遠。如小麥，由每

斗重六公斤至九十公斤，相差十五倍之鉅！高粱由每斗四·五公斤，至八十八公斤，相差十五倍有奇！即其他各種糧食，亦均相差甚多。各地糧食品質雖有不同，而優劣之分，在範圍較小之區域中亦不應有如此之甚！是則完全爲斗之容量不同，可以知矣。又在此表中，尙可得出一點，即凡在魯東南山中各地，如諸城，蒙陰等，則所用之斗，容量特大；而交通較便之地，則容量較小，更有幾處，幾與市制斗完全相同。這種現象，是否完全爲交通的關係，因材料的不充分，尙不易斷定！

一九三四，六，三十日。

十六　山東文登縣農村市場概況調查

隋德民

文登縣位於山東半島之東南隅，地瘠民貧，人民生活程度之低，甲於全省。全境南北約長一百二十里，東西長約八十餘里，東北邊界至威海衞屬之喬頭村，南與榮成縣屬之石島口相毗連；共有耕地六千四百四十三頃二十二畝七分，地丁糧銀總數爲二萬六千九百二十五兩，約人丁二十二萬八千餘口。該縣著名出口物，以花生米爲大宗，人民食糧以苞米爲主要；有耕地五畝以上之農民（不論自耕農半自耕農或佃農）往往能種一畝半以上之花生，二畝以上之苞米，餘下少數地畝，則分種白薯俗名地瓜——及其他作物。全縣最著名之市集，有宋村，葛家，侯家，黃山，俗名之曰四大集。其餘如高村大水泊及馮家等集，不下四十餘處；各該市集逢集之日期不一，平均每日必能有兩處以上逢集者，亦有每十天逢集一次及二次之別，唯每十天逢集三次者則絕不多見。這一些農村中的市集，直接與石島口及威海衞相接觸，間接亦受上海及天津青島等處之影響，筆者今春旅行抵此，勾留四十餘日，考察該地農村經濟情形，現在僅就農村市場概況，縷爲述陳，其他如該地之農民經濟及農民副業等暇時當另文報告。

山東素以出產花生馳名全國，就中尤以石島貨爲最佳——因文登南部所產之花生多由石島口及張家埠（距石島約三十餘里）巡運青島銷售，故因以成名。民國十九年以前，由石島出口之花生米，無論

在國際市場或國內市場每百斤比他處所產者常高五六角之數，最近數年一半因爲國際經濟關係，一半因本縣近二三年雨水之失調，以致所產之花生成色不佳，每百斤比他處所產者只高二三角錢：有時亦常與他貨價碼劃一，惟成交較佳而已。在本縣較大之市集，整個之市面，常以花生米行市之起落爲轉移，故各該市集之商店，亦以經營花生米事業者之地位與信譽較佳。農民在春耕的時候，經過了幾番苛刻的手續，向資本家張羅了少數資本，到了秋收的時候，便把收穫所得的生米（該縣其他土產物尙不够人民糧食，鮮有出口）用驢子或肩背運到集上去，換了金錢，便把來還債。

本縣的民間歌謠有說：「莊稼老眞怪，越貴越不賣；」據筆者所見，這句鐵一般的俚語，不但形容了整個貧困的農民心理，即今日一般城市中的巨紳大賈，亦何莫不然。因此，一般專靠把花生賣掉，換來金錢，補充春耕時所借的資本的農民，便會嘗受了莫大的損失而搥胸大呼曰「皇天不可憐！」唉！這是多麼可憐的話呢?!

這個原因却又非常淺顯；在花生出口最多之青島上海天津等埠的土產商店，純以東西洋及廣寧等幫買賣之繁否而高低其價；在古書有云：「穀者以陰晴而貴賤其價」。在文登的農村市場中，花生雖然比其他五穀的地位要大，但是，却不能與其他穀類一樣的觀天之陰晴而貴賤其價。換句話說；文登農村市場中的土產商店之收買花生進胃程度如何及價格之高低，亦視青島上海天津等埠行情之起落爲轉移耳；

輓近交通便利，青漚行市微有起落，則本地花生收買者立即響應，唯以人情多虛，青漚微漲二角，則此地嘗有漲至一元，甚至一元以上的事實，反之，微疲亦然。陰曆年前，各地花生曾一度猛漲，本縣市集之花生經營者，多出而搶辦，唯農民方面多應了『越貴越不賣』的事實，坐而希望較高的價值；可憐不久又行狂跌下來，而這時的他們——農民——却又心甘情願地出而拋賣起來。本縣第四區東南鄉二章村廣仁堂為著名富商，其家中財富約值二萬餘元，年前因花生米市逐步上漲，以七元二角價（按百斤計算）大事收買，預備漲價後再行運往各地銷售，不期轉瞬即大狂跌，照現在市價計算，把二萬元的家底賠盡，還要虧空一萬餘元，而堆積之貨，早已霉爛不堪！

以上是文登縣農村市場幾點顯明的事實，其他如買青苗，牙稅制及農業倉庫操縱貨價等事均不多見，故不贅述。現在談到農村市場中的洋貨：

三年以前筆者曾乘遊歷威海之便，來榮成縣之崖頭集及本縣之大水泊（距威海約一百里，距縣城約四十里）作概況視察，彼時各該市面之棉紗棉布，尚中日間半；今春來文登視察各集，則華紗華布已寥若晨星，以前之猪皮底土布製成之鞋，亦不多見，充斥於眼簾者，唯日人所製膠底布鞋而已；因其貨美（美觀）價廉，（每雙約價三角）農民多樂購用，日貨遂一帆風順，將整個市場掠奪而去。以前農民家又有紡織聲，現在到處只見洋布洋線，以前尚見農民着土布短襪，現在則只見線襪充斥市面——雖不必盡屬日

貨，但日貨最少亦佔百分之八十以上也。因爲時間之關係，未能作週密之調查，日貨每年輸入總值若干亦無從估計，然其興盛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一九三五，六，八日。

十七　山東昌邑縣農村的「孝帽子會」

——一種舊有的喪葬合作組織——

王藥雨

一　小引

我國農村舊有的各種類似合作組織，種類甚多。只就山東舊濟南道屬二十七縣調查，便有十八類，五十七種。舉凡耕種，買賣，借貸，儲蓄，勞動，自衛，備荒以及婚，喪，育，樂，祭祀，旅行等等，無不俱備。（詳見鄒平「鄉村建設」，二卷，二期）大連南滿鐵道會社調查課曾於民國十九年出版「支那之動亂與農村」一書，內載山東農村祕密結社五十二種，其中有好多種是屬於合作性質的。他們——日本人——雖然將這些合作組織視爲「祕密」結社；甚至將「孝帽子會」一類的喪葬合作，列入「武裝團體」項下（原書目次及頁一二四）。這是由於他們不大明瞭這種組織的意義和內容，無足深怪。筆者於民國二十一年曾到魯省昌邑縣調查農業經濟狀況，在該縣丈嶺一帶，遇過好多的喪葬合作組織，如孝帽子會「白帽子會」等。這種組織，很值得探討。今就整理調查資料之便，特草短文作個概括的介紹。

二　成立的原因和組織

孝帽子會一名白帽子會，又名「白社」。名稱雖異，而性質則同。吾國舊俗：父母之喪，爲人子者必佩麻

掛孝；而孝服喪冠是用白粗布做成的。所以孝帽，白帽等，全是同一意義。

這種會的沿革，雖不易考證，而其成立的原因，則根據客觀上的兩種需要：（一）一般農民，遽遭大故，化費必多，需要金錢上的互助；（二）農村閒人很少，農忙時尤甚，一遇親喪，僱人不易，需要勞力上的互助。這兩種互助之最後的目的，是爲將親喪很順利的辦完，免有「抱恨終天」之憾。因此，凡是老親在堂的成年男子，便想湊合到相當人數，成立一個孝帽子會。

加入這種會的份子，全是久居本鄉的土著，大都務農爲業。「老街舊隣，」彼此相知，有事很容易幫忙。至於組織方法：是先由發起人做「會首」（或公舉會首，）再湊若干人爲「會友。」每會的人數，通常約自二十至三十五人，正是一般農戶辦喪事時所需要的人工數。成立的那天，大家在會首家裏聚齊，公議遇事攤款額和服務方法。或寫一會約，或一言爲定。此後誰家遭遇親喪，大家即如議奉行。

三　會友間的互助

會友間互助的方法有兩種，一是金錢上的互助，一是勞力上的互助。所謂金錢上的互助，是在開成立會時，議定每一會友（包括會首）出錢的額數，遇到會友喪親，大家照數交納。每一會友出錢的數額，通常情形由一吊至五吊（每吊合銅元五十枚。）交納的手續則分：（一）直接送給喪主；（二）由會首轉交。

至於勞力上的互助，即是幫忙喪主辦理喪葬各事。如舁棺，掘坑以及其他雜務，會友全可以襄辦。

此外，還有奉行唯謹，值得稱讚的幾條「戒律」（一）致送會金，不許延期和拖欠；（二）幫助勞力，不許片刻遲誤。即是說凡在會者無論怎樣的貧乏，接到會友的訃告，便須趕快的設法交錢。又無論晝夜，無論忙閑，一聞喪訊，便立刻到喪主家幫忙。聽說某人正在忙於割收小麥的時候。會友家來人報喪，便馬上放下田場的工作，趕到喪主家服務，這是很平常的情形。復次，會友在喪主家幫忙，不許叨人飲食，萬不得已時，只許飲水，絕對不准用飯，因爲一般會友，大都是些不甚寬裕的辦家，一遭大故，則人財兩乏，自無餘力來招待具有互助關係的會友了。

四　會友間權利義務的均衡

這種組織既是合作性質的一種，在互助行爲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即是權利義務均衡無爭。必得如此，這種制度才能長久的存在，才能普遍的推廣。我國農村舊有的各種合作組織，大都具有這種情義，孝帽子會也無例外。它所以達到權義均衡美德，是根據下列幾種方法：（一）凡遭遇親喪的會友，便有接受或要求其他會友幫助金錢和勞力的權利；其他會友即應盡到幫助的義務。互相幫助，直到全體會友親故後爲止；（二）凡雙親健在的會友，只能限定父或母一人的喪葬享受這種被幫助的權利，須於入會時自行聲明。所以「椿萱並茂」的會友，常須加入兩個孝帽子會。若全體會員均是雙親在堂，對於他們父母的喪葬欲一律享受孝帽子會的權利並盡其義務者，也有其例，不過很少；（三）如某家遭遇親喪，正趕上某會友未

在本鄉，無從幫忙，必須由缺席的會友家另外找人替工。應該交的會金，也須照數完納。因爲上述的三種辦法，會友間的權利義務，很容易均衡而無爭執。但是，這只是一個淺層的概說而已。

五　解散與出會

這種會成立以後，必俟全體會友親喪終了，才可以宣告解放。自成立至解散，並無一定的期限，因爲會友的父母不一定甚麼時候准死。所以存在一二十年的孝帽子會，是常有的事。比方說：某一會友的母親自五十歲在會，直到七十歲壽終，這其間的經過便是二十年。如果是「壽登大耋」的老人，比這個時間更要長些了。

因有在會的時間很長，所以會友中途出會的事，自所難免，如出走，遷移，死亡等，全是中途出會的重要理由。如果會裏遇到這種出會的事情，他們補救的辦法，常是斟酌着下列幾個途徑：(一)出走者由兄弟子任來頂替代負繳納會金和幫助勞力的義務；(二)老親健在，舉家遷徙者，即斷絕權利義務的關係；(三)如果已享受過親喪被助的權利，尙未盡完義務而中途出會者，如無頂替之人，例須照約賠償會金，寬免勞力的義務。此外，也許還有別的辦法，要看出會的情形如何而定。

關於會友中途出會的補救辦法，在立會之初，多不討論，大都臨時議定。這因爲經過的時期很長，人事的變化莫測；又兼同會者皆有鄉誼的關係，相知素深，遇事自易商決，毋須預先討論了。

六 尾語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守望相助。」一般人常用這句老話來形容農村裏社羣生活的合作精神。但是，在守望相助的前提之下，有過怎樣的組織？取過怎樣的方法？收過怎樣的效果？這實在是研究農村問題和從事鄉村建設的人們應該注意的一點，因爲這類的組合，歷史很久，種類很多，作用很大；尤其是一切辦法，合乎我國農村社會背景和風俗習慣，這一點最值得重視。希望對這種問題感覺興趣的人們，作個比較具體而擴大的研究。不但在學術和應用上有它相當的價值，還可免得外國人的著作中對此有好多的誤解，區區短文，只是「拋磚引玉」而已。

一九三五，三，二十三日。

十八　山西中部一般的農家生活

——替破產中的農家清算的一筆帳——

張稼夫

一

作者在一九三一年的秋天，因患肺病，醫生吩咐要我去到一個大陸氣候的地方去休養，於是便到山西中部的一個小村莊住下，一直在那裏住了差不多三年的時光，去年秋末的時候才離開那裏。其間因爲有病，一點也沒有敢做什麼；在一九三三年的冬天，身體也比較好了一點，爲了研究興趣的驅使，曾爲當地的農家做過一個田內收支的統計，以及一些關於當地農家生活上各方面的數字記載，現在這雖說已是過去了的材料，然在其正確的意義上是仍有相當價值的。

人家說「中國是一個沒有統計數字的國家，」這不僅是外國人所加於我們的一種惡意的批評，中國之缺乏正確的統計數字，就是我們自己也不能否認。中國人之所謂「馬馬虎虎」的精神，着實是高出一等的。尤其是在農村，當你問及他們的生活收支情形時，首先是爲了怕，不肯告你；你就是誠心誠意地要告訴你了，他們也是絕對答不出一個比較正確一點的數字來。譬如：關於稅捐，他們知道今年確是比去年加多了，究竟增加了些什麼項目？每畝計負擔稅捐若干？他們是一點兒也不知道的；關於成本，除了種子費而

外，他們只知把自己的全部勞力以及所有的那堆糞土，一齊放在自己所有的田地中去，必要時也難免屈一點人工，究竟每畝什麼農作計需人工若干？肥料若干？他們是不知道的。至於要是問到他們的衣物油鹽醬醋米麵等實際消費的數字時，那就是苦死了他們也是答不出來的。所以做農村調查的人，首先要有說服農人叫他對你相信的本領，一方面還得耐心地多次的去訪問他，並爲他一點一點的清算着他的那筆糊塗帳。

農村破產在中國是事實，中國的朝野上上下下，差不多人人在談論着中國的農村破產，農村破產這個名詞，在現時幾乎已成爲時髦的口頭禪了。然試一究問其中國農村破產的現狀如何？已經破產到怎樣的程度？必皆瞠目不能對。如其是口頭的，不是眞的要謀求中國之實際前途的發展，那就無須說了。否則，那關於正確的統計數字所表現的中國農村破產實況材料之搜求，則是所謂「建設」「復興」等問題，開步走起碼必要的前提。

二

此地是省南，距太原百里以外的一個小村莊前年——一九三三年是一個多事的年份，然此地並未受到水災。只是一般地受了雨水過大的損傷，收穫較歉。至鄰近的地域內，一般地觀察起來，情況較好於此地者固然也有，而不好於此地者，實十倍多於其較好者。今將這個村莊裏的農家田內收支統計，列表於次：

一九三三年山西中部農家全年田內收支統計

收支項目 ╲ 農產類別	每畝收入 正產 數量	正產 價格 (元)	正產 總值 (元)	副產 數量 (斤)	副產 價格 (元)	副產 總值 (元)	收入總計 (元)	種 數量 (石或斤)
小麥	(石) 〇·三五〇	三·〇〇〇	一·〇五〇	100.000	〇·〇〇〇	〇·〇一〇	一·〇六〇	〇·一〇〇
高粱	(石) 一·〇〇〇	一·三〇〇	一·三〇〇	500.000	〇·〇〇〇五	〇·二五〇	一·五五〇	〇·〇〇七
玉蜀黍	(石) 〇·七〇〇	一·二〇〇	〇·八四〇	200.000	〇·〇〇〇五	〇·一〇〇	〇·九四〇	〇·〇〇七
穀子	(石) 一·〇〇〇	一·五〇〇	一·五〇〇	200.000	〇·〇〇二	〇·四〇〇	一·九〇〇	〇·〇一〇
豆類	(石) 〇·五〇〇	一·六〇〇	〇·八〇〇	150.000	〇·〇〇一	〇·一五〇	〇·九五〇	〇·〇二〇
芝麻	(斤) 四〇·〇〇	〇·〇五〇	二·〇〇〇	150.000	〇·〇〇〇五	〇·〇七五	二·〇七五	(斤) 一·〇〇〇
棉花	(斤) 三〇·〇〇〇	〇·一〇〇	三·〇〇〇	50.000	〇·〇〇〇五	〇·〇二五	三·〇二五	(斤) 一〇·〇〇〇
平均			一·四九九			〇·一五七	一·六五六	

每畝支								
成本							稅	
子費		人工費						
價格（元）	總值（元）	數量（日）	價格（元）	總值（元）	肥料費（元）	耕地費（元）	錢糧及一切地方附加（元）	臨時軍費及臨時派款（元）
五·〇〇〇	〇·五〇〇	三·〇〇〇	〇·三〇〇	〇·九〇〇	〇·二〇〇	〇·四〇〇	〇·三二〇	〇·〇五〇
二·〇〇〇	〇·〇一四	四·〇〇〇	〇·二五〇	一·〇〇〇	〇·二〇〇	〇·四〇〇	〇·三二〇	〇·〇五〇
二·〇〇〇	〇·〇一四	四·〇〇〇	〇·二五〇	一·〇〇〇	〇·二〇〇	〇·四〇〇	〇·三二〇	〇·〇五〇
二·〇〇〇	〇·〇二〇	六·〇〇〇	〇·二五〇	一·五〇〇	〇·二〇〇	〇·四〇〇	〇·三二〇	〇·〇五〇
三·〇〇〇	〇·〇六〇	五·〇〇〇	〇·二五〇	二·二五〇	〇·二〇〇	〇·四〇〇	〇·三二〇	〇·〇五〇
〇·一〇〇	〇·一〇〇	六·〇〇〇	〇·二五〇	一·五〇〇	〇·二〇〇	〇·四〇〇	〇·三二〇	〇·〇五〇
〇·〇三〇	〇·三〇〇	三·〇〇〇	〇·二五〇	三·〇〇〇	〇·二〇〇	〇·四〇〇	〇·三二〇	〇·〇五〇
	〇·一四四			一·四五〇	〇·二〇〇	〇·四〇〇	〇·三二〇	〇·〇五〇

出	捐	差車費（元）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巡田費（元）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地方雜費及村公費（元）	○·四五○	○·四五○	○·四五○	○·四五○	○·四五○	○·四五○	○·四五○	○·四五○
	支出總計（元）		二·九○○	二·五一四	二·五一四	三·○二○	二·八一○	三·一○○	四·八○○	三·○九四

（一）本表各項數字來源均係作者親自歷詢當地四位自耕農二位雇農（長工）二位農業經營者，詳加訂正，編製而成。

（二）在成本費中本應有農具費一項，但以計算農具費須用「耐用年限」除「購價」才能求得，而耐用年限又因物材之不同而有不同，同時，每一農具之利用範圍亦因戶而有不同，不便計出，故從略。

（三）本表係製自一九三四年一月，表中所計概係一九三三年計全年收支以及當時物價，更應特加聲明者即一九三三年當地的小麥因傷雨而特別歉收，糧價亦較往年為低。

（四）表中「副產」一項，乃指小麥桿，高粱桿等等而言。

現在我們根據以上的統計，僅就田地中的收支情形而論，可以表出此間農家於收支相抵之後，所有的農作沒有那一樣是不賠本的。不過其所賠的數目因作物種類而有不同，茲特列舉其每畝賠數於次：

小麥　一·七五（單位元）

高粱　○·九六四

玉蜀黍	一·五六四
谷子	一·一二
豆類	一·八六
芝麻	一·〇二五
棉花	一·七七五

一般農人對於自己的人工，常是不把它當錢算的。現在我們更假定人工都是自己的，並沒有用錢去雇人，將自己的人工費完全除掉不計，以(－)號示賠，以(＋)示賺，更將此間農家每種一畝農作，除掉已工不計之賠賺情形，列示於次：

小麥	(－)	〇·八五元
高粱	(＋)	〇·〇三六元
玉蜀黍	(－)	〇·五七四元
谷子	(＋)	〇·三八元
豆類	(－)	〇·六一元
芝麻	(＋)	〇·四七五元

棉花	（十）	一・二二五元

表面看來，似以種棉花爲較有利，種小麥爲最賠錢；然棉花費工最大，一個人盡種棉花，全年僅可作三畝上下。小麥之賠數最大，却多由本年的傷雨所致，所以一般大地戶——資本主義經營者——以小麥省工，銷路亦較普遍，仍喜多種小麥、棉花需要人工衆多，女人小孩子都可以放在田間去的中小農家還相宜的；如果要雇人來作，那就非賠本不可。比較之下，種芝蔴要比較好些，不過芝蔴的輪作年限很長，在當地曾作過芝蔴之地，須隔過十年才能更作第二次，實際上不能多種，高粱谷子爲此間農家主要食品，故仍以種高粱和谷子爲最多。

每個農人全年可能耕作的畝數，亦因作物而有不同。今如假定一個人全年單作一種農作，其可能耕作的畝數，曾經估計如次：

小麥	一五畝	豆類	五畝
高粱	二五畝	芝蔴	〇畝
玉蜀黍	二〇畝	棉花	三畝
谷子	一〇畝	平均	一四畝

如果我們更假定一個農人盡作一種農作，以其可能耕作之畝數，作爲其全年所作的畝數，即將自己

的人工除了其所表現的賠賺數目就更有可觀了。

小麥	(－)	一二・七五元
高粱	(＋)	○・九○元
玉蜀黍	(－)	一一・四八元
谷子	(＋)	○・八○元
豆類	(－)	九・一五元
芝蔴	(＋)	四・七五元
棉花	(＋)	三・六七五元

以上各農作，賠賺數字的相懸殊，一定會引起讀者的驚異的。不過前面已經說過了，當年的農作是受到雨害的；凡是有農耕常識的人，都會知道小麥，玉蜀黍，豆類是最怕傷雨的作物，故將其歉收之數也完全由以上數字中表現了出來。

現在我們再把第一表中的平均數，拿來看看各種農作每畝的平均收入為一元六角五分六厘，每畝平均支出為三元零九分四釐，收支相抵每畝實賠大洋一元四角三分八釐；如果除去己工不計，每畝僅可實賺大洋一分二釐。今以每個農人兼作各種農作，全年可耕畝數平均以十四畝計算，除掉己工不計，每人

每年僅可得贏餘大洋一角六分八釐。今更假定一個工作能力最强的農人，全年可耕畝數之最大限度爲二十畝，除掉己工不計，全年可得贏餘也只不過大洋二角四分罷了。

三

前節所述，僅限於當地農家田地中的收支情形。農人並不是種種地，交納了稅捐就可以生活下去的；他們除了田內的開支而外，還有在其維持生活上最必要的實際消費。農人在終年不息的勞作中，也得吃也得穿；不用說在勞動中了，只要是活着一天，卽不能不有一天之吃穿等實際的消費。

關於當地農家實際消費的調查，作者最初也是分了許多項目去問，其結果差不多每一個人的估計是一個樣子，中間的差額很大並不是他們不肯實說，實由於他們之不會逐宗計算，所以最後僅將農家的實際消費，分爲食糧和其他消費二項，請求他們估計；如此估計的結果，則各人的估計，大都是相近的。最後又將他們各個人的估計，做出一個平均數來，更以此類一一質之於原人，他們差不多都公認這個數目是對的。就是當地農家人口大小均計，每人全年最低限度的食糧消費爲二石五斗——雜糧——，平均每石以兩元計値，共計大洋五元；每人全年衣物油鹽醬醋等消費大小均計，平均爲大洋四元。以上二宗合計，每人每年的實際消費總値，僅爲大洋九元。又此間農家的人口，平均每個家主必須負擔三大口二小口——卽二個小孩，一個老人以及自己和妻。共計五口人的養育責任故以每家五口人計算，全年共須實際消費

大洋四十五元。

當地農家全年最低限度的實際消費爲四十五元，而其全年最大限度的田內純收入，才只有二角四分。至於他們在這種收支大相懸殊的情況之下，究竟將何以維持生活，這就實非作者所知了。不過據我揣想所得，其維持生活之道，也無非是（一）當當負債；（二）典房，賣地；（三）賣金飾，鬻妻子；（四）充苦力，兼他業；（五）吞糠咽菜，節衣縮食；（六）挺而走險，爲非作歹等幾樣途徑了。

每個農人，連伙食帶衣物等一應化費，一年到頭只要九元大洋，就可以够了的。這叫住在都市中的人們聽了，一定以爲我是在造謠；因爲他們全年的消費總額，差不多僅僅等於一個住在都市中的人之起碼的一個月的伙食費而已。不過，這個數字的來源是由於多數農人自己的估計，而且他們在怎樣悲慘地過渡着那種非人的生活，也是我親身長期地看到過的，假如我要不是在那住過的話，恐怕連我自己也不會相信那是正確的了。他們的食品，最主要的是高粱麵和小米；而高粱麵也只是僅限於午飯一次，早晚是在小米稀飯中煮以南瓜之類的東西，午飯時，也只限於勞作的人才能吃乾麪，其餘女人小孩子通常都是吃湯麵的。因爲小米的價格比較高點，所以有些貧農即將高糧或玉蜀黍碾碎，用以代替小米。有一個在這村裏的「村公所」充當書記的人，因爲家庭負擔很重，所以他過的也很苦。據他親自告我，說他的家裏自二月間就沒有了小米，一直到九月谷子收割的時候，在永喝高糧末兒的稀飯；他並說，他家除了過大年買過

四兩煤油外，成年也不肯點一次燈的。他們的衣物，非至萬不得已是不肯買新的：他們在不憚煩勞地改拆着，補綴着；棉的改成袷的，袷的更改成單的，就是小小的破布也要想法利用，不肯輕易去掉的。

所以我很希望，住在都市中在熱切地關心着農村問題的人們，最好也要更加熱切的關心一下，我們住在農村中的一部分同胞，在過着怎樣的生活。

四

農村中的階級分化，在以上的統計中是一點也看不出來的，因爲我並沒有去作分家的調查。一般地看出來，租佃關係——地主與佃農的對立形勢，在當地是非常模糊的。因爲那裏農作是近於粗放農業，成本和人工的費用是比較小，而稅捐的負擔很大，所以與其租給人家，還不如自己經營比較有利些；除了自己缺少壯丁的農家，是不肯租給人家種的。此間的租制，大部分是分租；地主負擔稅捐，佃戶負擔成本，所收穀物各分其半。做地主的差不多是男人出外營商或是只有女人小孩子的小戶農家；而做承佃者的，反而是當地的大地戶。其對立形勢比較顯著的，是村人對於村長，小農對於高利貸者，雇主；而村長高利貸者，雇主，差不多就是當地三位一體的大地戶——富農。大地戶所有的田地，最多的也不過三百畝，最少的在百畝以上；他們都養有耕畜二頭至四頭，在耕作，中耕，運輸上都是用畜力的。所以他們在人工費一項上，是絕沒有前表所示的那麼大，在耕地費項也只消將耕畜之飼料費，均派在所有的田地中就是了，故他們的人

工費耕地費都是比較輕微。同時，他們除了耕作自己的農田而外，大都以出雇給一般農家，爲其耕畜之主要的營利事業。

普通農家是養不起耕畜的，所以在耕田的時候，就非雇用大地戶的耕畜不可。通常耕地費的價格竟高至每畝四角到六角；二頭耕畜一個人工，一天可以耕作五畝地上下，那末一天就可以起碼有二元到三元的收入。在一九三三年的冬季，正是收取耕地費的時候，當地農家曾要求減少耕地費，以糧價的低落以及農作的歉收而論，耕地費很應該減低一點才對，可是當時所有的大地戶協議的結果，不能再少於每畝四角，誰家也不准少收的。

稅捐官款是由村長經手徵收，縣長向村長要，村長就向農家要，村長是當地的大地戶，自己有糧店有磨房——兼營雜貨——也放債；沒有錢可以交糧，沒有糧也可以收地，不交官款是無論如何不行的。至於到期約利息和耕地費，那更加是絲毫不可以通融的了，所以每至年終，一般高利貸生活者便廉價地大批的將牲畜牛羊從村中趕了下來，一套一套的箱櫃農具由農戶中抬了出來。然而高利貸的生意，並不因此消沉，仍然在繼續出放着；其方法之嚴密出奇，有出人意想之外者。如當時本處某戶，共借本大洋十五元，言明月利四分行息，計質押上等田地八畝，場院一所，二宗估價計值大洋一百一十四元；至借約上寫明限期爲五個月，至期如還不到，所有質押一概作爲死契。

去年的麥價棉價都比較前年稍有起色，而農家生活的困苦情形，並不見得較好於前年。當我去年離開那裏的時候，正是「村公所」起派官款和村費的時候，一般農人都是憂形於色，正像作着生與死的鬥爭似的。然而人們都總是願意活着，就是在那生死關頭，仍不能不做着生的迷夢，他們所夢想着的，無非是：第一，官廳開恩，免除一切苛捐雜稅；第二，明年豐收，一切物品仍如現時一樣便宜，而農產的價格突漲到和五年前一樣；第三，天下大亂，隨處都可以取得食物和用品而不需要一個現錢。但是在他們的這幾種迷夢之中，有把握可能實現的究竟是那一種呢？

一九三五，七，十三日。

十九　廣東潮州的農地分配

余捷瓊

這一回乘着寒假之便，我決定回到潮汕一走。這一行有三個目的：第一個是想看看那鬧得天翻地覆的潮汕貨幣的擾亂狀況，第二個是在看看那傳聞得黑漆一團的廣東的捐稅狀況，第三個是在看看潮汕的農地分配狀況。這裏就是想把第三部分所得的結果向大家報告。

我得談談我做這種工作的動機和所採用的方法。許久來，我心頭時常有一個問題憧憬着，何以潮汕僑居南洋的人口是那樣多？這個問題發生的原因，却是完全受現實的刺激而來的。南洋商情的惡化，使許多華僑，特別是潮籍的華僑相繼破產了。這樣立卽影響汕頭的經濟狀況。銀行和錢莊三年來可說都倒光了，一般商情的冷淡，更是前此所沒有的。假如我們碰上每個人都叩問他們爲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結果，他們不是說「破款多，」便是說「番銀沒有來。」關於破款部分，下時再講，所謂「番銀沒來，」就是說南洋的潮籍華僑沒有匯錢回來。

潮汕沒有南洋是支持不了的。我被這個問題苦悶着，於是我想到何以潮汕沒有南洋便過不了。許久來我時常在分析它的原因，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許久以前愛爾蘭人的大批移住美國，是因爲受土地問題的紛擾，英國地主把愛爾蘭的土地都分割去了，迫使愛爾蘭人不得不一跑了事，於是我想到潮洲人民的

所以大量流寓南洋，也許也是因爲土地問題的緣故吧。我把這點意見認得很眞，只是沒有事實做根據，無從確定。於是我便想找一個機會考察潮洲的農地分配。順着這一次南歸之便，我便想看一看土地分配的實情，結果便產生如下的一段報告，這是問題發生的始末。

工作的方法，是應該向大家說明的因爲這和報告的可靠性有甚大的關係。

在潮汕的時光，充其量只有一個月。除了十天花在汕頭看看汕頭的新風色外，所能在鄉村的時間至多只有二十天，我怎麼樣便可以知道各地農地分配的狀況呢，直至我跑到汕頭時還被這個問題困擾着，我幾乎要放棄這種工作。恰好碰上幾個中學時代的朋友，他們現在都權充鄉村的小學敎師，談起那汕頭的商情，連帶談起了南洋，更連帶談到何以潮汕沒有南洋便不能過活，於是我順便提起我那一段土地分配的心事。

他們都對這個問題表示興趣，我便決定請他們幫同辦理實地調查的事，他們都是滿口應承。但是接着具體的問題便來了，要如何調查呢，向那裏去調查呢？調查那幾項問題呢？詳細擬製表格是來不及了，一時幾乎是無法可施，事情又像要化成一陣烟。經了三次的詳細討論，還是沒得結果。最後還是吳君石提議利用各鄉間已成的田畝簿。（按就是各鄉村公所公共登記各戶所有各種田地的大小多寡的公共帳簿，用以爲攤派公款之用。）我表示反對，因爲我不知道各鄉田畝簿上的記載是否確實。他們的見解則對這

一點可以全部擔保。據他們的意見，以爲「鄉村中某戶有田多少，某戶有地多鹵，都是大家所共同知道的事實，田畝簿上的記載，決無錯誤，並且帳簿所以供攤派公款之用，此戶匿報或少報，立卽可以影響彼一戶分派的數目，以鄉村人打算之精，決不容許有不確實之處存在。」他們這種意見，我認爲確是言之成理，於是我決定利用這些檔案——軍閥剝削的檔案，做我的初步的材料。

既然決定要應用這些既成的材料，問題便變得非常簡單。但是到底要找那一個村落做代表呢？這又是一個問題。因爲現在既不必分戶調查，只在分村抄錄已成的材料，材料工作已不見繁重，於是我決定至少應有五個以上代表不同性質的鄉村做代表，在各人有關係的村落中，終於決定了如下的六個地方。

縣名	村名	所代表之特殊性質
普寧	歧嶺新寨	地主制度下的典型的農村，是一個附屬於普寧城的小村，一向在方姓地主的支配之下。
揭陽	北洋鄉（卽福陽鄉上房）	代表正常狀態的鄉村，鄉民大都小康，無極貧，亦無極富。
潮安	水美	是一個典型的華僑資本支配的鄉村。
饒平	後佗（長房）	華僑資本轉化爲地主後的典型社會（卽若干年前該村有華僑甚多，且多富有資本，後多回國購地立業，變成新式地主。）
潮陽	沙甫	代表寒村。

澄海　沱浦（林姓）　代表靠近海灘之漁村。

除普寧一地由我自行料理外。餘均委託他們分頭進行。當時並決定抄錄各該鄉每戶所占有的各類土地外，並應精確調查各該村落的事實人口（現有在村人口的數目）將來才可以計算每一村人口所占的土地面積多少。這一項是我原定所沒有的，我本來只想知農地的分配狀況，並沒想計算每個人所能分得的土地多少。現在既然要涉及華僑外移的原因，便要計算到每個人所能有的土地，那末這一項便成爲不能少了。

工作的進行都順利過去，差不多十二天功夫全體便都返回汕頭了。又因爲開學的時間已屆，他們那些敎書的朋友都要回去敎書，我雖然在汕頭還有一週的擱留，然又忙於外事，所以抄成的材料無從整理。直至我下上海船之後，得着上海船風平浪靜之賜，半倚在艙壁上劃組分類，才把結果整理出來，這便是全部事實的經過。下面便是從那些已有的檔案中整理出來的結果。

下面的報告，第一表是先將各村的土地的總畝數求出，再用該村的總人口和總戶口去除它，求出每口和每戶所能夠分到的土地的畝數，其次第二表用簡單的次數分配的辦法，把各村土地的分配狀況，以次數表表示出來，最後再將全體平均，求出這六個區域的共同結果。

第一表　土地按人口戶口之分配狀況表（以畝計）

村名	人口	戶數	全村所有土地 糧田	全村所有土地 租田	每口得分土地 糧田	每口得分土地 租田	每口得分土地 租糧合計	每戶得分土地 糧田	每戶得分土地 租田	每戶得分土地 租糧合計
岐崗新寨	一九二	四二	二五	二二八	〇·一三	一·一九	一·三二	〇·六〇	五·四三	六·〇三
北洋上房	七〇九	一三〇	七五〇	—	一·〇六		一·〇六	五·七七		五·七七
水美	二〇七	三八	五六八	（註）	二·七二		二·七二	一四·九四		一四·九四
後宅	二四一	四四	三三五	—	一·三八		一·三八	七·六二		七·六二
沙埔	三七二	七七	一四〇	一五三	〇·三七	〇·四一	〇·七八	一·八二	二·〇〇	三·八二
沱浦	二六一	四九	二〇三	—	〇·八〇		〇·八〇	四·一四		四·一四
六村合計	一九八二	三八〇	二〇二一	三八一	一·〇二	〇·二〇	一·二二	五·三二	一·〇〇	六·三二

第二表　各村土地的分配狀況（租糧合計）按每戶有田多少之次數分配

組別 ＼ 戶數 ＼ 村名	岐崗新寨
〇——一畝	一
一——二	二
二——三	二
三——四	五
四——五	八
五——六	七
六——七	八
七——八	三
八——九	一
九——一〇	二
一〇——一一	一
一一——一二	一
一二——一三	〇
一三——一四	〇
一四——一五	〇
一五——二〇	〇
二〇——二五	〇
二五——	一

北洋	水美	後宅	沙埔	沱浦	六村總計
五	○	二	五	二	一五
七	一	一	九	五	二五
七	○	四	一四	七	三四
一九	二	四	二一	一六	六七
二一	○	五	九	一四	五七
二一	八	五	一○	三	五四
一八	一○	六	五	一	四八
二一	○	五	二	○	二一
四	五	四	一	○	一五
三	一	○	○	○	六
二	二	○	○	○	五
二	三	三	○	○	九
一	○	○	○	○	一
一	○	○	一	○	二
二	○	○	○	○	二
一	○	一	○	○	二
二	○	○	○	○	二
三	六	四	○	一	一五

（註）租田制度，在潮洲農村中或有或無，上表六地中只歧崗及沙埔有之，歧崗之有是制，歷史甚久，原因無從考查（參照五十期農村週刊余歧童一文）至沙埔之租田制度，乃納於官而非納於地主，因其地近海，海佃官有，年中由官收租云。

上面兩個表，就是整理出來的結果。這兒不能詳細發揮我的結論，只能把淺而易見的幾個要點指出如下：

（一）在第一表最末一行六村合計中，我們可以看到每一丁所能分到的田租糧合計，不過是一畝二分一，每戶所能分到的田租糧合計不過六畝三分二。由是可以看到農民耕種面積的狹小，無怪潮人都東分西散，跑到南洋去找尋生計。

（二）在第一表的最底下一行每戶得分土地租糧合計一列中，我們可以看出各地居民所能分到的土地絕對不等，以水美一鄉與沙埔一鄉相較，相差竟超過四倍。這中間的原因是應該加以說明的。水美一

鄉，華僑最多，大都是錢力雄厚的。他們把從外洋搾來的金錢，盡量收買地產，本鄉既都是錢力雄厚的番客，所以收買到鄰鄉的土地，造成新地主的地位。在第二表中可以看出水美一個小小村落中有田超過二十五畝的已達六家之多，在廣東，特別是在潮州，要有二十五畝以上的地產是很不容易的。至於沙埔是一個窮困的漁村，僻處海嵎，所以各人所能占得的地面那樣小。

(三)由於耕地的狹小，所以便可以看到洋米每年不能不大量流入廣東。

(四)在第二表的最末一行六村總計中，以每戶占有土地三畝至四畝爲最大多數，其次爲四畝至五畝，再次爲五畝至六畝，有地十畝以上的絕對少數。

(五)有地二十五畝以上的共十五戶，占總戶數的百分之四弱。這一輩人，都是華僑資本的轉形。據調查所得，內中除一戶以業糖起家外，餘悉爲海外的華僑，若干華僑已經變成地主。

二十　河北鄉村視察印象記

吳半農

一　定縣

三月十日。星期六，晴。

晨七時乘平漢慢車離平。下午三時半，車抵定縣，平敎會派一用人來接，說會裏已給我們預備了住處，可以不用下「棧」。於是我們就僱了四輛洋車，一直奔向城裏去。

平敎會是在城裏考棚街。到了那裏，即有該會研究委員會王君始先生出來招待。王先生手裏拿着幾張油印的參觀程序表，說是特別爲我們預備的，問我們覺得合適不合適。我們知道明天是星期日，後天又是中山先生逝世紀念日，在這假期裏面該會諸君還肯犧牲休息的時間，指導我們參觀，我們除了感激外，自然沒有什麼意見的。

定縣目前是河北省的縣政建設實驗區，縣長霍六丁便是平敎會從前的職員，縣政建設研究院的主要人員也是平敎會的職員所兼任。所以定縣目前的縣政可以說是握在平敎會的手裏。平敎會爲什麼要把定縣的縣政握在手裏呢？這里，我們便得明白平敎會發展的略史。平敎會最初成立時僅以開辦平民學校，從事文字敎育爲職志。主辦人晏陽初等也是以編輯千字課而得名。後來因爲感覺到中國大多數的人

民是農民，中國社會的基礎是農村，所以才轉變而傾向於農民教育。以後再由農民教育進而爲農村建設，現在則更進一步，欲以縣政建設爲工作的目標了。翟六丁做了定縣的縣長，想是爲了實現這個目標而來的。一個縣政府負了這種非凡的使命，我們想像定有許多値得我們注意的地方。我們從料敵塔下散步歸來，道經縣署時，爲了這個想像曾在衙門前逗留了一回。第一件引起我們注意的新穎的東西是縣長的兩紙佈告。其一文曰：

『定縣人，性子急，
一天官司十六起。
賣了莊戶去了地，
又費工夫又受氣。
我勸大家和解好，
自己事情自己了。』

又一文曰：

『眞有寃，來告狀，
我勸大家把心放。

官事輸贏全憑理，

化錢託人淨上當」

又縣署的第一道門裏設有一家民衆食堂，聽說是爲了方便那些「性子急」進城打官司的鄉下老的，事亦新穎。

十一日，星期日，雪。

起床極早。參觀的程序要到九時才開始。我利用這個時間把昨夜王君始先生拿給我們的許多小冊子，檢了幾本主要的翻閱了一下。我發現每本小冊子上，幾乎都有「四大敎育」「三大方式」的字樣，什麼是四大敎育呢？要懂得這個，我們便得先知道平敎會的敎育哲學是什麼。據說平敎會的諸君，從農村敎育的經驗中和平敎工作的進展中，切實發現了中國的病根是由於人民太「愚」太「窮」太「弱」太「私」，這「愚」「窮」「弱」「私」四個字便是中國人民的基本缺點。平敎會的四大敎育便是從這四個字產生出來的，即是：爲了救「愚」才有「文藝敎育」，爲了救「窮」才有「生計敎育」，爲了救「弱」才有「衞生敎育」，爲了救「私」才有「公民敎育」。他們「要使中國人，尤其是最大多數的農民，人人都富有智識力，生產力，强健力與團結力，爲創造新中國的新民。」那末怎樣才能把「四大敎育」實施到民間——尤其是農民身上去呢？他們的回答是「三大方式」。三大方式云者，即「學校式」的實

施「社會式」的實施，「家庭式」的實施之謂也，

「四大教育，」「三大方式，」平教會的全部工作便是在這八個字的身上。不過他們却一再說明，他們並不是把定縣當作實施的區域，即是說，並不是想把四大教育當眞在定縣實施出來，他們不過借這個地方作試驗而已。定縣好比是個研究室，每個農民都是他們的參考書。據說他們正在這個研究室中作研究，希望將來能將研究所得，「一套」「一套」的制度獻給全國以供採用我們在北平的時候聽說定縣的縣政現在是握在平教會的手裏；我總以爲：如果平教會在定縣的工作只是一種實驗，至少縣政府所做的應該是平教會數年研究所得的結果之一實施了。及至今晨翻閱了幾本小册子，才知這個「縣政建設實驗區」及「縣政建設研究院」的工作還仍然是一種實驗和研究。所與平教會不同者，一是私人學術團體，一是省立縣政研究機關；一是「多致力於學術的研討，」以爲研究院「學術上的助力，」一是「多努力於實施的研究與制度行政研究」以給平教會「研究上所必須的政治力或行政的便利」而已。「將來雙方合作，希望對於此基本的，由下而上的，政治與學術，教育與建設合一的縣單位實驗，在內容上與行政上，能夠達到預期的結果。然後推廣全省以及全國，即以定縣爲訓練表證之中心。使農村復興得到具體進行的方案，使國家得到一條基本建設的新路，使中華民族能於建設工作之中，創造一個新的生命。」

我剛把幾本小册子看了個大意，瞿菊農先生即到我們的住處來看我們，說昨晚因爲縣政建設研究

院開會，未得閒空和我們晤談，心中非常抱歉；現在時間已到，約我們立刻到接待室去，聽他們「介紹工作」。我們翻開了油印的程序表看見上面寫着上午九時至十時半是「社會調查」，十時四十分至十二時是「平民文學」。我們於是從書堆中找出一本「定縣的社會調查工作」一本「平民文學工作簡要說明」走到接待室去。室內已經坐着五六個人，有一位矮胖的徐先生，聽說是燕大神學系的主任；還有一位能用英語說出許多化學名詞的中年女士，聽說也是從燕大來此參觀的；此外還有三位傳教士似的先生聽說是上海青年會派來參觀的。我們圍着一張長方的桌子坐下，統計調查處張世文先生便開始向我們「介紹」起工作來。他先向我們講述平教會的社會調查與別的機關的調查之不同處。第一，他說，定縣的社會調查是在一個整個的目的與理想下而進行，這個目的與理想便是農民教育與農村建設。這是別的機關所沒有的。別的機關只是爲研究而調查，卽是所謂「爲調查而調查。」第二，他說，定縣調查不僅收集材料，分析材料，統計材料而已，而且還要根據所得的結果，用各種方法，在實際工作的過程上去解決農民生計的各種問題；不僅解決，而且還要將解決的方法告訴農民，這也是和別的社會調查不同的。第三，他說，定縣調查是整個運動下的一部分，不是一獨立的機關。這又和別的社會調查不同。第四，他說，定縣的工作是以農民爲對象，是以農民整個生活爲對象。故其調查是整個農民生活的調查。這個調查可以產生一整個的哲學，一切問題是要從整個方面去解決的。這一點也和別的調查之把問題分割爲許多部分，然後片面的

去調查的不同。第五，他說，普通調查極易引起農民的誤會，定縣調查因爲是在四大教育，三大方式之掩護下進行，故能得到別的機關所得不到的便利。其次他把平教會歷年的調查工作報告了一下。大意是說，民十六與民十七兩年度平教會是以東亭鄉村社會區爲實驗區域，所以那時調查工作大半注重區內的六十二村。民十八與民十九兩年度該會雖以全縣爲實驗區，但特別注意第一區內的縣城及周圍附近七十一村。因此調查工作亦隨之以全縣爲範圍，而首先注意城內及第一區農村情況。據說那時調查各村，一切問題都分着最富，較富，富，較不富，不富，窮等階級去作比較。從這次調查，他們始發現愚，窮，弱，私之間原來均有相關的關係。即是說，最富的村也是最有教育的村。因爲這個發現，所以四大教育方聯成一氣，變爲「一套」。民二十年度該會分全縣爲三個區域，以南支合，明月店與李親顧爲三區的中心村，又選高頭爲研究村。所以調查工作仍以全縣爲範圍，而特別注意研究村與三個中心村。民二十一年度該會選定縣第一區的東部及第三區的東北部爲集中工作之研究區，包括六十一村，而仍以區內的高頭爲研究村。調查工作亦隨之而集中於此區。二十二年縣政建設研究院成立，平教會有一部分工作讓給該院負責，據說該院現正研究定縣出入口貨物，外國經濟對於中國農村的關係，農村組織，農民犯罪等題目。

張先生把該會歷年的調查工作「介紹」了一下之後，接着便說定縣的社會調查負有兩個重大的責任：一是他們在定縣工作，既有種種特殊的機會，便應該利用這些機會對於農村社會學的學理方面多

作些貢獻；一是把研究所得拿到實際方面去應用。其次，他又把他們調查的經驗告訴我們，大意是說做調查工作，第一要注意的是先作社會調查，然後再作經濟調查；第二要注意的是先作一般調查，然後再作精細調查；第三要注意的是以調查需有團體，這個團體還要以增進人民的幸福爲前提；第四要注意的是調查的人必需與農民共甘苦。

張先生又把掛在演講架上的許多圖表一張一張的翻給我們看，使我們對於北方一個重要縣份的經濟概況得着一個具體的認識。張先生告訴我們說，這些數目字還沒有經過最後的審查，現在還不預備發表，不過我覺得這些數目字都很重要，故擇要抄了些下來，使研究農村問題的人早日得到一點參考資料：

一、定縣各種田產權之農戶——自耕農約占百分之六三；自耕農兼租種約占百分之二四；自耕農兼租出約占百分之五；佃農約占百分之四；雇農及地主均少。

二、全縣各種農家自有田產畝數，及無田產之家庭——不滿二五畝者計四五、一二五家，五畝至四九畝者計一二、一一七家；五〇畝至九九畝者計四、三八七家；一〇〇畝至二九九畝者計一、二一二家；三〇〇畝以上者計一一九家；無田者計四、九〇五家。

三、全縣各種農家種地畝數及不種地之家庭——不滿二五畝者計四五、六四九家；二五畝至四九畝

者計一四、八一五家；五〇畝至九九畝者計四二七七家；一〇〇畝以上者，八五五家；不種地者計二、三七一家。

四、全縣田塊之面積——不滿五畝之小塊用地占百分之六九；五畝至九畝者占百分之二四；一〇畝至一四畝者占百分之四；一五畝至一九畝者占百分之一・四；二〇畝至二四畝者占百分之一；二四畝以上者占百分之・六。這裏有一點很值得我們注意：中國黃河以北，均係廣大的平原，極適宜於大規模的機器耕種，現在因為所有權之故，竟把廣大的農場分割得這樣零碎，也可以說是不合理之至了。

五、全縣主要農作物所占畝數（一九三一年）——穀子約占百分之三〇；小麥約占百分之一七；豆類約占百分之一四；高粱約占百分之七；棉花約占百分之六；山藥約占百分之五；玉蜀黍約占百分之三；花生，蕎麥亦各約占百分之三。

六、全縣主要農產品價值（一九三一年）——穀子值洋三，三〇八，〇〇〇元；小麥二，三五四，〇〇〇元；山藥二，二五〇，〇〇〇元；豆類二，一八〇，〇〇〇元；棉花一，六七四，〇〇〇元；花生五〇九，〇〇〇元；高粱四九七，〇〇〇元；玉蜀黍三七〇，〇〇〇元；蕎麥三五三，〇〇〇元。

七、全縣主要家庭工業品價值（一九三一年）——土布值洋二，三〇七，〇〇〇元；線四五九，〇〇〇元；蓆三六一，〇〇〇元；乾粉條一六一，〇〇〇元；掛面五七，〇〇〇元等等。

八、全縣歷年水井數目之增加——民元約一八，〇〇〇個；民五約增至二四，〇〇〇個；民十約增至三二，〇〇〇個；民十五約增至五五，〇〇〇個；民二十則約增至五九，五〇〇個了。定縣居然有這樣多的水井，對於農作的收穫自然極有補益。不過這恐怕是定縣特有的現象，河北省別的縣份，我想決不會有這樣多的水利設備。

張先生講完了以後，休息十分鐘，接着便是平民文學部趙作雄先生向我們介紹平民文藝的工作。他先把三千四百二十個「通用字」的選擇經過和方法詳細地說明了一下；又把「千字課」中所用的一千三百二十個「基本字」的來源也同樣詳細地說明了一番。他說現有的「千字課」有農民，市民，士兵三種，將來還要再編一種「婦女千字課。」他說初級的課本完全是用基本字編成；高級的課本則以基本字為根據，同時酌量引用通用字。他又說以前所編的課本只注意到「字」而沒有注意到「詞，」其實中國有許多字是不能分開講的，例如「老頭子，」「小孩子，」「國家，」「社會，」「民族，」「積極，」「消極」等詞，拆開來講，意思便不同了。所以將來他們還擬用「詞類連書」法改編一切課本。趙先生又說，平教會因鑒於一般農民讀完了四個月的初級平民學校和四個月的高級平民學校後，因無「讀物」補充，常發生兩種毛病：一種是天資遲鈍的人容易把所學的忘掉；一種是天資聰慧的人容易去看不正當的書籍；為要彌補這個毛病，所以他們又大批的編了些課外「讀物。」

定縣的「秧歌」據說特別發達；內容多是講些「男女之事，」歌詞非常的長，唱起來便是整本的戲，傳係蘇東坡先生長定州時傳下來的。秧歌對於此地的農民有非常大的魔力；此地有「抱着枕頭看秧歌」之語，意卽指秧歌一唱，萬人空巷，婦女們常把枕頭當作小孩抱去看也。現平敎會已把這些秧歌彙成一厚冊，出版問世了。又大鼓書，笑話等，亦係民間文學。據趙先生說他們亦已採集或刪改一部分，以便流行。

趙先生的講演完了，已經是吃午飯的時間了。

午飯後，休息了一回，王君始先生卽來約我們，說時間已經到了。我們翻開油印的程序表，知道今天下午二時至三時半是「藝術敎育。」三時四十分至四時二十分是「戲劇。」我們從書堆中找出一本題名「藝術敎育，」一本題名「農村戲劇與農村敎育」的小冊子，匆匆走到接待室。一切還是和上午一樣，只是長桌兩邊的聽講者多出了四五個人。有人告訴我們，說這四五個人是蘇州青年會和什麼敎堂派到此地「見習」的，他們都是剛下火車。

負責報告的是藝術敎育部鄭褧裳先生。他先向我們說明，藝術敎育只是平敎會所主張的四大敎育之一的文藝敎育之一部分。它和「平民文學」合併起來才構成「文」「藝」敎育的全部。至於「戲劇」又只是藝術敎育之一部分。

鄭先生似乎不甚讚賞曲線美；尤其不滿意明月歌舞團之流的時髦小調，他說那些都是靡靡之音，亡

國之調他覺得目前中國的民族意識已經消沉到萬分，農民太無國家觀念，這些都是因為農民無正當的藝術涵養之故。他們目前的工作便是去到鄉間「認識一般人民欣賞藝術的力量，立定工作的原則，從事研究中國民間的藝術，來與教育相依並進，」以「發揚民族精神，」並「培養文藝興趣。」他們的原則有二：第一是根據科學的方法，搜集民間固有的藝術，「把它有系統的來詳細研究，同時並參照西方的藝術，採長捨短，」供其適合教育的目的。第二是根據民間的習慣和經濟能力，造成一種新的平民藝術。

演講架上掛着一張「藝術教育設計表，」講到這裏，他便指着這個表說起圖畫，音樂，戲劇，無線電，攝影等等和平民教育的關係來。他說，平民教育的對象是幼年失學，缺乏基礎教育和團體訓練的男女青年和成人。這些人，因為年齡較大，腦筋已很複雜，精神不易集中，教授時極感困難。有時教師說得口焦舌爛，他們還是茫然不知所云。現在他們利用圖畫，影片，留聲機等來做幫助，便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他又說，鄉下的農民往往不知農產品的市價，故易為商人所壟斷，現在他們利用無線電，便可於集市的頭一天，把市價廣播出去，使農民有所準備；「一般農民，在經濟上獲益不淺。這種辦法頗為他們所歡迎」說到無線電，鄭先生的精神似乎越發興奮起來，他很滿意的告訴我們，平教會已能自己製造收音機，價錢要比歐美貨便宜百分之八十，全套只需二十元「而其使用效率之高有過之無不及；」所引以為美中不足者只是真空管自己尚不能製造。用無線電廣播農產品的價格，這和「藝術」兩字到底有怎樣一種關係，我雖沒有了解，但

這種辦法對於農民的經濟生活確能給與不少的方便，却是無容置辯的。鄭先生的話很使我發生興趣；當時我很懇切的提出三個問題：第一個是目前定縣全體村莊一共有了多少收音機？第二個是直至現在平教會一共製造了多少收音機？第三個是直至現在平教會一共賣出了多少自製的收音機？其中賣給定縣農民的共有多少？鄭先生對於這三個問題似乎沒有十分重視。他只漠然的回答說：「平教會過去一共借出十三個收音機，目的是在作研究；現在研究已經作好，全已收回、至於說到製造方面、過去我們也很做了幾個，本縣農民也賣了幾個，外縣也有來買的。」

除了收音機外，鄭先生告訴我們，他們還能製造幻燈，留聲機，和風琴等等。據他說，日本製造的幻燈要賣五十元，商務印書館製造的要賣八十元，他們製造的只賣五元。其他如留聲機，風琴等都要比市面上的便宜許多。

我們很想看看平教會自製的收音機，留聲機和幻燈，但因為終日忙於聽講之故，始終沒有找着一個適當的機會，這是我們引為遺憾的。

接着鄭先生之後向我們介紹工作的便是熊佛西先生。他一進門便 Hep-Hep-Hep 的笑着向我們說：「我知道諸位聽得膩了——到了這裏老是聽，老是聽。我沒有幾句話說；至多只有五分鐘。」

我們早就聽說，熊先生是最喜歡談話的一個人。他所謂五分鐘當然也許五十分鐘也不止。不過我們

憑良心說，熊先生的談話便是叫我們聽五個鐘頭也不會膩煩的。他的談話簡直不是談話，而是一種帶有戲劇情調的表演，他畢竟是一位戲劇家。

他一開頭便誠懇的向我們說，他以前是不相信「教育」這玩意兒的！「不過現在我是在平敎會；平敎會是專門相信敎育的；所以我現在只好談敎育！」

他於是談到戲劇在農民敎育上的幾種力量。第一，他也說到「愚，」「窮，」「弱，」「私」四個字，他說那是農民四個向下的意識，戲劇便有喚發農民意識向上的能力；不但能够喚發，而且非常的直接有力。第二，他說到戲劇還有抒發農民情感的能力。農民的苦痛，雖然自己說不出，甚或意識不到，但如果一旦有人給他說了出來，他便會情不自禁的哭，情不自禁的笑；情不自禁的狂哮，情不自禁的咬牙。而這哭，笑，狂哮，咬牙，從心理上說，便是一種自然的流露；從敎育上說，便是一種向上的表現。熊先生似乎特別重視戲劇的這種抒發情感的力量。他講到這裏，就把他公演「屠戶」的經過，用着生動的，有力的聲調，向我們報告了一下。

聽熊先生的口氣，「屠戶」這個劇本當爲他到平敎會以後最得意的傑作，同時也是他最成功的創作。「這個劇本的技術，」據他說，「也不敢自詡爲完美，不過其中的意識確曾抒發一般勞苦民衆的熱烈情感。……可憐一般勞苦的農民……受了天災人禍的折磨還不够，還得受着土豪劣紳層層疊疊的剝削

和壓迫，眞是啞吧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現在我們藉着「屠戶」劇本的編演，把他們的苦處說出萬一，他們怎能不痛快呢？」所以，他告訴我們，當「屠戶」第一次公演，演到第三幕孔屠戶持契約來占王氏弟兄的房屋時，池座的最後排忽然跳起一個青年農夫，向臺上大聲呼罵「揍死孔屠戶他媽的老渾蛋」不止。

熊先生說到這位青年農夫的呼罵時，是握着拳頭，咬着牙，從坐位上跳了起來模仿的。我聽了熊先生這段演劇的經過——尤其是聽到熊先生口中轉達出來的青年農夫的呼罵——幾乎感動得流出眼淚來。不過同時我的心頭却也襲來一個重大的問題：「屠戶這個劇本，無疑的，是一個很成功的劇本。但是它之所以成功是因爲它能說出大多數農民的痛苦和壓迫，能使臺下的農民情不自禁的跳了起來，大聲呼罵「揍死孔屠戶他媽的老渾蛋。」不過這裏有一個事實：便是目前中國的社會畢竟是個階級的社會。這個劇本所喚起的呼聲，無疑的是被壓迫的農民對於壓迫他們的土豪劣紳，高利貸資本之一種反抗的表現。現在我們既然用這劇本喚起了農民的階級意識和鬬爭情緒，我們將要在這劇本中暗示他們走那一條道路呢？換句話說，我們將要拿什麼來滿足他們的情緒呢？」

熊先生還沒有等我把問題說淸楚，便搶着說道：「是的，是的，你這個問題正是使我最痛苦的一個問題。我爲了這個問題，至少把劇本改寫了七八次。我沒有辦法。我很苦！我又不能叫他們暴動！我想來想去沒有辦法，我於是想到『好人政府。』我這個劇本是這樣結束的：王氏兄弟憤火中燒，飼孔某以老拳，將其打

得半死不活，同時曾受孔某剝削壓迫之千餘良善平民，亦乘機至縣政府告發其罪惡，孔屠戶遂爲縣府逮捕而待國法的裁判矣。」

熊先生說到這裏，燕大神學系主任徐先生隨即說道：「熊先生爲什麼不用合作社的辦法來解決這個難題呢！」徐先生這個建議所得的回音是熊先生的 Hep-Hep-Hep 的笑聲。

除了上面兩種力量外，第三，熊先生還講到，戲劇能介紹一般常識給農民；第四，借着演劇還能給農民一種公民訓練，教他們排隊入場，教他們脫帽，教他們不要吐痰，不要咳嗽，不要談笑，不要交頭接耳，一言以蔽之，教他們嚴守秩序；第五，借着演劇還能改進農村的語言。

熊先生的談話一直拉到五點時才告終結，但是我們並沒有感覺疲倦。

晚，王君始先生約我們到民衆食堂晚餐，味頗不惡。

十二日。星期一，風。

晨九時餘，參觀者十餘人結隊赴「保健院，」聽陳志潛先生介紹「保健制度。」陳先生是平教會衛生教育部的主任兼北平協和學院的名譽講師，是一位誠樸幹練的難得的人才。他先把定縣農村的衛生情形約略報告了一下，大體是這樣的：從質的方面說，依據民二十年九千個死者的調查，約有百分之六十七，死前曾經受過舊式方法的治療，百分之四，死前曾經受過新式方法的治療，而沒有經過任何治療便死

了的，約占百分之二十九；從量的方面說，全縣四百七十二村，其中完全沒有醫生（連草藥郎中也算在裏面）的約有二百二十村，約占全體百分之四十七。定縣的衞生事業雖然這樣可憐，但每年人民所化的醫藥費却是很大的：依據一千家的調查，每家每年平均大約要化一元五角；每人約攤三角，全縣人民每年醫藥費的支出，大約要達十二萬元。這筆款項當然不能算小，不過要用這十二萬元，照普通設立醫院的辦法，使農村每個農民都能受到新式醫術的治療，却也是萬萬辦不到的。他們要想在目前農村的經濟情形下達到這個目的，便不能不另想辦法；於是他們想出了「保健制度」。這個制度是這樣的：縣設一保健院，負責：（一）衞生行政，（二）衞生教育，（三）縣立醫院，（四）縣立檢驗室，（五）防制流行病疫，（六）學校衞生表證，（七）護士及助理員之訓練，（八）助產人員之訓練等事宜。區設一保健所，由一普通醫科大學畢業之醫生和一助理員負責，所擔任的事宜計有：（一）監督保健員，（二）衞生教育，（三）預防注射，（四）逐日治療等項。現在定縣共有四個保健所。村設一保健員；這個保健員係自平民學校的畢業同學中選出，保健院給以短期的訓練，所學的事宜計有：（一）報告生亡，（二）水井改良，（三）普及種痘（方法極簡單），（四）救急治療等項。保健員所學的救急治療法有三個標準：第一要便宜，第二要有效力，第三要安全。至其所用的法寶只是一個長僅一尺，寬僅五六寸的「適用藥箱」。箱內計有簡單器具十種，藥品十種。箱子蓋上並貼有簡明的說明書，極確切的註明什麼病症用什麼藥品。陳先生告訴我們，這個「適用藥箱」連裏面的器具藥品

算在一起，只值三元每月費用平均約須七角，藥品均極安全而有效力。可以說是三個原則都顧到了。目前該縣共有五十個保健員。

陳先生把「保健制度」介紹了後，隨即拿出一張預算表指給我們看，說這個制度如果推行全縣，每年所需還不到三萬六千元。這個數目和上述全年定縣人民在舊的情形下支出的醫藥費比較起來，僅及十分之三。陳先生的預算如下：

	每單位	全縣
保健員	一五元	六，七五〇元
保健所	一，二〇〇元	一四，四〇〇元
保健院	一四，四〇〇元	一四，四〇〇元
合計		三五，五五〇元

在保健院草草的參觀了一下，立即趕回平教會聽陳筑山先生介紹「公民教育」及「家庭式教育」的工作。陳先生的演講很長，他劈頭便說中國的農民太自私自利，太不知愛國，「農民只知官和軍隊是代表國家的；教他愛國，他總認為是騙他。不過也很難，譬如你說國家是他們的，你得說到人民應享的權利；說到權利，最低限度也得說到選舉權，但是他們村裏的村長就是地方上有勢力的人指定的，你怎能和他們

談這些呢！」接着陳先生又說到：「過新年時是農民自私自利心表現得最厲害的時候，因爲這時他們還不起債買不起年貨，於是他們就恨起有錢的鄰居來了。」他說平敎會就利用這個機會在高頭村作了一個「化私爲公」的設計。這個設計是這樣的：他們先在村中選出六十多個閨女，爲全村七百餘人做了一千四百餘朵紙花，分紅白兩種，新年的那天，他們把全村的男女老幼都請到一個地方，大家共同過年。到會的人，父母雙存的帶兩朵紅花；父母雙亡的帶兩朵白花；一存一亡的帶一紅一白。他們便這樣的把全村的人分成三組。這時「大家看左邊一組，許多兩鬢斑白的人帶着兩朵紅花，八九十歲的老父母雙雙健在，大家替他們歡喜，不覺拍掌恭賀。正在歡喜的時節，再看右邊一組，許多可憐的三四歲的小孩，帶着兩朵白花，父母都不在了，因此大家對這些不幸的小孩發生無限的同情。我們就在此時給全村的人演講，提倡大家對於這些可憐的小孩要共同負責幫助他們。」這樣一來，據說窮人便不會再恨富人，大家便可「化私爲公」了。

陳先生這個報告引起燕大神學系主任徐先生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他說「陳先生這個辦法，左傾的人不會說你是在緩和階級鬭爭麼？」

「這是沒有辦法叫他們不說的。定縣從前也曾發生過幾次抗債抗捐的事。不過凡是平敎會勢力所到之處，這種口號便無效了；因爲我們會告訴他們，『你今天抗了債，明天就要無處借債了。』」陳先生的

回答說明了一切。

陳先生又拿出許多帶有簡單文字說明的故事畫本分給我們傳閱，說這些都是農民重要的公民教材，我隨便翻了一下看見上面所畫所寫的都是些仁義廉恥忠信孝慈之類的故事。

陳先生還向我們說了許多提倡「國族精神」的話。這些話又引起燕大徐先生一個問題，他說「國族精神不是可以變成狹義的國家主義，更進而變成帝國主義麼？」回答這個問題，陳先生就走到演講架前翻出了一張很大的掛圖，上面一共畫着四個人，身體一個比一個大，就中最渺小的一個寫着「一家之人，」稍大的寫着「一鄉之人，」更大的寫着「一國之人，」最大的寫着「世界之人」等字樣。這個偉大的「世界之人」我想一定是個「你打我的右頰，我連左頰也給你打」的「博愛」主義者。

說到掛圖，還有許多還值得我們介紹的，因為這些都足以具體的說明平教會的理論本質。現在我為節省篇幅計，只提出一張重要的說一說。這圖題名為「强弱的根本原因」圖分上下兩段，上半段畫着一幅直立的太陽旗，有許多穿着和服的男女老少，牽着手，圍着這幅太陽旗站成一個團團轉。下半段畫着一幅斜歪的青天白日旗，旗下一輛大車，兩個拉車的，一個向東，一個向西，死勁的拉，還有兩個粗人正在打架，又有一男一女正在吵嘴。

這幅掛圖使我想到二十年前小學時代的生活，因為那時我們的老師也常常拿這類的比喻說明中

國衰弱的根本原因。

下午李訓石先生介紹「學校式教育」的工作。他說平教會辦了幾年的平民學校，一共只除了三萬文盲。這其間的原因並不是因爲推行的本身有什麼困難，而是因爲地方沒有經費。現在定縣的農民眞是苦得不堪設想，他們一過十月，每天便只吃兩頓白薯。在這種情形之下，叫他們拿什麼來辦教育！其實平民學校所用的款項是有限的，每季每村只須拿出四十元，每人只須拿出四角就足够了，但是他們偏拿不出。現在平教會在定縣共辦有初級男女實驗小學六所，高級男女實驗小校各一所，男女靑年補習學校各一所。

聽完了這個「介紹」我們便又結隊赴農業試驗場，聽他們介紹「生計教育」的工作。報告的是一位說話很快的四川人（？）和一位說話很慢的貴州人（？），報告也很長；把它總括起來，大約可分三方面：第一是農業改良方面，什麼「波支猪，」「來航雞，」「葡萄栽培設計，」等等都屬於這一部分工作，什麼是「波支猪，」我也說不清楚，不過我知道這是一種外國公猪，把它拿來和中國母猪交配便可產出一種雜種改良猪。這種改良猪據說要比北方普通猪多產猪肉三十二斤十兩，不過所可惜的只是猪鬃沒有普通的猪長。什麼是「來航雞，」我也不大淸楚，好像聽說普通中國雞每年平均只產六十個蛋，意大利雞便能產一百八十個蛋，而且很大。不過這種雞十分嬌嫩，抵抗力不强。他們把它和中國雞交配幾代，便產出一

種改良雞，每年也能產八十個蛋。第二是農村經濟方面，自助社，合作社，倉庫，等等都是屬於這一部分工作。定縣現有五個倉庫：中國銀行三個，分設在城裏，淸風店和東亭；金城銀行兩個分設在明月店和李親顧。這五個倉庫都是專做農產物抵押放款的業務。自助社現已成立二百五十五個，社員經平敎會介紹，向倉庫借款，可享八厘五的利率之優待（非社員借款需九釐）自助社經過一年之活動，即可辦合作社。現在定縣據說共有四十二個合作社，大半都是新近成立的，業務種類可分信用及購買兩項。其他如棉花等運銷合作，因去年天津棉價跌落沒有辦成。合作社資本僅千餘元，通常借款均係由平敎會介紹，向銀行透支。第三是農村工藝方面，目前平敎會關於這方面的工作還只有提倡棉毛織品一種。過去他們曾在高頭村試辦過毛棉紡織的小作坊，後因布價跌落，農人都不願學，故即停頓。現該作坊的手工紡織機已遷至農場前的瘟神廟中。我們聽完報告，曾到廟中參觀了一下，內僅新式手搖八十餘錠的紡紗車兩架，織機十餘架，工人數人而已。

晚瞿菊農先生約我們晚餐；暢談至十時始散。從瞿先生的口中，我們得知定縣的人民現在已有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終年不吃食鹽；有的也不過吃些犯法的硝鹽而已。

十三日。星期二，風。

晨九時，汪德亮先生在招待室向我們講述「社會式敎育」的內容。大意是說「社會式敎育」所要

解決的問題計有三個：第一，怎樣組織農民？解決這個問題，他們主張以平校畢業同學爲基礎，從教育方面下手。具體一點說，便是他們要組織平校同學會。據說定縣第一年有此同學會之組織的計有十九村，第二年增加三十三村，第三年增加八十六村，目前一共有一百三十八村已有同學會的組織。第二個問題是：怎樣繼續教育農民？解決這個問題，他們辦了一個「農民週刊」（原名「平校同學會週刊」）刊物上的文字聽說有三分之二是農民自己寫的；還有三分之一是平教會「爲農民寫的。」現在每期出兩張。他們又辦了一個畫報，登載農民的作品。有些農民聽說很能拿圖畫表達他們的意思，有一次就有一個農民畫了一個「官兒」模樣的人，手裏打着一幅大旗，旗上寫的是「天下爲公，」肚子上寫的却是一個「私」字。他們又辦了一種所謂「圖書擔，」由教書的先生挑着，不時地在僻靜的村莊或隴畝間遊行。第三個問題是：怎樣才能發展農民的能力？他們的能力到底能發展到何種地步？這一方面，據說試驗得很成功。例如保健員，例如修橋，例如築路，例如抗日捐款，都有驚人的成績。

汪先生這個報告是我們在定縣「用耳」參觀的最後一次；聽完這個報告，我們便要下鄉「用眼」參觀了。平教會給參觀的人一共僱了兩輛大車，我們三四個人，因不願受顛簸之苦，是騎的騾子。

我們到的第一個村莊是小深河。這裏有一所實驗高級平校，校內設備頗簡陋，書桌坐位都是土磚和木板砌成的，可謂極「平民化」之能事了。室內滿滿的坐着四十多個女生——年齡最大的約三十幾歲，

小的僅十二三歲。我們走進去的時候，正是一位女教師背着身子在黑板上寫「讀物報告」四字。教師掉轉身子向學生說了幾句話後，接着便是一個一個的女生走上講臺，向臺下的人鞠躬，說明自己「年假的時候，看了一本讀物，有一點感想，要向大家報告報告，」於是報告一個不識字之苦的故事。我們一共聽了五六個女生以同一的方式登臺報告了。她們報告得異常熟練，說話的技能亦極高明，顯然是訓練有素。報告一完，又有一位十四五歲的女郎從坐位上站了起來，連連向我們參觀的人鞠躬，說是要請我們登臺訓話，同時全體同學亦鼓掌歡迎，這樣一來，倒把我們弄得踧促不安起來。我們愈踧促，她們愈鼓掌，那位代表亦愈鞠躬。為要打破這個踧促的局面，我們推出一位女士和一位牧師向她們說了幾句話，但我憑良心說，我們的代表的演說遠趕不上這班鄉下的姑娘。

其次我們到了西建陽村，那里有一個保健所，負責的人是一位北平醫大畢業的王先生。他告訴我們，這個保健所要管三十村，二萬七千餘人口。現所屬保健員已達十八人。普通的人到該所看病，掛號費須銅元二枚，保健員介紹只收一枚，平校同學概不收費。該所每週要巡視保健員一次，沒有保健員的村莊，每週還要去作「遊行治療」兩次。除上述工作外，該所還負有檢查小學衞生，組織種痘團，改良水井等責任，又據該所過去的經驗，這一帶人民的普遍疾病以沙眼為特多，這大約是因為地方多風，農民一生都在砂土中討生活之故。

再其次我們到了東建陽村，有該地平教會辦事處吳先生出來招待。吳君是江蘇人，曾在南京高師卒業，人極誠樸，光着腦袋穿着一身破舊的學生服，看去宛如一位鄉下先生。吳先生先帶我們參觀實驗女校，校舍外面的牆壁上有一「壁報」欄，上面寫着七八條新聞，內中還有三四條是國外新聞，書法固極工正，文字亦極老練，我問吳先生這是不是教員寫的。他說不是，這完全是學生聽無線電時記下來的。一班僅僅受着小學教育的鄉下姑娘，居然能從無線電中聽懂了許多與農民生活毫無關係的國家大事以及世界大事，不但聽懂了，而且還能用極老練的文字，像報紙上的專電似的，一一寫了出來，如果吳先生的話可靠的話，這確實是一個奇蹟。除了「壁報」欄外，這個牆壁上還塗着一幅中國地圖，一首地理歌，一個現行政治組織系統表，和一個中國歷代系統表，這些大約是給看「壁報」的人作參考的。

這個女校共有學生一百二十餘人，內成年十二人，青年三十四人，兒童四十二人，幼童三十三人。我們參觀的時候，有二十幾個女生正在上課，我把她們的年齡估量了一下，大的約有四十幾歲，小的僅十一二歲，又有二十幾個兒童由三位十五六歲的姑娘領着，正在操場上圍着唱歌，這三位姑娘聽說就是青年成人部的學生。又有十幾位小姑娘正在一個教室裏互相幫助着上眼藥，旁邊還有一位十二三歲的小姑娘專司點名和記錄。吳先生告訴我們，說這是「缺點糾正」，是每天午間下課後必有的工作。吳先生又帶我們參觀校內所設的兩架新式手搖紡紗機，說這是專給農婦們預備的。這里的農婦終日忙於操作，拿不出

時間上學，現在有了這兩架新式紡紗機（大約要比舊式紡車快五倍）就可減少她們一部分工作時間來讀書。

吳先生還告訴我們，這個學校一到農忙時，即行停止上課，那時學校便變成托兒所，以青年成人班的學生輪值爲保姆。

這個女校確有她的特點，第一，她把成年和幼童教育放在一起，不特可以使有孩子的農婦帶着自己的兒童一同上學，解決了成年婦女讀書的一大困難，而且還可以使成年及青年教育得與幼稚園的幼童教育成爲連鎖的學習與實驗。第二，它把教育混在一起，教即是學，學即是教。第三，它把學校生活與農家生活打成一片，使學校變成農家生活的一大幫助。

我們又到男子小學校去參觀，該校共有學生一百零七人，都是十六歲以下的兒童。學校的組織完全軍隊化，以小隊爲單位，合四小隊爲一中隊，合二中隊爲一大隊。小隊以十人組成，內又舉出五人分理總務，祕書，文化，衛生，司法等工作。大隊長和中隊長均由學生自己擔任，教師完全處在指導的地位。隊員違犯紀律，即採用社會制裁的辦法，由各級隊長負責糾正或懲戒。學生每日都有「秩序訓練，」吳先生告訴我們，「秩序訓練」者即軍事訓練之別名也。我們參觀的時候，正值全體學生在操場上作這「秩序訓練。」兩位中隊長大聲疾呼地在那裏發號施令，一羣小「武夫」居然跟着號令演出許多隊伍的變化來。

十四日。星期三，風。

晨九時，乘轎車兩輛離平教會。途中備受顛簸之苦。下午一時半，行抵李親顧打尖，店小二把我們當作神仙似的招待，飯後我們給他小費兩毛，害得他不止說了十個「謝謝。」

李親顧有金城銀行開設的倉庫一處，飯後曾抽出半個多鐘點前往參觀了一下。這個倉庫是去年十一月一日開幕的，主任爲梁振熙先生；明月店那邊比這裏遲一月開幕，主任也是梁先生。兩處抵押品均以棉麥等及不易霉爛之農產品爲限。借款利率，農村自助社及合作社社員均按月息八厘五計算（棧租保險等費包括在內）非社員則按月息九釐計算，而且還要另負棧租火險等費。抵押品作款按定縣市價七折計算，卽值百元之農產品可借洋七十元。抵押之農產品如因市價低落，不足抵額時，得由倉庫通知物主增加押品或償還款項；否則，倉庫便可將該存品自由拍賣，以資抵償；不足時仍須由物主補償。借款數額，原定五十元起碼，後因農民拿不出這樣多的抵押品，故中途不得不變通辦理，准許農民以合作的方法，聯合數家，共同借款。誰知這個辦法亦走不通，於是只好減低借款額；現起碼數已改定爲二十元了。押款期限原定六個月，不過實際辦理的時候，亦常有伸縮。梁先生告訴我們，金城所辦的兩處倉庫，直至現在止，僅放出款項一萬元，但兩處開銷，每月卽需百五十元。拿目前的情形說，這當然是個賠本的玩藝兒！至於借款不踴躍的原因，據說有三點：（一）倉庫成立是在去年冬季，那時已距收成的時間太遠，農民手中的農產品已不

甚多；(二)農民講究「面子」他們都以抵押物品爲可恥，(三)開辦不久，農民尚不明瞭倉庫是什麼東西！目前李親顧倉庫所押的農產品以小麥爲最多，次爲玉黍，次爲黑豆，次爲穀子，次爲高粱，次爲小米，棉花亦有不少；均用蔴布口袋裝置，分別儲存在各個房間中。

梁先生說，他們還要經營農產品運銷事宜，但目前尚未舉辦耳。

三時餘離李親顧，直至黃昏始抵深澤南營村，華洋義賑會于永滋先生已先我們兩三分鐘站在明德小學的門口了。

二　深澤和蠡縣

華洋義賑會在河北省辦理合作社已有十年多的歷史，現有合作社的縣份已達七十餘。即以訓練社員的一年一度的「合作講習會」來講，今年也是第九次了。「講習會」是在各區分別舉行，各處期限均爲一整星期，由義賑會遴派專員或約請專家輪流前往講授，內容偏重於各種合作知識和技能。于永滋先生這次下鄉便是專爲視察和指導各處講習會而來的，他已走了肥鄉等縣。我們因爲想要看看合作社實際辦理的情形，事前曾在北平和于先生約定在深澤南營村碰頭。現在居然在同一時間內大家一齊到了明德小學校的門前，亦可謂巧矣。

明德小學是南營村唯一的文化機關；今年合作講習會第二十四組即在該校舉行，遠地來此聽講的

社員都在校內寄宿；我們也就寄住於此。

聽講的社員們有所謂「大飯團」之組織，想是他們用「合作」的方法處理伙食問題的。我們因為想和農民多找些談話的機會，也想加入這個「大飯團」，但是該校的校長和幾位教員（他們都是合作社的領袖人物）一定不肯，說要叫校內的「小廚房」弄一點「好吃的」給我們吃。我們擦完了臉上的灰土，閒談了一回，這「好吃的」已經擺到一張長方的桌子上來了。主人把我們安排到桌子的兩邊坐下，我發現這「好吃的」原是滿桌「黑」饅頭（土製麵粉做的，）一鉢白菜湯，這饅頭的「個兒」起碼有我的拳頭大，一到嘴裏，就聞見一股漂白粉似的味兒。白菜湯是白水煮成的，但上面却浮着厚厚的一層老黃色的生油。我看見同來的朋友中有一兩位慢吞吞地吞嚥的嚴重姿態，我幾乎笑了出來。我雖一骨落吃了兩個饅頭，一碗白菜湯；但事後總覺得嗓子裏有一種異樣的感覺——說癢又不是癢，說痲又不是痲，說渴又不是渴。但這却是此間最高文化機關的最高負責人特別叫「小廚房」弄出來宴請客人的。「大飯團」的朋友們怎樣吃法呢？這在我們是不容易想像的吧。連組織合作社的可能都沒有的廣大的貧農又是怎樣吃法呢？這又是我們所不敢想像的了。

前幾天在定縣，曾經聽瞿菊農先生一段妙論，他說：「北方農民真安分得可怕他們吃不起麵食就吃白薯；一天吃不起三頓就吃兩頓，吃不起兩頓就吃一頓，連一頓都沒有了，就索性緊緊褲腰帶不吃了。他們

買不起食鹽就括硝鹽，政府不許他們括硝鹽了，就連鹽也索性不吃。這種情形，在別的民族，早就應當發生革命了。」

全國經濟破產的巨浪確已把成千成萬的農民打入「活不下去」的深淵。但他們活不下去，却還要安分守己地去活，這確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個事實。

晚間全體出席講習會的社員一百四五十人開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歡迎于永滋先生和我們。會中所用的瓜子花生和水菓都是于先生從北平帶來送他們的。在歡迎會中，我和他們零零碎碎地談到許多問題。同時我也得了許多實際的知識。我知道這兒普通借款的利息都在四五分，這四五分還須在借款中先扣了去。這裏的長工，前幾年全年可得工價五十餘元，現在二十元一年都不容易找着僱主。這裏的地價，從前百元一畝的現在跌到二三十元，有時連二三十元都無人肯受。這裏的租佃制度還有一種叫做「客家」辦法的；「客家」當然是外鄉人，他們之中較有勢力的常邀集一班赤手空拳的「客家，」臨時向本地各地主兜攬租地耕種。時間多以一年爲期。所用農具，有的是地主供給，有的是他們自備；作物則按照預定的比例，和各地主瓜分。在這制度下，負責兜攬的包工頭當然可以盡量剝削雇農，但有時收成不好，或價物太賤，他們也會虧本的。

我和他們談了個半鐘點，不止聽了他們說到十次「農村破產；」有的甚至說是現在的農村已經到

了「無產可破，」或是「要破也破不了」的地步。我問他們怎樣叫做「破產，」怎樣叫做「無產可破，」怎樣叫做「要破也破不了？」他們的回答很對。他們說：譬如我借了你的錢，因爲還不起，我把產業變賣了來還你，我的「產」業便「破」了，這就叫做「破產。」等到我窮得什麽都沒有了，這便是「無產可破。」有的人雖然還有幾畝旱地，或幾間破房，但却找不着受主，這便叫做「要破也破不了。」

深澤縣是西河棉花的重要產地。從他們口中，我們知道這裏每畝土地，如種西河短絨棉，普通連子可得一百斤（這裏的習慣每二十一兩作一斤）最多時可得百四十斤；如種美種長絨棉，普通連子可得百五十斤，最多時可得二百斤。去年因爲年成不好，棉子歉收，短絨棉每畝僅得二三十斤，長絨棉亦僅六七十斤。去年此間合作社的社員，閞共試種長絨棉百餘畝，今年聽說不打算再種了。據于永滋先生的意思，年內美棉跌價傾銷，不管長絨棉的產量怎樣的多，種了出來，也决不能獲利的。但西河棉，因短而富有彈性，可摻入羊毛中，製造各種氈製品，故尙能運銷英美。西河棉既有這種特有的工業用途，自比長絨棉差勝一籌。爲了貪圖多得產量，把有特種銷路的作物產地改種了定遭外貨之打擊的品種，當然是一失策。不過這裏有一個事實却很値得我們注意的：長絨棉是我國紡織業所需的原料，短絨棉却是英美氈織業所需的原料，現在我國的棉農却只有專爲英美廠家種植原料才能勉强存在；這種矛盾的現象，除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外，還有什麽地方可以找得出來呢！

十五日。星期四，晴。

講習會的上課時間九時開始。我們爲要多知道一些合作社的消息，屆時也加入旁聽。

今天的講習會，差不多是于永滋先生一個人的獨脚戲。他第一次登臺是報告今年義賑會辦理此間合作社運銷棉花的經過。

義賑會辦理事宜向取穩健態度。他們雖在河北省辦了十年多的合作社，但其業務一向只限於容易收效的信用合作。直至前年年底，他們才破題兒第一遭，以基礎穩固的深澤合作社作試驗，辦了一次小規模的棉花運銷合作。那次，聞只運銷棉花一百零四包。今年的棉花販運亦仍以深澤爲試驗，不過規模較上次稍大而已。今年第一批共運二百零五包，均係西河短絨棉。第二批運二十三包，而十八包爲西河棉，餘五包是美種長絨棉。這兩批棉花運到天津時，天津的行市每包僅售四十元；他們覺得行市太低，遂把它暫時送到中國銀行抵押了九千塊錢，以候善價而沽。其實今年的棉花壓根兒就賣不起價；只有舊曆新年的時候，曾一度漲到四十四元。不過這次的上漲，也是完全由於美金貶價，中美貨幣在匯兌率上一時顯出差異；棉花的價格本身根本上並沒有變動，所以事過三日，又回跌到四十元左右了。在這瞬息即逝的三日中，恰巧天津的負責人一時他去，竟把機會錯過。後以每包四十二元五角的價格賣給英人。現在的價格僅僅四十一元。

這次義賑會幫助合作社運銷棉花，有好幾點是值得提出談談的。

第一，深澤的棉花向來是由花行收買，運銷天津；價格多爲花行所操縱。一般農民，因漫無組織，且急求貨物脫手，只有任其壟斷。不過花行把棉花運到天津，却又要受外商的操縱了。近年世界經濟恐慌之結果，各棉產國之棉花大量過剩，價格步步跌；花行的老板們儘管是剝削農民的能手，但一到世界市場便又顯得一無所知；在此情形之下，虧本破產當然是常有的事。花行虧了本，第二年回到內地市場，自然只有加倍地剝削農民，才能撈回上年的虧損。於是農民所受的損失便愈加重。現在義賑會幫助此間合作社把社員的棉花直接運到天津出售，自然可以使合作社的關係社員得免這一層花行的剝削，而且棉花還未起運，便由義賑會負責借了一萬塊錢，接濟運銷的農民；棉花運到天津，又由該會負責把它送到銀行抵押了巨額的款項，償還以前借款，使運銷的棉花得以靜觀市面，待價而沽，這些也能給與農民不少的利益。此外，天津方面還有好幾位專家替這次運銷觀察行情的變化，決定交易的政策，更不是盲目的花行所能望其項背了。

第二，花行運銷棉花，在本地出口時有所謂雜捐；運到天津，賣給外商多由中國棧房過秤，此時又有所謂秤手費。此外，天津商品檢驗局檢驗，普通須躭擱時間五六天，有時甚至躭擱十多天；棉花售給外商照例又須經過中國棧房之手，這一經手之間，款項照例被棧房押用一二星期，遲遲不發，有時花行等待不及，只

有在極不利的條件下，向棧房請求墊款。凡此種種苛細的費用和時間的損失直接雖由花行負擔，但歸根到底，終究是要轉嫁到農民身上的。這次運銷，因有義賑會這塊招牌放在前面，同時又係與英商直接商洽，這一切的苛細費用和時間上的損失可以說是完全免掉了。

第三，這次運銷的棉花在重量上也漲出不少。例如第一批棉花二百零五包，連皮原重二八，〇八七斤；這次過秤却漲出六八三斤，計重二八，七七〇斤。又包皮原作五斤一個計算，這次過秤時，却作四斤一個計算，故又漲出二〇五斤；合計第一批棉花漲出八八八斤。第二批棉花也漲出不少。這大約是由於以前農民把棉花賣給花行時，一向要加秤稱出，始够分量之結果。

這次義賑會在深澤所作的運銷棉花的試驗，從其免除花行的操縱與剝削，規避棧房的留難與敲詐，以及補救運銷者對於市場的盲目與無知，這一類的意義上說，確已指示着前途的勝利與成功。從這一次試驗的結果，義賑會方面業已決定來年在西河棉產區一帶從事大規模的棉花運銷合作。這在義賑會的合作事業中確是一件劃時代的舉動。不過同時我們也要注意一點，即一切運銷合作，從其最理想的發展形態來說，也只有在其免除中間層的操縱與剝削這一類的作用上，是有重大意義的。如果說它能够解決中國農產品的銷路問題，那就未免把它的效能看得過大了。這正和信用合作儘管有減少農村高利貸剝削的作用，但一定說它能够復興農村，解決農民的根本問題，畢竟是一句笑話，情形是相同的。

于先生第二次登臺是解釋並批評最近南京正式公佈的合作法。

他第三次登臺是報告各地合作社概況及其趨勢。第一，他說，從前各地合作社的社員多任理事擺佈，對於社務一向不聞不問，近來社員的知識已漸提高，對於社員大會已知應用。這一點單從近來各地社員紛紛致函總會請求改組一事就足以證之。有些地方的社員雖然稍欠勇氣，還不敢提倡改組，但向總會告發理事的事件却是習見習聞的。例如過去某縣某村有一合作社，子爲理事主席，父爲司庫；後社員全體蓋章告發，與該父子分離，另組新社，結果原社只剩父子二人。這些地方都足以表現社員的權威。

第二，他說，各地社員以前對於各項章程及「合作訊」所登各項文字向來不發生問題；現已漸覺興趣，常能提出問題，或改正數字。

第三，他說，各地合作社有一種很有趣的現象，卽年代越久，弊病越多；資格越嫩，成績越好。例如淶水縣的合作社，十三年時卽已承認；但該縣各社便只知借款關係，不知其他。職員壟斷借款，虛掛或假造社員姓名等類弊端，業已數見不鮮。不過這些都是老社，五年以內新成立的合作社便沒有這些毛病。我們試以肥鄉縣爲例。肥鄉辦理合作社不過五年的歷史，但其成績之佳是爲各縣之冠。肥鄉是一個窮縣，但那裏的合作社偏偏自己建築了一所房屋；說到社員的儲金也以該縣爲最多。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爲理事們熱心負責，他們每於秋收的時候，背着口袋挨門挨戶地向各社員索儲作物；平時各社之間又常開觀摩會，互

相作成績之競賽的緣故。

第四，他說從各地向合作社辦理的成績方面看，雖以肥鄉爲第一，但從基礎穩固與發展平等這兩點來看，却又要首推深澤縣了。深澤今年二月二十四日，業已成立縣聯合會；這個縣聯合會的成立，在中國合作事業中，還算是第一次縣聯合會的業務將來大約有下列四項：一、對會員社存款放款並代理收付款項；二、於必要時聯合各會員兼營運銷供給利用及農業倉庫業務；三、保證會員之債務；四、傳播合作知識協助新社組織並指導監督各會員之會務社務。現河北省聞已有十餘縣可以組織縣聯合會，將來此項組織如能發展，目前區聯合會便無業務可做，故將來區的組織是要取消的。

第五，他說，河北省的合作社發展最快的地方，要算平鄉縣；該縣因有縣長竭誠提倡之故，在一年之中竟成立了八十餘社；不過這些社大多數連辦事手續都不明瞭，遑論其他。所以平鄉雖有合作的形式，但無合作的靈魂、

除了于先生外，我和同來的巫君也被他們拉上講臺，談了些話。我的談話的題目是：「咱們的子兒上那兒去了，是怎麼跑走的？」

下午華北工業改進社盧廣綿先生及南開經濟學院楊先生也從山西趕來。據說，最近金城銀行，南開經濟學院及定縣平敎會三個機關，擬合作起來，在河北省舉大規模的棉花運銷。他們此來便是想利用各

地合作社為基礎，作初步之宣傳與交涉的。不過這裏有兩個問題却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一、合作社最後目的是要使農民能以合作的方法，自己處理自己一切經濟問題。文化，慈善，金融，或政府機關只應處在幫助的地位。現在河北省的合作社經過十餘年的苦鬥，業已能從信用合作踏入運銷合作之一階段，上述這些機關更應保持在旁贊助的態度，使其能够逐漸達到自立自治的地步，現在忽然來了一個以銀行為背景的新的組織，欲利用這個已能自行發展的合作社之基礎，直接從事越俎代庖的運銷事宜；這在合作社自身業務之發展上是否必要，是否有害，却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二、深澤合作社兩次運銷棉花的試驗，均係由義賑會指導辦理，現在這一金融機關，學術機關和農村建設實驗機關三位一體的辦理棉花運銷的新的組織中却偏偏缺少了一個義賑會，這在我們也是不能了解的。

晚間評定會，評定各地合作社成績的優劣；參加的人固然一個個精神煥發，如臨陣地，評定的人也莫不認眞從事，毫不敷衍。我從夢中睡了一覺醒來，還聽見他們在爭論着評定的結果呢！

三月十六日。星期五，晴。

晨起，我們和于永滋先生坐着三輛轎車離開了南營村，一直奔向蠡縣去。沿途時見有三三兩兩的農民蹲在地上「括地皮」。趕車的告訴我們，說這些都是括硝鹽的，緝私隊見了會開鎗的呢！

我們在轎車上顚簸到黃昏才進了蠡縣城。這裏的合作講習會是在福音堂開會，我們也就寄住於此。

三月十七日。星期六，晴。

此間合作社講習會開會的情形和內容，大致和深澤相同，沒有詳細記載的必要，不過這裏的合作社聽說去年因爲請求義賑會幫助他們運銷棉花，沒有得到允許，曾經自動聯合起來，羣策羣力，辦了一次運銷的事宜，這倒是值得在此提及的。

講習會的聽講人員中有一位是博野縣四存中學的學生。四存中學的董事長便是從前曾經做過平津衞戍司令兼北平市長的張蔭梧先生，該校經他一番整理，聽說辦得頗有精神。我因爲想多知道一點實際的情形，特別把這位學生找了出來，暢談了個半鐘頭。據說張蔭梧先生自從下野後，即擬置身農民教育，不欲再問政治；他在他的故鄉——博野縣住了不久，便感覺得目前中國的鄉村教育有兩個很大的缺點；一是學生在學校所學的都不是社會所需要的，一是鄉間的子弟一進學校便離開了鄉村生活，超出鄉村生活程度太遠。爲要糾正這兩種缺點，便製定了「民國二十年新教育方案」這個方案的原則有二：第一，在消極方面主張「寓教育於生活中」，即學生生活必須勞動化，平民化，以期適合目前的環境；第二，在積極方面主張思想科學化，行動紀律化，以期改進社會。從這兩個原則出發，於是便產生了「三八制」「三八制」者，即一日之中，睡眠八小時，「堂內教育」八小時，「堂外教育」八小時之謂也。所謂「堂外教育」範圍是很大的。學校辦有農林場，園圃，炊事委員會，自衞團，國術團，合作社，平民學校，農民問事處，醫院……

等等，以供學生參加活動，所以一到「堂外教育」的時間，他們便要推車，抬土，種地，算賬，醫病，洒掃，弄飯，做菜……五花八門，忙個不了。校內沒有聽差，一切的事情都是自己動手。伙食極其簡單。這位學生驕傲地告訴我，他們每人每月只攤一塊多錢呢！至於教員方面，小學部的，因爲都是本校初中的畢業生，所以伙食完全和學生一樣；中學部的伙食較好。他笑着說，「張校董告訴我們，中學的教員都是過慣了都市的奢侈生活，一時改不過來，只好讓他們吃好一點。」我說，「張校董自己怎麼吃法呢？」「他當然和中學教員一塊兒吃。」

他又告訴我說，「張校董」正在實行「五月計畫。」

「五月計畫！」這倒把我弄得莫明其妙了。但是他說：

「是的！張校董把博野縣的大部分劃入了「自治試驗區，」限定五個月內完成戶口調查和淸鄉，並禁絕白面。現在全縣賣白面的已經趕得乾乾淨淨了。以後還剩下一個縣黨部的委員私販白面，現在也被抓去了；昨天省黨部還派了兩個人到我們那裏交涉呢！」

「張校董只是你們學校的校董，怎麼有這樣大的權力呢？」我更莫明其妙了。

「是的！不過我們那裏有警衛隊；這警衛隊便是從前的巡警和保衛團改編的。改編以後，各警衛盡量改用高小或初中畢業的青年充任，薪水也自每月四元加到八元。而且還有若干是張校董在北平做衛戍

司令時的舊部，警衛隊的隊長也是他的部下。所以事情是很好辦的。況且張校董也是很有地位的人。」

聽了這段話，我又增長了一點知識。張蔭梧先生出身於舊式軍人和官僚，現在居然能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回到故鄉從事鄉村實際改造工作；這工作的本身雖然並無遠大的前途，但其精神畢竟是值得敬佩的。不過我們從博野自治試驗區的五月計畫的本身來說，這種成績，除了張先生外，還有什麼人能够做得出來呢？博野自治試驗區的辦法，我們即使退讓一萬步，說它是有前途的，但中國一千九百三十九個縣份中，如果找不出第二個張蔭梧，這種事業仍然不能跑出博野以外的。

最後這位學生又對我說：他們學校每月還開一次「農村聯歡會，」在空地上搭臺講演，並表演各種游藝，每次到會的農民總在千數以上。明天就是聯歡會開會的日子；他請我們也去參加，並到他們學校參觀。他說于永滋先生是打算去的。我和三位同來的朋友商量了一下，大家都覺得這個地方是值得去看看的，但因爲我們在平的工作都很忙碌，在外的日子太久了，怕不合適，所以沒有接受這位青年學生的盛意。

晚，合作講習會的二十幾個重要會員替我們開了一個茶話會，說我們來去匆匆，時間過於倉卒，這個會算是歡迎我們，也是歡送我們。他們還發表了許多議論，並說了許多農村經濟的實況。我被迫得不得已，也站了起來，向他們說了二十多分鐘的話。

三　高陽

三月十八日，星期日，晴。

晨起，僱了兩輛轎車直赴高陽。于永滋先生因要參加博野的「農村聯歡會，」沒有同行。

高陽以土布著名；它和山東的濰縣都是華北最有名的土布中心區。高陽的土布業，民國初年才開始發展，至民十八而登峯造極。自是以後，卽日趨衰落，到了目前只是苟延殘喘，勉强掙命而已。依據南開經濟學院的調查，民十八時，全高陽土布區共有平面機三萬架左右，提花機三千八百架左右，合計織機三萬三千八百架左右，是年洋紗輸入達八萬餘包，人造絲輸入達二萬餘箱。到了去年，平面機只有一萬二千架左右，提花機六百架左右，合計僅織機一萬二千六百架左右而已。至於原料方面，前年洋紗輸入便只二萬二千包，人造絲輸入還不及三千箱（而且大部還是上年的輸入。）衰落的情形，可見一斑。

高陽土布的生產關係完全是一種商人資本的剝削關係，這裏的織機大都分散於各地農家之手，所需原料均向高陽城裏的大布線莊和染線工廠領取；布織好了，又送到這些布線莊和染線工廠抵賬領紗，並得一點微薄的工資。布線莊和染線工廠得了這些布疋，再加以漂染和整理，便可運銷各地。農家替各布線莊和染線工廠織布，俗稱「織定機。」此地平面機一萬二千架中，這種「織定機」的竟占百分之九十四，其性質可想而知了。

高陽土布業的黃金時代確已過去了。雖然，百足之蟲，死而不殭，昔日的繁榮，當然還是可以看得出的。

我們轎車走到離城不遠的地方，便可以看到這種盛景。沿途二十餘里，隨時隨地，我們所看見的都是大包小包的洋紗在驅使着成羣的農民絡繹於道，大車上拉的是洋紗，獨輪車上推的是洋紗，自行車上帶的是洋紗，牲口背的是洋紗，農民身上挑的，肩的也是洋紗。這些洋紗，我想都是他們從布線莊和染線工廠領來「織定機」的。

晚在高陽城外一家小店住下。我們包了整個一座上房，每日房金只四毛錢，可稱「公道」矣。房門以外便是牲口的休息地。驢糞和馬尿，隨地都是。房內當然也是一股糞臭。這味兒現在想起來，都還覺得「惡心」呢！

三月十九日。星期日，晴。

晨起，赴商會，詢問高陽土布業一般情形，並請介紹赴各廠號實地參觀。蒙該會交際員韓玉亭先生出見，並派一工友做我們參觀的嚮導。我們因爲時間不多，不能普遍參觀，所以只挑選幾家可作代表的廠號看了一下，現在依照性質分別敘述如下。

(一)布線莊——主要的業務，大都不外把外埠購來的洋紗放給四鄉的織戶；織成布疋後，再把它們送到自己開設或別人開設的漂染整理廠加工整理；然後再經過「外埠莊口」運銷各地。高陽的布線莊大小共有六十家左右。內中要算蚨豐，慶豐義，合記，匯昌四家的規模爲最大。我們參觀的便是蚨豐布莊。蚨

豐在天津，石莊，青島，上海等處均有莊口；現青島莊口已撤；其他各處的生意也遠不如往昔。高陽的土布業之衰落，其主要原因，當然是由於外貨——尤其日貨——的傾銷，及人民購買力的低減但稅捐奇重，運費昂貴，也是重要的原因。高陽的土布大體言之，計分兩種：一是棉織品，約占產額百分之八十，多銷陝甘晉豫等省，一是人造絲織品，產額不多，多銷川鄂等省。棉布運銷西北，主要的路線有二，一由隴海出潼關；一由平綏出塞北關，據蚨豐的老闆說，布疋經過潼關，每疋須繳正稅四角五分，附加三成；從前塞北關聽說每疋竟徵收一元；現該莊因這條路線稅捐太重，庫倫方面，又受中俄絕交之影響，不能繼續去貨，業已放棄不做；故目前情形如何，不得而知。至於運費一層，計自高陽至保定，每疋需費三四分，高陽至天津，每疋需費一角；又自保定至鄭州每百斤四元，至潼關六元五角，至漢口七元，至山西一元餘。高陽的紗價，計十六支的每包一七〇元，二十支的每包一八八元，三十二支的每包二二〇元，四十二支的每包一八〇元。棉布的尺碼，普通均爲寬二尺六寸，長四十碼，重八斤以上。每疋成本約六七元內紗價五元，工資六角至七角，整理費六角至二元五角。陰丹士林布，整理費較貴，每疋約需洋七元。

(二)顏料店和染坊——這裏的顏料店多附設染坊，其主要業務，係在本地購買洋紗，染成各種顏色，發給四鄉織戶，織造各種格子布和仿呢。這種店舖的規模常較布線莊爲小，外埠亦無「莊口」；但其剝削織戶的方式却和布線莊沒有二樣的。這種顏料店，城裏僅有六家，我們參觀的那家名叫義豐。該店所購顏

料多係德美出產顏色以朱紅為特多。民國十三四年間該店每年可做六十餘萬元的買賣，現在每年只做三四十萬元。

（三）漂染整理廠——這種工廠專門從事各種布疋的最後一步的整理事宜，規模宏大，多用機器工作。我們一共參觀了兩廠，一為恩記工廠，一為合記工廠。恩記計有染槽一，乾燥機二（價值四千元）扯寬機一（價值八千元）軋光機四，四十五匹馬力的動力機一，工人百餘，日夜工作。該廠每年染布十餘萬疋，內客貨約占五萬餘疋。合記計有扯寬機一，軋光機八，每年染布三萬餘疋，內客貨約占二萬餘疋。染布的手續，聽說以陰丹士林布最為麻煩，計煮八次，染七次，始能完成；普通布疋只須一染足矣。

（四）織布廠——這種工廠最盛時約有十餘家，現僅存三家，我們參觀了兩家，一為德隆工廠，一為同和工廠。德隆計有提花木織機四十餘架，每架價值四五十元，日可織蔴絲布三十尺；不過目前開工的織機僅二十架。其餘二十餘架，每架十元出售，都無買主。老闆告訴我們：「這個年頭不對了，幹什麼都不行的。等到手邊一點蔴紗織完了，就不再織了。」

同和算是高陽最大的一家織布廠，廠內分織染兩部。織部計有提花木織機六十餘架，織毯機十六架，砸花機兩架，這些都是手工機器；此外又有電力絡經機三架，整理機兩架，緯線機一架，電力提花鐵木機一架（天津信昌機器廠製，每架百八十元）電力條紋鐵木機二架（每架百十元，）發動係用柴油機，山東濰

縣華豐機器廠的出品，計有十五匹馬力，價值一千五百元，係去年四月間新置者。織廠共有工人二百餘人，惟正式工人只八十人，餘均係學徒。我們的嚮導告訴我們，這位老闆是很聰明的，他會僱用大批不化錢的工人來做工作，所以別人家的工廠儘管虧本，他還可以添置機器。該廠的染部完全係人工工作，內雖有軋光機及新式染槽，但均設而不用，我問一位工人這是什麼道理，他說這很簡單，就是因爲這裏的人工太賤，用機器反不如用人力合算。機器的意義原是在其能代替人工，減低成本，現在我們中國，倒是人工代替機器，以減低成本。這種現象，倒底怎樣解釋呢！

高陽爲什麼成爲華北土布業的中心區呢？換句話說，即是黃河以北廣大數省中，爲什麼高陽一縣的土布業偏偏特別發達呢？這也是我們各處訪問和參觀時所最感覺興趣的一個問題。南開經濟學院吳知先生曾舉出三個理由來解答這個問題。第一，他說是由於「勞力的過剩，高陽地瘠人稠……加以水利不修，河水常有泛濫之患，所以鄉間的勞力發生過剩，並需要別的工作來補助收入的不足。」第二，他說，是由於「織布原料和機器的供給便利，高陽離天津水程旱程都不過三百里光景，水程經大清河用民船運輸，旱程則用大車，約三四天可到。因此高陽從天津方面輸入棉紗和織布機械是很方便的……棉紗織成布疋之後，近的地方可用大車運輸，遠的地方可以先裝保定再由平漢路運輸，所以出品的運銷也很方便。」第三，他說，是由於「市場的需要，遜清末年和民國初年，河北本省和山西河南等省，都需要棉布，那時外貨

雖有進口，供給還嫌不够。高陽在這種情形之下，布疋可以暢銷……到歐戰期間，外貨進口更少，高陽布業，因此更得到了一個發達的機會。」（見經濟週刊第四十八期）這三個理由我覺得還不能充分說明高陽土布業所以特別發達的原因。因爲第一，農村「勞力的過剩」差不多是帝國主義的商品重礮轟破了中國農村經濟的機構，破壞了農村副業以後全國各地普遍的現象，並非高陽一地爲然！目前各帝國主義者，由於長期恐慌之結果，對於半殖民地的中國，侵略益形瘋狂，農村破產與農民失業，更已成爲普遍的事實。如果「鄉間的勞力發生過剩，並需要別的工作來補助收入的不足，」這一事實是高陽成爲華北土布區的主要原因，則在目前全國各地的農村愈趨破產，成千萬的農民莫不需要工作來「維持生命」（比「補助收入的不足」當然更要迫切萬分）的條件下，全國的鄉村工業豈非更應萬苞齊放，爭艷比美乎？然而事實告訴我們，目前不但全國各地的舊有農家副業更形破產，就連高陽的新興土布業亦已奄奄一息。這個事實又將怎樣解釋呢？至於吳先生以「地瘠人稠，」「水利不修，」「河水泛濫」來作爲高陽「鄉間的勞力發生過剩」的原因，當然更是不顧事實本質的說法了。第二個理由倒是比較合理一點，不過天津左近，水陸交通方便的地方也不止高陽一地，所以這一點說是一個有利的條件當然是很對的，說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似乎還嫌不够。吳先生所舉的第三個原因——即市場的需要——也是寬幅洋布打倒了窄幅土布後各地所共有的普遍現象，決非高陽獨有的條件，所以把它當作重要的原因也是不够的。

我們因爲這個重要有趣的問題在目前還沒有適當的解答，所以在每次談話中，都要把它提出詢問；不過不幸得很，我們所得的結果也是很難令人滿意的。我現在姑且根據我們在這六小時內詢問的結果和觀察所得，提出一點未成熟的意見來說明「高陽爲什麼偏偏成爲華北土布中心區」這一問題。

我們要從造成「高陽偏偏成爲土布中心區」的諸條件說起。我把這些條件分成兩方面：

(一)一般的條件

(1)高陽的土布到了民國初年才逐漸發展起來，這時中國農村原有的窄面土布已遭寬面洋布之嚴重打擊而不能立足，但同時洋布的輸入數量且還不能趕上全國農村的鉅額需要，於是寬面土布遂有應運而生之可能，加以不久歐戰爆發，洋貨輸入斷絕，更給了寬面土布一個發榮滋長的機會。高陽，濰縣……等地土布業都是發展於民國初年而興盛於歐戰期間及戰後數年間，便是這個道理。

(2)在這同一的期間中，中國境內的紗廠，雖如雨後春筍，相繼林立，但大規模生產的新式布廠尚寥寥無幾；這一條件亦易使若干接近產紗城市的地方成爲大量產布的中心區域之可能。

(3)中國新式布廠之所以不能發展，其主要原因當然是由於(A)資本不足，(B)機器設備及工廠開銷易使成本昂貴，不能與外貨競爭，(C)技術及管理不及外洋……等等。但高陽及濰縣的商人資本的土布生產辦法——即布線莊向各農戶發放棉紗「織定機貨」的辦法恰恰能夠補救上述各項缺點。因爲

這種辦法，不但不須購置織機，設立工廠，管理工人，而且可以使低廉的勞動（當然較中國城市的勞動尙要低廉）在一極無保護，極無抵抗的狀態下，供商人資本之任意剝削。民初以還，中國的土布業尙能在洋布的競爭下有了一段繁榮歷史，其主要原因，除了歐戰這一關係外，便是由於這種商人資本的剝削方法、中國土布業是以剝削農民的强度來和機器生產的速度競賽的。

（二）特殊的條件

一、高陽及其附近各縣——如保定，定縣……本有窄面土布，出產頗多。

二、民初，王法勤等革新分子曾在高陽縣立小學校提倡寬面土布，發生影響極大。

三、高陽離天津頗近，交通甚方便，故織機之購置及棉紗之供給頗爲便利。

四、從高陽到平漢鐵路，交通更爲便利；故織成布疋亦可源源運銷河南，山西，陝西，甘肅等大土布消費區。

高陽之所以成爲華北的重要土布產區，以我們目前的材料來下判斷，只能說，便是上面各項條件所決定的。

最後，我們還在高陽統稅查驗所抄了一些關於此間輸入棉紗之數量及種類的材料。

從這些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出數點如下：

(一)去年高陽用紗，全年僅達二萬一千七百餘包，就中日紗竟占百分之四十五左右。今年一，二，三月共用紗四千三百包，就中日紗竟占百分之六十二以上。

(二)紗的支數，以三十二支者爲最多，二十支者次之，十六支四十二支者均極少。

(三)十六支的幾全爲華紗；四十二支全爲日紗。

我們把高陽的土布業大體看了一下，卽於下午四時乘長途汽車赴保定，下榻保陽旅館。

三月二十日。星期二，晴。

早晨赴河北省立農學院參觀。下午十二時餘卽乘平漢車返平。車到前門車站，已是晚間九點多鐘。

一九三四，三，三十一日。

二十一 北平鴨業調查

張景觀
劉秉仁

一 導言

是篇之作，爲筆者自去年九月迄今年三月在四郊及城內訪問的結果。調查目的在明瞭育鴨在平郊農村副業裏所佔之位置，及其推廣與改進之可能性，調查範圍，以農家飼養家鴨之技術工作及鴨場之經營方法爲主，並旁及鴨業組織及販運情形。皮蛋製造爲北平僅有之鴨蛋保藏工業，故亦調查及之。調查地點以西郊溪流縱橫，鴨戶衆多，故訪問鴨戶以海淀青龍橋一帶爲中心，東北郊一帶，則就護城河沿岸抽查數處。

調查方法，採用平易之談話方式，力避表格紀錄等機械行動。除城市商家在調查時須稍費脣舌，時加解釋，以免誤會外，在訪問郊外鴨戶時，詢者既用請敎態度，答者亦多竭誠相告也。

筆者以學課關係，每星期只能作調查一次，故調查起迄，雖亙數月之久，仍難免掛一漏萬之譏，惟是篇之作，無非爲設計復興平郊農村者有所參考，精密研究，有待專家，諒讀者當不以粗枝大葉見棄也。

二 飼養過程

A 孵鴨：——

（一）鴨蛋　孵鴨所用鴨蛋。多係鴨戶自養老鴨所產，普通留作預備孵鴨產卵用的老鴨。其性分配，爲三與一之比。（卽三雌一雄，）檢蛋時間，距產蛋之時間，愈近愈好，冬日尤需十分注意，冬日鴨蛋需於早晨四時以前檢起，否則在冷土上擱置過久，卽不易孵出，卽能孵出亦必多病易死。

（二）孵鷄　孵鷄俗名抱窠鷄，就是經過長期產卵，暫時停止生育，預備孵卵的母鷄。鴨戶用瓦盆鋪以麥桿，上置鴨蛋十個或七八個，（依母鷄之大小而定）每盆置抱窠鷄一隻孵之，最大的母鷄可孵十個，最小的一次可孵七個。

此種孵鷄，可連孵雛鴨三四次，到不能再孵時始售出。在孵卵時，鷄卽不離盆行動，故常於盆前，置有水及食品。

（三）孵出時期　無論冬夏由卵孵爲雛鴨，都是二十八天，冬季天寒，屋內要置爐火，提高溫度。

（四）孵鴨的設備　較大的鴨，都專有一個屋子，作孵鴨用。大約一間一立方丈的房間，可置孵盆八十個。以每盆容卵八枚計，一次可孵六四〇個。孵卵室多陽光暗淡，除一個門外，並無窗戶。據鴨戶說，此非但可以均衡室內的溫度，並可免去許多意外的侵害。

孵卵用瓦盆，高約六寸，口大底小，口之直徑約一尺二寸，底直徑約爲一尺。中塡鍘碎碾過之麥桿，約厚一寸半至二寸，蛋置麥桿上，孵鷄俯臥卵上。

孵卵室除門口之一部份外，四週有許多書架式的架子，孵卵盆依次排列架上。盆前懸兩個鐵箔製小斗，一盛水，一盛食品使孵鷄可不離盆而得飲食。

B 鴨黃：——

(一)釋名　俗名雛鴨為鴨黃，因為初生時，羽毛皆為黃色故名，及其漸長，另換羽毛，全體皆呈白色。

(二)飼養：

1. 次數，普通多為每日四次，時間為早五時，十時，及晚三時，十一時，亦有每日餵三次者。

2. 食料種類，飼料每依鴨黃之發育而變，初生時飼以煮熟之小米，六日後飼以半熟之小米飯，及以水浸輭之綠豆，其混合之比例為米二豆一。至七八日之後，改餵以小米及黑豆，高粱，水草，菜等等。

(三)放河　北平鴨以產肉為主要目的，他用的是「陸飼法，」所以除必要的活動及洗澡外，決不使之泳水。因為下水，非但多消耗飼料，且不能增加體重，故自雛鴨時起，即不使之任意泳水。惟老鴨必須放河，日以為常。雛鴨生後四日，即可泳水，不過因羽毛未豐，易於下沈，故祇能在特備之淺水池內，使之洗濯。冬季則於池內略加溫水，使不至受寒，至一個月之後，即可驅至河中游泳。

(四)住處　初生鴨黃，多置於葦織之蓆簍中，簍高可尺半，直徑二尺，每簍可容二十五隻，至兩三日之後，即可放出，置於磚砌之方場中。

夏季場中鋪以乾土及爐灰，冬季則鋪以稻草或麥桿，鋪草，每天曬一次，否則過濕，鴨即生病。鋪土每日亦必墳一次，夏季場上搭有蘆棚，以遮烈日。冬季夜間則驅於溫度適宜之房間，至次日再放出之。

C 塡鴨：——

(一)名辭解釋　塡鴨是北平鴨的特殊飼養方法。鴨生後二月，身體之發育完成，鴨戶用人工法，將以麵粉等製成之臘腸形的食品，向鴨嘴中塡塞，强其進食十數日之久，體重即可增加一斤半。塡到一定時日，即可出售這種鴨子，叫作塡鴨。

(二)塡鴨食料　此種飼料，成分各家不同，但大多數之混合成分爲高粱麵，高粱，麥麩，及玉米麵混合之後，加水成糊，略加細砂少許，再用手搓成徑六分長二寸之圓柱體，在日光下曝乾，即可留作塡鴨之用。

(三)塡鴨方法　塡鴨時，取鴨一隻，置於兩腿間，以手撑開鴨嘴，取柱形食品一枚，微浸以水，再塞入食道中，如是一一塡去，至塡足爲止。

(四)所塡之重量　每一柱狀食品，均重一兩二三錢，初塡時，一日可塡二十個。及後日漸減少，大約塡過七八日之後，每日即不過塡九個或十個已足。十天之後，則塡六七個，日子再多，每日所塡不過五六個而已。

(五)每日所塡次數及時間　塡鴨每日兩次，時間爲早五時及晚六時，生後二月身體發育完成，即可

開始充塡，平常到市上出賣塡鴨，多論個不論斤，故一俟塡肥卽可出售。

(六)塡後之重量　由蛋孵出後二月，卽可開始去塡，在未塡以前約重三斤至三斤半，塡十日之後卽可增重一斤。這種鴨普通叫作三路鴨。若塡二十五日可重五斤半，名二路鴨。若塡三十五日，可重七斤半，名爲頭路鴨，是塡鴨之重量最大者。塡食日期，每以收買者之標準而定，倘收買者以隻論價，則祗塡十日，若論重量，則可多塡若干日。

(七)住處與雛鴨相似　場中置一水盆，高可一尺，鴨可引頸飲水，而不至躍入游泳。冬日夜間則驅至屋內，大約每方尺可容大鴨三十隻，再多則太擁擠，反有礙發育。

D老鴨：——

(一)老鴨係指產卵鴨而言　但亦有人叫：第一年產卵的鴨子爲雛鴨，一年之後，才叫作老鴨。此種分別不甚恰當，故應稱產卵鴨爲老鴨。

(二)留老鴨的時期　舊曆春二月留鴨黃，飼養方法與塡鴨之前期相同。到同年九月，卽驅之下河，十月初卽可開始產卵。

(三)老鴨之飼養方法　在鴨黃時期，與塡鴨同，到身體漸次成長後，卽飼以水草，菜葉及小米，綠豆，黑豆等，每日餵三次，食後到水池中洗濯一次，不使之自由泳水。

當年二月所留鴨黃到八月卽開始餵高粱黑豆等，名爲「上糧。」同時每日驅之下河游泳，卽在河濱餵之。餵「上糧」一個月後卽開始產卵，至此食品中常稍加炒紅之蝦，至產卵停止時爲止，餵蝦日期，爲冬季六個月，卽當年十月，至次年二三月。

(四)產期及產量　當年老鴨由九十月間，開始產卵，到次年二三月停止，至四五月間，又開始產卵，六月間停止。八月後下河，九十月間再開始產卵，普通一年可產卵二四〇枚。

(五)老鴨之生活期限　老鴨若任其生長，可產卵五年，但年老的鴨子，非多餵蝦卽不能多生卵。同時鴨太老時，其卵所孵出之雛鴨，發育常不健康，故許多鴨戶所養老鴨，每自產卵期起二年後卽出售。

(六)產卵　預備孵鴨所留的老鴨，其性比例，多爲三雌與一雄之比。蛋之重量約有三兩，輕者亦有二兩半。鴨蛋生下之後，不可在冷地上擱置過久，倘爲時過多，卽不易孵出，卽或是孵出，其發育亦不健全。

E生育死亡及疾病：——

自養老鴨的生鴨蛋，可孵出的成數，常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出生後倘無意外的事故，其死亡數，每百中不過五六個而已。死亡最多的時期是在鴨黃時期。

鴨黃最易生病，有經驗的人，每日早起，先看它的眼鼻及肛門，卽可知其是否受寒或中暑。受寒需在室內加高溫度，中暑卽驅之水邊代爲洗濯。

大鴨較不易受寒，然仍畏暑。故盛夏鴨場，必搭天棚。食品中多加綠豆以却暑，住處要清潔乾燥，以防穢濕致病。

F 飼料總量：——

養鴨五〇隻，自鴨黃到出賣爲止，約七十日，共可吃小米四斗。綠豆二斗，水草七十斤，倘專養老鴨以五〇隻計，每日需食高粱二八斤，黑豆四斤，蝦五斤。

G 工作時期：——

有鴨工作時期，終年不斷。惟以舊曆七月及十一二月忙，過後卽較爲清閒，因爲前者是中秋節前的一個月，後者爲舊年的前兩個月，北平市場需鴨最多，各鴨戶，都要提前多養，因之工作卽較爲緊張。每年舊曆三四及六月最爲清閒。

三　北平西郊鴨戶選樣研究

育鴨的生產過程，上節中已詳細述過，現在從我們的調查中舉一兩個實例來研究。從這些實例中，第一，可以窺見以養鴨爲副業的北平農家情形，次之可以見養鴨這種副業在農家經濟中的地位。

北平郊外的鴨戶，大別之爲二種，一是以鴨爲專業的，一是以養鴨爲次要工作的，換言之，卽以養鴨爲副業的。現就每類各舉實例研究之：

A 以養鴨爲副業者：——

實例壹：前八家王姓

（一）歷史——王姓，北平西郊前八家村人，養鴨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附近村人俱稱之「鴨子王，」爲清華園東各村中最著名的鴨戶。

（二）人口——連大人及小孩，總共爲八口人。

（三）土地——

一、種類：自有田地五畝，租田十五畝，共二十畝。

二、田租：租來的十五畝地，每畝年納租金兩元半。

三、種植田地所種的作物，分配如下：

玉米	一五畝
白薯	三畝
高粱	二畝

（四）收入——收入之來源及數量，詳下表：

前八家王姓收入來源分配表

種類		產量	出售價格	收入（元）
農產品	玉米	一四石	每石五元	七〇·〇〇
	高粱	一·五石	每斗五毛	七·五〇
	白薯	二〇〇〇斤	每百斤一元	二〇·〇〇
總數				九七·五〇
副業	鴨	二〇〇隻	每隻平均一元	二〇〇·〇〇
總收入				二九七·五〇

從上表中可見粗收入（即未除去成本之收入）約為三百元，而正業之收入不過九十餘元，約佔三分之一；副業收入約佔三分之二。又鴨之價格，最低時為六七角，最高時可達一元四五毛，故平均之約為一元。

（五）支出——

前八家王姓經營支出分配表

業類	支出種類	價格	數量	支出（元）
正業	田租	每畝二·五元	一五畝	三七·五〇
副業	鴨黃	每個一毛五	二〇〇隻	三〇·〇〇
	飼料	每隻需四毛五	二〇〇隻	九〇·〇〇

總數	一五七·五〇

(六)養鴨副業在經濟中的地位——

前八家王姓收入分配表

業類	收入(元)	支出(元)	淨收入 數量 元	淨收入 %
農產品	九七·五〇	三七·五〇	六〇	四二·八
鴨子	二〇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	八〇	五七·二
總數	二九七·五〇	一五七·五〇	一四〇	一〇〇·〇

從上表的分析中，可見養鴨這種副業，在家庭經濟中地位的重要，王姓的淨收入中，有一半以上，即五七%是靠副業的，正業的收入反不及總數之一半，由此可見養鴨副業之價值，及其重要性。

(七)飼養方法　詳見第二節中。

(八)銷售　經過填鴨這一步後，便由鴨戶挑至北平城內出售，價格之高低，因季節而異，最低時每隻售價七毛，年節時每隻售一元五六毛不等，平常時售價約一元一隻。出售地點則為北平城內定期集市之廟會，最大者為護國寺，他如崇文門外之花市，東四牌樓，西四牌樓，及前門外西河沿諸鴨市等。

B 以養鴨為專業者：——

實例貳：青龍橋西後營宋戶。

(一)歷史　宋家營鴨業已有一百多年，老家在清華園附近之水磨村，分家後，老大仍居水磨村老家，老二搬至後營，老三則遷至安河橋，兄弟三人現俱繼續以養鴨爲專業。

(二)人口狀況　全家共九口人，內長工一名。

(三)土地狀況　共有地二十五畝，俱種玉米，每畝可產十斗，總共二百五十斗。每斗價五毛，總共可得一百二十五元。

(四)養鴨概況　全家從事養鴨工作，所有庭院，大部是拿來爲養鴨用的，鴨欄本用草，後改爲用磚，欄內墊以稻草依鴨之大小而分欄，小鴨則置于竹簍中內院並專蓋有一土屋以藏鴨，餵鴨另有飼場，即以磚砌成四方形的小廣場，中墊以蘆蓆，餵時便將鴨從欄內驅入於此廣場中，再拋擲食料與之食，食完後便驅入水池中令之洗浴。水池即在食場之對面，用木板築成，池旁有一井，用水即由井內吸上再灌入池中。池底有陰溝，穢水可由之以放出，浴完後，便將鴨驅回欄中。

(五)飼養方法　略如前章所述。

(六)收入　宋家因經營農業及鴨子所費的各種資本，尙無詳細調查，故不能計算正業及副業的淨收入及其百分比，現姑從上段粗收入中比較之：

業類	收入(元)	百分比
農產	一二五	五・八%
養鴨	二〇〇〇	九四・一%
總計	二一二五	一〇〇%

從上表中充分地表現宋家是以養鴨為專業的，收入中，鴨的部份竟達百分之九十四，而農產收入不過百分之五，實輕微不足道矣。

四　北平西郊鴨業統計

1. 清華園附近各村鴨戶鴨數估計表

村名	鴨戶	鴨數		
		總數	每家	
			最少	最多
前八家	二	二五五	五五	二〇〇
六道口	一	六〇	—	—
公德莊	一	一，八〇〇	—	—
六間房	一	一九二	—	—

大石橋	一	三〇	—	—
後營	一	二三	—	—
前河沿	九	一，一五〇	三五	七五〇
蘇村	一	七〇〇	—	—
蕭家莊	二	二〇	—	—
掛甲屯	一	六〇〇	—	—
水磨村	一	一，〇五〇	—	—
後營（青龍橋附近）	二	二，〇七五	七五	二〇〇〇
青龍橋	二	三六〇	一六〇	二〇〇〇
安河橋	一	七五〇	—	—
六郎莊	二	九二	三六	五五
大有莊	二	一一四	一四	一〇〇
其他*	….	一〇〇	—	—
總數	三〇	九，三七〇		

*「其他」項下乃假定清華園附近各村中尚未調查到的各鴨戶養鴨總數。

本調查表之範圍，以清華園為中心，北達蘇村，東至六道口，西至青龍橋附近，南至六郎莊。所謂北平西

郊即以此爲範圍，下各統計表倣此。

2. 北平西郊鴨戶按鴨數大小分配表

鴨數組（隻）	戶數
一——五〇	一三
五〇——一〇〇	六
一〇〇——五〇〇	四
五〇〇——一〇〇〇	四
一〇〇〇——二〇〇〇	三
二〇〇〇——二〇〇〇以上	一
總數	三〇

按上表中，可見北平西郊鴨戶所養的鴨數，多是甚少的，在五十隻以下的鴨戶，竟佔鴨戶總數中四三·三三%，而一千隻以上的鴨戶不過一〇%。

3. 北平西郊鴨戶收入表

戶名	收入（元）	養鴨收入	總收入 量數	總收入 百分數

前八家王戶	一五五・〇〇	八〇	六一・三%
前八家歐戶	八一・〇〇	二九	三五・八%
公德莊劉戶	一一九二・〇〇	九〇〇	七五・五%
大石橋王戶	二七五・〇〇	一六二	五八・九%
後營劉戶	一六〇・〇〇	六〇	三七・五%
前河沿安戶	一八三・八〇	一四四	七八・二%

從上表可看出養鴨收入對總收入中的比重，最高者達總收入的七八・二%，最低者亦有三五・八%，可見養鴨副業之重，又因調查時對總收入，養鴨收入等未能分別調查清楚；祇將曾經清楚調查者六戶列表如上，從上表中大概亦可窺見養鴨副業收入之重要。

五　北平近郊鴨業統計

所謂北平近郊，事實上祇是指北平城外的北郊和東郊，更詳細說，便是指德勝門，安定門，東直門，朝陽門，東便門五個門外的鴨戶。北平西郊鴨戶，在第五節中已詳細描畫，此處不必重覆。至於南郊，據我們所知，鴨戶雖然有，可是不很多，而且每家所豢養的數目也很少，因此，我們便將它省略過去。

1. 北平東郊北郊鴨戶鴨數統計表

地名	鴨戶	鴨數		
		總數	每家豢養數	
			最少	最多
德勝門外	三	二〇五	五〇	八〇
德勝門內	一	七八	—	—
東直門外	七	一二，一五〇	四五〇	三五〇〇
朝陽門外	二七	二二，六〇〇	四〇〇	三五〇〇
東便門外	八	六，八七五	一五〇	—
總計	四六	四〇，九〇八		

北平北郊東郊的鴨戶有幾個特點，值得我們注意的：

1. 北郊中，德勝門外祇有兩三鴨戶，並且餵養數目也不多；安定門外，則全無鴨戶。

2. 以鴨數而論，東郊是北平養鴨最盛的地方。第一、它豢養的數目，在北平各郊中，實居首位。第二、東郊的鴨業有大規模的傾向；例如東直門外，鴨戶祇有七家，而過千數以上者佔四家，有兩家通常都是養鴨三四千隻的。

3. 東郊的鴨戶，集於河沿一帶再往東便無養鴨者。

2. 北平東郊北郊鴨戶按鴨數多寡分配表

鴨數組（隻）	戶數
一——五〇	一
五〇——一〇〇	三
一〇〇——五〇〇	二四
五〇〇——一〇〇〇	六
一〇〇〇——二〇〇〇	七
二〇〇〇——二〇〇〇以上	五
總數	四六

從上表看來，半數的鴨戶，其豢養數目，俱在一百隻以上，五百隻以下。但一千隻以上的鴨，也佔全數百分之二十六約，即達全體鴨戶四分之一，其比重也值得注意。

六　北平鴨的市場

——交易，組織，捐稅，鴨戶——

A 北平市內鴨子的交易狀況：——

（一）廟會　北平鴨市有隆福寺護國寺二者，隆福寺在每月七號，十七號，二十七號開市。護國寺則於每月四號十四號，二十四號開市。現用者爲陽曆。銷量計每廟可一千隻。每月總共可銷六千隻。每年大概可銷至七萬隻左右。廟會中之價格，視行市而有高下。以民二十三年的營業而論，三月至九月時，行市不佳，每隻售價四毛至五毛。十月以後，市況轉好，每隻可售一元以上。

（二）同德雞鴨行　同德雞鴨行的主要買賣爲雞，但鴨子亦有交易。且雞鴨同爲家禽，性質相近，而該行營業，甚足注意，故略述如下：

1. 該行設備：行在崇文門外，三里河東口路南。成立已有三十餘年。行共有房十七間，三間爲辦公及伙計住所。六間爲客人驢騾飼養之所，一間爲廚房，餘七間雞客之住所。

2. 雞之來源及運輸：北平爲雞之終點市場。來源主要者有三處，最多者爲平東之三河，興隆、薊縣、昌平、玉田各縣。次爲北口雞，即從平綏路沿線各地運來者。第三爲保定高碑店一帶由平漢路運來。數量每年約十七八萬。民十三時達二十七八萬。運輸則平東各縣，有由人用筐擔來，有用大車運來，亦有以驢馱來者。北口雞及西路大都由火車運來。

3. 交易：北平雞市，一在前門外，一在崇文門外，前者是買賣兩方直接交易，後者是經牙行的介紹而舉行交易。此外，在各城門外，亦有交易。本市有雞販四百餘家，但俱無字號，它們多在城門外收買農家之雞，轉

賣而獲微利，在崇文門外交易者，則以牙行為中間人，賣主為外地雞客，買主則為本市雞鴨店及飯莊業者，現崇文門外之牙行，祇剩同德雞鴨行一家，該行向財政局領有牙紀帖，年納帖費五十元。是名為散行帖，意即承辦一區的牙行事務，但不能包括全市。該行所辦事務約為下列五種，一、介紹買主，二、評定價格，三、供給客商住宿，四、借墊資本。五、代雇脚力等。客商至平後，均至牙行落脚，雞鴨驢馬可寄存店中，客人本身亦可寄宿其間，不收費用，賣出後該行並可代墊款項，買主立即取走，前門雞市無此便利，故不能廣招外客也。成交後，並可由行代雇脚力，送至買主處，脚力由買主擔負，視遠近而定。牙行所得之佣金為賣方每元出三分，買方每隻雞出一大枚。

交易時，由牙行中人居間，代雙方講價，講成之價，為每筐內之平均價格。筐內雞鴨，無論大小，該適用此平均價格。價格以銅元為本位，交款時，再折合為銀元。折價是以每月初一的市價為標準，該月之內，無論銅元漲落，俱不變動。賣買成功時，立時付款，若由牙行代墊，三五日內，必需歸還，但不取利息。

B 北平鴨的輸出：——

(一)對國內的輸出——國內的主要市場為。

1. 天津　天津於一、二、三月河結冰後，便來北平販運，多由火車載運東去，營業佳時，每月可去二三千隻，不佳時祇二三百隻。

2. 上海　上海每若干月販運一次，用船載運，但運到時死亡甚多。二十三年度中曾運過六七次，每次約一百多隻。

3. 大連　每年五月至七月來北平收貨，年運二次，每次約百餘隻。

4. 奉天　每年交易四五次，每次百餘隻。

(二)對國外的輸出——鴨子出口由和記公司經營，該行在中樓子胡同十二號。該行爲外人經營，總行在天津，原專收雞蛋，後兼收鴨子。每年冬季到平收買，春暖回天津，該行派人至各鴨戶中定貨，每鴨定洋四毛，貨到時再給足。鴨收來後，便宰之，弄好後，毛亦拔去，於是裝箱運津。再由天津出口，運銷各國，而運至英國者爲大宗，運時需用冷氣船。

C 鴨業的組織——

鴨戶有「北平市鴨業同業公會」之組織，在哈德門外，中頭條胡同四十號。該會設於民十六年。現有會員四十八家，以東郊一帶爲最多，次爲西北郊。會中有執行委員及常務委員。設文書，會計，雜務三股。全體大會年開二次；常會月開二次。會費按其賣買之大小，分爲甲乙丙丁四等。現會員納費最多者，爲年出十六元，最少者爲一二元。會務甚簡單，祇是給上市後的會員休息之所而已。

D 鴨業的捐稅：　關於鴨子的捐稅，有下列各種：

(一)河捐　每年每家鴨戶，凡居近河者，不論養鴨多寡，均納河捐二元。

(二)車捐　運鴨手車，每年納捐二元；大車則三四元。

(三)營業稅　以前由公會月納三十元，再由會員分攤。二十三年十一月起，改爲各家自納，現尚無詳細辦法。

(四)營業捐　分四季徵收，每季一元。

(五)小票　上市時交給警察，日十大枚。

E 北平鴨戶之分佈：

據公會之估計

地點	戶數	地點	戶數
東便門外	四	永定門外	一
朝陽門外	一五—一六	阜成門外	二
東直門外	四	彰儀門外	四
安定門外	二	廣渠門外	六—七
西直門外河沿	四	左安門外	二

總計　約六十餘戶

按此表乃鴨業公會根據其會員的估計，恐與事實不大符，現祇錄作參考。

七　北平松花業調查

一、北平松花的歷史——松花原名變蛋，出於江蘇常州。清乾隆年間，北人採用南方製松花之法而改良之，製為糖心松花。至光緒年間，北人漸有嗜松花之習慣，於是銷路大開，民國而後，銷路更盛。此後，北平松花蜚聲全國。

二、北平松花業之歷史——在政府南遷以前，松花業甚為發達；國都南徙後，乃大受打擊，從前，北平專營松花之店舖共有六家，現祇剩城外四家；前門內之兩家，已於前年倒閉矣。現餘之四家，俱有二三十年之歷史。舊本以永興德號歷史為最久，開辦已五六十年，惜於前年已倒閉矣。營此業者，可謂全部俱通縣人；即天津各地之松花行，亦俱僱用通縣人。前年，廣東亦曾來北平僱一松花技師。

三、蛋的來源——北平鴨雖名聞全國，但產下之蛋，多留作孵鴨之用，且價又昂貴，故製松花之鴨蛋，多從遠處購來，如河北之新安縣，任邱縣等處。亦有遠赴山東濟寧採辦者。採辦方法，有由自己派人赴各地採購，有由產地收莊送至北平出售者。運送時載以荊筐，以船運來，普通收買價格為三元許一百。

四、製造的方法：——先將買來之鴨蛋，詳細檢查，凡存放已久，及蛋碰皮傷之蛋，盡行取出，然後將選擇過的蛋，置於罎內，第二步為配材料，材料的種類及大概成份為：

石灰	每罎約二〇斤	紅土	——
鹼	五斤	小灰	——
鹽	每罎一〇斤	柏枝	——
紅茶末	三至四斤	水	——

將上述原料配勻，以水煮沸為湯，涼後傾入罎內，至於材料之成份，松花業者俱祕不告人，無法得可靠報告也。原料之用途，據該業云：鹼有苦性，鹽所以調口味，茶葉所以染色，柏枝所以印影，石灰所以使蛋皮變灰色。但此不過傳說，未經科學的分析，實不能置信。將材料（石灰除外）放入蛋罎後，又將石灰溶為汁，傾入內，蓋石灰可以生熱力，使蛋成熟也。以上手續完備後，便將罎加蓋，約俟兩個多月，便可成熟，屆時乃將蛋取出，置於竹筐內，將用過的材料，加黃土混合之，再將此種泥裹於蛋殼上，外再覆以稻皮，便可拿至市場出售，據云裹皮後之蛋可保存至三個月不壞。

五、成貨的出售：——

(一)價格價格依行市而定，大概每一百個售價三四元左右。例如去年（二十三年）行市，最低時三

元八毛一百個，最高達四元五毛一百。

（二）賣買方式：銷售方式有三，一爲由各店舖至松花行中大批賣出。一爲於工作完畢後，由工人挑至各街巷零售。一爲裝箱出西直門，由平綏路運至張家口，大同，豐鎮等處出售。

6. 北平松花每年出產數量估計：

1. 北平松花產量估計表

店名	產額（個）	地址
萬玉興	四五〇，〇〇〇	宣外山西街
永茂	三五〇，〇〇〇	前外上巷四條
天義成	三五〇，〇〇〇	崇外東月牆
隆昌	三〇〇，〇〇〇	十間樓
生春陽*	九〇，〇〇〇	
合興成*	九〇，〇〇〇	
富積德*	九〇，〇〇〇	
總計	一，六二〇，〇〇〇	

*按此三家爲食品店而兼自製松花出售者

七、松花銷售地的分配估計：——

(一)北平約一百數十萬個。

(二)西北約數十萬個。

八、捐稅：——包括於蛋捐以內，每年納帖費三百元，由各松花行分攤。但去年取消苛雜後，本稅亦取消。

九、工作時期：——每年工作時期，可分爲兩季。第一季由舊曆三月清明後起，至五月止。第二季由舊曆八月起至十月止。工作所以有季節者，因鴨蛋之供給有季性故也。

十、工人概況：——每間松花行，大概有工人五人至八人不等。工人在工作季節內，全部參加生產工作，停工後則挑貨至外面零賣。每月工資三四元至五六元不等。技師則月薪二三十元，有時技師即爲店主。

八　結論

(一)北平郊外凡臨近溪河的地方，都適於養鴨，養鴨成本輕微，又不需繁重設備！其工作時間可充分利用農場工作之餘暇，爲農家最有利益之副業。

(二)北平鴨之飼育方法，雖無何等科學之根據，然農民已知以河中水草及發芽綠豆供給幼鴨成長所需之一種維生素及礦質，以蝦類供給老鴨產卵所需之蛋白質，已未可厚非。至若填鴨法以最經濟的代價，短期促成鴨體之肥重，尤爲北平業鴨者特具之技術也。

濟。

(三)利用母雞孵鴨，成本仍嫌過重，不若採用人工孵卵箱爲得計。如能集若干鴨戶合作孵雛尤爲經濟。

(四)業鴨者散處四郊，從無聯絡，更不知大量生產以供應外埠市場，且易受奸商操縱，應有强固的鴨業組織以應付此種複雜環境，至若現有之公會，在實際上毫無效用。

(五)北平產鴨遠可運銷上海，惟習用船運，中途死亡頗多。如平滬間運輸機關能有代價稍廉的冷藏設備，似宜宰殺後再起運，則損失較輕。

(六)英商和記公司試運北平鴨至歐洲，已獲得國外市場。此種有前途之企業，國人胡不起而經營之?

(七)皮蛋製造爲北平主要之鴨蛋保藏工業，惟墨守舊法，產量日減，且不知謀外埠銷場。如對生產方法加以改良，當可銷用多量鴨蛋，對於鴨業不無裨益也。

一九三五，六，二十八日。

二十二　懷來縣水果區調查記

張翰才

由去年秋天一直到現在，算起來，在城市中住有半年了使習慣於鄉村生活的我，感覺着異樣的煩悶，很想找個機會，再到田野間走走。正好在這個時候，承友人之介紹，得識懷來人孫君；懷來的水果，聞名已久，可是總沒有機會去看。聽說孫君二三日後，就要回去，所以當時就約好了，定期隨他同往懷來去調查。在四月二十號那天早晨，我們同在西直門車站，上了平綏火車直向目的地前進，午間抵青龍橋，青龍橋雖是舊遊之地，可是聳立在車站上詹天佑氏的銅像，依然可以使我發生正如初次來遊時同樣豐富的情緒。在中國居然也曾有一位脚踏實地的人，作了一番困難萬分的偉大事業，在這氣壯山河的萬里長城旁邊，與英名千古的詹君銅像之下，使我們自己愈慚形穢，百感交集。車過青龍橋，不久到康莊，約於下午三時左右，即抵懷來車站，車站的南邊，就是懷來縣城，進了城之後，隨孫君往訪幾位在教育界及建設界作事的朋友，他們對於我所注意的水果事業，雖然很具熱心，但是他們所有的材料，多係得之傳聞，不能給我什麼實際的幫助，我的經驗也告訴我，這些小城市的紳士們，他們的紳士氣派，與恥談農事的惡習，有時比之大城市中的人們還要厲害，所以我只記着了懷來境內產水果的地方，是北山，南山及沙營子附近三個地方。此外，也不願多問他們。是夜，即借宿城內孫君家中，第二天太陽初上，我一個人，雇了一匹驢，馱上我的簡單行裝，與

採集標本的器具，從速的向着北山前進，出了城，過鐵路，一直到黃家冲，地都是很平坦，路也好走，黃家冲附近，已經有很多很多的果木樹了。塞北氣候寒冷，所以這時候，正是杏花將落，梨及蘋果沙果開香果等花初開時節。一個一二百家的村莊，完全埋藏在燦爛的果花裏，橫在村莊背後的北山，在春天也愈顯着雄壯，這種大自然的景色，引起了我無限的興趣。在村裏找到了一個小學校，由一位教師的介紹，認識一個姓劉的農夫，曾到過「北京城」三次的青年，思想很清楚，口齒也流利，據我的經驗，各處經營園藝事業的農人，多比當地普通的農夫，知識高些，這是因為園藝生產品，比普通農產物價格略高，經營園藝的農家，經濟上比較充裕一些的緣故。我在黃家冲小學住了三天，每日白天，隨着劉君到各處去跑，晚間同他們閑談，第四天的早晨又雇了一匹驢，離開黃家冲，往南山去。由黃家冲往南山，也要由懷來縣城旁邊經過，過了縣城，不遠就是一條河，聽說河的上流，沿岸產葡萄極多，出產葡萄最有名的地方沙營子，也就在那裏，過了這道河之後，一直往南走，約三十里左右，就到了南山山口，這時已能看見山上果樹，順着很寬的山澗再向前進，三里多路，就到石洞村。這個村也不很大，沿着山邊有一百多戶人家，村中也有一個小學，村長王某，三十多歲，人極精明，他給我許多幫助，領着我走了許多的地方，我就在這村的小學裏，又住了兩天，將井溝，辛莊，化莊，水頭各地方都看過之後，因為採集的標本，已經不少，需要整理，就隨着一位某大水果行的伙計，回北平來。現在將我這幾天採集標本之外，所見聞的一點材料，記下來以為研究農村問題者之參考。

懷來水果生產區之地位

懷來縣舊屬於河北省口北道，今劃入察哈爾省，距北平二百里左右，平綏路經過縣城之北，交通頗稱便利，夏季氣候溫和涼爽，果樹類中，如仁果類，核果類及葡萄等，在此種氣候之下，生長極爲相宜，雖冬季氣候嚴寒，果樹易受凍傷，惟以當地農民，多將樹木種於北面山坡上，利用北面之山峯，以爲天然之風障，故受害者，尚不多覩，不過雨量略少，且夏間時有雹災，是其缺點，然終不失爲一有望之果樹栽培區也。

縣內所產果實種類

懷來境內所產之果實種類極多，凡北溫帶所能生長之果樹，幾無不有之，如梨，蘋果，沙果，檳子，閙香果，楸子，海棠果，山裏紅，桃，李，杏，巴達杏，（俗名大扁）柿，葡萄等，莫不應有盡有，惟生產量之多，則推平果，梨，葡萄三種，此中又以蘋果爲最有名，平津各大水果行所售之中國種蘋果，皆冠以懷來二字，實則昌黎產者亦多，但不如懷來產者之著稱耳。

果樹種類之分佈

北山以梨爲最多，黃家冲，北辛堡，鼃房營各村，皆以梨爲大宗，蘋果僅黑山口一帶有之，成熟期雖比南山產者爲早，而產量甚少，其他沙果，檳子，桃，杏等，多散植於山邊或梨樹園中，成園者極少，故不得視爲重要之栽培種類。

南山則以平菓爲大宗，如石洞井、溝辛莊、化莊、廟港各村，俱以蘋果爲主要生產，水頭則以巴達杏爲最多，其他種類皆甚少。

南北山之地勢及土質

北山在懷來城北約十里左右，山陽一帶之緩坡地，凡坡度在十度至二十度之間者，皆已全數栽種果樹。此種地勢栽培樹木非常合宜，因背後之高山，即等於天然之風障物，不僅免除風災，亦可減低寒害，且延山一帶多泉，故園中水層不深，惟除黑山口下一泉之外，其他水量皆不甚多，不能引用之以施行灌漑，頗爲可惜。土質則表土爲石英質沙土，底土略帶粘性。

南山果園地勢，與北山完全不同，因南山之平果園皆在羣山之中，故果樹栽在東，西南，北各面山坡上者，皆有之，惟山皆不高，山上土層頗深，土質多砂質埌土，農民多將山坡整成梯田，以便栽種菓樹，亦有並不整爲梯田，即行栽種的，甚至坡度在五十度以上，不加整地，即植以果苗，任其自然生長者。按理論上說，坡度在三十度以上，栽培工作已非常不便，不過南山之內平地極少，緩坡地又不多，所以這種不合宜的地方，也都被人開墾利用了。

蘋菓及梨之品種

蘋菓只有一種，樹性直立成倒帚形，主枝極多，由各主枝上分生短果枝，完全依賴短果枝結果，該處以

雨量不很多，所以枝條尙不易流於徒長，因此雖樹勢不佳，而結果情形尙屬良好，不過這種倒帚形的樹勢，對於日光及空氣之透射，皆不很好，不只防礙花芽之形成，且易受病蟲之侵害，此種不良之樹勢，實有積極設法改良之必要。果實每個重三兩許，圓形，菓心小，顏色鮮豔，質細味甜，成熟期在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之間。

梨有秋梨，熱梨，紅霄梨三種，秋梨係晚熟種，於九十月間成熟，果重四兩許，皮淡黃色，有芳香，性耐貯藏。樹勢在未達結果期時，稍帶直立性，既達結果期，則姿式漸形開張，雖無整枝剪定之管理，而姿態頗好，近於圓錐形整枝法，此種姿式，若再加以科學管理，形式必可更爲優美。樹皮暗褐色，節間頗短，短果枝極多，結果期內之樹，長果枝殊爲罕見，結果完全依賴短果枝，各樹上乾枯之短果枝極多，且稍大之樹，其短果枝極爲微弱，是皆因施肥不足，管理失當，以致養料不敷分配，有以致之的。

熱梨之樹勢與結果習性，與前種無大差異，惟果實比前種略小，皮稍薄，水分高，不耐久藏，比秋梨早熟一個月左右。

紅霄梨之樹勢，較秋梨爲弱，枝條亦柔細，果實重三兩左右，成熟期在秋梨與熱梨之間。

栽培方法

該縣果樹事業，雖非常發達，而對於種苗事業，向不注意，附近不只無專門作育苗事業的，並且走遍南

北山附近一帶，看不見一家私人的苗圃。農人欲得新的樹苗時，即將老樹根部自然分生之蘖，移植於目的地，此後若非有特別的原因，即不再行移植，所以這也就可以算為定植。定植以後，待此幼苗長大至直徑二寸左右時，在樹幹上一尺左右處，將上部枝條完全鋸去，然後在此鋸木上，用劈接法，嫁接兩個或四個接穗，關於接穗母株之選擇，多不知注意，關於接穗本身之選擇，則用結果枝，較之用葉枝者為多，這就是因為用結果枝作接穗，達結果期間的年限，可以早一些的原故。嫁接已畢，用土封好，成活之後，即任其自由生長，並不加以任何整理之手續。

各處園中果樹之株間距離，極不整齊，普通約在二十尺至三十尺之間，但行間尚能取直，株行之間，皆種有間作物，間作種類，以麥為最多，豆及芝蔴高粱等次之，農人對於施肥，亦不注意，聞數年前，農村經濟狀況略好時，每株梨樹，約施羊糞百斤左右，近年來，則以羊少糞貴，兼以農家經濟不振，施肥者已極不普遍，且施肥量又不充分，果樹之生長，實受莫大之惡劣影響。

病蟲害之防除，則用刮皮及手捕二法，刮皮者，即將成年樹之枝幹外皮，用特製之刀刮去之，此法甚妙，蓋樹木既達成年，外皮部多生裂紋，其間極易成為病蟲之潛伏所，所以若將外皮刮去，無形中，可以避免若干種的病蟲害，至少也可以減低被害的程度，利益殊大；惟此種刮皮之技術，頗非容易，稍大之樹，每人每日只能刮一二株，並且刮皮工人的工資，也比普通工人為昂貴，刮皮的時期，並非四季皆可，只規於每年，春季

驚蟄之後，清明之前，除此之外，則對於樹木之生機有妨害的。

捕蟲工作，則於花落後分數次行之，通常多於小滿前後（五月下旬，）芒種前後（六月上旬；）夏至前後（六月下旬，）各捉包蟲一次，包蟲即葉捲蟲，爲害極烈，此外又有一種梨虎子，又名錐果牛，學名爲象鼻蟲者，亦極猖獗，此種梨虎子之爲害時期，在六月中即由芒種至夏至後十日間。其驅除方法，則係利用每天早晨露濕未乾，蟲不能飛之際乃振落而捕殺之，法即將樹下之土，用手捻成極細之細末，於每日清晨，以此細土擊樹上枝葉，使蟲驚落，然後急速捕殺之。此法極爲繁瑣費時，可謂未脫原始的栽培技術時代，且費用亦昂，據石洞村王村長之計算，二十年生盛果期中之蘋果樹一株，每年由於病蟲防除之費用，平均爲刮皮一工，捉包蟲二工，捉梨虎子一工，每工連飯在內，以三角計算，即達一元二角。若以同等之費用，利用藥劑噴射防除，不只驅除蟲害，效可十倍，且兼可防制病菌之侵害，所以藥劑防除，在該處實有從速設法提倡施行之必要。

蘋果及梨的產量

因爲農人對於管理的技術，極爲幼稚，加以天災蟲害，所以每年的生產量，差異殊多，俗有大年小年之稱，即每隔一年，始結果一次，學者稱爲隔年結果者是也。普通大年即結果之年，全縣之生產量，除由驢馱運出，不能計算者外，由平綏鐵路運往平津一帶者，蘋果約在三千噸左右，梨約二千噸左右，至於每株之產量，

梨每株能達八九百斤，蘋果能結一千個左右。

蘋果及梨之價格

上等梨百斤，在樹下可賣八元，劣等者，亦達四元。蘋果之上等者，在樹下百斤值十元左右，若先期預定，則價大減，如典花典枝，其價僅及樹下賣價之半。

販賣及運銷方法

販賣之法有以下數種：

一、典乾枝：即在未發芽以前預定，價最廉。
二、典花：在開花時預定。
三、典果：在果實尚未成熟之前預定。
四、賣果：農人將果實採收之後，再行販賣，前節所稱樹下賣價，即係此種。
五、預定價格法：買賣兩方將價格先行議妥，待果實收穫之後，依量付款。
六、預典若干年：五年十年不等。

一方面因爲農人栽培技術的幼稚，果樹皆有隔年結果之弊，所以農家每年之收入，極不平均，經濟至不安定，一方面因爲鄉間的金融不流通，借款不容易，所以每因歉年需款孔殷之故，農人忍痛的以極低的

價格，定了若干年的合同，將自己視如生命一般重要的果樹園，預典給平津一帶資本雄厚的各大水果行了，所以我們雖然覺着近年來果實價格日趨高昂，但是栽培果樹的農人們，所得到的利益，反而一天天減少的。

除上述預典若干年之外，以典花爲最多，每年春季，果花盛開時，平津各大水果行，即派人來此視察，謂之「看花，」預測豐歉，以便估計價格，待與農人商妥價值，價定之後，即先付款若干，下餘之數，則待至成熟採取之後，再行付清，實則付款之時，仍百般要挾，如數付給者，絕無僅有也。

包裝方法皆用筐，筐以荊條編成，底小口大，與普通所用之馱筐相同，每筐容梨七八十斤，容蘋果六十斤，裝好之後，用驢馱往懷來車站，兩筐一馱，每馱運費，由北山至車站爲三角，由南山至車站爲五角左右，抵站之後，再由棧房包運，前往北平或天津。包運費每馱至北平二元四毛，至天津三元二角，運銷地點，則天津最多，約佔全輸出量百分之七十，其餘百分之三十則運往北平。

結論

該縣雖以得天獨厚，果實之生產量，極爲豐富，惟栽培技術，尙未脫原始時代之簡單方法，在此科學日新月異的環境之下，特別是日本人正在遼東努力提倡果樹事業的時候，若不急起設法改良，則前途必不堪設想。石洞村王村長曾太息對余曰：「昌黎的蘋果，只一日即可到天津，我們的貨，要五天纔能到，日本的

蘋果，因包裝得法，價格劃一，買賣人付錢之後，搬了就走，我們的貨，價錢講了又講，將貨由筐內，一回兩回的倒出來，看了又看，倒幾回再賣不出去，貨就壞了。」

為什麼日本貨，可以不還價，可以不選擇，搬了就走，為什麼中國貨，要挑了又挑，價錢講了又講，這都是因為人家包裝與販賣之得法，有以致之，所以一種事業，欲謀成功，皆非容易，此點亦非本篇討論範圍之內，故不多贅，他日有暇，當另為文以討論之。

一九三四，八，十八日。

第三編　各地農村實況

一　河北三河縣農村社會概況

張鐵錚

今年三月間，我因從事鄉村農產品的價格研究，曾到三河縣高樓鎭作調查，華洋義賑會農利股旣爲我寫介紹信給當地的合作社，同時又承莊戶村田澍霖先生及該村各位合作社員的贊助，使我的調查工作，得以順利的進行。這是我應當感謝的。

不過在調查時，特別注重農產品價格的搜集，至本篇關於農村社會各方面資料，只爲此行所得之副產物，且資料來源，多從農民口頭談話中得來，統計數字，自極缺乏，惟對該地農村一般狀況，已可看出究是怎樣的情形了。

一　三河縣農業概況

三河縣除了縣北境有棘荊山，堡子山，鳳凰山，臥龍山，龍坨子山等數道山脈地勢略高外，縣的東西南三境，則全是一片大平原地，洵河及鮑邱河自縣東南境流入，在這兩河的沿岸地方經過河水冲刷之後，土質多變爲沙土，但大部分的農田，還是黃土和黑土居多。

農業的生產以食糧爲主，食糧之中最主要的爲玉米，高粱，小米，麥子等，其次則爲黃豆，黑豆，綠豆，芝蔴等項作物，花生及棉花均不出產，在三河縣紡線織布的家庭手工業，可說是極不發達。

土質亦極瘠薄，須要大量的猪糞肥地，故三河縣「養肥猪」最盛行，據這次調查平均十畝地，便需要養猪一口，積蓄的猪糞，纔足供肥地之用。

農民耕作的習慣多在一塊地內，要間種兩三種不同的作物，例如在高粱地內，間種黑豆；玉米地內，間種黃豆，穀子地內，間種綠豆，同時亦有將高粱和玉米間種在一起的。因此每單位畝的作物產量極爲有限，在平常年景，每畝的產量約計如下：

作物名稱	每畝產量(斗)	作物名稱	每畝產量(斗)
春麥	一	高粱	八
秋麥	三	穀子	八
玉米	八	芝蔴	三
綠豆	一	穈子	三
黑豆	三	黍子	三
黃豆	三		

穀子是在麥地內播種，麥子在收割以前，亟須要將穀種撒入麥隴內，麥子收割以後，穀子便也長了起來。其他各種作物的播種和收穫時期，都不相同，我們試把他列表出來。

	播種時期	收穫時期
春麥	清明前	夏至後十天
秋麥	寒露	夏至前二天
高粱	穀雨	白露
黑豆	穀雨	白露
玉米	小滿	白露後秋分前
黃豆	小滿	白露後秋分前
穀子	清明前	處暑後白露前
綠豆	夏至後秋分前	白露

全縣作物的產量，沒有統計可作參考，但大體上說來，全縣作物的出產僅可維持自給的地步，並沒有餘糧可以往外輸出，同時黑豆爲猪的飼料，還需要由外地運來接濟。

二　農民的經濟狀況

三河縣很少擁有極多土地的大地主，在莊戶村調查有二頃地的只有五家，那算是很富的農家了。據當地農民的估計，除上述的五個農家外，有一頃地的農家也有五家，八十畝以上的有三家，六十畝以上的，最少只有一家，四十畝以上的有十一家，以下四十畝以下至不及十畝的農家最多，計三十畝至四十畝地的有三十家，二十畝地以上的，也有三十家，十畝地以上的有二十家，十畝地以下的更多，有四十五家，還有無地的約二十家。統計起來，四十畝地以上至二頃地的農家，只佔「有地農家」的百分之十六，四十畝地以下至不及十畝地的農家，却佔「有地農家」的百分之八十四。由這統計看來，可知三河縣農民的土地的分配，尙是一個很均衡的狀態。土地權利不是集中幾個大地主手裏。

我們再看看農家的經濟情形。據當地農民談話，全村的耕地面積（莊戶村）約有三千八百餘畝，現在我們可以把無地的二十個農家加入裏面，則莊戶農家共一百七十餘家，每家佔有耕地畝數約爲二十二畝。莊戶男女人口共一千人，每人佔有耕地畝數約四畝。一般農家經濟狀況，這樣是不算得太壞的。

三　糧食的借貸

在高樓鎭經營糧食貸放的店舖，有雜貨舖三家，糧酒棧兩家，燒鍋一家，米麵舖一家。他們俱是在大秋後，大批的收買糧食，預存起來，待到轉年舊曆二，三，四，各月，正當青黃不接時再以極高的價格，向外貸放，但他們貸放的糧食，只限於雜糧，最主要的爲麥子，玉米，小米，高糧，黑豆，綠豆，黃豆等項，不包括芝蔴，黍穈等在

內。農民向他們貸借糧食，須與其素有來往，或有中人作保的，然後由他們規定價格，到了舊曆九月初一或十五兩日，收回現款大概放一元的糧食半年之間，便可得到對成的利息，這當然是商人高利貸的一種剝削了。

不過經營糧食借貸的店舖，常有兩種危險：(一)買進糧食以後，須要相當的時間來儲存，在這期間，糧食易生腐霉或遭蟲蝕；(二)農民借貸糧食只憑信用不須抵押品，故無絕對的保障。近兩年來，糧價繼續的慘跌，貸出糧食價格自依當時行情來規定，因此店舖多屬無利可言，目前情形，極為不振。

四　租佃的制度

三河縣租佃的制度，是不很通行的，因為根本很少大地主有富裕的土地，向外出租。因此在三河縣自耕農最多，佃農最少。

在莊戶村調查，「租佃三年有永佃權」的習慣，所以租地的期限，多是限定為一年，期滿收地，佃戶納租，均為錢租，惟納租的方法，則分為「先納租後種地」或「先種地後納租」兩種。先納租的，每畝的租價，自二元五角起最高至三元，在前三四年間，每畝租價尚高，約為四五元之數。納租的時期，係在驚蟄前交納，到秋後糧食收割完畢交地。

另一種「先種地後納租」的，是瓜田。每畝租價，則較「先納租」的為高，每畝為五元。其納租時期，在

立秋後。莊戶村全村農田有三千八百餘畝，瓜田只有四十餘畝。

瓜田是在村的四周，據他們說種了瓜以後，三四年間，不易生長莊稼，所以今年種瓜的地，次年還須利用來種瓜，纔有出產。

除了租佃制度以外，就是典當地。典當地的典當期限，是不必固定的，惟當立典約時，則須在典約上註明時期的長短。至於典價，普通多是相當於其地價的十分之七，將來期滿，地主即持原典價，將地贖回。典地所出的捐稅，係按典價的百分之十八，其中正稅爲百分之十，附加稅爲百分之八，地主與典主各出一半。

五　集市的情形

三河全縣劃分爲九個行政區，每區均以一集鎮爲中心，除縣城爲一區外，共有八個最大的集鎮。這八個集鎮距縣城的里數和開集日期如下：

集鎮	距縣城里數	開集日期（舊曆）
高樓	四〇	二，七
夏店	三〇	大集五，十，小集三，八。
大場	三五	不詳
黃莊	三〇	不詳

段家嶺	二〇	不詳
馬坊	二〇	四，九
張各莊	三〇	五，十
峪口	四〇	一，六

集鎮夏店以糧食市和牲口市最大，高樓鎮以花生市和菜市為最大，峪口因附近果產甚豐，另有果子市亦很大，在各集鎮的居民多將其收穫的農產品趕來集上銷售，同時復購入其他的日用物品，故此集鎮為附近村莊的商業中心點，集鎮上農產品價格的變動，最足直接影響於附近村莊農民的經濟生活的。

集鎮上農產品的交易皆有各行經紀人來擔負介紹和評價的責任，經紀特權的取得，是由包商向縣府投標包繳牙稅，包商即為牙行，須領牙帖。由包商手中，欲分包某集鎮的牙稅，或每月認繳若干牙稅者，即可得到經紀的特權，經紀人不再領帖。在高樓鎮糧食牙紀共十一人。有「斗頭」一人，其餘稱為「量斗的」各人向包商所繳牙稅的數目，計斗頭每月為六元。「量斗的」每月繳十元者二人，每月繳十二元者六人，每月繳十八元者二人。經紀人對包商方面須出牙稅，同時為買賣雙方評價過斗時則須取斗佣。取佣的辦法，對賣方按交易值取百分之二，對買方按粗糧每斗取二大枚，麥子芝蔴兩類為細糧，取三大枚。

我們再談到市場的組織。糧食的賣主多是農民，買主多為本鎮的店舖，或來此販買糧食的糧販，但糧

販有時亦是賣主，在鄉鎮上糧市比較城市簡單，多少還保持着一個原始市場的組織。

六　三河縣的保衞團

三河縣的保衞團，在民十八年間創辦，彼時全縣九區，每區設團正一人，又分四組，設訓練員四人，團丁則在靑紗幛起時，臨時招雇，額數無定，到陽曆九月初便行解散，每年保衞期限僅三個月，卽陽曆六七八三個月。至二十年冬，曾由縣府成立縣常備保衞團，及在同時期內，各區復成立冬防保衞團，保衞期限，則僅是一個月。

前年四月間團正由各區長兼職，同時取消了縣常備保衞團。迨去年十月間，原有四組改爲支隊，每支隊雇用團丁十六人，始爲常備的保衞團丁。

保衞團的經費，是按地畝向農民課徵，但歷年來，課征之數，稍有增減，我們試把它分析說明如下：

保衞費在民十八年時，只有團正辦公費及四組辦公費，由各村鎭公攤，高樓鎭計攤付團正辦公費每年爲七元五角，四組辦公費每月爲一元三角，計每畝地所攤付之保衞團約爲一分之數。團丁費每年爲五十四元，計每畝應攤二分三釐。前後共計每畝每年所攤保衞費爲三分三釐。

民二十年，設縣常備保衞費，高樓鎭每年擔負繳納十五元二角（分四季繳納，）平均每畝所攤之數爲六釐，同年間，又擔負冬防保衞費每畝爲三釐。

民二十年四月起，團正辦公費及四組辦公費取消，另由縣財政局每畝徵保衛費二分。今年一月間，所有冬防臨時等保衛費一概取消，改按每畝徵洋三分八，每年分上下兩忙，各徵一半。自保衛團成立後，農民每畝地攤付的保衛費如下。

民十八年	
團正費及各組辦公費	○·○一○元
臨時保衛費	○·○二三
共計	○·○三三
民十九年與民十八年同	
民二十年	
團正費及各組辦公費	○·○一○
臨時保衛費	○·○二三
縣常備保衛費	○·○○六
冬防保衛費	○·○○二

共計	〇·〇四一
民二十一年	
保衛費	〇·〇二〇
臨時保衛費	〇·〇二三
冬防保衛費	〇·〇〇二
共計	〇·〇四五
民二十二年與民二十一年同	
民二十三年	
保衛費	〇·〇三八

七　結論

三河縣農村現狀，就我們的觀察，尚是可以抱樂觀的。農村既無太貧農民，亦無極富農家，在莊戶村雖有二十家無地者，然彼等或在外地經商，或在本地傭工，其家庭經濟狀況並不低下且此無地農家，僅佔全

村農戶總數的十分之一稍强。又每家占有田地畝數的總平均，多至二十餘畝，農家的經濟狀況，固不能認爲低劣。

多數農家的經濟情形是平衡的，而且趨向在四十畝地以內的農家最多，所以在農村中，並無剝削階級在那裏剝削，貸放糧食的店舖，雖爲一種剝削機關，但他們的營業情形，却極不振。就農業生產的情形講，糧食出產，雖無多少富裕，却還足以自給。家庭的手工業因棉花不出產，固不發達，但養肥猪最盛行。農民買進每個五十斤的猪，至三四個月後，當每個猪養至一百斤時，卽又賣出，每年的賺利亦尙可觀。再就租佃的制度來講，每畝租價，近年來尙向下跌落，可證明無大地主從中操縱。不過關於農村治安，却頗成爲問題，三河縣自去年淪爲戰區後，開入之保安隊，份子複雜，而本地公安局力量，又極薄弱，保衞團之實力，則如前述，每區只有四支隊，每支隊只有團丁十六人，一區的村莊數甚多，所轄面積甚大，却只有六十四個團丁，保障治安，自然是不敷分配的。

還有是農民教育程度低下，農村的風氣尙極閉塞，纏足之風頗爲盛行此外關於該縣農村社會情形，尙須有多方面的改進，而我們又感覺鄉村中的領袖人才的缺乏，找不到能有社會活動能力的人。然而歸結一句話，我們對於三河縣農村目前現狀，尙可抱樂觀。

編者跋：張先生這篇文章是很寶貴的實地調查資料，不過，張先生對三河縣農村土地分配的看法，我們有不盡同

意的地方。我們以爲，假使張先生用另一種分析來方法觀察，也許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來。例如張先生分析材料的結果，以爲「三河縣農民土地的分配，倘是一個很均衡的狀態。土地權利不是集中在幾個大地主手裏。」但據我看來，則恰恰相反。按張先生調查三河縣莊戶村的耕地面積約有三千八百餘畝，農家共一百七十餘戶，但該村有二頃地（每頃一百畝）的有五家，有一頃地的也有五家。那末這十家農戶就占有土地一千五百畝，約占該村耕地總面積（三千八百畝）百分之五十而弱。但他們的家數僅占全村農戶家數十七分之一，即百分之六而強。同時占有土地十畝以下的四十五家，根本沒有土地的貧農有二十家，他們的戶口占農家總數三分之一强，而所有土地不過三四百畝（即假定張先生所說「十畝以下」作爲八畝計，四十五家亦不過得三百六十畝）即僅占耕地面積十分之一而弱。以僅占農家戶數百分之六的農戶，占有耕地面積竟達百分之五十，乃占有全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農戶，耕地面積反占不到百分之十，像這樣的土地分配，不能說是很均衡的了吧。

第二，再說到農家的經濟情形，張先生以全村耕地面積三千八百餘畝，全村農戶爲一百七十餘家，這樣一平均的結果，每家約占有耕地面積二十二畝，每人約爲四畝，「一般的農家經濟狀況，這樣是不算得太壞的，」但這是全不合事實的，因爲我們已經知道，在這一百七十餘家的農戶中，有二十家是根本沒有土地的，有四十五家是祇有不到十畝耕地的，有二十家是祇有十數畝地的，換言之，有半數的農戶還平均不到十畝地。所以張先生的「每家平均有二十二畝土地不算得太壞」的結論，是須以均田制已在三河縣實行了後爲其前提的。

此外，商人高利貸資本在三河縣之活躍情形，我們也可於張先生文中得知梗概。不過張先生說：「近兩年來，糧價繼續慘跌，貸出糧食價格自依當時行情來規定，因此店舖放糧食者多屬無利可圖。」但據我們所知道，糧價之跌落総以秋收時爲最甚，而當農民青黃不接需要借糧時，這時的糧價即使低，恐怕也要比農民糶賣穀物以還債時要高一些的，所以由糧食的跌價中，我們又不難想像農民怎樣在賣穀物還債中掙扎的悲慘狀況了。

這就是我讀了張先生文章後的一點意見。

一九三四，七，七日。

二　阜平縣農村素描

李小民

地理與物產

阜平是處於冀省西陲的一個三等小縣，地勢偏僻，交通阻塞，全縣面積約有一萬五千二百方里，乍然一聽，並不算小，可是太行山支脈綿亘境內，崗巒起伏，倒占去了十分之八的位置；這些山坡既沒有銅鐵礦可採，就是巖石也都是些不成材的頑石，固然沒有蔽天的樹林，竟連豐茂的草也不長；滿目荒涼，都是些濯濯的童山，磽瘠不毛，更談不到用來耕種。就這樣天然的環境便把阜平限成了窮荒的地帶。再加以大沙河，鵝子，胭脂，板峪，平陽諸河流，縱橫全境，因水流湍急，不能利用灌溉；每當夏秋兩季，霪雨連綿，山洪暴發，動輒淹沒田禾，冲毀房舍，更把人民的生活陷進了艱苦的深淵。多少年來，人們便在這窮山惡水中掙扎着！

現在全縣有着九三，三七八口人，十分之九是靠種地生活的農夫，可是可耕的地僅有一四四，六○○畝，這那裏夠敷分配呢？主要作物為穀，玉蜀黍，高粱，麥……全年產量列表如下：

作物名稱	全年產量（以擔計）
穀類	一六，八○○
玉蜀黍	一二，三○四

高粱	一八，八七〇
麥類	一九，一六四
總計	六七，一三八

這區區的食糧，如何能養活偌大的人羣？因之本縣食糧，大部是仰給山西繁峙靈邱等地的米穀輸入。至於種棉的，因爲地域的關係，可說是寥寥無幾，年僅產二百二十一擔，此不過略爲鄉婦搓線之用，日常所着土布盡從隣邑曲陽行唐靈壽等縣運來，年約三萬五千匹，棉花亦然，年需四萬斤，洋布約二千疋，人們本來就窮得够瞧的了，再加上如此大筆漏卮，眞累得喘不過一口氣來。所以在窮阜平要想找三兩個擁有五萬以上資產的還很費勁呢！

地主與佃農

在全縣戶口中略爲區分，除去商人及小手工業者不計外，地主約占十分之二，自耕農約占十分之三，僱農占半成，其餘十分之四以上，便是佃農了。佃農的生活是悲苦的，他們沒有祖遺的田地可種，所以不得不出大租額，希望從地主手裏弄幾畝地「人吃稠的咱喝湯，」好使妻兒老小不致餓死。租額無疑的是重的，差不多成六與四之比。租田有兩種：一種是糧租，每年秋後收租，雖凶年亦得勉力交納；正租之外，還有其他零星租品像什麼嵩，栗，桃，胡桃，……得二一添作五分與地主一半，如果地裏是有着這類樹的話。現在雖

是新制度量衡已經實行，可是每逢地主收租的時候，仍然用那比舊市斗還要大出一升甚至二升的所謂「加一」「加二」的租斗（這是東家們特爲收租而造的一種斗）佃農對這是不敢怎樣反抗的，因爲如果悖逆了東家的意思，馬上便沒了地種，會打碎了他們唯一的飯碗。一種是典錢，每畝最高價額六七元，低則三二元不等，但多在預種地之上一年交納；比如種二十四年之地，典錢須於二十三年冬預先交淸，謂之「上打」。如果交不出，便會被地主拿去了地。此外佃農對地主還得白盡些義務，例如地主家裏遇有婚喪事項，佃農便趨前去伺候，看地主用不用他們；如果遇有兵變匪亂，替東家搬東挪西，背箱挈籠，也是分內的事，好使地主歡喜，以固其耕地。

更有所謂小撥者，就是佃農從地主手裏佃來的地多，他種不了，便另外撥給旁的農戶種，當然佃農在出撥的時候，租額又高了許多，好從中得些便宜，如此種小撥地的人，無異受二重剝削，所以有的剛過了大秋，才擱下鐮刀，便會什麼也沒有了，勞碌一年算白幹，仍是沒吃沒穿。

在春天，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地裏需要動手了，肚子却又鬧着饑荒，這時除却揭借一些米穀好鬼混下去外，還有什麼法可想呢？平常吃一斗穀，在麥秋須還一斗麥，穀值六角錢，麥值一元餘，這並不是輕的利息。如果等到大秋再歸還，便須加倍，也就是給二斗穀。誰讓你求上門去呢？

有一部分農民既無地可種，又苦於沒有別的生活可幹，於是便出於出賣力氣爲人傭工之一途，這便

是僱農僱農有長期的和短期的區別。長期的像長工，在上工前說定了一年或數年，在這期間內如無重大事故，是不許隨便辭退的。一年的工資僅有十幾塊錢，還拖欠着不能一次清償，但生活終算比較安定。最苦的是短工，今天給這家幹，明天又得另找新的僱主；然而工資却菲薄得可憐：要管飯的話。才不過掙二十枚以至一角錢。如果午間落雨。下午的活不能做，那僱主還得扣去半天工資，只掙五大枚，然仍有人搶着幹。在縣城裏，每逢夏季清晨，有一人市。許多農人鵠候街頭。預備出賣勞力，見一僱主來了，不惜自貶價格，爭前搶作，甚至因被人捷足先得，心中忿恨，遂致扭閙毆打，演成流血慘劇。窮困驅人，一至於此！

自耕農比較好些，可是繁重的捐稅，和農產物價格的低落，也使他們漸漸不支的沒落下去，宣告破產！一兩銀子的糧，倒有二元三角錢的附加，什麼自治款，警團費，區經費等等，更有其他臨時捐款，保衞費．教育款……不勝枚舉。同時農產物品，價格狂跌，一石糧食糶不了幾個錢，像頂好的玉米，往年能賣五角錢一斗（市斗）而今才不過值二角六分錢；小米漲八角八分錢一斗，現在最高也過不了四角。然而他們所必需的粗布，鹽，……等物品，却並沒有減價，反而異常昂貴：穿個布非有一元二三角錢不辦，一塊洋也只能買八斤鹽，物價不減，食糧狂跌，這無異削減了他們的收入，加重了他們的負擔，焉得不窮？焉得不日趨破落！

地主的寶座，是建築在佃農身上的，佃農的幾根枯骨，逐漸彎折了，於是地主的寶座也跟着起了動搖。平常過慣了驕奢的日子，這時無論如何也吃不下苦去，既不能實行緊縮政策，而又點金乏術，終致捉襟見

肘，債臺高築。在這金融奇緊的年頭兒，想揭借一些錢，來救濟一下目前的艱窘，也是件困難的事。雖然有殷實的商號作舖保，雄厚的田房作抵押，利息也由三分以至五分八分，可是誰都鬧窮，誰又有錢？在現在阜平不用說大宗借款，就連十元錢也很不易尋到哩！利率的高漲，比任何地方都凶狠。像有一種放短期借款的，每天一元一大枚以至三枚的利息，這是何等的利率？這比天津的「印子錢」也不在下吧！

再說到賣地，往昔一畝好地，能賣到二百餘元，現在最高也不過值五十元。比如有二千元的債，在昔日有十畝地，便可以抵補得住，在今日却非四十畝不辦，所以有許多地主，都在這個原則下，宣告破產了。不到五百戶的縣城中，地主也不過百十戶，然而反倒有十多家盡產還債的，就是鐵的證明。其餘「行將破產」和「準破產」的，尚不知有多少。經濟的困慌，地價的暴跌，使得素稱寬裕的地主，也飽嘗艱苦滋味。

今將最近地價與三年前列一比較表：

地別	三年前價值（每畝以元計）	最近價值（每畝以元計）
園地	二二〇	五〇
麥地	一八〇	四六
稻地	一六〇	四〇
旱地	一二〇	三〇

較前三年相差四五倍，地價雖仍一直狂跌，然鮮有問津者，貧富交窘，可見一斑。

農民生活

其次再說到農民生活，概括說來，也只「窮苦」二字。雖還不曾吃草根，樹皮，嚼黃土，甚至人吃人，但吃樹葉，糠粃，菜根，薯塊，總是不可掩諱的事實。他們在秋天把樹葉（杏，柳，槐……）打下來，浸在甕裏，預備泡淡了苦味，撈出來拌上糠粃，蒸窩頭吃，過有收棗年頭，再把糶不出的壞棗搗成泥攪和在糠裏，為的便於下嚥。假如大人先生們見到了這又黑又硬又粗糙的東西，一定會總着眉懷疑這不是人吃的，但他們却狠吞虎咽，惟恐不飽。小米粥，玉米窩頭，雖算不得好，但在貧苦的鄉農很少吃到這些東西，家裏要沒點家私，誰吃得起？能够啜到小米粥，啃到玉面窩頭的，他們覺得是在天堂上的人。要讓他們知道富人的狗也吃肉糜的話，我眞不知他們要作何感想？說來這事近於神話：在阜平有着不少的鄉農，終生只嘗過一兩回蕎麵餃子，至於白麵大米是什麼滋味，簡直不曉得。再說到穿的問題：因了本縣布棉的缺乏，以致非常困難，一件破單掛，千補萬綻，仍不免赤身露肉；到現在嚴冬已屆，而無棉衣者尚不在少數。他們沒有穿夾衣的階級，在秋風蕭蕭中，仍是披着夏天那身破袴掛，瑟縮的一直到滿地霜雪的嚴冬。我們如肯到鄉間看看：低矮的草房，卑陋的黃土屋，光線不足，汚地陰濕，雜亂的什物，射出一股刺鼻的霉臭，一個大鍋竈，烟氣薰蒸，一條土坑鋪着

半塊破蓆，被褥已經成了爛布敗絮，堆在一角，幾個人蓋一條棉被並不是稀罕的事。這……是猪窩狗窩？囚牢？！地獄？！哦！可憐的農民！

結論

在這世界經濟恐慌的大漩渦裏，各地都被不景氣的氛圍籠罩着，尤其波及到這工業落後的中國，更受到莫大打擊。阜平爲一彈丸山僻小邑，也跟着淪胥於萬劫不復之境。在從前較爲富有的，現已大抵宣告破產；中產之家也破落下去鬧得一無所有；至於佃農僱農更屬走頭無路。縣內原即毫無工業之可言，極少數的小手工業者和商人，也因了農村的凋敝，賠累不堪，日漸歇業倒閉下去，形成農村總崩潰。人們日處水深火熱之中，困苦哀號，輾轉呻吟，凄慘慘，陰森森，不啻人間地獄！中國人向來是「安土重遷」的，可是生活的鋼鞭無情地驅策着，使他們不能再株守故鄉，於是有一部分便逃荒他地另謀生路去了。我們只消看三年前調查還有十二萬餘人口，今日却只剩有九萬多，便可瞭然走去了若干人。今年外走的更多，恐怕人口還不足上數。唉！農村破產了！農村確已整個宣告破產！嚴重的農村問題，在今日已呈極端尖銳化，深盼從事農村改革者，注重事實切實研究癥結所在，設法救濟，是則馨香禱祝者矣。

一九三四，十一，三十日。

三　河北臨城縣農村概況

薛邨人

一　概觀

臨城位居太行東麓，爲古趙地。戰國時，屬中山；漢爲房子郡。雖歷史悠久，奈地處僻塞，人多不知。晚清以來，平漢路成，穿境南下；煤礦改用新法開採；於是在交通上，經濟上均能增加國人之注意！

本縣因近傍太行，境內山巒盤亘，土壤磽薄，東西長百里，南北袤五十，西南高而東北低，山崗之峽，有泜水斜貫，流沙百里，良田爲埋，盛夏之際，因地勢使然，若高屋建瓴，直洩東下；多雨之歲，恆汎濫成災；縣民苦之。然其沙灣河港，蘆葦叢生；農民採製席箔，尚可稍獲利潤，故泜水之於臨城，猶黃河之於中國，百害而只此一利。

本縣農產品，以小麥穀子等爲大宗。農產之外，如祁村之煤礦，及山川區之棗柿，均馳名華北，每年縣民收入頗鉅。至若賈村一帶之盌甕磁器，因創窰時短，尚無多大收益。而該區坩藏富而質佳，現正在經營之新窰已有十家之多；倘來日能集資努力，他年必有意外成績，定可成臨城致富之一大源泉！

至若風俗人情，吾人當記取漢書地理志有云：「趙中山地薄人衆，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臨城處中山而屬趙地，又何獨不然？近山區域，尤以儉稱，貧苦農家，日以糠菜爲食者，比比皆是。然晚近以來，交通便

利，奢風漸染，食之者衆，生之者寡；更以天災頻至，人禍連年；致今日農莊經濟日趨崩潰，破產者日有所聞。因而向之慷慨悲歌者，挺身走險，流爲匪盜；向之勤儉自持者，流爲礦工乞丐，岌岌焉不可終日。擧目鄉村，江河日下，令人不勝惴惴！

二　土地分配

臨城全縣可耕之田，僅三十五萬畝，佔全縣總面積百分之三十。其他則盡係石嶺沙灘，确磽不毛。可耕者之中，尚有山川區所謂之「掛地」，懸山坡上，其收穫之微，可想及矣！可灌溉者，只百分之一二。其他悉爲旱田；「靠天吃飯」乃臨城農村之整個現象。

耕田之分配，在臨城並無極度懸殊之情形，故無地主之形成，擁田五百畝以上者，可云絕無，大多數悉爲自耕農戶，即擁有較多田畝，專事出租者，實不多見，故臨城亦無佃戶之存在，所分別者，惟大農小農耳！然細分之，可列爲四等：種田百畝以上者，可謂之大農；大農中又可分之爲二：二百畝以上者曰一等大農，百畝以上者曰二等大農。種田三十畝以上者曰中農；五畝以上者曰小農，五畝以下乃至無一畝田者，可謂之無產農。

近年農村經濟恐慌，高利貸與大農之舊日稍有餘積者，因而漸成少數資本之有權者；小中農等，困於生活拮据，由負債而走向破產。於是一九三〇年後，農村中土地，雖然未十分顯着歸併，而確已呈現趨入集

中之一途。

農村中之一等大農，迄未增多其戶數；而其中擁有少數資本，貸款於中小農者，今日見其田畝增加，此種大農，佔全農戶百分之二。至若二等大農，及中農等，日漸衰落；因破產或負債，大半化爲小農或無產農。近五年來，二等大農戶數由百分之三，降至百分之一；中農由百分之六十五，減至百分之二十三；同時小農及無產農之戶數急劇增加，小農由百分之二十，增到百分之五十五；無產農由百分之六，增至百分十七，其變化期間，尤以一九三二年爲最烈。三五年中，耕田分配起偌大變化，可證其日趨集中之實際，然而此種情形，並未停止，尚日在邁進中。

述及此，吾人猶有不可不注意者，即自一九三四年後，近一年中，土地集中，在表面上，似乎稍事停止，揆其所以：不外一般大農，感到收買土地不但惹盜匪注目，且天災迭至，收穫難豐，遠不若放債，既不招搖，復可免去耕作憂勞，故近日雖田賤若贈，尚無人過問，然而究其實際，中小農之負債者，利息日加，賣田不得，積年累月之後，其全部田畝，不難爲貸利毒蛇盤剝以盡，鄉人有云：「賣買不夠人家的」正可表示此種田畝集中之潛伏勢力，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若調劑無方，前途不可問也。

三　農產及農產副業

臨城之農產物，與臨封各邑，無大差異；以穀，麥，豆，高糧，棉花等爲大宗。

全縣因土質磽薄，秋麥兼收之田，僅占百分之二十。大部分只收一季。東部以棉麥較多，中部以高粱穀豆較多，西部之種植棉花者，可云絕無僅有。種玉蜀黍及黍稷者較多。每年全縣收穫糧食，統計不過三十萬石；棉花二萬斤，以之活八萬縣民，每人每歲只合糧三石七斗有奇，棉花四兩。況夫捐稅繁重，什物價高，農民衣食自難豐裕。以上乃就豐年估計，一遇災歉，更屬不堪！

完成整個農產過程之主力軍，則為牲畜及幾件簡單農具。牲畜則牛驢騾馬均有；普通中等農戶，以牛為最多；大農始有飼騾馬力量。小農有獨飼一驢，或二三家合飼一牛或驢。農具則有車，耬，鋤，犂等物；因車價值百元之譜，中農以上者始有購置能力。其他各種大小農具，均千百年沿傳故物，無一物為新科學化之器械。至肥料，悉為糞草等之腐敗物，困於經濟，囿於積習；知採用新式人造肥料者極少。耕作方式，亦屬聖傳古方，毫無改進。

由於農產微薄，民生艱苦；故耕做之餘，不得不營副業，以彌補生活之不足。

縣境東部，各鄉婦女買紗織布，藉收蠅頭微利。出布最多者以山下解村一帶村莊，幾至無一婦女不終歲從事於此。全縣年銷土布，雖無精確調查，大約總在五十萬疋以上。其銷處有二：向東者聚鎮內柏鄉，逕走張北，向西者，除本縣山川區銷納一部分外，多數越嶺赴晉。

沿滏水村莊，因葦產以製席箔；運銷趙縣柏鄉等地；年可萬餘條。獲利亦屬可觀。

中部以木材著稱，大凡楊柳椿楡，無不具備；喬木伐爲樑棟，銷東南各縣。曲弱者，售於礦局爲支柱。本縣鴨鴿營乃木材聚散場所。該處資本五萬元以上之木廠，雖際此百業蕭條之際，尚有七家之多。

西北部，農家多飼羊羣，以收繁衍之利。由羊經紀代銷於東北各縣。每隻羊均以四元論，每羣百隻，即值四百元，除却人工食料，攫利當得其半。全縣飼羊，以八十羣計，每歲進益，亦大可裨補農村！

西部及西南一帶，盛產棗柿，紅棗年產二百萬斤，運銷津門；柿年產三千馱，東走寧普，南運任縣。此二者，每年穫利之厚，約六萬餘。是故，西部一中農人家，每歲售棗柿之收入，常在六十元以上。

至於養鷄餵猪，更屬普遍。平均每二戶有猪一口，每戶養鷄三隻。詎以近年農產物價格暴落，各物銷路不暢，物難易錢。向之賴紡織換油鹽者，今徒負布市頭，待終日而無人問津。羊無銷路，宰肉送親，取皮毛以求本銀者，亦不乏人。以柿堆腐肥料，把紅棗以飼豬豕，大好天產，購買無人，付之糞畜，良可慨也。今步入中部，稚林不蔭，較之往時蓊鬱蔓林，顯現窮困情景。

農產不足，副產衰頹，民之困也，宜矣！

四　經濟現狀

一九三二年，秋後，臨城農產品價格暴跌，麥穀等糧，均跌落三分之二。一時農民相率叫苦，地價亦因之跌價一半。經濟驟感恐慌，如水絕源，全縣整個鄉村，到處嚷窮。

但農民之負擔，並不因經濟窮困，少事減輕。苛捐雜稅，仍層出不絕。雖於近日廢去葦，布，草，猪肉，羊肉，棉花等六項捐稅，然杯水車薪，何濟於事？僅就目下仍行存在之捐稅言，尚有念種之多：（一）烟酒稅，年包六百五十元，（二）營業稅，年收百元，（三）斗捐，年收二百五十元，（四）牲畜正稅，年收三千五百元，（五）牲畜附加，年包一千七百元，（六）屠宰正稅，年包二千二百元，（七）屠宰附加，年包九百元，（八）牲畜經紀捐，年徵五百元，（九）地畝捐，年徵五千一百八十元，（十）砟捐，年徵五百元，（十一）炭捐，年收一千元，（十二）戲捐，年收二百元，（十三）木廠捐，年收二百元，（十四）商捐，年收七百五十元，（十五）棗捐，年包八百元，（十六）柿子捐，年包三百元，（十七）田產稅契二分牙佣，年收一千二百元，（十八）田產典契中佣，年收二百五十元，（十九）狀紙附加，年進百五十元，（二十）稅契正稅及附稅，年收六千元，此外如田賦年徵二萬四千元，區款，團款，檢定所派款，亦在萬元以上。再者全縣各鄉共有初級小學九十處，每所以每年經費二百元計，年需一萬九千元許。

上述各項捐稅派款，有直接徵收於農民者，有間接徵收於民者。鄉有諺云：「羊毛出於羊身上，」無論其名目若何，農民出錢，其理一也！況夫前年牲畜屠宰等稅，由一般奸商承包，只圖本身利益，不顧民生疾苦，竟自行爭嚷，抬高包價，牲畜稅竟高至年包二萬餘元。凡由商承包之稅，除納給官方外，自然稅商亦有利可圖，於此，可想見民衆所担負者，豈只官方所計之數？

農民負重入微，虧累自屬意中。加以年來農民所用之輸入品，却與糧價作反比例而高漲，日用之必須品，如煤油火柴食鹽洋線，以及其他一切自外輸入物品，無不逐日漲價，陷農民於益加貧困中。

農民點金無術，告借無門，高利貸應運而生！城鎮附近，貸款百元以上者，尚可享老三分之優渥；非有特別信用及情面者，勢難以月息二分貸款，稽之鄉中，一二十元之貸款，多係五分；而貸款者，猶恐事生意外，故於貸款上，只書二分或三分，俗曰「明三暗二」，十元以下者，多係大加一。年來花樣翻新，又有所謂六頂十，或七頂十者；即貸時六元算十元，另外行息，更有倒下文契，即將某一時間之利息，五分或大加一，預先算入本銀之中，另外行息；屆所預算之期，本利未克清還者，以所質之產業沒收。故高利貸愈使農民經濟破產尖銳化，一般農民，明知其酷，而不得不屈服於其下，飲鴆止渴，此之謂也。

地價與農產物價愈跌落，則民生愈困，民生愈困，則高利貸愈烈，高利貸愈烈，則民生愈困，兩者互為因果，農村遂日以破產。全縣區區二百小村，客歲破產之中農已有四十餘戶，延而久之，伊於胡底？述及此，筆者不禁慄然！

一九三五，五，二十五日。

四　農村破產聲中冀南一個繁榮的村莊

——花生小鹽生產的商品化形成十五年來畸形發展的基礎——

紀　彬

一　地理條件的特殊性

自然，我相信十五年來（一九二〇——一九三五）我村在全國農村破產浪潮中一帆風順的走上了畸形的經濟繁榮的境界，不能單由地理條件的特殊性來說明；但我尤其相信：設我村無此特殊的地理條件，恐亦不會有此十五年的畸形繁榮。所以我把本文的第一節來敍述我村的地理條件。

我村在河北省南端濮陽縣轄境的北隅。東南距縣城五十里；西南至滑縣及道口各七十里；西至安陽百里；東北至內黃縣四十五里；恰在直豫兩省的濮陽滑縣內黃三縣的交岔點上。來自河南滑縣屬境的硝河，好像一把扇子一樣迴繞着我村的東北兩面。該河長四十餘里，寬五里，除夏季雨水外無其他水源，故春季常乾。河正中約一里寬生蘆葦，乃村民燃料及織蓆原料的出產地，此爲有主之田，每年五分納糧（即二畝納銀糧一畝。）葦地兩旁的河身，佔全河面積三分之二以上，自古爲無主荒田，因鹽鹼性過大，向不耕種。

村東南正南及西南三面皆是沙地，相傳爲明朝某王的馬場，幾無銀糧（往往數十畝地每年只納丁銀三二角；）清初之際，修成棗樹林，土嶺起伏，草木叢茂，絕不似直南平原地帶，遼望無阻，遙立村外，雞犬之

聲相聞，但不見人烟何處。再遠則爲黃河故道，一片流沙，但生茅草，佔全村耕地十倍以上，亦均爲無主的荒田。

村西爲青沙地質，生產力較高，乃村民的穀倉。

全村耕地約六十頃，人口共三百戶，約兩千人，父老相傳爲明燕王時代自山西洪洞縣遷來。所有任其開墾的荒地，竟佔現存耕地二十倍以上，此實十五年來我村經濟畸形繁榮的自然基礎。

二　花生栽培的普及與其前途發展的暗礁

我村耕地多沙質，本宜栽培花生。但在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以前，栽培花生的人家，全村不過兩三戶，爲地不過三數畝；且多爲小手工業者小商人在小塊地內或道旁田角，偶然種植；其目的完全在於炒熟零賣或自行榨油，於附近三數里內，挑擔推車，換取日用物品。至地主小規模的培植，榨油自用，實絕無而僅有。

及民國九年而後，花生油忽成爲國際商品，花生價格逐由每斤制錢二十四文漸漲至銀元九分，而以賣爲目的的商品化的花生栽培，亦普及於我村。上自地主富農，下至中小貧農，平均都以二分之一左右的耕地，栽培花生。

因花生栽培的發達，我村遂產生兩種新的經濟組織。第一爲花生收買行，第二爲榨油作房。前者爲商

業性質，後者爲工業性質，這是很明白的。但其出現的先後與意義，亦各自不同，玆分別說明如次：

民國十一二年間，我村尙無花生事業之組織，此時期的買賣行爲，率由官許乾果經紀人辦理，此等人全村共三四名，皆貧困游蕩分子，說合於商人地主之間，少獲佣錢以度日。十二年以後，花生買賣漸多，乃暫借本村糧行雜貨舖，爲交易地點；遂有花生行之名。但此時之花生行，純爲介紹說合機關，尙無榨取性質可言。十四年後，改由地主經營，一方於秋末冬初賤價收買附近中小貧農的花生；一方包攬官稅從中取利；待春夏之交，高價整批賣於外來商人。前此的經紀人，或淪爲雇員，或擯於門牆之外；自十五年至現在，所有前期中小資本的花生行，盡行消滅，全村只剩了兩個。這兩個都有殷實地主出資，連同小股東及雇員，總在十數人以上。附近十數方里內的貧家生產，幾乎都被吸收，每年獲利均在千元上下。

榨油作坊，以前多爲小手工業貧民所經營，及花生行成立於十四年後，遂改爲與花生行有血緣關係之組織。即花生行收買之花生，不直接出賣，自行壓榨成油，運送大名道口等地，轉由天津濟南輸出海外。近來我村的兩家作坊，都是花生收買事業的領袖，前此之榨油業主，或歇業拍賣工具，或爲雇工，他們的事業，盡被地主，紳士，及知識份子所包辦了。

此外，因花生栽培，村中貧苦人家，多進行開墾黃河故道中的無主沙田，其法爲：先於周圍種植灌木類的樹木，以防沙土隨風漂流。不三數年，灌木叢起，略施肥料，即可栽培，每畝約產乾花生四五十斤。且銀糧極

經，常有數百畝之家，每年稅額不及數元。年來因此致富者，計十餘家。有十年前的貧農今則樓房矗立，騾馬俱全，儼然富翁，多得力於此。玆將自一九二〇至一九三五年來我村花生栽培發展概況表列如左：

項目	一九二〇	一九三五
每斤價格	〇·〇一六五元	〇·〇六五元
栽培戶數	三戶	三〇〇戶
栽培面積	五畝	三〇〇〇畝
交換範圍	本村及附近各村三數里內	由大名道口等地，經天津輸出海外
交換方式	個人推車換油或擺籃零賣	各家合組商行大批運送
榨油主人	貧民小手工業者	地主，紳士知識份子
油業經營	經營者卽生產者與業主	經營者爲小股東及雇員，業主坐享其利，生產者與油業分離

觀上表可知，十年來花生價格增加三·九倍强，栽培戶數增加百倍，面積增加六百倍，交換範圍由地方性變爲國際性，榨油已由貧民轉入富戶獨占，而油業經營的變動，更可看出由自給轉化爲營利性的過程。

花生業既有如此巨大的發展，故每值冬春，附近十里內外的中小貧農，及遠來商客，熙來攘往，充斥街

衢。冷落的農村，完全變成了縣鎮風光。

我村花生生產，既建築在國際商場上，故隨世界經濟的不景氣，花生價格已由每斤大洋九分降至六分五；而中小貧農所提出的價格更在三四分左右。價格愈動搖，貧民愈急於賣却其商品，再加以收買家的操縱，而吃虧更巨。且近來每次政治上的動亂，都影響到我村花生價格的低落；其結果，總是中小貧農家的生產者大受損失，收買家乘機發財。故此等暗礁不除，我村花生生產，不獨無更形發展的可能，只有日趨凋弊。

三　小鹽製造的發展與土城生產的消滅

民國九年以前，我村硝河坡中蘆葦而外的副產物爲土城，城場星羅棋佈，間有茅房五三，均爲製城人食宿之所，每年出產的土城或由村中地主收買，行銷遠方；或由製造人推擔零售，雲游道口大名南宮邯鄲一帶；供給舊式染房及磨房之用。嗣因洋城侵入，價廉而質純，用土城者已去其大半；同時，大鹽價格日高，破產的農家食用不起，乃改用小鹽。故自民九以來，伴隨小鹽製造的發展而日趨衰落；至今鹽場已完全代替城場，城民全數變成了鹽民；製城者舉村無一家，製鹽者却在二百八十戶以上（即全村戶數百分之九三强。）

近數年來，我村小鹽製造業，雖極發達；但亦非突然而來。其主要動因，爲官鹽價過高，前已略述。其發達

過程，可分爲三個時期，茲分別說明如左：

一九二〇年以前爲第一期。此時期的小鹽業，純爲村中赤貧失業期間的副業。他們的勞力無處出賣，同時又被安土重遷的觀念所支配，不欲逃荒出外，往往擇硝河坡中的荒地，小規模的製造小鹽，行走零售，藉以餬口。當時每斤價格在制錢十二文上下（合當時洋價一分不足）往往不克溫飽，僅免餓死。全村的鹽民，頂多不過三五家。

自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七爲第二期。此時期的小鹽業，爲中小農家的主要生產部門。小鹽每斤價格漲至銅元三十枚上下（合當時洋六分，較前增加六倍）而一般農民爲經濟計，除待客過節外，餘均不食大鹽。中小貧農見有利可圖，皆以製小鹽爲業。土地是自佔的無主荒田，且無捐稅的負擔；而製鹽所費的資本，又極輕微：除糧食外，不過水筒一兩對，鐵鍬三數把，一兩個土筐，數十斤石灰，總計甫及數元；而每年所賣鹽價，竟有達二三百元者。當時村中流氓——鹽經紀與外來販鹽，雖以聯合戰線，用大秤（每斤合市秤三至五斤）賤價剝削，而因製鹽致富的，仍在三十戶以上。他們或購田建房，或轉營他業，均已家給人足。同時因捐稅過重（北伐前我村耕田每畝合稅捐一元左右）土匪蠭起，中小地主多以葦田爲累（葦田爲我村銀糧頂重的，）樂於賣却，此時期葦田轉賣給鹽民者，約四分之一。大有改葦田爲鹽場之勢。「貧變富，富變貧，世事顛倒千口村。」這是我村當時的歌謠，故此時期，周圍農村的社會秩序大亂，匪亂不可收拾，而我村

夏秋之際，竟無盜割麥禾的小偷。

自一九二七年至現在，爲第三期。此時期的小鹽業，已變成了富農地主的專賣營利事業。一九二六年前後，新舊富農地主，興起一種計畫，以自己葦地爲標準，非法延長，强指地契外，幷無主鹽田爲自己所有，一時貧富之間，頗有爭議。一九二七以後，貧方完全失敗。故現在的製鹽主人，多數雖仍爲中小貧農，而地主富農已實行參與今日鹽業中的雇工及佃田人，約占全鹽民二分之一。地主富農營業之方式有三，茲述之如次：

A. 以鹽地及資本，施行雇工佃田制，坐獲大量小鹽。

B. 先期貸糧換鹽法——造鹽期爲春季，此時中小貧農正乏糧食，而糧價亦正高，無力以現金糴買，往往依最高價格先期貸地主富農的糧食，而以製成之鹽，賤價換取糧食。

C. 實行收買賤鹽或放高利貸。貧苦鹽民，迫於生活需要，多無力待高價時期出賣小鹽，而臨時賤價賣與富農地主。近來富人合股收買小鹽之組織（或名鹽行或名窩壓）日益發達。賤價屯積起來，待時出售於內黃，湯陰，安陽，臨彰等縣屬境。每年獲利均在一倍以上。其貸借利率，亦多在月利三分四分左右。

據此可知我村鹽業，雖興盛之勢未減，但從其性質上觀察，已大非昔比。因前此的鹽業，使生產羣衆衣

煖食飽安，定了農村的社會秩序；現在的鹽業，利益歸少數人所獨佔，恐其客觀作用，已無補於農村破產的危機。如果將十五年我村小鹽製造的發達，簡括起來，當如下表：

項目	鹽民成分	鹽民所佔全戶%	鹽業性質	鹽業的社會機能	鹽價	鹽地所有權
第一期 一九二〇以前	赤貧及貧農	百分之一	失業及閒暇期間的副業	使少數赤貧不餓死於故鄉	大洋一分以上	無主荒田
第二期 一九二〇—一九二七年	中小貧農	百分之八十五	農村的主要生產部門	使生產羣衆家人足穩定農村治安	大洋七分左右	貧富爭奪鹽地所有權
第三期 一九二七—一九三五年	地主富農及全部中小貧農	百分之九十三強	富農地主專賣營利的事業	少數人獲利，促進中小農民破產，加重農村危機	大洋五六分左右	鹽地歸有產者非法獨佔

四　棉花栽培的消滅，棗業發達的中止，與五谷產量的銳減

一九二〇年以前，商品經濟的傾向我村尚不甚發達。全部耕地，均依各家經年的需要而種植谷物及棉花蕃薯等作物。大概近村周圍的耕地約十頃許，因便於看守及婦女往返，多種植棉花。一九二〇年以後，因花生栽培盛行，棉田漸減，距今三四年前已完全消滅。衣料的來源，以前均取給於成安臨漳一帶的棉花，自行紡織，繼而購用安陽紗廠的棉線，今則多直接購買洋布，僅事裁做。至蕃薯則因與花生收穫期衝突，亦廢棄不種。

我村從明末修成遍地棗園，每戶年收三十至二三百袋不等；向由清化道口等地售往江南。冬末春初，

貧民推車出外賣棗，經月不歸，相演成風。富人大批赴漢口賣棗者，亦頗不少。近因花生栽培盛行，在家有利可圖，均將所有之棗交由本村乾菓行（即花生行鹽行所兼營）代售，誰也不出外自售了。同時又因棗樹生長過慢，得利多在五年之後，故新開墾的花生地周圍，亦不多種棗樹，而慣以檉柳等灌木代之，以便防風壞田。故近年以來，雖仍有滑縣等處商人來我村買棗，棗之產量因經營不足，十年來實無多大發展。

五穀類的種植，因花生栽培之故，減少二分之一。例如麥子一九二〇年以前所佔耕地面積約有二分之一以上，今則退爲四分之一不足；其他穀類，亦由二分之一，降至四分之一。因我村地多沙質，上好耕地種穀類每年所得不過五六元，種花生則獲利九元以上。中等沙地種穀類年獲一二元，種花生則有三元餘。至下等沙地，因穀類不生，久成無主荒田，今稍加人工，種花生即可得利二元以上。故十五年來，我村糧食已由有餘變爲不足，從前的糧店大部分或全部分都改成了花生行與鹽行。所以尙留二分之一的土地仍種五穀的原因有二：（一）農民在觀念上絕不願自己成爲食糧購買者，爲保持其只賣花生不買糧食的地位，多自動留耕地之一部，專種五穀。（二）我村之西面及近村一帶耕地，爲「青沙」地，土質不如「黃沙」地疏鬆，栽培花生，收穫時所費人工太大。（黃沙地但拔花生秧，花生果即隨秧出土；青沙地則多遺於土中，必須拔秧後，平均起土五寸左右，用鐵篩取出。而土質經篩濾後，變爲細粒，同時此等地帶又平坦無樹，春風一起，則土即漂流以去，俗語名「跑風，」而耕地即壞；因此亦不得不仍種五穀。）

五　勞動力不足與牲畜業的變遷

一九二〇年以前，我村與普通農村一樣，表現勞動力過剩。貧苦分子，或逃荒於山西及察綏等地，或走入軍隊。近十五年來因花生及製鹽事業發達，多重返故里，永未出外，或墾荒，或製鹽，利益均勝於佃農及雇工數倍，故地主及富農的傭工每年多至百餘人，皆雇自外村，而本村人絕少（至多不及十分一）且多與地主有親戚關係者，除工價外，尚有許多其他之報酬；且彼等多半係殘廢份子。

硝河坡及黃河故道，向富水草，為自然牧場。夏秋之交，村人多購瘦弱老小牲口，牧畜養肥，秋後種麥時節，赴市出售，獲利一倍二倍不等。從前畜牧者成人佔百分之五十以上，近因花生及製鹽事業忙迫，完全讓兒童擔任；只有少數老人無力操勞，仍與兒童共事牧畜。年來夕陽落山的時候，雖仍有成百的驢牛騾馬，但牧人早由壯丁變成了十五歲以下的兒童。

六　商人階級掌握村政

一九二〇年以前，我村村政完全握於舊式知識分子，家族長及一小部份地主的手中。那時候的商人，都是貧民，且總計不過十人，沒有什麼社會地位。後因商品經濟發展，所有地主富農及知識份子，都變成了花生及小鹽業的真實主人（其不營商業者都因貧困化喪失了固有權威，故現在的村長佐，里排長，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花生行，棗行鹽行的東家，小股東及經紀人）他們一方面是村政管理者，同時又是花生，

棗鹽的收買者，放款人與糧食出賣者。故我村近年以來的政治中心，已經由秀才舉人及家族長的宅第，轉移到地主商人及高利貸者所組織的三位一體的商店之中。

七　不可避免的破產危機已迫在眉睫

商品經濟發展的浪潮，使花生及小鹽成了交換的主要商品，而黃河故道中的荒沙與硝河坡中的鹽鹹不毛之地，也從貧困的根源變成了富庶的有力條件。但自一九二七年以後，鹽地被有產者所獨占，而花生及小鹽的專買機關與榨油事業，又被富農地主所壟斷，大批生產羣衆，已無繼續獲利之可能。故今後即無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恐怕也不能在滿足大多數經濟利益的原則上繼續發展了。同時商品發達的結果，提高了農民消費慾望。許多農民——幾乎是青年農民的全部，都有了吸紙烟及賭博的習慣，且大有非洋布不穿之勢。婦女們——中年以下穿新式洋襪者幾佔百分之五十以上。買飯度日的人們，約有五百左右（佔全人口六分之一，）另方面伴隨着商品生產發達而產生了一批所謂「經紀人」的消費份子，四季不事生產，專從賣買商品中攫得佣錢而生活。此等人近有三十名以上；青年農民受其引誘，漸趨於游手好閒者近三百人。因此，質樸之風俗大壞，流風漸趨淫蕩。更加世界市場的不景氣與政治上的不穩定，各種農產品的價格非常動搖，（往往有一倍以上的漲落，）故近二年來入不敷出的家庭已達百分之三十左右（約百戶）除三兩家商品專賣及高利貸者外，幾無不日趨貧困化。例如因無力買煤油而又用花生油點

燈的風氣已逐漸普及，然而揮霍之習，却絲毫不改。所以我敢斷定，我村畸形的經濟繁榮，已至末期，在不遠的將來，便要和華北一般農村同踏入破產的前途。

一九三五，八，十七日。

五　破產聲中的一個冀南農村

郭異之

我的故鄉，是冀南廣宗縣一個偏僻的農村，——件只鎮，往東三五里，是一條南北大沙河，裏邊完全培植果樹；每逢果實掛了，天津的客商，即來下鄉收買，所以有時他們很富裕，如果遇着天災，他們便少一筆很大的收入。村西北南三面，都是平原，沒有山也沒有水，完全靠天吃飯，假使天不下雨，他們生活的艱難，就可想而知了。下邊分幾項來說：

一　社會狀況的一般

全村有五〇一戶，只有七家經商，其餘純係務農，民國五年以後，年年豐收，衣食住都不成問題，社會秩序，也很穩定。民國九年大旱，秋麥都未收穫，農民叫苦連天，流亡載道，地價低落，每畝自五元至七元，家具櫃箱，更是無人過問，穀價却貴到每元三升（二十筒斗）同時土匪四起，中產以上的人家，因夜間防匪，精神缺乏，而吸食金丹者，所在多有。這種毒品的侵入，遂造成近十餘年農村破產的因素。

就農民每戶人數之分配看，大家庭很少，中等家庭居多，二十口以上的人家，已甚寥寥。據我們的調查，全村有三千五百餘人，每家平均不過七口，中國自古所引為美談的大家庭，已經漸次崩潰。至於人口間兩性的分配，女多男少，年少的人多，中年人少；女人在十五歲以上者，多行纏足。全村能從事於勞苦操作者，不

過千人而已。且男人不如女人活的年歲高，所以消費者多。

二　經濟狀況

我村當帝國主義經濟勢力未侵入之前，農村經濟也經過幾度變更，光緒末年，當地因年景饑荒，不堪納稅，與官軍衝突，壯年人多被屠殺，常言道：「大兵之後，必有荒年。」當年夏季，瘟疫流行，又死了一些人。經濟狀況因之有一度的轉變。民國以來，又經荒年一次，瘟疫一次，村中又是一度犧牲。在這種情形之下，無地或地少而不能維持生活的小農窮農，開始尋找新的出路，當時有兩條路可走：一是經商，二爲離村。凡土地短少的人家，如果人口也少，壯年人不能脫離家庭，只得在家從事商業手工業；人口多者，就跑到東三省地方去作苦工去開墾。他們飽受了貧寒的壓迫，大半多能克苦耐勞，節省儉用，每年每人竟有一百多元的剩餘，到了臘月，便匯回家鄉。這樣一來，村中經濟，頗現活躍。因之往關外去的日多。每逢正月三，六，九的日子，總有一些人出外去，到了秋麥急忙之際，連找人工也起恐慌。

他們在關外種地，自備農具；三年不納租稅。關外的收成，多半是大豆和玉蜀黍，玉蜀黍是自給，大豆多銷售到外國。自中俄事變起，豆價低落，二十元一石的降至十元（二十筒斗）不過還可以維持，迨至九一八以後，他們都被趕回來，紛紛失業，村中立刻起了很大的影響。同時，經營商業的手工業者：或以本小利微，或受高利貸的剝削，漸漸歸於破產。能夠補助金融者，只有小麥及花生，其他穀類，多係自給，所以小麥及花

生價格的昇降，大有關係。茲將十年來麥價及花生價述之如下：

年份	小麥每石之價	花生每百斤之價
十四年	一八·八元	四——五元
十五年	一八·四元	四·五元
十六年	一七·四元	四·五元
十七年	一六·〇五	四·五元
十八年	一六·〇元	四·三元
十九年	一七·五元	四·五元
二十年	一七·五元	三·六元
二十一年	一七·〇元	三·五元
二十二年	一三·〇元	二·五元
二十三年	九·〇元	一·六元
二十四年春	一二·五元	三·〇元

以上的價格，都是每年的通常價格，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在二十一年以前麥價及花生價，差異甚少，

經濟狀況是穩定的。二十二年以後，價格忽然降低，幾乎相差一半，其他農產品也同樣落價，以後釀成穀賤傷農的現象，農民就在這種動盪中生活着。

三 土地的分配狀況

大體上說，因家庭析產制及其他原因，村中尚沒有什麼特號的大地主；百畝以上者不過十八家，五十至一百畝者不過四十家，二十畝以下的小農却占三百二十三家。二十畝以下的佔總戶數百分之七十六，而所佔的田畝是百分之二十二；百畝以上的佔總戶數之百分三・六，而所佔畝數爲百分之二一。換句話說，這十八家所有的畝數幾乎等於三二三家所有的地畝數。分配的不平，可以想見了。

四 農民生活

我們由上面土地分配的狀況中，可以想像出中小農生活的概況來。

大概十畝地以下者自己多養不起牲口，有的借牲口來耕種，以收穫的草爲報酬，有兩三家共餵一口。所種植的穀類，以穀子高粱爲最多，俗稱粗糧；又種瓜菜，當舊曆五六月之交，便吃北瓜和豆莢子，以代替粗糧。麥子不過二三畝，割倒麥子，種甘藷蘿蔔，在冬天裏可以代替粗糧；有的種玉蜀黍，也可當高粱吃。能够一年溫飽，已經是很幸福的了。

中農大農種田雖比較多，然大半人口較多，或使用雇工，負担亦較大，所以在生活的享受上並不比小

農好多少。小農生活比較簡單，社會關係亦比較淡薄，所以比較也容易維持。大農中農就不然了：一方面需要支撐門面，一方面又無特別生財之道，所以有時反不如一般小農。

百畝以上的富農，多半是農村的高利貸者或商業資本家。一方面用賤價收買農產品，一方面以年利二分或三分的高利率剝削一般中小農。他們是村中金融操持者，村中政權的掌握者，自然要享受比較優越的生活日子。

以上各等人家的耕種方式，大體上都是二年三種，三年四種，或四年五種的；一年兩種的很少；富家種的次數比較少；據農家的經驗，麥子留種二年比較好；普通的地五六年必留麥一次；因爲一種麥子，每年要犁三次——一在夏至，一在中伏，一在處暑——那些宿根草，都被剷除，以便種秋。

種植方面多半都是依賴自然，所以一遇水旱天災或蟲害，就不能過活。使用的農具，施肥的方法，又是因襲幾千年來的舊方法，不知改良，所以生產力特別低；平均每畝可以產穀五斗，麥子四斗——五斗，高粱及其他五斗，花生二百餘斤。卽在豐年的生產，普通人家除了消費外，亦少剩餘；如果地畝過少，或租佃地主的地，或遇有什麼天災，勢必賣地或舉債，現在舉一個種田三十畝左右的自耕農的例子，我們可以知道一般農民收支的大概：

麥子可收穫三石至四石，穀子高粱共六石，其他的糧食一石或兩石，花生七八百至一千斤。每年麥種

二斗或三斗，過年節，會戲，中秋節………需要麥子五六斗；如果收穫四石，可賣三石，按今年的價格，可賣三十六元，花生每畝需要種子十五斤左右，種四畝需要六十斤，每年四、五畝花生，可收穫七八百斤，以去年計算還不到二十元。所花費的差糧五至七元，肥料費三十元左右（約計）人情來往不下一二十元，油鹽醬醋至少也需五元，假使他是五六口之家，已很困難了，八口之家更要艱苦。這是關於農民生活的大概情形。

五　教育狀況

我村的教育，在當地比較起來，還不算落伍。有男校兩座，女校一座，男學生一百人上下，女學生有四十餘人；現在失學者：男兒童佔一半，女兒童佔四分之三有奇。在科舉時代，有私塾四五座，每年入學者不下百餘人。迨至科舉制廢除後，新學制成立，有高級初級小學各一，高級四十人，初級百餘人，高級校長教員各一，初級教員二。校址是廟院，以白布遮蔽神像，後來因經濟不給，高級一班就停止了。當時入高級者：有一半是本村人，其餘是附近村莊的人，至多不過十里路。本村的人，家裏吃飯，家裏睡覺，吃高粱及糠菜的都能入學；外村的學生，有的在親戚家吃飯住宿，有的早晨來晚上走，拿的飫飫，在學裏熱熱，再喝口熱水。學校裏只有一位校工，作飯搖鈴都是他。

自從高小停辦以後，五十畝以下者很少有入高小的了。那些聰明貧苦的學生，就此埋沒，因為有些人家為一元的學費而棄學，有的為買教科書而棄學。他們說：『七八歲的小孩，春冬天可以打柴，夏秋天可以

割青草，可以作飯，可以養牛上學就不能作飯，不能養牛，只說將來做官「可是遠井不趕近渴，現有現不作難。」女孩一到六七歲，可以照顧小孩，省下她母親許多麻煩，她母親可以安然作衣服作飯；……』在這些環境中，那一般男女的小朋友，都拋棄了他們求學的機會了。

其次再說高小畢業生的出路，入中學年需一百五十元，二百畝以上者，才可入一人，過二百畝的人家非常的少，因此入中學者亦很少；前二年有地五十畝者，還可以入師範，現在連這條路也斷了！

六　總結

總之：現在鄉村的破產，一天急迫一天，尤其是近二年，農民的衣、食、住都成了問題，所以影響到一切上層建設，尤其是地方教育，更是不堪言狀。願一般教育家們，不要只在理論上討論些這種制度，那樣方法，應該看農村是什麼樣情形，農民過什麼樣生活，應該用什麼方法來補救，這是作者做這篇調查的動機。

一九三五，八，三十一日

六　山東萊蕪縣農村實況

王毓銓

一　本縣之特點及一般的狀況

山東萊邑並不是一個很富庶的區域，而且在交通上也不算得方便。縣的四圍，羣山環繞，可稱作耕地的也不過佔全縣面積十分之六七，而且耕地裏山陵高地還佔二分之一。比較以肥沃稱的，有汶南區，魯西區域等（萊蕪全縣分十區）比較瘠薄的，如石碼區，顏莊區等。而此肥沃與瘠薄之分，也不是絕對的，瘠薄中也有的是比較好的，肥沃中也有比較壞的，實際上兩者多有間雜，以上所述，也不過是大致的情形而已。

交通方面，也不甚便利。萊蕪城，西距津浦路的泰安車站，一百一十里，北距膠濟鐵路支線淄博線的博山車站九十里，且山路崎嶇還不如西去方便。民國十七年孫良誠主山東時，始修泰萊汽車路，以便交通。前兩年汽車尚通，但近因生意蕭條，停止開駛，蓋因車價甚貴，一般農民多無資乘坐，至於貨物出口，客商也覺得不如用小車搬運，較爲低廉，且萊蕪土貨出口多北運博山，藉膠濟路以達海口，西去的路就少走了，所以當時的交通，建設就短命而亡了。韓復榘繼主魯，又大修馬路，裝置電話。泰萊間且有直達長途電話，其建設目的，固非爲農村設想，而農產物之搬運，却也沾了點小光。

本縣農民，處於閉塞的環境中，既無很肥沃之地和改良的生產手段，又乏其他有利的副業，遂養成了

吃苦耐勞的性質。終年，以過度的勤勞，以貧乏的營養，來維持農村經濟的生命。其耕種之講求，種植之細謹，恐他縣無出其右者。除穀物食料之栽培外，多營商品生產——薑，麻，花生等，桑蠶副業亦甚重要。

但終因本縣農村的貧乏，遂致上述「集約的經營」變作了「掠奪的經營」一方面用過度的勞動力，他方面則盡量掠奪地力，這種經營方法，在目前農村經濟恐慌時節，更加重了恐慌的程度。

在土地利用方面，確是小農占居優勢，像東三省的大經營方式，在本縣很少看到。據我所知，百畝至二百畝（本縣田畝一畝合官畝四畝）的大地主，百農場中最多也不過有一二。四十畝（合官畝一百六十畝）至五十畝（合官畝二百畝）者就比較多，而十畝（合官畝四十畝）至三十畝（合官畝一百二十畝）就更多了，然而以農場的數目而論，大概還是以五畝至十畝，以及五畝以下的小農或貧農佔居最多數。在鄉村裏，只有一二分地的農戶家，在人口的數目上，恐怕又算最多的吧。

就一般的情形，把農場面積和數目的估計數，約當如下：耕地百畝左右者，約占農家百分之一或二，五十畝至八十畝者占百分之十，二十畝至五十畝者約百分之十五，五畝至二十畝者占百分之二十，五十畝以下約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　土地之經營及農民之分化

以全國而論，北方小農經營多於南方，萊蕪縣，在這小農經營佔優勢的山東省中，也是一個最能代表

該省特徵縣份，而且就它自身說，它也很難走上大經營發展的道路的。普通都把二十五畝（官畝）以下的農場稱爲小農五畝地以下的爲貧農三十畝以上爲中農數百畝以上的爲大農（地主。）萊蕪則凡是有地百畝的地主，本身皆已脫離開了農業的經營，他可以以其積蓄在都市裏做寓公生活，或從事銀行錢莊酒油坊各業，即使他們不離開本土，也是呆在防禦完備的「寨」裏（萊蕪通俗，凡大鎮或鄉地主所在，地皆築有「土寨」以防土匪）過他的悠閒生活。二則他的農場，皆僱傭勞動者（長工，短工等）經營，在許多長工之中任一指揮者，略似西洋之 Steward，他本人對於農事，毫不過問，甚或無能過問，我的外祖家便是這樣的。

凡有土地五畝以下者，情形便不同了。萊蕪的人口，可稱稠密，平均每家約五六口人左右，依此推論，五畝之家，每人還攤不得一畝地，終歲勞苦所得，除了田賦，田賦附加，地方攤派，以及其他苛捐雜稅以外，所餘簡直不能自給。在這裏可惜我不能把五畝之家的家計拿具體的數字表示出來，但我可拿我的家庭來作個實證。我的家庭，現有地十畝（合官畝四十畝）人七口，每人佔地一畝多，然而歲入尙不敷支出。我的學費家庭全不負擔，而負債尙有四百元左右之多。以此而論，五畝之家的農戶，其窮困情形便更可想而知了。所以此等農家除以自己的家庭勞動耕種自己的所有地以外，不得不於秋麥二季去從事「短工」的工作，取得些微工資，或經營其他農家副業，如養蠶，織布，賣菜，打鐵，木匠，泥水匠，石匠，……有的則在自己所有

的較肥沃土地上，投下較多的資本（自然是以利息借來的，）經營商品生產，希望得到更大的收入；然而，即使所望能實現，那也不過以過度勞動，缺乏營養，以及掠奪耕種上得來的。

至於有一二畝或一二分地的貧農，或一無所有的農民無產階級，便不得不出賣其勞動力為工銀勞動者。「長工」「短工」的勞動，或佃農生活便成他們生活的唯一大路。

以上所述，還是過去的情形。目前說來，又發生了許多不同，在這裏我想說一說農村破產與農民分化的情況。

世界農業恐慌發生後，很快的動搖了中國的農村，這種情形，最明顯是表現在穀物價格與地價跌落上面。穀物跌價，地主自然也受到相當的損失，不過他趁此機會，可從事土地的收買，完成土地集中的過程。在恐慌中遭受了最大的威脅的便是中農以下的農民層。農作物價格跌落，富農與自耕農的收入銳減，這是自然的事。尤其是萊蕪的出口商品——薑，麻，花生等——的經營，一半操在他們手裏，今因世界經濟恐慌，薑麻出口激減過半，因之價格亦猛烈慘落。在這兩種情形之下，中農為支持自己的家庭，供國家及地方的稅捐，所以他們也不得不乞助於銀行錢莊及商人高利貸者之門。

至於半自耕農或貧農，那更不必說，情形是倍加凄慘了，從前他們還可藉掠奪經營，以維持其家庭生計，現在連這個農業經營上最後的手段也失掉了它的效力。農民們沒有娛樂和休息的時間，土地亦無休

閉，農村疲敝，已達極點。復因農業之商業化，農民和市場發生了很密切的關係；他不得不急往市場拋售自己所有的農作物，又不得不從市場上購買價值昂貴的必需日用品。他們本來就是以借貸爲生的，目前更遇着了一個銀根吃緊的年頭（東北喪失後，萊蕪人在關外的經營全部喪失，每年的進款，特別是貧農的進款，因而斷絕，）那只有走上更窮困更悲慘的道路。於是他們之中，膽大的年壯的，便掙扎着脫離這窮困的農村，跑到都市去。無能的便呆坐在農村裏，坐以待斃，去年一年，我所住的小曹村裏，就有三家（全村共三十家）到南京去作修馬路的苦工的。在那裏每日工資三毛，鄉裏人便認爲這是很好的工作了。後來，我曾加以調查，這離鄉三戶人家，家裏尙各有地二三畝不等，二三畝之家，卽已被迫離鄉，其餘一無所有之貧農狀況，更不堪設想。

在這裏，我們不可忽視：地主，商業資本家，和高利貸者這三種魔鬼，加速了農民分化過程。在這方面，萊蕪的情形，和別的地方沒有什麼分別。上面我們已經指出該縣的銀行錢莊油坊酒店以及百貨商店，全部操在地主手裏。銀行錢莊不必說，他們主要經營是在放款，營利子生活；卽上述之油坊，酒店，綢緞莊，在農村購買力低減市面蕭條的今日，也都傾其全力去營高利貸的農村放款，利息之高也不下於他地。不過銀行錢莊，不能公開行施過重的剝削，但此等放款之大部分，貧農是難得光顧的，因爲他們放款時雖不要抵押品，但須要「保人」和「中人」，凡有堅實富農作擔保，他們才肯把款交與貧農，一旦到期不還，便唯「保

人」是問，高利貸在這種放款手續上的目的，不是在給與貧民（或有房產和土地可抵押者）以任何方便，他們的目的，在求放款的確實，剝削之穩妥。但貧農之家實不易找得有富足的親友給他們作擔保人，因此，他們除向錢莊酒店油坊借款外，更不得不去哀求那些更殘酷的小貸款者。這樣他們便不得不更遭受那高度利息的剝削。這樣的小貸款者，利息既高，而放款期間又短，最長的一月，短的五天或十天，到期不還，在債權者估計債務者尚可支持時，便將利作本，利上加利，結果無力償債的小農，便迫不得已，離開自己的故土，作逃亡生涯。其不逃亡者，便尋短自盡。於是逃亡，自殺或牢獄，便變成萊蕪貧農的前程了。

至於中農，則因穀物跌價與商品經營的不振影響，偶一不愼，便走上破產的道路，至此只賴借貸，以謀週轉。豈不知農民一投入高利貸者之巨手，直等於飲酖止渴一樣，非陷於萬刼不復之境不止，至此，雖再願承受高利貸者的吸吮，而高利貸者已不願敲剝這塊乾枯乏味的骨頭了。我的家庭現在便已是往這條路上走，我的父親常以很悲酸的口吻對我說：「這莫非就是叫人家欺壓到四肢着地了嗎?」（萊蕪土話，言破產之後，難以覓得活計，前途充滿黑暗之意。）現在萊蕪的中農都在面對着破產，瞭望着窮困的前途，走向貧農的路程中，在掙扎，在哀泣着。

三　農業勞動者

萊蕪的農村勞動者，概爲工銀勞動。勞動者的名稱，也非常複雜，主要的有「長工，」「月工，」「短工」，

「日工」之分。「長工」俗稱之曰「伙計，」或曰「做活的，」「月工，」「短工，」則各如其名。

農業勞動者的分配，因僱主之大小，亦各異其組織。普通說來，地主佔有地在五十畝至八十畝（萊蕪畝）者，需要長工七八人，百畝左右者，則需十一二人。一般地主們，都把這些「做活的」分成三個主要階層，居「伙計」們之首，有「掌作的，」亦曰「作伙計，」負領導其他「伙計」耕耘之責，彷彿像工廠裏的「工頭。」其下有「二伙計」「三伙計」以及「小伙計」等，人數是不定的，有時每種「伙計」名目之下，有多至三四人者。不過負領導責任的「作伙計」却只有一個。「作伙計」除領導工作外，他的主要責任，還在全盤計畫地主家庭的農耕事宜。他一方面是管理「伙計」的管理員，同時又是地主家庭的農事帳房，他居主人與工人之間，所以地位異常重要。主人對於他，也稍微尊重，而且一經僱用，假若沒有大錯發生，更不會解雇，有的「作伙計」是老死在一個固定的地主家裏的，不過這種現象在目前很少有了。

其次中農的家庭，其僱用之「長工，」自二人至五六人不等，須視其種植作物之性質而定。假如地主之經營多爲商品之生產，那麼他需要的「長工，」自然多些，普通說來，有地十畝者，需要「長工」兩人或三人，二十畝者五人，三十畝者則六七人，於農忙期間，大批「短工」的僱用，尚不在內。

「長工，」「月工，」之僱用，概爲口頭契約，每年於十月一日左右（時農事皆畢）勞動者還「中人」向地主說妥，願擔任那項脚差，「作伙計，」或「二伙計」……，並言明工錢，而勞動者的行爲由「中人」

擔保，便算了事。契約一經成立，「長工」便終年（一般的說）住在地主家裏或園裏，如有小疾病，地主可代付藥費，且不扣工資，如遇大病時，「長工」必須找代理人，或由地主代覓，但工資悉由生病的「長工」擔負。這時地主也不再代付藥費。當主人對某工人不滿意，或工人與主人間發生齟齬時，雙方都能提出解僱，工資則按工作時間扣算。

他們的工資，也各以其地位之高低而有差別。「作伙計」就比「二伙計」工資高。「二伙計」也比「三伙計」的工資高，餘可類推。即在「作伙計」一名目下的工資，也各有大小的不同，如百畝地主家裏「作伙計」絕不與二三十畝富農家裏的「作伙計」相同。雖同一名目，而工資數也各有差別，這是因爲經營土地規模大小的緣故。不過就普通一般情形而論，我們也可以看出個大概來，粗略的劃分，則如下表：

長工工資表

作伙計	每年四十元至六十元
二伙計	每年二十五元至三十元
三伙計	每年二十元至二十五元
小伙計	每年十元左右

從前，工資以銅元計算，如幾十吊，幾百吊（每吊銅元五十枚）現在則一律按銀元計算了。這恐怕也

是受農業商品化的影響而生的吧？

至於食住，全由主人供給，普通吃的是粗米作的「尖餅，」秋麥農忙期間，午飯概爲白麵「饅頭，」每逢季節，吃食較好的，有餚饌與茶酒等物。他們住房，則爲主人的住宅以外的農具室，廠棚，或園裏邊的「園屋子，」破爛的被席亦由主人供給。

「日工」在農村勞動力的供給上，也佔很重要的地位。秋麥二季穀物成熟的時期，是農村裏需要勞動力最迫切的時候，農業不同於工業，工作是有季節之分的，特別豆類植物成熟後，若不收割，豆夾爆炸，豆粒落地，三日不割，豆粒就全不見了。因此「日工」勞動在農村中便成了重大問題，不只地主中農家需要「日工，」即自耕農有時也需要「日工。」

「日工」在山陵地的農村裏，更演着一種重要角色，因爲山陵土地中，缺乏灌漑設備，其他經營方面，概爲粗放的，任農作物自生自長，只是在種植期與收穫期需要「日工，」平常不需要任何勞動，故此等地方「日工」之需要更爲廣泛，更爲迫切。

全縣各重要鄉鎭，都有「短工子市，」（日工勞動者出賣其勞動力的市場，）淸晨四時至五時間，日工勞動者麕集在這個勞動力市場上，待顧主購買，願從事某項工作者，則隨帶着某工作所需要的農具。購買者皆爲地主或中農的「作伙計，」工資之高低亦隨時而異，但總較平時貴二三倍，在交易的那一刹那

間，供求律顯示着很重要的作用，交易成立後，大批短工便隨着「領短工的」的人，多者三四十，少者一二人不等，齊集地主的農場上去工作。工作時間，從上午六時至下午七時，中間休息三四次，一日間地主飼以三餐，早晚粗飯，午間則爲麵食。有的地方晚餐還有酒肴，晚飯畢，地主的「作伙計」分發工資，他們乃各歸店家去宿，希望第二天再得到顧主。假如，遇天陰雨，必須停止工作時，鄉人稱此爲「打半工」，工資照半數發放，如午飯後已工作一二鐘頭者，則按全日計算，雖全個下午不能工作，也不能「打半工」了。

其距鎭市較遠，而不能到鎭上去「領短工」的，則雇用本鄉或附近鄉村的日工勞動者，有時日工勞動者下鄉去求顧主的事也很多，此等鄉村的日工勞動多半是這樣來的：

我幼時在鄉村裏常看見，衣服襤褸，面色黑黃，愁眉不展的人，帶着鐮刀或鋤，到我的家門上，來求工作的外鄉來的日工勞動者，勞動市況不佳的時候，他們甚至只求食住的供給，便可爲主人作工，那時我還很小，還不明白日工勞動者的悲慘生活呢：

在農村中需要日工的時間也很長，大約每年三季，自陰曆四月至五月中，六月至七月，八月至九月，這個期間都有「短工市」。

日工勞動者，有的是本鄉或附近鄉村的半自耕農，貧農及農民無產階級，有的是外縣來的。遠路來的「日工」都隨身帶着幾種農具，如鐮刀，鋤之類，和一件簡單的行囊，至農忙完畢，他們才各自返鄉。這種勞

動力的移動，補足了缺乏勞動力的地方的需要，並加速地發展了農村工銀勞動的發展。

從農具方面觀察很清楚的看出萊蕪縣的農業經營的集約化，特別是農具之發達與農業商品化上，表現得最清楚。

四　農具和肥料

肥料的使用，過去與現在，並無若何變化，不過因爲性質相近，所以我們也附在此地說一說。

本縣農村所用的肥料，主要的有二種。家畜糞，人糞，與「豆餅，」家畜糞人糞多半用於普通農作物上，而「豆餅」則用於商業農作物或菜蔬上。

農村裏凡自耕農以上，家裏都至少養一個猪。四五十畝的大農，至少養二三十個猪。養猪的目的主要的是爲積蓄肥料，至於把養猪拿來交換貨幣，那倒是其次的事。自然，猪的出賣，也是農家的一種收入，「開冬就出糞，」這是各地流行的「雜字平」上的一句話，實際上也是農事的一個重要工作。首先他們把糞堆在曠場上，再用小車搬運到田地裏，撒在地面上，至耕田時，糞土混合，施肥的工作，至此告畢。不過有時還有「苗糞」之施用，那是對某種特別的作物施的肥料，絕不是一般的了。

商業的農作物，如麻，薑，烟草，菜蔬，則皆用「豆餅。」豆餅每個一元左右，有的農作物一分地要用十個左右，這便形成了土地上投資的主要部分。中農以下的自耕農或半自耕農，往往因施肥而屈服於高利貸

的剝削之下，一遇農作物不收，或市況不佳，便有破產的危險。

近來本縣境裏也有在賣肥田粉的，不過用的很少。至於工具方面，只有灌溉上表示着很大的進步。灌溉，在本縣的各區農業上，佔着最重要的地位，除山地以外，幾乎沒有一塊土地上沒有灌溉用的「井」的。從前我在曲阜讀書，在鄉村中除了吃水用的井以外，幾乎是沒有爲灌溉而專設備的井。這在經營上說，曲阜不如萊蕪進步。不過，萊蕪的灌溉工具從前是很笨拙的，都是用單人擰的轆轤，後來，稍有進步，把單人擰的轆轤變作雙人擰的，井口也隨着加大了。近十年來，雙人擰的轆轤又不多見，用牲畜拉的「水車」倒很普遍了。由轆轤而水車，在本縣的種植方法上，發生了很大的進展。農作物的收穫額自然也增加。每於秋麥二季，在廣大靑葱田禾中，我們不斷的聽到水車的叮噹聲，它告訴我們說：萊蕪的農業是在進步中。

水車的使用有許多好處，第一，吸水多，農作物得以吸收更多的水分；第二，吸水快，每日可灌溉一畝至二畝，若遇旱天，尤稱便利；第三，節省勞動力與工作時間；第四，夜間亦可使用，只要井水不斷。

但是裝置一架水車，所費約二百餘元，絕非中農以下的農戶所能擔任，若再連牲口與飼料計算在內，那費用更大了。所以它只在大農經營的場合下，才能使用。水車之應用更顯出大農經營之優勢與小農經營之落後。

三年前，本縣「紅卍字會」在西關開設鐵工廠一處，又製出各種手擰水車，價值有僅值五十元左右

者，因爲價値較賤，鑿井稍易，所以購用的也很多。該工廠除了製造輕便的手搾水車外，並造很簡便的牲畜拉的水車，較舊時的水車，又方便了許多。

五　農產品的商品化

上面已經說過，萊蕪縣境內的土地差不多有二分之一是山嶺地，按耕地來說，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土地瘠薄的山陵地。就這點看來，本縣的農產物是很難走上單純商品生產的途徑的。然而，事實却不然，本縣的農產物除了主要的食糧之外，尚有薑、麻，花生之屬的出口商品，至於蠶桑，也是本縣農家的主要副業之一。

不過這種商品農作物和蠶桑副業並不是全縣一律的作業，譬如山陵上土質瘠薄的地方，很顯明的，是不適於麻、薑種植之用的。反之土地肥沃的「下窪」（本地土語，有盆地之意）裏，農民決不願把耕地變作桑田，從事養蠶事業。所以本縣的農作物之商品生產，在一縣之內也是有地方性的。大致說來，萊蕪的東南鄉（顏莊區）及南鄉（汶南區）一帶近山處，桑樹成林，適於養蠶，本縣一年中繭絲的出產，此一帶地佔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此帶地有許多農戶一年的生計，專恃種桑養蠶。薑之種植多偏在城區，汶南區及口子區三處，而麻地又多在城區，魯西區，寨里區，水白區，汶南區……。

手下沒有統計材料，所以關於萊蕪的薑、麻之種植，共有多少畝數，到底佔耕地幾分之幾，不能具體的

說出來，不過我們就一般的情形而論，至少要佔耕地的百分之五，汝南區的汝南及其附近一帶，幾乎沒有一家農戶不種薑，魯西區的魯西鎮及其附近，又幾乎無家不種麻。就按我住的小曹村來說，也是一樣。我家共有耕地十畝，而薑地就佔去了一畝，這種農業商品生產經營的性質，太顯著了。

各重要鎮市，以及萊蕪城的東西兩關，或五天一「集」，或十天一「集」，每個「集」上，薑麻市常佔最重要的地位。薑、麻市上的交易，實質上恐怕佔一「集」交易的總額之十分七八。「集」開始的前一晚上，遠來的賣的買的都住在「集」所在鎮市的店裏，翌日八時左右交易便開始了。市上的擁擠擾攘那是不必說的，販賣薑、麻者再僱小車或人力小擔搬運出境。

假如一時市況不佳，農戶就把薑、麻暫時保藏，麻則用硫磺燻後不剝，薑則深藏在薑井內，待來年或市況上漲時，再運到市場上去賣，然而也有不少的農戶，因為豆餅賬必須清還，或要付清某項借款的利息，雖市況不佳，也不得不將所有的薑麻濫賤拋售，這種情形，在目前本縣農村破產的當兒，已變為很平常的事了。

薑、麻、蠶桑之商品化的顯著的發展，也不過是近十年間的事。十年前，因為世界市場上的需要，營斯業者，屢獲厚利，多有因此致富者，一般農民看見這個現象，遂爭相種植，而種植之法因之亦有進步。蠶桑自浙江桑苗運到後，各家都購買，城裏「職業學校」且製造出售優良蠶種，於是栽桑養蠶，也興盛一個期間。除

曆五月底，繭皆上市，出口約百萬餘斤，每斤貴至一元餘，即依每斤一元計，本縣每年只此一項進款，也有一百多萬元。這數目對於萊蕪的農村經濟上，不能不算是一大幫助。但自世界經濟恐慌爆發後，中國的蠶絲在世界市場上，大形退縮，於是偏僻的本縣農村也受到很大的影響。養蠶的現在雖然沒有減少，而農村的疲敝却發生了。今年好繭每斤價只三四毛，所獲難抵成本，在農村破產的今日，農村重要副業也蒙受了如此的大打擊。農村的命運，可算得悲慘已極了。

此外，主要的薑、麻生產怎樣呢？誰知也走上了同一不幸的命運！

近來薑，麻市價各猛跌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不等，幸所獲尚敷成本，故本縣農村崩潰現象，未因之而臻至極。然而，長此以往，本縣的薑、麻，因無從發展，農村經濟愈益拮据，而農業之資本主義的經營也將要受到很大的阻礙。

帝國主義的侵入，使本縣的農村經濟也資本主義化，它為自己的商品開擴了市場，同時也為殖民地農產品開擴了市場；因之，使殖民地農民的生產與消費，都與市場發生了不解之緣。直到今日，雖如萊蕪這般閉塞的農村，也隨着世界經濟的恐慌，而趨於大破產了。

六　結論

最後，我想用幾句簡單的話，把上面的散漫的敘述歸結起來，使讀者對於本縣農村得到個比較清楚

的概念。

近半年，萊蕪農村經濟已完全脫離過去半自給自足的情形，而走上了資本主義化的道路。農民必須在市場上出賣他們的生產品，購買他們日用的必需品，並以在市場上所換來的貨幣支付一切賦稅及苛斂。從前農村依恃本區域內的交換，現在變成依賴世界市場了。這在農民一般的日常生活，以及農產品之商品化上——薑、麻之種植，以及蠶桑副業之發達上，表現得最爲明顯（目前的衰落，另作別論）

因農產品之商品化，更加速了本縣農作物種植上之改良，工具之改善，和灌漑方法之進步。水車之應用，以及同一土地面積上投下資本之增大，（施肥的增加等）很明白的指明了這件事。

一九三四，九，十五日。

七　山東濰縣之農村副業

龍厂

山東省膠東一帶，本爲富庶之區，而濰縣一邑，農民副業，尤爲興盛。現以穀賤傷農，農田收穫不足抵償下種施肥之需，困苦萬狀。至該縣南鄉之烟葉，東鄉之機織，西北鄉之猪鬃，尤爲農家副業之大宗，近年亦日趨衰落，推其原因，無非受帝國主義者之壓迫，茲將各業情形述之，如何救濟，願我國人三致意焉！

甲　南鄉之煙葉

民國三年，大英烟公司來濰調查，知該鄉之地，可以種烟，遂分發烟種，貸款鄉民，誘其實行種烟。自民四起至民十一止，本地烟業均在該公司獨資宰割之下。民十一年後，南洋兄弟及日商南信，米星等公司，亦來如法泡製。其間種烟之風，又波及他縣，種烟之地畝，可以烤烟房（俗名籠屋）之數目推算之（每房每年烤五畝，七百二十方步一畝，烟葉每畝約產六百磅）列表如下：

年代	產區	烤烟房數目	烟葉畝數	磅數	每百磅價洋(元)	附記
民四	濰南鄉	五〇〇	二五〇〇	一、二五〇、〇〇〇	一八	每畝七二〇方步
民五	同	一三〇〇	六五〇〇	三、九〇〇、〇〇〇	一六	
民六	同	八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	二四、〇〇〇、〇〇〇	一五	
民七	同	一五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	四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五	

民八	同	三五000	七五000	四五,000,000	一四	
民九	同	三五000	七五000	四五,000,000	一四	
民十	同	三五000	七五000	四五,000,000	一四	
民十一	同	四五000	三三五000	一三五,000,000	一四	
民十二	同	四五000	三三五000	一三五,000,000	一四	
民十三	同	四五000	三三五000	一三五,000,000	一四	
民十四	同	四五000	三三五000	[illegible],000,000	一四	
民十五	同	四五000	三三五000	一三五,000,000	一四	
民十六	同	四五000	三三五000	一三五,000,000	三	
民十七	同	四五000	三三五000	一三五,000,000	三	
民十八	同	四五000	三三五000	一三五,000,000	二	
民十九	同	四五000	三三五000	一三五,000,000	二	
民二十	同	四五000	三三五000	一三五,000,000	八	
民二一	同	四五000	三三五000	一三五,000,000	六	
民二二	同	四五000	三三五000	一三五,000,000	五	
民六	安邱縣	三00	六000	三,六00,000	一五	
民七	同	四0000	一五0000	九,000,000	一五	

民八	同	三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	九、〇〇〇、〇〇〇	一四	
民九	同	三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	九、〇〇〇、〇〇〇	一四	
民九	青州屬	一〇〇〇	五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四	青州楊家莊辛店等處
民十	同	一〇〇〇	五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四	
民十一	青州屬	一五〇〇	七五〇〇	四、五〇〇、〇〇〇	一四	
民十二	同	一五〇〇	七五〇〇	四、五〇〇、〇〇〇	一四	
民十三	同	二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〇	一四	
民十四	同	二六〇〇	一八〇〇〇	一〇、八〇〇、〇〇〇	一四	
民十五	同	三六〇〇	一八〇〇〇	一〇、八〇〇、〇〇〇	一四	
民十六	同	三六〇〇	一八〇〇〇	一〇、八〇〇、〇〇〇	三	
民十七	同	四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三	
民十八	同	四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二	
民十九	同	四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二	
民二十	同	四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八	
民二一	同	四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六	
民二二	同	四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五	

觀上表價格之每年降落，可知外商操縱市價之毒腕（南洋兄弟公司收烟甚少。）其初也以利誘，誘之既得，遂於民國七年停止分種子貸洋款之事，民衆既受麻醉於前，難以停止種植於後，明知不能賺錢，但一屆播種之時，不種何以爲生？現在種一畝烟，需肥料費十六元，烤煙塊煤十元，工價十二元，地價利息及房貸十元，共四十八元，而每畝之煙價僅賣三十餘元（每畝產六百磅，每百磅五元，）其損失可以想見矣。

尤有甚者，每屆烟熟之後，整理完竣，大車小輛，紛紛向公司輸送，烟公司所在之地（二十里堡坊子等處，）成爲大市，車輛銜接，長四五里，有俟至數日，仍不得入者，農民無法，逐爭向閽人施賄，及入公司，將烟條左檢右翻，出以廉價；如不賣則即時逐出，而煙葉已散亂不堪，重行整理，勢必需費工錢，成色無形已爲減低，故農民亦祇有忍痛出售耳。

公司爲保護利益，塡壓小民計，且每年送給縣長數萬元：遇有事件，即將民衆抓送縣署，縣長即遵命辦理，是以濰縣縣長多腰纏累累，此其一端也。

按煙葉一磅，只值大洋五六分，而哈德門烟一條（二十五盒，）賣價至一元以上，所用烟葉不過一磅，即外加各種費用，其成本亦不過五角。獲利之厚，可想而知，漏卮之大，更不堪設想矣。

山東各處之小捲烟公司，多係華人小本經營，所出之捲烟，多在中下等級，銷售頗旺，獲利亦厚。但自去年政府改訂捲烟稅則之後，好烟（多係外商出品）減稅，劣烟（華商出品）加稅，華人之公司逐告破產

矣。

乙 機織業

濰縣之機織業，爲農民之家庭副業，全縣無不有之，而以該縣東鄉爲最多。所織者爲棉布，其品質式樣，與洋貨相似，所用之布機，係該縣工廠自製。機爲足踏式，價廉物美，據調查所得，當民國十五六年，全縣布機約有一萬餘張，每機需工人兩名，所獲利益，除養家之外，略有盈餘。後逐年增加，至去年，全縣有布機七萬餘張。現則因洋布太賤，濰布銷路大減，業已大半停工矣。

(一)棉紗之來源：

濰縣機戶所用之紗，均由青島運來，青島紗廠共七家：大康，寶來，銀月，內外棉，鐘淵，富士六家，（外有兩家在籌設中）爲日人開設，廠中職員亦係日人，惟用華工。僅華新一家，係華商組織。所用之棉花，均由山東西部，河北，河南購來，以濟南爲匯萃之區，再由膠濟路，運往使用各廠。

(二)棉紗之銷售：

青島各廠所出之紗，有十分之五，運銷於濰縣。該縣向有錢莊（即販紗店）四十餘家，專門到青島買紗。所買之紗，多係青島華商由日人手中買出者，經膠濟路運到濰縣，再轉賣於機戶。各綫莊有營業稅，及線行費（即線業公會性質）之擔負，並加洋綫（紗之俗稱）經紀人之扣用（爲買主賣主

講成交易，按比例得扣用，）有此種種剝削，無形中機戶買了貴紗。去歲有日人見有利可圖，遂在膠濟路濰縣站成立一販紗公司，名曰瑞祥。既無營業及其他各項稅捐，且直接由紗廠購買，售價自較便宜。因此生意興隆，壟斷一切。濰縣之棧莊四十餘家，分設於縣城東關及眉村，南流兩鎮者，全告歇業矣。

(三)銷紗之數量：

按膠濟鐵路濰縣境內，如南流（屬濰）濰縣等站，每年運到之棉紗，以民十八十九兩年平均計算，在一萬噸左右。約合棉紗五萬六千件左右，值洋一千五百萬元以上。

(四)濰布之銷售：

據膠濟鐵路運輸報告，每年平均由濰縣境內各站，運出之棉布，約重六千噸，從郵政寄出之包件，亦有兩千噸，以上共計二百萬疋左右。至於由山東北部，各海口出售之棉布，尚不在內。其銷售地帶，以河南、陝西、山西爲最多，其次如河北、綏遠、東三省等省亦用之，現則東三省之路已絕。

(五)布業之現況：

緣日本之棉布，多係機製，成本既低，稅項又少，故售價低廉。濰布雖係家庭副業，以品質論，固與洋貨不相上下，且較結實，但以受種種摧殘，無人維持，致不能抵抗日貨，現則大半停工矣。

丙　猪鬃業

濰縣西北鄉之猪鬃業，始於光緒末年，原爲家庭副業，近十餘年來，從事斯業者愈衆，成立商號組織者，約有五十處，均設農村中。現每年運到青島出售之猪鬃，約值一百五十餘萬元。因貨價忽漲忽落，及其他種種原因，以致賠累者多，獲利者少。現方在演進之中，前途深可悲觀，此亦該縣經濟破產之現象也，玆述於左：

（一）鬃號之組織：

每一鬃號，多由鄰里或鄰村住戶，合資成立。商號之股東，多少不一，大概以十股爲通例。商號人員，亦由股東充任之。所用之款，多向濰縣城銀號，及青島代理店（代理客人買賣）借用。每號除由各股東實交三五百元外，其餘常年用款，每號由兩萬元至十萬元不等，均以高利取用。

（二）猪鬃之採買及整理：

當舊年前後，各號卽派人到山東西部各縣，及河南江蘇河北等省，收買猪毛，運回各號整理。按長短尺寸，捆把裝箱，每箱重爲一〇二磅，卽一英擔，再運青島代理店出售，整理猪鬃之工人，多爲自十歲至三十歲左右之婦女。

（三）猪鬃之銷路：

猪鬃係展轉運銷，售於北洋，亦我國出口土貨之一也。

（四）猪鬃出賣之手續：

猪鬃作成裝箱運交濰縣膠濟車站附近之轉運公司，該公司轉運至青島，交代理店。該店再請洋買辦，向洋行說項，說成之後，洋行再轉運出口。

按猪毛本係無用之物，經整理後年可收入一百五十餘萬元，對於農家經濟，不無少補，但以農民無資本，所借之款均係高利（約在月利二分以上）又乏商業知識，收入之貨價高於當時之賣價，在所不計。復以苛稅，轉運（不法之運價）代理店（一百五十萬元之纍價明扣六萬元）買辦，洋行之層層剝削，在農民方面只知唉聲嘆氣，無可如何。一經賠累，家產蕩盡，淪爲流氓。其稍有資力者，總想孤注一擲，以圖扎掙，日求援於銀號及代理店之門，通融資本，非至家產賠盡，不肯罷手。查該鄉自有此業以來，不下三十年，乃以農民受資本家代理店，買辦，洋行之壓迫，卒至破產者累累，不亦可哀乎。

一九三四，五，十二日。

八　山東招遠縣農村概況

曉夢

一

每和朋友們談起各人故鄉的情形來，總有一些地方不大相同。我的故鄉——招遠，好像是一個特殊的形態似的爲此，我想據個人所知道的寫出來，以供研究中國農村問題者的參考。

招遠是一個不出名的小縣，位於山東半島的中部。西連掖縣，東接棲霞，南與萊陽爲界，北與黃縣相鄰，西北面則臨渤海面積約六十四萬方里。古爲萊國地，漢時叫做曲城，北魏併入掖縣，金時改爲招遠，至今因之。境內多山，惟西北一隅較平坦。山之大者有羅山，馬山，靈山，架旗山等蔓延境內，河流則有老界河，鍾流河，老翅河等，山脈河流，佔全縣面積三分二以上。但山上皆可種植松木，雖在深冬，出門一望，觸目一片蒼翠之色；而且，土質尙宜耕作，所以許多山陵都被開墾了，因之，招遠山河雖佔去很大的面積，耕地實在徵糧者，猶有四十三萬餘畝（每畝合官畝二畝，西北鄉有一畝合三畝者），實際耕墾數，決在官畝百萬以上的。全縣共有七百六十九莊，大莊三四百戶，小莊四五十戶，亦有三四戶者，但殊少見。全縣人口約有二十萬以上，無大家庭，普通每戶有五六人之數。

因爲招遠僻處於山谷間，交通不大發達。近幾年來，西境有了烟濰汽車路，自前年又有青黃汽車通過

縣中，道路亦加修築，大車陡增，交通日形便利，但較之鄰近的掖黃兩縣，仍是望塵莫及的。

縣中出產品有粉條，花邊，花生油，尤以粉條爲大宗，在北鄉每村差不多都有幾家製粉條的粉房。普通工業品，有磚、瓦、瓦盆、條筐、箕斗、钁頭、等。這些農村副業，後面還要敍述。

教育在前並不發達，民智閉塞，在中國史上，招遠從未有過出頭露臉的人物。（招遠之無大地主，這是一個主要的原因罷？）現在縣中雖有一處初級中學，及十餘完全小學，但都辦得不見出色，雖比從前好些，可是沒有什麼表現的。每莊差不多都有一小學，惟因教員不懂敎學方法，與從前私塾相差無幾，兒童雖讀上三二年書，也是白打，不識字的人仍是很多。至於婦女，幾全不念書，城內女子小學人數亦甚寥寥耳。

至風俗習慣，無甚差異，這裏不述說了。

二

招遠土地大致可分爲三等；窪地（靠近河流的地），山地（靠山的地）和山河之間的溝地。以窪地爲最肥沃，山地最磽瘠。就全縣說，西北鄉土地肥饒，東南鄉則爲瘠薄之區。縣中無大富赤貧，大半是小自耕農。普通有田四五畝，最貧者亦有自己的房子。俗云：「要飯的也有放棍的地方，」在招遠，沒有完全耕地主之地，住地主之房的佃戶的。普通所謂富有之家，都是指有田四五十畝的人戶，百畝以上的富家，簡直寥若晨星，全縣不過十餘戶而已。招遠的土地分配，無甚懸殊，大都是中小農，小自耕農佔百分之九十以上。

農業經營的形式，有下述幾種：

一、自耕農　自耕農是自己有五畝至十畝的耕地，全由自己種作，完全自足自給的，這種人戶，約佔全縣戶數百分之七十。他們在農作之暇，也作一點副業，如木匠、瓦匠、或販賣鄉村應用物品等。他們田地的生產可以足食，副業所得，則可幫助零用。

二、半自耕農　這是有田一畝至五畝，有餘力耕他人田地的人戶。他們租種田地，並非不租地即無以為生，乃是因有餘力而為之。他們的副業是出傭為日工及操鄉村的手工業或作小本營業，藉以賺得日常的用費。這種人戶約佔百分之二十以上。

三、自耕農兼地主　這種人家比較富裕，除自己耕種之外，還有餘地租借與人。他們土地的種作，多雇有長工（俗名伙計）擔任，自己家人幫助之。在春秋農忙的時候，還要雇日工。普通只雇一人，亦有雇至三四人者。近來因為粉業的發達，雇三四人者亦不少，但重心移於粉房，以農耕為副，轉換方向了。這種人戶約佔百分之五六。

四、地主　這是指自己不任勞動，坐食租課的人戶說的。像這種人戶，全縣只有數家，都是曾經做過官（如縣長之類）的後裔。他們的家事，如收租，糶糧等，全委之於「把頭」（即幹人）自種土地，亦由「把頭」督率耕作。但因年來的「穀賤」與其自身的奢侈，都差不多將土地賣完了，沒落的官僚後裔，為生計

的逼迫，有似於民國成立後的旗人了。

三

其次，再談另一耕種的方法。

土地的耕種是輪耕制。即今年春天種穀或高粱或玉蜀黍及黍子之類的地，秋收後則種麥子。第二年收了麥子後，就種豆子或玉蜀黍（俗名伏包米，春種者則曰春包米）或地瓜（俗名蔓瓜，因取地瓜蔓栽的緣故，春種者曰芽瓜，蓋以地瓜芽栽植也。）秋收後即不再種，將地休息一冬，至次年春再種穀，高粱之類。這種周而復始的種植法，可圖示如下：

第一年

春	夏	秋	冬
麥	豆子，蘿蔔，玉蜀黍，地瓜等。		休耕
高粱，穀，黍子，玉蜀黍，地瓜，甜瓜等。			麥

第二年

春	夏	秋	冬
高粱，穀，玉蜀黍，黍子，地瓜，甜瓜等。			麥
麥	豆子，蘿蔔，玉蜀黍，地瓜等。		休耕

第三年	春	夏	秋	冬
	麥	豆子，蘿蔔，玉蜀黍，地瓜等。		休耕
	高粱，穀，玉蜀黍，黍子，地瓜，甜瓜等。			麥

種植穀物的比例，可列表如下（以種十畝田者為標準：）

麥——五畝（麥收後大半種豆子，約為四畝，其他一畝則種蘿蔔，玉蜀黍地瓜之屬）

高粱——二畝（玉蜀黍春種者很少併入此類，約為二畝之數）

穀——二畝

地瓜——半畝

黍子——半畝（其地少者，不種黍子，大半種花生甜瓜或種菜園之類）

近來因為粉業的發展，「推粉」之家，休耕地比較少了，即在麥收後少種黃豆，多種綠豆玉蜀黍，以便收獲後再種麥子。惟因不能種植高粱，穀等，休耕地仍不能廢除的。

種作的方法——即先將土地用犂耕好，施以肥料，再將肥料犂翻地內，然後下種，再以時鋤治，以至收穫，大概各地相同，不贅述。惟招遠於禾地常加肥料，許與他處不同，蓋因招遠人口稠密，對土地的耕作，多為集約的，肥料使用很多。例如在種高粱時已施肥料，而在高粱將秀時，還在其根邊施以肥料。普通每畝肥料

的價值約在三四元。而「推粉」之家，因有很多的「粉漿，」所施又倍之。以故，招遠近年來的生產較前大增，聞老人言。在前每畝產六斗穀，卽爲豐年，今則風雨調和，畝收總在一石三四斗的了。

在招遠的南鄉，因土地瘠薄，多種花生，產量亦頗不少，花生油就出在南鄉了。

四

現任我們再看看勞動的關係，自耕農完全爲自己勞動，在這裏無述說的必要，我們所要說的是：

一、佃農 在招遠，沒有純佃農——卽完全種地主的土地，住地主的房屋的佃農，前已說過。這裏所謂佃農，是指有餘力佃種他人的土地的人戶說的。他們自己有土地房屋，只是佃租地主的田地，對於地主，除約定應納的租額（大都爲二分之一）外，什麼責任也不負的。佃家與田主完全平等，租約可以隨意解除，沒有一點限制。

租地有兩種，一種是約定納若干租課。在早都是現物地租，現在亦有用貨幣的了，其次是「分種，」卽佃家種地主之田，將田中收穫與地主平分。

二、僱傭勞動 僱傭勞動，可以分爲長工、月工、日工三項來說，玆述之如下：

A. 長工——長工的期約，都是一年。工資普通爲三十元至四十元，其工作能力很低之童叟，亦有二十元者，至有製作粉條技藝之粉匠，上手可得百元，下手亦可得五六十元。又在粉房之長工，工資比普通農家

爲多，因粉房的工作比農家爲苦也。

長工多住於僱主之家（與僱主鄰者則多回自己家中）僱主除供給飲食外，於夏秋時還須給以手巾，雨帽，綁（即豬皮縫成之鞋，普通爲一雙，亦有講明爲兩雙者）及小帶等零用物，亦有給與褲料者。此外，於節日（如秋節冬節等）亦有食物的給予（此爲本村或近村之長工始有之，遠則無矣），但多須在定約時講明。

長工與僱主之間，並無什麼文契，只是口頭定約。普通由中人介紹，約定工資，長工即到僱主家試工三日（如熟知者即無須試工了），試工期間無工資。試工滿意，約即成立，如僱主認爲不合，或長工以爲活重或飯食不好，原約即可宣告失效。若約定而中途發生意見，亦可解約，視兩方曲直而斷定應予長工之工資。

長工在主家作工，應受僱主指揮，但在法律地位上則完全平等，決沒有什麼軒輊。長工在閒暇的時候，可回家住幾天（最多一星期）如遇疾病或因他事曠日過多，則必須找人代替或扣去若干工資。

B. 月工——月工與長工的情形同，惟僱月工者，多在農忙之時，工資較高，每月約爲五六元，如粉房僱用，則須七八元。

C. 日工——日工的工資，約爲二角至四角之數，在麥秋最忙時節，亦常增至一元，但一年中不過一二日耳。

日工有市，俗名「工夫市」（即爲人工日作者聚集待雇之所），爲僱傭日工之處，在無「工夫市」

處，則多僱隣人之有閑暇者。

日工與長工月工不同之處，日工只管作農地工作，僱主家中的雜事，如餵驢馬，挑水，擔土等則全不管，長工和月工，則必須作這些事的。但日工亦有管作者，惟必須講明。

五

農村副業，在招遠有下述幾種：

（一）粉房　粉房即製造粉條的作坊。一個粉房的組織，大都爲一個家庭「推粉」（即製造粉條業，俗名推粉）之家。無論大人小孩，都有工作作的。如七八歲小孩，本不能作什麼活計，但在粉房中，則於晒粉時命之拾斷落的粉條。粉房中主要的工作人員爲：

一、粉匠——即推粉的師傅，他管着粉房內的一切精細點的工作及指導並監視其餘人的工作的。粉條製得好壞，全在他一人身上。粉匠大都是僱的，亦有業主自己管理者。粉匠的僱傭，都是論季，即春季或秋季，每季約爲三月，工資上手四五十元，下手三四十元。

二、貼作——即徒弟，俗名貼作。粉房中一切苦的勞動，多由其擔任，他的工資與普通長工相似，其所以苦而得錢不多，蓋在想從粉匠手中學「推粉」的手藝。他絕對的須聽粉匠的指揮，從事各種工作。但無如中世紀式的師徒關係，可以隨意脫離的。

粉房內的主要工作人就是「粉匠」和「貼作，」其餘則臨時由家庭中成員參加。如在「漏粉」時，家人（有因家中人數不足，兩家互相輔助）加入燒火的理粉等是。

年來粉業非常發達，其發達的原因爲：一方可以賺錢，（最高利潤每包賺至十元，但亦有賠錢的時候，普通每包可賺一二元）一方在賺粉漿肥地，又「推粉」餘下的「粉碴」「油粉」等，既可以之充腸，又可飼猪騾而省下豆餅。而且在農村中不「推粉」也無他事可圖，故「推粉」者常言：「推粉是苦事，莊家買賣。莊家人能幹什麼？推粉就是不賺錢，也可賺點力量（即肥料），閒着也是白閑工夫不打錢，比閑着强的。」

由於粉業的發達，土地的經營亦日趨集約化了。凡「推粉」之家，肥料很多，土地肥沃起來，生產量大增，比普通人家的產額增至一倍以上。因此，有一報上曾這樣載過：

「招遠（粉條）產量二九六，〇〇〇包，價值四，一一四，〇〇〇元，……近年農村破產，各處皆然。但在招遠一帶，農村生活程度及經濟情形，極爲景氣。招遠每年所產粉條收入約四，一一四，〇〇〇元，除去原料綠豆價約二，五〇〇，〇〇〇元，雇工費用約三〇〇，〇〇〇元，器用薪炭消耗及一切雜費用約三六〇，〇〇〇元外，純收益約一，〇五四，〇〇〇元，故招遠農村經濟饒餘，皆粉條之賜也。」

我們雖不能說「皆粉條之賜也，」但粉房在招遠經濟上的作用，農村生活的改進上，確有很大的影

響的。

影響於招遠農村經濟的農村副業，除粉房外，還有——

(二)花邊　粉房的影響，大都在比較富有及有人力之家；花邊的影響，則在於比較貧困的婦女。在招遠的鄉村中，很容易看到兩種現象：一是滿街臭水（由粉房流出的汚水），一是街頭巷尾三三兩兩織花的婦女在工作。這些婦女，就是在織花邊。

花邊織做的方法，分二種：

A. 織麻格——將麻線結成二分或三分見方的網。

B. 在織成的網上綴各種各樣的花。

結網或綴花的原料都由花邊莊（專作花邊買賣的商店）供給，作成後看手藝的高下，論碼計價買去。大約中等手藝，每日工作十二小時，可得洋一角之數。這種婦女，都是在家作工，原料及成品的送取，雖由花邊莊的人負之，可是勤作終日，賠上衣飯，只有一角的工資，亦云苦矣！但因在鄉間無事可作，猶皆趨之若鶩，尤其十歲上下的女孩，幾無一人不作的。

據調查，招遠有花邊莊五十家，工作人數約五六萬人，每年成品約有六十餘萬碼，價值約六四六，〇〇〇元，每年純工資約收入二十餘萬元。縱然工資甚微，但於貧家的補助，却非淺鮮！

（三）油房　即製豆餅條者。在粉業未發達以前，此業很盛，但近來凋零了。凋零的原因，一方為東三省的豆餅進口奪其銷路，一方由於粉業的刺戟，油房多改為粉房了。現在油房五百餘家，較之粉房（三千餘家，）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四）工匠　即木匠、瓦匠、鐵匠等，他們於農隙出外作工，木匠、瓦匠的工資為二角四分，鐵匠則係論件，如一張鋤，一把鏈之類，每日亦有二三角的收入，這種手藝工人，因受粉業影響，多不學習，也日見衰微了。

（五）脚販　在農隙中，亦有許多人到龍口販賣魚米等用品。而南鄉花生油的出口，以及龍口綠豆等向縣中的搬運，需要許多脚力，因之，近年來大車甚多。全縣約有五百餘輛，絡繹於途。脚販每日所得，大約二角至四角之數，一輛大車日可賺洋一元。

（六）其他　其他如編箕斗燒窰，鑄鏂頭，等等，比較的不重要，茲不贅述了。

六

在招遠，因農村副業的發達，得錢容易的緣故，罷高利貸的情形，這幾年來可說是沒有了。在他縣，借錢的利息，據說至少是三分，招遠却是沒有的。如果有抵押品的話，一分五釐算是最高的利息了，若相熟悉，一分利就可借貸到錢的。——這原因，大概有錢者多投資去作買賣，或者買些土地，不願放債。不願放債的緣故，是因為只要勤樸的人，總可以謀生，用不着借債；借債的人，多為浪蕩子弟，雖利重他也要用，但借去後，十

九是追不回來的。

其次，因爲一般人也不像在早那樣的愛惜土地，有錢就買，無錢就賣，買賣土地都很隨便，所以有賣土地而亦不舉債的。

七

因爲招遠臨海，到東三省，朝鮮，俄國去，比較方便，所以家中有弟兄二人，就要有一人出外的，甚至完全出外去謀「發財」，因之，稍有能力者，多不安於鄉生活，而趨向都市，這種現象，近年來尤爲顯着。鄉居士着者，不是有特殊情形，就是無用之踸，招遠年來勞動力的缺乏，就是在流入都市的人太多了。——在都市住過的人，再回到鄉村，已不能再忍受那田地耕作的勞苦，變成了游手好閑的流民，不能參加農村勞動的。

八

其次，還有一種現象，卽中農的沒落。僱工的工資，雖祇三四十元，但在鄉村却是一筆巨款。每畝所收，不過十元，長工的工資和飲食須六七畝的收入才足支付。若有田二十畝，自己無人勞動，便弄得入不敷出，每年要虧欠的。一般中農如果自家沒有人力來經營，都是日趨沒落，而有力者則日見興盛。以故，鄉人都說：有人就有錢，沒人只靠土地不行了。

上述招遠的農村概況中可以窺招遠的農村因粉業之發達，一時有景氣的現象。但骨子裏却依然是

趨於崩潰，景氣現象只是一時的。這不用遠說，我們就以粉業爲例罷。在民國十六七年時粉房倒閉的很多，鄉人只知道外邊的買賣不好，他那知粉條銷售地的香港，因爲香港罷工蕭條了，影響到他們的粉條業呢？

僻處在山谷間的招遠的粉條業之盛衰，握在香港的資本主義者的手中，這是人所夢想不到的罷。然而事實却是如此。因之，我覺得復興農村經濟，不是簡單的振興實業所能解決的。

一九三五，一，二十六日。

九　山西平順縣農村經濟概況

趙梅生

平順爲山西東南邊陲的一個小縣，全境在太行山中人口八萬七千餘。經濟文化都很落後，除縣中特產的黨參及花椒比較著名外，其他一切多不爲人所注意。故各種經濟情形，向無統計，今年春天作者因參加編修縣志苦無材料，才製成調查表十餘種，從事調查。但因爲參與修縣志的人多爲老朽，對於調查，尙取旁觀的態度。官廳的統計材料又十九是閉門虛造，專爲應付上級機關的東西。而農民，尤其是地主和富有者多不願意把他們的實際情形說出來。所以在調查時遇到種種困難，但因作者是生長在這個地方的人，對於農民情形，尙多熟習，故所得材料，相信沒有違背事實的地方，這裏的材料，即係根據這次調查所得的結果茲爲醒目起見，分別敍述如下：

一　土地的分配

全縣的土地分配情形，經整理後，結果如下表：

	戶數百分比	所有地百分比
無地者	一六·〇	——
十畝以下者	四六·五	一八·六

十畝至三十畝者	二五・八	三〇・六
三十畝至五十畝者	九・一	二七・九
五十畝至一百畝者	二・〇	一三・六
一百畝以上者	〇・六	九・三
合計	一〇〇	一〇〇

這個表顯著的特點，是表示土地分配的不均衡，三十畝以上的農民，僅佔總戶口百分之十二弱，而其所有地，則佔全部土地百分之五十一。反之，三十畝以下的農民，佔總戶口百分之八十八強，而其所有地僅佔總畝數百分之四十九。即半數以上的土地，集中在總戶口十分之一強的地主富農手中，而差不多十分之九的貧農，僅依賴極少的土地維持生活。如果我們把各等級農民中每戶的平均畝數寫出來，則這種不均衡情形便更加明顯。

農民等級	戶數	所佔畝數(單位千畝)	每戶平均(單位畝)
無地者	二，八五一戶	—	—
十畝以下者	八，二七九	三四	四・一
十畝至三十畝者	四，五七五	五六	一二・五

三十畝至五十畝者	一，六一三	五一	三一·六
五十畝至一百畝者	三六二	二五	六九·四
一百畝以上者	一〇六	一七	一六〇·二
總計	一七，七八六	一八三	

這不是很有趣的一幅農民分化的圖畫嗎!?三十畝以上的二千多富農和地主，每戶平均有六十畝以上的土地，十畝至三十畝的四千多農民，每戶平均有十餘畝，而十畝以下的八千多農民，每戶僅平均有四畝的土地，其餘的二千八百多戶，則一無所有！其實即在一百畝以上的地主中，也有很大的差別，其中有三四個大地主，除平地外，尚有很大的「山場」，六七十戶的佃戶，每年要收二三百石租。可是我們對於土地的分配情形，完全滿足於這種表面的數字還是不夠的。當然，用這種統計數字來判斷它所代表的經濟情形，在本質上沒有什麼妨害，但如果對於農村中高利貸的剝削及高利貸與地租的結合有相當的明瞭，則將能更深刻的懂得土地制度的機構。這種情形在平順是這樣的：即高利貸者向農民借債，並不以貨幣計算利息，而是用抵押土地，徵收地租的形式來代替利息。即是說，農民在負債的名義下，有了出租的義務，而高利貸者在名義上，對於所抵押的土地，雖然沒有所有權，但是却有徵租的權利，這在實際上和有土地所有權是一樣的。這種，土地所有權轉移的情形，在近年來，因爲金融吃緊，農民得到現金困難的原因，發展得

非常普遍，非常迅速，所以實際上的土地集中情形，比表上面的統計數字，還要厲害好幾倍。

二　地租

平順的地租，十分之七是現物地租，其餘有貨幣地租，及很少的勞役地租的殘餘，但在其爲前資本主義的地租一點上來說，則是一致的。現物地租，用穀最多，其次是米（小米），麥，也有用玉蜀黍，豆子和高粱的。

佃租制度有二種，一種是定額制，每畝地普通是五斗或六斗，也有四斗和七斗的時候，（平順斗的大小，幾至各村不同，這裏是以官斗計算的。）這要看土地的肥瘠，及用何種產品徵租來決定。一種是分租制，於收割時，地主與佃戶雙方就田中分配，大多數是均分，兩方各得農產物的一半，也有四六分的，地主得四成，佃戶得六成；地主六成，佃戶四成的很少，這大概是因爲土地不肥沃的緣故。像這種分租制，在平順叫做「代地，」凡是「代地」的種籽歸地主負擔，普通是在分租的時候，便將下年的種籽，從地主所分的一份中除下。貨幣地租在學校，寺廟，村莊，官廳的土地中最多，每畝地二元、三元、四元不等，今年因爲糧食跌價，租額亦減低。勞役地租，完全是以出租土地，來代替工資，即農民爲地主傭工，但地主並不給他工錢，而是租給他若干畝土地，不向他徵租來代償工資，這種條件，大半都是苛刻，所以除極貧而又人口很多的農民外，大部都不願意在這種情形下，來租佃土地。因爲這種佃農，既十分貧困，又有很多的人口，無處使用他們的勞

動，便以一個人爲地主工作來換得一小片土地，維持生活。

佃農的確實數目，很難調查，因爲純粹佃農僅是佃農中的一部份，半佃農的數目，恐怕比佃農還要多，在事實上，因爲租佃條件的苛刻，只憑佃地是很難維持生活的，而十畝以下的貧農，又因不能維持生活，大多數是除耕種自己的土地外，還要佃租幾畝土地，這種情形，和工資制度中的「補助工資制」一樣，使佃租條件愈加惡化。我們看到這種情形以後，當更可以確信：「在小農制度支配着的國家，因爲農民有小片的土地，所以他們的生活，也更惡劣，農民的小片土地，僅造成被殘酷剝削的條件。」這在平順縣便得到了有力的證據，因此，十畝以上的貧農，都可以做半佃農，負債的農民，從我們在上面所說的看來，也可以看做半佃農，再加上佃農，這個數目，雖然沒有確實統計的數字，估計要佔總戶口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恐怕祇會失之過低吧。

佃租性質亦分兩種，一種是永佃制，訂有契約，佃農並可以將佃權轉讓，詳細情形，我們將在下一節加以敍述，這裏僅說第二種；非永佃制。在私人所有土地和「平地」（平順因多山，特名種地爲「平地，」其不能用牲畜耕種及無畝數的山坡地，叫做「山地」或「坡地」）中，大半是非永佃制。佃期不等，普通在十年以下，且多僅用口頭契約。用文字契約的，都規定年限，用口頭契約的多不規定年限，無論在什麼時候，佃農都可以退佃，地主也可以隨時將土地收回。佃地的手續也很簡單，一般的情形是佃農央請中人向地

主請求，條件講好後，這種手續就算完結。沒有押租，佃農的種種額外義務，如所謂「年雞，」「年米，」「送工」等等，在這裏也沒有的。祇不過佃戶對於地主，在禮貌上總得恭敬點，這也是一種身分制的殘餘。又在歉收時，可以減租或欠租，沒有免租的。欠租也有加算利息，也有不加算利息的，這要看雙方的感情及關係若何而定。地主對於佃戶亦沒有任何可幫助，牲畜，種籽（分租制除外）農具，農舍完全由佃戶自備，甚至田賦，「地畝」（地畝捐及村社開費，均按畝攤派，叫做「地畝」）等，都出自佃戶，地主只坐享利益。

三　社田族田及外戶

在平順東南很大的一帶山地（由縣東至西南長約一百三四十里，廣二十餘里，）除個人私有外，半數以上是屬於「里社」（一「里」七八村至十餘村不等，「里」分數「約，」集數「里」爲「鄉。」此制大約始於明代，清仍其舊，民國雖廢里改區，但徵糧及農民饗神賽社調解爭端，仍沿里制。全縣共有十七里，）和族所有地，在山西安澤，沁源等靠山的縣份，也有這種情形。耕種這種山田，是很苦的，山的坡度，大半在四十度以上，又全係石山，耕種的農民用钁（類似鋤，較厚稍狹）將石頭掘開，就坡下種，不只不能利用畜力，連犂頭，鋤鍬等全不能用，僅用手和鐮刀钁頭等耕作，其生產力之低，勞動狀況之惡化，生活的貧困可以想見。家父有幾句形容這種佃農的話，說得異常逼眞，他說：「一個『逃荒』的男子，挑一付筐籃，一頭是些破爛衣服，一頭是他們的孩子。一個提籃子的婆娘跟在後面，籃子裏邊有幾個碗，也許還有個『沙鍋』

他們走到山上一個地方停下來，開了一孔土窰，用三塊石頭支了一個鍋，再租上一片山地，這就是他們的一生了。」這種佃農約一千餘戶人口七八千，約佔總人口十分之一，其佃租條件，亦多不同，而且大半係由河南來的移民，所以在這裏特別加以敍述。

他們的特點是：

第一，全部是永佃制，非永佃制可以說是例外，這種永佃制在開始佃地時，立有契約，載明租額，及其他條件。佃農在履行契約，按期交租的條件下，可以有永久的佃種權，地主不能任意將土地收回，但因爲是永佃，所以常載明每若干年（以五年爲最多）可以變更租額一次，並更換契約。在實際上所謂變更租額，就是加租，決沒有減租的，也有在契約中不載明而臨時加租的；所謂「換契」佃農還得出若干契紙及手續費，地主大半用這種方法，對佃農榨剝。所以每逢加租或換契，常常惹起佃農劇烈的反對，有時涉訟，有時則直接用武力反抗，且對於永佃權，也常起爭論。佃農總是將永佃權解釋爲所有權，將地租解釋作田賦（作者曾研究地租與田賦的關係，疑田賦係由地租轉變而來，與資本主義的土地稅不同，此可得一左證。）且沒有加租權。而地主的解釋則恰與這相反，所以常起爭端。近幾十年來，不斷的發生這種情形，有一次是族田的佃農，反對地主採伐田中的樹林及加租的。有兩次是祉田的佃農反對加租，事情擴大的很嚴重，其中一次用訴訟的方法解決，佃農失敗。一次起了武力衝突，佃農曾死傷若干人，田舍被焚，但佃農却得到土地

所有權，這種事情，發生在縣東金剛坡，所以一般人便把這件事情叫作「火燒金剛坡。」事後佃農並將這次事件演作戲劇，以作紀念這種情形，很可以看做中國農民爲土地而鬥爭的圖畫的一角。

第二因爲佃農有永佃權，所以也有轉佃的權利，不過普通情形，轉讓時須得到地主的同意，或向地主出若干手續費。轉佃時，租額不變更，唯因前佃戶在墾荒時，對土地加了工，改良了土地的耕作條件，並有時還附帶田舍（俗名庵場）樹木等，所以新佃戶須向前佃戶出若干代價，叫作「鑁頭錢，」他們中間所立的契約，亦叫做「鑁頭契。」

第三是貨幣地租，在社田及族田中，多半通行貨幣地租。有在契約中即載明是若干錢的，有的雖載明是租穀，但多在收租時臨時折錢。租額因係山地，沒有畝數，很難計算，私人所有的山地，亦有用貨幣計租的，但不多。因爲用貨幣計租的原因，佃農與地主間的紐帶，相當的鬆懈起來，所以條件比較優越的少數佃農，轉又僱用工人來耕作，剝削他的剩餘勞動，逐漸變成了富農。

第四：一般人的習慣，總是賤視這樣的佃農，（稱之爲「草灰，」未知何意。）又因爲他們多是外戶，所以豪紳士棍常常利用他們的無知與勢孤來欺壓他們。拘捕，毆打，處罰的事情是常見的。實際上，社田和族田的支配權，是操在幾個紳士手中的，不只地租多被他們侵用，而且對於佃農有很大的權利，可以任意壓迫。這種佃農在政治上的地位，亦較一般農民爲低。

四　經營情形

本來，經營單位的大小，在農民經濟中是很關重要的，作者調查時，亦曾製有調查經營單位及經營情形的表格，如耕作畝數，其中所有地若干，佃地若干，耕作牲畜，每畝投資等，但結果很不好！因此僅能將作者所知道的情形，略述如下。

經營單位，以十畝上下的爲最多，少數在二十畝到五十畝之間的。五十畝以上的，全縣只有五六十家。一百畝以上的，全縣僅三四家。因爲三十畝以上的富農和地主，全是將土地出租一部分，只留一部分自己耕種，所以田地耕作的單位，分割的極細，每方耕地的面積，亦因爲常常轉移所有主，及自然條件的限制，都分成極小的細條。（分成細條，恐怕是用犂頭的關係，如果不用犂頭，或要分割得更小。這可以證明工具與生產力對經營單位及經營性質的關係。）不僅沒有新式農具的採用，即畜力的利用，也很有限，如豆口一村，有人口一千餘，地一千六百多畝，所有的耕畜，僅騾子六頭，馬二匹，毛驢五十幾頭，牛十餘頭而已。這種原因，一方面因爲經濟的關係，即經營單位小；一方面則由於政治的關係，因爲近年來「拉差」頻繁，許多耕畜都是一被拉去，再不回來，養耕畜反成了災害，當然誰也不願意養。其他人造肥料，也未被採用，水利事業因爲地勢的緣故，亦絕無僅有，全縣有水利的僅二千來畝，所以一般的說來，是小農經濟，生產力極低。在這裏是得不出「因爲所有權集中，所以經營單位也擴大」的結論來的。經營單位小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爲

地租高出租土地，比雇工經營還要有利。越是這樣，土地的耕作條件也越惡劣，土地改良的可能也越少。磽瘠的土地上，載着貧困的農民。誠如馬扎亞爾所謂因爲人餓着，所以土地也磽瘠了，中國土地的肥瘠是與農民的肚子成正比例的。（手邊無原書，大意如此的。）

五　高利貸

這次在鄉間的時候，第一使作者驚訝的，就是高利貸的普遍那種情形，眞是使人難以相信，例如平順，三十畝以下的農民，幾於家家負債，換句話說，卽負債的農民，要佔總人口百分之八十！這是何等驚人的事實呵！在負債的農民中，十畝以下的農民負債最多，三十畝的農民及無地的農民較少（因三十畝的農民比較寬裕，無地者缺乏抵押品，）僅在豆口里（大小十八村，人口約六七千，）就有專放高利貸的地主三家，當舖一家，其中一家放債三萬餘元，其餘二家及當舖，亦各近萬元，再加上其他十來家較小的放債者，所放債款總額，至少也有七八萬元，如以人口爲比例來推算全縣，高利貸總額當在一百萬元以上，如果我們把牠平分在百分之八十的農民中，卽平均每人負債十三元，每戶負債七十三元。這個數目在富有的人看來，當然是很小，僅七十三元，也許不足一餐的用費！但如果想一想不足十畝的農民，全年收入僅數十元。無論怎麼刻苦儉省，決不能逃出高利貸的剝削，債額只有一年比一年增加，以至於破產。而實際上，正是這種情形，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在高利貸壓迫與破產的威脅下渡生活！

高利貸的利率，普通是月利三分，卽百分之三十。至少是二分利，也有四分利的。大概是債額越小，利率越高，條件也越苛刻。農村的借貸平常在百元以下，尤以三四十元的借貸爲最多。償還期間，在習慣上並不一定遵守契約上的規定，雖然契約平常多載明是一年或二三年到期（也有幾個月的），但負債者如果有償債能力，卽早期償還，亦爲債主所歡迎。其次如欠債者，能按期繳納利息，延期亦無不可，普通償債及納利，多在秋收以後，亦有言明在年底淸償的。

農民向地主富農借債，以有抵押品及抵押品確實可靠者爲前提，但在現在的情形下，卽具備上述條件，亦不容易借到，因爲農產品跌價，金融奇緊，去年到期的債款，卽差不多全未償還，在事實上農民的確沒有還債的能力，但是臥在鴉片燈下吞雲吐霧的高利貸主總是說：「現代的人心全變了，只想借錢不想還錢。」所以債主對於放債總是很小心的，對於借債的人，總要加以多方的考查，還要中保人可靠，才肯投放。豆谽村有個大債主（放債約三萬）在他的座右貼一條標語，上面寫道：「能防親紳遠秀，自然不差分毫」「防」動詞，卽預防，「親」親戚朋友，「紳」紳士，「遠」遠道的人，「秀」秀才。因爲這四種人最難討債。這個標語的意思卽是說：「如果不把錢放給親舊，紳士，遠方的人和秀才的話，那末討債就可以不差分毫了。」此翁可謂深知此中三昧，而這個短短的小座右銘，也可以使人意味到高利貸與債務者中間的情形了。高利貸主估量一個人的償債能力，連他的女人都計算在內，這決不是笑話，賣妻償債是常見的事情，第

九十合期「新平」（該縣出版之刋物）有一篇通信中有「咱村（按爲老甲峧村在縣東北第三區）六十戶人家，三年以來二十至四十歲的男子，賣去老婆者共十三人。」他認爲這是人權不發達，並沒有指出這種現象是經濟壓迫的結果，其實一個人，如果不爲經濟所迫，決不會賣老婆的。固然，農村婦女的地位很低，是一事實，但高利貸主把債務者的老婆，當作財產估計在內，逼着賣老婆也是一事實。放債者在平常的時候，對於附近的居民，都要給他一個計算，可値若干錢？放債時，最多能放給他多少？所以高利貸主對於他附近居民的財產狀況，倒是比誰都清楚些。

借高利貸，決沒有用到生產上，而且因爲利率過高，卽投到生產上也無利可圖。這從借債者的經濟地位全是三十畝以下的農民一點上看來，亦可以知道，舉高利貸不是爲着生產，而是爲着償債，償租及繳納捐稅等之用。

還有一種情形，在上面已經說過，卽高利貸的利息，不以貨幣計算，而用地租代替利息。這種借貸，條件更苛，普通每三元出租米一斗三升（官斗。）這在前一兩年，糧價很貴的時候（平順糧價，在前一兩年，麥每石十四元，米十一元，谷七元，玉蜀黍五元；黃黑豆十三元。今春爲麥三元五；米一元五；谷一元五；玉蜀黍一元；豆子三元）這是很合算的，且地租有一定抵押品，比較的可靠，所以這種借貸就很快的發展起來。而且在債務者不能納租時，債主可以沒收所抵押的土地，作爲抵償，沒有虧本的危險。作者今春在縣編修縣志

時修志局的房東即是從這種方法富有起來的，聽說他在去年一年中，即沒收了數百畝土地。在某一個小村中，半數以上的土地都歸了他，所修的住宅異常壯麗，題其額曰「復積起家」，當時作者想，如果題作高利起家」那就更名符其實了。

這裏，我們將高利貸最常用的契據形式寫出來，想亦為一般研究農村經濟的人所樂於知道的吧。

正面

立揭帖人〇〇〇今因使用不便揭到
〇〇名下揭本大洋若干元以本人某處白地幾畝作押
其地四至各照原界大小根條果木相連一切在內同中言
明每年出租若干倘有本利不到改歸主耕種為業恐口無
憑立字存證
某年某月某日　　立揭帖人〇〇〇押

反面

后批官糧若干
同中人〇〇　〇〇　〇〇

谷物借貸亦是常見的事情，這種借貸多在春荒的時候，債額最小，通常在一石以下。利率亦最高，普通是「春借一，秋還二。」即在麥秋時償還，亦須較原額加倍。如以百分率計算，當在百分之二百或百分之三百以上。

當舖和質店，全縣共三家，資本二千元至一萬元不等。利率都是百分之三十。為小額高利貸最主要的機關。

還有一種借貸形式是「預賣」，即農民在春荒時，需要款項，把自己尚未收穫的農產品預先賣給商業資本家，而得到若干現款。這種交易從表面看來雖是交換，但事實上則是高利借貸，因為在「預賣」時，

對於農產品的作價很低，通常僅合市價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所以這裏面亦包含很高的利率。

六 商業

平順以前有商號百餘家，近因銷路縮小，虧累倒閉，只剩九十餘家。縣城有十三四家，其餘散在各村中。商號資本大多在百元以下，百元以上的僅十餘家，五百元以上的僅兩三家。全縣商號以雜貨店最多。約六七十家，其餘布店五六家、糧店三四家，藥舖三四家，烟店十來家。

依據這種數字，我們很可以斷定平順商業十分落後。但事實上這並不能表現商業的眞實情形，因爲：

第一、平順縣的最大宗交易是花椒和黨參（花椒和黨參都出在縣東北第三區，花椒以豆口里爲最多，年產總額約十萬斤，每斤市價七八角；黨參皆產於山巔，產額約三四萬斤，前幾年毛參每斤一元多，大參二元，去年慘跌，每斤一角上下，初上市時僅四五分）但此等交易，並無市面，又無專營商號，多由地主富農或行商臨時收買運往河南涉縣或彰德批發，亦有遠運天津上海或錦州的，地主富農不僅做此種交易，且兼做糧食投機及其他投機事業，所以實際上的商業權，不操在有舖面的商號，倒是操在地主手中的。故商業資本與地租高利貸，三者名異而實則同。

第二、平順地面遼闊，各村星羅棋布於山峽中，故各區自成風氣，並無經濟中心，農民需要貨物，或出賣農產品，多到鄰境縣城或集鎮實行交易，所以並不能以境內商號多寡來判斷交易範圍的大小。

七　捐稅

平順的捐稅計有下列幾種：一、契稅，二、印花稅，三、烟酒稅，四、牙稅，五、六畜稅，六、皮毛稅，七、斗稅，八、婚姻捐（官婚書）九、戲捐，十、營業稅，十一、牌照稅，十二、產銷稅，十三、當捐，十四、附捐，十五、區款附加，十六、警餉附加，十七、巡緝隊捐，十八、官佣，十九、所得稅，二十、村捐。

一看這些名目，就可以知道捐稅的苛繁了。而且其中印花稅，六畜稅，皮毛稅三種，並不是按一定手續徵收，而是按戶派捐。不管你是否須要貼印花，也不管你是否曾買賣牲畜，或是否出賣過皮毛，全是按戶捐派。所得稅也要攤派，不過這不是向農民派，而是向商號派。本來所得稅是規定每年贏利在五百元以上的商號才有，但在平順，則不管這個商號的大小，贏利多少，一律平等平均攤派。在雜捐中，巡緝隊捐最大，每年二萬七千餘元，也是按戶派捐，農民雖多方反對，好幾次向縣政府要求取消，但都無結果。村捐是一種臨時捐，沒有一定數目，政府想要多少，便徵多少，什麼時候要，就什麼時候徵，一年徵二次三次不等，十八九年時，有在一年中徵至五六次的。

在這裏我們還應該注意的是捐稅的平均攤派，這好像是很公平的一種辦法，但實際上因爲農民的貧富懸殊，在這種平均的字面下寓着極大的不平等。這差不多把捐稅的全部完全壓到貧農的肩上去了。

一九三四，七，二十八日。

十　山西屯留縣農村經濟實況

高苗

一　人口總數

屯留是山西的一縣。在政治上，他不能不受山西省政治的影響；在經濟上，他又不能避免一般經濟恐慌的襲擊。但我們所要研究的，不是屯留的一般經濟地位，而是它的農村經濟．因此．我們就先從它的人口說起。

屯留人口總數，依據當地縣政府調查，在民國二十年時爲十二萬零七百二十一人。民國二十二年爲十二萬二千九百二十五人，兩年之間增加二千二百零四人。人口增加的速度，實在不小；但到本年（屯留縣政府，每年在九月以前調查一次）統計的人口數，只有十二萬三千一百二十三人，僅僅增加一百九十八人。這種增加速率變更的原因，最主要的是糧食不值錢；其次是捐稅太重。

由民國二十年到民國二十二年，某軍尙駐在屯留，今日徵發糧秣，明日攤派款項，捐稅比現在尙苛重；尤其是那些隊伍，不守紀律，未免滋擾民間，所以屯留人民，幾乎每天都在逃亡之中。

但是，這兩年間的人口，竟能增加二千二百零四人。在這方面看來，不能不驚嘆屯留人民生殖能力之大了！但自民國二十年某軍開去之後，爲什麼屯留人口增加的速度，反遠不及前兩年呢？這，大概說來是：

第一、中國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一環，當然要捲進世界經濟恐慌的漩渦中；尤其是自民國二十二年洋米進口激增，麥棉借款成立之後，更影響到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在山西有一句俗話，「屯留長子米糧川。」糧食跌價之後，對於「米糧川」的屯留，威力更大。屯留人民百分之百都從事農業，所有應用的工業品，如煤油火柴農具等，一概要拿糧食換來，所謂爲買而賣。自經濟恐慌之後，工業品固然跌價，但遠不如農產品跌價之速。因此，農民因剪刀問題而極度的破產，就影響到生活，影響到人口了。

第二、自從民國十九年十月起，某軍駐在屯留。於是屯留的農民除了供給山西的正式捐稅之外，還要攤派該軍軍餉，還要攤派糧秣。截至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底止，計攤派麵粉二百零三萬三千一百零五斤，小米二百三十萬六千五百二十斤，玉麵一百一十三萬零九百一十斤，麩子五萬五千八百七十五斤，谷草四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三十斤，大洋三萬六千三百五十六元。此外往來差務，派遣差車，這項損失無從計算，至少總在十萬元以上。所以屯留農民，將自己的血汗榨盡之後，不能不逐漸貧血死去。人口增率的降低，這是第二個原因。

第三、是捐稅太多（詳細情形，留待後說，）官吏與紳士狼狽爲奸。民國二十年被告撤職的張縣長，刮錢五萬餘元。民國二十二年被告丟差的潘縣長，刮錢三萬餘元，而地方紳士的發財，無從計算。農民雖能吃苦耐勞，也不够官吏的搜刮。所以最近一年以來，人口增率急速的低減了。

二　農民的土地分配

屯留的耕地面積，按照民國二十二年七月的縣政調查所載，爲五十五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畝，其實官廳統計，絕不可靠。據我個人的調查，當爲七十萬畝。

屯留的戶口，在民國二十二年是二萬零九百六十二戶，民國二十三年是二萬零九百七十戶，一年之間，計增八戶。屯留人口總數爲十二萬三千一百二十三人，平均每戶六口。

要是以平均六口之家的二萬九百七十戶，來分配這七十萬畝的耕地，每戶應得三十三畝。但實際上土地的分配，並不能如此單純。

據我個人的調查（到各村詢小學教員）屯留地主共有二十戶，富農三百八十戶，佃農二千五百戶，中農與貧農共爲一萬八千零七十戶。據我推算（因爲調查時，未將中農貧農分開），中農約有一萬四千三百三十戶，貧農應爲三千七百四十戶。茲列表如下：

戶口統計表

	戶口數	百分率
地主	二〇	〇·一〇
佃農	二，五〇〇	一一·九二

富農	三八〇	一・八二
中農	一四，三三〇	六八・三三
貧農	三，七四〇	一七・八三
總計	二〇，九七〇	一〇〇

由上表，我們可以看出最多的數目是中農，佔戶口總數百分之六十八又小數點三三。次多數是貧農，佔總數百分之十七又小數點八三。再次是佃農，佔總數百分之十一又小數點九二。最少者是地主與富農。富農佔百分之一又小數點八二，而地主僅佔小數點一。

但耕地的分配，就不是這樣的次序了。茲將耕地分配列表如下：

耕地分配表

	耕地畝數	百分比
地主	一七〇，〇〇〇	二四・二九
富農	三八，〇〇〇	五・四三
中農	四三〇，〇〇〇	六一・四三
貧農	三七，〇〇〇	五・二八

公產	二五，○○○	三·五七
總數	七○○，○○○	一○○

雖然地主僅佔戶口總數的百分之○・一，然而他們所保有的耕地面積要佔地畝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四・二九幾佔屯留耕地的四分之一！他們正因為有這樣多的耕地，也就「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了。他們將耕地一塊一塊的分租給佃農，所有地內的糧銀公費，一概由佃農負擔，一切肥料種子農具等，當然也要由佃農自備。他自己只要趕秋收之後，吃席算賬就行，普通的租額多半是每畝五斗黃谷。年景好時，每畝可收十二斗，年景不好，則七八斗五六斗不等；但平均計算，每畝收穫十斗，除去租谷五斗，實收五斗。然而一切捐稅與攤款，都由佃農負擔。糧價高時，佃農尚可維持生活，而今糧食不值錢，捐稅又特別重，佃農就是傾缸倒盆，將所有剩下的生產品，完全出賣，仍有不敷捐稅款項者。所以近二年來，佃農逃跑的很多，因為減租地主不許，捐稅又不能不出，其結果只有逃亡之一途了。但這，只是人口不多，無兒女牽掛的佃農才能辦到。大多數都有妻子有兒女有父母，又兼祖宗墳墓所在，他們是逃也逃不了的。地主也知道他們走不開。非租種他們的耕地不可，當然不肯減低租額。有些地主甚至藉口糧食不值錢，不敷開支，增高租額。

除去佃農租種地主的耕地之外，一部分的耕地落在貧農手裏。貧農單種自己的區區三五畝地，不夠種，租種地主的田地雖然不合算，但也比坐着吃喝好些；因此貧農也含有半佃農的性質。

極貧的農民，有的給富農作長工，有的給富農當短工，工資平均每天五分，至多三百錢（不到六分。）在鋤田時，短工工資有漲到一角者。

三　農民的生產品

他們不管自耕農也罷，富農也罷，絕沒有一個使用機器農具的，貧農佃農那更不必說了。他們耕種田地，除了使用他們自己力量之外，就是使用畜類。有的人餵牛，有的人餵驢，富農都養着騾子與馬。這就是他們所用的動力——人力與畜力。

農具還是乃祖乃父所傳來的木犂，獨脚耩斗，兩脚或三脚耩斗。鈀子，鋤，鐮刀等等，工作之緩慢，自在意中。

肥料也不過人糞、家畜糞、柴灰、壓楷等，絕沒有使用化學肥料的。

由他們所使用的動力，由他們所使用的農具，由他們所使用的肥料等看起來，也就可以決定他們的收穫了。

上邊已經說過，他們的收穫，平均每畝只收十斗。

屯留出產的糧食，最主要的是小米，麥子，其次是高粱玉蜀黍，再次是豆類。在民國二十年二十一年時，平均市價小米每斗八角，每斤六分一釐至二釐。現在小米每斗只值二角八分，每斤只值二分一釐了。麥子

在那時，市價每斗一元，白麵每斤九分；現在麥子每斗只值三角五分，白麵每斤只值三分五釐。其餘高粱玉蜀黍及其他雜糧等，無不大跌特跌。

屯留農民（地主除外）平常所食用的東西是小米，其次是玉麵。親戚往來，則食三和麵（豆麵高粱粉麵與麥麵數種混合者）。他們種的麥子，雖然要占耕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但他們絕不肯食用麥麵。中農貧農每年只在中秋節與舊曆年時食麥麵一兩次。他們揀壞的東西吃，揀好的東西賣，爲的是納糧，爲的是交捐，而今糧食更不值錢了，不但好的東西（麥子與豆類）不敢吃，就是次一點的小米玉蜀黍也不敢吃飽了；因爲肚子可以忍飢受餓，而捐稅可不能不交。

四　農民的負擔

由上一段，我們知道現在糧價，比較民國二十年時，小米跌落百分之六十五，麥子亦跌落百分之六十五。其餘如高粱玉蜀黍豆子等，跌落的比率，大致彷彿。然而農民的負擔，卻沒有減輕什麼。現在先就農民的捐稅負擔來說吧。

屯留的田賦，連同附加的糧捐，前數年就是每一兩銀子徵收二元九角八分，現在名義上雖仍舊貫。但實際上，農民所交納的遠在三元以上。因爲屯留（其實不只屯留）在滿清時代以及民國二十一年以前，所有田賦都是由各花戶將自己應納的田賦，逕交當地縣政府里老及單頭不過負一種催交的責任罷了，

權限並不很大；現在變更舊制，農民自己應交的田賦，不得逕交官廳。各花戶應當把自己應交的田賦款項交給單頭，單頭再交給里老，然後再由里老交給官廳。如此一來，名義上是每兩銀子以二元九角八分折算，但實際上就遠在三元以上了。再還有可笑的事情，就是縣政府限令各里老（屯留共有二十四個里老，專負催交田賦與辦理差徭）每月交款若干，不足額者即逼令借債，里老的債務利息又分派到各花戶的田賦上。有的里老不到別處張羅，就在縣政府寫一借債字據，書明借債若干，月利五分。於是乎一轉手間，大洋纍纍即飛至官吏手中。不用本錢，就能放債，千里做官為的什麼？他們何樂而不為呢？但另一方面農民的賦稅加多，債臺也就築的更高了。

屯留田賦額，上地每畝七分九釐二毫，中地每畝六分零五毫三，下地每畝是四分一釐六。我們就以中地計算吧，種一畝地就要交納一角八分二釐。就這，臨時的田賦附加與官吏的高利盤剝，尚不曾計算在內呢！

買賣田地，當然要稅契。稅額是值百抽七，官紙二角，證書一元，此外還有印花與村長的手續費。再，還有滿清時稅過的契紙必需換契，加蓋民國印信，與賣買新契稅額差不多。山西當局名此為驗契，縣府官吏時常下鄉查驗，對照村中地畝社賬，詳細查對。因此各鄉村俱有假地畝賬一本，以備不時查驗；但農民們不識字的太多，時常有人將已經出賣之地契重行拿出，一與村中社賬對驗，契紙便多出來了，當然要罰，再或契

紙比社賬上的地畝少二三分地，也要罰！因此，農民們一聽得「查契的來啦，」便心驚膽寒，大有牛羊就屠不勝觳觫之勢。

賣買家畜，徵稅百分之九。屠宰稅豬羊分別徵收。農民趕車赴外縣，或隣縣農民趕車來屯留者，要抽收一種過境稅，名爲騾櫃捐。另外，還在大路附近抽收一種過路捐，騾馬一角，牛驢五分，名爲橋捐。農民結婚要領結婚證書，定價四元八角，不領者罰。鄉村農民雖不記賬，但每月要給村公所發幾元印花。此外如臨時募捐吏警勒索及其他起錢名目，說不勝說。

以上是屯留農民捐稅的負擔，以下再說村政負擔。

在屯留一方面保存着舊日的制度，如上邊說過的里老單頭之類；一方面又新設了一批村長副村長及閭長。其結果，只給農民增加了許多負擔，增加幾層盤剝。如上說的里老單頭都有薪金，由各村公攤。村長年薪三十元，副村長十五元，此外還有村警費及其他公雜費，不易計算。村長廉潔時，公雜費不過數十元；但大多數村長都是土豪，慣於敲詐，不但公雜費盡量增多，甚至巧立名目，如書記費、筆墨費、車馬費、旅費，更還有什麼「其他費」等等。因此，普通農民視村長的蛇蝎，而地主土豪則視村長如搖錢樹，到選舉時，賄賂公行，醜態百出，蓋不亞於先前選舉議員時之情形也。

其次，再說祭祀的擔負。

祭祀，好像是說信仰自由，願奉神者祭祀，不願奉神者不祭祀。但在鄉村，絕不是這樣情形。農民個人的祭祀，可以任便；但村中公祭，那就不能自便了。不管各個人信神與否，村中祭祀的花費，總要由全村農民負擔，普通都按照地畝公攤。領導祭祀者名為社首。社首普通都是由地主與富農充當，中農也有充當社首的；但貧農與佃農絕沒有充當社首的可能。這些社首專辦祭祀，依照村中習慣，按時燒香，演戲。這項花費大小村不等；三百戶五百戶的大村，每年至少也需三百元，就是七八十家的小村，每年的祭祀費也不下百元。——這是各個鄉村的公祭，還有十村八村聯合的大祭，名之曰「賽」，花費就更多了。再還有全縣的公祭，不過這公祭現在已經變成私祭了。他的形式是每年由地方紳士派兩家「土財主」代表祭祀，一家財主代表五月初一的公祭，一家財主代表七月初七的公祭。一年兩次，每次祭祀花費至少六百元，概由代表祭祀的財主負擔。而土財主因為名譽關係，亦樂為之。於是屯留財主每年破產兩家。

依我個人的估計，屯留祭祀的耗費，每年當在三萬元左右。這也是農民極重的負擔。

這些捐稅負擔，村政費負擔，祭祀費負擔，都是農民共有的負擔。此外，還有特殊的負擔。如地租之與佃農，高利貸之與佃農貧農自耕農。地租在第二節已經說過了，茲不贅。現在再說說高利貸。

本來在鄉村是借債的多，放債的少；尤其是這個年頭，借債的越發多了，當然利息非漲高不可。

先前借債的只有貧農與佃農，現在中農也借起債來了。簡單的原因，就是先前糧食值錢，價高，賣了糧

食可以付捐稅，可以交納村中公費與祭祀的負擔。因此，先前借債者只有佃農貧農，而自耕農是足夠維持的。現在却不然了，不但佃農貧農必需舉債維持生活，就是自耕農，一切的負擔大部分都要靠借債了。

而放債的戶口，只有地主和富農。他們雖有錢，但因舉債者多也就奇貨可居了。所以在先前放債是月利二分，就是一百塊錢每月賺二元利錢；現在莫說二分利息不成，就是三分四分也不行了。普通都是月利五分。就這，還得信用好，有抵押，尤其是有面子才成。够這三個條件的只有自耕農，而貧農與佃農是不够資格的。所以越發貧窮的戶口，出的利息越發高。他們借債的利息，普通都是老一分（在河北，叫做大一分）就是借債百元，因為出利錢十元。實際上，佃農貧農舉債的利息，比老一分還高；因為放債的地主與富農，為着名譽關係，為着避免法律的干涉（山西當局法定月利二分）他們放債時，都是令舉債者在字據上書明「並無利息」字樣。比如貧農舉債十元，在字據上必須書明「借某君太洋十元，並無利息，一月為期。至期不還，情願將某物作抵」云云。放債者預先扣去利錢一元，只拿出九元，卽可到期收回十元。如此一來，放債者名譽又好，又不怕涉訟，尤其是名義上老一分，實際上，因為預先扣去利錢，月利遠在老一分以上。所以普通農民（中農，貧農，佃農）越沒法生活，而地主與富農越能大發財源，利市百倍。

因為有這樣高的利息，不但地主與富農盛氣勃勃，就是商家舖戶也都放起債來了。「還年頭兒作什麼也不如放賬。」這是目前流行的格言，「放賬」就是放債。就是說，買賣可以不作，而債却不可不放。因此，

屯留區區七十七家的小小商號幾乎都出放高利貸。

商號出放高利貸，比較起來總算是平的月利五分；但非有舖保不可。貧農佃農有舖保面子的絕無僅有，而中農有這種面子的也很少，所以商號放債不及富農與地主的順利。

總之，糧食不值錢，農民捐稅重，負擔重，非舉債不可。雖然這是走向地獄去的路兒，但只好走去！

五　農民的識字人數

到現在，農村經濟完全破產，大部分的農民（中農，貧農與佃農）都沒法生活了，那裏還能去念書呢！地主，全屯留只有二十家，富農也祇佔戶口總數的百分之一點八二，這樣，能够識字的人也就有限了。

在屯留，比較大一點的村莊（五十戶以上）都有一座初級小學校。但這亦徒有其名而已，實際上，教員沒有教員，學生沒有學生，學校時常關着門，上着鎖。

因爲縣政府的公事命令各鄉村必須設立學校；而且每年趕春季，縣政府就給各村委派一個小學教員，因此，各鄉村農民逼於威勢，不敢不立學校。

但是農村的兒童，在七八歲上就開始給他父親向田裏送飯，替母親看小孩，拾糞，拾柴，幫他的父母作工了。在先前，農村經濟還不曾如今日之破產時，農民生活勉强可以維持，兒童們還可以念書；但也只是較開明的家庭。至頑固一點的父母，不佩服學校，不贊成「念洋書，」寧使兒童失學，也不肯讓他去學「洋先

生。」現在，這種頑固的農民倒少了，但也來不及了，因爲破產。

所以貧農與佃農的兒子不能念書，中農在昔不肯「念洋書，」現在肯念，也因生活逼迫不能再念了。然而，縣政府的公事，不能不立學校。於是乎就將敎員請來，放在學校裏就算公事完畢，只要趕年底交清薪水就成，其結果，徒增農民的負擔，於農民兒童絲毫無益。所以現在關門的學校多。

再一層，敎員是縣裏委派來，他當然喜歡有學生，但沒有學生，也不要緊。因爲年薪八十元總是要到手的。而且農村破產，智識份子失業者也多，大家都爭奪敎員的位置。得到這個位置時對於破產的家庭或有相當補救。因此，你爭我奪，都到縣政府去運動，而學問好，有廉恥有品行的敎師，反而不能敎學；倒是無學識無品格的敎員充滿了鄉村的學校。

因此，農民越發不齒，學生越發的少。敎員或者在家裏睡覺，或者在學校裏睡覺；只要等敎育局派員查學時，自己到校支應公事就成。

初級小學是這個樣子，但高級小學却不能這樣了。因爲高級小學設在城市地方，而且花的又是全縣的公款，當然辦的比較好些。高等小學，全屯留官立四座（其中有一座女校），私立兩座。但大都招不上學生，因爲初級學校辦理不善，農民無力供給子女念書，所以各高級小學招不齊學生。

成人識字的太少，全縣至多有五千人，識字人數佔人口總數百分之四。全縣婦女識字者，至多不過二

十人。現在有女子高級小學一座，兩年招生一次，但招不起來。現在高級一班只有五個女生。

假如農村破產沒法挽救，農民繼續貧乏下去，恐怕這幾座學校有倒閉的趨勢，全體農民要更黑暗吧！

六　農民沒有老婆的多

山西實行買賣婚姻，婦女就是財產。

結婚當然是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農民子女早在兒童時期給他們訂婚了。訂婚必須男家給女家相當的金錢，首飾及布疋之類。媒人等於牙紀，雙方賣買交易，身價爭議，全靠媒人從中說合。先前價錢頗昂貴，現在也隨着糧食的行市跌價了。如果男孩子與女孩子年齡相當時，市價多半是每歲四元，另外還有首飾布疋。比如男孩子八歲，女孩子八歲，訂婚的身價當爲三十二元左右。如果男長於女時，那，身價就比較高貴了。如男子十二歲，女子仍爲八歲，則女子身價當更高一點。現在市價是四十元左右。總之，年歲越大，價錢越高。但四五十歲以上的老太婆就不值錢了，至多是三二十元的身價。

二十多歲的小寡婦，更值錢，現在農村雖破產，市價也在八十元以上。

因此，農民的老婆死亡時，多半無力續娶，只好當鰥夫。而極貧的農民，根本上也就無力爲兒子完婚。

所以，配偶完全的只有地主與富農，而中農貧農及佃農，配偶就不完全了。有些極貧的農民，一生從沒有聞過女人味！

根據當地官廳的統計，民國二十年，屯留男性是六萬七千二百七十人，女性是五萬三千四百五十一人。女人比男人少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九人。民國二十一年，男性是六萬九千七百五十一人，女性是五萬三千一百七十四人，女比男少一萬六千五百七十七人。本年的統計，男性是六萬九千八百五十六人，女性是五萬三千二百六十七人，女比男少一萬六千五百八十九人。

不但女性比男性少，而且（根據上邊的數目字）他的趨勢還是繼續的向下發展。民國二十年，女性只少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九人，二十二年就少一萬六千五百七十七人了，今年又少到一萬六千五百八十九人。這樣發展下去，可怕，驚人！

這，並不是出生的男子多，女子少；而是女子的死亡率比男子高。依據最近的統計：民國二十二年，全年男子死亡七百五十六人，女子死亡七百一十人，相差四十六人。在男女各別的總數上，女子死亡率遠比男子的死亡率高。本年八月份，男子死亡六十五人，女死六十三人，只少兩人。九月份，男死六十一人，女死六十五人，竟比男子多死四人！

現在我們要問：爲什麼女子死亡率比男子高？我以爲第一是農民重男輕女。俗話說「養女賠錢貨，」一雖然在山西出嫁女兒，可以得到相當的身價，但總不如養豬養雞有利可圖。因此，收入微末的農民不願養此「賠錢貨。」雖然而今溺嬰的事沒有了，但因此女孩子不被父母重視，易於死亡。第二是女性的身體原

不及男性强壯，多病易死，尤其是「這年頭兒，」沒有錢給他們看病，更易死。——大概這就是女子比男子少，農民多沒有老婆的原因吧。

七　屯留農民說「不能算賬」

一般的說，屯留農民最能儉省，他們吃的是小米粥，玉蜀黍麵。穿的是短褲短衫，土布衣服。太陽還沒有出來時，就到田裏工作去了，一直工作到太陽下山，不能再工作時，才由田裏回來。一年三百六十天，從不間斷一日。只有在陰曆年節時，才肯休息一兩天，才肯吃一兩頓麥麵麵條，富有的農民也只吃一頓餃子。同時，屯留農民遠比河北與山東的農民淸潔。餵猪有餵猪的地方，養雞有養雞的地方，絕沒把猪圈在院中，把雞養在室內的。他們室內雖然沒有什麼財產，但僅有的一些破桌子瓦盆磁缸等，也都擦得光亮耀眼，毫無灰塵。他們雖然能儉省耐勞實行「新生活，」但所有這些，仍不能使他們維持舊生活，這又有什麼辦法呢！

他們知道糧食不值錢，知道捐稅大，知道負擔重，知道食鹽太貴（屯留每斤食鹽，價洋一角二分，出賣小米一斗，只能買鹽二斤。故農民最痛苦者是食鹽問題，但他們沒有法子解除這種痛苦。）沒辦法時，只好借債，雖然大家都知道高利貸是一座太行山，是一架榨油機壓住人是永不會翻身的；但他們仍然要這樣辦，事實上，也只好這樣辦。向着黑暗前進！他們說：「過了一天算一天，不能算賬。」——這就是屯留農民生活。

一九三四，十二，一日。

十一 山西離石縣高利貸方式的演進

李曉初

一 舊日的借貸習慣法

離石地處山西西陲，四界及境內山脈縱橫，西與陝西爲黃河隔斷，交通甚爲不便，貨物轉運，全恃人工擔挑與驢騾駝載，牛車都極少見，生產以農爲主，直至淸末民初仍保持其一向的自給自足的封建形態，居民與外界往來甚少，在這樣沈滯的社會內，一切事情的進行都有多年相傳下來的舊習成規，借貸的方法也不能例外，當時的借貸方式，約有下列幾點特徵：

1. 利率　當時利率雖不劃一，但最高者不能超過月利三分，大約貸數達百吊（每吊爲一千文）以上者利率在一分左右，在百吊至十吊之間者約需二分上下，不足十吊者利率即升至二分五上下了。
2. 貸數單位　當時銀元尚未流入普通借貸，完全以吊爲單位，借貸量數很大者亦間以銀兩爲單位，但究屬少數。
3. 質當與擔保　質多用土地，間有用房產者；保多以人，亦有用商號者。
4. 借約方式　按該地習慣，用他人之錢而償還本不出息者，謂之「借」；出息者謂之「揭」，故借貸必須以揭約書寫。
5. 淸償法　揭約上雖照例的都寫明限一年或十月內本利淸還，如不淸還，質地即歸錢主經管；但習慣上却揭錢人只要償淸本或利之任一種，質地即可繼續爲原主人保有，債主不能據約而强佔。

以上五點，是該地借貸適用的多年成規，但這些鐵律似的成則，到民初以後隨着社會情勢的轉變，一一相繼破壞了，他們是怎樣被打破的？它們破壞後代之而起的又有些甚麼？茲略述於後：

二　吊換成元

自從資本主義的勢力侵入中國以後，用鐵鋁鎳等製造的用具在中國社會上較前增多，銅製器物隨而減少了，因了銅的需要減少，其價格自然降低，而以之鑄造的貨幣之價格（購買力）當然也就下落了。因此民元以後銅幣（制錢與銅元）的價格逐年低減，民國初年，現洋一元僅換制錢八九百文，今則可換四五千文，這是近年來全國的共同現象，離石一地也正相同。

因為銅幣價格的下落，一般貨物的價格就相對的增高，在離石，民國初年一吊錢能購買到的貨物，當民十前後約值六七吊。因此以吊為計算單位的借貸法在債主便感到不快意了，因為假如在一年中間物價增高了十分之三，則放錢人雖以年利三分剝削別人，但其所得之利息僅足塡補於騰貴的物價中；即出貸等於白存，資本永不會增加。

於是到民五六以後，揭約之向以吊為單位者，相繼都換成以元為單位了。

三　眞的地歸債主經管了

民十前後，離石的地價本已隨物價的增高而增高；但另外又來了兩個特殊的助力：

第一是當時汾軍汽車道（從汾陽經離石城到離屬軍渡）修成了，但因乘客不多，未曾開車，於是縣車借行，離汾間大車的交通破天荒的開始出現。從此運費減低，縣上餘糧容易出境了。

第二是那幾年西隣陝北與東隣汾陽平遙等處常遭荒旱，於是離石的米麥雜糧皆可東行西走，糧價漸高了，因而地價就逐年升漲了。

由於地價的升漲，債主們的貪心也隨之加强。於是習慣法敵不過成文法，借方如不能按約定時將本利一齊清償，債主便眞的不客氣把質地自己管理起來（自然也還有依照舊習而行的客氣貸主。）

四　揭約一變而爲賣地約

爲了貸主們據約語强佔質地，將本利只清一種的習慣法打破，社會上借貸間起過許多糾葛，每遇糾葛發生，評判人始終有主持遵行習慣法者，因此貸主們，更新奇的花樣又玩出來了：

他們把貸出的洋數到一年後清償時的本利總數算出，將此洋數做了質地的賣價，使揭洋者向他們寫下賣地的絕契，年月寫成清償時的年月，這樣到期如借洋人不能本利一齊償清，剝削者便趕快到縣署將契約一驗，於是貸主便變成地主，債務人的土地便再不能還依習慣法而保有了。

五　賣地約再變而爲借約

剝削者的貪心是永不會饜足的，他們除用種種方法奪佔窮人們的土地外，對利率也時刻在設法把

它提高。但習慣是不許提到三分以上的，官方也不准提到四五分以上；而且過高的利率也易於揭破剝削者的貪心，有傷於其僞善的體面，因此他們就又想出新的方法了：

如前面所說一般，他們把出貸的洋數當歸還時的本利總數算出，使揭洋人照此洋數向他們寫下借約。這樣一來，雖然實際上是五分六分的高利剝削，約據上却還是無利的白白出借，得了高利又送了人情，貸主自然樂而爲之了。假如發生糾葛，只要保證人隨着貸主異口同聲說揭洋人當初確實是無利白借的，因事實上保證人都是貸主信託的人，有事時自然隨他說話。揭洋人反顯得忘恩負義，人財兩傷，有冤也無處申訴。

六 七錢二分重的袁頭眞現洋

自從改吊爲元後，高利貸者的剝削幾乎是一帆風順，百事如意的；種種剝削的時新方法都是由他們中的聰明者所想出，如由他們所推行，自然只能於他們有利益。

但到民國十五六年的時候，由於省政治當局外侵野心的熱烈，山西省銀行的鈔票日漸增多，結果，省鈔的價格開始下落，它與現洋之間發生所謂貼水與匯水。初則鈔現之差數尙小，僅百分之三四或五六，到民十九閻馮倒蔣大戰起，省鈔便打九扣八扣了。隨着戰事的失利，省鈔的命運每況愈下，由七八扣而四五扣而一二扣，甚至無人問津，最後到民二十夏秋間省鈔穩定後，一元只值五分，僅當現洋的二十分之一。

當晉鈔開始下落的時候，敏感的高利貸主們便於百事如意中感到了點遺憾，似乎預知晉鈔前途的命運之悲苦，於是便趁早設好應付的良策。因為當鈔現等價時，紙洋是可以當現洋用的，由是借約上寫的現洋當然也可用紙洋抵償貸主們恐怕借洋的窮人們到鈔洋低落後仍以鈔償債，佔了便宜；因此他們當立約時要在所謂「現洋」上更加一個「真」字，而且還請了「袁頭」與「七錢二分重」的兩位證人。這自然再不會發生絲毫的差誤了，因為「紙票」已絕不能說成「真現洋」，何況它上邊又絕不會有「袁頭」與「七錢二分重」的標幟？

七　質地人保都不如金銀首飾

高利貸者雖在晉鈔狂落的險境中渡過，但時代卻又給他們出了個難題，好像在測驗他們剝削技術的程度似的。

世界經濟的大恐慌也達到偏僻的離石地面，二三年來該地的物價都陷於狂落的狀態，地價當然也年低一年。民二十年底縣中良田每畝可值百元（現洋），二年後的去年臘月僅值十元左右；前時僅值一二十元者，目前連一二元也賣不了。

由於土地價格的下落，高利貸者對土地也起了厭惡。憑質地再借不到錢了；特保人也不可靠，因為即使貸主信託的保人，當借錢人真窮的無法歸還時，保人也無辦法。質地人保既都不行，於是他們進而以金

銀首飾等珍貴物品的扣押代替了質地與人保的任務。

這方法想的確實巧妙，農村中除少數極貧的人家，普通的貧農與中農家中婦人們多少總有一些銀製首飾，（富農之家這類珍品自然更多。）用這扣押銀器而出貸的方法，雖在世界經濟恐慌農村經濟破壞中，高利貸者的財富仍可以繼長增高。

在這裏，高利貸者又執行了典當舖的任務了。

一九三四，七，十四日。

十二　後套臨河縣農村實況

藏林

在目前開發西北聲中，關於西北各地實況的調查，應該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後套農村的實況，尤其值得我們注意，因爲這裏無論就土地的分配，剝削的方式及生產的方法，都具有與內地絕不相同的特殊形態。作者限於材料的不足，只能將臨河縣作一概括的敍述，而整個後套的情形，從此也可知其一般。

一　高度的土地集中

後套原是蒙古民族游牧的地帶，因爲地臨黃河，每年經河水淹沒一次，土地非常肥沃。庚子以後，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的先鋒隊天主教堂，藉不平等條約的保障，來此建立教堂從事開墾。並在華北各省欺騙一般破產農民，移居後套，做他們的墾民。當時天主教堂便是唯一的地主，移民全是雇農，而且限於教徒。不過當時並沒有從事大規模的開墾，因爲臨河縣只有教徒二千五百餘人，即使曾經有過大規模的開墾，也在五原縣而不在臨河縣。

大規模的築渠開墾是一九一〇年以後的事。先是有些做蒙古生意的商人，利用流竄該地的股匪驅逐蒙古人，爭佔土地，從事開墾。後來又有些內地的流氓財主，來這裏雇傭一二百至一千多名的流浪農民，或組織哥老會嘯聚逃亡塞外的浪人，參加這個墾地的爭取。這些流氓無產者一方面是這幾個領袖的雇

農，一方面也是他們的武裝組織，即所謂「打手，」用以對付游牧的蒙古人。經過幾年的血鬭，纔把蒙古人趕至黃河南岸及後山以北，佔據了後套這塊肥沃的區域。著名的王進才即王英的父親，便是這許多武裝開墾集團中最著名的一個。這些新興地主，利用他們的奴隸武裝，儘量的圈佔土地，均佔有數千頃至萬頃之多。所以後套的土地，一開始就集中在極少數的人們手中。後來雖有些地主的土地，被他的家臣即所謂「頭目」們分據為私有，但土地集中的事情在本質上是並未變更的。

同時因為築渠的工程，絕非赤貧如洗的農民所能辦到，勢非由大地主經營不可。結果渠始終是大地主的私產，而受渠支配的土地也全被地主佔取。後來的移民們，雖然也能從大渠引些小渠開墾荒地，但畢竟因為有「主渠」的節制，深受大地主的壓迫和剝削。等到這些可憐的移民經過幾年的辛苦開出幾頃地來的時候，渠主便出面沒收，不然便強收地租和渠租。因之，在最初，渠的私有很大的幫助了土地的集中；現在渠雖然已經完全收歸水利局，但仍舊是維持土地集中及剝削農民的一大工具。

墾務局成立後，向土地的佔有者徵收地價，發給地契，以確定所有權。但這並沒有減少土地集中的程度，反是發展了並鞏固了土地的集中。因為該地是很廣漠的原野，已墾地的面積和全面積比較起來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并非集中在一處。地方的名稱既少，而包括的面積又大，所以地契上所謂「四至」所指的名方，非常廣泛。只要買到兩塊土地，其距離雖遠至十餘里，其間所有的土地便實際上歸於同一地主（此

種多餘所得的土地一般稱爲餘地）而且大地主們因種種優勢，有許多並不出地價便可拿到地契、天主堂的土地在這時也大部分收回，而在同樣的情形下歸到極少數的敎徒手裏。

這是後套土地集中的一般的原因。

一九三〇年，正當蔣閻混戰，大籌軍費的時候，臨河從五原縣劃出，正式設立縣治，苛捐雜稅也隨之俱來。因爲臨河縣是後套最肥的地方，稅捐特別苛重。這時候正趕着國內經濟恐慌開始的時候，臨河農村從此也走上破產的道路。在這一破產過程中，土地集中的過程也更加速的發展。

現在全臨河縣已墾的土地約三萬頃，其中的十分之三集中在四個大地主手中。臨河縣共分四區，恰好一區分配了一個大地主，也許一九三〇年劃區的時候，就是按這四大地主劃分的。四區的楊貴是其中最大的，有地三千三百頃，四區境內，幾乎再找不出另外的地主來。他曾獨資開了一道大渠，名之爲楊家河，僅渠幹卽長八十里。他還從蒙古某王爺租得一千餘頃永租田，地雖在臨河縣境，但因蒙漢實際上仍是分治，所以並不納任何稅捐。現在因爲蒙古王爺的破產，已經無力贖這土地，而成爲楊貴的私產。總計楊貴共有地四千五百頃。此外，三區的傅陀來有地二千頃，一區的李元貞有地一千五百頃，二區的陳家（其名未悉）有地八百頃。合計這四家大地主共有地八千八百頃。

據調查所得，臨河土地的分配略如下表：

	戶數	總計頃數
千頃以上	四	八，八〇〇
三百頃至五百頃	五	一，八〇〇
百頃至三百頃	九	二，〇〇〇
三十頃至百頃	六〇	三，二〇〇
十頃至三十頃	二五〇	五，〇〇〇
五頃至十頃	六五〇	四，五〇〇
五頃以下	一，五〇〇	四，〇〇〇
總計	二，四七八	二九，三〇〇

臨河土地的耕作較簡單，平均兩個人用兩頭牛，可耕作一頃半地（說見後）有地二三十頃的，大半都要將一部分出租給佃農或雇用雇農。若以此為標準，把有地三十頃以上的定為地主，五頃至三十頃的為富農。則臨河縣耕地的百分之五十四是操在八十戶大地主手中，百分之三十二操在富農手中，百分之十四分散於中小農。

二　尖銳的農民分化

土地集中達到這樣高的程度，所以農民的分化，非常尖銳。上節所舉有土地的人家只二千五百戶，這並不足奇，除過城內的居民（全縣不足三十村，差不多每村都有城堡，天主堂和四大地主則另有其城堡）散居在廣大土地上的小農家，幾乎全是佃農，而且有三萬多人是沒有眷屬的「流客」。農民分化的實際數字無從調查，只按土地的分配和農民耕作的能力，作一大略的估計，縱然是一種過於大膽的方法，和實際情形也不會差得許多

臨河縣人口總數，據官方一九三〇年統計共五萬九千人，實際上相差很遠。便是這幾年人口並沒有增加，也不只此數。因爲臨河人口的流動性非常大，孑然一身的流浪者佔人口幾半數，並無一定住址，這種人很難列入統計。現在的人口總數，從各方面估計，應在六萬五千以上。

地主按八十戶，每戶二十五人計算，約二千人。富農按九百戶，每戶十人計算，約九千人，還有一種「商人」是一種特殊的富農（詳見第三節），約百餘戶，合千人。中小農按一千戶，每戶六人計算，約六千人。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共二萬五千餘頃，至少有一萬五千頃由佃農耕種，佃農普通每戶種地一頃至五頃不等，約有佃農六千戶，按每戶四人計算，約二萬四千人。

臨河的耕地共三萬頃，但這兩年秋季縣政府實行清丈的結果，常在一萬五千頃至二萬頃之間，這個數目的不正確，臨河農民們都可以曉得。因爲清丈員受地主的賄賂，對於實有的青苗地在登計上有很大

的折扣。所以每年施種的土地，應有二萬頃至二萬五千頃，即按二萬五千頃計算，約需四萬人經常參加耕作，除中小農和佃農約三萬人外，長年的雇農至多不過一萬人。

自由職業者約三千人。油粉缸磨等四坊工人統計共八百人，木鐵等雜工及技術工人共八百人，這些都是完全脫離了農業生產的。

按季節做短工的約五千人。冬季甘草場可容三千多人，春季渠工可容二千人，此外，「烟市」（即收割大烟）上可容三千多人。其餘的便全是失業的農民和流氓乞丐了，其數當在五六千。

如上估計，臨河人口總數為六萬六千，農民的分化，略成如下的百分比：

有產者	無產者	自由職業者
二七	六八	五

上邊將臨河土地的分配和階級的分化，作了一個大概的分析，茲合併列一統計如下：

	地主	富農（註）	中小農	佃農	雇農	其他
人口百分比	三	一五	九	三六	一五	二二
土地百分比	五四	三二	一四	—	—	—

註：佔全人口百分之十五的富農，連「商人」也計算在內。有土地的富農只有百分之一三・六

三　商人與佃農制度

臨河土地集中的高度化，配合上地域廣袤和人口分散這兩個原因，在佃農制度中發生了一種特殊因素，卽後套人所謂「商人」，這裏所講的「商人」並不是經營商品交易的商人而是立在地主和佃農之間，以地主的土地剝削佃農的一種人。

當地主們將土地出租時，有時是直接分租給佃農，有時是包租給一家或兩三家「商人」。「商人」不一定只包租一個地主的土地，有時也包租幾家的土地。他們拿出一筆現金交給地主，便可得到若干頃地若干年的使用權。

一個商人所包租的土地，自三十頃至三百頃不等，只有臨河縣教育局長李復義，是一個租地一千餘頃的大「商人」。「商人」包租的年限與所租土地的面積成正比例，通常是五年至十年。租金在訂立租約時一次交淸，租金的額數，因調查困難，不悉其一般情形。從後邊的舉例中，略可知其一二。通常租額是與土地的面積及包租年限成反比例的。

「商人」租得土地後，只留極小部分由自己耕種，大半都分租給佃農以掠取大利。試舉一例，可知其梗概：

在臨河城西郊老姑子灘，有一個姓王的「商人」，於一九三〇年以現洋三千二百元租得土地八十頃，租期是五年。一九三三年時，他自己只剩了七頃地，其餘七十三頃則分租給大小三十七家佃農，其中有

三家共租地十一畝(註)，其他的佃戶租地一頃至五頃不等。地租通常以現洋計算，每頃六十元至四十元，零碎租地，每畝一元至三元。合計每年共收租約三千五百元。而「商人」對地主的負擔，每年只平均六百四十元。

註：這種零碎租地的，須先交地租，大半是自由職業者租來種大烟的，爲數很少，但他們自己一點也不參加耕作，所以不能算作佃農，嚴格的講，也應當歸入富農。

臨河縣的「商人」，據調查所得約百二十餘戶，但他們所包租的土地的總數，因調查時的忽略，將這一項可寶貴的材料未曾收集。但就實際情形推測，定在萬頃左右，則「商人」在臨河土地經濟中實佔一重要地位。

「商人」運用商業資本(？)來經營農業，而以封建的剝削手段來榨取佃農。就其租地的行爲而論是佃農，其經營是資本主義的；就其剝削的行爲而論是地主；其方式是純封建的。但在其本質上是既非地主又非佃農，是無土地的，可是非資本主義的富農。這種富農的存在，一方面隱蔽了眞正的生產關係，他方面又隱避了佃農和地主的對立關係。但這種隱避作用，並不能緩和階級的對立，而只將富農更地主化，將階級對立的關係更單純化而已。

不論土地是租自商人或地主，佃農的負擔並沒有兩樣。地租通常是按現洋計算的，但實際上都是行

着實物地租。地主只是藉現洋這個名目，從佃農身上多剝削一層罷了。地租通常是每頃六十元到四十元，秋季收穫後，因爲事實上不能够將糧食馬上換回現洋，所以交納地租，全是拿糧食在市價以下折成現洋，交給地主或商人。春秋兩季糧價的差額，因後套的特殊原因，較之內地的差額要大的多。如去年春季麥子每石五元，糜米每石三元，到秋收後麥子落至三元，糜米落至一元五角，後來雖又上漲，但多係軍事的影響。所以佃農交地租時，常需交納原定地租的兩倍，而受着變相的高利貸的剝削。每頃地的收穫量，麥子是三十石至四十石，糜米是六十石至八十石。是地租竟佔全收穫的半數。

臨河通行的佃農有兩種，一種是地主或「商人」只收地租，「官害」（後套人對稅捐的總稱）由佃農負擔，種子農具由佃農自備。佃農除過交地租外，對地主或「商人」再無其他義務。這是最普通的方式。另一種是佃農只備農具並負擔勞動，地主或「商人」負擔種子，收穫物及「官害」均由兩方平均分配。這種方式只用於種蔴烟草等特殊農作物的時候。

對佃農稍有幫助的，卽佃農除過耕種原租到的土地外，盡量開墾土地四週的荒地，這一部分是可以不納地租的。但這項利益並不能持久，只要佃農多開出一兩項較好的地來，地主或「商人」就要收地而轉租給他人，以收取更多的地租。卽使佃農仍舊保留耕種，也須增加地租。

地主和「商人」在每年秋季，有大量糧食的收入，所以他們是對外輸出的主要角色。

四　苛捐雜稅和高利貸

臨河的苛捐雜稅是在一九三〇年纔突然增加的。隨着縣政府，公安局，區公署，村公署，墾務局及水利局等半稅收機關的成立，徵收局，烟酒事務所，禁烟稽查處及塞北關等正式收稅機關也正式成立。這一大批收稅機關，給臨河農民安排了四五十種苛捐雜稅。現略舉其重要者如次（數字均係一九三二年的）：

後套沒有田賦，而是徵收青苗稅，即所謂「官短租。」臨河縣的官短租，按土地的等次也分爲三等，每頃徵收五元四角，五元，四元二角。並附加黨費五角及丈青費一角。地方行政費每頃十八元，村行政費各村不同，平均每頃十五元，渠費每頃九元。即種地一頃，共納「官害」四十七元五角，如種大烟，每頃尚須加「禁烟罰款」（！）二十七元。

零星稅捐直接向農民徵收的有：牲畜捐，馬每匹五角，牛騾驢四角，猪羊三角，年收二萬元。屠宰捐年額一萬元，由包商徵收。印花稅年約四千元，按戶派捐。烟囪捐（官稱戶口捐，因臨河居民無院落大門，戶口亦不定，故按烟囪徵收而有此俗名）每季二角。

間接由農民負擔的有斗捐，磨坊每季二元至四元，油坊每季四元至六元，缸坊每季六元至八元，粉坊每季二元（臨河無糧店，故由四坊徵收）鹽斤捐，每擔（二百斤）三十元至四十元。車捐年一元。牙稅由包商徵收年額千元。此外還有百貨捐，營業捐等。

除過塞北關是徵收過路的貨物船筏駝騾等捐外，每年從臨河直接徵收的稅捐有七十萬之多，而臨時攤派尚不在內。這一大宗稅捐的最大部分，是由中小農佃農負擔的。這不只因爲土地是多半由中小農及佃農耕作，而且將地主富農應負擔的一部分，也轉嫁在中小農佃農身上。

官短租，兩種行政費，禁煙罰款及渠費等大宗稅捐，全是先有定額，在丈青後按青苗地均攤的。這幾項稅捐是直接向土地的所有者徵收，或向「商人」徵收的。佃農照着實有的青苗地將各項稅捐交給地主或「商人」，而地主和「商人」却在丈青時，因賄賂了丈青員和監丈員，不只對自己種的土地加以八扣至六扣，卽對其所有的青苗地或包租地的青苗地也大加折扣。這樣地主和「商人」不只將自己應負的青苗稅轉嫁在佃農和中小農身上，而且扣留了佃農的青苗稅之一部分。

除了苛捐雜稅的剝削外，中小農尤其是佃農，還受着高利貸的剝削。臨河高利貸有兩種：一種是穀物的，一種是貨幣的，而以前者最爲普遍。穀物借貸，以借糜米者爲最多，除過做種子外，絕沒有借麥子的。因爲這種借貸多半是補充種子的不足，或春季到秋收間的食用。通常都是借四還十，或借五還十，秋收結束後卽必須償還。

貨幣借貸，有時是借貸者需要現洋，有時却是高利貸者半強迫性的放給現洋。這種情形多半是在離開中心城市較遠的地方，借貸者雖然需要的是穀物或布匹，而高利貸者却故意借給現洋，讓借貸者自己

購買。因爲這種購買仍離不開高利者的範圍，而從這個簡單的交易過程中，高利貸者無形又取得一層利。

借款的利息通常是月利三分至五分。但借貸者所受的損失，主要的並不在利息，而在秋收後必須拿糧食換成現洋以還淸本利這件事。由於春秋兩季糧價的差額，借貸者須以二倍於借本的糧食，並在市價以下折合現洋歸還高利貸者。

在臨河，不僅地租和高利貸是披着貨幣的緞皮，卽雇農的工資也是一樣，實際上都以穀物爲唯一的支付手段，雇農的工資雖然全是拿現洋計算，而雇主支付工資時，却是拿穀物布匹及烟草等日用品折合。兼做高利貸者的地主和商人，無論在支付上或收入上，全將這個貨幣的假法做了榨取的手段。

借貸多半是在春季或夏季，像內地的年關借貸却非常少，貨幣形態的借貸，利息並不怎樣高。這是臨河高利貸的兩個特點。前者是因爲中小農和佃農的生活特別簡單，每年只要有幾斤棉花幾匹高陽布就够了，有好些連食鹽都不用。與市場發生的關係既少，就無所謂年關緊急了。後者是因爲高利貸者的目光並不在利息，而是注意拿糧食折合現洋這件事。

從這兩個特點，還可看出臨河縣商品市場的狹隘。臨河縣只有臨河城和陝壩鎭有洋貨商店，而地主和富農是他們的主要主顧。分散於各村城堡中的小商販，除過零星用品有洋貨外，大部分是高陽禹州等地的布匹。在後套只有綏省官錢局各縣分局，經營鈔票匯兌等營業，沒有一家錢莊當舖，從此也可以知道

後套商品市場的狹隘。

五　破產的前途

佃農每年的收穫，自一九三〇年後，漸漸不足交納地租和「官害，」而被迫的走入高利貸這個永不能翻身的牢籠裏。往年借貸在佃農的心目中不過是一時的不幸現象，到現在已成了最恐怖的事件了，事實告訴他們，借物便是破產，被逐以至流亡的開始！他們的住屋是築在地主或富農的土地上的，因爲地租或高利貸的不能償還，他們的住屋便被拆毀。最近一二年來，每當秋季後，就有大批的佃農被迫離開土地。

中小農民的情形雖比較好些，也繼佃農而陷入高利貸的牢籠裏，結果是將他們的土地以半價讓渡給高利貸者。

佃農和中小農是臨河農村的支持者，佃農的減少和中小農的破產，很快的縮減了耕地的面積。試看每年清丈的報告：一九三〇年時尚有青苗地二萬五千頃，一九三一年減至二萬二千頃，一九三二年減至一萬八千頃，去年更減至一萬五千頃。這個報告雖然與事實的眞像相差很遠，但總可表示出耕地減少的傾向來。

農民們因爲可以無限制的開發不納「官短租」的餘地，所以只在耕作的面積上努力，而對於耕作的方式毫不在意。除過菜園地，一般的都不施肥。春耕後耙一次便行施種。有些只用一匹馬拉一條木椎，潦

草的將土壤掘鬆便施種糜子。下種後便只有淌地和收穫，「小鋤」和「大鋤」只在麥地裏施行。這樣潦草耕作的多半是佃農，所以墾地雖然是年有增加，但收穫量並不等比的增加。更因最近幾年耕地絕對的減少，收穫量更形減少。

臨河的農產物剩餘很多，每年有很多的麥子豌豆和少數糜米向外輸出。銷售地是由黃河水路西至寧夏，東至包頭及山陝北境，由包頭再運銷平綏路沿線。最近一二年的輸出大減，從往來船隻的減少上便可證明。臨河城和陝壩是兩大輸出物集中地，春夏兩季經常有二三十隻帆船停留着收買糧食，秋季更多。這兩個地方的船符捐（每隻四元至六元）逐年減少，一九三一年收九千元，一九三二年減至七千五百元。

糧價是日趨低落，一九三〇以前麥價每石八元，糜米價每石六元。到去年春季麥價每石五元，糜米每石三元，秋季更落至三元與一元五角。今春因受戰事的影響麥價漲至七元，糜米漲至五元，也沒有恢復到一九三〇年前的水平。

總之，臨河的耕地面積，收穫量及輸出額，都是逐年的減少，糧價是逐年低落；一向被人注目的發財鄉，已沒有吸引人的魔力，臨河的人口已經不像五年前時飛快的增加，而是逐漸減少；佃農變成「流客」，雇農淪爲土匪；到今天，臨河已緊臨着破產！不過，從動盪着的臨河農村看來，破產也許是未來繁榮的序幕呢！

*　*　*　*　*　*　*

本文因篇幅所限，即止於此；關於臨河農民生活狀況的敍述，將在『動蕩中的臨河農村』一文中補述，又，本文材料關於土地的分配，係作者與三五朋友在各大村鎮中由農民口頭得到關於苛捐雜稅材料，得自縣政府財務局李君及征收局王君，特此聲明，以誌謝意。

一九三四，四，二八日。

十三　江北農村實況

王南屏

此處所指「江北」並非是包括揚子江以北的各省各地，而是專就江蘇長江以北諸縣底範圍而言。這並不是故意放棄或抹煞其他各省各地，而是因爲在此範圍內，在地理上歷史上風俗人情上成爲一個單位，所以依着普通的慣例，把它的範圍如此縮小，而名爲江北，若是改稱「蘇北」兩字，或許要更切當些。

這一大片的土地，計三十餘縣，面積要佔全省三分之二以上，屬於江淮平原的區域，地勢平坦，並無關山阻隔，加以川渠交錯，更爲灌溉所最宜；位於經東一度至五度，緯三十二至三十五度之間，東濱大海，氣候屬海洋性，無酷寒烈暑之苦，空氣四季濕潤，雨量尤多，雖西北部銅山一帶的地勢較高，冬季時有北風的吹捲，氣溫較低，夏季東南風難以吹及，空氣略熱，但終不失爲溫良地帶。物產以農產爲最豐富，植物如徐海一帶的高粱，麥，粟，落花生，馬鈴薯……淮揚通泰一帶的米，棉，豆類……均爲生產之大宗。南通之棉花，在中國產棉的統計上，尤佔着很重要的地位；動物則以水禽如鷸鶖鴛鴦爲最多，湖濱水涯，到處羣棲，家禽雞鴨鵝鴿等亦爲農家之副產，餘如家畜之牛豕馬羊，更爲農家作業上所必需；礦產則雖有煤鐵金銅的富藏，但開採者祇有銅山賈兒汪之煤礦而已。但兩淮（淮南淮北）的鹽產，却有很豐富的收入，可謂礦質物中之主要者。至於機器工業，除南通之有紗廠鐵廠外，在江北則別無所聞了。

在這廣大的區域內，除去少數的資本家大地主和官僚政客聚集於城鎮或都市外，均爲從事於農業生產的農民（工人均集聚在南通紗廠或買兒汪礦區的附近，他們原先也是鄉村間的農民）雖然江北的人口只佔全省的十分之六左右，但農民的數字居總數十分之七八的光景。關於這個問題，可惜沒有精確的統計，作爲我們論述底根據，然而若走過江蘇全境的人們，都不會否定我這估計的。

農村社會的階層，因着各地的情形不同而不盡一致。有些地方，完全是許多佃農聚集在那裏，合耕某一個或一姓地主的土地，如東台縣沿海地方，就有不少是這樣的村落，尤其是如張謇所創辦的墾牧公司，在那裏更是佔着廣大的地面。有些地方，包有各個階層的份子，非常複雜，如泰縣謝五河鄉，固然是佃農貧農佔着多數，但地主豪紳貪官汚吏以至於地痞流氓沈緬於鴉片嗜好者，亦無不多有。所以在這樣繁複不同的社會裏祇有就各地所具備的共同性與地域較廣的情形，作爲概述的標準。依照一般的觀察，江北和其他的地方一樣，佃農農業最多，地主富農佔着少數，雖各地互有差異，但相差無遠。作者曾就如皋立發區某鄉，作一次詳細的調查，錄其結果如下：佃農（僱農在內）佔百分之四十八·四；貧農（半自耕農之經濟困難者，亦包括在內）佔百分之三十四·三；富農佔百分之九·一；而地主商人……合計則僅佔百分之八·三。按查該鄉情況，在如皋全縣中，雖非富庶之區，然亦非極貧窮的僻鄉，却可爲該縣中等的區域，用以推測江北的全境，雖未免有武斷之嫌，但就鹽城與化諸縣的調查，與此亦無甚出入，於此可見江北農村

中構成份子，確以貧苦的佃農貧農佔着主要成分，地主富農等祇佔着微末的數字。一方面固可以表現農村之日趨貧窮化，另一方面，却可證實土地之集中於少數地主之形勢的嚴重，實爲不可忽視的問題。

村社的組織，仍有中古遺留下的宗法社會的形態。以家庭爲社會構成的單位，家長負領導的責任，對外做一家的代表，發生家與家的關係。年青的子弟底行動，如未得家長之同意，絕難發生效力的。宗族的勢力，亦有其根深蒂固的存在，以族長做一族的代表，和其他氏族發生氏族間的關係，族長在從前完全以一族中位分最長年歲最高者當選，但現在却有些變動，「財勢」也成了當選的條件。每一氏族，均有代表一族的祠堂，以供奉一族的列宗列祖的牌位，挨次序的由始遷祖（因爲江北曾遭過洪水的湮沒，大部分的住民，係由江南蘇常一帶遷去的，故稱始遷祖而不稱始祖）起，順次排列着，不但作爲秋祭的祠堂，並且把族中之得有功名的扁額，金色輝煌地懸掛着，表示其門閥的顯貴。另外還有譜系的森嚴，族中位分的尊卑，嫡庶的區別，榮辱盛衰，無不有嚴格的規定，妨有亂宗混族之弊。但在佃農份子，因爲沒有私有的土地，居住多係流動的，而且對於這種「門閥」底尊嚴，在他們也認做無關重要，所以佃農和貧農與祠堂族譜的關係，則甚淺薄。在他們頭腦中所盤旋的，只有他們和地主之剝削的佃租關係。這種宗法觀念，已經不是他們的需要了。

還有很少的地方，藉着氏族的關係，從事於社會的建設和氏族的救濟，雖然多半是限於一族或一支派的狹小範圍，但間接的對於社會，却有相當的利益。如泰縣的王氏義莊，辦有貧民工廠，學校，及賑濟寒族

的規定，每年約有十萬元左右的經費，在這政府方面無力從事農村救濟的今日，如這樣以氏族關係而話之功效，實有極大的效益。然而，這不過如鳳毛麟角的存在，在江北全區，恐怕難找到第二個吧。氏族祠堂的權威，却有驚人之勢力，其作用並不弱於國家的法律，族中如有糾紛，須先由祠堂董事或族長排解，如有一造不從起訴，全族即可舉發其不是，雖不若往昔之操有可以決定族人之生死榮辱的權力，然而它的普遍的存在，却爲不可磨滅的事實。十之八九的村舍，都以其姓氏爲名，如王家樓，韓家窯，薛家墩，徐家圩，李家莊，傅家舍……這類的村名，很明顯的是由於氏族關係存在底表示。尤其是如鹽（城）阜（寧）高（郵）寶（應）一帶，爲着防止水災盜匪的關係，更是聚族而居造成很大的堡圍，以鞏固他們的防線。雖然也有因着經濟關係的締結，在一個大堡或是鄉村裏，由少數地主結合很多的農民圍住在他的附近，以作防禦匪類的戰士。可是他們的氏族觀念，在他們每一動作上，都可以表現出，如像兒童的取名，完全依着譜乘上「字」的規定和次序，不得亂宗或犯諱的。喪禮的服制和繼承的順位，雖有政府新頒的法規，還依着宗祧繼承的慣習；縱使有些地方不是如此，但終不失其有普遍性的勢力。

說到江北農村生產組織，純然爲小農制度，其耕作的器具，完全是古代耒耜式的耕犂，絕無以機器來耕種的，耕種的方法，一仍往昔的舊習，並無進步的改良，在下河一帶的水田，每年只收一熟稻子，春冬時期，田間完全滿儲着污水，據說這也是肥田的一法，夏秋的時候，一望菁菁，十足地表現出「以農立國」的本

色。一家耕種的土地，多者百數十畝，少者亦在三四十畝以上，車水均賴風車，所費人力甚少，收穫期間，則招遠地傭農前去作業，謂爲忙月。泰（縣）東（台）諸縣，多爲兩熟，春熟爲麥，秋熟爲稻，而以秋熟爲主，每畝約收兩石至三石左右，較之下河爲多。如皋泰興等縣，則有兼種三熟者，在秋天豆熟後，可再種蕎麥，但於下熟之麥，甚有影響，故種此者爲少。風車亦絕無，全靠人力，所以每家祇能耕種二三十畝，絕無躋及百畝者。在農村經濟較爲安定的往昔，一年辛苦，即可供仰事俯畜之需，但近來穀價低落，農村破產，所有的收穫，已不足維持了，尤其是高郵寶應興化泰縣東台諸縣，時有洪澤湖水患之慮，一遇水災，耕田竟成澤國，農民所受苦痛極深。南部諸縣的旱災蟲害，亦年有所聞，農事上所受影響亦甚鉅。所以如何獲得一種財力上之援助，技術之指導，改革零星破碎的小農制度，從事於集體的生產，廢除舊式耕具，採行機器生產，以救濟今日之凋弊衰落的農村，是今日我們所應注意的問題呵！

我們再來看一看江北農民的生活，農民耕作的時間，不僅是如古昔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勤苦，已然達到了「黎明即起，終宵無息」底極度的程度，這並不是農民的愚笨不知享樂安晏，而爲生活所迫，蓋不如是，即不足以償還地主資本家的剝削。計算他們工作時間，每天總在十五小時以上，尤其是在夏秋耕耘收穫期間，更是連朝帶晚整天整夜地不得休息，幾乎要盡其所有之生命的能力，其中傭農的苦痛，更是登峰造極而無以復加的。農村婦女的生活，除去極少數的大地主們的太太小姐，過着優閑的生活外，

一般的農家婦女，所擔任的操作，更是極度的煩勞。除去整理家庭雜務外，如炊飯，縫衣，餵猪，割麥，起秧，晒草，拾棉，鋤草等等工作，均須由她們盡其全力的幫助，要說她們勞動時間，却在男人以上。如高郵興化東台諸縣農村婦女，除任家事工作外，並在田間耕耘，車水，分秧，割稻，和男子幾無上下，通如海泰等縣農村婦女，也常擔任田間耘草和收穫工作，雖不若北部諸縣婦女之能耐苦，然亦不愧爲生產的成員，如像冬春兩季之紡紗績線諸事，則更爲其特長。古昔「男耕女織」的遺風，在資本帝國主義經濟勢力侵襲中的現日，已不能存在了；蓋因農村的男子，受着資本地主高度的剝削，不得不拋棄祖宗邱墓所在的鄉井，走到城市或工業區域內去謀活，鄉間土地耕作，祇好由婦女分擔。同時，爲着供應資本地主的虎饜，婦女和兒童的命運，亦不得不如此而被決定。

佃農終年勤勞，提去繳納地主苛重的租穀外，幾不能自飽。傭農的工資，分做長工與短工二種，長工論年，短工論月或論日，長工每年工資，約在十元左右，最多總難超過十五元的限度，短工在忙時（即夏秋收穫期間）每月有一元半至二元者，婦女減半，春冬兩季，則鮮有工資，僅供餐食即可。婦女傭工，長工每年祇給一元五毛至兩元的工資，忙期短工較貴，閒期則無人過問，如此低廉之工資，悉爲中國所特有，無怪國外資本家爭相在各地投資設立工廠以剝取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呢。

蘇北的農村田租制度，形式多不相同，甚難詳述，玆舉其犖犖大者，約分：包租制，分租制，工佃制，預租制

數種。

一、包租制：地主將一塊土地計若干畝，與佃農訂立契約，每年繳納若干租穀，這租數的訂定多半是按照豐年的總收入而取其七成八成不等，對於耕作的農具，牲畜，肥料，種子等，地主並不分擔，完全由農民獨自負責，不幸有了旱荒水澇的災禍，地主亦無絲毫的讓減；作者記得在民十七的秋天，江北大水成災，秋收淹沒，東台西鄉有地主名嚴克明者，爲着催繳租谷，農民全家自殺，這樣事實，在其他地方當然也是所在多有。此種包租制度的剝奪，却可置農民於死地。

二、分租制：地主供給土地，農民擔任勞作，種子肥料，地主略有津貼，按照所有收穫，地主却不勞而獲，攫取六成至七成左右，這種計算的方法，多半採用「抽行」的制度，其估計核算的手續，均操在地主手內，農民不敢過問，有時甚至要全部完納地主猶恐不够的。農民終迫於地主土地私有權的尊嚴，不敢有所反抗，祇好忍氣吞聲的埋頭苦受，一任其高力的榨取，至於最後的一粒而後已。

三、工佃制：地主給農民幾畝土地，因爲承耕此種土地的農民，均貧無生產的農具，牲畜等，又少保證納租的資金，（普通佃農耕種地主土地時，每畝須繳納五元左右的押租資金，還有至十元二十元不等。）可謂爲農民無產者，除照樣完納租穀外，並要白白地代地主耕種大批土地，沒有分文酬報的，這純爲古代封建式的剝削關係。

四、預租制：方法和包租相彷彿，可是所有應繳之地租，在每年度開始時，即預先全部繳納，倘有災荒的不幸，地主却可安然不受影響，所有災禍的苦痛，完全放在窮苦的農民身上，這幾年來連年的災荒，他們所受的苦痛，眞是一言難盡。

另外還有所謂「小租」專爲地主無名的榨取，如像過年時，農民須送給地主年雞，雜糧之類，轉租或修葢房屋時，還須花費不少的茶金使費等項，至於大秤大斗的剝削，更爲地主所通行使用的方法，無待贅述了。

農村的行政，完全操在豪紳地主手裏，每遇修築馬路，築堤搶險，或撲滅飛蝗之類的事情，地主們即協同警察保衛團丁，强迫農民服役，並趁機大顯其敲剝騙取之手段，農民的聽命，直等於奴隸的服從一樣！

至於捐稅的繁苛，更是難以罄述，如所謂車蓬捐，警察捐，地畝附加捐，教育捐，猪捐，牛捐，產銷稅，印花稅……各色各樣的種類，還有巧立名目的冬防捐，饑民捐，公益捐等等的榨取，農民終年辛苦的所得，不但須完重的地租，即如此多的捐稅，已有無以應付之苦了。

農民在這重重榨壓之下，當然不能維持其生活，祇有向地主借貸以延其殘喘，然而這高利貸的剝奪，更是決定農民最後的生命，普通的利率均在二分或三分以上，有時還超過於加一（即如一元的本金，利金即爲一元）的利率，越窮的農民，越是加重，甚至於告貸無門，欲活不得，以至於饑餓，逃避；自殺。

近來更因着生產之橫的不均衡底結果，穀價低落，農村經濟，益趨於貧窮化，金融周轉不靈，遂不得不求助於帝國主義資本及商業資本，最普遍的如一邊將肥料等用高利賒給農民，一邊則以低價購買其農產品爲條件，其出價常不及市價的二分之一；南通一帶的棉區，資本帝國主義者趁着農村經濟破產的機會伸其經濟的巨手，將未成熟的棉花，用「期買」的形式先期購買，其所估計的價格，更不及十分之三四，這種高利的榨取，若按利率計算，實不在百分之五百以下。這樣，不特貧農佃農無以爲生，卽素稱「小康」的富農，也日趨敗落而瀕於破產。現在美麥大批的輸入，穀價當會更低，更會葬送農村經濟於不可收拾之境地。

此外，農村敎育極其幼稚，除去南通，如皐，鹽城幾縣比較普遍外，幾無敎育可言。一般農村中，祇有幾家冬烘私塾先生，所敎課程，不過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三字經、百家姓而已。甚麼新的敎學方法，科學智識，民族觀念，於彼等如風馬牛不相及也。依據一般的調查，失學兒童總佔百分之七十以上，至於成人的補習敎育，在農村裏更是鳳毛麟角罕見罕聞了。有些鄉村盡爲蠢蠢者氓，幾無一能識字者，渾渾噩噩，竟成了蠢頑無知的世界。農民迷信極深，一若鬼神之有活的存在，每村均有土地廟供奉土地神（是不是古時之社稷神的遺留，很難說定，）朔望或喪祭的時期，前去焚香供奉，作祈禱豐年，保祐吉樂的祭祀；夏秋有菁苗會的舉行，作爲拜神求雨驅逐螟蝗的禱告，另外還有所謂降神臺的設立，目的謂爲請天神下界收災降福，更能引

起農民有深切的信念，這種迷信的耗費，在農民之家庭支出上，也佔一重要之地位的。

一九三四，六，十六日。

十四　浙江義烏縣農村概況

吳辰仲

一　農村概觀

義烏位於浙江中部，舊屬金華府；古名烏傷，一稱稠州，在秦漢時即設縣治，是一個歷史頗久而不甚為人知的地方。近因杭江鐵路經過該地，交通和經濟方面的地位就因之日益增進了。

義烏是水田區域中的一縣，所有水田區域中的農業經濟的特性，在此地大都具備；如農業經營上的集約性，農場單位的狹小，租佃關係的普遍，族產及寺廟財產的發達等，都是該縣農村生產關係中的幾個彰明昭著的事實。

該處物產除食糧外，以火腿，南棗等著稱。人所豔稱的「金華火腿」實大部由該處出產，每年輸出價值達數十萬元。至於南棗亦為該地特產，為名貴的補品之一，生貨盛銷閩廣一帶，價值頗鉅，若加工製造——糖漬——即成盡人皆知的蜜棗。礦產之有開採價值者首推螢石礦。螢石一名弗石，中國產地似不多，除浙江外，僅山東之膠縣，遼寧之蓋平等處而已。方今各國正積極造械備戰，螢石為冶金之上等熔劑，需量日增，價格暴漲，義烏諸礦如天山山，花石山，羅漢堂等皆努力企圖發展，惟銷場為某國所壟斷，為可惜耳。農產中除米穀年有剩餘，得以大量輸出外，最可注意的是「技術農作物」的興起，如蔗糖業即其明證。在幾年

以前，義烏的蔗糖產量甚微，輸出極少；近因交通便利，糖價日漲，加以人造肥料的普遍應用，土壤性質的相宜，植蔗者乃風起雲湧，產量大增。年來復有「蔗糖運銷合作社」之組織，對於蔗糖事業前途，頗有良好的影響。他如除蟲菊等，亦有人提倡栽培，蓋因此類產品較之種植水稻，實利市數倍也。

此地是以民風强悍聞名遠近的，仇殺械鬬，時有所聞。加以鬬牛聚賭之風，至今未衰，流氓地痞「刀手」惡徒，幾至遍地皆是。至毒物流行，命案迭出，前途瞻望，尤足寒心。這是義烏社會的一般概況。

二　土地的分配

貧富兩個階層的分化，釀成土地分配的極端不均。而不均的土地分配又顯明地表現在發達的租佃關係上。根據中央農業實驗所的估計，浙江佃農和自耕農的百分率，在全國各省中，僅次於廣東，差不多有八〇%以上的農民在租佃制度之下討生活。義烏是浙江的一縣，這種普遍現象的存在自亦不能例外。因土地的分配不均，就造成了土地的使用者不復是土地的所有者的現象，這更使農村中的情形惡化。

義烏的土地分配情形，因爲沒有可靠的統計資料，頗難給我們以明晰的概念。照該縣一般的估計：佔農戶總數百分之三的地主擁有土地百分之四十以上。富農在義烏農村中所佔的地位並不重要，其數目約占農戶百分之七，而佔有耕地約爲百分之二十上下。自耕農和貧農數量最多，占人口數約百分之七十，耕地則不過百分之二十左右。

照一般的趨勢看，因農村經濟破產程度日益加深的結果，各農戶中，自耕農的成份在逐漸減少，佃農和雇農的成份在逐漸增加，這種情形從另一方面看，就表現爲地權之繼續地集中。近年來義烏地價狂跌到一倍以上，這事實是伴隨着田權之集中與歸併而來的。

在水田區域的義烏，說到土地分配時，有一點我們必須特別加以注意：即是廟產和族產的異常發達，依照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的調查：全縣的族產合計達二〇〇〇〇畝。廟產雖比不上族產，當也在二萬畝以上。這些土地在名義上雖屬公產，却大都由所謂鄉紳也者把持着，零碎地租給一般農民，實際上和他們的私產沒多大區別。這類土地的收入是打着祖先和神佛的旗號騙人的，祖先和神佛自身當然不會收租食稅，於是收入的大部份都流入農村上層人物的私囊，小部份用作祭祀，再在節日購置些酒肉，讓大衆肥肥瘦嘴，潤潤枯腸。

農民承繼的遺產，除房屋，現金及農具外，以土地爲主要成份。而在析產時，無論父母有沒有死，都在全部土地中提出較肥沃的田地若干畝作爲祀產，父母健在時，則爲父母食用所資。父母死了，就由親族輪流佃種，每年繳納一定數量的田租給「常中」。這樣世襲下去，祀產的數量和收入就日益增大。更有那些沒有子女和近親族的農民，也往往把田地「助」入宗祠中，死後由宗祠的理事按照「助」入財產的多寡在每個規定的節日爲之祭祀。除却每個宗祠都擁有巨額的土地之外，每個農民的家族也往往有若干數

量的公有土地。據作者所知，義烏有若干村落所有的土地所有權，竟有百分之八十落在百年前的祖先手上。至於各個寺廟普通都擁有中人以上的財產，領有千百畝土地的僧人更是司空見慣，而且因爲寺廟的遺產自來沒有由承繼人細碎瓜分的緣故，香資所入既豐，田租收入又鉅，無怪各大叢林附近的農村的田地莫不被其併吞，廟鄰也自然成爲和尙的佃戶了。由此，我們知道義烏農村的租佃關係之所以這等普遍和强大，祠產和廟產的發達，實爲其中很主要的一個原因，而祠產和廟產的發達又顯現出封建關係與神鬼迷信在農村社會關係中的功能與作用。

三　租佃的形式

租佃關係，在義烏農村中流行着下列幾種方式：

（一）「客佃」——是一種永佃權，和「客佃」相對的形式是「清業。」所謂「清業，」意卽完全的產業權，包括着「田皮」和「田骨，」而「客佃」則僅具有「田皮」的所有權。它能世代相傳，也可互相授受。除非地主把「田骨」出賣給佃農或「佃農」把「田皮」讓渡給地主，租佃關係就永遠的保存着。它有文據而無年限，每「石」田（義烏農田的單位，約合兩畝半）普通須納租穀三石，租額皆在文據上載明，雙方都無權更動，平均租額約佔全部農產收穫三分之一。若租穀拖欠過多，地主可以撤銷他的佃權。這種「客佃，」是義烏農村中最佔優勢的租佃形式。所有的土地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具備着客佃關係

的。

（二）「租銀佃」——這和上述的「客佃」形式，在本質上是同樣的，最重要的不同是：「客佃」是以穀物納租，而「租銀佃」則以貨幣納租。因爲成立租佃關係的年代的先後，貨幣地租的輕重卽因之而異。而在同樣的情形之下，「客佃」的納租額是無例外的要比「租銀佃」重了許多。舉例說：張姓宗祠和吳姓宗祠在道光年間各擁有同量的地產，譬如一千石田，前者採取「客佃」形式分給族人耕種，後者則採取「租銀佃」的形式，假定當時的稻子值五百文一石，那末張姓宗祠每年收入以每石田繳納三石稻子計算得穀子三千石，吳姓宗祠則依照當時的穀價折算得錢一百五十萬文。這在當時的情形下原是毫無軒輕的。但後來穀價日漲，錢價日跌，時至今日，就形成：張姓宗祠的佃戶對地主的負擔要比吳姓宗祠的佃戶重酷至五倍或十倍；雖然在這長時期中吳姓宗祠也曾不斷地增加了租銀的數額，但因習俗關係和錢價的猛跌，所納的田租之實質的差異就很大了。所以目下的「租銀佃」的田在佃戶的眼中看來，其價値竟可以和「淸業田」相頡頏了，因爲假若一石「租銀佃」只納銀元五元的話，除去田賦的支出（田賦概由地主繳納）不但所出甚微，有許多竟有用租銀來抵補田賦還要不够呢。但這種極端的現象究不多見，雖然「租銀佃」戶的負擔一般的比較輕鬆，但其加重的程度却也與日俱增；如若干村鎭的「廢錢改元」運動，一反手間，佃戶的負擔就加重了若干倍。

（三）「租穀佃」——上述的「客佃」和「租銀佃」的形式都具有歷史的關係是租佃關係中的典型形態。「租穀佃」則不然，它具有投資的意味，是高利貸在租佃關係中的化身。當中農或貧農需款孔殷的時候，就把自己的田權（「清業」或「客佃」）訂立契約，賣給富戶，自己保留了佃權。這種田權的價格是隨雙方協定的租額的大小而上下的。普通每石租穀（這種租佃關係的單位是穀物而非田畝）售價三十元至四十元，而田賦還得由賣方負擔。「租穀佃」在買者看來，只是放債生利的另一種形式，不過收到的利息不是貨幣而是農產吧了。在賣方看來，也不算是割棄家產，只是用土地做抵押品，從而借得一筆貸款。高利貸者的事業中最着重的是借款的安全保障，而「租穀佃」最能滿足此項要求，因為「租穀佃」約上都載明這一句：若有租穀拖欠短少情事，准由「財主」管業耕種無詞！中國農民對於割棄祖產是認做奇恥大辱的，而「租穀佃」在他們看來並不算是出賣田產，雖然心裏明知道「永難取贖」，但「楓樹葉遮鼻頭」總算把死去的和活着的都騙過去了。有了上述兩個原因，這種「租穀佃」的發達，自是無怪其然了。

（四）「押扎佃」——沒有土地耕種的農民，繳納了一筆金錢給地主，從而取得與此「押扎金」相當的佃權，就叫做「押扎佃」，所以「押扎金」可以說是取得佃權的代價。這種佃農權在義烏是一種永佃權，而且在佃農間也可以互相讓渡。通常這種租佃關係之成立的原因是地主方面無力經營或想藉此

得一筆無利借款，佃農方面自然是因爲需要土地，「押扎佃」戶應繳納的租額在訂就的片面佃契中有明文規定，其租額的輕重視「押扎金」的多寡而定。地租若有短少拖欠，地主得在「押扎金」內源源扣除，使「頑」佃無技可施。除非雙方同意，地主不得任意撤佃，但是實際上，佃農在地主的高壓之下，往往藉口穀價高漲，另換「押扎契」，將「押扎金」任意提高，於是這種「押扎佃」制度就超越了代表佃權與保證納租之原來的單純作用，而變成地主有保障地榨取佃農的手段了。

（五）「討租佃」和「呑倒利」佃——「討租佃」和「呑倒利」佃都是一種短期的富農經濟的租佃方式。「討租佃」的內容是：佃戶繳納一筆錢給地主，訂了一紙契約，就可以使用那租來的土地，全部農產物都歸佃農所有。普通的租期都只一年，期滿另訂契約。租金隨土地的肥沃程度而異，大概每石（合兩畝又半）田須納租金十六元至二十元，田賦歸業主清還。「呑倒利佃」制度類皆施行家族的祀產，譬如一個大家族的第三房因需款急亟，但是祖先的祀產尙須三年後始能輪値到耕種，該第三房也可以找主出租，不過租金內須扣除三年中的租金利息而已。其他情形都和「討租佃」完全相同。

以上所述的只是該縣農村中幾種重要的盛行的租佃形式，他如「討種佃」「典佃」等猶不勝枚擧，至於力租，則尙無所聞。

四　高利貸的勢力

如果繁重的租佃是農村中吮吸農民膏血的魔鬼，高利貸就是寄生在農民腸胃中的毒蛇，它的殘酷和勢力的無孔不入，是難以其它東西來比擬的。

以貨幣營養自己的金利生活者，其本身大都兼是商人和地主。在義烏，普通借款一百元，除給予票據外，尚需田半石用作抵押，年利二分算是最輕的利率，非稍有資產，信譽素孚的人們是萬難得到如此便宜的條件的貸款的。其他有每月加二成（年利二分四）加三（年利三分六）的利率，總之越窮的農民借錢時就要負擔越重的利率，借款如到期不還，即可將用作抵押的田產沒收。更有用複利計算的，用「兩頭月」計算的——二月二十八號借的錢，即在三月一號淸償時，也要算二個月。當舖的營業也很發達，不過因農村大旱之後，農民大都「當而不贖」，或別無長物可質，生意也差了。商業高利貸更爲盛行，賒欠的商品，除照例暗將售價提高外，必於物價外加年利二分，在年終收帳時一併收取。此中特別以藥材業利率之高著稱——年利在五分之上者頗不鮮見。富有的孀婦，常私下開着具體而微的當舖，專當祀神祭祖的陳設：如香爐，銅鑼等，索取極高的息金。因爲上述的器具都屬公產，若不能如期贖出，祀產就不准輪值享有了。又有所謂「通工錢」者，即趁着農閒期借錢給貧農等，預定在農忙期爲債主做工，若照利息計算，總要在十分利以上了。更有「穀還利」「防新穀」者，所謂「穀還利」即「穀利銀」，是以穀物償付債務的利息，通常借洋十六元至二十五元，每年須償稻子百斤當利息，有時此項借款尚須以田產保證。所謂「防新

穀」的債款也是貧民飲酖止渴的辦法：每當春季，青黃不接的時候，貧農向富農借貸穀物若干，約定在秋收時將本利用新穀償還。除了要負擔極重的利息外，借穀時故意扣了斤兩，還穀時却强迫要用大秤，一轉手間，債戶又受了一層損失。總之，高利貸勢力的深進與擴大，眞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義烏農家大約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負債累累的，其勢力可以想見了。

至於農民銀行的放款，在該地也起了些微小的作用，但是農行放款的章程規定：要具有法人資格如合作社等機關或有確實擔保者才能借到，在這民窮財盡的農村中自然除了地主和富農外，中農以下就難想沾其餘潤了。有的富豪竟把農行的貸款轉化成吮吸農人血汗的高利貸資本，或利用春耕放款的名義做一筆敲榨農民的勾當；自然對於枯渴的農村更祇有害而無益了，

「搖會」是農民互相自助的信用放款，它有很悠久的歷史，既能免除高利貸者的剝削，兼有貯蓄和團結感情，患難相助的長處，負擔公平，弊端很少。可惜因爲農家經濟每況愈下，致自顧不暇，即有急公好義的人號召幫人做會，也大都有愛莫能助之概，所以這種古昔遺留的合作組織竟因之日趨衰落了。

五 農業經營和農村副業

義烏是中國水田區域中的一縣，所以農業經營的狀況和各隣縣自屬大同小異。水田區域的農業，最着重的是水利。若灌溉和排水的情狀都很好的水田，每年可以收穫三次稻——豆——麥，叫做「全三熟

田，」否則就只有一熟或二熟了。全境多邱陵，可耕地和人口比較，頗有地窄人稠之感。除無望的山地外，土地幾已全部開發。卽供人畜交通的阡陌，雖闊度不滿三尺，於路沿亦植大豆。春夏之交，枝葉茂盛，幾難辨別路徑：於此可知農業經營是到達如何集約的程度了。因爲此地的土地耕種是從來不知道有休耕制存在的，稻子尙未收割，豆種已播進農田，豆既收穫，立卽耕植小麥，割麥後立卽插禾；週而復始，簡直不讓地力有片刻的休閒。然而我們知道：從土壤中取用了多少營養物，就須交回多少肥料以營養土壤，否則就無從繼續再生產的進程。所以肥料問題在水田區域的農村中是和水利問題實有同等的重要性。義烏農田的肥料來源除人所週知的人糞外，一切東西只要能够利用做肥田原料的，他們都煞費苦心地收集起來：畜類的毛骨，含油果實的糟粕，視同廢物的柴灰和魚骨，甚至河裏的泥，山上的草，也都費了大量的勞力收集起來。至於廐肥，則爲最重要最大宗的肥料。差不多每個農家都養着幾口肥猪，飼料是豆和大麥，——有時比農人自身的食料還要精美——猪是肥得異常的快速，平均一隻十斤重的小豕養了半年就變成百斤以上的肥猪。所以養猪就成了重要的農村副業，而「無豕不成家」這句話在此地亦成了眞理。因爲養猪的飼料精美，和因肥料的需求而促進的猪肉的產量的增高，也就可以解釋金華火腿爲什麼如此著名的理由。

此地的農業技術是非常落後的，灌溉半用人力，耕耘半用人力，耕牛因歷年屠宰和輸出過多，顯有缺

乏的現象。採用機械農具的，當然是沒有。除溪河附近的農田，水的供給比較不成問題外，其餘的地方大都「靠天吃飯，」雖有湖沼，貯水不多。去年大旱成災，據浙江省府調查：義烏災田達一四二、〇三一畝，佔全縣農田三三%，災民數達一三九、八八一人，這是官方的統計，實際當不止此數。

因爲甘蔗除蟲菊及藍靛等技術農產品的種植發達，人造肥料的使用乃盛極一時，甚至種植其他農作物，亦間用此種肥料，每年耗金鉅萬，幾有壓倒自然肥料之勢，將來肥料之供給當成爲嚴重的問題。

農村副業以養猪爲最重要，前已言之。近因蛋價日漲，鷄鴨畜養在農村經濟中的地位也日見重要。養鷄在農家是不費事的，普通每家至少畜養五六隻，所產鷄蛋都由小販收買以去，積少成多，總量頗可觀。養鴨亦有專業者，因農村池沼甚多，每於晨暮千百成羣，散處田野，收入亦頗豐。至於南棗等果類產品，已見上述，茲不贅。

每屆農隙，有若干農民就變成手工匠人。如成衣匠，木匠，蓑衣匠，彈棉匠等。他們散佈在金華，浦江，永康一帶的鄉下地方做工，直到播種季或收穫季才相率歸來。更有在錢塘江上做水手的，沿各縣道做挑夫的，到都市去做土木工人和小販的，因鄉下經濟破產程度的加重，此項平時看作副業的工作人數就日增月盛了。

一九三五，三，九日。

十五　廣東某縣的地主與農民

余捷瓊

××是廣東省潮州八屬中的一個縣治和汕頭相去約百里之遙。這一個縣治的組織的歷史背景，是典型的封建社會和氏族社會的結晶。不問在封建組織方面或氏族組織方面，都可做中國的一部分的代表。

縣治的組織是這樣的：縣城位居在全屬的中央而偏北，城裏的居民約近六萬，除了少數姓「李」的之外，全數都是姓「方」的，至於城外的居民的姓氏，便錯雜不同了，大的幾千丁，小的幾百丁，更有一姓的人丁數萬而分散在許多區域的。雖然亦有幾個大姓的丁數在一萬以上而又集中在一處的，如像「莊」「張」「許」和「賴」，但他們却和縣城相去有數十里之遙，歷來便和方姓互抱不相侵犯的態度。

這樣方姓便成爲這一個區域裏的唯我獨尊的統治氏族了。但是，單是聚族而成的統治地位，惡勢力並不怎樣的大，因爲鄰近的小姓氏，可以團結起來，和他對抗。原來更有一層勢力和這種聚族而成的勢力相結托，那便是封建勢力和這種氏族勢力的結合，換句話說，這種氏族勢力是以封建勢力做後盾的。可憐在這兩種黑暗勢力的勾結之下，氏族勢力單薄而又無封建勢力做後盾的小姓們，便永遠生活在十八層地獄之下了。

氏族勢力和封建勢力是怎樣結托的呢？這便要追溯到不爲人所記憶的先代歷史。原來方姓都天生成的是地主，雜姓却天生成的是田奴，方姓天生成的是居住在城裏，雜姓天生成的是居住在鄉村。天生成的方姓代代都是官運亨通，科第輩出，更不得了的是在亡清時出了一個流氓出身的虎門提督，這赫赫的威風，更足以震破鄉民的鼠膽了。因爲方姓是地主，所以他可以爲所欲爲，稍有徵逐不如意的地方，便到官府去控人民「反了起來，抗納租稅」去，這一來農民的死罪眞是重重了。因爲方姓是住居在城裏，所以假如農民被迫得沒有辦法想糾合各族反抗的話，他便可飛報上峰，就說「人民造反了，舉兵圍城。」又因爲他是住居在城裏，所以他可以遮蔽縣官的耳目，包攬一切的詞訟，掌握一切抽捐攤稅的大權，要挾到任的官吏。更因爲他歷代官運亨通，所以威鎭一方，就是到這裏來當縣長的小官，亦不敢平平安安的喘息，而應該戰戰兢兢的奉承，所以官吏成爲生活在方姓的喘息裏的可憐傀儡，方姓成爲南面稱王的一方霸主。因爲這一姓既然丁多口繁，而又是地主，同時又住在縣城，更有歷代的官星拱照，在這樣的氏族惡勢力和封建的傳統勢力的結合之下，形成一種非常的統治力量，這便是這個地方的組織，典型的傳統的封建勢力和氏族本位社會的組織。

這一個宗族壓迫別一個姓氏——即是農村中的農奴——的情形，我想在任何一個時期的黑暗時代，總沒像那樣兇橫的。在這個範圍之內，他的剝削關係的高度發揮，遠過於歐西中古的貴族和農奴。我們

這裏不能詳細講明，只能舉些簡單的例子來做例證。

這個區域內的田租之重，是別個地方所看不到的，亦是一般所想像不到的。每畝水田普通都是要租四石，查每畝田地每年的收成普通亦不過五石之譜，這就是說農民每年的收入十分之八要歸還那坐享清福的田主。其實這樣高的田租，不問在豐收歉收的年成，農民都是要賠錢的。或許有人要問，農民既然種地賠錢，那嗎不種好了。但是，這是不行的，爾不種田，到收成的時候，田主還是要問爾要同等的租穀的，他並不管爾的田有沒有收成。就是在大旱的年頭，全體都沒有收穫，租穀的繳納還是要照舊，否則方姓地主的五萬多個肚皮便得都活活餓死。所以田園的收成量儘管豐歉無常，而超乎土地生產量的租穀的負擔卻是年年如故。農民的收成量既不足以納繳田租和成本，他怎樣生活呢？只有一條生路，田園讓妻子或年高的父母耕種去，自己帶着兩條毛腿，兩條鐵般的臂膀到外洋去——暹邏，安南，新加坡，荷屬——賺錢來贍養終年爲田主白勞動的妻子和父母，更還要多餘一部分錢來償還田園收入不足以抵還租穀的一部分田租。他的剝削關係已達到這種程度！但這還是祖宗積下來的正租，農民雖然有苦亦無口可說，額外的徵逐，更是說不盡的了。方姓是居在縣城。一切的稅捐都要經過他們的手裏。他們便借這個敲詐的機會來實現他們的發財之夢了。額外加徵固是常事，而巧立名目，假公濟私，更是層出不窮。方姓人其實並沒有職業，只不過賭錢抽烟，和想方法向農民壓榨。這就是他們的常年職業。

更有一個說起來會令人咋舌的剝削方法，這個方法或許是任何一個人都想像不到的，除非目睹其事。這便是追討祖賬的方法。他們那些破落戶式的田主少爺們，隨便找些破爛簿子，到鄰村家祠的家神牌上去抄些古人的名字在簿子上把他們的名字記下來，就說在同治幾年，咸豐幾年或光緒幾年欠了他祖上多少兩銀子，到現在已經幾十年，母利合起來是幾百兩甚或幾千兩，就開了賬單向他的子孫要錢去。可憐這些無辜的子孫們便慘字臨門了。雖然那些賬大都是牛頭不對馬嘴，有的他所指名欠帳的人在所指借債時期實在還未出生，有的指名欠帳的日子實際他本人早已去世了許久。但是，這羣生活在十八層地獄下的農奴，雖明知其無稽，到底一點辦法都沒有。向官申訴嗎？！好官是他們自家御用的，而且根本就沒有財力和知識可以見官去，於是乎接到這些追討祖帳的帳單後，全家都是號天哭地，叫說祖宗無靈——其實他們的祖宗的日子亦是這樣過的，於是，稍有能力的便五跪三叩頭去，求債主減算，折成一成二成還清，農民又得憑兩條毛腿兩條鐵膀到外洋去掙錢回來代他的祖宗還那莫須有的債。至於沒有能力的，或債目的龐大遠出一般常例的，只好沒有辦法，農民在白天接到追債單，和父母妻子抱頭痛哭了一宵後，得立即在大清早後亡命去了。他們大都是偷偷的攜帶父母妻子，抛了家宅田園，抛了一切，逃到別的地方去。流落在鄰近的村落，逗留了幾天，把幼年的子女賣了，得了船資，又逃到外洋去——在平常農民家絕沒有船資積下，急時只好出賣骨肉了，天地間的慘事，殘酷事，事有甚於是。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的剝削關係，決沒

有發揮到這樣澈底的。

上面不過是略舉其大概，這種社會，已經不是中世紀歐洲農奴所能比擬的了。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了現在。

像這樣沒有天理的壓迫制度，惹起鄉民不斷的反抗是必然的。其實自爲人所記得的歷史到了現在，時時刻刻農民都在想法反抗中的。據說在咸同年中，曾經有一個持續四十多年的大鬭爭。農奴們結合起來，成爲聯鄉的反對城市大決戰。在這四十多年中，租穀和債務當然完全停止償還。迫得方姓人沒有辦法了，於是那些流氓公子們在近鄉無法討生活，都相率逃到外地投軍當兵去。在這些逃出的流氓中，恰好又出了一個虎門提督方大人，這一來可就非同小可了。他爲着要報農奴的反抗之仇，特奏准了上司到潮州來剿匪，這一來，爲生存而反抗中的農奴就遭殃了。好幾十個村落都被剷成平地，更有好幾個村落的農民被趕跑了，乾脆把村落掛上了「方」字招牌，把整個村落吞了去，變成了姓「方」的，有點東周兼併的風味。其他殺戮的，搶掠的，俘捕的，自然更不必說了。橫豎這是「方」字號的天下，誰也講不得話的。延續四十多年的農奴反抗運動，這樣便在封建勢力和姓氏勢力結合的高壓之下結束了。

但是踏平了農村，這並不是很好的辦法，事情過後不久，便出現了矛盾的現象了，因爲把農民趕跑之後，再沒有剝削的對象了。雖然成望的田原可以隨自己的尊便劃成自己的，但是農奴已經完全逃亡了，田

野是荒蕪的，沒有人種地了，他們才知道趕走農奴並不是頂好的辦法。於是乎令逃亡在附近的農奴回來具結歸田，第一個條件是增租，第二個條件是把所有的會反抗的壯丁都以叛衆的封號拿去殺頭，第三個條件是永不許反抗。第四個條件是補繳四十多年來的租穀，分年加攤。從此沒有能力在別的地方生活的農奴，便逐漸的又回來重整他們的家園，重過他們的農奴——其實是超乎農奴的生活了。

不知不覺的，這些農民又在暗無天日中過了幾十年。一則因爲經前一次的大殺戮和驅逐後，實際歸鄉的人口不多，二則方姓的束縛和監督加緊，自然再沒有抬頭反抗的可能。

在幾十年後，民國十五年，起來一個翻動天地的大變革，終於把這種制度震撼了。日處於宰制中而把受宰制的痛苦無形已淡忘了的農奴，這次又重新被驚醒了。

民國十五年的夏秋之交，忽然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來了一種謠言，說當今的官是小百姓的，什麼革命的目的就是維護種田人的利益，敎他們不再憑空遭人追索租債。這一來這一範圍內的農奴便起了一個深的激動，他們對於痛苦的感受性被激發了，他們回味了積祖傳下來的非人生活，回味了身受的屈辱和苦痛，遺忘中的滔天的憤恨便都擁上來了。大家都嚷說『要是官老爺是我們的，我們立刻起來同那曲脚鬼——意即「方」姓，算賬吧，』碰巧這個時候張姓的媳婦在田裏種田，被幾個姓方的抽烟鬼在田禾下脅迫成姦，在平時原可以不聲不揚的如常過去，這回在羣衆情緒的激動之下，可就發上來了。四鄉六里都

鳴鑼擂鼓報告這一件醜事，彷彿各鄉都在召集鄉民全體大會，農民心頭的積恨和震怒爆成為火花了，都狂呼着要和方姓的算賬。城裏聽到農奴激動的消息，更是例外的暴怒該死的奴才憑什麼敢造反起來了，於是在那天的傍晚上向四鄉的鄉村鳴槍示威，這一來城外的村民更加激動了，在平時，他們是馴猪，當他的無明火被激動了，他們是暴虎。更傳出一個消息說方姓當晚將分頭姦淫各村的農婦，這一來更把農民們的火焰煽得高了，大家都鳴着鼓集攏來，向城裏開土槍——農家藏的舊槍，戰鬬便開始了。

這一個戰鬬論本質和四十多年前的他們的祖宗的反抗運動相同，但因為時代變了，亦就跟着變了性質。

相持了十多天，組織農民協會的先生從海陸豐趕來了。他們看了一會農民的武器，聽着城裏放出來的槍聲，知道這陣勢是不大妙的，於是主張講和。方姓的雖然兇橫但因為憑空裏來了一個省裏來的農民協會，不知道葫蘆裏的底細，亦就馬虎的和了。農民得了他們祖宗以來的第一次勝利，吐了一口氣，但一面都把功歸到農民協會的各位先生的身上。於是經他們一番宣傳，全數農民加入農會。這樣的組織起來，設法買來些槍。雖說和城裏的方姓地主是和了，但事實是嚴陣相待。農民們不再受驚受嚇，這福氣恐怕是他們有祖以來所沒有的。

自然，當這一次農民反抗期中，方姓亦函電交馳向官方求救，說是農民造反攻城。但這回廣東已革了

命，省方沒有功夫過問這些事。方姓自然是十分失望，亦以爲老天這會子眞的變了。只好耐着心腸等下來。經過了一年多的嚴陣相待，後來忽然又發生了變化，方姓官報私仇，借刀殺人，居然又達到了目的，詳情也不便細說。

我的話止於此了。上面的一段事實，可以說明中國現階段的共黨形成的社會背景。我想這決不只是一個小小地方的局部事實吧。

一九三五，二，九日。

十六 「放糖花」（廣西的高利貸）

吳半農

——廣西高利貸資本及商業資本之一實例——

越走近熱帶，甜蜜的東西似乎越多起來。

在極北的東三省，廣大的「青紗帳」是高粱造成的；在極南的兩廣，廣大的「青紗帳」却是甘蔗造成的。

甘蔗是製糖的極好原料。這里所講的關於廣西蔗農區域「放糖花」的故事便是在這甜蜜的「青紗帳」下演了不知幾多世紀的一套殘酷的把戲。

廣西的蔗糖計有三種：一種是荳糖或片糖，一種是沙糖，一種是白糖。荳糖及片糖都是粗製的黃糖，色褐而質不純，銷路是有限的。沙糖的品質也和荳糖片糖差不多；不過它是專門用來提煉白糖的。用舊式的方法把沙糖製成白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法是把煉得的糖水裝入一種叫做「漏」的瓦器中，任其自然凝結，故需時常在兩月左右。時間既是這樣的長，便不是一般「寅時吃卯時糧」的蔗農所能從事了，普通蔗農所製造的都是荳糖片糖及沙糖。至於白糖的製造差不多完全操在「糖房」的手裏。什麼是「糖房呢？」從生產的程序上說，不消說，它是白糖的提煉廠；但從生產的關係上說，它實是蔗農區域裏高利貸

資本及商業資本對於中農及貧農橫施剝削的大本營。

目前中國農民普遍地窮困已是一件週知的事；這也不獨廣西的蔗農爲然。不過蔗農的主要農產品既是甘蔗，他們的日常所需便更不能不仰給於借貸。廣西蔗農的生活，一般言之，太約是這樣的：卽每年到了國曆十二月底，甘蔗已漸成熟，他們便把榨糖機（有木製及石製兩種）裝置起來，預備「開榨」。他們或是一家獨有一榨，或是兩三家四五家合用一榨，情形是不相同的。開榨以後，他們的生活立刻便要緊張起來；他們一面榨蔗，一面煉糖，常常是要不分晝夜去做的。他們這種緊張的生活通常要到次年二月底——「收榨」的時候才能停止。自開榨至收榨，這短短的兩個多月，不消說，是蔗農最辛苦的時期，但同時也是他們最愉快，最輕鬆的時期，因爲他們終歲的血汗只有這時才能收穫，終歲的債務也只有這時才能償還。不過等到他們把甘蔗製成了糖（當然是沙糖，蔞糖或片糖），挑去抵了債務，所剩下的往往又只是一副空着的肚皮了。日後的生活和農事還是要靠借債來維持，來進行的。去歲我們在邕寧縣的蒲廟和良慶調查蔗農的經濟生活時，各方的材料都告訴我們，蔗農借債是以四五月間爲最普通，便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借債還債好像一個循環圈；許多農民的一生都在這個圈裏打來回，永遠不會跳出圈的。誰是這個圈的主宰者呢？在蔗農方面，不消說，便是上面所說的「糖房」。「糖房」是他們唯一的借貸機關，也是他們銷納產品的主要處所。他們「收榨」以後沒有錢用，便到「糖房」去借；「開榨」以後，製出了沙糖，便拿到

「糖房」去抵賬；抵了賬便沒有錢用，又是去借；第二年沙糖上了市，又是拿去抵賬。他們永遠是在忙着向「糖房」借債還債。

不過這一借一還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你如果是一個蔗農，你向「糖房」借款，「糖房」老闆一定會皺着眉頭向你訴許多苦，說目前金錢困難，實在無法通融。你如果再哀求幾次，他就會答應把白糖作價借給你。這白糖，不消說，便是你不久以前挑來抵債的沙糖製成的白糖。作價，照例要較市價略高；例如那時市面上的白糖是四十枚一斤，作價便要算四十四枚一斤。利率最低每月三分，間有高至六七分者。借時還要拿田地房屋，糖榨，或牛作抵。有時還要憑中寫一割賣契，聲明「情因急用合家商議」願將祖遺或自置某某財產賣給某某人。割賣契上只寫買主出了多少售價，並不寫明借了多少糖，作了多少錢，全年要上多少利息。不過事實上，這個售價便是所借白糖作價的錢數和全年應付的利息之總和。譬如說，你向某家「糖房」借了白糖二百五十斤，按四十四枚一斤作價，計值銅元一萬一千枚，如果那時銀毫和銅元的比價是每毫二十二枚，那末所借的糖便等於毫洋五十元。以每月三分計息，全年利金即達十八元。本利相加，計洋六十八元。這攏統的六十八元便算是這紙滑稽的割賣契上買主所付的售價了。借期一滿，如果你無力還債，這位「糖房」老闆便可以依據割賣契沒收你抵押的財產。這些條件和手續經你一一辦妥和認可，他才把糖稱給你。不過這里你得知道，「糖房」老闆稱出的秤照例沒有足秤的，最厚道的老闆也得用「九

八秤；」這便是說，你所借的二百五十斤糖，實際的重量至多只會有二百四十五斤。這二百四十五斤糖，挑到墟市（即北方之集市，普通三日一聚）依照市價（每斤四十枚）變賣，僅得銅元九千八百枚（廣西農村都以銅元爲貨幣單位，農民是不信仰紙幣和銀毫的）約合毫洋四十四元五角。這里，你如果做一個簡單的數學習題，便知你這次借款除了所負的重利和將來償還時還要受種種酷刻的條件外實際所得的銀數也只及名義借款百分之八十九，這便是說，你借一百元只能實收八十九元。

這是借債時的情形。等到你到了冬天，沙糖上了市，挑去抵債的時候，情形也不是很簡單的。沙糖上市的時候，價錢照例很低，而且最易受「糖房」的操縱。去歲年底，我們在廣西調查時，每斤沙糖普通只賣銅元十四枚。拿去抵債，照例還要比市價降低二三枚。而且「糖房」老闆的秤至少是有兩種：稱出時用「九八秤，」稱入時却用「包二秤；」「包二」云者即一百斤等於實際重量一百零二斤之謂也。這樣一來，所以你如果再做一個數學習題，便知你去年所借的二百四十五斤白糖，今年至少要用一千二百七十二斤沙糖才能償清。這一千二百七十二斤沙糖即使依當時「糖房」操縱下的市價計算，也要值銅元一萬七千八百零八枚，或毫洋八十元九角。這個數目和去年借款時實際所得的四十四元五角比較，已超出百分之八十二，這便是說，去年四五月間你向「糖房」借洋一百元，今年二三月間須還洋一百八十二元。

雖然，這還是一個表面上的計算，事實上「糖房」老闆收了你的沙糖，他是要拿去煉白糖的。根據我

們的調查，每百斤沙糖，通常可以得三十斤白糖和六十五斤水糖。這六十五斤水糖又可以熬成四十五斤二沙糖。二沙糖還可以提煉二白糖。四十五斤計可得二白糖十斤，桔水三十斤（桔水是製酒精的原料。）這樣計算起來，你挑去抵債的這一千二百七十二斤沙糖，加以提煉，大約可得頭白糖三百八十二斤，二白糖一百二十七斤，合計白糖五百零九斤。這五百零九斤白糖，「糖房」老闆又可以作價再來放給你了。

這種放債的辦法，在廣西，就叫做「放糖花。」這種方法不但殘酷，而且巧妙得無以復加。因爲在資本主義的國度裏，資本家不管怎樣異想天開，他總不能不負收集原料和推銷製品的責任，但是我們的「糖房」老闆便能把這些責任一一推到借款的蔗農身上。

在廣西，「放糖花」並不是一個特殊的制度，此外，「放穀花，」「放牛花，」「放豬花，」……都是十分普遍，上面所述「放糖花」自然只是其中的一個好例而已。

中國的經濟，雖然有些人一口咬定，說是資本主義性的，但在實際上資本主義前期的封建剝削關係還普遍地在生產界中占着絕對重要的地位，然則這篇文章所敍述的又豈只是代表廣西一省的經濟性質能了嗎？

一九三四，二，二十七日。

十七　貴州平壩縣農業概況

張洪績

一　平壩位置及其面積

平壩位於貴州西路，距省會貴陽百二十里，爲滇黔往來必經之地。淸時名安平縣，屬安順府；民國改元，始有今名。毗鄰縣份爲安順，貴陽，廣順，淸鎭四縣。全縣山巒起伏，鮮有平地。計東西距離約九十餘里，南北不過六十里，故其面積總計亦不過六千方里。在淸時本縣區分爲華楚，蒙楚，中七，中八，中十，後一，後二，後三，前屯，後屯等等地段；民國以來，即以東一東二東三西一西二南一南二北一北二中區等十區劃分地段，迄今仍之未變。

二　農田概況

平壩面積雖有六千方里，因全境俱爲蜿蜒不絕山巒所佔據，故可耕種之田土，不過佔面積百分之十而弱。而此可耕之田土，又復有一部份爲荒山荒地所佔，故實際上，現時所耕種者，只不過佔總面積百分之六而已。因爲地位高下不同，故田土之多寡以及其出產物遂亦各異。大概言之，東南各區及北一區田多而土少，且其地質較爲肥沃！西區及北二區土多而田少。各區田土之多寡既各異，故出產之物，在東南各區，以穀爲大宗，而包谷洋烟之出產則不甚多。西北各區，則恰與是相反。就田而論，有濫田乾田之分，而濫田又可

分爲湖田冷水濫田及濫田三種。此三者之中，前兩種因出產不豐，故地價亦甚爲便宜；至後者則爲田之最上者，無論何地，價格均貴。乾田可分爲高膀田與沖田二種。前者專望雨大及山洪暴發時，始能得水種植；後者則除天雨自然給水量外，亦可用人工灌漑法以引水進田，但水源過遠則殊甚費事。此不過就田之有水與無水而爲之區別者。若就田之泥色及其性質而分，則有沙田，黃泥田，白泥田，黑泥田，膠泥田，湖泥田，鴨屎泥田等數種。若以土而論，則可分爲沙地，黃泥土，馬血泥地，黑泥地，白泥地數種，就中以沙地，黑泥地出產爲豐，故地價較昂，黃泥地次之，白泥地又次之。

三　土地分配

平壩全縣可以耕種田地約五十餘萬畝，農田共四十多萬畝，耕土約十餘萬畝。至農民耕種之田土，其畝數之多寡，因向無精確之調查，故未知其詳。但是，全縣人民爲八萬餘口，據歷年派款之冊子觀之，全縣戶數有一萬六千二百餘，而農民戶數則有一萬四千五百，則全境農民戶數當占總戶數十分之九弱。就各地觀察之結果，每戶所耕種之田土面積，其數在七畝至九畝者占百分之十五，九畝至十三畝者占百分之四十五，十三畝至二十畝者占百分之三十二，二十畝以上至三十五畝者占百分之十。農民之中，可分爲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三種，此外還有所謂雇農——即普通所稱的「幫工」。雇農之產生，不消說是因爲一方面無自己田土耕種，而他一方面又無力購置農具耕牛以討他人田土耕種，爲生活所迫，不得不出賣其勞

動力。此種雇農，又可分爲長工，月活，零活三種。長工就是整年出賣，除供宿膳及草鞋幔肩布外，每年可得工資三十元左右。月活出賣一月之勞力，雇用月活之雇主，多於春秋農忙時節，故應雇者除宿食外，至少可得六七元一月之工資。零活則爲兩天出賣勞力，通常亦不過一角四五仙錢一天。上述四種農民，可以說是平壩農業生產中之中堅分子，占全縣人口之百分九十，以九人供一人之食，故每年除自給外，尚徵有剩餘以供鄰縣之用。

四　農耕情形

農民耕種時期，春秋兩季最忙，夏次之，冬季則較爲空閒。每年秋收後，農民即從事土中工作，如種鴉片烟等。待種烟畢，即開始犂田，使土壤疎鬆，是爲初耕。所犂之田，若爲濫田，則於犂後，繼之以小耙碧耙（或曰壩）使土壤鬆而實，免水漏遺，此外並施以肥料，如牛馬豕糞等。至四月中旬，即行收割鴉片烟，同時也就在田中撒秧（卽播穀種）五月中旬，再行二次犂田施肥，並引水進田以爲插秧之準備。灌溉方法，可分爲：（一）在河邊者，若河水勢大，則横河砌一壩，而於壩之一端開一口，並砌一臺，用竹製一傘形之高車，安上水筒，藉水流而旋轉，水卽入田，且可期其週年四季不乾。若河流不大，而又無天然之地勢可用，則用人力就水之便利而灌溉之。至灌溉所用之工具，多爲木製之龍骨車，此龍骨車若在田坎不高之田畝，一人可運用一架，田坎高時則須二人。

五　佃戶與地主關係

因土地之遠近與肥瘠之不同，故佃戶對於地主之關係，亦稍有差別。但就一般言之，佃戶之欲向地主租田者。不外分上租分花兩種。上租就是租田佃戶，經人介紹與地主租田時，即立下租約一張與地主，承認每年秋收後，上納曬乾車淨租穀若干，屆時請地主量印；此外並言明每年若遇地主有紅白喜事時，佃戶須爲義務之服役，不取報酬。地主若允許時，亦得遷介紹人書一發約，書明田之坐落地名及坵數，俾佃戶得以按約種植。若佃戶在租田時，有言定由地主供給佃戶耕牛房屋，及下脚糧者，於租約發約上必須寫明。分花就是將田安與佃戶耕種，到秋收時，由地主親到田中或土中分收者是，但所謂分花，有平分，正四六分，及倒四六分三種之別。平分就是佃戶與地主各半，正四六分，必須田土近便而肥沃者，地主以爲佃戶耕種此等土地，所費勞力與資本無幾，而收穫又佳，故於安田時即議定由地主分六成，佃戶分四成。若田土過於遠而瘠薄者，則其分法恰與是相反，是之謂倒四六分。

六　農產物之種類及數量

平壩農田出產，計有粘穀糯穀兩種。粘穀又可分爲大白粘，水難乾，十月早三種。糯穀亦可分爲粘穀糯，猪屎糯，打斗糯，黄糯，碗米，黑糯六種；土產有包谷，高粱，麥，蕎，豆，烟，烟草，靛，小米，菜子等等。至其出產數量，略列表示之如次：

品名	產額（單位石）
豆類	一，五〇〇
小米	五〇
高粱	六〇〇
蕎	一，五〇〇
麥	二，〇〇〇
包谷	五〇，〇〇〇
穀子	一五〇，〇〇〇
烟	一，〇〇〇（擔）

七　農產銷路與市集情況

平壩農產，每年除供本縣自食外，穀子約可餘四百石左右，包谷約餘二百石，豆類六十石，運銷鄰縣。其銷路為貴陽與安順，以銷售於貴陽者為最多。至於在本縣縣境集散情況，東西南北均有市場，大概言之，東南住居之人，則以會周馬場，羊昌河，龍場，飯籠舖，小雞場這幾個地方，為農產聚散之區。住居西北者，則以十字路，洞上場，七百房等地為聚散之區。此外，平壩城中，亦有場期可以集散，且因其地位適中而又為一縣之

政治中心地，故四鄉之人逢場期而至者，更形踴躍。

八　農民負擔

平壩農民的負擔，最近一年以來，可說甚屬苛重，因逃稅而潛逃或他徙者，比比皆是。普通者如禁烟罰金，撞墊丁糧，軍隊開拔費，傷兵醫藥費，曆頭費，燈捐，穀捐，勦共捐，借款，招兵費，軍穀軍米等等，橫徵暴歛，民不堪命，貴州農村之日趨破產，可以思過半矣。

一九三五，一，十九日。

十八　貴州農民的負擔

張洪績

貴州地瘠民貧，財政支絀，這本爲不可掩的事實。不幸十數年來，因爲政變靡常，軍事迭興的結果，經費既劇烈的膨脹，由三百七十餘萬達於二千數百萬之鉅，當局者點金乏術，當然只有竭澤而漁，拚命地以一般農民大衆爲其搜括的對象。剝削誅求，固無怪乎整個的貴州，越發走至山窮水盡的地步了。

現在，貴州的局面已變，過去的一切，似已隨着政治之轉變而付諸東流，沒有再提的必要了。而且也有人這樣的說，今後的貴州財政，既在中央統治之下，不敷之數，中央勢必要加以補助；貴州民衆的負擔除了合法的稅款照常地繳納外，其餘不合法者不特人民可以不繳納，就是政府也不會舉辦以重累於人民了。惟查近年以來的中央財政，亦正在支絀艱窘之中，不敷之數，尙無法塡補，然則貴州歲出的不敷尙望中央發款補助，眞是談何容易！姑無論將來的事實如何？而刼後餘生的貴州民衆，在目前正如人之害重病，剛好而尙未復元，這只宜吃補藥，不宜吃下藥。若昧於此理，則危險實甚；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因而我們遂不憚煩在此把以往貴州農民的負擔實況，作一概括的敍述，藉以促社會人士之注意，使讀者可以知道貴州農民的負擔究竟重到什麼地步。於此我們可以把它分成兩方面，即田賦與苛捐雜稅的負擔兩項來說。

第一、田賦的負擔；「官家的糧銀，百姓的會銀」這兩句話，在我們貴州，可說已深印入一般人民的腦

中，由這話看來，則我們就可知道貴州的人民，無論其爲地主，自耕農，抑或爲半自耕農，只要他們有了田土，便必須按期到官廳去繳納田賦，以了其應盡的義務。惟查貴州的田賦收入，甚屬有限，在民國以前，全省歲入，合計不過正銀（田賦分正銀地租秋糧三種）十萬零三千五百五十五兩，米十四萬七千一百一十九石，改元而後，賴前財政當局張協陸的竭力整頓，剔出中飽，合併陋規，數年之間，歲入遂逾八十餘萬元，較之原額，約增兩倍。民九以還，軍事迭興，歲出既膨脹至千餘萬元，而田賦之收入，仍不過爾爾，僅佔百分之六七；兼以是項稅收，既屬國家正供，征收多寡之權，又全操諸中央政府，且事實上，收入之多寡，雖可截留自用，然論理似應繳解中央，手續既繁，所得有限，因而民九以後之理財者，對於田賦之收入，均視爲無足輕重，一任民間之拖欠與糧書之舞弊而不屑過問了。以是，在貴州雖曰內戰頻仍，苛雜如毛，然在民十七以前，大多數私有土地的農民，總算是托「國家正供」這四字之福，而沒有受田賦之累。不幸十七年十一月國地稅劃分後，中央雖然頒布了豁免民七至民十六年間之丁糧積欠的命令，始明定田賦收入歸諸地方，並予各省有加賦之權，但誰又料想得到貴州當局者會得意忘形，對於後者則唯命是聽，惟恐其不速，除任意施行所謂「兩」「石」的換算率外，更有所謂教育附加等等的征收；對於前者，則不特諱莫如深，反而一面積極清理積欠，一面巧立所謂丁糧一次抬墊，二次抬墊，五次抬墊（民十七至民二十），因是而田賦附加的突飛猛進，眞是一日千里，令人咋舌。關於田賦附加的情況，參看次列正附稅之百分比率表，即可一目瞭然。

各田附加	元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水田	六九	一一〇	一一〇	一二八
平原旱地	六七	一四八	一三一	一四四
山坡旱地	七七	一五一	一五九	一四三

上表係中央農業實驗所農業經濟科的調查報告，各年的正稅定爲一百。我們看了這個表後，當可知道貴州的平原旱地與山坡旱地的附加額，在二十年二十一年與二十二年這三年裏，雖說是有加有減，然較之民國元年，總是加增了一倍。此外，我們再就貴州財政廳十九年的田賦收入報告，試看田賦等正項收入數字，是否仍有加減呢？據當局的報告，民國元年的田賦契稅等加入爲一，二七三，一二三元，十九年爲一，四四八，一二一元。單以正稅而論，十九年的收入較之元年就已有一七四，九九七元的增加，要是再加上丁糧擡墊以及敎育等附加的數字，其增加的程度，更是駭人聽聞了。由這增加的數字看來，我們就可以想像到貴州農民的困頓狀況，實有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了。

因爲田賦附加的日愈加多，另一方面就反映到地價之日益下落。關於地價變遷的情況，據中央農業實驗所的調查，有如次表所列。

各田地價	元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水田	六一	六九	九九
平原旱地	六〇	九二	九八
山坡旱地	五九	八七	九三

註：此表係以二十二年的地價爲一百

表中數字，我們若由表面上看去，自然免不掉要爲它所朦蔽，以爲貴州的地價是在逐年的往上高漲着；但若以之與前列正附稅百分比率表對照而研究之，則我們一定會立刻發現出它不特沒有增加，且反而是在相對的逐漸下落呢。這還是以事論事，要是以我們所知的實況來說，則近年來的貴州地價變遷，實有一落千丈的現象。例如：在民國初年貴州雷厲風行禁種鴉片烟的結果，既無特產行銷內地各省換取現金，因之農村金融遂感枯竭，以致引起糧食的低落，石穀（以貴陽爲準）僅值銀七八錢。糧食低落的結果，也就反映到地價的日愈下降，每斗田僅值銀十多兩。迨至民國六年，貴州因中央協款停發，爲塡補財政上之赤字而大開烟禁後，既有物換取外省現金，穀遂日有起色，由七八錢一石漸漲至五六元，同時並促成地價之繼長增高，迄民國二十年而始定。在這十幾年當中，地價高漲得最厲害的時期，要算民國十四年，此因這年的穀價陡漲至每石値錢三十餘元故也。二十年後，執政者窮兵黷武，隨之而來的就是苛捐雜稅繁興，因而農民的負擔也就日益加重了。農民被剝削在「油乾燈盡」的地步，就無所謂購買能力，只有實行飢

餓術以苟延殘喘，抑或率性挺而走險，這就是貴州近年來土匪猖獗的原因。農民既無購買能力，糧食價格當因無人問津而跌落，並促成地價之鋭減，而演成在二十年以前每斗田值一百七八十元者，現僅值六十七元，甚至形成有地賣無主買之怪現象。

第二、苛捐雜税的負擔：民九以還的貴州，總是內訌連年不絕。戰爭的結果，必然的是支出龐大的軍費，膨脹了歲出的預算。因之苛雜迭出，苛捐雜税之名目以及其收入額數計省款方面，其確實可據者，除正當税收之田賦九十萬，屠宰税六十五萬，印花税二十五萬，契税六十五萬，烟酒公賣費二十萬而外，有百貨厘税一百二十萬，鹽捐一百五十萬，郵包税三十萬，烟土出關税五百萬，護商費一百二十萬，烟館燈捐三十萬，禁烟罰金二百八十萬，馬路捐一百萬，營防捐六十萬，吸烟癮民捐二百二十萬，軍庫券一百萬，抗日捐一百萬，飛機捐五十萬，銀行基金一百萬，善後借款一百五十萬，存款庫券二百萬，抬墊丁糧一百萬，維持紙幣一百萬，預徵禁烟罰金一百萬，估收紅章幣基金三十萬，再發紅章幣一百萬，合計全年的收入，約在二千九百多萬元以上。這二千九百多萬元當中，經常收入者約爲一千八百餘萬元，臨時收入者約爲一千一百餘萬元。至於縣款方面，雖無精確數字足供參考，然名目之多，亦不下二十餘種，計有區經費，酒席捐，屠宰附加，牙行捐，斗息捐，公安捐，落地捐，脩志捐，年猪捐，團防款，春帖（國曆）附加，契税附加，民練捐，開拔費，軍米，軍穀等等。

省稅與縣稅的名稱既有這麼多，則農民負擔之重，當可想見。這些省縣稅之中，除少數部份如烟土出關稅護商費等等係名稱其實的征收外，其餘可說全是按戶攤派，並非依照一定的手續征取。像這樣不分皂白的橫征暴斂可說除從前軍治的四川而外，在中國是再沒有與貴州相比擬的了。更可怪異者，如禁烟罰金與吸烟癮民捐二項，以理而論，種烟與吸烟的固應受罰，固應納捐，然而在事實上，不種不吸的也要受罰，也要納捐，這種徵收方法，可說是絕無而僅有的。像這樣的辦法，試問不是獎勵人民種烟與吸烟又是甚麼呢？貴州有人民七百萬，而每年政府的支出竟達二千九百餘萬，就是按戶攤派者，亦不下二千萬。這兩千萬元的鉅額，若以全省人口來平均分配，則每人每一年之負擔當為三元餘；若以戶數計之，則每一農戶之負擔，一年至少要在二十多元以上。實際上恐還不止此呢？譬如地主和富農們，因為與所謂區長保董等，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即是說有了情面的關係而減下來的額數，不消說是要加在或轉嫁在敢怒而不敢言的自耕農半自耕農與佃農的身上。

前邊所述的平均攤派，由表面上看去，這似乎是極公平極普遍不過的事。惜乎農民貧富懸殊，在這表面上極公平極普遍的形式下，實含有極不公平極不普遍的意義，以致幾乎把稅捐的全部加壓在一般貧農肩上。

總之，目前在貴州最為捐稅所苦累的人，實際上不是地主與富農，直接的是自耕農，間接的是佃農。一

般的自耕農半自耕農與佃農，計其終歲手足胼胝所獲，以自耕農而言，要不過穀三十石左右，包谷二石，黃豆一石五斗，鴉片烟三百兩，合計共值錢二百餘元。這二百餘元之數，除去其生產成本約八十八元而外所餘不過百二三十元。而此區區之數，衣取於斯，食取於斯，婚喪嫁娶亦取於斯，試問怎够分配呢？今更不幸還要負擔一大筆直接與間接的苛捐雜稅，固無怪加緊貴州農村經濟的總崩潰。加速農村勞力的喪失。因爲農村經濟破產程度的深刻化，故農戶中之自耕農成分是在逐漸的減少，佃農與雇農的成分是在逐漸的加多。這種畸形的現象，我們若從另一方面看，就不外是在表現地權之向地主手裏集中，但事實地主也在叫苦呢。那末，貴州農村經濟衰落之情況與夫破產之深刻化，由此也可見一般。關於自耕農之逐漸減少，以及佃農與僱農之逐漸增加情況，最近雖無精確統計，但觀下列佃農之百分比率表，就不難想像其正趨向於這條道路了。

佃農%		自耕農%		半自耕農%	
二二年	四二	二二年	三三	二二年	二五
二一年	四五	二一年	三三	二一年	二二
二十年	三九	二十年	三八	二十年	二三
元年	三三	元年	四三	元年	二四

（此表係根據二十二年南京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的調查而作）

一九三五，六，一日。

中國農村經濟論文集終